Fountain

村上春树首次授权中文电子书

村上春树

小套装系列

上海译文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Fountain



村上春树首次授权中文电子书



村上春树



小套装系列



目录

雨天炎天

希腊篇

再见，现实世界
阿索斯是怎样的世界？
从达菲尼到卡里埃
从卡里埃到斯塔夫罗尼基塔
伊比隆修道院
费罗塞修道院
卡拉卡尔修道院
拉布拉修道院
普罗德罗姆小修道院之行
卡胡索卡里贝亚
亚吉亚·安纳——再见，阿索斯

土耳其篇

兵
面包和茶
土耳其
黑海
霍帕
凡湖猫
哈卡里之行
哈卡里（2）
万宝路

24号国道的噩梦
24号国道沿线

远方的鼓声

远方的鼓声——写在前面
罗马

罗马
两只蜂——乔治和卡洛
蜂飞了

雅典

雅典
瓦伦蒂娜

斯派赛斯岛

抵达斯派赛斯岛
海岛淡季
老港
缇坦尼亚电影院的深夜
来自荷兰人的信、岛上的猫
斯派赛斯岛上小说家的一天
暴风雨来了

米科诺斯

米科诺斯
港口和范吉利斯
撤离米科诺斯

从西西里到罗马

西西里

南欧跑步情况

罗马

比拉·托雷克里

凌晨3时50分的昏死

去梅塔村途中

梅塔村

春天的希腊

帕特拉斯的复活节周末和对壁橱实施的大屠杀

从米科诺斯去克里特岛、浴缸之战、101号酒宴大巴的光与影

克里特岛的小村庄和小旅馆

1987年，夏天和秋天

赫尔辛基

马洛内先生的房子

雅典马拉松和退票还算顺利

雨中的卡瓦拉

卡瓦拉驶发的客轮

莱斯博斯

佩特拉（莱斯博斯岛）

罗马的冬天

电视、意式疙瘩汤、普雷特

罗马的岁末

米尔维奥桥市场

隆冬时节

伦敦

1988年，空白年

1988年，空白年
1989年，复原年
康纳利先生的公寓
罗马停车种种
蓝旗亚
罗得岛
春树岛
卡尔帕索斯岛
选举
意大利的几副面孔
托斯卡纳
雉鸠亭
意大利的邮政
意大利的小偷
奥地利纪行
萨尔茨堡
阿尔卑斯的麻烦事
尾声——旅行结束
边境·近境
东汉普顿幽静的写作圣地
无人岛·乌鸦岛的秘密
横穿墨西哥
从巴亚尔塔到瓦哈卡
做同样的梦的人们
超“有深度”赞歧乌冬面之旅

诺门罕钢铁墓场

从大连到海拉尔

从海拉尔到诺门罕

从乌兰巴托到哈拉哈河

横穿美国大陆

作为一种病的旅行，牛的价格，无聊的汽车旅馆

镇名韦尔卡姆，西部唐人街，犹太人

走去神户

关于套装

产品策划：邵明鉴

套书宣传图：赵瑾

关注微博：@译文的书

微信服务号：上海译文出版社

微信订阅号：译文的书

我们的产品：译文的书

联系我们：noahs.team@icloud.com

合作电话：021-63914089

这部村上春树小套装是上海译文出版社首次推出的村上春树作品，

电子书包括：

·《雨天炎天》

·《远方的鼓声》

·《边境·近境》

村上春树游记系列

雨天炎天

希腊、土耳其边境纪行

[日] 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希腊篇

再见，现实世界

阿索斯是怎样的世界？

从达菲尼到卡里埃

从卡里埃到斯塔夫罗尼基塔

伊比隆修道院

费罗塞修道院

卡拉卡尔修道院

拉布拉修道院

普罗德罗姆小修道院之行

卡胡索卡里贝亚

亚吉亚·安纳——再见，阿索斯

土耳其篇

兵

面包和茶

土耳其

黑海

霍帕

凡湖猫

哈卡里之行

哈卡里（2）

万宝路

24号国道的噩梦

24号国道沿线

版权信息

书名：雨天炎天： 希腊、土耳其边境纪行
作者：[日]村上春树
ISBN：9787532743933
译者：林少华
产品经理：邵明鉴

版权申明

UTEN ENTEN
by Haruki Murakami
Copyright © 1990 Haruki Murakam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Haruki Murakam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译者短语

林少华

提起美国，相信不少人不以为然——哼，不就是个财大气粗的山姆大叔嘛！但若提起希腊，则有可能涌起浪漫而静谧的遐思——噢，维纳斯的故乡，奥运会的第一缕圣火，西方文明的发祥地，以及希腊诸神，以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总之，和咱们中国一样，至少有值得世人仰视的辉煌当年。然而又必须承认，我们对时下的希腊又所知无多。多数人宁愿去其实并不可敬也不可爱的山姆大叔家里感受他如何财大气粗，却硬是想不起去希腊领略绝世美女维纳斯的流风遗韵，岂非咄咄怪事！

人家村上春树到底情趣不俗，既去了美国，又不忘希腊。而且去希腊不是为了欣赏维纳斯丰腴娇美如花似玉的留守姐妹，而是一头扎进"希腊僧侣自治共和国"。此"国"位于阿索斯半岛（或称阿克蒂半岛、圣山半岛），乃希腊东正教圣地，上面有二十座大修道院和许多小修道院，近两千人在那里潜心修行，晨钟暮鼓，黄卷青灯，诵经祈祷，自耕自种。没有电，没有车，没有酒，没有娱乐，没有女人。别说女人，"动物也不许放雌性进来，雄性统统被阉掉"。村上便是在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住了四五天。走路淋成落汤鸡，客栈没有冲水马桶，含着眼泪吃发霉长绿毛的面包，为多拿一块西瓜而宁愿遭人白眼……不料离开那里之后，却又奇异地生出怀念之情。"在那里，人们虽然贫穷，但活得安静而有高密度的信念。那里吃的食物虽然简单，但味道充满活生生的实感。"说起来，虽然村上的祖父是寺院里的和尚（日本的和尚可以娶妻生子），但他本人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对与宗教有关的文物丝毫不感兴趣。在阿索斯的修道院目睹众人毕恭毕敬瞻仰"宝物"时他也全然无动于衷。尽管如此，这次由俗世进入圣地又重返俗世的俗圣之旅还是给他以某种触动，至少是他最为接近宗教的一次特殊旅行。读之，我们不仅可以同他一起游历这个神秘的"神权独立王国"，感受奇特的宗教气氛，也可以追寻他这方面的思维轨迹和情趣趋向。

从希腊圣山下来，村上和他的摄影师同伴直接开车驶入相邻的土耳其，顺时针方向沿土耳其国境线周游二十一天。他在希腊接触的几乎全是僧侣，而进入土耳其面对的则大多是兵。遍地是兵。为何兵多呢？因为“土耳其是个罕见的一贯孤独的大国”，西边同希腊势同水火，北面对苏联恨之入骨，东部南部同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三国纠纷不断。固然加入了北约，却未被接受为欧盟成员，西欧不信任土耳其。“总而言之，这个国家无论往哪边看都不可掉以轻心。真正要好的朋友一个也没有……况且本来就是尚武之国，很多东西都是通过战斗、通过把对手打翻在地夺过来的。”这种“煞有介事的尚武的军国主义”让村上颇伤脑筋（当然他对一个个质朴的普通土耳其兵并无不好印象）。但更糟糕的是其肠胃面临考验。“一闻膻味胃就缩成一团，食欲半点也上不来”。然而南下内陆除了羊别无他物，触目皆羊，餐馆里是羊，肉店里是羊，“整只剥了皮的羊挂在那里”。满城膻味，无孔不入。一次开车赶路时遭遇“铺天盖地的羊群”，于是好奇地对准羊群拍照，不料被羊倌索取拍照费，送了五六盒万宝路对方还不满足，“最后竟提出必须买下一只羊”。总之，兵和羊把村上吓坏了、害苦了。旅行快结束时村上给远在东京的夫人打电话，夫人问：“两个男人快活吧？”他心里嘀咕：“这里到底有什么可快活的呢？两个人都拉了肚子，在糟糕透顶的公路上玩命开车，太阳晒，狗咬，小孩扔石头，从早到晚只吃面包，澡都一直没洗，这算哪家子快活！”

如果说在希腊村上感受的是宗教，那么在土耳其感受更多的则是政治。宗教关乎人的精神本源，政治是驱使人的外在力量。此次旅途中村上对两者的体验和思考，融入了他后来的长篇巨著《奇鸟行状录》之中。可以说，旅行不仅产生了游记，也间接催生了他的小说。只是小说中的村上是“门内”影影绰绰的村上，旅途中的村上更是“门外”真真切切的村上。

二零零四年五月十四日

于青岛窥海斋

希腊篇

阿索斯——神的现实世界



再见，现实世界

先从乌拉诺波里乘船。

阿索斯半岛[1]巡礼之旅将从这里开始，并在这里结束。从这里出发，再返回这里——若有意返回的话。

乌拉诺波里位于阿索斯半岛的根基部，是海滨一个观光休闲小镇。船七点四十五分从这里的港口起锚，一天仅此一班。所以，最好尽可能提前一天来到这里在宾馆住一晚上，翌日慢慢吃完早餐从从容容上船。可以说此乃上策。因为，万一赶不上这班船，就要在这乌拉诺波里镇上困守二十四小时，困到第二天早上，而这无疑是相当严重的情况（我们实际遭遇过一回）。

从乌拉诺波里到达菲尼乘船约两个小时。这个时间正好歪在甲板上舒舒服服晒太阳，而世界则因这两个来小时的航行分成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乌拉诺波里和达菲尼两镇之间便是存在如此决定性的差异。一来两镇的形成方式根本不同，二来其所依据的规范和价值观也完全相左，而且居民的种类和追求也不一样。用一句话说来，乌拉诺波里脏兮兮却又令人眷恋，属于我等凡夫俗子居住的地方，达菲尼则属于建立在普遍性、清廉和信仰之上的圣境。每天一班的渡轮便是把这两座在很多方面互不相容——即使不能说是背道而驰——的小镇勉强连接起来。

乌拉诺波里——顺便说一句，乌拉诺波里是神圣的城市之意——有几家小旅店，有酒吧式餐馆，有海滩，有码头，路边紧挨紧靠停着挂德国车牌的野营车。镇不大，沿一条路从这头走到那头，大多事都可办完。有漂亮的海滩、大得令人吃惊的停车场（大概因为来阿索斯的人都把车停在这里）和码头。甚至有一座看不出名堂的古老的石塔。酒吧式餐馆飘出油炸小乌贼的独特香味儿。戴深色太阳镜身穿游泳衣的女郎拖着橡胶拖鞋缓缓穿过路面。同周围光景简直格格不入的迈克尔·杰克逊的歌从收放机里流淌出来：each bad、each bad……一只狗在背阴处酣然大睡，仿佛正在生死之间彷徨。一个背负旅行包的人如获至宝似的抱着四十五日元一条的大面包走了过去。咖啡馆里面，本地的老年人一支接一支吸烟，持续污染着四周的空气和自己的

肺。希腊赚小钱类型的休闲海滨全都是这个样子。只是，这里是最后一站，是我们小小现实世界的天涯海角。再往前去，没有女人，没有酒吧式餐馆，听不到迈克尔·杰克逊，没有德国游客。连德国游客都没有了，老兄！是的，这里是人世的尽头，是欲望最后的出口，是现实世界的边陲。

没赶上渡轮的我们好歹在码头找到一艘往达菲尼运送建筑材料的船。同船长交涉后，得以花三千日元搭船过去。乘客只我们两人。谢天谢地，总算没在乌拉诺波里白耗一天。

可是话又说回来，大海是多么漂亮啊！从乌拉诺波里开船不久，我们便进入崭新的天地。我把上身探出栏杆，目不转睛地久久看着海面，百看不厌。虽说希腊有很多漂亮的海，但像阿索斯一带这么美丽迷人的海记忆中从未有过。当然，单纯澄澈单纯蔚蓝的海任凭多少都有，而这里的海则是全然与此不同的另一种美。怎么说好呢，那是性质迥然有别的一种澄澈、一种蓝。水简直像真空的空间一样纯净，而又被染上深葡萄酒色。对了，就好像大地酿造的葡萄酒从地底的缝隙“咕嘟嘟”涌出，给海面着了色——便是那么一种令人头晕目眩的蓝。那里有鲜亮亮的清冽，有丰饶，有突破所有观念限制的令人诚惶诚恐的深度，晚夏清晨强烈的阳光如尖刀一般剧烈地扎在上面，又反射回来哗然四溅。船影以历历分明的轮廓映进海底，摇曳不定。鱼群无声无息地横向游过。海未被污染，无论怎样凝眸细看，也看不见脏物。感觉上那已经不能称之为海。甚至倏然间觉得那仿佛某种仪式，让我想起经过久远得令人眩晕的时间和牺牲后被彻底格式化、并因急于向美的核心突飞猛进而失却其本来意义的一种仪式。

海就是漂亮到这般地步。

随着船在海面行进，油炸乌贼、泳装女郎、迈克尔·杰克逊、“万宝路”广告等等迅速后撤变小，不觉之间消失了。一旦消失，就连那些东西是否曾经存在这点都在我脑袋里变得大可怀疑。映入我眼帘的惟有坑坑洼洼的半岛海岸和岩壁。与此同时，海岸开始现出仿佛时间倒流回中世纪的庄严的修道院——阿索斯！

---

[1] 亦称阿克蒂半岛、圣山半岛。希腊东正教会（希腊正教）圣地，希腊僧侣自治共和国所在地，有“神权独立王国”之称。有一千六百多居民，当中多数为修士，少数为隐士。



阿索斯是怎样的世界？

开始阿索斯之旅之前有几点我们必须了解。其中最基本的是这样一个事实： 阿索斯半岛绝对是另一世界。阿索斯乃是以与此侧世界截然不同的原则运转的世界。其原则就是希腊正教。此地是希腊正教的圣地，人们为了接近神而来此访问。正因如此，这块土地尽管位于希腊境内，却在政府的认可下作为宗教圣地享有完全的自治。

治理阿索斯的法律，比任何世俗法律和宪法都要古老和强大。东罗马皇帝统治过这里，继而土耳其人统治，接下去由希腊政府统治。但无论在哪一种政治体制之下，作为宗教共同体的阿索斯体制都丝毫不曾动摇。这便是阿索斯。

阿索斯半岛现在有二十座修道院，约两千个僧侣在那里一丝不苟地修行。他们继续着几乎和拜占庭时期相同的自给自足的俭朴生活，为了接近神而日夜祈祷不止。他们非常虔诚，为了抵达宗教真理和至福境界而离开人烟、断绝世俗欲望潜心修行。那些祈祷需要付出非常微妙的注意力，惟其如此，他们才特意来到这个圣域，而不是出于童子军那种心血来潮。这点务请牢牢记在脑袋里。

所以，住在这里的一个女人也没有，也不允许女人进山。因为有女人会妨碍——说法倒是不礼貌——修行。动物也不允许放雌性进来。雄性统统被阉掉。不过，当然不是说阿索斯的动物无一不是雄性。这里说的仅限于家畜那样的大动物。

另外，这里是希腊正教徒的专属地，外国异教徒进来须取得希腊外交部签发的特别入境证。因为无关的人乱哄哄蜂拥而入，教徒们便无法静心修行。外国人逗留期限原则上为三夜四天，超过此限似乎很难获得批准。

据说圣母马利亚乘船访问住在塞浦路斯的拉撒路[2]，途中因遭遇风暴而偏离航路，在神的指引下漂流到阿索斯海岸。在那以前这里被置于令人讨厌的异教徒的支配之下，而圣母马利亚脚刚一触及海岸，所有偶像马上变得粉身碎骨。马利亚把阿索斯定为圣庭，宣布女性永远不得踏上此地。于是阿索斯成了被神祝福的圣地。

我想，假如现在发生这样的事，马利亚势必受到全世界女权组织

的猛烈抨击。但这是差不多两千年前的旧话，没有什么人为之气恼，并且自那以来女性便无法进入这里了。若让我说一下个人感想，我觉得女人不得进入的场所世界上有一两处也未必不好。即使某处存在不准男人涉足的场所，我也不至于忿忿不平。

言归正传。这里修建正规修道院是十世纪的事。鼎盛时有四十座修道院，容纳两万僧侣修行。土耳其帝国统治时期也是由于财政问题，加上海盗屡屡袭扰，一段时间里显得相当萧条，但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又一点点现出复兴征兆，直至今日。特别是六十年代以后，对物质主义感到失望、转而对作为取而代之的价值观的宗教发生兴趣的年轻人（尤其大学毕业的知识阶层）来此出家的事例多了起来，使得这里作为新的灵魂（spiritual）圣境受到世界关注。在阿索斯转过以后我也感觉得出，每一座修道院年轻人都为数相当不少，总的来说他们外语也很精通。在这个意义上，阿索斯这个地方同日本人心目中的既成宗教含义完全不同。在这里，宗教分明是活着的，与时代共同呼吸。

还有，在这个半岛上，大自然几乎保留原始状态，可以说是希腊国内唯一未被旅游业开发商染指的地方。地形也很险峻，全是山，几乎没有平地。半岛南边耸立的阿索斯山海拔两千米。海岸线均为悬崖峭壁，仿佛要拒人于千里之外。无论去哪里都必须以自己的双腿翻山越岭。交通工具那东西在半岛上可以说根本不存在。

自从在书上得知阿索斯以来，无论如何我都想来此一游，想亲眼看一下那里有怎样的人、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

如此这般，一九八八年九月一个清晨我们从乌拉诺波里乘船赶往达菲尼。同伴是摄影师松村君和编辑O君。松村君和我下一步准备开车周游土耳其。这阿索斯是第一步。O君被进入阿索斯的种种手续搞烦了，只同行到这里为止。

从结果上说，这次旅行相当辛苦。虽说我绝不讨厌辛苦的旅行，但我还是觉得这一次非同一般。路难走至极，天气恶劣至极，饮食糟糕至极。

不管怎样，还是按顺序来吧。首先是阿索斯的入口——达菲尼。

[2] 《新约圣经》故事人物。据《约翰福音》记述，乃家住伯大尼村的马大和马利亚之弟，耶稣使其复活。



从达菲尼到卡里埃

船到达菲尼港。从远处看，不过是个到处可以见到的普普通通的希腊港口。但随着距离的拉近，开始三三两两看见若干不普通之点。因是女人禁入之地，说理所当然也是理所当然，可是一个女人也没有的光景就在眼前的时候，还是产生一定的感慨。港口四周聚集着数百之众，无一不是男人，而且半数以上是僧侣。所以，整个光景黑压压一片。这就是说即将进入圣域。

还有一点——作为夏季的希腊极为罕见——没发现像是外国游客的人影。既没有胖得可观的德国夫妇，又没有背囊上缝着加拿大国旗的快乐游客。当然，旅行者模样的人还是不难找见的（他们是乘三十分钟以前的渡轮先一步到达这里的），但差不多全是希腊人，而且全部身穿十分朴素的——换言之，即平均线上的希腊人式的——服装。他们是从希腊各地远远赶来这神圣的大本营朝觐的善男们（没有信女）。

占人群主流的僧侣们全部身穿叫做“拉索”的那种肥肥大大的希腊正教僧袍，头戴呈生日蛋糕形状的圆筒帽，而且统统留着长胡须。对希腊正教我所知无多，不过剃须大概是有违教义或有违什么。头发也都很长，像发髻那样紧紧束在脑后。这副模样的僧侣在希腊各地屡见不鲜，但目睹如此密密麻麻聚集一处却是头一遭。而且有趣的是，仔细观察之下，所穿服装所携物品各有微妙差异。里边甚至有顽固不化的所谓武斗派僧侣，他们身穿破烂得不成样子的拉索，腰间缠一条粗麻绳，肩上搭一个俨然游方僧背囊那样的口袋。说清楚点，较之僧侣，看上去更像乞丐。而一转眼，旁边又有整齐穿着仿佛从洗衣店刚刚取回的全无褶痕的拉索、手提公文包、戴着太阳镜的新潮雅皮式僧侣。以此二者为两端，其间又浓淡不一地散着形形色色的僧侣。真想把他们聚在一处按顺序排成一列。

同一宗教，而且是在如此狭小的半岛之中，僧衣何以存在如此差异呢？我难以理解。

不但整洁或脏污这点，而且拉索的颜色也一件件大不相同。从浅灰到深紫以至漆黑，大凡颜色一应俱全，众彩纷呈。不知是每座修道

院各有不同，还是地位和职务造成的差异，我很难判断。莫非僧侣之间也有贫富之差？也有赶时髦的和不赶时髦之人、也有武斗派和温和派？这东西一一琢磨起来也琢磨不出个究竟，心想反正就是那样，如此不了了之。

反正就是那样。

不过这点也是后来才明白的。实际上他们是各不相同的。他们因其所属场所或生存方式而迥然有别。阿索斯便是这样能够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和做法的地方。所以，他们的打扮各所不一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下到达菲尼港，首先有个类似护照管理那样的地方。把护照放在这里，然后去首府卡里埃。卡里埃有个阿索斯山事务局那样的机关，在此进行入境审查，审查完毕发给停留许可证。没有这许可证就不能在阿索斯山走来走去，相当严格。

从达菲尼乘大巴去卡里埃。说是大巴，其实是个差劲得令人有些不快的劳什子。跑还是可以跑的。怕是已经用了三十几年。汽车用得这么彻底，可算是享尽了汽车的恩惠。大巴全岛只此一辆。

说实话，我们到时大巴刚要开，但座位上全是人，上不去，于是央求能不能凑合着让我们上去，而司机一口一个“不行”。很难说司机态度有多么好。他说到了卡里埃还回来，在此等一个小时即可。这么着，又推迟了一个小时。看来，在这地方着急也无济于事。倒也不是完全没有着急之人——大巴刚开始动，一个五十岁上下的僧侣赶来“砰砰”大敲车窗，喊道“喂让我上去！”司机说“满了不行！”但他置若罔闻，只管“砰砰”敲个不止。司机只好开车门让他上来。那人无论倒插的眼神还是敲门的方式，全都显得怒不可遏。我不由心想从事圣职之人怎么好这样，这地方简直莫名其妙。从一开始就有很多事情让我困惑不解，可是别无他法，只能在此等一个小时。

达菲尼港有个小邮局，有个小海滨，有个小派出所。咖啡馆也有，还有两三家小杂货店。等大巴时间里，我买了一点应急食品塞进背囊。原来想像一旦跨进阿索斯，世俗用品一概买不到了，不料杂货店里基本食品一样不少。盒上落了灰尘，罐头生了锈，但只要不介意，东西不至买不齐。从J&B威士忌到廉价乌糟[3]等酒类、肉罐头鱼罐头、速溶咖啡、糕点——想必前来朝觐的旅行者在此买完食品才去

修道院的，因为修道院只供应一点点食物。至于僧侣们是否在此买东西我不得而知。但不管怎样，看样子这地方并非彻底要求人们清心寡欲，某种含糊性大约还是存在的（后来得知，除了僧侣，半岛还有很多来干活的人，需要卖给他们生活必需品）。

我也在此买了葡萄酒、面包、奶酪、咸牛肉罐头、梨和苏打饼干，还买了四个柠檬（这柠檬后来有千钧之重），往水筒里灌水，半岛地图也买了，然后走进咖啡馆喝了大概是最后一瓶啤酒，啃了面包，又在大巴来之前迷迷糊糊睡了片刻午觉。

港口有两条狗和四只猫。出于慎重我查看了一下，狗的确条条都是公狗。它们具有显而易见的雄性特征——勇武而又似乎哀伤。不错，原则得以维护。遗憾的是猫的性别没弄明白。同狗相比，猫在此地的生活似乎严谨得多，它们没有友好到轻易容我查看性别的程度。再说猫分辨公母远比狗困难。

我无可奈何，定定地瞪视墙头上的猫们的时间里，大巴下山返回。我们即将进入阿索斯内部。

---

[3] 用大茴香籽调味的希腊产的一种果酒，用于饭前促进食欲或饭后作为清凉饮料饮用。



从卡里埃到斯塔夫罗尼基塔

阿索斯一片葱茏。在看惯希腊（特别是希腊南部）树木稀少的红褐色地表的人眼睛里，这景致显得十分新鲜。除却面临海岸的悬崖峭壁，其余无论哪里都绵延着密林和草原。

大巴扬着灰尘爬上山道，把我们拉往山那边的首府卡里埃。说是首府，其实卡里埃只是个静悄悄的小镇，甚至镇这个字眼都不太确切。一个静悄悄的村落——无非停大巴的广场周围排列的几座旧石头建筑罢了。有教堂，有钟楼，仍有几家杂货店。这里也有狗有猫。人影同样稀稀拉拉，只有几个提着皮包或口袋模样的东西的僧侣走过来问我从哪里来的。我说日本。又问我是不是正教徒，我说不是。遂问我信何宗教。无奈，我说是佛教。若回答不信教，很可能被赶出半岛。“日本有正教教会吗？”他问。“有。”我回答（神田[4]的尼古拉教堂即是）。他心满意足似的微微一笑，大概心想日本那个国家还不至于无可救药吧。

这样的交谈在我游阿索斯半岛期间估计重复不止十次。几乎是一字不差按部就班地重复。从哪里来的？是正教徒吗？日本有正教教会吗？总之对他们来说，宗教、希腊正教乃是世界中心，是自己存在的中心，是思考领域的中心，是之于他们的现实世界。他们的关心始于这里终于这里。他们是和我们截然不同的人们。

在不妨说是卡里埃总部事务局的办公室里我们领到了停留许可证。阿索斯划分为二十个修道院教区，保持着可以说是自治中的自治的独立性。惟独卡里埃镇例外，给人的感觉仿佛是特别区。各修道院选出的僧侣聚在这里组成“教会评议会”，就整个半岛的问题作出种种决定。这项制度自修道院创立以来几乎一成不变地延续下来，作为原理是极为民主的。

我们在此顺利取得许可证，好歹走上了巡游修道院之路。由于时间一点点迟于日程安排，此时已到了三点。走不多远了，需要先把今晚住在哪里一事定下来。这是因为，各修道院随着太阳落山同时关门。一旦关门，不到早上绝不打开。一千多年以前这样规定的。所以无论怎么“砰砰”敲门也绝不开门。如果不抢在日落前赶到修道院大

门，我们势必餐风宿露。这地方除了修道院别无投宿之处。

现在仍是夏天，可以说野营也不要紧。虽然食品不是很多，但也不至于饿死。这点准备还是有的。问题是动物。阿索斯半岛有狼出没。至少一开始我们就被这样提醒过，说晚上有狼出没。大自然便是如此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但不管怎样，作为我不想特意在这有狼出没的地方野营。所以，必须细看地图，把行程和所需时间弄得一清二楚。

姑且去斯塔夫罗尼基塔修道院好了。到斯塔夫罗尼基塔有两小时左右路程。其次去伊比隆修道院。第一天，时候又晚了，今天就先看看情况算了。

我们背起背囊，走上通往斯塔夫罗尼基塔的路。午后三时的阳光很强，汗顺着身体流淌下来。但路本身很容易走，简直可以边哼着小曲边走。其实从卡里埃到伊比隆甚至有大巴，但我们坚持走路。毕竟是为了走路来这里的，走就是。山路心旷神怡。种种样样的小鸟在树林里鸣啭，飞起来掠过天空。路上到处立有顶着十字架的佛堂样的东西。木牌上写道“树林是心的憩息地，是神的微笑，注意防火”。一点不错。

中途同一个瘦瘦高高的希腊青年同行。他说要去一座小修道院的作坊帮忙做壁毯。阿索斯除了修道院也有几家大大小小的这种作坊，若干僧侣在那里制作宗教工艺品。他虽然不是僧侣，但定期去作坊从事壁毯的制作。

不久，走到斯塔夫罗尼基塔修道院。在阿索斯半岛二十座修道院之中，斯塔夫罗尼基塔最小。走进院内，左边有一座石头修的旧水道桥，沿桥排列几个水池，还有坚牢的高塔。这座修道院靠近海岸，自古以来频频遭受海盗袭击，因而加强了防御。的确，从海岸一侧看来，较之修道院，更像一座堡垒。

到修道院后，有关僧侣首先端来希腊咖啡、掺水的乌糟酒和一种叫鲁克米的甜果冻。哪一座修道院都必然拿出鲁克米这种糕点，但这里的实在甜得下巴发痒不敢沾牙。当然，由于是手工制作，各修道院味道略有不同，但唯独甜得要命这点无一例外。

乌糟这东西类似希腊烧酒，酒精含量十分之高，味道忽一下子直冲鼻孔，掺水后变得白浆浆的，而且便宜。总的说来，我觉得不适合

日本人口味，我也不大喜欢喝，但浑身累了，酒精急切切地渗进胃里，身体就会放松开来。咖啡也放足了砂糖，甜得不能再甜。我们称之为阿索斯三样。三样的目的在于以酒精和糖分消除旅人的疲劳。反正越疲劳越能觉出这三样的美味。咖啡和乌糟酒我是高兴地享用了，但鲁克米怎么也没吃完，因为我本来就吃不来甜食。只咬了一口，其余全剩下了，倒是觉得抱歉。

往下路没那么好走了，疲劳也渐渐上身，恨不得马上赶到下一座修道院吃鲁克米——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

[4] 东京市区的地名。



伊比隆修道院

关于伊比隆修道院没有多少可说的。

从斯塔夫罗尼基塔到伊比隆，走的是海边比较好走的路。我们五点从斯塔夫罗尼基塔动身，不出一个小时就到了，一路顺风，轻松至极。说句英语，就是“a peace of”。我们想，什么呀，这阿索斯也没什么了不得的嘛！这种傲慢后来受到了足够的惩罚。一路上海很漂亮，风平浪静。很想歇一会儿下去游泳，但不可能。这里是圣地，是神的庭院，严禁赤身裸体在海里游什么泳。

到了修道院——无论哪座修道院——我们先去名叫“阿尔霍达”的办公室。换成日本式说法，“阿尔霍达”大约就是“朝觐·食宿部”。

除了宗教义务，修道僧还要分担各种日常性劳作，接待朝觐者也是劳作之一，安排专人负责。他们给来访者端茶上糕点、准备床铺，这是免费的。上岛时在卡里埃的事务局每人交两千日元左右，一切费用都包括在里面。

只是，伊比隆是大修道院（在半岛二十座修道院中位居第三），加之离卡里埃近，来人也多。所以，这里“阿尔霍达”雇用普通的老伯替僧人做实际事务。当然也有几个僧人做，但事情太多了，光靠他们估计根本做不完。这座修道院同样位于海边，同样状如城堡。墙高，窗少，双重门又厚又重。若想起电影《玫瑰的名字》中的修道院，情形就差不多了。

走到这“阿尔霍达”，照例有鲁克米果冻和乌糟酒和甜腻腻的希腊咖啡端上来。鲁克米我只吃了一半。

在“阿尔霍达”帮忙的老伯把我们领进房间。房间狭窄简朴，木地板，摆着同样简朴的六张床。窗口有一个，可以望见修道院的田地和后山。若是oceanview[5]就好了，不过不可贪心不足。这房间里，除了我们还住一个希腊老伯。不知此人是累了还是性喜沉默，只是脸朝里躺着，一动不动。墙上挂了一盏煤油灯——照明器具仅此而已。房间一角有个较为像样的取暖炉。这个季节当然没生火。炉里插着一个烟头，看样子有人在此吸过烟。房间里倒是禁烟，但希腊人一般都是烟鬼，怕是忍无可忍了。

接待我们的老伯说饭已经开过，但若肚子饿了，可以特别做一顿。当然饿了，除了鲁克米什么都没进肚。在黑乎乎的厨房那样的地方，我们面前端来了凉豆汤、橄榄咸菜、硬面包和水。若问是否好吃，我想不能说是好吃。面包硬硬的咬不动，又咸，但因为肚子瘪了，就算有怨气也如获至宝。别无选择，奈何不得。

端饭送菜的老伯说他原是船员，日本也跑过几次。在希腊旅行起来，一天总要碰一个这样的人。希腊的确当过船员的人多。但船舶不景气，他们都弃船上岸，迫不得已。上岸当服务生，在大巴售票，当造船工，或者像这样在修道院干杂务。

到天黑还有半个小时，我们在修道院内散步。松村君照相，我踱着方步画几笔素描代替记录，伊比隆之名来自古伊比利亚（高加索南部），因为这座修道院的创建者是来自伊比利亚的修道僧。阿索斯的修道院有一半左右都这样是由信奉东正教的许多国家（多是东欧）捐赠或创建的，修道院的色调也因各国文化和风格的不同而多少有所不一。

伊比隆修道院里也有好几个礼拜堂。窗口镶着五彩玻璃。但在看惯了意大利和德国教堂精妙华丽的五彩玻璃的我的眼里，这里的玻璃显得甚是原始，而且做工粗疏，式样单调，不少地方打坏了一直没有维修。其实维修也无非是在缺口那里换一块普通玻璃罢了。感觉上虽不能说荒芜，但管理显然跟不上，大概没那经济实力吧。俄罗斯和东欧等东正教国家全都共产化了，对修道院的经济援助也已断绝。不过黄昏时分在这一片岑寂的修道院院子里散步之间，其简朴的景致不由令人神思悠然。那种单纯、那种疏漏同景致融为一体，感觉十分自然。坦率地说，我对西欧教堂神气活现无懈可击的华丽时常感到头疼，但这里不然。

这时间对于僧人也好像是休息时间，他们三三五五聚在院子角落里低声说话。他们说话总是压低语声，笑也是静静微笑。

除了礼拜堂还有几间殿堂，有关的僧人像做什么准备似的逐个转来转去，用长棍样的工具给殿堂里的灯点火。院子到处高高堆着劈开的圆木准备过冬。

想不到我们睡得很熟。睡得早，以为能够早起，但睁开眼睛已经

六点半了。昨天那个老伯进来把我们叫醒，样子像是问我们要睡到什么时候。礼拜已经开始了，这种时候还在睡是不地道的。早饭都已结束。

我们赶紧穿衣走去礼拜堂。抬头看天，天空阴沉沉的，颜色不吉利的云快速飘移。和昨天的天气完全两样。可以感觉出空中有一股潮气。回想起来，来欧洲将近两个星期时间里还一次也没下雨。别说雨，甚至阴都几乎没阴过。所以根本没考虑到下雨的可能性。不过看这样子很可能下雨。

礼拜已经开始。身披艳丽僧袍的高僧向人们赐福。两个年轻僧人以朗朗动听的声音轮换唱着拜占庭圣歌。希腊正教禁止为圣歌伴奏。雕像也禁止。因为没有伴奏，听起来也像是日本的念经。昏暗的教堂里点着无数蜡烛。神情肃然的朝觐者们轮番接受祝福。朝觐者们似乎只能在礼拜之时进入教堂。我们是异教徒，悄悄缩在后头。其实他们也不希望异教徒进来。他们这种严格的宗教观——不妨说是本质上的不宽容——同积极接受外国人的日本禅寺大相径庭。他们是把宗教作为自我确认（identity）的方式，从历史的通道中冲杀出来的。有一个青年正在接受特别的祝福。不明白为何唯独他得以如此。大概有某种缘由吧。他跪在祭坛跟前，高僧站在旁边高诵祝词。稍顷，高僧一件件脱下衣服，并把脱下的衣服搭在青年身上。这么说来，我忽然想起詹姆斯·布朗[6]的表演中也有这样一幕来着。同詹姆斯·布朗连在一起是有些不大合适，但那原本也是从福音中派生、发展而来的，感觉上应是同一回事。不管怎样，属于一种表演这点是确切无疑的。青年显然蛮紧张地接受祝福。我看着他的侧脸心想，为什么希腊人会有这般一本正经的表情呢？很多时候我就是以其表情的一本正经将希腊人同意大利、德国人区分开来的（例如迈克·杜卡基斯就是个好例子）。倒不是说意大利人和德国人表情就不认真，但希腊人的认真和那个还不一样。他们在某种场合几乎一本正经得令人悲伤，让我时而有些心境黯然，时而觉得不忍。

礼拜结束高僧离开后，礼拜堂里收藏的宝物开始向朝觐者们小心翼翼展示出来。管事僧用钥匙打开橱柜，我们排成一列依序拜见。即使在阿索斯半岛，伊比隆修道院这些宝物在数量和质量上也是数一数二的，亦被称为“博物馆修道院”。这么说是不大好，算是比较柔和的

修道院。至少不是武斗派顽固不化的修道院。阿索斯二十座修道院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全体共同生产性质的，另一类是多少柔软的承认个性的，祈祷是全体共同的，而饮食和劳作则由个人决定。伊比隆修道院属于后者。

伊比隆修道院的宝物基本是宗教工艺品。似乎各有来历，但我对这类东西概无兴致，并不觉多么可贵。其中有形状奇特类似药丸盒那样的东西。细看之下，里边装的似乎是人的遗骨。想必是古代高僧遗骨的一部分。希腊人在那些物件跟前难分难舍地画着十字。

我们大体看罢，管事僧十分小心地盖上盒盖，“咔”一声锁上，似乎在说参观至此结束。随即，堂内照明一支支吹灭。于是这场分外够规格的晨间功课告终。

这倒也罢了，问题是我们似乎漏掉了早餐，肚子渐渐饿了。试着进厨房问一下老伯，他说这个倒有，姑且吃了吧，说着递给一大块面包。我们拿回房间吃了起来。比昨天的还硬，简直咬不动。得得，往下每天都吃这种面包如何吃得消。就结果来说，如此不好吃的面包在阿索斯半岛是个例外，其他修道院拿出的面包要好吃得多。白吃白喝却写这样的事是觉得过意不去，但若编写“阿索斯的星级指南”一类导游手册，伊比隆修道院的厨房我想会是无星一级，遗憾。

七点四十分，我们背起背囊，告别这座无星修道院。

---

[5] 能从宾馆窗口看见海。

[6] 美国黑人灵魂乐歌手(1933—2006)。



费罗塞修道院

七时四十分，我们刚走出伊比隆修道院大门，果然噼里啪啦下起雨来。雨倒不是很大，但看天空，又不像是避一会雨就会停下的样子。天空阴云密布。不管怎样，我们决定穿上雨衣前行。按阿索斯的规定，没有特别许可，同一座修道院不得住两晚。有进无退。

下一站是费罗塞修道院。我们原计划经费罗塞去卡拉卡尔修道院，若再有时间就争取去更远的格兰德·拉布拉修道院。因为只有三夜四日，很想尽可能抓紧赶路，但看这天气恐怕很难赶到那里。姑且走到费罗塞，然后再作打算吧。去费罗塞要爬山，但距离不很远。我们估算，这个程度的雨，费不多大力就能走到。

可是当时还不清楚，在这阿索斯半岛的东南部，天气变幻莫测。

至于为何这地方天气多变，我自然不大明白。或者海拔两千米之高的阿索斯山的存在使得气象大大乱套亦未可知。总之这里别看眼下丽日晴空，而转眼间就云笼山头，转眼间就大雨倾盆。而且半岛北部比南部、西部比东部更容易风云突变。不了解这点，就会大触霉头。在气象这点上，此地完全不像希腊。

然而我们对此一无所知。任何一本旅游指南都没谈及阿索斯的气候，以致我们马马虎虎伞也没带，只带了简易雨衣。而我更掉以轻心，仅仅带了件防风外衣。说马虎的确马虎得可以。可是，有谁会想到去九月初的希腊要带什么伞呢？实际上除了阿索斯，其他地区滴雨未下。

往费罗塞走了差不多一个小时，雨哗哗下了起来。雨很凶，裤子也好鞋袜也好什么都淋得一塌糊涂。山和海也彻底隐没在水帘般的雨中。一无所见，见到的唯独雨和水。身上渐渐冷了起来。若是这样，身穿正规登山装就好了，我一边这么想着一边在山路上走。行走之间，忽见路旁稍远些的地方有座小屋。有没有人不知道。大概是独立僧的小屋，也可能是什么作坊或者没人住的废屋。碰巧，避避雨估计还是可以的。

一敲门，出来一个长发蓄胡的年轻男子，也就二十五六吧。不是僧侣，穿普通衣服。我问进去一会儿可以么，他说不碍事进去好了。

里边还有一个年轻男子，短发，胡也刮了。再往里有个大房间，又一个人倒在那里吸着烟听收音机。锵锵锵——仍是凄凄哀哀的希腊民歌。这种音乐同雨声混在一起，更叫人悲从中来。

房间共有八张简易床，哪张都有新用过的痕迹。毯子堆作一团，烟灰缸满是烟头，一张床上散乱地扔着扑克牌。一本似乎很多人翻看过的破破烂烂的希腊语软皮书扣在枕旁。

“啊，随便坐。”胡子青年似乎这样吩咐。我们脱鞋烤袜子时间里，他给我们做咖啡。用小锅“咕嘟嘟”煮的希腊咖啡。至少糖放了很多，甜得不行。我实在喝不惯这种甜咖啡，但希腊人不问放不放糖，只好忍着喝下。不过，由于身上发冷，热咖啡的确难得。

“日本人？”胡子青年问。我说是的。他说他去过日本。原来他也曾是船员。“川崎、函馆、长崎，”他说。简直像在唱《港城布鲁斯》。“现在来这里赚钱。”他继续道。他家在与阿索斯相邻的希索尼亚半岛，现在的职业是木工，在此从事两星期修道院维修作业，然后返回希索尼亚。一共八个人住在这里，全是木工。“其他人出去干活了，我们下雨守在家里。”语气中沁出一种无奈，似乎在说没人想待在这种地方。情有可原。红尘中的年轻男子在这一无女人二无酒馆甚至澡堂也没有的山中闷上两个星期，不无聊才怪。我说又喝不得酒，他说那倒不至于。说着，笑嘻嘻把我领去隔壁。一看，不得了，满地酒坛子。还堆着几箱苏格兰威士忌，啤酒箱简直数不胜数。此外有葡萄酒、乌糟酒、杜松子酒、伏尔加，活活一个酒库。实际也像喝得很来劲，很多瓶空空如也。我不由赞叹：这般喝法居然没酒精中毒！

“不喝乌糟？”他问。于是我们庆幸地接过一杯乌糟。这瓶乌糟格外大，酒忽一下子暖融融地沁入胃中，感觉上无与伦比。不觉之间，好像自己的身体缺了乌糟很难坚持下去似的。毕竟越熟悉本地，本地酒这东西就越变得可口。在基昂蒂[7]地区旅行时一个劲儿喝葡萄酒，在美国南部每天都喝波旁苏打，在德国始终泡在啤酒里，而在这阿索斯，对了，就喝起了乌糟。

在木工们的宿舍避了一个小时雨。“去费罗塞，很快有去费罗塞的卡车路过这里，坐在货厢里算了。”听胡子青年这么说，决定承其美意就是。这么着，我们在这里一边听着雨声，一边无所事事地打发时间。

不多工夫，一辆丰田轻型货车停在门外。驾驶席坐两个男子，货厢也坐了一个。胡子青年让司机把我们拉去费罗塞。好啊，坐上去，司机以手示意。雨略微小了，四周却相当冷。天空仍黑漆漆的。我们坐上货厢，丰田当即开动。老实说，路相当糟。泥泞得一塌糊涂，又是拐来拐去的坡路。拐弯时屁股常常颠起，每次我们都险些从货厢甩下去。就路况来说，一般只能由四轮驱动车爬坡，但开车的人似乎丝毫不以为意。同我们一起坐货厢的是叙利亚人，来此朝觐。我问常来么，他说常来，一副理所当然的神气，相当虔诚。

如此这般，来到费罗塞时我们已经筋疲力尽。浑身发冷，又给车颠得昏头昏脑。时间已过十二点。计划一步步滞后。

费罗塞比伊比隆规模小得多，一看就知整洁而平和。总的说来有一种家庭气氛。修道院四周整个围着高墙，入口有一座俄罗斯风格的漂亮塔门。整体上建筑物色调明朗，但因淋了早上下起的雨，颜色变得有些沉稳。雨已完全止息，门外坐着几个老伯悠闲地聊着天。墙外是葡萄园、果树园和一片开阔的菜田。

走进“阿尔霍达”，一个文静的年轻僧人出来给我们送来鲁克米果冻、茶和乌糟酒。从这时开始我也可以把鲁克米全部吞进肚里了。甜是甜了点，但总可以壮起胆子——尽管仍战战兢兢——整个吃掉。茶和乌糟酒也美妙得很。之后年轻僧人把我们领入房间。不大的三人房。我们在这里脱掉湿透了的旅游鞋，换掉长裤和袜子，然后吃苏打饼干和奶酪代替午饭。几乎闷声不响地一口口吃着。吃罢歪身上床，理直气壮似的呼呼睡了过去。睡得十分香甜。我蓦然心想： 光是被雨淋一淋人就会变得如此垂头丧气！倘淋得再厉害些，说不定会投向宗教怀抱。修道院的床成了我们的救星。

费罗塞修道院让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阿尔霍达”里的僧人全都和蔼可亲，建筑物颜色赏心悦目，以及午觉睡得无比惬意，所以我对这座修道院的印象十分美好。至于其他的——对不起——都记不确切了。记忆荡然无存，现在就是想写点什么也全然无从记起。或许是被淋雨消耗一空的关系。也可能睡得太沉了，以致前后记忆依稀莫辨。不过说到底，修道院这东西一天转上两三座，看起来难免千篇一律。这么说倒是失礼了。

三点过后，天气恢复，天空明亮起来。我们谢过负责接待的热情

僧人，开始向下一座修道院进发。我们一点点往半岛尖端南下，前往更为原始的地带。

---

[7] 位于意大利，以产红葡萄酒闻名。



卡拉卡尔修道院

去下一个目的地卡拉卡尔修道院一小时的路很好走。我们下山，又下到海边。到达卡拉卡尔门前下午五点刚过。今天只能在此投宿。

卡拉卡尔端上的是咖啡和香子兰（vanilla）水。香子兰水就是把香子兰果“嗵”一声放进玻璃杯水里。香子兰融入水中使得水味变甜。先喝水，再用小匙舀香子兰吃。这东西反正就是甜得要命，我无论如何受用不了。蜜蜂闻味飞来，落在杯边“吧唧吧唧”舔水不止——便是甜到这个程度。

给我们上香子兰水和咖啡的是一个叫马什的年轻僧人，戴着俨然大学外聘讲师的眼镜，蓄着黑黑的胡须，完全一副煞有介事的学究架式。后来问年龄，答说二十八。讲一口相当考究的英语。我等照例说是佛教徒。结果他想详细了解佛教教义。遗憾的是，关于佛教我不具有多少专业知识。我思忖，较之佛教徒，恐怕还是回答“高科技教徒”或“高度发展资本主义教徒”之类好些。若是这个，倒可以比佛教多少说得详细些，例如索尼随身听是如何诞生和发展的等等。

“一小时后吃晚饭，先休息吧！”马什君说。饭前时间里我走到院子，把礼拜堂窗口的五彩玻璃的花纹素描下来。这里的五彩玻璃也远远算不上华丽，保存状况也很难说有多么好。

院子里住着一家蛮可怜的猫。一只母猫和五只小猫，母子全都瘦得形销骨立。在基本百分之百实行素食主义的修道院里安家落户（这座卡拉卡尔修道院实行更严格的素食，禁食肉食。若有祭祀活动之类，倒可能有鱼出现），它们不可能胖。可是猫们何苦特意选择饮食状况如此糟糕的地方定居呢？真个匪夷所思。偏偏选中修道院，只能说是异想天开。

修道院里放着各种奇形怪状不知做什么用的工具。例如用铁丝吊着两端变圆的木鱼样的东西，下面挂着木槌。还有一座建筑物前面悬一块陡然弯成马蹄形的大铁板，上面也带一把铁锤。铁锤形状很不规则，像是谁心血来潮做的。此外，长约两米状如螺旋桨又如舍利塔的长板扔得满院子都是，两端圆似木鱼，但中央部位像为抓取方便削得很细，而且好像用了很久，已经变成糖饴色了。这东西在昨天投宿的

伊比隆修道院根本没见到。

马什介绍了这些工具。他说是用来向修道院僧人们通知祈祷时间的。“先敲马蹄形铁板，再敲木鱼，接下去拿起这名叫萨曼特隆的螺旋桨形板边敲边围着修道院奔跑。半夜十二点就听见了。”他说。

“十二点开始祈祷？”

“是的。半夜十二点对于我们——以你们的时间说——相当于早上四点。”马什说，“所以，那不是半夜的祈祷，而是早晨的祈祷。”

莫名其妙。马什进一步说明：“就是说，我们是在不同于你们的时间中生活的。这是从很久很久以前持续下来的时间，被称为‘拜占庭时间’。依据‘拜占庭时间’，一天不是从午夜十二时而是从日落开始的。因此，你们的午夜相当于我们的上午四时。”

言之有理。阿索斯的修道院全部采用这种拜占庭时间。但不知何故——忘记问了——唯独昨天投宿的伊比隆修道院例外。所以，昨晚未能听得午夜的木鱼声或钟声。“我们十二点起来，分别在自己房间祈祷。后半夜一点全体集合祈祷。祈祷大体持续三四个钟头。特别日子有时持续十小时左右。”祈祷完毕，他们分开去各个场所干活，单独学习，再次祈祷。

我想这和我的工作时间差不多。我一般也在凌晨三四点开始工作。然后做家务、运动。特别的日子也有时工作十个来小时。平时不那么玩命。无论对象是什么，注意力持续的时间或许都差不多。

六点半我们被叫去吃晚饭。我们是异教徒，不能和他们一起吃饭。大家吃完后，叫我们单独去吃。因为正式晚餐要同时祈祷，异教徒无法加入。不过，没有郑重其事的仪式，说快活倒也快活。吃饭这事情还是想悠着性子来。晚饭菜单有类似杂烩粥的米粥和三个西红柿、橄榄咸菜，以及又软又香的面包，不加量。杂烩粥里有大豆。较之昨天伊比隆的伙食，好得没法比。材料哪一样都是在这修道院里采摘的，一咬，味道猛地在口腔散开。毕竟是绝对彻底的天然食物。简单至极，清淡之至，和所谓希腊风味菜截然不同。

我对马什说因为明天一早动身，吃不上早餐。马什随即从厨房拿来许多面包和橄榄，并装进塑料袋，让我们带去。实在亲切得很。我们道谢接过。面包也好奶酪也好橄榄也好，都是他们亲手培育的。

晚饭后，马什带我们看修道院的菜田。田里长着西红柿、茄子、

甘蓝和大葱。看上去土质非常肥沃。肯定因为雨多适合蔬菜栽培。暮色深下来以后，开始传来仿佛与此呼应的雷声。雷虽然远，但声音一阵紧似一阵。云又开始出现。正担心明日天气，雨啪啪啦啦落了下来，得得。

我们回到房间，一边听雷一边打开在达菲尼杂货店买的红葡萄酒喝着。虽是便宜货，但由于身体渴求酒精，觉得分外香醇。仅有三张床的狭小房间，照明只一盏煤油灯。没有电。厕所是手动冲水式，就是说或用旁边的软管冲洗或自己往桶里灌水哗地冲下去。简单。卫生纸冲不下去，扔进现成的盒子里。这道程序不限于阿索斯，整个希腊无论哪里都一样，习惯了倒也没什么不便。借着煤油灯光喝多少带有特殊涩味的葡萄酒也甚是舒心惬意。雷声不时传来耳畔。于是我想起马什的话，他说这一带时常落雷烧毁修道院。紧挨我们住处的一栋房子就在几个月前给落雷烧掉了，现在还焦黑黑地扔在那里。看来这地方不单雨多，雷也够多的。我可不愿意在这地方遇上落雷焦黑黑一命呜呼。正想着，八点左右有人轻轻敲门。开门一看，是马什。

“这个也带上吧！”说着，递过一个装着葡萄、元葱和青椒的袋子。真够友好的。多谢。九点，我们吹灯睡觉。

半夜被钟声惊醒。很奇妙的钟声。奇妙的节奏奇妙的音阶。看表，后半夜二时二十分。静静躺着未动，不一会儿木鱼样的东西响了起来。也同钟声一样，以奇妙的节奏和奇妙的音阶响个不停，一如马什所说。此外，那个叫萨曼特隆的螺旋桨形奔跑的木鱼也“咚咚”开始敲响。声音渐渐由远而近，又渐渐远去。从声音移动方式推断，萨曼特隆敲击手像以相当快的速度一路奔跑。但敲法很有力，节奏有条不紊。至于怎样的声音，说明起来非常困难，因为和我们通常听到的任何声音都不一样：短促、明快、清脆，声音凛然而遒劲地敲击夜空，一瞬间击穿夜幕传来我们耳边。虽说我对宗教没有什么虔诚之心，但还是能够觉出那声音里蕴含的某种心灵信息。唯独那声音的回响我想怕是无法录进磁带传达出来的，因为那是包含所有状况的声音、震颤所有状况的声音。阿索斯深沉的夜色。沉默。与我们不同的时间。满天的星辰。

整个修道院的僧人似乎全部在这栋房子里集合。上楼梯和在走廊行走的“吱咯吱咯”声不间断地传来。我们住的这座建筑物的走廊木地

板损伤非常严重（说濒于解体也未尝不可），每走一步都发出宿命的吱呀声，而且板与板之间有空隙，蜡烛的黄色光亮呈一条线泻落下来。此外则一无所见，漆黑一片。唯独不规则的光线从天花板泻下。我们住在二楼，看情形楼上是做夜间礼拜的场所。

我爬起身，拿小手电筒走到房间外面。黑漆漆的走廊尽头，可以看见僧人们手中闪闪摇曳的烛光。他们三三五五爬上楼梯，消失在楼上。蹑手蹑脚尾随他们爬上去一看，楼梯上头有个小礼拜堂。朗朗的诵唱声传来。烛光明晃晃的，可以看见聚集一堂的僧侣那仿佛从夜幕中穿过的黑乎乎的僧衣。老实说，较之庄严，很有些令人惧怵。

我这人对整个宗教不具有丰富的知识。但若允许发表我个人感想，我觉得希腊正教这种宗教有时候好像能让人感觉出超越教义的东方式惊骇意味，尤其在从楼梯一隅窥看夜半礼拜的情况下。其中的确存在着以我等理性所无法处理的力学，仿佛欧洲同小亚细亚在历史的根本点上互相妥协的那种力度，比之形而上的世界观，似乎具有更为神秘而凡俗的肉体性。更进一步说来，我甚至觉得希腊正教乃是由最直接继承了满怀基督教之谜的人的小亚细亚式惊骇性所形成的。

我在楼梯侧耳倾听了一会他们的祈祷，后来觉得似乎妨碍了人家，遂走进院子。雨停了，夜空一片澄明，万里无云，简直像天象仪一样哪怕每个角落都布满亮得刺眼的银星。

怔怔望了三十分钟夜空，然后回房间钻进被窝。想到今天也大概是个好天气，心头一阵释然。远处唱和的僧侣们的祈祷声柔软地充满我的耳朵，我很快睡了过去。



拉布拉修道院

来阿索斯第四天。一大早告别热情好客的卡拉卡尔修道院，向格兰德·拉布拉修道院进发。从这里开始路渐渐艰难起来。因为要沿阿索斯山麓绕行一周。这以前的路像是让我们练腿。好在今天晴空万里，是个适合旅行的好天气。

“有一点不太明白。”摄影师松村君说。此人平时只是笑眯眯不怎么开口，而一开口常常提出较为本源性的疑问。“那里僧侣们，吃那么糟糕的伙食，为什么还胖呢？猫都瘦得咯嘣咯嘣的。”

经他一说，果然觉得看到不少肚皮挺出的和尚，血色也并不差。每天只吃一点点粗粮，劳作又很辛苦，胖从何来？粗茶淡饭和运动是减肥的基本，那样的生活多少年持续下来而若还胖，减肥什么的应当从全世界彻底销声匿迹才对。不可思议！此乃神之庭园阿索斯半岛上一大谜团。或者年龄大了便胖乃此地人种性特质亦未可知。也许无论怎样的生活都避免不了他们非胖不可的倾向。也可能在什么地方偷偷地巧妙地补充了营养。

如此在山路上东拉西扯之间，发现泥泞的路面有很大的足迹。类似狗爪印，但作为狗未免过大。体重也好像相当可以，足迹陡然深深嵌入地面。如此清晰的足迹一个个重叠着伸向前去。看样子，雨过之后有什么成群结队在山路上移动，而且和我们前进的方向相同。说不定是狼、一群野狼。我们就此议论良久。可是——不大明白的是——狼与野狗之间有这么大区别吗？不就是AC/DC和电机头那个程度的差异吗？不管怎样，我可不愿意同那样的角色发生关联，一定要在天黑前进入修道院门内。

到格兰德·拉布拉有相当长一段路程。我们在山路上爬上爬下，顺着海岸前行。说是顺着海岸，其实海岸线几乎全是悬崖峭壁，上下相当艰险。十点半，累得浑身瘫软，坐下喝水，吃苏打饼干，然后继续爬山。但无论怎么爬都爬不过山梁。看地图，该早已翻过山梁才是。不管怎么说时间都花得太多了，无论怎么看上坡路都太长了。核对指南针，发觉我们偏离预定路线，似乎在朝阿索斯顶峰行进。但是无法断定。商量的结果，决定先走到路标出现时再说。

十二点，当我们快累得趴在地上的时候，遇见了樵夫一家三口。他们在山坡砍树，放在驴背上驮到下面路口，在那里装车，一起运下山去。驴共有六七头。樵夫一家由父亲和大儿子、小儿子组成。还有一只小狗。小孩告诉我狗的名字叫米克罗。用日语说，大约就是“小东西”。

我们说想去格兰德·拉布拉。“完全搞错了，”对方回答，“路走错了。这条道，哪里也去不了。”总之，这条路似乎是砍木材运木材用的。他说一定要折回，一直往下有块路标写着“格兰德·拉布拉”，在那里右拐即可。可是我们是留意着走过来的，却没有发现，真是奇怪。不过既然本地人这么说，自是奈何不得。

他们大概也正好到了午饭时间，我们一同走下来时的山路。驴背上绑了一大堆木材，敲驴屁股让它先行，我们跟在后头慢慢行走。“从哪儿来的？”那位父亲问。“从日本。”他听了现出费解的神情：“怎么来的？”我说飞机。三人对视说了声“飞机”。听到乘飞机而显得敬佩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不由实实在在感到自己来到了很不得了的地方。

这一家是从一个叫阿尔内的村子出来打工的。老伯在我带的地图指出阿尔内村的位置。“啊，这一带！”地图上没有阿尔内村，是在北面很远一个叫德拉马的镇附近（过去我坐大巴在那一带旅行过一次，德拉马镇绝对是个非dramatic[8]的镇子）。“这里还有三个孩子，”老伯得意地说，“在这里干一个月，干完回阿尔内。”说罢微微一笑。听懂这个意思费了很长时间。我的希腊语固然一塌糊涂，可他们的乡音也够重的了。

想必下面有他们睡觉的场所，但午饭似乎是在途中临时搭的小屋里吃的。立起柱子，像暖窖那样围起塑料布，便是这样的小屋。小屋旁边有水涌出，清凉凉的好喝得很。樵夫父子用那水为我们做了咖啡。小孩说他是李小龙迷。李小龙在希腊的人气简直排山倒海，罗伯特·德·尼罗和汤姆·克鲁斯以及哈里逊·福特[9]捆在一起怕也望尘莫及。这些人常去的电影院恐怕只能上映拷贝便宜的香港电影。

喝罢咖啡照了张纪念相，谢过他们后继续前进。沿路一直下行，果然有一块写着“格兰德·拉布拉”的路标。正是我们筋疲力尽在十点半坐下去吃零食休息的地点。也许实在太累了，只想休息，以致看漏

了。从我们当时坐的位置看去路标那里正是死角。罢了罢了，又白白耗掉了三个小时。如此下去，没准晚间也赶不到修道院，要和狼们狗们一起露宿山林了。

但不管怎样，肚皮已经瘪了，决定在岔路口吃午饭。切了马什给的蔬菜，连同咸牛肉做成开放式三明治吃了起来，又“咕嘟咕嘟”喝刚才灌进水壶的冰凉泉水。编辑O君说：“哎呀，这么美味的咸牛肉生来还是头一次吃到。”累成一摊泥，加上好久没吃肉了，自然觉得咸牛肉罐头好吃至极，的确香入骨髓。马什给的蔬菜也甘美得很，西红柿的味道似乎吸足大地的养分。今天是O君第三十三个生日，能吃上如此美味的午饭，作为我也不胜欣喜。走了弯路也值得。脱去湿透汗水的衬衫晾晒，躺在那里闭起眼睛，听了一会儿鸟鸣。

休息二十分钟后，打起精神出发。同样上上下下的高原路蜿蜒不断。所幸天气好，阿索斯山头不时飘来云絮，但不是那种不吉利的雨云，白得干净利落。最后到达目的地拉布拉修道院已经傍晚五点多了。从早上七点开始，差不多走了十个小时。疲于奔命的一天，脚到底痛了。

在拉布拉，上来的仍是那三件： 鲁克米果冻、咖啡、乌糟酒。鲁克米狼吞虎咽吃了，甜味现在也没得说了，无尚幸福。把那果冻塞满口腔，直觉得一股妙不可言的甘甜势不可挡地沁入浑身每一个细胞。这样的日子持续下去，大有可能成为铁杆鲁克米爱好者。咖啡也极够味儿，乌糟酒也好上天了。罗马餐馆的香味儿早已飞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们到拉布拉修道院不大工夫，意大利人模样的旅游团吵吵嚷嚷闯了进来。大约是宗教团体，一个罗马天主教的修道僧领着十四五人。估计是作为同样的修道僧前来阿索斯参观或干什么的。不过这修道僧竟然提着收发两用机，机身挂着玫瑰念珠。不知吃的什么东西，血色好得出奇，一有什么就高声咯咯笑个不停。虽说同是修道僧，但阿索斯和罗马差别如此明显，简直像乌鸦群中的一只白鹭。意大利人一般都集体行动，加之喋喋不休，无论在哪里都一目了然。“好啊”、“妙极”、“不错”——吵得要死。这伙人看样子是坐大巴来的，不知何故，里边还混进一个波兰人。此人似乎对那伙意大利人相当伤脑筋，而往我们这边靠拢。但我们忙于采风，没怎么搭理。本来就不该

和一伙意大利人掺和在一起。我在马耳他岛旅行时也加入过意大利人旅游团，简直是人间地狱。

和卡拉卡尔不同，在拉布拉，正教徒和异教徒一起吃饭。大家在宽敞的餐厅里聚在一起，边听祈祷边吃午饭。餐厅右侧是修道院餐桌，左侧是朝觐者餐桌。顶头的餐桌是高声祈祷的僧人用的。餐桌是大理石的，感觉极其时髦。即使拿到麻布[10]的酒吧里去也可能受欢迎。

不过这正式晚餐吃起来困难重重——必须在祈祷时间里三两下赶快吃完，而且还有此时可以吃此时不可以吃等诸多清规戒律，情形十分了得。稍有差错，就要遭到同桌朝觐老伯的白眼。但我们没有宗教信仰，况且饥肠辘辘，只管大吃大嚼。

食谱有炖菜（豆、茄子、南瓜、红薯、元葱、青椒）和奶酪（山羊奶酪），还有面包（面包还是昨天卡拉卡尔的好吃）和葡萄酒！见得葡萄酒我实在乐不可支。深色白葡萄酒装在长颈瓶里“嗵”一声往餐桌正中间一放，倒在杯里一喝，味道相当不可思议。我在希腊委实喝了各种各样的葡萄酒，而这个和哪一种都有根本性差异。首先，多少有甜味。但并非所谓甜葡萄酒的味道，而是倔强的险峻的甜。若在平时，想必觉得不好喝，甚至可能以为——现在想来——味道变质了。但我当时的确觉得香醇，至今仍清楚记得那种味道。是用身体而不是用舌尖记住的。后来买了说是阿索斯山酿造的葡萄酒喝的时候，竟成了毫无特别之处的味道普通的葡萄酒。

然而那葡萄酒我未能喝得尽情尽兴。斟第二杯时，对面坐的一本正经的朝觐老伯定定地逼视我的脸。我推测大概是不得喝第二杯。结果，第三杯没能喝成，遗憾。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遗憾之至。

饭快吃完的时候上来了一盆西瓜。O君以为是饭后甜品，刚拿西瓜咬了一口，祈祷结束了。O君正要咬第二口，朝觐老伯狠狠瞪着他说：“不成！”这么着，O君好不容易迎来生日，却只吃了一口西瓜。“好吃倒是好吃啊！”他懊恼地说。祈祷结束的时间同甜品上来的时间过于接近了。

在这方面，修道僧因为习惯了，全都不失时机地美美吃了顿西瓜。不愧训练有素。佩服佩服！在《阿索斯星级指南》上面，这拉布拉修道院估计得分不少。炖菜可口，有葡萄酒上来也令人欢喜。只

是，上甜品的方式恐怕要在服务分数上失分，另外面包也有待改进。

吃完饭，作为明天的食粮，我把餐桌上的面包和奶酪手脚麻利地塞进口袋带走。看样子餐厅的人忙得不可开交，气氛上很难容自己提出什么明天一早动身能否多少分一点食物。何况规定多如牛毛。见我三把两把将食物塞进口袋，那些人全都露出十分厌恶的神色，和卡拉卡尔友好的马什有天壤之别。可我不能因周围人做出厌恶的神色就不战自退，食物这东西对于我们乃生死攸关问题。O君也乘隙偷了西瓜回来，此人始终对西瓜情有独钟。

---

[8] 戏剧性。两者发音相近。

[9] 这三人均为美国当代电影明星，擅演硬派角色。

[10] 东京一繁华地段的名称。



普罗德罗姆小修道院之行

这格兰德·拉布拉一如其名称所示[11]，是阿索斯半岛特别大的修道院，最大，又最古老。因而设施庞大齐全，但似乎多少缺乏家庭韵味。拿餐厅来说，未免过大，那样子简直同银座的“狮子”啤酒屋[12]无异。至少西瓜该让人家慢慢吃个够嘛！

“不过，修道院并非为了让异教徒淋漓畅快吃西瓜而存在的。”O君说。这也的确言之有理。

此外，这座修道院设有纪念品商店。卖的当然不是馒头、僧侣偶人等修道院货色，而是正正经经的宗教物品。尽管如此，终究还是纪念品商店。并且这里好端端通着电气。厕所甚至镶了块明镜。以前去过的修道院根本没什么镜子，以致我以为修道院出于不可一一注意外形这个原因而一律不放镜子。然而这里有一面，试着往里一照，双颊悄然下陷，胡须越来越长。看来阿索斯岛正适合健身。

这里似乎有种种样样来历不凡的建筑物和宝物，但一开始我就交代了，我对这类东西没什么兴致，再说以我的欣赏习惯看这座修道院有些过大。于是在院子里随便散散步、看看壁画就算完事。能够在阿索斯半岛停留的三个晚上就这样用掉了。我们本来打算去半岛南端转一圈，但由于下雨，日程整个乱套。这就开始深入秘境未免意犹未尽。

不管怎样，先去南端的卡胡索卡里贝亚的小修道院（斯基特）看看，再从那里乘船返回达菲尼。这样，也就算大体到了半岛南端。格兰德·拉布拉往前——也就是说绕完阿索斯再往前——正规修道院已经一个也没有了，有的只是小而粗疏的类似修道院派出所那样的东西。这些派出所也分几类，依大小顺序，称之为斯基特、凯利约、卡里贝、卡泰斯马、黑希哈斯特里奥。修道院各有定员，超过定员，剩余的就离开修道院，被分去这些“派出所”。最大的斯基特感觉上就好像把修道院规模缩小了一圈、统一性弱化了一点。至于最后边的黑希哈斯特里奥，已经彻底成了隐士小屋。他们在远离人烟的荒地、山中或洞穴里边搭一座小屋，在那里不受任何人干扰地过着孤独的宗教生活，即所谓武斗派的苦行僧。而且他们多数住在格兰德·拉布拉前面的

半岛南端。因此来半岛后，作为我无论如何都想继续南下。

一清早我们从格兰德·拉布拉修道院出发。幸好天气不错，晴朗无云。由此往前的路渐渐难行，又很快糟到了极点。大多路段只能容一人通过，并且路面时不时消失不见，看样子一下雨路面就会成河。草蓬蓬勃勃长得很高，必须一一用手拨开才能迈步。道路标识也马虎起来，有几条踩出来的岔路让人摸不着头脑。但至少意大利旅游团没来这里。

“村上君，你对意大利人好像很有成见。”O君说。

那倒不至于。不过好容易离开罗马，不想在这样的地方碰上意大利人（不是吗）。

约一个小时来到普罗德罗姆小修道院。一座稍稍离开海岸的斯基特。路上一直有一只蛮乖的狗跟在后面，一叫就跑，一迈步又尾随而来。此外谁也没遇见。狗一直跟到修道院门口。

普罗德罗姆小修道院空无人影，穿过门进入院子，走到像是“阿尔霍达”的地方大声呼喊也没人出来。阒无声息。看上去就好像最近因为什么彻底放弃了这座建筑。干干净净，井然有序，但空不见人。人的动静也没有。鸟鸣声从什么地方传来，如此而已。

无奈，我们坐在那里等人到来。

大约过了十分钟，一个瘦瘦的僧人如淡淡的影子无声无息地出现了，手里拿着扫帚，道歉说没注意到对不起。早上八点刚过就来这里的巡礼者怕是很少有。他照例端来咖啡、鲁克米果冻和乌糟酒。这么说或许不好——鲁克米的味道还是卡拉卡尔的好。

僧人名叫库列曼，是罗马尼亚人，讲法语。他介绍说，这座小修道院隶属格兰德·拉布拉（所有的斯基特均隶属于某座修道院），创立于一八六三年，住在这里的十五名修道僧全部是罗马尼亚人。他把我们领到院落中央的蛮气派的礼拜堂。礼拜堂只有做礼拜才能参观，但库列曼神父为人热情，特意为我们打开门。一进门就见到无数受难图。无论墙壁还是天花板，无不绘有过去遭受宗教苦难的圣人画。这不是壁画，只是用颜色画上去的，已过了差不多一百年，褪色和裂纹相当严重，但仍很鲜艳，看了不由感慨世界上委实充满着种类繁多的苦难。

煮在锅里的圣者有之（此人稍微显得难受，但似乎不是特别

烫），手脚险些被斧头剁掉的圣者有之（此人看样子相当痛苦），腹部置红火炭者有之（有人的神情仿佛在说悉听尊便），腋下被火烧者有之（此人以傻呆呆的神情加以忍受），绑在车上飞速旋转、且背部被铁钉尖划得皮开肉绽者有之（此人大概昏迷过去），倒吊起来活剥皮者有之（看样子很痛）。压卷之作是锯裂胯骨，头朝下吊着，锯从胯间锯下去。这个我觉得可不是开玩笑。如此看着看着，心情渐渐黯淡起来。不过进到教堂里面，但见祥和的天堂景观铺展开来。圣人被神请到天国憩息，异教徒堕入地狱遭受不尽的苦难。天使吹响喇叭，圣母慈祥地微笑。地狱也好天堂也好都有点夸张造作，构图也单调。不过说到底，这种笨拙正是希腊正教的长处和一贯特色。天主教堂也有类似的手法，但没有如此凄惨可怕。在威尼斯的Torcello岛见过的受难图在意大利以残酷的地狱图而闻名，但同这个比起来简直成了准天国。总而言之，看这些图的时间里，我觉得自己受的难还不够多，遭到文艺批评之类，根本不能称为受难。“已经破损得很厉害了，但这座斯基特贫寒，没办法修复。”库列曼神父说。

看完礼拜堂，库列曼说这附近有圣人住过的洞穴，劝我们去看一看。时间还早，去看看无妨。我们转到小修道院后面，穿过仿佛曾让基督经受考验的到处是石块的荒地，来到海边的悬崖峭壁。路上有几座两三个僧侣居住的小屋。刀削般的石崖上凿有狭小石阶。究竟多少阶不晓得，总之很陡很陡。我们留心着不踩空石阶，慢慢下行，岩壁上果然有个洞穴，里面搭一个小屋，小屋里放着扫帚、木鱼和木槌，地面向海那边倾斜得叫人害怕。岩壁上方垂下一根软管悬在小屋窗外——估计是从小修道院引水的。在没有软管的年代想必用桶提水来着。生活可想而知。

小屋后头、洞穴深处有个静悄悄的小礼拜堂。里面有祭坛，变短的蜡烛排列在蜡台上。一个人也没有，惟有海风飕飕吹来。礼拜堂旁边的小洞穴里摆着四个古旧的头盖骨，不知是几百年前的，反正看上去很有年代，大概是住在这里修行至死的僧人的。应该是难得可贵的骨骸，但一旦成为骨骸之后，外观上就分不出是圣人还是凡人，是小说家还是摄影家抑或编辑。全都一样，无非白骨而已。

折回普罗德罗姆小修道院，几名修道僧把图书馆的旧书放到阳光下晾晒。也有人解开钉书线拆开来修护。一切都那么安静。问道能否

照相，答说不要紧。在阿索斯拍摄僧侣困难之至（多数僧侣不愿意，甚至有发脾气的），但这座小修道院的修道僧则满口答应下来，看上去性格较为平和。

另外，我们带的食品也渐渐少了，自觉厚脸皮，但还是问库列曼神父能不能分一点食品给我们。库列曼神父点头去了哪里，不多工夫手拿装满食品的袋子返回，里边有西红柿、奶酪、面包和橄榄咸菜。从贫穷的小修道院如此白拿食物很过意不去，而这分亲切实在难得，实际上后来也帮了大忙。卡拉卡尔的马什也好，这普罗德罗姆的库列曼神父也好，若无他们的好意，我想我们的遭遇会更加狼狈。对宗教诚然不知其详，但其亲切我心领神会。爱消失了也有亲切剩下——大概是博加特[13]说的吧。

十时四十五分，我们告别普罗德罗姆。下一站是卡胡索卡里贝亚小修道院，从那里乘船回去，如果顺利的话。

当然未能顺利。

---

[11] 格兰德同英语grand（大、伟大）发音相似。

[12] 这是个西洋风格的老啤酒屋，面积大，俨然教堂。

[13] 汉弗姆·博加特（1899—1956），美国电影演员，主演《卡萨布兰卡》等。



卡胡索卡里贝亚

从普罗德罗姆去卡胡索卡里贝亚的路相当艰难。平地几乎没有，或陡然向上，或急转直下。翻过一座险峻的山峰便是深邃的峡谷，然后又有山峰拔地而起。如此反复不止，令人相当厌倦。海边的石崖路大多崩塌，必须手扶石砾斜坡前行。行了两个小时，到底累了，遂在山崖上休息，看着海喝水、吃库列曼神父给的面包和橄榄。对于疲惫的身体来说，橄榄的咸味委实妙不可言。

早上耸立在我们右边的山峰现已绕到我们的背后，我们正往半岛南端接近。不料注意到时，刚才还历历在目的阿索斯山顶那里已罩上令人怵然的乌云。湿漉漉沉甸甸的云。云的下端灰雾濛濛。看样子山上在下雨，且是很厉害的雨。天气又开始变幻莫测。糟糕，没准要下到这边来。正这么想着，雨点“啪啪啦啦”打来了。我们赶紧起身上路。走不到二三十分钟，雨劈头盖脸而来。路本来就举步维艰，一下雨更是雪上加霜，转眼之间都淋成了落汤鸡，前天的一幕再次上演。

同以大修道院为中心进行修道生活的半岛中央那里不一样，这一带多数修道僧在山里边过着差不多和农夫一样的个人生活。走一段路就会看见星星点点散在的人家，有小块菜田，有家畜棚栏，有葡萄架，有狗。不时碰上的僧人，虽然戴着那种僧帽，但穿的不是僧服，而是适于做重体力活的作业服，有的甚至穿着针织短裤或蓝色牛仔裤。

也有的小屋大概为了追求更加孤苦的外景地而把小屋建在俯视大海的悬崖峭壁的尖端。有的甚至会惊叹那地方到底怎样建的屋呢！本来可以在那样的人家或小屋避雨，但我们一致决定不管怎样先赶到卡胡索卡里贝亚的码头再说。一来阿索斯停留许可证今天到期，二来若赶不上四点钟从卡胡索卡里贝亚开出的船可就非同小可。于是我们在越下越大的雨中挣扎行进。

去卡胡索卡里贝亚路上没什么可写的。雨急路险，我们又疲惫不堪，几乎没有开口，只顾闷头行走。最后到达卡胡索卡里贝亚已两点多了。我们湿得像河里爬出，连骨髓都冻透了。

卡胡索卡里贝亚是个坐落在陡峭的山坡或者说是近乎石崖的斜坡

上的小镇。何苦选择这么糟糕的地方建镇呢？叫人莫名其妙。如此陡坡种田都种不成，况且去哪里都要爬上爬下。从镇口到最下面的码头，估计有三十阶楼梯那样的落差。镇子地形简直疯了。虽说是镇，却一无店铺二无餐馆，沿街只有三三两两的几座修道小屋那样的劳什子。空不见人。总之是个空空荡荡凄凄清清的地方。加之大雨哗哗下得正猛，看上去即使不算世界尽头，怕也离得不远了。其实到开船差不多还有两个小时，但我们担心有始料未及的事情发生，决定先下到码头再说。

码头在出镇还要往下的地方，如尿壶的底。踩着石崖极陡的石阶一直下行，的确有个混凝土突堤样的东西伸出海面。波涛“呼嗵”一声撞在那里四溅开来，到处卷起色调黯然的海藻。雨落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背后是悬崖峭壁，此外一无所见。没有码头建筑，没有匾牌，仅有一个突堤。得得，在这样的地方再冒雨等上两个钟头，一想都叫人黯然神伤。

不过人世总有转机。前行不远，有个洞穴样的场所。看来这一带地貌很容易形成洞穴。虽不太深，但进去避雨足矣。我们在洞里脱去衣服，用毛巾擦身，换上干衣服吃饭。早已饥不可耐，加上反正可以乘船离开阿索斯，便把剩余食品大体一扫而光。西红柿、奶酪和青椒夹进面包里吃，橄榄单吃。最后剩在背囊里的只有一点苏打饼干、两片奶酪和柠檬。

时针转过三点的时候，雨总算停了。雨停之后，恢复很快，太阳转眼探出脸来。阿索斯的天气简直叫人捉摸不透。我们走出洞穴，把湿衬衫湿裤子放在朝阳处晾晒，只穿久违了的短裤做日光浴。但觉舒坦至极，竟然迷迷糊糊睡了一觉。反正往下只管悠悠然等船来就是。因日程推迟没转成半岛尖端，但毕竟到了端头，再说食物也没了，该回去了。想刮刮胡须，想洗个澡，酒也想一饮为快。

然而船没来。

四点没来，四点半没来，五点还是没来。

“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研究可能性，但摸不着头脑。海上风浪并未大到足以停航的程度。或者船没看见我们也有可能。于是我们爬上崖顶，像鬼界岛的俊宽[14]那样朝着偶尔驶过远方海面的轮船“噢——噢——”喊叫。可是任何船都不看我们一眼，驶入我们所在海湾

的一艘也没有。我们惨遭遗弃。

既然乘不上船，往下只能再住一宿。问题是只允许住三宿而住四宿是否可以，可是别无他法，只能住下，往后的事往后再说。

这么着，我们在卡胡索卡里贝亚的小修道院住了始料未及的第四夜。就结果而言，这里成了我所经历过的最有刺激性最艰苦的修道院。旅途中，事情便是如此阴差阳错，预定日程便是如此偏离了。毕竟我们身处异乡。这里不是为我们存在的场所，乃是异国他乡。所以，在这里事情不可能称心如意。反过来说，事情诸般不顺也才成其为旅行。惟其诸般不顺，我们才得以碰上种种有趣的东西、奇异的东西、令人哑然失惊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旅行。

首先，我们问小修道院里会英语的僧人为什么船没来，据他解释，情况简单而明了：（1）我们等的码头不对，码头在另一座山的后面。（2）不过不必气馁，反正这样的天气船不会来。天气不好，船当即不开。（3）这个季节船两天一班，因此后天之前不会有船，而且因天气关系船不来的可能性很大。（4）最稳妥的办法是明天步行去亚吉亚·安纳，从那里乘开往达菲尼的船。半岛西侧亚吉亚·安纳每天早晨有班船开出。

“早晨几点？”

“七点。”

“从这里去亚吉亚·安纳要多少时间？”

“这个嘛，快也要三个半小时吧。”

可是无论怎么说，不可能早上四点前爬起去走山路，势必在亚吉亚·安纳再住一宿。而这样一来，要以三夜四天的许可证住五夜六天。问题又严重起来。

“不过，到了亚吉亚·安纳说不定找得到船。”我说。

“是啊，反正去了再说吧。”编辑O君附和道。

总之，我们不得不按最初的打算绕半岛尖端即最艰苦的地区徒步一周。

我们在卡胡索卡里贝亚的小修道院（一如普罗德罗姆，这里隶属格兰德·拉布拉修道院）住的僧房与其说是僧房，莫如说更像穷乡僻野的工棚。人家免费留宿还发牢骚是不大合适，但的确一塌糊涂。厕所粗糙得简直算不上厕所——我这人从未体验过便秘，可这回无论怎么

用力也硬上不来排泄欲望。负责住宿的僧人长一副活像《德拉库拉》[15]电影里的驼背佣人的脏兮兮阴沉沉不吉利的面孔，态度极不耐烦，同马什和库列曼那样文质彬彬的人大异其趣，时不时嘟囔一句，把什么一脚踢飞或开门关门时弄得啪啪作响。我们到来也没招待，鲁克米果冻也好咖啡也好乌糟酒也好一样也没见到。

晚饭也提不起来。先说面包。面包简直一塌糊涂，不知什么做的，硬如石头，而且霉得长满绿毛。他把这东西扔进洗脸盆用自来水泡涨，再用笊篱过水。肯用水泡涨未尝不可以称之为友好表现，问题是这东西根本不是人所能吃的。再说豆汤。往汤里“咕咕嘟嘟”倒了很多醋进去，“醋养元气。”他说。那或许不无道理，可是味道一言难尽。还有那犹如墙土的破破糟糟的奶酪，在我生来吃过的奶酪里边顶数这个咸，咸得让人扭歪了脸。有高血压的人吃了这东西保准呜呼哀哉。可是肚子饿了，不能不吃，除此别无选择。这么着，我们吞了霉烂长毛用水泡胀的面包，灌了酸汤，嚼了咸奶酪。

“吃霉烂长毛的面包，身体不要紧吧？”松村君问。问得好。但我迄今没吃过霉烂长毛的面包，估计不出要紧不要紧。若身强体壮，有可能捡一条命，否则说不定报销。不过反正肚子饿了，没有办法。闭上眼睛吃掉算啦。不用说，味道绝不鲜美。

松村说他曾在中国各地转了一个月，有过种种样样的遭遇，但总比这里强。

吃喝时间里，不知从哪里来了一只猫。看样子猫是修道院的，一边“呼噜呼噜”响着喉咙，一边把脑袋蹭在给我们送来食物的那个面目可憎的僧人腿上。僧人尽管又嘟嘟囔囔发着牢骚（怕是在诅咒什么），但还是把发霉面包浸在豆汤里给猫吃了（对猫比对我们似乎多少亲切一些）。结果怎么样？猫居然“吧唧吧唧”吃得津津有味。

这光景实在难以置信，大千世界还真有靠豆汤和发霉面包活命的猫。这样的猫没见过也没听说过。我养的猫连鲣鱼饭都不正经吃。世界确实大。对于生在长在卡胡索卡里贝亚的猫来说，食物大概就是发霉的面包和放醋的豆汤。猫不知道——不知道翻过几座山后就有所谓猫专用食品存在，不知道甚至有分为鲣鱼味、牛排味和鸡肉味的特殊猫食罐头，不知道有的猫过早死于运动不足和营养过剩，不知道发霉面包绝对不是猫应吃的东西。这些是卡胡索卡里贝亚的猫根本想像不

到的。猫肯定边吃发霉面包边想今天能吃上发霉面包真是幸福啊活着真好。

那样的岁月或许是一种幸福。但那不是我的岁月。倘若在这样的地方再憋上一天，再吃发霉的面包，我们势必土崩瓦解。明天还是尽快撤往亚吉亚·安纳吧！

---

[14] 俊宽是12世纪的日本僧人，因密谋政变被流放鬼界岛（位于日本鹿儿岛县的火山岛）多年。这一历史故事因被编为日本歌舞伎剧目而闻名。

[15] 爱尔兰作家布拉姆·斯托卡1897年出版的魔怪小说名。亦为书中主人公的名字。



亚吉亚·安纳——再见，阿索斯

晚饭后没别的事干，于是拿出关于阿索斯的历史书，歪在床上查阅卡胡索卡里贝亚是如何形成的。书上说，卡胡索卡里贝亚是由四十个卡里比（像一家人那样生活的人数少的小修道院）合在一起成立的。最初住在这里的是一个名叫马克希莫斯的隐士。此人似乎是个讨厌人类的、或者真正是个偏执型隐士。一开始他在近海处盖了一座茅庐一个人，自得其乐地过着隐士生活。及至后来其他僧人赶来在附近建房子的时候，他嫌他们妨碍修行，一把火烧了自己住的小屋移居崖顶。或许是个急性子人，撤离倒也罢了，付之一炬未免过激。总之，这座贴在石崖上的地形奇妙的镇便是这样形成的。镇的创始本身就够偏执的，而且这种偏执至今似乎仍然作为此镇的特性根深蒂固地留传下来，我觉得。

也可能是这里负责投宿的僧人不大希望来人，因而就算不烧小屋（一一烧不过来），也要拿出发霉面包尽快把我们打发走。若真是这样，其战术便成功了。吃早餐时我们一看见用水泡胀的发霉面包上来就蔫头耷脑，而且这回还配了发霉长毛的鲁克米果冻，再加上咸奶酪和咖啡。但因肚子饿了，只好含着眼泪闷头咀嚼。

“喂喂，是不是在找我们别扭啊？”松村君说。过激意见。

“僧侣们在那边享受美味佳肴呢！”O君接道。

“如此说来，这里的僧侣们血色相当不坏，肚皮也鼓起来了。”松村君继续下文。

“不过猫是老实的，如果真是那样，根本不会来这里吃发霉面包，早闻出香味儿跑去那边了。”我说。

一时议论纷纭。但有一点意见一致：尽可能快些离开这里。去处是亚吉亚·安纳的小修道院。它也隶属于格兰德·拉布拉。虽说来到这地方不能指望肥吃肥喝，但总会比卡胡索卡里贝亚略有好转，但愿。

从卡胡索卡里贝亚去亚吉亚·安纳的路又很糟糕，不折不扣是阿索斯最糟的路。山迅速变险，谷迅速变深。攀上攀下，攀下攀上，连思考什么都厌烦。唯一的救星是天气好。途中同几个僧人擦肩而过。不

过来到这一带，不凑到跟前已分不出是僧人还是乞丐抑或大马猴了。衣服破破烂烂，发须任其疯长，独有眼珠转来转去——便是这样的人在山里游走。路上遇见的一个老僧郑重其事地忠告我们：“下次来时要洗心革面皈依正教。”

走了一个来小时，体力耗尽，遂在山梁上擦汗，切开柠檬挤汁喝了。柠檬真是好吃，喝几个也喝不够。尽管酸，可全然感觉不出酸。连皮也“咔嗤咔嗤”咬了榨汁。走路须常带柠檬，这是夏季在希腊旅行学得的一个教训。

不说点什么提不起精神，于是边走边谈吃： 什么在东京吃鳗鱼去哪家店，什么荞面条哪里的好吃，什么吃火锅用的魔芋丝和豆腐哪个先放为妙，什么吃京都的烧大葱最好去哪里等等，尽是些无聊废话。但由于肚子正饿，交谈越来越现实，描写生动而具体。一如多数编辑表现的那样——用出版社经费吃饭乃编辑的一项职责——O君对饮食如数家珍，我也中意谈论吃喝，于是说个没完没了，大可消磨时间。而松村君却渐渐沉默下去，后来索性一声不响。我这人一旦开口就喋喋不休，但此君听得这种话，脑海里的食物形象自动自发地急速膨胀，每当提起食物，他便痛苦得心如刀绞。“当时真的很难受。”后来他对我坦白。我心里一阵歉然。不过早知如此，说得更刺激些就好了！这类描写是我的拿手好戏。

总之，我们便是如此饥饿，如此疲惫。昨晚到现在等于什么也没吃。背囊里倒有一点苏打饼干和奶酪，但必须作为应急食品留到最后关头。无可预料在阿索斯会发生什么。

如此这般，我们大约连续走了三个半小时。也是由于鞋号不大合脚，脚上的血泡破了两个，趾甲翘了起来。说痛当然痛，但最后连痛都懒得感觉了，只顾挪动脚步。我因为平时跑步，对这种强行军在某种程度是习惯的，问题是路况不好，何况已这么马不停蹄地走了四天。虽然是工作，但大城市长大的O君也够可怜的。

十一点二十分好歹到了亚吉亚·安纳。同卡胡索卡里贝亚相比，这里的人显然客气些。有咖啡和乌糟酒上来。乌糟酒委实够味儿，酒味儿好像整个沁入骨髓。从小修道院可以望见眼下光闪闪的大海和港口。这里也同卡胡索卡里贝亚一样，是在崖坡中间形成的集镇。

向僧人打听船，答说今天的船已经开了，只能等到明天早上。问

有没有其他船，回话说若另外出钱也许肯来，于是请其往达菲尼港打电话联系。此人蛮热情，甚至同船长谈了价钱——“跟你说，要价是不是太高了？人家是从日本来的，怕不好接受吧。”如此讨价还价了好长时间。最终以两万五千德拉克马[16]敲定。看样子僧人觉得很对不起我们，问道：“要两万五千才来，怎么办？”贵固然贵（换算成日元，二万元多一点点），但又有停留许可问题，决定雇下再说。“可以的。”我们说。

过了一会，希腊人（多是在此停留的朝觐者）聚拢过来，七嘴八舌议论说这三个日本人花两万五千租船如何如何。两万五千对他们是相当不小的数目，很难相信出这么大一笔钱租船。本想告诉他们从成田到东京市中心搭出租车也要这个价，但说来话长，遂作罢。我适当解释说，虽然高得出格，但因为工作无论如何也得回去，又怕赶不上飞机。他们这才好像理解了。估计往下要把我们这件事议论好几个月。

船来之前就在那里晒太阳消磨时间。我请为我们打电话的为人和气的僧人领我去看礼拜堂。里面墙壁上同样满满画着地狱图和天堂图。也有种种样样惨不忍睹的殉教和受难场景。对方非常亲切地介绍礼拜堂细部，但因为是希腊语，具体听不大明白。不过此人的确亲切，说到“这位圣人被剜了眼睛”时做出真像要剜眼睛的手势，所以大致意思可以把握。

如此一来二去，船终于来了。船相当结实，看来是在渡轮时刻表以外临时开来的，不妨说类似船长个人赚外快。从这里到达菲尼一小时，从那里去乌拉诺波里两个小时。这个路程租一条船两万日元多一点点，以我们的感觉算便宜的。码头上有对希腊人父子，希望一起乘船过去，问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为父者三十五六光景，脸黑黑瘦瘦，小男孩十来岁。两人从凯拉希亚来，把阿索斯修道院转了一圈，这就要去代奥尼苏修道院。一对沉默得不可思议的父子，其中总好像有什么缘故。

上得船，我们马上脱下运动鞋打赤脚，只穿一条短裤躺在甲板上。途中在代奥尼苏修道院靠岸放下朝觐父子，之后朝达菲尼驶去。进入阿索斯和离开阿索斯必经达菲尼。在达菲尼我们不得不重新穿上长裤。在神的庭院里穿短裤是不敬的。达菲尼有个检查许可证和简单

检查行李的地方，看是否把修道院的宝物带出，但没那么大动干戈。我们停留期间的过期也没算回事，粗略扫一眼证件，OK。

这样，我们的阿索斯之旅终于落幕。到了乌拉诺波里，我们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是进酒吧式餐馆猛喝一通冰镇啤酒，痛快得差点儿人事不省。接着就放开肚皮享受今世佳肴。点了鲜鱼汤、炸薯条、musacà[17]、沙丁鱼、炸乌贼和色拉。又从车里拿来收放机，听着“沙滩男孩”慢慢进食。现实世界。谁都不会再吃什么发霉长毛的面包。

不料几天过后，竟奇异地怀念起阿索斯来。说实话，即使是写这篇稿子的现在也不由得怀念那个地方。在那里生活的人、在那里见到的风景、在那里吃的东西极为真切地在眼前浮现出来。在那里，人们虽然贫穷，但活得安静而有高密度的信念。那里吃的食物虽然简单，但味道充满活生生的实感。就连猫也有滋有味地吃着发霉长毛的面包。

我一开始就写过，我这人几乎没有什么宗教热情，属于不轻易为事物所感动或者不如说是怀疑型的人。尽管如此，在阿索斯路上碰见的那个野猴般的脏兮兮的僧人叫我洗心革面皈依正教再来这里时的情景也居然记得一清二楚。当然我不可能皈依正教，然而他的话具有神奇的说服力。较之信仰宗教，我想那更是对于人生方式的信念问题。说到信念，我觉得找遍全世界恐怕也找不到像阿索斯这样具有高密度信念的地方。对他们来说，那是充满无可怀疑的信念的现实世界。对于卡胡索卡里贝亚的那只猫来说，发霉长毛的面包也是最具现实性的东西之一。

那么，究竟哪边是现实世界呢？

---

[16] 希腊货币名称。

[17] 用茄子和羊肉做的希腊菜。

土耳其篇

土耳其茶、兵和羊——周游土耳其的二十一天



兵

土耳其是兵多的国家。除了实行战时体制的，如此到处是兵的国家我想怕是没有的。不光兵，警察也多。总之穿制服的人多得不得了。基地数目多，在街上转来转去的兵多。

土耳其严禁拍摄兵和警察。所以想拍摄街景的时候，原则上必须首先确认有没有兵和警察，否则就要被警察或兵拉走接受盘问，一把抽出胶卷。即使主观上完全没打算拍摄警察，但若结果上有其形象进入，也要触霉头。浪费时间，心情也糟。在伊斯坦布尔我们也曾有过一次这样的遭遇。他们可是很认真的。

别人的国家，或许又有相应的情由，恐怕不该以旅行者的眼光随便说三道四。只是有一点我很难理解： 何必一一拘泥于那种细节呢？第一，我们拍摄的并非执勤中的兵而是正在休假的；第二，我们是问了那水兵可否照相，得到许可后才照的。他们还摆了姿势。不料这当儿警察赶来把松村君拉去警察署（对了，街上便衣警察也所在皆是），不由分说地抽走胶卷。为什么拍摄休假中的士兵涉及军事机密呢？将因此威胁到土耳其怎样的国家利益呢？反正我不大明白。

莫非拍摄了休假中的士兵，就可以根据军装判断出哪国军队在休假不成？可是在这高科技信息战时代，到底又有谁会不胜其烦地把在伊斯坦布尔公园里晒太阳的水兵的军装拍下来、以此为线索推断部队如何调动呢？果真担心这个，那么可谓百分之百奴才主义神经症。我是因为比较喜欢土耳其这个国家才想这样一吐为快，假如真想抹消多数西欧人对土耳其怀有的“Midnight express”（夜半特快）式偏见或阴暗印象，我认为最好尽快消除这种军事神经症。因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普通旅行者都不会对身穿制服之人过分耀武扬威的国家怀有好感和敬意。

从希腊开车跨过埃夫罗斯河迈进土耳其一步，肌肤就能感觉出空气骤然一变。首先是兵的长相不同，眼睛炯炯发光，脸颊下陷，和尚头。如此形象的兵端着自动步枪或机枪，以毫无表情的脸朝这边逼视。

当然，土希国境是热线国境。希腊人和土耳其冰火不同炉，时不

时火拼，双方均有伤亡。小规模纠纷乃家常便饭，因而两国的报纸标题上的爱国字眼触目可见。伊朗逃亡者夜晚渡过埃夫罗斯河逃往希腊一侧，希腊谴责土耳其故意放逃，土耳其则指责希腊无端发难进行军事挑衅。某种程度的紧张也是情有可原的。希腊那边也时不时有部队调动。不过守卫国境的荷枪实弹的希腊士兵并未这么横眉怒眼，还面对照相机微笑着挥手，拍摄坦克也不曾面带怒气。

不料过得桥往土耳其这边跨入一步，情况截然不同。这里的人们反正只讲严肃认真，微笑挥手那样的气氛根本无从谈起。入境手续也严格，尤其像我们这样乘坐设备齐全的大型三菱帕杰罗来的，检查更花时间。有若干检查点，每个点都有士兵端枪警卫，枪口直挺挺对着我们这边，一有什么立即做出开火的架势。

不用说，他们这么做自有其相应的理由，我们也可理解。从地理和历史上看，土耳其是个罕见的一贯孤独的大国。曾经拥有广阔的领土，直到二十世纪初期还对近邻各国实行严厉的军事统治，那期间发生的历史恩怨现在仍在继续。首先同希腊彻底不和。我觉得握手言和恐怕是不可能的。被苏联欺压了很多年，对苏联恨之入骨，因此以反苏立场加入北约，可是欧盟无论如何也未能加入。西欧有很强的不信任土耳其气氛，而且对移民态度也很严厉。同土耳其人之间长达数世纪的血火鏖战仍未从西欧人的记忆中消失。

另外还因塞浦路斯问题在国际上完全孤立。承认北塞浦路斯独立的只有土耳其。同东南部毗邻的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三国之间，虽说同是伊斯兰教国家，但因领土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和难民问题纠纷不断，相互绝不亲密。实际上在我们转东部国境的时候也正有库尔德人问题发生，形势一触即发，那一带极度紧张。并且，这个国家是包括大量少数民族而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常有分离独立问题提出，恒常性地怀抱内战火种。

总而言之，这个国家无论往哪边看都不可掉以轻心。真正要好的朋友一个也没有，所以总是处于微热状态。因此之故，军人为数很多。况且本来就是尚武之国，很多东西都是通过战斗、通过把对手打翻在地夺过来的。军人作为国家精英拥有强大权力。

这个那个写了很多消极东西。不过坦率说来，对于一个个土耳其士兵我并没有不好印象。我多少感到伤脑筋的是那种僵化体制、奴才主义、官僚主义以及煞有介事的尚武的军国主义。就一个个士兵来说，我们周游土耳其期间，在同他们交往过程中几乎没有什么不快。他们质朴、喜欢亲近人、有旺盛的好奇心——土耳其人终究是土耳其人。从远处看的确显得剽悍和冷酷，但凑到身边交谈起来，就可知道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土耳其乡间青年，一看就知是老百姓的子弟，看脸即可看出。这么说或许不好，他们是同钱财和知识没多大关系的青年人，而且总的说来长着极其亚细亚式的面孔。有可能是征兵征来的，或者因没工作而入伍也未可知。但我觉得他们绝非想当英雄那一类型。他们——或许以我的年龄叫我那样认为——看起来完全是个孩子。

我们用车拉过好几次徒步巡逻的士兵。说来难以置信，土耳其服役期间的士兵要徒步巡逻。一般两人一组提着机关枪和地雷在烈日炎天下无精打采地走路。车一来就扬手叫停，让把他们送到目的地。起初见他们挥手我们以为要接受检查，慌忙停车。但他们大多只是请求“能不能送去基地”。态度随和得很。因为同路，让他们搭车一点问题也没有，只是放在车板上的机关枪口对着自己脖子——就算上了保险栓——叫人很不是滋味，握住方向盘的手渗出汗来。

不过，尽管武器装备可怕，但奇异的是他们个人并没给我们以恐怖感。总的说来，在他们身上我们感到的只是有些不忍。他们坐上了我们的车，却总是非常紧张。在他们看来，乘坐日本人开的车是根本无法想像的事。在车上他们十分好奇地四下环视，或捅一捅收放两用机，或就照相机和同伴唧唧喳喳，那紧张与好奇心相持不下而达到极限状态的眼神照在车内镜里，有时甚至让人忍俊不禁。他们的表情同被关在摆满玩具的房间里的孩子没什么两样。假如我会说土耳其语或者他们会说英语，我想可以互相说很多话。遗憾的是我们只能用极简单的土耳其语和英语勉勉强强进行交流。但因了一支烟一块口香糖，他们会很大程度上放松下来。他们终究是亚洲士兵——这样的感觉或许莫名其妙——他们同我迄今看见过的美国和欧洲士兵感觉上完全不同。同美国和欧洲士兵相比，即使语言不通，我也好像更能理解他们的心情。我想这不仅仅因为同是亚洲人这一单纯的缘由，而是因为我

能从他们的眼睛中感觉出某种纯粹或扭曲的东西。

从土耳其兵这个词想像到的，是例如《阿拉伯的劳伦斯》中出现的粗野而残忍的土耳其兵。但我认为那是欧洲人心目中的土耳其兵。以作为日本人的我的眼睛看来，看不出他们有多么粗野和残忍。看上去普普通通，不过是随处可见的普通乡下青年。和曾经支撑旧日本军的是同一阶层青年。无知、纯朴、贫穷、吃苦耐劳。想必无论上级往脑袋塞什么都信以为真。那种场合到来的时候，也许会变得粗野和残忍，一如所有国家的所有军队的士兵。但此刻这么抱着北约步枪津津有味吸着万宝路的他们既不粗野又不残忍。还是孩子。

在东部国境，我们一天遇上了十多次检查。每次都有枪口对着。不过胆战心惊的只有一次。那是被戴贝雷帽的特种部队拦住的时候。他们不是普通的士兵，他们是精英，是真正的行家。首先眼神不同，那是能够把对方浑身剥光的眼神。而且长的是欧洲人脸型，不是亚洲方面而是欧洲方面的面孔。冷冷的蓝眼睛。他们彻底核查了我们的护照。彬彬有礼，泰然自若，然而令我们一阵胆寒。紧接下去由亚洲脸型士兵检查的时候，我莫如说为之释然。护照也没好好看一眼，只管好奇地往车里打量。并问一句：“喂没有烟？”我说没有。于是遗憾地咧嘴一笑，做出放行的手势。情况大同小异。

从多乌巴亚泽特开往凡湖途中，要通过离伊朗边境仅一公里的地点，是距伊朗边境最近的地点。这里的警戒异常之严。因为是库尔德人越境、贩毒分子活动（此乃这一带的正业）和难民流入最活跃的地点之一。从这里到哈卡里，士兵被游击队打死——土耳其人绝对不向外国游客透露——并不罕见。检查站比比皆是。糟糕的是我们走错一条路，没走正路（其实也不是什么像样的路），而从更为偏僻的国境一侧遍地岩石的山路通过。没走多远就有一个检查站，手持自动步枪的两个士兵蹿到路面，用枪口对准我们喝令停车，脸色高度紧张。比检查站高出一截的地方堆着沙包，架着机关枪，枪口同样对着我们这边。因为选择了一般人不走的道路，受到怀疑也是没办法的事。亚洲脸士兵面无表情地拿过我们的护照，递给悄然从里面出来的欧洲脸中尉。中尉看样子二十五六岁，一副知识分子模样，显得有点疲劳，头发乱蓬蓬的，睡眼惺忪，好像刚刚过完夜生活回来，无论怎么看都不是剽悍之人。腰间倒是插一把大手枪，但不太相称。中尉“啪啪啦

啦”翻护照翻了好一阵子，然后用英语问我们去哪里，我们说去凡湖。他看一会儿我们的脸，然后让手下士兵查看车后座行李。查得不很严，但还是大致查了一遍。脸色都那么难看，紧绷绷的，中尉不知如何处理日本人，再次盯视护照。士兵等待他的指令。士兵共有十人。

我心生一计，问中尉“可以给您照一张相吗”。因我觉得大家都那样紧张，而我这么轻松地来一句说不定反而有效果。若我们紧张起来，对方更紧张。没指望能够拍照。想必对方回答“NO”。因为此前我尝试几次给士兵照相，每次都被拒绝了。

不料这么一说，“夜生活”中尉竟绽出笑容，说道：“啊，照相？可以呀，照吧！”周围“亚洲脸”士兵们听了也都对视一笑。于是场上气氛陡然一变。检查也好身份盘问也好都不翼而飞。我也没以为这招能灵。归根结底，大家都很喜欢照相。驻扎在这么偏僻的地方，上级只有中尉，既然中尉说可以，便再也无需顾忌。形貌剽悍的中士也好乡下人长相的普通兵也好都把自动步枪扔在那里，友好地照了张纪念相。身后红地星月土耳其国旗翩然飘扬，翻过山丘一公里外就是伊朗。当然还有一个人按中尉的命令守着机枪监视路面，不管怎么说，总不能彻底放弃警备。他显得十分遗憾，但无可奈何，毕竟是军队。

纪念相照罢，中尉命令一个士兵拿茶来。上茶的样子和日本上茶时差不多。另一个士兵搬来椅子。看气氛要聊很长时间。土耳其人进行个人交往，必然聊得很长。本来就喜欢亲近别人，好奇心又强，而且时间观念比我们日本人淡薄，一聊就聊得很长。这位“夜生活”中尉也不例外。但在国境警备队被请喝茶是很少有的事，加之好像蛮有意思，于是我们决定在这里坐下来品尝土耳其茶。我、松村君和中尉坐在椅子上喝，士兵们围成一圈定定地看着我们。这里会英语的仅中尉一人，因此对他来说能同我们用英语畅谈似乎是向大家显示权威的好机会。虽说样子像“夜生活”，但还是够了不起的。实际上大家也心悦诚服地看着他。土耳其军队的军官大部分是知识分子，无论长相和气质都同下士和士兵们不一样，总之感觉上“天生不同”。这里的中尉也长着金发，个头也最高。其他人剃着光头，唯独他留着头发。士兵们个个敦敦实实，一副“百姓”模样。彻头彻尾的阶级社会。

这时间里，中尉从宿舍拿出两架照相机。美能达和尼康。我不大

晓得（对照相机我几乎一无所知），但据松村君说，是不太差的老型号。不过在土耳其能拿出两架这个档次的照相机，到底是相当可以的精英。况且是在荒凉得一无所见的边境的守备队。

“好厉害啊！”听我们这么说，中尉高兴地咧嘴一笑。有人这么说他分外高兴。一笑，更显得年轻些。由于头发稀薄，以为他有二十五六，其实没准才二十刚过。说不定大学一毕业就被征兵征来这里的。大学毕业生应征，被自动任命为军官。

“我嘛，喜欢照相机。”中尉说。于是话题转到他的照相机和松村君带的照相机上。看来此人颇有情趣。他说自己是伊斯坦布尔人。大概是有钱人家的公子哥吧。被征到天涯海角一般荒凉的山里边同土里土气的士兵终日相守，想必他感到忍无可忍。心情完全可以理解。的确，方圆几十公里，除了养羊的村庄一无所有。况且常有游击队出没，又不能跑去别处散散心。肯定怀念伊斯坦布尔的霓虹灯。

又过了一会儿，一个皮肤微黑的乡下脸士兵走来，笑眯眯地用日语说出“一、二、三、四”。一问，原来他在练空手道。“练了四年松涛流[18]。”他说。松村君是空手道的有段之人，遂说：“那么，请造个型看看！”于是微黑士兵大致造个型出来。我问如何（我对空手道几乎无知），松村君说：“太差了。练四年还这个样子，根本无可救药，基本功都不行。”实在看不下去了，松村君便指导他造型。毕竟是由空手道老家的日本人指导造型，可以说简直等于由密西西比出身的黑人指导布鲁斯吉他的弹法，由阿伦·拉德指导手枪的快射。他激动得浑身颤抖。这种边境的守备队，再等十年怕也不会另有日本人来。“腰再下沉一些”、“双腿合拢，别让人踢去中间”——如此用日语和英语适当提醒着练习时间里，不觉三十分钟过去。我刚要欠身，中尉说再饮一杯茶如何。看样子他还想说一会儿。松涛流士兵也想继续练空手道。但如此下去是没完的，决定就此起身。一来想趁天黑前赶到凡湖，二来他们可能叫我们住在这里。

临走时，大家站成一排热情挥手相送，我们也友好地挥手告别。

那位中尉大概现在还在那荒野正中央百无聊赖地执行国境守备任务，那位乡下脸士兵还在每天叫着“一、二、三、四”练习空手道。

※

另一张照片后来是在地中海伊兹密尔军港拍摄的。潜水艇停在那里，松村君试着对准相机，警备士兵热情挥手。照完一张还叫照一张。潜水艇看上去性能好像不怎么样。

---

[18] 日本空手道的一个流派，近年来流行海外，全称“松涛馆流”。



面包和茶

老实说，土耳其饭食吃不来。问题首先是以肉食为主，而且几乎全是羊肉。我平时不怎么吃肉，羊肉更是一口不吃。其次，油腻东西也接受不了。蔬菜种类倒是丰富，但餐馆里端上的土耳其菜大多烹调过度，味重。因此，烹调味往往压过蔬菜本身的味，进餐厅光一闻味就食欲全无。土耳其的餐馆同朝鲜餐馆一样，跨进一步，一股特殊味道就扑鼻而来。喜欢这个的人或许不在乎，而受不了的人就相当麻烦。

当然我不是诽谤土耳其菜的档次。土耳其人坚持说土耳其菜乃世间无与伦比的美味佳肴，读任何一种旅游指南，上面都以相当多的篇幅介绍土耳其菜种类如何丰富做工如何考究。往日拿破仑三世和皇后一起访问土耳其时，奥斯曼帝国皇帝设晚宴招待，皇后吃了为之感动，命令随行的御膳长官"去土耳其御膳长官那里问一下这食谱"（这里边有个噱头，但怎样的噱头彻底忘了）。总而言之是我不行，我也觉得抱歉。我不是就土耳其菜说三道四，只不过味道同我合不来罢了。试着往餐馆里进了几次，但都落荒而逃。不但我，松村君也不成。那种味无论如何也习惯不了。两个人原本都津津有味地吃过世间口碑不怎么好的希腊风味菜，说奇怪也是奇怪。

不过一开始是从伊斯坦布尔转去黑海沿岸，因此得以吃鱼活命。天天吃加盐的烤鱼和西红柿色拉。鱼的种类和日本差不多，从青花鱼到鲣鱼，应有尽有。进餐馆请厨师烤了，或在鱼铺买来自己用液化气炉烤来吃。在黑海沿岸一个叫特拉布宗的城市进的那家烤鱼专门店非常别致有趣，相当于日本所说的"大众食堂"，那里的老伯们围着胶合板餐桌拿起鱼一起大吃大嚼，还有一股烤鱼特有的扑鼻的香气。点了之后即剖开鱼腹烤制。剖鱼烧烤专门店，别的什么也没有。看起来好吃，进去一吃果然好吃，或者莫如说味道清淡爽口，没加过多的调味料。鱼同西红柿色拉、面包一起吃。我们点了最贵的味似鲣鱼的一种鱼。每人面前重重放了足有三十厘米长的圆滚滚的一条，根本吃不完，剩了一半多。加上饮料两个人才八百日元左右，而这在土耳其已是相当高的价格。欧洲就不用说了，即使黑海沿岸城市，鱼也比肉要

贵一点。细看之下，原来周围普通老伯们（当然这种地方的顾客全是男人，餐馆人员也是男人）吃的全是一百五十日元的类似剖开的竹荚鱼那种鱼。那个看上去也蛮够味。

如此这般，在黑海转的时候还能吃到鱼。不料沿黑海走到苏联边境，再从那里南下内陆，情形就悲观起来。除了羊别无他物。触目皆是羊、羊、羊。走路也时常碰上羊。往肉店一看，整只剥了皮的羊挂在那里。进餐馆只有羊。满城膻味，甚至叫人觉得是用羊代替纸币。便是如此以羊为中心的文化。

“糟糕，这可如何是好，我受不了羊。一吃肚子就莫名其妙。”松村君说。我肚子虽没有莫名其妙，但一闻膻味胃就缩成一团，食欲半点也上不来。伤透脑筋。往下要在土耳其转几个星期，这样子很难保命。日本食品在车上堆了一些，活活饿死倒不至于。可这毕竟有限。没料到土耳其饭菜这般跟身体过不去。原来想得比较乐观，以为就算多少不合口味，但总可以克服过去。

那么，自己做来吃如何呢？事情又没那么简单。食品商店里摆的全是无懈可击地调理成土耳其风味的罐头食品，品种也有限，所谓欧洲食品见不到几样。例如想买极为普通的咸牛肉罐头，货架上硬是没有。这个也始料未及。

归根结底，土耳其旅行当中维持我们饮食生活的，是面包、蔬菜、奶酪和茶。土耳其最可我心意的是面包。然后是茶哈内（卖茶的咖啡馆）。土耳其的面包好吃得没得说（哪种旅游指南上都对此只字未提，匪夷所思）。土耳其面包有两种，一种是膨胀得很大的普通型，另一种白白生生扁扁平平，味道好得不相上下。在我此前吃过的许多国家的面包中，以平均水平来说，土耳其面包应该是最好吃的，尤其到了乡下，更是好吃得不得了。

到吃午饭的时候，我们把车停在眼睛看得到的面包店门前，买来刚出炉的热乎乎的面包（在炉灶前等待烤好再美妙不过），坐在那里撕开放进嘴里。有黄油自然锦上添花，没有也没问题。倘附近有蔬菜店，就买来新鲜西红柿和奶酪一起吃下去，这也是至高无上的美食。有时拿面包走进茶哈内，要杯茶边喝边吃面包。按理不能这么做的，但毕竟是外国人，没人抱怨。茶也便宜得一塌糊涂，便宜得难以置信。比如在哈卡里附近一个叫巴什卡列的仿佛大地尽头的荒凉冷漠的

小镇(感觉同《谢恩》[19]里面出现的边境小镇差不多）买了个热乎乎的大面包，走进旁边的茶哈内各自喝了两杯茶——面包和茶分别多少钱忘了，但两者加起来才二十八日元。记得夏目漱石小说有句台词说“那不是价钱”，而这个分明“不是价钱”。这个价钱即使在低价王国土耳其也是绝对的低价。

在土耳其旅行期间，一天要进好几回茶哈内。一来适合小憩，二来在土耳其待起来自然而然想喝茶。身体需求茶，也可能是气候关系。无论去哪个国家，稍微待长一点时间，嗜好都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不过较之在意大利旅行时想喝蒸汽咖啡，较之在希腊旅行时想喝希腊咖啡，我们远为强烈地被土耳其茶所吸引。反正一有机会就先来一杯土耳其茶，很快染上了这种土耳其习惯。每到一座城镇首先喝茶，早上起来喝，散步途中喝，开车换班时喝，饭后喝。

茶的价钱各地有所不同，平均起来大约一杯十日元。只要喝一杯茶，坐多长时间都没关系，自由自在，和日本的酒吧茶馆不同。

茶哈内是个奇妙的场所。全土耳其的茶哈内一般都把建国之父、民族英雄凯末尔[20]的肖像挂上墙壁最佳位置。不过人们在茶哈内一般不会做有利于国家的光彩事情。他们的行为只有两种，即聊天或赌博。靠什么为生不清楚，反正老大不小之人从一大清早就一个接一个聚拢在茶哈内，打牌、打土耳其式麻将，或天南地北闲聊。当然清一色是男人。顾客和店员统统是男人。倘女人进入这里，说不定成为一个问题，我想。

我们虽是异邦人，但无论进哪一家茶哈内——哪怕地处穷乡僻野——都没有不受欢迎。在希腊乡下走进咖啡馆，聚在那里的当地老伯们时不时以极其冷漠的眼神逼视我们（特别是在希腊旅游胜地，倾向于把游客用的咖啡馆和当地老百姓用的咖啡馆分开。进错了，气氛就很尴尬。而在土耳其从未有此遭遇。相反，在乡下，店主人由于感到稀罕，第二杯甚至分文不取。邻桌的顾客有时也招待我们。土耳其人总的说来热情好客。只是，在后一种情况下往往聊起来话长，好意姑且作为好意接受，尽量敬而远之则是明智的）。

松村君出去拍摄时间里，我常在茶哈内观看土耳其式麻将。这东西介于中国式麻将和桥牌之间。数字使用算术数字，1、2、3、4……直至13。牌为多米诺骨牌大小，分红、蓝、黄、绿四种，码在两层木

制牌架上，置于手边。然后从牌堆里拿出一个出牌。别人也可以叫牌。同麻将一样。但丢掉的牌接二连三码得很快，搞不清此前丢了什么。细微之处的名堂还没最后弄清，反正一个人牌凑齐了就一局终了。“嘿嘿嘿，对不起啊”、“浑小子，还真有两下子，本来我也不错”——这种气氛和日本的麻将馆一个样。其中也有气呼呼扔牌的缺乏教养的人。没有得分棒，由记录员记入得分表。这个也和桥牌相同。钱恐怕多少要花一点的。一边换茶一边没完没了玩下去，看的人也看不够，除了我后面还有百看不厌的人。这个世上，大凡人做的事哪里都大同小异。

正看得出神，旁边一个老伯问我：“日本也有同样玩法吗？”我回答：“有的。”于是皆大欢喜。看情形有可能叫我也上场，于是赶紧付了茶钱离开。不管怎么说，总不能来土耳其玩麻将。

总之这就是茶哈内。

茶倒进小玻璃杯里端来。杯下有杯托，茶匙也有。一开始杯烫得没法用手拿。要等凉一凉才喝。起初我以为热红茶放在玻璃杯里未免不够合理，但看惯了以后，觉得杯里的热红茶颜色实在漂亮。杯底沉淀着一点茶叶。我喜欢不放糖喝。味道清冽而芳香。

没见过冰红茶。土耳其即使热得冒汗的时候，这滚烫滚烫的茶也照样好喝得不可思议。不怎么想喝凉东西。走到树荫下“呼”地出一口气，然后喝温茶。

土耳其茶本来是普普通通的红茶。然而奇怪的是，土耳其茶就是土耳其茶，而不是红茶。原因不晓得。土耳其茶是土耳其茶味，红茶是红茶味。

---

[19] 美国著名西部片，1953年拍摄，中文译名为《原野奇侠》。

[20] 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第一任总统(1880或1881—1938)。



土耳其

我第一次踏上土耳其大地是在七年前的夏天。当时我去的是库沙达瑟。那是面临爱琴海的港城。从那里乘大巴去看有名的以弗所[21]遗址。那天热得要死。大巴上没有空调，我们一个劲儿出汗。男导游向我们解释说：“我国现在石油短缺，所以汽车禁止使用空调。希望各位理解这方面的情况，忍耐一下。”那是石油危机的余波仍未平息的年代。可是就算能够理解，热反正是热的。热得脑袋发昏。看完遗址在海边游一会。没有就势在土耳其住下，而返回了希腊。

但自那以后，我就对土耳其这个国家怀有强烈的兴趣。原因我也不大清楚。吸引我的，我想大概是类似那里的空气的质那样的东西。我觉得那里的空气含有不同于其他任何地方的某种特殊的质。肤感也好气味也好色调也好大凡一切都有别于迄今我所呼吸过的任何空气。那是不可思议的空气。那时我想，旅行这东西在本质上无非就是吸入空气。记忆会消失，明信片会褪色，但空气会留下来，至少某种空气会剩留下来。

后来很长时间里我一直记着那空气，记得在那空气中发生的几件日常性及非日常性（那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的事情。其后我去了很多国家，呼吸了很多空气。然而惟独土耳其空气的神奇性不同于任何地方的空气的质。至于何以土耳其的空气那般吸引我的心，我无法说明，因为那不是能够说明的。它类似某种预感。预感只能在其变得具体的时候才能说明。人生途中会出现若干次那样的预感，次数不多，若干次而已。

因此不用说，我一直想重访那里，想在下次慢慢花时间周游土耳其。

可是总找不到去土耳其的机会。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去。那期间我去了好几次希腊，在意大利也生活了，所以若想去土耳其并非不能去。一伸腿就到土耳其的那样的地方也去了几次。但作为我总是觉得既然去就该好好花时间——而不是中途顺便——把土耳其这个国家每个角落都转上一遍。可是为此必须做相应的准备。首先需要顽强的车和顽强的同伴，既然是艰苦的旅行，那么就不能带老婆去。另外我必

须为旅行取得驾驶执照。初级土耳其话也学了，有关土耳其的书也看了不少。

这次和我同行的是摄影师松村映三君。出发日期定在他婚礼后一星期。我一提起，他痛快地答应下来。我们用三个星期以时针顺序开车绕土耳其外圈转了一圈。其实也想去内陆看看，但由于日程关系顾不过来。必须认识到，土耳其幅员辽阔，一切都看个明白是不可能的。

在土耳其旅行最先感觉到的，就是这个国家的辽阔和多样性。我们说“土耳其”、“土耳其人”时，一般是将其作为单一国家、单一民族看待的，而实际转上一转，就会为其各地差异之大而吃惊。在地势上土耳其明显分为几副面孔，而且无论风景还是气候抑或人们的生活甚至人种各地都截然不同。这只是我个人主观划分，也许不准确，但在我眼里，土耳其似乎可以清楚分为五个部分。

按顺序来吧。

从欧洲开车进入，首先是欧洲一侧的土耳其，即色雷斯地区。这是第一个土耳其，地形上同希腊北部几乎没有不同，风景上或许接近东欧。一望无际的枯萎的向日葵田上空燕子飞来飞去。单纯无聊这点也像东欧，不过土地肥沃。田野无边无际铺展开去。值得看的东西几乎没有。不仅单调缺少变化，而且路直得难以置信，司机没办法睡觉，一大辛苦。

其次是伊斯坦布尔。这里最好视为例外，不列入土耳其五副面孔之中。一如世界上多数大城市，这里乃是特殊场所。随着伊斯坦布尔的临近，沿路风景由单调向丑陋转变——在伊斯坦布尔上班的新中产阶级那令人不寒而栗的群体住宅和商品住宅栉比鳞次密密匝匝。哪个国家这样的景观都令人厌倦，而这里的尤其如此。无论看哪一家哪一栋，都那么新、那么廉价、那么浅薄、那么整齐划一。白墙、红顶，千篇一律。每个板块都竖有一块房地产商不三不四的招牌，有的还画有十分中产情调的生活场景，光看都觉心冷。不久，车驶入城内。这里和郊区相反：脏、旧、猥琐、杂乱无章、人声鼎沸、空气浑浊、花花绿绿，人多得一塌糊涂，车流险象丛生。信号灯固然有，却几乎麻木不动。车尾废气直冲鼻孔，走一会心情就变糟。宾馆价格昂贵，餐馆的计费单经常多收。人们一窝蜂争卖地毯，名牌专卖店里全然没有

可圈可点之物。但夜景漂亮。

离开伊斯坦布尔后跨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大桥，进入亚洲一侧的土耳其。亚洲高速公路两旁大煞风景的工业地带持续了好一阵子。若想更加大煞风景，那么最好沿这壮观的高速公路径直开往安卡拉。不过往左一拐，我们就到了黑海。黑海沿岸乃第二个土耳其。这里的确美妙，幽静、游客少，风景也漂亮。只是，同爱琴海岸地带相比，道路和宾馆质量差得不可同日而语。雨多，空气湿润。

再按时针顺序前行，便来到同苏联、伊朗、伊拉克接壤的边境，这里是第三个土耳其。从草木葱茏的黑海沿岸进山，翻过山脊，这里是东部安纳托利亚高原即无比干燥的中亚式土耳其。许许多多的民族为争夺霸权踏过这片土地，往东或往西。蕴藏紧张的大地。环境和气候也相当严酷。尘土飞扬，目力所及只有羊。道路和宾馆质量更是提不起来。

南下从叙利亚边境地带到地中海的安纳托利亚中部，这是第四个土耳其、阿拉伯色彩浓厚的土耳其。宾馆和道路情况多少有所好转。夏季的热浪虽然叫人吃不消，但女性服装眼看着变得鲜亮艳丽起来。

而西面地中海和爱琴海沿岸的土耳其则是第五个土耳其。到了这里，风景骤然明媚迷人。人们从内陆灰尘迷濛的空气中解放出来，表情也好像一片明媚。美丽的海岸舒展开去，高级度假区也有几处。有新颖别致的游艇港，土特产商店一家挨一家。土耳其政府真正下工夫要把这里建设成旅游胜地。外国游客和土耳其中产阶级以至上流社会人士在这里优雅地度假。不用说，这样的地方物价高。

那么，土耳其这几个地区中哪个最有意思呢？当然是顶糟糕的安纳托利亚东部。在那里逗留期间，我们每天从早到晚气恼、疲劳、骂人、冒冷汗。所到之处全都脏兮兮目不忍视，道路几乎全部处于成为道路之前的状态。人们的生活一看就知穷困潦倒，街头到处是警察、兵和牛羊。不过希望不要误解。我虽然写得这么差，但决非出于恶意。我也以我的方式享受在此旅游的乐趣来着。说享受也许过分，但至少不枯燥。从有意思没意思这个角度看，显然有意思，有意思得很。这里有独特的空气，有生存实感。人们有存在感，眼睛生龙活虎闪闪发光。在欧洲和日本很难碰见那般鲜活生猛的目光。那眼睛里没有啰啰嗦嗦的保留事项，没有“不过”和“但是”，有的只是诚实和坦

荡。那里大多数事物都无可预料，条理在很多时候被吸入虚无之中。简单说来，就是没有章法。但旅行的妙味也就在那里。

非我说谎，的确有意思。不过如果问我是不是想再去一次，时下我的回答是“NO”。若有明确目的另当别论，否则我觉得那地方一次足矣。

爱琴海岸是个美丽的地方。让人心情放松。阳光柔和，海水清澄。不过若仅仅在美丽的海边游泳——即便把这里的物价比希腊便宜不少这一好处考虑在内——那么是不必特意去土耳其的，或者至少没有理由非来土耳其不可。在安纳托利亚高原转了一圈之后，我们对这个地方也感觉不出足够的魅力了。那里确有动人的风景和西欧式的便利，可是仅此而已。我曾在库沙达瑟呼吸过的空气那里也不存在。

或者我们在安纳托利亚高原的体验过于强烈也有可能。我们面对蔚蓝的地中海，不由放心地叹了口气。然而与此同时，我觉得有什么已彻底失去。目中所见、手中所触的一切东西已不再有力而鲜活地传达土耳其之所以成其为土耳其的那种意味。况且在爱琴海，无论往哪里看，看到的都只是德国游客。

如果我重游土耳其并且只能去一个地方的话，我想我可能选择黑海沿岸。倒不是说那里有什么特殊，也不是说看见了什么新奇东西。同安纳托利亚高原相比，可以说那里几乎什么也没发生。但不管怎样，这次旅行当中毕竟得以在那里度过了最为悠然自得的时光。那是个平和安静的地方、什么也没有的地方。

下面写一下黑海。

---

[21] 小亚细亚西海岸的古城。公元前六世纪建造的阿耳忒弥斯神殿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黑海

Karadeniz——如字面所示，土耳其语意思即“黑色的海”。同爱琴海被称为“白色的海”相反，黑海反正就是“黑色的海”。

至于为什么称之为黑色的海，实际到那里一看就明白了——在所有意义上都是黑色的海。那里没有光灿灿倾泻在地中海那样的阳光。我们去时虽然九月刚刚过半，但已满目秋光。那种光美丽动人、晶莹澄澈，却又怡静温和，无需戴太阳镜。

不仅光，海本身也温和怡静。无波无浪，较之海，看上去更像巨大的湖。海岸没有堪称沙滩的沙滩，有的只是铺满黑色小石砾的海岸线。海岸没有水声，海水蹑手蹑脚地赶来。每当渔船通过远处，海面便像突然想起似的轻轻摇颤一下，很快归于静止，纹丝不动。水是透明的，不存在爱琴海那种炫目耀眼的艳蓝，仅仅透明而已。黑石砾海滩仿佛被那透明拽进透明的底部沉潜其中，不知不觉消失于映在水面的光照中。

在我们转过的地方之中，这里是面部表情最为柔和的土耳其。没有安纳托利亚东部的激昂，没有地中海和爱琴海沿岸的西欧式喧闹，没有色雷斯的单调。秋光静静降临那里，人们在田里三三两两采烟叶。他们和她们——其实女性更多——被卡车拉来田里，晚上白月浮上天空的时候再乘卡车返回村子。我们挥手，她们也挥手。她们都身穿类似日本农村妇女干活时穿的裙裤那样的五颜六色细花长裤，头上包着头巾。

翻阅任何一种导游指南，黑海地区都必然放在末尾，记述也最少。历史遗迹也少于其他地区，有也不显眼。夏天短，一年四季两天就一场雨，作为海滨度假区来开发也不适合。山咄咄逼人地伸向海面，地形多为崇山峻岭，道路也跟不上。景致诚然无可挑剔，但行路颇需魄力，因此交通工具也不发达。除了特拉布宗，没发现有魅力的城市，所以特意来此观光的游客为数不多。但是惟其如此，人们才表现得悠然自得，人情味也浓。以日本来说，大概类似山阳一带。

我们从伊斯坦布尔往东，在萨潘加湖前面的萨卡尔亚离开高速公路，进入黑海沿岸一个叫卡拉苏的小镇。这一带路旁的城镇都一个个

小巧玲珑，或者莫如说一刮风就能刮跑乡间小镇。我有事要往日本打电话，每有城镇就停车在PTT（电话局）打国际长途，但一次也没打通。我一说“请接国际电话”，马上应道“NO”。到这种地方，不去很大的城镇日本电话是接不通的。

下一站是去阿马斯拉。沿岸道路相当糟糕。熟悉土耳其情况的人曾告诉我黑海沿岸的道路极差，已经做了相应的精神准备，但情形还是出乎意料。接连都是山路且柏油路面不时中断，这且不说，道路本身还整个消失不见。地图上明明有线路记载，而实际上道路却时不时中止其作为道路的存在，这很令人吃惊，而狼狈又大于吃惊。下车，查看车辙，估计是路面，然后再从人家后院和工厂用地上穿过。如此行驶一阵子，见路面又一下子冒了出来，于是舒了口气，这回好了！可是这样的反复相当占用时间——一百二十公里竟花了两个半小时。

从伊斯坦布尔来到这种地方，不由切切实实感到原来这才是土耳其。倒不是落后不便的地方才像土耳其，只是置身此地之后终于对最初踏上土耳其时所感到的那种独特空气有了切肤之感。伊斯坦布尔当然也并非没有如此情形，但那里毕竟人太挤、车太多、车尾废气呛人、噪音不绝于耳。我在伊斯坦布尔停了三天，转了好多好多地方，但我甚至没有停下脚步感觉空气的时间。

可是我刚刚踏上黑海地区，我觉得这里已是另一天地。首先人的长相变了，眼睛充满生机。我们每次通过村镇，孩子们全都出来挥手。这一带的孩子统统剃着光头，很有些像战争刚结束时日本的情景。大概观看过路车也是一种娱乐。我们也报以挥手。但后来累了，只是稍微抬一手，毕竟挥起来没完。而到了第二天，就仅仅微笑一下，手都几乎抬不起来了。不光孩子，大人们固然不挥手，但也都坐在路边餐桌旁似看非看地悠悠然打量过路的汽车。停车问路，全都“哗”一下子围过来，争先恐后地指点。实在是个悠闲地方。

这一带种烟草的农户和牛集中，很少见到绵羊和山羊，这在土耳其是很稀罕的。路旁放牧的牛一口口闷头吃草。过路的车不多。拖拉机和驮运烟叶的驴们慢慢悠悠在路上移动。由于烟叶驮得过多，驴都几乎看不见了。不单驴，老大娘和年轻姑娘们也扛着好大一摞烟草。

到巴尔滕时天彻底黑了。不晓得去阿马斯拉的路，在加油站向两个年轻人打听。对方说“跟我来”，用小型卡车把我们带到半路：“从这

往前一直走。拜拜！”这才折身回去。不管怎么说土耳其人待人亲切。从欧洲进入土耳其，一开始肯定对人们的反应感到不知所措。因为欧洲人和土耳其人关于“亲切”观念的定义完全不同。在欧洲问路，人们当然也亲切相告；但土耳其人的亲切不那么适可而止，他们指路务必指到最后的最后，让你彻底明白。问开车的人，用车领路；问走路的人，当即跳上车来，把你引到那里。而且到达目的地——往往很有距离——后说一声“就这里”就转身快步走开。以日本人或西方人的感觉来说，这也完全超出“亲切”领域。老实说，这种亲切让我们多少为难的时候也并非没有。帮了大忙一点不错，但有时候并不符合我们的做法和习惯。但这种说法我想是不大合适的。因为这在土耳其乡间属于常识范围内的亲切，他们做的只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无偿服务。不过一问路对方就一声不响地突然蹿上车来，一开始还真吓一跳。

在阿马斯拉，我们住在一家饭店上面的家庭旅馆，住宿费一人三百五十日元。这里没有宾馆，加油站也没有。短暂的旅游旺季早已过去，除了我们几乎没有客人投宿，八人房间只睡我们两个。如大走廊一样细细长长的房间里摆着八张床，随便睡哪一张。蛮奇特的房间。从窗口看得见海，但那是秋日萧瑟的海景。太阳一落，空气急速变冷。仅仅一星期前我们还在爱琴海擦汗、还晒得黑黑地游泳来着。应该出热水的公用淋浴室只出冷水，但由于累了，懒得抱怨，默默地用冷水擦洗了一下。下面的餐厅里也空无人影，我们各要一盘烤鱼，喝了一瓶白葡萄酒，吃了色拉。鱼非常新鲜。问有没有有名的黑海葡萄酒，少年服务生说夏天过去就没有了。饭钱为一千四百日元。饭后上街看了看，街上利利索索的什么也没有。最大的店是液化气店，店门口堆着大大小小各种液化气瓶。一个不适合有商店橱窗的镇。

早上起来，见镇上的老伯们正一个劲儿打量我们那辆停着的三菱帕杰罗，问是不是我们的车。我答说是的。随即让我们打开车头盖看看。打开以后，大家像要吞进去似的定定地注视着引擎和电路系统，并且这个那个热心评说了一番。这些人一旦买车，势必自己修理着彻底用到最后（像使驴那样使到死，死后还可能剥皮），因此对机械结构极有兴趣。

从阿马斯拉到锡诺普的路也相当险恶。山伸向海面，海岸线几乎全是悬崖。一路上分明全是荒僻地区。小镇和渔村像挤在山与山的夹

缝里似的勉强探出脸来。黑海西部沿岸没有多少像样的产业，三分之一人口跑去德国打工。我也去过柏林的土耳其人街，那里简直就是土耳其本土。他们在德国工厂做工，把宝贵的外汇带回土耳其，所以留在村里干农活的差不多全是老人、年轻姑娘或小孩。应该是穷地方吧。但奇异的是没有阴暗，相反，气氛竟那么悠然自得，甚至让人觉出充裕。沉静舒展的黑海风景和人们的生活景况似乎很好地融为一体。

锡诺普。

锡诺普本身不特别有趣，虽然以哲学家第欧根尼[22]的出生地而闻名，但与传说不同，实际上第欧根尼并未在洗澡桶里生活，也没见过亚历山大大帝。锡诺普是位于土耳其最北端的城市。几乎没有东西可看，惟有凄清的港口和残存的城墙。风凉飕飕的。这里的宾馆也几乎见不到客人。半夜宾馆突然停电了，下到大厅一看，服务台里一个人像斯克尔吉[23]老头儿那样正借着烛光数一天的营业额。此处没发现多少令人感到温馨的元素。

巴夫拉。

在此小憩吃午饭。向银行保安员老伯打听附近有没有美味餐馆，老伯照例说一声“跟我来”就走了起来。我们只好尾随。大约走了十分钟，老伯在一家餐馆前停下：“就这里。”我说谢谢，他说不必不必，转身归去。其亲切只能让人感谢，问题是这时间里银行里来了小偷可如何是好呢？不过这家餐馆只有薄薄的羊肉饼，吃不来羊肉的我们很有点为难。饼本身刚刚烤好，热气腾腾，但羊肉没有熟透，香辣调料也过于刺激。不过在当地人中间似乎很有人气，全都来问“好吃吗？”“香吧？”以致我们到底不好剩下，以吃得有滋有味的神情全部吞进肚去，要啤酒，照例没有啤酒，喝了没有凉透的可乐。

巴夫拉旁边有条河流过，前面长长的岬角一直伸向大海。沿河边没走多远，路不见了。后来找出车辙，循辙行进。越过一道浅溪之后，给人以神奇之感的田园风光在眼前舒展开来。道路是坑坑洼洼的泥路。点点处处散在着农舍，其余全是桌面一样平展的土地。土地一看就知很肥沃，草木绿得艳丽。路面有羊群、牛和鸭大摇大摆地穿过。也有水洼样的湿地。长达二十五公里的路程遇到的只有一个领着狗的羊倌。

路尽头铺展着以黑海来说漂亮得出奇的沙滩。沙滩前面横陈着鸦雀无声的黑海。再往前一无所见。径直过去就是苏联。另外，这里有一座好看的灯塔。风很大，滩头草丛轻声摇曳。灯塔附近堆着当柴用的黑木材，看样子准备过冬了。也有狗吠声传来。尽管从爱琴海到这里开车仅半日路程，却好像来到完全不同的另一世界。

萨姆松。

人口二十五万，地处交通要塞，是黑海边最大的城市。机场也有。但不妨说是了无情趣的城市。只是大、嘈杂而已。像那么回事的宾馆也有几家。在此住了一晚，仅仅投宿罢了。傍晚到达，清早出发。

特拉布宗。

这倒是座极有情趣的城市，仍留有拜占庭时期的面影。君士坦丁堡陷落、东罗马帝国灭亡后，唯独这座城市作为由基督教徒统治的特拉布宗王国存留一段时间。古城仍在，不过这里留在我记忆中的全是与历史没多大关系的事。

半夜两个警察碰见一个酩酊大醉的青年，当即把他打翻在地，原因无从得知。

早晨五点，清真寺尖塔（minaret）播放的祈祷声把我们从床上拖起。没想到清早会用扩音器做什么祈祷，一开始费了好大劲才明白过来。扩音器音量同日本右翼宣传车不相上下，在尖塔顶端安了四个，面向四方。所以，如果想好好睡个早觉，最好别住在清真寺附近。

早饭后正在街上散步，一个擦鞋少年走来问我能否擦我的白色旅游鞋。白色旅游鞋到底如何擦法倒让我有些兴致，问题是弄糟了很麻烦（十有八九），遂拒绝。

土耳其这个国家的某些部分，好也罢坏也罢都凌驾于我的想像力之上。

还有一点，特拉布宗鞋店极多。

---

[22] 三世纪前半叶希腊哲学家。犬儒学派的代表人物。住在木桶里过着禁欲生活。

[23] 英国作家狄更斯小说《圣诞欢歌》中的人物，一个一生只知攒钱的商人。



霍帕

在特拉布宗前面的海岸认识了一户伊朗人家。两对夫妇开两辆车外出旅游，有小孩，小女孩很恋人，又漂亮。车都很有年头了，车身坑坑洼洼。车牌上写着德黑兰。居然能从德黑兰开到这里，令人佩服。秃得比较厉害的那个男子手指车身的凹坑，解释说是在伊斯坦布尔造成的。“你也最好当心，土耳其人开车最不守规矩。我在伊斯坦布尔被人撞了车，去警察那里报案。不料车停在警署门前，又给人撞了另一侧。喏，就这边，够意思吧？要好好当心才是。第一次来土耳其？我搞贸易，一年有一半时间待在土耳其。工作嘛。现在休假，大家这么转一转。爱琴海？不去那边。物价高，挤。黑海可以。东西便宜，安静，悠闲。往下去哪儿？凡湖？那么来伊朗好了，好地方！战争？不要紧，结束了，和平了。没护照也容易进（这是说谎）。地方好着呢！”

我们一起照了张纪念相。

第二天在特拉布宗街上散步，又同他们不期而遇。

“你们住哪家宾馆？住宿费多少？嗬，够贵的。我们租公寓套间……要里拉[24]（的确是我们的一半）。不过嘛，我们同老板有私人关系，也有这个原因（这就没有办法了）。反正祝你们一路顺风（谢谢）。”

由特拉布宗去苏联边境的路比这以前的好了不少，估计是为了使部队迅速推进到苏联边境，实际也见到好几次吉普和运兵车在这条路上往来。沿路不时有适于海水浴的海岸，停下车在那样的地方游了几次泳。若有自来水，就在那里煮冷面吃。在黑海沿岸吃冷面也极有情调。我想，冷面这东西总好像是奇妙的食物。无论在哪里吃——我是说在日本以外的地方——都会产生一种远走他乡的感慨。黑海几乎水波不兴，极易游泳，觉得就像一个独自租到清晨的游泳池似的。水也漂亮，心旷神怡。水比看时的感觉温暖得多。

特拉布宗和霍帕之间的地区，也有人称之为“土耳其的香格里拉”。从海滨路往山里迈进一步，就已置身于潮乎乎的雾霭之中。云

绕青峰，雨林茂密，溪流淙淙，石桥横卧，小村庄的房舍均由木材和砖瓦建成。

这一带曾是因伊阿宋[25]率领土耳其人前来寻觅金羊毛而闻名的科奇斯王国的土地。伊阿宋在这里被公主美狄亚一眼看中，在她的指点下找到金羊毛，顺利返回希腊。可是在悲剧《美狄亚》中，如大家所知，伊阿宋后来因飞黄腾达而背叛了美狄亚，痴迷于其他女人，放弃王国且被丈夫遗弃的美狄亚在异乡死于非命。

往里居住着亦被称为科尔喀斯王国后裔的拉兹族人。拉兹族人金发碧眼，保持着独特的风俗习惯。据书上记载，拉兹族人“自立欲望强烈，精力充沛，具有洗练的幽默感，即使在土耳其人之中也大放异彩。而且有在异乡揭竿而起的美狄亚遗风，土耳其不动产经营者大部分是拉兹人。此外，他们一手控制着土耳其面包制作业，在餐饮业也很活跃”。

不动产商和面包商这样的搭配极为幽默有趣。诸如举行法事的时候，面包商和不动产商想必汇聚一堂。不过我猜想，既然能制作那么可口的面包，肯定是优秀的种族。

我们没有在拉兹人居住的山中热心探索，但多少离开海岸进入山中后，常常为眼前纵使不算是“香格里拉”也恍若到了阿尔卑斯的风景感到惊异。树木苍翠，清溪道道，房子结构根本不像是土耳其。双坡屋顶，俨然用圆木建成的登山窝棚，如此充分使用木材的住房在土耳其是很少见的。

雨水充足适于农作物栽培，使得这一带成为有名的红茶产地。土耳其开始生产红茶是十九世纪的事，历史绝对不算长，但如今红茶已取代咖啡，成了土耳其国民性的饮料。咖啡价格世界性上涨是这一转换的主要原因。反正土耳其人坐在茶哈内一边闲聊或赌博、一边从早到晚喝得津津有味的茶大半是此地生产的。街上有红茶厂，黑烟从大烟囱里滚滚冒出。红茶厂居然有烟囱，这以前我压根儿不知道。红茶这东西到底是怎么制作的呢？一个谜，红茶厂之谜。

这地方女人头上全都披着既像披肩又像头巾那样一块布。去大些的街头市场，大约从乡下来卖茶的妇女全都缠着这样的头巾坐在地上，从八十岁的老婆婆到少妇模样的女子，形形色色。头巾分纯白和有花纹的两种。花纹有艳丽的大花，有素雅的箭翎形，各式各样。至

于其中有什么规定还是任由个人出于爱好挑选，我就不得而知了。缠法也分几种，有只缠脑袋的，有仅仅露出眼睛然后像木乃伊那样一圈圈缠得密密实实的，因人而异。我想这大概来自其世界观的开明或保守。

这些农家妇女分成几伙坐着，感觉上大概是左邻右舍和妯娌什么的。前面摆着筐篓，里面装着葱、西红柿、青豆、青椒、大蒜之类。也有一伙全缠同样花纹的妇女。这地方在市场卖东西的差不多全是女性，所以气氛欢快明朗。顺便说一句，在凡湖去市场时，卖东西的清一色是男人，买东西的也全是男人。傍晚因买晚饭用料而热闹起来的市场里全部是脸色阴沉的老伯们。这个无论谁怎么说都相当令人不是滋味。

但这里情况不同。其中也有蛮够漂亮的年轻太太。这么多女人聚在一起，很容易以为她们会唧唧喳喳说个不停，其实根本没那回事，全都安安静静席地而坐，神情认真地默默卖茶。甚至不像高山[26]早市那样说一句“太太今天萝卜不错啊来一根”。在土耳其，女性在人前大声说话、张大嘴笑或随便袒露肌肤——即如日本妇女平时做的那样——是极不光彩的事。松村君想为一位女子拍照，遇到相当大的抵制。最后她丈夫从哪里出来劝道：“喂，照就照一张嘛，不就是拍照吗！”（土耳其人实在亲切得很）然而硬是不点头。想必这女子具有牢不可破的世界观。

霍帕。

霍帕是黑海最东端的城市，再走三十公里就是苏联边境。前面已没有宾馆，这里有五六家，都大同小异半斤八两。较之宾馆，说是简易旅店更为接近。我们住的我想算是比较好的，一个人也才三百日元。单人房，毯子倒是有的，只是磨得没了毛，又硬如木板。三张榻榻米大小，天花板上吊一个电灯泡。躺在床上看电灯泡，不由觉得人之弱小人生之有限。霍帕便是这么一个令人心里难过的城市。

从窗口可以看见建在海滨的粗糙的游乐园。以晚空为背景的摩天轮简直像罚没物品一样直挺挺凄冷冷立在那里。也有类似滴溜溜旋转的火箭那样的劳什子。模拟射击场、摊床……廉价游乐园必须具备的东西大体齐全，全都涂着夸张的颜色。对面是灰濛濛空茫茫的黑海。大概夏日黄昏时分那里也曾多少有过热闹场景，响过欢快的音乐吧，

可现在是黑海早秋的傍晚，看上去只像是专门以让人黯然神伤为目的的庞然大物。

角落里有一座大约住着看管游乐园的一家人的帐篷，里边一闪一闪晃动着仿佛开电视机的蓝光。一股做饭味儿飘来。鸡在帐篷周围漫无目标地神经质地转来转去。我蓦然心想，不巧生在这等地方的鸡们到底会是怎样一种心情呢？尽管想这个也解决不了什么。

宾馆服务台里是神色凄惶的年轻男子。大厅在二楼（一楼是茶哈内），两个中年男子坐在人造革沙发上看汉城奥运会电视转播。拳击。日暮时分正坐在这大厅阳台上往外打量，服务台青年送上茶来。大厅一角有个煤气炉，我们用来再次做了个冷面。见青年人很稀罕地看着，松村君便给了他点尝尝，他吃后做出甚是复杂的表情。也是理所当然，即使日本人不蘸调味料吃起来也不可能好吃。

宾馆似乎没有员工用房，到了夜间，青年人就回自己家住，早晨又返回。这倒无所谓，问题是他回家时从外面给门上了锁。门结实，锁也结实。因此，我们住宿客人从晚间十点到第二天早上八点一步也出不得宾馆。我原想早上六点起来散散步，却未能如愿，只好躺在床上看弗拉纳里·奥康纳[27]的短篇消磨时间。发生火灾可如何是好呢？

早上在房间里煮咖啡吃面包。往下既没有特别值得一看的东西又无事可做，于是拿起钓鱼竿走去突堤前端。一个风平浪静的星期日早晨，当地人也都坐在突堤上悠然垂钓。看钓线，知道尽管没浪但潮流意外强劲。一开始夸下海口，宣称若钓上大家伙就裹上面油炸来吃，不料一无所获。我们用的是从日本带来的有转轮的钓竿，而用这东西的只我们两个。别人都不用竿，直接抛线，但都钓上不少。钓上来的全是顶多够炸着吃的小鱼，偶尔也有针鱼那样的家伙上来。水很清，可以看见鱼群在脚下游动，针鱼的肚皮不时一闪反射出太阳光。

由于什么也钓不上来，周围一位老伯看得不忍，走来我身旁教我正确钓法。见我们把面包和奶酪摆在一起做鱼饵，老伯说那不行，把自己的鱼饵分给我们（说了好几次了，人们实在亲切）。他是用鱼肉作饵，把鱼肉连皮用小刀切成小块扎在钩上。鱼皮极硬，很难咬动。另外还把鱼尾切得细细的作散饵。我谢过老伯又钓了一个小时。结果我的饵光是被鱼们巧妙地吃来咬去，而鱼一条也没钓上来。大家都很同情，但不上钩也是奈何不得的。

与此相比，观看在突堤钓鱼的一伙老伯和在附近游泳的一伙少年吵架更有意思。孩子们一靠近，老伯就大吼不许影响钓鱼，孩子们根本不理睬，只管继续游泳。这地方除了钓鱼和游泳没有其他活计，想必年轻人都想去外地当面包商和不动产商。

结果我们花了两个小时也没钓上来一条鱼。不过星期日早上望着黑海懒洋洋地晒太阳的确心情不坏。过了霍帕，往下一段时间就看不成海了。要过几个星期不清楚，反正下次看海就是看地中海。

---

[24] 意大利货币名称。

[25] 希腊神话中沃洛斯王埃宋之子，阿耳戈号远征船的指挥者，在赫拉女神的保佑和美狄亚的帮助下觅得金羊毛，得以继承王位。

[26] 日本市名，位于岐阜县北部，有小京都之称。

[27] 美国女作家(1925—1964)。



凡湖猫

来到土耳其，几乎没了想做什么的念头。说来无聊，只是想开车到处转，看看山川风物和男女模样罢了。勉强说来，如果可能，倒是想见一见凡湖猫，在凡湖游游泳。这是我小小的希望。但也不是非那样不可，只是说如果可能。我的希望向来都基本上是这个程度。

凡湖猫是住在凡湖旁边的特殊猫。乍看是普通猫，实际上特喜欢游泳，只要有水就游。相当变态的家伙。另外右眼和左眼颜色不一样。这种猫仅凡湖附近有，别的地方即使有，一般也很难看到——以前在哪里听人这么讲过。好不容易去凡湖一次，如果可能，很想见一见这种猫。

凡湖海拔一千七百二十米，是世界上高水面湖之一。因为没有河流出，盐分相当浓，书上说浓度达百分之三十。鱼几乎没有，湖水发出相当奇妙的气味。如果可能，想在此游泳。就理想来说，想和凡湖猫在凡湖里游泳。这个理想是太理想化了。各自分别游也可以（从结果来说，我得以在凡湖游了泳。这是气氛极为奇妙的湖，一股过去在化学实验室里嗅到的药味儿，似乎是钠。水质也有点滑溜溜的。但由于含盐量大，游起来非常容易，游三十分钟也全然不累。水为绿松石蓝，极为漂亮）。

凡湖地处土耳其最里边的里边，距边境很近。在海拔超过五千米的亚拉腊山的南边，是靠近伊朗边境的大湖。乘飞机从安卡拉飞来自然是转瞬之间，但开车捱到这里就相当吃力。我们在黑海尽头处的霍帕住一晚，然后沿苏联边境南下，在卡尔斯投宿，拼命穿过羊群、军队检查和猴子般纠缠不休的孩子们的围攻，到达凡湖。这段路可谓历尽艰辛——毫不夸张——且迷路了几次。道路标识不全，极易迷路。一旦迷路，就非同小可。因为路利利索索彻底消失。消失之后，往下只能在岩石遍布的荒野中驱车横穿。我们开的是大型四轮驱动车，问题还不是很大，而若是普通车，势必动弹不得。

望见凡湖水面已是傍晚了。我们累得浑身瘫软，但还是觉得凡湖的黄昏漂亮得无可形容。天空、湖水、山峦……一切都染为橙黄色，

尤其天空与山峦交际处简直像火烧一样通红通红。湖面波平如镜，细粉般的光亮随着涟漪摇颤，无边无际，无声无息。这就是凡湖。在索寞荒凉尘土迷濛的安纳托利亚东部高原整整穿行两天之后面对湖水，委实心怀释然。

在这一带，凡城算是相当大的城市。听人说，凡城是因了伊朗流亡者和毒品走私者繁荣起来的。翻山逃来的流亡者（几乎全是在两伊战争期间逃避兵役的人）先在这里喘口气，然后去当局办理流亡的正式手续。毒品走私者们把鸦片和海洛因从东边运来这里，在此交给下一程的走私者。无论哪一方面，此城都是其路线中转站。因此，土耳其东南部的部队和治安当局总部驻扎在这里，以便取缔他们的活动。风景虽然秀丽，但治安相当严峻。看人们的脸，表情也十分复杂。

由于人来人往，看上去颇为像样的宾馆也是有的。我们闯进满是德国游客的似乎很高级的一家宾馆，问有无房间。回答说只有套间。价格约六千五百日元。看房间，有两个宽敞的房间，加之近来住的全是一晚六百日元那种糟糕地方，决定在此休整两夜。不料这家宾馆相当胡来（名叫阿克达马尔宾馆），我们刚从车上卸行李，服务台的人就提出："既然是两位，那么作为加床费，需另交一千六百日元。"开哪家子玩笑！刚才看的时候两个房间岂不各放一张床？"哎呀，那是忘记收了……"我心里冒火："好了，另找宾馆就是。""明白了，那么出于友好，就免了吧。"我心想这算什么友好呢，不过反正先进房间安歇，洗澡，洗罢咕咕嘟嘟喝啤酒。这才叫天堂。

之后，我和松村君想外出散步。下到宾馆大厅，见立柱上贴一张凡湖猫广告画。

"凡湖猫到底去哪里才能找到呢？"松村君问。

"这——，如何找得到呢？又不至于在路上走。"

我这么一说，服务台刚才那个男的就像听懂了日语似的三步并作两步走来："恕我冒昧，刚才看到这凡湖猫广告画了吧，对这猫可有兴趣？"

我们说有。

"那么，我堂弟就住在这附近，他养这凡湖猫。如果想看，我可以做向导。"

这话未免蹊跷。很难认为此人有多么友好。不可能特意为此表示

友好，估计里面有什么名堂。不过那很可能用钱了结，再说只要能花点钱见到凡湖猫给它照相，我想那未尝不好。

对方说那好，三十分钟后在此碰头，“带二位去我堂弟那里”。

三十分钟去大厅，他正等着。问远么，“不，近得很，No problem（没问题）”。果然近，一直走过两个路段，往右一拐就是他堂弟家。是个地毯商。原来是想推销地毯。但明白过来，事情倒也简单。同推销海洛因、鸦片和印度大麻相比，推销地毯不犯罪。“到了，”他说，“这里有凡湖猫。”

然而没猫。他堂弟三十光景，较有绅士派头（当然是就凡城而言），讲一口漂亮的英语，文质彬彬，没有强加于人的味道。在土耳其我同地毯商交谈过几次，见到文质彬彬的地毯商还是第一次。服务台这个人和他的堂弟找不到猫，有点慌张起来。“刚才还在来着。”他堂弟说。“糟糕，莫不是跑出去了？”服务台的人说。两人在椅子底下和里面房间找来找去。他堂弟对我们解释说：“对不起。毕竟是猫，一转眼就跑去哪里。不过很快就会回来的。小猫，跑不多远。请喝茶等一会吧。”

“这怕不是演戏？”松村君充满狐疑。

但门口旁边好端端摆着猫食盘子，不能认为人家说谎。若手脚做到那么细的地步，那已是“sting”（欺诈）世界。土耳其的地毯商不至于那么处心积虑。顺便说一句，猫食内容为煮羊肉、马铃薯加米饭（猫竟吃这东西）和粉红色的牛奶。不清楚牛奶何以粉红色。问地毯商，答说就是这种颜色的。

四个大男人静静等猫回来，未免有些傻气。于是我自然而然看了店的地毯。地毯非常漂亮也很齐全。用手一摸，东西相当地道，图案也比在伊斯坦布尔看到的好。价钱也便宜。我本来就打算在土耳其买一张地毯，就不再谈猫，一张张看起地毯来。正看着，猫回来了。出生两三个月的小猫崽。雪白雪白，漂漂亮亮。但抱起来的最初印象，老实说，觉得什么呀不就是普通猫嘛。右眼和左眼颜色确实不同，毛蓬蓬松松，蛮可爱。可是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名字叫奈迪尔。”地毯商堂弟说。

“游泳吗？真会游？”我问。

“游的，还用说。”他很自信地回答。

但不好提出那么就把这小猫扔进水里叫它游游看。既然说“游的”，那么只能相信。

不管怎样，松村君给猫拍了照。猫十分逗人喜爱，拍照时间里在地毯上打滚撒欢儿。最终我买了张地毯，丝和毛混织的，不很大，做工相当考究。喝着茶轻松交涉了十五分钟，结果以九万日元价格成交。地毯商包了地毯，我用美国运通卡付了款，然后和地毯商握手告别。

这件事的教训——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教训——如果为以后去凡湖的朋友写一下类似教训的东西的话，就是在凡城这个地方，宾馆的服务台人员肯定和一家地毯商有联系。后来见到的服务台人员都给我们地毯商的名片，极为热情地劝说我们“那是城里最讲良心最有信誉的地毯商，去一下看看”。即使同一家宾馆，每个服务台人员所联系的地毯商也各有不同。宾馆工作做得不很热心，但在介绍地毯商上面实在认真得令人吃惊，以致让我觉得宾馆工作大概属于副业。毕竟作为一流宾馆，卫生间还整个晚上都哗哗漏水漏个没完，房间没有电话，几乎不出热水，服务人员又态度恶劣，一塌糊涂。

还有，第二天街上慢慢散步时注意到，地毯店里凡湖猫相当不少。凡城地毯店的橱窗和店里头常有凡湖猫睡午觉，有的甚至被关在橱窗里——为了招徕顾客。一旦游客对猫发生兴趣停止脚步，里面便有主人出来招呼游客进去。然后端茶、聊猫，再打开地毯看。完完全全是招牌猫。这里的居民看见游客所想到的似乎只是如何兜售地毯。

总之遗憾的是未能看到游泳的凡湖猫。



哈卡里之行

以前看过一部叫《哈卡里的季节》的土耳其电影，讲的是一个大城市长大的土耳其人去哈卡里这个土耳其腹地——或者不如说几近秘境——当教师的故事。他是个理想主义知识分子，在深山里的一个村落（大概是库尔德人村落）给孩子们上课，同时力争和人们打成一片。大家也开始一点点接受了他，但最终因发生一起事件而黯然神伤离村而去。我时常把电影情节整个记错（有时甚至把两个混淆成一个），所以记不确切，但大概是这样子的。主要说理想主义在当地现实面前的败北。记得是十九世纪俄罗斯风格的主题抑郁的电影，情节另当别论，风景和风俗描写则很精彩生动，细微之处都让我记得一清二楚。

电影上说，哈卡里雪很深，一到冬天，山里的村落就和外界彻底隔绝，雪直到五月还不融化，也就是说一年中的大半时间要被封闭在村落里。人们贫穷，沉默寡言。见那个教师往端上来的茶里放糖搅拌后喝了，众人现出诧异的神情。那里的人们全都“咯嘣咯嘣”咬方糖吃，然后才喝茶。全村风习如此。

在电影里看了以后，我想，若去土耳其，一定去这地方亲眼看看。但哈卡里这地方不仅雪深，而且在土耳其以治安不好闻名。我最信赖的英语旅游指南上这样写道：“哈卡里最好绕开。此镇人口的一半在路旁脏兮兮的茅屋里战战兢兢闭门不出，另一半只考虑如何把政府官员杀死。这里的政府官员全部是在其他地方犯了错误或出了问题被流放来的。”

我以为这样的说法无论如何都未免夸张，不料去哈卡里一看，一点也不夸张。当然不是说有人在自己眼前遇害，但笼罩镇子的气氛的确如其所述。在哈卡里只要停车往外跨出一步，就会感觉出空气紧绷绷的不太平。

时机也不好。我们去的时候正值库尔德人问题白热化，可我们已经好几个星期没看报纸（离开伊斯坦布尔后，Herald Tribune[28]哪里都没卖的），不晓得情况恶化到这般地步。不过到底有些担心，在凡城向地毯店和旅游办公室的人问过哈卡里治安如何，两人都保证说

没问题，“哈卡里？No problem,安全着咧，根本没什么好怕的”。我深入问了一句：“可听说有很多问题。”“唔，以前有过一点，”对方老大不情愿地承认道，“不过现在不要紧了，治安恢复了。伊拉克欺负库尔德人，杀害库尔德人，他们逃来土耳其。但土耳其人无微不至地保护库尔德人，天下太平。”总的说来，土耳其人不愿意向外国人谈本国的纠纷。无论什么都想以“不要紧，No problem”这一正规见解搪塞过去。这恐怕因为他们是爱国者，也可能因为极端讨厌外国人以“midnight express”（夜半特快）方式传播本国消极消息（他们的心已被深深伤害），或者出于尽可能不多嘴多舌这种政治上的考虑，抑或由于体制问题使得坏消息不四下传播亦未可知。对此我弄不明白。总之对于消极事情他们十分懒得开口。

例如凡城（不是今天的凡城，是过去的凡城）曾是亚美尼亚人的城市，其分离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从土耳其独立出来而联合俄军占领了城市，杀了土耳其人。但俄国爆发革命、革命政府单独讲和撤军之后，返回的土耳其军队出于报复大量屠杀亚美尼亚人（据说在全地区杀了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人），又把剩下的亚美尼亚人一个不留地从这一地区强制性大量迁出，将城市整个夷为平地。化为废墟的城里如今只住着鹳的一家。可是带我们看这废墟的陆军特种部队出身的管理人兼导游只说“这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俄军的炮火夷为平地”。此话——也许实际遭遇了俄军炮火——纯属无稽之谈。反正他们是尽量不触及土耳其的这种阴暗面。

这倒也罢了，问题是我们把那两个凡城人的“哈卡里毫无问题”——毕竟他们信誓旦旦地强调说不要紧——作为当下的信息信以为真了。但我并非诽谤土耳其人。总的说来，土耳其人说不要紧基本都不要紧。他们不是想说谎，只不过他们的见解往往出于良好的愿望罢了。也就是说，“I hope that it is so”不觉之间成了“It has to be so”。确是这样。向他们问路，若说“啊很近也就一百米”，那么就有六百米。他们心想大概说近些对对方有好处，于是好意地缩短了距离。这仅仅是一种感情上的亲切。作为证据，在土耳其问了好几次路，一次也没人教对过。问及哈卡里治安，他们也是心想好容易来土耳其一次，但愿那里不要紧，遂那样说出口来。然而此时我稀里糊涂相信了。

库尔德人问题极为复杂且根深蒂固。库尔德这个民族尽管从七世纪就已存在，并拥有固有的文化和语言，但几乎不曾有过自己的国家，是个悲剧民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从民族自决名单中被排挤出去，现在也居住在横跨土耳其、伊拉克和伊朗三国的地区（叙利亚和苏联也有一小部分）。库尔德人有高度自豪感，对同化于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怀有反感，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掀起激烈的独立分离运动从而遭到镇压。他们的数量把握不准，不过总数大体为一千万至两千万，其中八百万住在土耳其。由于政府采取高压性同化政策，他们的文化活动——包括音乐和出版在内——在正式场合受到禁止。例如电影《路》的导演、已故于尔马兹·居涅是库尔德人，因而受到政府的彻底镇压，三番五次被捕入狱。在监狱中导演的《路》是很有名的事。

事情就从这里变得更加麻烦起来： 伊朗支援伊拉克国内的库尔德人分离独立运动，向他们运送武器。为什么呢？为了在两伊战争期间扰乱伊拉克后方。不料，两伊战争突然停止以后，库尔德人问题对于伊朗就纯粹成了累赘，因而中断了援助。对于库尔德人游击队来说，好比上到二楼被撤走了梯子。而从前线战斗中脱身的伊拉克军队开始投入主力部队镇压库尔德。因为即使对于伊拉克政府来说，这也是解决迄今为之头痛的库尔德人问题的绝好机会。至此同前边说过的土耳其亚美尼亚人的命运极其相似。被大国用来做交易的少数民族的悲哀。但是，伊拉克部队也很难镇压。因为库尔德人出没于深山密林，而且一看形势不妙马上逃往国境线。遂把一个个村庄包围起来，使用毒瓦斯炸弹连妇女带小孩一网打尽。杀了多少人不清楚，有人说两万有人说三万。调查团进不去，实数不得而知。

于是库尔德人翻山越岭冲破国境线大部分逃来土耳其。伊朗因有那样的原委，最初经由土耳其接收库尔德难民，但难民数量据称已达十万，作为伊朗也不可能接收那么多。何况无论伊朗还是土耳其都担心库尔德人涌进太多会引发本国民族问题。尤其土耳其，库尔德人问题本来就已严重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但若按伊拉克政府要求强行遣返库尔德难民，势必受到国际舆论的围攻。特别是美国政府正密切注视土耳其的难民接收情况。而另一方面，作为土耳其政府又有不愿同伊拉克结怨的苦衷。这是因为，土耳其的石油供应全面依赖伊拉克。倘伊拉克中止石油供应，土耳其经济势必土崩瓦解。所以，即使伊拉

克部队追赶库尔德人越境追到土耳其，也很难公开指责伊拉克部队的军事行动。

因此之故，土耳其政府禁止库尔德难民同外国新闻记者接触。因为不想把使用毒瓦斯公诸于世从而刺激伊拉克政府。各国的利害和意图极其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但不管怎样，就在这一时期土耳其军方把陆军部队大量调至土伊边境，采取了近乎戒严的态势。这首先是为了防止库尔德人更多地涌入，其次是为了控制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人的不安倾向，第三是为了断绝外国人同库尔德难民的接触。

总之我们已完全置身于——在不明所以的情况下——这场骚动旋涡的正中。回头想来，实在不胜诧异： 算什么No problem！算什么天下太平！



离开凡城向哈卡里进发。虽然仍是九月，但早晨的空气已寒气袭人。其实较之寒意，更是一种近乎锐利的冷。阳光炫目耀眼，即使戴太阳镜开车也还是觉得眼睛作痛。笔直的路持续有顷。周围一无所有，惟独平原横陈开去。青草丰茂，羊群点点。融雪汇聚成的溪流和湿地也闪入眼帘。有好几只狗被挑死在路旁，有的露出内脏，有的瘪瘪的如比萨饼。都是牧羊犬。每有车开来，便以为是入侵者而飞扑上前，于是被车挑翻。可怜诚然可怜，但也确实吓人。我们在这路上也遭到几次狗的扑袭。不知它们是傻还是勇敢（大概兼而有之），毫不畏惧地蹿到以一百公里时速奔驰的车前霍地立起身来，我们也面对生死关头。对面没有车开来的时候尚可设法避开；而若前后有车，那么——尽管觉得不忍——就只能压死。如果放慢速度，狗就和车相伴而行，用身体“砰嗵砰嗵”拼命往车门上撞——简直成了斯蒂芬·金笔下的《泄愤》世界。

狗很大，凶相毕露，气势汹汹，说半是野狗都未尝不可。骑摩托或自行车旅行的人若遭此扑袭，怕是要慌作一团。本来我想不时下车走动一下，但因怕狗扑来，在土耳其一次也没敢。几年前土耳其政府曾计划全国性扑杀野狗，但因遭到西欧动物保护团体的抗议而作罢。实际上被狗吃掉的人也似乎不少。

不久驶入山路。草原消失，换成灰濛濛的风景。翻过海拔两千七百米的山脊后，风陡然增大。在这里已是冬天的风。据说土伊边境附近的山上，八月间冻死了很多翻山越境的妇女儿童，便是冷到如此程度。过了山，就已是哈卡里地界。道路突然变糟。倒算是柏油路面，但到处有陷坑。提醒陷坑的立牌当然有，但小小的不易瞧见。路面一多半或整个不见的地方也相当不少。桥也塌了。维修路段铺了柏油后再没处理，轮胎马上给焦油沾着黏糊糊的。看筑路现场，不由暗暗叫苦。虽然路沿河谷而筑，却不好好打地基，大致平整一下路面就直接铺柏油，以致稍一下雨路肩就塌掉，塌得到处是洞。不时有一头扎进洞里的汽车倒在路旁。Wild west[29]。

路旁的城镇看一看都叫人悲从中来。进茶馆喝过一次茶，里面有三个长相丑陋的男人，一个（我从未见过贩毒者，想必就是这副模样）用土耳其语问我戴的西铁城潜水表多少钱。告诉后，他们就此说了十多分钟。之后又问我们开的三菱帕杰罗多少钱，告诉后，又交头接耳就此说了十多分钟。他们对价格怀有异乎寻常的好奇心。气氛让人觉得没准会在这里被杀了整个剥皮。问茶馆主人厕所在哪，被告知没那东西。估计在外头小便。看样子洒上小便说不定倒能使镇子变干净点。

---

[28] 《先驱者报》。

[29] 未开发的美国西部。



哈卡里（2）

在距哈卡里一步之遥的地方发现了不可思议的一行人。大约十六七岁的年轻姑娘身穿像是新娘盛装的雪白雪白一尘不染的飘飘长裙骑在马上，长裙有好几颗鲜艳的绿星，薄薄的面纱遮住嘴角。一个感觉上异常安静的漂亮女孩。牵马的是个十岁左右的神情严肃的男孩子。仿佛父亲的年长男子拄着拐杖在前面步行。男子头缠阿富汗样式的伊斯兰头巾，浅黑色的脸，愁眉不展地瞪视道路的前方。令人费解的场景。到底怎么回事呢？他们要去哪里做什么呢？我不得而知。女孩那身艳丽的服装与土耳其腹地尘土飞扬的荒山野岭实在太不谐调了。四周只有红褐色的石山、满是乱石的山涧，此外就是无遮无拦的青空。说不定那女孩是去赶婚礼的新娘。

那时是我开车。差不多有十分钟没见到其他车辆了。除了岩石别无东西可看。路又单调，除了塌开的洞没别的。拐弯时看见他们，再拐弯时就不见了。场景倏然扑进我的视野，转眼之间就退往后面。其实一开始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怀疑那里是否真有那场景。

可松村君也看到了同样场景，所以确有其事。如果有意，我们也可以停车退回好好看个究竟。但没那样做。因我觉得——倒是说不清楚——那样做很可能使我们损坏那个场景所含有的东西。本能有那样的预感。于是我们继续朝哈卡里行驶，没有就那场景深入交谈。可那到底怎么回事呢？现在我也能真切而鲜明地在眼前推出那个场景，并且这样想道：那女孩大概正去哪里。



即将进入哈卡里之前受到两三道警察的检查。详细查验护照和驾驶证，记下编号。打开后车门查看行李。往哪里打电话。再次审视我们的脸。完了之后我们爬上通往台地小镇的七拐八弯的坡路。近午时分终于驶入哈卡里。一看就知是个一塌糊涂的镇，至少不能说是个让人感到温馨的地方。镇口首当其冲的是简直像在横眉怒目的庞大的陆军基地。军用车、装甲门在门内列成一排，仿佛在说随时可以出动。

持枪士兵在那里站岗。

过得这里即是哈卡里镇。进镇第一步首先注意到的是脏污。路未铺柏油，灰尘多得不行，而且只有男人。开车在镇里转了一会，触目皆是男人。估计大多是库尔德人，头上缠着阿富汗式伊斯兰头巾，腰间扎着腹布。在路上四五个人头碰头站着说话的，很可能是贩毒分子。总之气氛非常可疑。悄声悄语说上一会儿，就一齐“啪啪”按动卡西欧计算器。一个人向对方出示数字，对方又“啪啪”按计算器出示数字，如此反复良久，或抬手或摇头。警察或军人一来，赶紧藏起计算器。

另外，警察和兵多得要命。目力所及，无不是制服。携带自动步枪、来复枪、手枪等各种枪支的警察和兵充斥街头。枪支委实五花八门，制服委实形形色色。他们两三人结伴四下巡逻，决不一人单独行走。

路旁一伙伙坐着眼神抑郁的库尔德人、伊朗人和伊拉克人。来到这一带，很少见到金发碧眼的欧洲脸土耳其人。光景几乎可以说是中东。他们也不是在说什么，而是直勾勾地盯视来往行人。身体纹丝不动，惟独眼珠在转。

停车下来，人们战战兢兢地围上前，询问从哪里来、来干什么、去哪里、喜欢不喜欢土耳其、喝茶吗之类。游客模样的人想必极少来这里。但我们不愿意在此镇久留，想尽快办完事、尽早动身离开。无论街上气氛还是人们的眼神都给人危险之感。我们对一再劝我们喝茶的那个人推说还有事要办。对方或许出于好意，问题是打起交道来势必话长。松村君独自去拍摄街景，我则走进咖啡馆写日记。

咖啡馆里，电视正转播汉城奥运会。摔跤。几个人坐在桌旁定定地注视着黑白荧屏。仅仅注视而已，不发表感想，不改变表情。我在柱子后面最不显眼的桌旁坐下，说要一杯茶。对方说没有茶。我说那就来杯果汁，又要了奶酪饼。不大工夫，茶和奶酪饼端来。莫名其妙。

喝茶、吃奶酪饼、写日记时间里，一个年轻男子坐在我面前。我尽量不抬头。因为一旦四目对视就麻烦了。对视必然搭话，而对方要说什么早已了然——“从哪儿来？”日本。“来做什么？”旅游。“在土耳其待多少日子了？”三个星期。“都去了哪里？”伊斯坦布尔、黑海沿

岸、多乌巴亚泽特、凡城。“往下去哪里？”迪亚巴克尔、乌尔法、地中海、伊斯坦布尔。“喜欢土耳其？”喜欢。“职业是什么？”新闻记者。“这是工作？”是的。“我这手表，精工牌。”很好。“不照张相？”现在不需要。“来一杯茶如何？”也不需要。“年纪多大了？”二十九（说谎）。“结婚了？”老婆去年死了（这也是说谎）。“不幸。”谢谢……如此不一而足。最初我视为一种友好表示，热情应答，很快厌倦起来，不再理睬。他们虽爱说话，但稍一深问，便马上支支吾吾，打听不出让人觉得“哦这个不得了有趣有趣”的情况。在其他国家，在街头聊上三言两语就可得到种种兴味盎然的信息，可在土耳其几乎没有希望，说的尽是不咸不淡。所以说也毫无意思。不可思议。大致说一通，接着提出“一起照相吧”，最后递过地址：“洗出来请寄来这里。”如此周而复始。

我继续眼皮不撩地闷头写日记。对方大概忍不住了：“excuse me,”开始向我打招呼，“会讲英语么？”

“No。”我尽可能冷淡回答。

对方思考了五分钟对策。但终究放弃努力，去哪里不见了。我舒一口气，继续写日记。不料不出十分钟，另一个男人走来坐在我桌子对面：“excuse me。”简直无可奈何，连安心写日记都无从谈起。

我不再写日记，走出咖啡馆在街上散步。行走之间，发现这是格外奇妙的镇。街上有很多人（镇口处写道此镇人口两万），却好像全都无所事事。或坐在路旁，或站着闲聊，或喝茶，或单单东游西逛，几乎没人看得出在正经做什么营生。这方面和日本的城镇截然不同。日本的城镇基本都有营生，或扫除，或买东西，或运东西，或匆匆去哪里，或遛狗，或幽会。可这里不一样，根本找不见具有明确目的的行为，而无目的行为倒可以把握几桩。

我坐在镇中心广场上半看不看地看着街头景象。正看着，一个黑肤色中年男人走来站在我正面三米左右的地方，一动不动看我的脸，简直纹丝不动，只是目不转睛地往脸上盯视。我不乐意被别人这么看，遂以眼还眼地回视对方。但对方绝不移开眼睛。而且那并非出于针锋相对或吵架的目的，只是普普通通的不转眼珠罢了。无论视线怎样从正面射来，对方都好像丝毫不以为然。我也始终看着对方眼睛，但到底坚持不住，决定以走为上。就算对视几个小时，也不可能战胜

那对眼睛。那眼睛里不含有任何感情，与其说是看人，莫如说是看地面上出现的深洞。

在这个镇，我被很多人以那样的眼睛看过。走路之间，会突然有人像冻僵一样在那里止步立定死死看人，几乎能把人看出洞来。擦肩而过时给人扫一眼倒无所谓，但一再被人如此直勾勾地盯视，心情迅速黯淡下去。

走了好大一阵子，总算碰见一个领小孩的女人。没穿裙子，但我想应该是女人。脑袋整个围着犹如黑包袱皮的纱巾，全然看不出男女，若不仔细看前后都分辨不出。这是我在此镇遇见的唯一女性。原以为讨厌照相，不料实际面对照相机时却一副欣喜的样子，甚至摆出姿势。实在是莫名其妙的地方。仅仅停留一个小时，却累得浑身瘫软。

“这里总觉得不是滋味，快点离开为好。”松村君说。我也同感。最后向警察问了一次路：从这里去乌尔德雷的国境线的路在地图上细得不得了，通行没有问题么？

他看了看我们的帕杰罗，说这个还差不多。“普通车是不大容易，这个去得了。No problem。”他和颜悦色地说。

我们担心是不是果真这样，是不是真没问题。可是别无他路可走，只能先去乌尔德雷再说。

实际上这条路上充满登峰造极的problem。路本身就翻山越岭异常险峻，但问题不仅于此。后来查阅得知，此路是库尔德山岳武装游击队出没的最糟糕的地区。警察对此当然一清二楚，但不告诉。因为在正式场合那里不存在什么游击队。据说游击队数量约有一千人，频繁袭击部队营地，绝对不可以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徒步旅行和野营（啊，我们却一无所知地在那里野营）。

我们的车只被一伙库尔德武装分子拦住过一次，他们拿的是手枪和老式来复枪，头上全部缠着伊斯兰头巾，晒得黑黑的，脸上刻着很深的皱纹，毫无表情可言，唯独两眼闪闪发亮，气氛如箭在弦。我从衣袋里掏出万宝路递给每人一支。五个男子拿过万宝路叼在嘴上。我用打火机点燃。谁都一言不发。僵硬的沉默持续好长时间。强烈的阳光照得来复枪闪闪发光。依然鸦雀无声。

又过了一会，一个男子来到我身旁，直挺挺地探出脸，突然用手

指翻出眼白，并用土耳其语向我解释什么。他在我脸前三十厘米的地方一动不动翻眼白翻了三十秒。细看之下，眼睛红肿红肿的。不知他说了什么。听明白的只有一句：“你是从维也纳来的么？”我说不是，对方遗憾地摇了摇头，对我说可以走了。

当时倒不清楚，其实他们很可能是从伊拉克越境逃来的库尔德人，并且希望我看清被芥子气搞坏的眼睛。因为此外没有任何特意让我看眼睛的缘由。估计他把我们看成是从维也纳来的观察团。估计他们是在伊拉克军队实施的毒气战中失去家人的人，希望我们向全世界公布伊军的行径。因为此时、尤其此时——前面也写了——伊拉克政府已完全禁止越境库尔德人接触外国记者。我对他们十分同情，虽说情况不明，但仍为什么也未能为他们做而感到歉然。

这且不说了。不过情景可想而知，在山路上被一伙武装了的库尔德人拦住车，团团围住，突然在眼前翻白眼——这可是相当恐怖的场面。我可不大愿意有此遭遇。



万宝路

世间充斥着各种旅游指南册，上面充斥着各种资讯。有用的资讯诚然有，但无用的也相当不少，最多的是似乎有用而实际无用的半截子资讯，还有以偏概全的资讯，从别处找来的二手资讯。顺便说一句，日本的旅游指南写得相当乏味，而外国的旅游手册——我是说总的说来——文笔幽默，即使作为读物也蛮有意思。

话说回来，从旅游指南中分辨哪种资讯有用哪种没用是很困难的事，特别是第一次去的国家（一般正因为是第一次去的国家才看旅游指南）就更加困难。另外，所谓有用没用也因旅行的种类、目的、时间以及每个人的性格、体力而异。对所有人都有用的旅行资讯或许并不存在。我在希腊旅行时，背包里总是带着寿司盒饭附带的那种微型酱油瓶，在餐馆吃鱼时往上面一淋，相当管用。但对于认为多此一举，认为去哪个国家就直接用哪个国家的东西不就得了那一类旅行者，这资讯恐怕实属多此一举。

不过，对于打算长期在土耳其旅行的人来说，有一个资讯绝对有用——不管你吸烟不吸烟都要带一条万宝路去。这可大有帮助。进入土耳其之前我在一本旅行指南看了，半信半疑地在免税商店买了一条带去，果真帮了大忙。因为在土耳其递烟是友好的第一步，特别在乡下，万宝路有很高声誉。别人小有亲切表示，给钱可能失礼，况且也不知给多少合适——这种时候若给一盒万宝路，一般事情都可了结。作为对方允许拍照的回礼，万宝路也OK。受到士兵检查而时间可能拖长时说一句“不吸烟？”笑眯眯递上一支万宝路，一般即可顺利过关。简直是魔术香烟。若问为什么必须万宝路而云丝顿就不行，我也答不上来。反正我总觉得非万宝路莫属。大概万宝路是一种象征，大概。

Come to Marlboro country.[30]

这万宝路现象越往内陆去越明显。在安纳托利亚东部旅行时，从小孩子到垂死的老人、从羊倌到士兵，看见人就把两只手指拿到嘴角做出吸烟姿势，问有没有烟。都给起来没完，当然不给。问路和允许

拍照等有求于人的时候才给。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对讨烟那么积极。因为烟并非供应不足。听说过去曾经不足，如今哪里都有烟卖，去小卖店即手到擒来。然而大家偏偏讨烟。也许住在乡下的人穷得没钱买烟。若是我，索性戒烟就是。但在土耳其，好像几乎不存在戒烟这一意识（旅行三个星期，只在伊兹密尔附近见到一幅画有吸烟骷髅的戒烟运动广告画）。男人基本百分之百吸烟，递给一支，拿起挟在耳上，再取一支叼在嘴里点燃，有时问有火么，便用打火机为他点上。而若递打火机过去，基本有去无还。这不是夸张，在政府或餐馆桌旁曾被借去圆珠笔一用，为讨回来费了好一番周折。

同样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乡间，一次被铺天盖地的羊群堵住道路。我们前面是开奔驰·梅塞德斯露营车的德国人，他们也寸步难行。反正到处是海一般的羊群。目睹数量如此之多的羊群，前前后后仅此一次。触目皆是羊、羊、羊。几个骑驴的羊倌和大牧羊犬在羊群前领路。我们也好德国人也好都对准羊群拍照。不料羊倌走来，说拍照要给钱。德国人无奈地给了一点钱，我们把剩的五六盒烟统统递去。这羊倌一看就知是个贪婪无耻的家伙，继续索要。说没了也死活不肯让路，最后竟提出必须买下一只羊，简直岂有此理，只能逃走。

这类羊倌一般都不是好惹的。目光敏锐，炯炯发光，俨然游牧民族的后裔，脾气也似乎暴躁。给这等人一支烟，会连讨几支。小孩子也非等闲之辈。一次开车穿过偏僻地带的羊倌村子时，可算大触霉头。我们刚刚进村，一群小孩不知从哪里蜂拥而来，站在车前不动。刚放慢速度，结果全都死死趴在车上，叫道“烟、烟、烟”，叫“衬衫、衬衫”的人也不少，还“砰砰”敲窗。但若停车就麻烦大了，只能强行突围。而突围时万一压了孩子可不得了，很可能被周围大人们活活打死。在这世界尽头般的地方丧命，肯定被草草埋了，尸体都休想找到。别开玩笑，我可不想死在这种地方。即使侥幸被警察带走，这回等着你的就是臭名昭著的土耳其监狱。在土耳其一旦惹出伤亡事故，无论理由如何，一辈子就算报销了，务请小心——有关之人刚刚这么忠告我。那个人说经他巧妙疏通，帮助一个因在土耳其惹出伤亡事故将被关进监狱的日本人好歹逃往国外。我可不想落此下场。

总算在没碰伤孩子们的情况下突围（最后把一个趴在后窗上的家伙推下去了）之后，他们紧接着往车上扔石头，险象环生。

这个噩梦般的村子的名称忘了。地图上没有的地方。我们是迷了路（或者不如说是受了牧羊少年的误导）才进村子的。他们何以拼死拼活地讨烟呢，莫名其妙。反正我有个忠告：去土耳其务请带万宝路。

---

[30] 意为“光临万宝路世界”(广告词)。



24号国道的噩梦

24号国道是一条产业要道，从伊拉克边境城布吉兹雷沿叙利亚边境笔直向西伸去。到达地中海后，从那里北去。此路的目的在于用卡车往北部运送从伊拉克进口的石油，别名叫“当心大道”。因为上面通行的几乎全是大型油罐车，车尾大大写有“当心！”字样，字旁用油漆画着令人毛骨悚然的骷髅标记。

我们沿安纳托利亚东部尘土飞扬的山道一路仓皇逃窜，好歹逃到的柏油路便是这“当心大道”，真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土耳其内陆的旅行总不肯让人轻松下来。

就24号国道本身来看，算是一条像样的公路。路面铺了，也没塌陷，几乎笔直，又没有库尔德武装游击队。只是，24号线最大的问题点在于路面只有一条车道。因此，若想超车，只能拐到反向车道。但是此路——前面也已提到——挤满油罐车。如往前赶，必须一连超过五六辆。而若不往前赶，就只好以四十公里时速慢慢行驶，所以不能不往前赶。然而反向车道油罐车辆鱼贯而行，需要见缝插针一样赶超过去。不仅如此，还时而有油罐车超另一辆油罐车。油罐车有较快的和较慢的两种。虽说快，但终究是油罐车，并非了不得的快速。所以，超车自然费时间。倘前面有两辆晃晃悠悠并排逼来，我们便无处可逃。若撞在一起，对方或许无所谓，我们则顿成肉饼。而且仔细观察，躲闪不及或方向盘打歪的油罐车和小汽车在路旁横躺竖卧，感觉上好像电影《斯巴达克思》鏖战后的场景。居然没发生大事故（也许发生了）。

不错，运输伊拉克进口石油还是内陆安全，路又近。可为什么不搞输油管道呢？我很难理解。从事故方面考虑，输油管道相对安全，又不花汽油钱，岂不便宜？让这么多杂乱无章的油罐车跑来跑去，空气都弄坏了，又危险。但从战略角度着想，输油管道一旦遭受攻击，即刻寿终正寝。所以，作为国策，纵使不经济且有危险，恐怕还是要用油罐车一一运输。可是，如若这样，将两侧分别弄成双车道岂不更好。实在是超乎想像的糟糕道路，说是噩梦我想都未尝不可。这丝毫也不夸张，在此“当心大道”上开车一个小时，身心俱已疲惫不堪。

这么说或许不好，土耳其的司机总的说来不守规矩。即使将风俗习惯考虑在内而相当出于好意来看——至少以我们的感觉——将他们的驾驶情况列入“好”这一档次也是相当让人有抵触感的。不说别的，脾气相当暴躁，哪怕情况不太允许也硬要往前冲。意大利、希腊、土耳其无不是开车横冲直撞的代表性国家，但在令人哑然失惊这点上，三国之中，我还是想把金牌授予土耳其。

24号线的司机们也横冲直撞，上路你追我赶，我们若不踩刹车很可能撞个满怀，所以要一个劲儿按喇叭或用闪光灯。这还不算，油罐车的司机们全都因超负荷劳动累得一塌糊涂。他们在这让人紧张的长距离公路上几乎到站就掉头，来回疲于奔命。一天二十四小时，车流从不止息。况且车况也不能说万无一失，上坡路段到处都有战死的油罐车横陈着恐龙般的尸体。称之为“土耳其最危险的公路”怕也当之无愧。至少我没有要紧事不会再跑这24号国道。

另外，较之伊拉克边境多由军队检查，24号线则大多由警察检查。到处都有警察把卡车拦在路旁查看货物——看有无毒品，这也为交通混乱火上浇油。不过我们同这种检查无关，见到我们，警察就摆手说一声通过。

最接近叙利亚边境一带拦了好几道铁丝网，军用岗楼栉比鳞次，空气甚为紧张。沿路排列着漂亮得不和谐的照明灯。但不是为了照射路面，而是为了防止贩毒分子和恐怖分子偷越国境。

24号国道几乎不存在温情脉脉的元素。

24号国道。

先看吉兹雷。从这里前行不远就同叙利亚接壤。伊拉克边境到处是崇山峻岭，而进入叙利亚，忽然现出无遮无拦的平原。风光变了，人们的服装、风貌也变了。中亚式风光渐渐带有阿拉伯色彩。阿拉法特戴的那种伊斯兰头巾开始增多，男人们身穿裤裆松垮垮下垂的裤子。携手杖的人也多了。沙漠映入眼帘，甚至可以见到骆驼。阿拉伯字增多，妇女的服装陡然艳丽起来，变成那种阿拉伯风格的金灿灿的服装。人们的肤色则有些发暗，眼神似乎更加锐利。而且军方检查明显减少。虽然没特别觉得天下太平，但至少渐渐有了逃离“戒严地区”的实感。

不过说实话，这吉兹雷也是个差到极点的城市。我们是晚上七点到达的，找宾馆开罢房间，因口渴要外出买啤酒，不料被宾馆服务台告知：“一过七点就买不到啤酒了，哪里都没有卖的。”遂问：“那么可有能喝啤酒的地方？”“没有。”又问：“为什么？”结果没有给予回答。气氛似乎是说懒得同七点以后还喝啤酒那种家伙说话。本想大声吼道难道七点以后就不能喝啤酒，但毕竟是别人的国家，只好忍气吞声。“那里有水，喝那个好了！”他指着大厅（就面积来说称为大厅令人颇有抵触感）里的饮用水冷却机说。在土耳其旅行了三个星期，见到冷水机既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猪圈般的小宾馆里何以有冷水机这劳什子呢？我至今都想不明白。然而就是有，毫不含糊。我渴得火烧火燎，这冷水机看上去极具魅力，遂用那里的杯子咕嘟咕嘟连喝两杯。经过一定时间之后，堪称悲剧的腹泻开始了。我这人肠胃算是强韧的，喝水一般不坏肚子，然而这里的水终究抵挡不住。水把我无情打翻、勒紧、摇撼，根本不是其对手。这场腹泻——细节从略——着实厉害。全是因为吉兹雷人七点后不允许卖啤酒。如弄到啤酒，当然不会喝什么冷水机里的水，绝对不会。

为慎重起见，在此写下这家宾馆的名称：“吉涅希宾馆。”住宿费每人三百五十日元。一人一个房间，便宜至极。这是一家相当奇妙的宾馆。首先，服务台后面是伊斯兰教礼拜堂，三张榻榻米大小，在这里脱鞋上去，头触地板做礼拜。有如此名堂的宾馆还是头一次见到。土耳其这个国家在伊斯兰教信仰方面并不怎么严格，而这里也许是接近叙利亚的关系，伊斯兰教色彩非常浓厚。不能喝啤酒估计也是这个原因。穿短裤行走，满城的人都射出深恶痛绝的目光，甚至有人看见我而往地上“呸”一声吐了一口。进店买苏打饼干和矿泉水，店里问道：“你是伊斯兰教徒吗？”我说不是的一瞬间还担心不卖给我，好在卖还是卖了。不过对外来者绝对不是友好城市。和西西里半斤八两。

对了，这家宾馆的礼拜堂的最里头是俨然中庭的开放式空间。一楼有淋浴室（难以置信的是，这里的淋浴红龙头是冷水，蓝龙头是热水。而我在最后一瞬间才明白过来，以致一直气呼呼地用冷水淋浴）。而且，周围有一股不折不扣的大便味。但毕竟三百五十日元，牢骚发不得的。城里还有一家不难推测比这里更差劲的宾馆。选哪家是个人自由，尽管不是多么开心的自由。

宾馆前面是24号国道，油罐车鬼哭狼嚎地一辆接一辆呼啸而去，彻夜不息，清晨都不中止。想喝酒再睡，却又没酒。窗扇被公路震得瑟瑟摇颤不止。而且凌晨时分几乎所有的油罐车通过时都毅然决然地按响喇叭。就像某种暗号： 噢噢噢——！我实在疲劳至极，好歹入睡，但还是被一再吵醒，不由一阵心头火起，恨不得像《兰博2号》那样用火箭炮把这里的一切炸个粉身碎骨。

除24号国道以外，城中所有的路都脏兮兮黑乎乎。刚进城时，主干道上一头疲惫不堪的老牛像被野外放养似的晃晃悠悠走来走去。此牛在我睡觉前还在走，早上出去外面牛仍悠然漫步。或者城里没有收容老牛的窝棚也未可知。反正是个哭笑不得的地方。我散步当中，一个老伯问我是不是荷兰人。我到底哪里像是荷兰人？

对了，吉兹雷正好由这条老牛漫步的主干道分成两部分。这是因为，此城有两大家族，这两大家族世世代代进行血腥对抗。这方面也同西西里相似。两派居民从不说话，住的地方也不同。他们以这条主干道为界左右分开居住，绝不混杂。这边有邮局，那边有药店。但是，这边的人不去那边的药店，那边的人不来这边的邮局。无论怎么看都是刘易斯·卡罗尔[31]式超现实主义荒唐无稽的事情。不过毕竟是别人的国家别人的城镇，就不评头论足了。

吉兹雷还有一件事让我记得清清楚楚。晚间快十一点时我去洗脸间刷牙，旁边洗脸台一个年轻男子在刷皮鞋，这倒也罢了。虽说不大卫生，但并非很不自然。问题是此人是把鞋穿在脚上刷——“嘿哟”一声抬腿插进洗脸盆连脚整个刷洗，作为姿势相当辛苦。况且袜子也穿着。这的确是——不亲眼看见怕是很难明白——异乎寻常的光景。反正我是匪夷所思。因为互相瞧见了，我说了声“晚上好”，对方也极为正常地回道“晚上好”。接着我刷牙，他继续刷鞋。何苦非那么做不可呢，晚间十一点连鞋带脚一起洗，或者把脚插进洗脸盆刷鞋？我至今理解不了。

---

[31] 英国数学家，童话《爱丽斯奇境历险记》的作者。



24号国道沿线

离开凄凉脏污得一塌糊涂的吉兹雷，朝地中海驶去。中途再也不愿意跑24号国道，遂北上转靠迪亚巴克尔。迪亚巴克尔是库尔德城市，城很大，多半是库尔德人，所以周围全是军事基地。但那不是保卫这座城市的部队，而是包围这座城市的部队。我们在迪亚巴克尔前面停车的马尔丁镇的基地上，野战炮全部对准该城，想必一有库尔德人叛乱便万炮齐轰。简直无法想像。若说别人的国家别人的城镇你管不着倒也罢了。

伊拉克边境的山岳地带让人阵阵发冷，而沿叙利亚线国境行驶，气温骤然升高，太阳光下热得脑袋差点晕过去。反正就是热。鼻孔干得沙沙拉拉，一吸气粘膜一扎一扎作痛。汽车的空气过滤器转眼挂满灰尘。

迪亚巴克尔是极有历史的古城，四周一圈高高的黑墙。当地人称之为“中东的巴黎”，坚持说城墙的长度世界第二，仅次于万里长城。就像把沼袋称为西武线的田园调布[32]、把中畑清称为日本的贝贝·鲁思[33]，哪个都夸张得近乎说谎。

不过话说回来，迪亚巴克尔自古以来就作为交通要冲而被支配这一地区的各种各类民族所统治。罗马统治时期成为对波斯萨桑王朝作战的最前线的堡垒。接着由波斯人取而代之，但也未能长久，而落入拜占庭帝国之手。后来回教徒阿拉伯人来了，倭马亚人来了，阿拔斯王朝阿拉伯人来了，马尔凡王朝库尔德人来了，塞尔柱人来了，白羊王朝土耳其人来了，波斯人也卷土重来，最后由奥斯曼土耳其攻占——像门口擦鞋垫一样的城市。

进城刚在露天咖啡馆落座，一群小孩子忽一下子围了上来。他们差不多全是光头，皮肤微黑，衣着脏污。若问孩子们围着做什么，却什么也没做，只是围成一圈站着，以一动不动的表情定睛看着我们，一言不发，只是看着。我照例写日记，一到城镇我就在咖啡馆或茶馆写日记，松村君出去拍照。车上写不了字，宾馆里又没有适合写东西的桌子（一般来说，那里没有适合干任何事情的桌子）。所以，休息时尽可能在咖啡馆或茶馆桌上把此前发生的事逐一记录下来。下一次

能在哪里写不清楚，再说能写的时候不写，在哪里有过什么很快会忘光。因为有种种样样的事，城镇又一个个大同小异，前后马上混淆。如果想就旅行写什么，关键要把细节——无论什么——记录下来。

我不搭理孩子们，闷头写个不停。我继续保持这样的态度：他们都不存在，只有自己一人。可是孩子们也不相让，无论我怎么无视他们默默写日记，他们就是立在那里寸步不移，定定地注视着我。不时有服务生过来像赶苍蝇似的把孩子们赶走，但不出五分钟又掉头回来，又围着我目不转睛。耐力的考验。我也赌起气来，心想岂能败在这等小鬼手下！认为他们不存在，他们就不存在。存在这东西是以意识为前提的。

可我终于败下阵来。在耐力比赛上要想战胜土耳其人，须有相当强韧的神经。这次也无论如何未能忍受住小孩子那面无表情的沉默。我立起身，付了账，走进附近一家啤酒馆。这里孩子不会来。孩子虽然没来，但这里也是糟透顶的地方。首先是一团漆黑。才上午十一点，竟黑得如地洞一般，而且似乎是一种猥琐的黑。土耳其街头的啤酒馆，就好像喝啤酒是重大犯罪似的，弄得阴暗、猥琐、可疑，且有一股令人讨厌的气味，感觉上仿佛人生途中被风刮出的雪堆。客人方面也以阴沉的表情一声不响啜着啤酒。墙上贴着恶毒的女人裸体照。员工态度冷漠且含带暴力性。当然，不这样的啤酒馆我想恐怕也是有的，但是我在土耳其乡间走进的啤酒馆统统这个德性，原因不得而知。这也是土耳其一个谜。我若是凯末尔，肯定把啤酒屋搞得热烈明快一些。

反正我是进了这家啤酒馆，好歹得以一个人独处，要了一扎啤酒，又开始腹泻。迪亚巴克尔一点快乐记忆也没有。

不不，好事也有一桩。

去电话局往公用电话里投了二十元硬币给日本打电话，本应十秒断掉，却因故障得以长长说了二十分钟，堪称奇迹。

毕竟，土耳其的电话很少能打通。然而此时奇迹发生了，得以用公用电话同远在东京的老婆聊了二十分钟之久。老婆为我把她扔下独自一忽儿去了土耳其感到气恼。

“你连个电话也不打，不知我多么牵肠挂肚。”她恼怒地说道。我向她解释土耳其的电话何等莫名其妙。公用电话不通，所以近来在电

话局通过交换台打，结果不但没通反被吞去了一千日元。“那就在宾馆里打直拨嘛！”她说。她不知道，不知道宾馆压根儿不存在什么电话。反正这回同老婆讲了二十分钟。“两个男人快活吧？”她问。喂喂，这里到底有什么可快活的？两个人都拉了肚子，在糟糕透顶的公路上玩命开车，太阳晒，狗咬，小孩扔石头，从早到晚只吃面包，澡都一直没洗，这算哪家子快活呢？

但是我什么也没说。在电话里说那种事，只能越说越晦气，得得！

旅游指南册上说，这迪亚巴克尔是土耳其最猖獗的公开卖淫地区。可我当然没去那种地方。出于好奇心我们去看了伊斯坦布尔的红灯区，那可真叫惨不忍睹。我的可怜的性欲茫然不知所措——若像詹姆斯·博德威[34]那样假定“如果性欲有嘴”——好半天开不了口。我无论如何想像不出世上竟有那般兵荒马乱的妓院。价格五美元。不是开玩笑，就算给我五美元我也不稀罕那种地方。

这就是所谓中东的巴黎——迪亚巴克尔。

---

[32] 西武线是东京地铁线路名。田园调布是沿线的上等地段，沼袋则逊之。

[33] 中畑清(1954—)是日本著名棒球手，但业绩不如美国的贝贝·鲁思(1895—1948)，后者曾创造职业生涯714个本垒打的纪录。

[34] 美国黑人作家(1924—1987)。

游记

远方的鼓声

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远方的鼓声——写在前面
罗马

罗马
两只蜂——乔治和卡洛
蜂飞了

雅典

雅典
瓦伦蒂娜

斯派赛斯岛

抵达斯派赛斯岛
海岛淡季
老港
缇坦尼亚电影院的深夜
来自荷兰人的信、岛上的猫
斯派赛斯岛上小说家的一天
暴风雨来了

米科诺斯

米科诺斯
港口和范吉利斯
撤离米科诺斯

从西西里到罗马

西西里
南欧跑步情况

罗马

比拉·托雷克里

凌晨3时50分的昏死
去梅塔村途中
梅塔村

春天的希腊

帕特拉斯的复活节周末和对壁橱实施的大屠杀
从米科诺斯去克里特岛、浴缸之战、101号酒宴大巴的光与影
克里特岛的小村庄和小旅馆

1987年，夏天和秋天

赫尔辛基
马洛内先生的房子
雅典马拉松和退票还算顺利
雨中的卡瓦拉
卡瓦拉驶发的客轮
莱斯博斯
佩特拉（莱斯博斯岛）

罗马的冬天

电视、意式疙瘩汤、普雷特
罗马的岁末
米尔维奥桥市场
隆冬时节
伦敦

1988年，空白年

1988年，空白年

1989年，复原年

康纳利先生的公寓

罗马停车种种
蓝旗亚
罗得岛
春树岛
卡尔帕索斯岛
选举
意大利的几副面孔
托斯卡纳
雉鸠亭
意大利的邮政
意大利的小偷
奥地利纪行
萨尔茨堡
阿尔卑斯的麻烦事
尾声——旅行结束

版权信息

书名：远方的鼓声
作者：[日]村上春树
ISBN：9787532754533
译者：林少华
产品经理：邵明鉴

版权申明

TOOI TAIKO
by Haruki Murakami
Copyright © 1990 Haruki Murakam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Haruki Murakam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译者短语

这是村上春树自1986年10月开始旅欧三年期间的游记性随笔集或随笔性游记。

“一天早上睁眼醒来，蓦然侧耳倾听，远处传来鼓声。鼓声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从很远很远的时间传来，微乎其微。听着听着，我无论如何都要踏上漫长的旅途”——作者听得的微乎其微的“远方的鼓声”，最终成了您手头上这部可触可观的《远方的鼓声》。

兴之所至，刚刚译完我就迫不及待地捧起了余秋雨先生的《行者无疆》和《千年一叹》。同是旅欧游记（《千年一叹》包括中东），同是拥有庞大读者群且依然走红的东方当代作家，两人笔下的欧洲有哪些相同和不同呢？结果发现，找出二者的相同之处比找出其不同之处不知困难多少倍。这是因为，第一，秋雨先生是带着历史去的，每到一处，首先凭吊历史遗迹，抒怀古之情，发兴亡之叹，探文明之源，观沧桑之变。而村上对各类遗址和出土文物基本上不屑一顾，他感兴趣的更是眼前异国男女活生生的音容笑貌和日常性行为模式及其透露的个体生命信息。第二，秋雨先生是带着中国去的，“身在曹营心在汉”，无论看什么，总忘不了将异邦和故国比较一番，有浓得化不开的家国意识或士子情怀。而村上基本上把日本潇洒地扔去一边，“情愿在异质文化的包围下、在孤立的生活中最大限度挖掘自己的脚下”。第三——这其实是先决原因——两人身份不同、任务不同。秋雨先生两次都是受香港凤凰卫视之邀，考察“人类历史上所有产生过整体影响的文明遗迹”，而村上纯属个人行为，不挂靠任何公司任何组织，自己掏腰包带着老婆想去哪就去哪，既非走马观花的游客又不是安营扎寨的居民，“勉强说来，我们是常驻游客”。

例如，同是第一次到罗马，秋雨先生当即诗兴大发，由衷感慨“伟大”一词非罗马莫属：“只有一个词……留给那座唯一的城市。这个词叫伟大，这座城市叫罗马。”（《行者无疆》）村上则懊恼地断言：“罗马是个吸纳了无数的死的城市，所有时代所有形式的死尽皆充斥于此。从恺撒的死到剑客的死，从英雄的死到殉教者的死，罗马史连篇累牍尽是关于死的描述。元老院议员若被宣布荣誉死亡，首先

在自己家里大设宴席，同友人一起大吃大喝，之后慢慢切开血管，一边畅谈哲学一边悠然死去。”（《凌晨3时50分的昏死》）当秋雨先生神色凝重地面对元老院废墟反复解读罗马如何伟大的时间里，村上百无聊赖地坐在公园草坪上看修女、看警察、看美少女、看热气球、看狗，还看人接吻：“离我坐得位置不远的地方，一对年轻男女紧紧抱在一起接吻，吻得非常之久非常之认真。半看不看地看人接吻的时间里，觉得自己本身也接起吻来。”（《蜂飞了》）旅居罗马两年多时间里，印象最强烈的是罗马无所不在的小偷扒手之流。村上的太太也被抢走了挎包（包里有护照、机票、信用卡和旅行支票）：“一个开摩托车的年轻男子从后面赶来，一把抓住她的挎包带。她本能地握紧不放，大约持续了三十秒。尽管周围有几十人之多，但都往别处看，佯装未见，不愿意介入，作出浑然不觉的样子。互相抢夺了一会，最后挎包带断了，男子拿包离去。众人这才如梦初醒地来到她身边，七嘴八舌安慰道‘真不得了啊’、‘啊请在这儿坐一下’、‘我给警察打电话去’、‘那不是意大利人，是南斯拉夫人’。这种时候的意大利人又可谓亲切之至——嘴皮子上的亲切，倒也容易。”此时此刻，村上到底怀念起祖国日本来——东京断不至于有如此表演。

再说一下希腊。当秋雨先生面对爱琴海立有很多洁白石柱的悬崖峭壁沉思埃斯库罗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至孔子、老子、释迦牟尼的时候（《千年一叹》），村上则对着海滩游泳女郎“朝着初秋太阳挺起的乳峰”，认真总结“爱琴海规则”——“具体地说，来到爱琴海以后，（A）女孩子心想反正是爱琴海，这么做理所当然，遂以习以为常的手势暴露乳房；（B）男人也做出视而不见的神情，就好像说毕竟是爱琴海，那么做也无所谓。当然，偶尔也会用眼角斜瞥一眼，但即使那种时候他们也显得从容不迫，仿佛在说这东西见得多了。此乃基本规则，从容才是至关重要。”（《海岛的淡季》）

如此说来，秋雨先生一定活得愁眉苦脸而村上一定活得一身轻松了？却也未必。“两千五百年前，希腊哲人在大海边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印度哲人在恒河边思考人与神的关系，而中国哲人则在黄河边思考人与人关系。”（《千年一叹》）在人际关系波谲云诡错综复杂这点上，同为东方人的秋雨先生和村上似乎颇有共同语言和共同感受，这点双方在书中都按捺不住。旅欧期间村上写了《挪威的森

林》，书很快出版。“说起来甚是匪夷所思，小说卖出十万册时，我感到自己似乎为许多人喜爱、喜欢和支持；而当《挪威的森林》卖到一百几十万册时，我因此觉得自己变得异常孤独，并且为许多人憎恨和讨厌。”他最后概括道：“罗马充满罗马才有的麻烦事，东京充满东京才有的麻烦事……无论我们置身何处，都只能和麻烦事相伴而行，同麻烦事一起生存。”（《意大利的小偷》）不同的是，秋雨先生归结于“中华文明的杂质”，村上则概括为自身的“经验教训”。

以上所言，纯属兴之所至，并不是想就两人的游记作品进行系统性比较。何况二者在时间上至少相差十年——尽管欧洲十年间变化不会很大——且两人旅途所花时间也长短有别。但不管怎样，对比着翻看几页确是一件颇有兴味的事。

村上在他的书中最后这样写道：“至今我仍时常听见远方的鼓声。安静的午后侧耳倾听，会在耳底感觉出它的回响。”

或许可以说，每个人都有惟独自己听得见的远方的鼓声，一如小时候在乡下每次听到山那边传来的演戏或扭秧歌的鼓声，心里就怦怦直跳急着出门。人生途中的每一阶段都会有鼓声在远方呼唤自己整装待发，声音再弱我们也会听见，即便不是在“安静的午后”。

林少华

2005年2月25日于青岛·窥海斋

在远方的鼓声呼唤下
我踏上漫长的旅途
裹起一件旧大衣
把一切留在身后

——土耳其旧时民谣

远方的鼓声——写在前面





远方的鼓声——写在前面

我离开日本生活了三年时间。

话虽这么说，但并非三年时间里从未返回日本。也是出于工作需要，我回国了几次，把在外国期间写下的文稿交给出版社，一起安排几本书出版。所以，至少一年要回日本一次。不过除此之外，几乎所有时间都在欧洲生活。而且不用说，这时间里我长了三岁。具体说来，由三十七长到四十。

很早以前（其实也就是三十过后）我就有这样一个念头：对我们的人生来说，四十岁大概是一条具有相当重要意义的分界线。这倒不是有什么实实在在的根据，也并非事先预测到了迎来四十岁具体是怎么一回事。但我还是这样认为，认为四十岁是一个大转折点，它将带走什么，又留下什么。在这种精神转换完成之后，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都已无退路可言，不可能因为尝试后不够满意而重新回到原来状态。一如齿轮，有进无退。我隐约有这样的感觉。

所谓精神转换，想必就是如此情形。也许越过四十这道分水岭即年龄上了一个档次之后，过去不能做到的事变得能够做到了。不用说，这是好事，可喜可贺。但同时我又这样想：作为新收获的交换条件，说不定以前以为可以轻易做到的事会变得无能为力。

这类似预感。可是三十过半以后，这种预感在我体内一点点膨胀开来。正因如此，我才想在精神转换之前做一件事留下来，想写那种往后很可能不写（写不了）的小说。上年纪没有什么可怕。上年纪不是我的责任。谁都要上年纪。那是奈何不得的。我怕的是本应在某一时期完成什么而最后不了了之，而这并非奈何不得的事。

这也是我想去外国的一个原因。感觉上待在日本，有可能在应付日常生活的时间里稀里糊涂上了年纪，有可能不知不觉之间失去什么。而我——要说起来——很想把切切实实的、可感可触的生之时间控制在自己手里，而在日本这好像很难做到。

※

当然，不管在哪里人都要稀里糊涂上年纪。在日本也好，在欧洲也好，在哪里都一样。恐怕正因为可以在应付日常生活中稀里糊涂上年纪，人才得以勉强保持正常心智。如今——在已经四十的今天——我也那样想。但那时候想法与此不同。

现在我已回到日本，正坐在桌前思考那三年时间发生的事——觉得十分不可思议。回想起来，那里边存在奇妙的失落感。有质感的空白。某种浮游感或流移感。那三年的记忆在浮游力和重力形成的狭窄河道里往来彷徨。那个年月在某种意义上已然失却，又在某种意义上牢牢植根于我体内的现实。我可以在身体某个地方真切地感觉出记忆的把手。记忆的长臂从非现实的黑暗中伸出来抓住现实的我。我想将其质感讲给别人听，然而我不具有相应的话语，恐怕只能把它作为比喻性整体表现出来，一如某种心情。



快四十岁了，这也是驱赶我踏上漫长旅途的一个动力。不过，促使我离开日本的原因还有好几个：既有几个积极的，又有几个消极的，既有几个现实的，又有几个隐喻式的。但我不太愿意就此详谈。因为时至现在，怎么都无所谓了。对我无所谓，对读者想必也无所谓。无论什么缘由让我开始旅行，漫长的旅途也已把最初的缘由冲往远处，就结果而言。

是的，一天，我突然心血来潮，无论如何都要踏上漫长的旅途。

作为旅行的缘由似乎有些理想化。简单，有说服力。再说，事情不可千篇一律。

一天早上睁眼醒来，蓦然侧耳倾听，远处传来鼓声。鼓声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从很远很远的时间传来，微乎其微。听着听着，我无论如何都要踏上漫长的旅途。

这也没什么不妥。毕竟听见了远方的鼓声。此时此刻，我觉得这是唯一使我踏上旅途的缘由。



三年时间我写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挪威的森林》，另一部是《舞！舞！舞！》。还写了《电视人》这部短篇集，又翻译了几本书。但这两部长篇小说是我三年海外生活中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小说后记中也写了，《挪威的森林》是在希腊动笔的，之后移居西西里，完成是在罗马。《舞！舞！舞！》大部分是在罗马写的，而结束于伦敦。

写长篇小说时我一向抛开其他所有工作，把精力彻底集中到一件事上，这样才能写得快些。但在欧洲期间由于不受任何人干扰，所以写作速度比以往还快。在这本书中我也提到：是不折不扣从早闷头写到晚。除了小说几乎什么也不想，心情上就好像把桌子放在深深的井底写作似的。

所以，我觉得这两部小说命中注定地抹上了异国标记。在那些异国城市，我们（即我和妻）孤独得不得了。几乎没有可以称为熟人的人，而我们所能说的语言又不足以结交朋友和得到熟人。

何况我们的立场在所有意义上都是不上不下的——我们不是赶来看应看的东西、看完就径自通过的游客，但又不是在那里住下来扎根的永久性居民。而且我们不属于任何公司任何团体。勉强说来，我们是常驻游客。虽说根据地设在罗马，但若另有满意的地方，就在那里租住带厨房的公寓生活几个月。想去别处时就又搬走。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在这种孤立的异国生活（尽管归根结底那是我们自己追求的）中，我只管一声不响地一个劲儿写小说。

我想，即使在日本，也许多花些时间，也还是会写出同样的两部小说。对我来说，《挪威的森林》和《舞！舞！舞！》是我在结果上必然写的小说。只是，若在日本写，这两部作品很可能带有与现在不同的色彩。明确说来，我恐怕不至于垂直地“深入”到这个程度，好也罢坏也罢。

也许某类读者生理上喜欢这种深入方式，不过我想，归终我是心甘情愿深入到那样的世界里面去的，情愿在异质文化的包围下、在孤立的生活中最大限度挖掘自己的脚下（或者尽可能孤军深入）。我的确有这样的渴望。

《挪威的森林》成为畅销书之后，各种各样的人老问我同一个问

题："你认为那本书为什么那样好销呢？"

我当然无从得知。我的工作只有一个：写出小说来。甚至自己何以写出那样的小说都稀里糊涂。反正当时只能写那个。好也罢坏也罢，作为我只能那么写。在那部小说里面我能够清楚表明的惟有一点，即作品命中注定地抹上了异国标记。



不写小说的时候主要搞翻译。与此同时，还确定进度一点一滴写了多种多样的纪行。收在这里的文章便是。当时兴之所至地尝试了种种写法，既有出于个人兴趣写的，又有无可奈何的独白。既有以习作为目的写的，又有断断续续在杂志上刊载的几篇。但总的说来，这些文章是以给亲朋好友写信那样的心情写的。所以，没有连贯而系统的视点和主题。每天生活的时间里，有了这样的事、去了那样的地方、见了这样的人——便是这样随心所欲写下来的，以常驻游客的眼睛。

二十年前倒也罢了，而在每年有数百万人出国的当今时代，早已不再需要什么欧洲纪行。所以这里几乎不含有启蒙因素，也不存在类似有益的比较文化论那样的东西。我开始写纪行文的一个目的，在于将由于置身异国而有可能不觉之间随波逐流的自身意识固定下来，以免它从一定的文字层面上滑得太远。将亲眼见到的东西写得像亲眼见到的一样——这是我的基本姿态，即把自己的感触尽可能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摈除廉价的感动和泛泛之论，尽量写得简洁（simple）、写得客观（real），并在千变万化的场景中努力不断地将自己相对化，当然事情不那么简单。有时候顺利，有时候不顺利。但最关键的是将写文章这一作业作为自身存在的水平器加以使用并持续使用。

最初我计划像记日记那样，无论如何要保持一定的进度，每星期写一篇这样的纪行文，结果根本不行。因为写长篇小说期间无暇写小说以外的文章。这样，不时出现长达几个月的完全空白。具体说来，在用来写小说的米科诺斯和西西里就差不多什么也没写。由于简单写了日记，事后可以顺着记忆来写，但严格说来那已不是现时记述，量也不多。即使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恐怕也很难称为游记。

这里收录的文章，原则上仅仅是纪行文的堆积。这些支离破碎的

东西很可能没多大意义。但对我来说，在其继续本身、在不断——尽管断断续续——写这些文章这一行为本身之中是有意义的。浪迹欧洲的我通过这些日语文章使得自己同驻守日本的我息息相通。

于是，我成了一个为持续维持自己而持续写文章的常驻游客。

罗马



罗马

罗马是此次漫长旅行的入口，同时也是我旅居海外期间的基本住址。我们所以考虑来考虑去最终选择罗马作为大本营，是出于几个理由。首先是气候温和。好容易决定在南欧放松一回，不愿意过什么寒冷的冬天。而在这点上，罗马可谓首选之地。

选择罗马的另一个理由，是一个老朋友住在那里。我这人无论哪里都能厚着脸皮活下去，不过既然得住那么长时间，那么一两个可依赖的人还是需要的。

这么着，罗马成了我们的根据地。虽然罗马一次也没到过，但我们认为地方不至于那么糟。至少从电影上看，城市还是蛮漂亮的，不料这点后来让我们好不后悔。

我们以搬家那样的心情离开了日本。因长达几年不在国内，一直住着的房子也租给了熟人。国外生活所需物品一股脑儿塞进旅行箱。这活计相当累人。毕竟一般人不大可能弄明白数年南欧生活到底需要什么、需要多少。以为需要似乎什么都需要，以为不需要又觉得什么都不需要。

手头工作一并收尾，连载也设法中止了。为一家杂志集中写出六个月分量的随笔——对方这样要求——交了。见了该见的人，说了该说的客气话。代为处理出国期间杂务的人也找到了。应做的事堆积如山，无论怎么做都接踵而至，最后甚至自己是前进还是后退都糊涂起来。旅行箱里装了什么、到底带了几个旅行箱——连这个都已无从记起。

如此这般，最初降落在罗马的达·芬奇机场时，我们累得几乎开不了口。身体所有的空隙就好像被牙医填牙缝的水泥填满了。哪部分是肉体疲劳、哪部分是时差造成的眩晕、哪部分属于精神消耗，对此我已全然没了分晓。这就是我们旅行的出发点：疲惫、茫然、消耗。

在罗马一共待了十天，大体休整过来后，开始朝雅典进发。

※

现在回头看罗马逗留期间写的东西，清楚地知道自己当时是多么心力交瘁。从日记上看，如此汹涌的疲劳大约持续了两个星期。而后忽然消失，忽一下子。



两只蜂——乔治和卡洛

1986年10月4日

> 这是我为尽可能准确地描述当时极度的心力交瘁而写的文章，和旅行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对他人的心力交瘁毫无兴致的读者朋友尽可跳过去不看。

两只蜂又在我脑袋里“嗡嗡”飞来飞去。我歪在宾馆床上，看着早已看腻的圣彼得大教堂的圆顶——能从窗口清楚看见圣彼得大教堂几乎是这家宾馆的唯一卖点——心想既然如此，也该为这两只蜂取个名字才是。然而怎么也想不起合适的。我躺在床上持续想了整整十五分钟，结果毫无进展，一个名字也想不出。而且是蜂造成的，因为两只蜂在我脑袋里硬是“嗡嗡”飞个不停，就像《青蜂侠》的主题曲一样。其令人心焦意躁的声响使我无法正经思考什么。

也罢，无所谓，蜂的名字就叫“乔治”和“卡洛”好了，我拿定主意。乔治蜂和卡洛蜂。意义谈不上，但至少可以从中感觉出意大利的芬芳。

喝干杯里的红葡萄酒，斟了第四杯。香味凛冽的托斯卡纳葡萄酒。在宾馆附近的酒铺买的，不贵，但不坏。标签上画一只鸟。没见过的鸟。类似日本的野鸡，但颜色更花哨。我把喝去一半的葡萄酒瓶拿在手里，没有任何目的、没有任何意味地久久注视酒瓶的形状和标签图案。握住瓶嘴，瓶底置于肚皮，不带什么感情色彩地目不转睛地看着它。累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我往往这样定定地注视什么。什么都行，反正只要盯视什么即可。

此刻我在盯视葡萄酒瓶。盯视了很久很久。但没得出任何结论。

感情？感情倒是多少有的。

我觉得自己上了很大年纪。一切都好像缓慢而遥远。而乔治和卡洛依然在我脑袋里盘旋不已，“嗡嗡嗡嗡嗡”。我的疲劳恰是它们的养料。

“嗡嗡嗡嗡嗡”。



乔治和卡洛在东京扎进我的脑浆，使其鼓囊囊闷乎乎膨胀开来（当然那时它们还没有名字，还没有一分为二），并且绕着那鼓囊囊的东西无休无止地飞来飞去。我筋疲力尽，决定离开日本。我们（前面也写了，即我和妻）收拾行李，把两只猫托付给朋友，房子租给人家，乘上开往罗马的飞机。至于住在哪里和做什么，都没有具体计划，不过总有办法可想。至少比在东京没完没了听蜂的翅膀声好得多。

可是到罗马后，蜂仍在我脑袋里挥之不去。不仅如此，又分裂成乔治和卡洛两个，变本加厉地发出刺耳的声音往来飞舞。而且不觉之间同罗马的声音——使罗马之所以为罗马的声音——融为一体，同那令人忍无可忍的、岂有此理的、该受天罚的都市噪音！得得，我内在的疲劳便是这样实现了伟大转化，化为都市一个外在特质。

若您手上有世界地图，想请您翻到欧洲那页找一下罗马市。那即是我的疲劳、即是乔治蜂、是卡洛蜂、是毫无特色可言的红葡萄酒瓶、是呈元葱形状的圣彼得大教堂的圆顶。每次乔治和卡洛沉闷地振响翅膀，罗马城的噪音就好像印第安人起义一般与之里应外合。

如此一来二去，我觉得一下子老了许多。昨天是老婆生日，我们是在老婆生日那天离开日本的。由于时差关系，她得以度过一个十分漫长的生日，十分十分漫长的三十八岁生日。第一次遇见她时，我们都还双双十八。十八，每喝必烂醉如泥的时光。尔来二十年。

但我觉得老了并非因为这二十年沧桑，而是乔治和卡洛的关系。

难办啊！我的思路一直围绕同一地方一圈圈打转。一如我往日那张“沙滩男孩”的单曲唱片（“Good Vibrations”[1]），一到正中间就不再前进，必须用手指把唱片针推到内侧——好咧！

好咧！

我何苦写这样的文章呢？为什么写？为谁写？这个世界上果真存在一两个对我的疲劳感兴趣的读者不成？如果存在，又是哪一类型的人士呢？

对此我当然不知晓。每次想到读者，我的脑袋都乱作一团。我见过几十、几百位看过（或者自称看过）我的小说的人，但结果只能让我愈发搞不清楚读者是怎样一种存在。其中是否有几个人对我的疲劳感兴趣我也全然无从得知。

算了，我是为自己写这篇文章的，一开始就是这么打算的。只是想写什么罢了，只是想坐在桌前拿笔写点什么罢了，只是想验证各种语句、各种修辞、各种比喻罢了。至于写什么则不是多大问题，至少现在不是。不是多大问题，至少现在不是。

好咧！

我喝一口葡萄酒。窗外传来小孩子们的声音。宾馆对面是幼儿园，修女们在小院子里让孩子们嬉戏。我又喝了一口葡萄酒。雾罩云笼般迷濛得不可思议的天空。想睡觉，就这样死死睡过去。却睡不成。蜂"嗡嗡"得令人心烦，再说有时候也必须让唱针划向前去。有时候唱针……

好咧！

乔治和卡洛，你们两个打算永远在我脑袋里飞下去不成？缠着我也没什么好事的吧？我很快就会振作起来，而那一来你们可就无处栖身了哟！

也罢，想飞你们就飞好了！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

话又说回来，这房间何等俗不可耐啊！

---

[1] 意为"优美颤音"。



蜂飞了

1986年10月6日星期天午后晴

> 对不起，接下来还是谈疲劳的文章。两只蜂——乔治和卡洛继续出场。我将结合对星期天下午波各赛公园的描写讲述他们究竟如何发生的。也有就作者本身所做的一点点思考。

乔治和卡洛仍在我脑袋里飞来飞去。但我尽量不想它们，努力想其他事，尽量。毕竟今天是星期天，大好的天气。

我在波各赛公园的草坪上坐下来晒太阳。喝着从货摊买来的橙汁，一个人呆呆看天，或打量周围的男男女女。虽说已届10月，可是热得就好像夏天卷土重来。人们戴着太阳镜，揩额头的汗，吃冰糕。有在长椅上偎在一起的情侣，有脱去衬衣赤身裸体仰卧着享受日光浴的小伙子，也有放开狗独自在树阴里静静休息的老人。两个修女坐在喷泉前面聊了很久很久。到底聊什么呢？身穿战服样式制服的警察（或宪兵）挽起衣袖，肩上斜挎着甚是不合场合的来福枪从我身旁走过。很有可能被19世纪印象派画家选为题材的平和、亲切而纯净的周日光景。

一个看上去年龄十四五岁的美少女头戴红色骑马帽、牵马朝马场那边走去。她的脚步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时间的存在。世上偶尔是有人以那种方式走路的，简直就像时间本身在行走。刚才最后一响是11时35分40秒。“哔——”，11时35分50秒——便是如此走法。她收敛下颌，挺直腰背，聚精会神地行走，绝无矫揉造作的样子。她十分怡然自得地、如时间本身一样流畅地沿着公园甬路往马场走去。

广场上，一伙人想放大型热气球，却因某种缘故放不顺利。三四

个人手忙脚乱调整器械，其余人显得有些无聊。这么切近地目睹热气球还是第一次，不过并非什么令人动心的劳什子，至少滞留地面时相当乏味。人们拼命折腾，但气球偏偏鼓不起来，就好像硬被叫醒穿衣服的肥胖的中年女人，浑身瘫软，显得老大不高兴，时而不耐烦地扭一下身体。

一条大狗从旁边经过。狗忽然止步不动，看了一会儿气球，看得十分专心，仿佛寻思这是什么呢。可是谁也不肯告诉它。再看也看不出名堂，狗径自离去。

离我坐得位置不远的地方，一对年轻男女紧紧抱在一起接吻，吻得非常之久非常之认真。半看不看地看人接吻的时间里，觉得自己本身也接起吻来。吻了很久很久，久得让人担心窒息过去。他们以各种角度、各种激情、各种姿势吻个不止。就好像剪辑得恰到好处的学术性记录片，动作紧凑地变换姿势，兴致勃勃地展示接吻的变化之妙。他们幸福吗？我倏然心想，如果幸福，那么要求人那般接吻的幸福究竟具有怎样的形状和特质呢？



最大的问题是我实在太累了。为什么累到如此地步呢？不过反正我是累了。至少写小说写累了，这是我身上最大的问题。

我打算四十岁之前写出两本小说。不，与其说是打算，莫如说非写不可。这点极其清楚。然而我还没能着手。写什么以及怎么写也大体心中有数，但没能动笔，不幸。甚至觉得如此下去很可能永远写不出来。况且脑袋里有蜂“嗡嗡”飞个不停。吵得要死，想东西都想不成。

脑袋里又有电话铃响起。那也是蜂发出的声音的一部分。电话。电话响。“叮铃铃铃铃铃铃”。他们向我提出种种要求：为电子打字机或什么物件做广告、去哪里的女子大学讲演、为杂志彩页做拿手的“料理”、同某某人对谈、就性别歧视环境污染死了的音乐家超短裙卷土重来发表评论、担任某某音乐比赛的评审员、下个月20日前写出三十页“都市小说”（所谓“都市小说”究竟为何物？）……

并非我有多么生气。当然不会生什么气。为什么呢？因为那是已

然被决定的事项，我不过被包含在那里面罢了。不是谁不好，也不是谁错了。这我晓得。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那种情况的一个帮凶。说起来相当曲折相当啰嗦，总之我在那上面起了推波助澜作用。所以我没有权利为之气恼。应该没有的，我想。给我打电话的，也是我自己。在某种意义上。

这种双重性让我心烦意乱，让我徒呼奈何。

无奈感——疲劳大概是从那里涌出来的。在那里，出口是入口，入口是出口。任何人都不能从那里走出。那里笼罩在凉瓦瓦的昏暗之中。作为夜晚则过于明亮，作为白天则过于黑暗。被这奇异的昏暗包拢之时，我势必迷失方向和时间。我已不明所以，不知到底什么正确、什么错误。

电话铃依然响个不止：叮铃铃铃铃铃铃。稍顷，一只蜂飞进我的脑袋。不管怎么说，蜂们喜欢疲劳的气味，一瞬之间即嗅出它的位置。喏喏，这里有美味疲劳脑浆！旋即一针扎下，使之鼓囊囊闷乎乎膨胀起来。

正因如此，我才离开了日本（不能不离开，我再次明确认识到）。但即使是在这罗马，我的疲劳也没终了，却穿越八小时时差和北极圈延续了下来。而且蜂一分为二，成了乔治和卡洛。疲劳如油汗腻乎乎沁出肌肤。去哪里都一回事，他们对我说。无论跑多远都一成不变，嗡嗡嗡嗡嗡嗡。哪怕你跑去天涯海角，我们也会紧随不舍，所以你一筹莫展，归根结底。你将在一筹莫展的时间里年届四十，就这样变老变衰。没有谁喜欢你这个人的，往后越来越糟。不，不对，我说，往后我会好端端写小说，消失的倒是你们。

即使那样，乔治和卡洛开口了：我俩也迟早要回来的，回到你这里。因为这是我们的职责。循序渐进，来日方长。没有谁喜欢你这个人的，大家都要憎恨你。写小说也什么作用都起不了。嗡嗡嗡嗡嗡嗡嗡嗡。

嗡嗡嗡嗡嗡嗡嗡嗡。

※

罗马。

沐浴着夏天一般灿烂阳光的午后的罗马。我“骨碌”一下歪倒在草坪上悠然望着马、人、云絮等缓慢的动作，心想假如两千年后今日的罗马像庞贝[2]那样彻底化为遗迹该有多妙：诸位，那是楚沙迪（Trussardi）遗址，这是华伦天奴（Valentino）遗址，那边展柜里的是美国运通金卡……

女孩仍在牵马前行，看上去她像要直接融入雾霭之中。身穿和刚才不同的制服的两个警察吃着雪糕走来，沿路走了过去。他们对热气球几乎毫无兴致。喷水池的水柱喷得高多了，顶端倾珠泻玉，炫目耀眼。

热气球还是升不起来。那三个人依然手忙脚乱地拧拧螺丝或者看看仪表，然而看上去根本没有升空动静，尽管是气球升空最好的天气。

午后1时45分，到天黑尚有不少时间。

---

[2] 古罗马城市，79年毁于维苏威火山喷发。


雅典



雅典

来雅典已是第三次或第四次。

提起雅典，乃是希腊人口达三百万（差不多相当于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的第一大都市。不过就游客通常活动的范围来说，城市并不很大。基本历史遗址均步行可达，即便极保守地说，有三天时间大体可以看完所有名胜。这座城市，在古代城邦（Polis）的四周宛如磁石吸铁屑一般围着近郊住宅区，看样子是一哄而上发展起来的，所以游客感兴趣的地方明确局限在中心部位。毕竟参观近郊住宅区也没什么意思（比如你是来东京观光的外国游客，会专门去看什么云雀丘、多摩广场以及西国分寺什么的吗）。一般人登上雅典卫城（Acropolis），在普拉卡喝蕾契娜酒[3]吃木莎卡[4]，在街上转一转，看一眼土特产商店，在宪法广场喝杯茶，从利卡维托斯山上看雅典夜景，往下有时间和有兴趣的人参观一下国立考古博物馆，日程就此结束。

也就是说，若来上三回，那么既没可看的东西，又没可去的地方。

我住在布列塔尼宾馆，在那里遇上了一位叫瓦伦蒂娜的女性，她给我们介绍了房子。

---

[3] 希腊产松香白葡萄酒。

[4] 茄子、马铃薯加碎肉做成的希腊菜。



瓦伦蒂娜

瓦伦蒂娜为我介绍了岛上一座出租房。

“倒不是很大，但实在是beau——tiful。”她甚是感慨地用手“啪啪”拍打我的膝盖说。她坐在我旁边，我们并排坐在布列塔尼宾馆大厅的沙发上。交谈用的是英语，但她有个毛病：每当为什么所感动或想强调什么的时候，就把正中间的母音拖得很长很长。而这毛病不觉之间也传给了我。一种类似传染病的毛病。

交谈之间，一个煞有介事的男服务生走来问“需要饮料吗”——言外之意希望点酒水——瓦伦蒂娜当即应道“NO”。这时她的母音发得极其干脆利落。

“另外，那房子附近还有beau——tiful的海滩。对了，你可带游泳衣了？”

“嗯，当然……”

“你么，绝——对中意那里。”

瓦伦蒂娜的年龄从外表一下子看不出。不过既然有二十岁的儿子，那么想必已有一定年龄。作为希腊中年女性很少有她这么瘦的。一如多数体瘦女性，她非——常有活力，无论化妆还是服装都像吸取了活力，相当花哨。

我和她是初次见面。

“德米特里说你是日本十分有名的作家，可是真的？”瓦伦蒂娜问我。简单的寒暄和关于天气的闲谈大致完了以后，她不无怀疑地这样提问。看来，德米特里传达给她的信息使她发生了误解以至情绪波动，她似乎把我预想成了谷崎或三岛[5]那一类半古典式文豪。而我是以褪色的开领半袖衫和脏污的牛仔裤这一平日形象晃晃悠悠出现的，作为她看样子多少有些失望。对此，作为我——尽管算不得我的责任——也觉得十分抱歉。

我时常想，自己身上总好像缺少作为作家（或艺术家）的不妨称之为光环的东西。在日本时也被人错当成面包铺送货员或超市店员。买东西的时候，常有陌生人问我辣椒在哪里（而且有时告诉得很准确），但这恐怕很难说是衣着造成的。偶尔像模像样扎条领带身穿深

色西装站在宾馆大厅里，也还是有老伯打听“喂喂仙鹤厅在哪里”。所以，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责怪瓦伦蒂娜。光环这东西——至于现实中究竟有多大作用我倒是不清楚——有的地方自然有，没有的地方压根儿没有，一如温泉和油田之类。

“嗯，是的，是作家。”我自我辩解似的说，“有名无名不大知道，不过是作家，算是。不管怎样，德米特里怕是向你夸大了我的情况。东西大体是写的，但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作家。”

“唔——，”她再次打量我说，“不过是专业作家对吧？full time[6]的？”

“嗯，是的，是full time作家。算是吧，总之。”我回答。

算是吧，总之。

“所以，是为写东西来希腊的。”我说。

“其实我也写诗的。”瓦伦蒂娜应道。

“是吗？我竟不知道，德米特里没告诉我的。”

“你、写诗？”

“没写过，遗憾。”

她连连点头：“希腊是诗歌非常繁荣的国家，诗比小说繁荣，这已是历史性的。对了，希腊人拿了两回诺贝尔文学奖你可知道？”

“啊，不知道啊。”我惶恐地说。

瓦伦蒂娜向我一闪投来“难道你也是作家”那样的视线。可我是不知道，哪里知道！连日本人有几个拿了诺贝尔奖我都不知道。

“但诗的问题是，光靠诗无论如何是吃不成饭的。诗人成不了职业。”瓦伦蒂娜说，“所以我也有其他工作。噢，德米特里没有就我向你说什么？”

“没有。遗憾的是我和德米特里失之交臂。上个月他返回希腊时我在东京，这个月我来到希腊，而他折回东京，就这样错开了。因此，没得到机会和他好好交谈。只是让我到雅典就给你打电话，说打电话就明白的。更详细的什么也没听说。”

“噢，原来如此。呃呃，怪不得。反正高兴能见到你。Well……I'm ha—ppy to mee…… t you.”

随即她再次“啪啪”拍我的膝盖。

一个念头掠过我的脑际：此人十分像我认识的一个人，并且不是

像一个人，而是像几个人。倒是很难解释，总之感觉上就像把特定人物在特定场合采取的三四种特定行动组合在一起，尔后从各种略略不同的角度展示出来。看上去异常真切，而相距又异常之远——便是如此的像法。不过感觉绝对不坏。和她交谈起来，甚至涌起某种怀旧之感：这么看来，世界相当狭窄啊！

“德米特里是我已经分手的丈夫的弟弟。”她说，“离婚后我一直一个人生活，所以我们还同姓。德米特里么，这么小的时候就十——分了解他。呃——，所以提起房子。你是在找房子吧？”

“是的，是在找房子。”

好歹进入正题。的确，我们是在找在希腊居住的房子。

我提出所找房子的主要条件：

（1）卧室两个。

（2）带厨房和浴室。

（3）带家具。

（4）安静，以便写作。

条件大体如此。

“这个么……”瓦伦蒂娜沉思了好一会儿，圆珠笔在手里团团旋转，“安静、有两个卧室……唔，对了，斯派赛斯岛怎么样？若是斯派赛斯，我的一个熟人倒是有座别墅。斯派赛斯可知道？”

斯派赛斯我大致知道。虽没去过，但晓得距伊德拉很近。伊德拉去过几次。大小合适，从比雷埃夫斯乘船也方便，而且没有每小时一班的观光船吵吵嚷嚷开来，应该不至于受到游客干扰。想必是个住在雅典的希腊人在那里拥有别墅、只是周末去一下的海岛，气氛上应当过得去。

“那是怎样的房子呢？”我问。

“我也在那里住过几次。倒不是很大，但实在是beau——tiful。”瓦伦蒂娜这句话便是那时候说的，“而且附近还有beau——tiful的……”

瓦伦蒂娜从手袋里掏出便笺，用圆珠笔画地图。先画整个希腊的地图，总之这也是相当奇妙的地图。迄今为止的人生过程中，我有几次机会请几位女性画地图，遗憾的是画出准确地图的女性一次也没能遇上。这位瓦伦蒂娜也是往人世间散发这类不准确地图的种族里的一

员。或者不如说——作为我不得不说——即使在那里头，她也属于症状严重的。

依照她的地图，希腊本土（即从马其顿至苏尼翁岬部分）状如细长的乳房，或呈犹如抓起烧焦的面饼一把撕开那样的圆锥形。伯罗奔尼撒半岛像扔一个皱巴巴的手套一样被无情地抛在左侧，将二者隔开的科林斯运河有多佛尔海峡那么宽（实际上仅一二百米）。这便是瓦伦蒂娜眼中的希腊。

“这是希腊。”瓦伦蒂娜把那该受天罚的地图朝我转来，“明白吧？”

“嗯，明白。”我无奈地同意。事到如今，有异议也无济于事。

“这样，喏，这就是斯派赛斯。”言毕，她在海上画出一个小圆圈，并在下一页画出岛的地图。岛——依她的地图——的形状如蘑菇横剖面。

不料后来买地图一看，岛的形状截然有别，港口位置也南北颠倒。何以出现如此大的误差呢？我猜想，原来她是把港口在海岛生活中的重要性迭加在地势重要性上，从而使得港的规模迅速地相对变大。令人伤脑筋的是，她全然未能把握上下左右、东南西北这一绝对位置关系。总之对她、或者对众多女性来说，地理整体面貌没有多大重要性。她们最为看重的是眼睛见到的丰富多彩的细部，细部印象越强烈，其地势重要性越成正比地膨胀开来。但那时我没就此深想，只是觉得奇怪：好一座形状离奇的岛！

画罢地图，她以画龙点睛的架势加进房子位置，脸上浮现出心满意足的表情点头欣赏。“我最最——喜欢这个岛！”叫罢，一口吻在地图上面，然后把那张纸递给我。地图上清晰留下她的口红。

被如此的偏爱和无知扭曲的海岛由口红盖了个漂亮封印。

至于她期待我对这富有激情的封印做出怎样的反应，当时我全然无由得知（现在也不得而知），姑且道谢接过地图，扫了一眼折起揣进衣袋，不再就这地图多想。

她开始介绍到达港口以后的情况。

“从港口到那座房子走路才十五分钟左右，”瓦伦蒂娜说，“风景漂亮的海滨路，走路我想是很开心的，不过行李多的时候最好搭出租车。岛上只有一辆出租车，如果找不到，可以坐马车，或者雇水上出

租车也行。”

“好个悠闲的地方啊！”我说。

“当——然，悠闲着咧！”瓦伦蒂娜强调，“车都几乎不跑，岂非再好不过的写作场所？”

我被瓦伦蒂娜“车都几乎不跑”这句话强烈打动。唔，这不正是理想的希腊生活么？我想，美丽的海滩、无车的孤岛、宁静的日夜。（后来实际上岛一看，吵得我大伤脑筋。汽车固然不跑，但摩托多得不行，而且几乎全是没带减音器的低档摩托，从早到晚“乒乒乓乓乒乒乓乓”发出小孩子拼命用棍棒敲打铁皮屋顶那样的刺耳噪音，在岛上东奔西窜。老实说，比站在三轩茶屋十字路口还刺激神经。正因为周围安静，噪音也就更——让人气恼。但当时当然不晓得这么多。噢，没车？这可不错！有谁能想到什么摩托呢！）

瓦伦蒂娜在另一张纸上画出了房子周围示意图。

“超市啦邮局啦OTE（电话局）啦，生活需要的东西去了港口一应俱全，餐馆什么的一家接一家，生活上一点问题也没有。不过，若嫌走十五分钟麻烦，房子旁边也有好多店铺。有小型超市（阿纳基洛斯经营）、有鱼餐馆（帕特拉里斯经营）、有咖啡馆（潘德莱斯经营）。鱼铺虽然没有，但咖啡馆里有渔夫聚集，可以直接讨价还价买鲜鱼。”

“地方看来蛮好啊！”我说。的确像是不坏。

“好了好了，下面看关键的房子。”她画出房子说，“就是这样两户相连的房子。旁边住的是房东塔基斯的妻弟哈里斯。哈里斯在雅典有房子，现在单身在这岛上的电话局上班，周末回雅典。他会说英语，有什么事还是方便的吧？”

“那怕是的。”我赞同。

最后她画出房子的结构。不知何故，较之她对房子外观和附近地理的熟悉程度，她对房子内部结构的了解却含含糊糊，难以信赖。地图也失去了一时的气势，没有对我多讲。花坛的花比门大得多（前面也说了，把自己喜欢的东西画得格外大是这一种族的特征），由此不难推断房间与房间的比例绝对不会准确。她为什么对房子周围如数家珍，而对房子内部却如此语焉不详呢？原因我无从得知。但这不是该由我追问的问题。作为我，只要能以合适价格在好位置租到好房子即

可。

概括起来，她说的情况是这样的：一楼有客厅、厨房、浴室和小孩房间。二楼一半同一楼直通，一半是卧室。庭院若干。

问题有几点。首先，没有独立的工作房间（小孩房间堆满不用的家具）；第二，没有浴缸（她说别墅里没那东西）；第三，没安电话（她强调去电话局就行了）；第四，房租决不便宜（他们要八万德拉克马。八万德拉克马在希腊是不小的数目）。

不过，和瓦伦蒂娜谈论海岛的时间里，我渐渐有了想住在那里的心情。再说另找房子也多少是个麻烦事。在希腊找房子是相当累人的。也罢，姑且住住看吧！不跑车，又安静。

我对瓦伦蒂娜说就住那房子，用支票先付一个月房租。事情就此敲定，简单得很。我们在希腊的临时住所就这样定了下来。

告别前瓦伦蒂娜把我领去附近书店，为我选了几本译成英文的现代作家的书（哪本都没什么意思，读到中间不再读了，抱歉）。在书店门前她从一个卖炒栗子的老伯手里买了一袋炒栗子。每到10月，雅典街头到处是卖炒栗子老伯的货摊，满街都是炒栗子香味儿。她大概同那老伯相识，一起聊着什么。她笑，老伯也笑。

“就用这个给儿子做午饭。”瓦伦蒂娜对我说。

用炒栗子到底能做什么午饭呢？对此我本来极有兴致，遗憾的是她似乎很急，没能问成。午饭时间快到了。看样子，让儿子饿肚子对她来说是比什么都难受的事情。我们就此告别。

“好好——受用好了，”瓦伦蒂娜说，“实在是个beau——tiful的地方！”

“多谢您的关照。”

瓦伦蒂娜翻卷着如原色蝴蝶一般色彩艳丽的裙裾，消失在雅典的人群之中。后来在电话中交谈过一次，但再未相见。

---

[5] 指谷崎润一郎（1886—1965）和三岛由纪夫（1925—1970），均为日本著名作家。

[6] 整个时间、全职。



斯派赛斯岛



抵达斯派赛斯岛

就速度来说，从比雷埃夫斯到斯派赛斯乘水上飞船最快，花普通渡轮所需时间的大约一半即可到达目的地，的确节省时间。但是，票价也贵，是普通船的两倍。而更主要的是缺乏情调。声音吵得要死，上甲板来个日光浴都不可能，外观也够难看的。就像过去看过的电影《海底两万里》中的鹦鹉螺号[7]，那种落后于时代的前卫造型，俨然性情乖戾的水生动物一般忽然伸脚在海面突飞猛进的光景，总给人一种不快之感，至少与旅人的心情相去甚远。

这令人忍无可忍的水上飞船好歹驶入斯派赛斯岛的港湾时，但见码头上所有建筑物外墙都给白色的幕布遮得严严实实，就连人家的阳台、宾馆的窗口和餐馆的门都垂着幕布。三角小旗齐刷刷排开。随着飞船渐渐靠岸，幕布上的希腊字母看清楚了，写的是IIAΣOK和NΔ之类，乍看颇像村庄里插着旗帜欢闹的秋季庙会，但究竟什么意思我们全然摸不着头脑。这以前在希腊转了很多城镇，却从未见过这等光景。

“嗳，那到底写的什么？”老婆问我。

“什么呢……呃，IIAΣOK、NΔ……后面好像是人名。”

“不是搞什么宣传？”

“不会，我想不是的。宣传无论如何都搞不到这个地步。”

两人抓耳挠腮思来想去，找不出合适的解释，最终大体得出结论：大概是某种地域性庆祝活动。但不管怎样，我们来到了斯派赛斯岛，往下至少要在这里安营扎寨一个月。

岛的第一印象绝对不坏。海湾里有个不大而工整的港口，后面有个不大而工整的镇。镇后面有丘陵，有山。山上现出白色的教堂，覆盖着松树、丝柏和橄榄等浓淡不一的绿色，作为希腊岛是很少见的。大海染成湛蓝色，云絮白得彻底，天空蓝得透澈，甚至寥廓。一只海鸥缓慢而潇洒地划过天空，就像在欣赏飞行这一行为。水上飞船马达停止后，传来耳畔的惟有船头切水的飒飒声。依瓦伦蒂娜的说法，风景实在够beau——tiful的。

※

在斯派赛斯岛下船的人相当不少，扛着大型背囊的外国游客偶尔也可见到，但因为旺季差不多已经过去，数量不是很多。乘客大半是希腊人。这些希腊人粗线条说来可以分成两类：（1）从哪里来的希腊人，（2）从哪里回来的希腊人。

属于（1）的希腊人大体衣着得体，不是情侣就是一家老小，估计是来别墅度周末的。这类人手上全都拿着一本什么书。坐在我前面座位的太太领一条很乖的小狗，正在看译成希腊语的阿瑟·黑利的《大饭店》。旁边一个身穿超短裙的可爱女孩一边喝热咖啡（船上有服务生端送饮料）一边看大约是希腊版的《ELLE》之类时装杂志。这些人周围充溢着上中产阶级（upper-middle）城里人特有的安详氛围。身上是住几宿用的简单旅行包、太阳镜、金手镯、威尼顿毛衣和索尼随身听。

相比之下，属于（2）的人们感觉上都那么单纯爽快、生机勃勃。俨然“希腊左巴”[8]的老伯和气色好的老婆婆们满抱着想必是在比雷埃夫斯或雅典买的货物“扑通扑通”下到码头。他们是真正的平民，我把他们称“左巴系希腊人”。

另外也可见到穿肥肥大大的黑色僧袍（称之为“拉索”）、蓄着长须、神情甚是庄重的僧侣。不知这僧人到底买了什么回来，一手提一个纸壳箱，而且似乎很重。一个四十光景的中年妇女在舷梯口同前来迎接的小男孩（可能是她儿子）紧紧抱在一起接吻，以致其他乘客下不了船。船上的乘务员到底喊了一声：“太太，挡住人了，请让开那里！”船上一个左巴老伯以大得令人吃惊的声音朝码头上一个左巴老伯喊道：“喂——，科斯塔，你好吗？”

也有拉客的。蛮有知识分子味儿，表面上看不出来。一个感觉上像伍迪·艾伦的细高个中年男子，身穿鳄鱼牌运动衫，戴一副雅皮式黑边眼镜。但无论运动衫、眼镜还是他本人都有些神情劳顿。他一个接一个拉住仿佛旅行者的外国人，用英语或德语问今晚住处定了没有。港口广场一共排列着六台马车（瓦伦蒂娜所言不差，确有马车），车夫向人们打招呼：“哈啰，请！”广场四周咖啡馆栉比鳞次，人们一边喝咖啡看报纸一边打量下船乘客。

还有狗。椅腿下面两条褐毛狗“骨碌”倒在那里再也不动，活着还是死了全然看不出来。这也不限于斯派赛斯岛，乃是整个希腊日常性光景，我称之为“死狗现象”。总之希腊的狗在炎热的下午都这样像石头一般睡得死死的，端的纹丝不动，甚至气都不喘（看上去）。就连希腊人都好像极难分辨出这种“倒地狗”是死是活，几个希腊人围着倒地狗，皱着眉头认真讨论狗是活着还是死了，这光景我见过几次。我想用棍子捅一捅即可见分晓，但不知人们觉得狗被叫醒太可怜还是怕被狗咬，没有人那样做，只管定定地看着争论是死是活。狗自是闲着，人也够闲的。

拉客的鳄鱼男（恐怕是一家寄宿式小旅馆的老板）来到我身旁问：“今晚住的地方定下了？”

“定下了。”我说。

“哪里的旅馆？”

“不是旅馆。”我说，“准备住克努皮查的达姆迪罗普罗斯的房子。”

“原来是克努皮查的达姆迪罗普罗斯的房子，”他歪了歪头，“你晓得那房子在哪里？”

“不晓得。”（瓦伦蒂娜没有告诉我房子地址。这是因为，岛上不存在地址这个劳什子。“去了自然知道。”她说。）

“那，我帮你打听一下。”对方说。为人甚是热情。

“喂，喂——，伊雅尼！克努皮查的达姆迪罗普罗斯的房子在哪里知道吗？”

被称为伊雅尼的头戴鸭舌帽的左巴赶了过来（希腊男人的名字大约一半叫科斯塔、伊雅尼或吉奥哥斯）。他也歪了歪头，抱歉似的说：“克努皮查的达姆迪罗普罗斯的房子？我也不知道啊，这个。”

这当儿，旁边一个看样子精力充沛的中年妇女插嘴道：“什么，谁的房子？克努皮查的达姆迪罗普罗斯的房子？”不过她不知道房子位置。这么着，附近一个又一个左巴加入话题，结果范围迅速膨胀。而且大家七嘴八舌地表示：“克努皮查的达姆迪罗普罗斯的房子？”“没听说过啊！”“会不会是那座房子呢？”“问问那家伙不就清楚了！”就是说，这么一点点事都可以使大家情绪高涨。我切切实实感到自己是来到一个悠闲或者说得闲的地方。

问题是尽管情绪如此高涨，但克努皮查的达姆迪罗普罗斯最终也没搞清。鳄鱼男对我说：“克努皮查的达姆迪罗普罗斯的房子倒是不知道在哪里，不过反正到了克努皮查一问就可以的。到了那里自然有人知道。”

我说那好。本来一开始就想那样做。

他劝我坐马车去，并帮我找了一台马车——人很热情。他告诉我：“付费可别超过二百德拉克马，马车费有那个规定。”

不料到克努皮查时，我不得不付四百德拉克马。车夫说东西重得要死，得付特别费用。我未尝不可以按鳄鱼男的话正色说少开玩笑，但东西的确够重，马也在上坡路上气喘吁吁（没准是表演），再说车夫又给找到了房子——也罢，就付了四百德拉克马。但不管怎么说，差了二百之多。

弄清我们最初进港时看见的四处垂挂的幕布上的名堂是在那天傍晚。那天是星期天，大凡副食品店都不开门，我们只好去港口附近的酒吧式餐馆吃晚饭。打开菜单，挑了当日的“鱼料理”和煮菜豆，要了白葡萄酒。

“对不起，今天不上葡萄酒。”女主人显得十分歉然。

我听了打心底吃了一惊，惊得声都出不来。没葡萄酒？希腊餐馆没葡萄酒？这简直等于进了日本的寿司店，被对方告知“对不起今天酱油没有了”。

“没葡萄酒？”我以干巴巴的语声问。

“噢，今天不是那个吗，”说着，她手指幕布，“所以不能上酒。”

突然听此一句，也还是全然听不明白。那个是什么，到底？

“那个是什么呢？”我问。

“今天是全国统一地方选举投票日，所以全国任何餐馆都不得上酒类。葡萄酒也好啤酒也好威士忌也好白兰地也好乌糟[9]也好，统统不成。法律这样规定的。”

原来那些幕布全是选举用的。报纸上是说选举马上开始，问题是选举怎么就不能喝酒呢？我就此问她。

“喏，希腊人每有选举都容易激动的嘛！全都哇哇直叫，如果再有酒上来，说不定就闹出人命来。所以酒精类遭到禁止，一滴都上不得的。”

也是因为闲着，她很耐心地对我解释一番。

“不过么，”我说，“我们是外国人，同选举全不相干，警察不至于因为我们喝点酒就来说三道四吧？”

“唔——，那倒也是。”她说，“特意来希腊一次，喝不成葡萄酒也够可怜的了。OK，给岛上的警察打电话问问，等一下。”

但最终那天我们未能捞到葡萄酒。警察的回答是：外国人也好外星人也罢，今天一律不得供酒。无论哪个国家，警察都是照章办事的。没有葡萄酒的晚饭是何等索然无味，这点不来希腊是体会不到的。

这就是我们在斯派赛斯岛第一天发生的事。没有葡萄酒的晚餐。往下可如何是好？

---

[7] Nautilus,美国海军核潜艇，1954年建成，1980年退役。以1958年潜越北冰洋抵达北极而闻名。

[8] 希腊作家尼可斯·卡赞扎基斯（Nikos Kazantzakis,1883—1957）的长篇小说《希腊左巴》里的主人公。此部作品写于1946年，为作者的代表作，被译成多种文字。

[9] Ouzo，一种希腊产的用大茴香籽调味的低度混合酒。



海岛淡季

我们来岛是10月过半的一个周末。换句话说，是旅游季节最后的周末。“这个时候还勉强可以下海游泳”——人们说的底线也就在此时。实际上这个周末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下海游泳的人的身影。

走到距港口很近的一处不很大的海滩一看，三十来个游客身穿泳衣躺在沙滩上，几个活蹦乱跳的孩子们进水游泳或打水仗。阳光虽然暖和，但风到底挟带着凉意，很难让人下到海里去。大家只是歪在沙滩上静悄悄晒太阳。男士穿一条小而又小的泳裤，女士有百分之七十整个亮出胸部，争取在冬天到来之前尽可能多一点吸收阳光。所有人的神情都十分严肃认真。我心想日光浴来得轻松些有何不可，然而这些人（猜想大半是特意从北欧来此寻求希腊阳光的）对于太阳相当认真，气氛就好像是太阳能电池式电动剃须刀们聚在一起举行兼作充电时间的信仰表白集会。

当地左巴系希腊人三三五五从旁边走过。因通往城里的公路紧贴海滨，他们每次走过，都左一眼右一眼几乎毫无顾忌地盯视妇女那朝着初秋太阳挺起的乳峰。

有趣的是，面对女人们在沙滩上解开游泳衣“哗”一下子、或者“哗啦啦”、“啪啦啦”亮出乳房这一行为——我也想不出更贴切的形容词——游客们并没有贼溜溜地打量，甚至斜眼瞟一下的都没有。游客当中有一种共识，认为那么做是非常不礼貌的，拍照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就算身旁有女人大模大样亮出乳房，男人也都一副丝毫不以为然的样子。我个人称之为“爱琴海规则”。具体地说，来到爱琴海以后，（A）女孩子心想反正是爱琴海，这么做理所当然，遂以习以为常的手势暴露乳房；（B）男人也做出视而不见的神情，就好像说毕竟是爱琴海，那么做也无所谓。当然，偶尔也会用眼角斜瞥一眼，但即使那种时候他们也显得从容不迫，仿佛在说这东西见得多了。此乃基本规则，从容才是至关重要。并且作为实际问题，在希腊住久了，对乳房之类的确习以为常，一旦习以为常，也就见怪不怪了。我这倒不是自我卖弄。

不光女孩子，若走去岛里边什么人的海滩，脱去泳裤裸露下半身

晒太阳的男子也常可见到。甚至有女人一丝不挂。这个我也做过一回，心情确实不坏。世间有“阴部”这一说法，但整个沐浴着阳光，也就无所谓“阴部”了，不就是身体一部分么——对此理解得相当深切。

总之，在希腊海岛沙滩上依照“爱琴海规则”袒胸露乳的女人横躺竖卧，男人们在其周围只管以熟视无睹的神情看书。不过自不用说，这样的规则也好，不成文的规定也好，对左巴系希腊人是行不通的。倒也不是说他们劝诱游客：“希腊是个好地方，在海滩露出乳房也无所谓。”也不是说他们的太太和女儿在日常生活中袒胸露乳。或者不如说希腊乡下人宗教影响很深，这方面非常保守。众目睽睽之下肆无忌惮地暴露乳房的，不过是蜂拥来到希腊的美国人和北欧人罢了。所谓“爱琴海规则”云云，同左巴们是毫不相干的。既然露乳房是自由，那么看乳房也是自由。

这么着，左巴们经过时对裸露的乳房看得相当投入。话虽这么说，但感觉上其视线中不含有多少性的色彩。莫如说是出于纯粹的好奇心（倒是不能称为科学好奇心），我觉得。我无意为左巴们辩护，毕竟他们的好奇心太强了，很难对那一带比比皆是的乳房完全不理不睬。我们走路过程中若见有人聚堆，也会伸长脖子窥看——二者同一道理。因此，女孩子们倏然感觉到有放肆的视线落在自己乳房上而抬起脸时，对方若是左巴，也只好作罢——“得得，又是左巴，没办法啊！”

不过，我目睹地中海如此场景只是一瞬之间。那个周末（那是个正好用来欢送旅游旺季最后一天的理想的地中海丽日晴天）过去而10月也过半之后，海滩人影急剧减少，从船上下来的游客愈发稀落，酒吧或餐馆也开始空空荡荡。如此这般，海岛真正进入淡季。一句话，我们是在大家往回走时赶来的，真是好事得可以。



岛上的淡季以相邻海滩上排列的酒吧式餐馆的关门停业为标志。一如山国之春始于遥远的雪崩声，海岛之秋则始于酒吧式餐馆收拾桌椅的乒乓声。关门首先从远离小镇的海滩开始，就像1945年的柏林攻坚战，前线一点一点朝中心部位接近，某一日彻底偃旗息鼓。剩下的

只是“尼科斯餐馆”和“海豚餐厅”等招牌、钉上木板的窗口以及垂着苇帘的屋顶。还有无家可归的狗——希腊岛上丧家犬何以如此之多呢——依循夏日的记忆，在现已不复存在的想像中的餐桌四周晃悠悠转来转去，鼓动鼻孔徒然搜寻食物的余味，心想投给肥肉和鱼头的友好而出手大方的游客怎么一忽儿跑光了呢？我告诉狗：休假结束，都回家去了，现在都早早起来或上班或上学了。但狗当然不懂，不可能懂的。狗所能隐约理解的，似乎仅仅是美好的季节已然结束。

这样，夏日期间把游客运来岛内片片海滩的破烂大巴（岛上仅有一辆）也随着酒吧式餐馆的关门大吉而寿终正寝。多的时候有十台之多的马车在10月末也减为两台。秋冬之间大巴留在岛上丝毫派不上用场，遂用渡轮运去本土，淡季作为普通通勤大巴在本土好好劳作，春天来时再返回海岛。我目睹了这辆大巴被装上渡轮运往本土的情景，总有些令人悲从中来。

马车是在时不时去郊外散步时在农家院前见到的。拉车的马拴在附近的树上，以柔和的目光自得其乐地吃着干草，一副“好好，总算可以休息些时日了”的样子。车夫——其中估计有从我手里抢去四百德拉克马的那个人——想必重新干回农夫老本行，在山地里栽培橄榄、西红柿和茄子等等。

接下去，似乎专门做外国旅行者生意的漂亮（当然是在比较意义上）店铺也慢慢察看着周围的动静开始关门。一般酒吧、像模像样的餐馆、快餐店、迪斯科舞厅（回荡着约翰·特拉沃尔塔魂灵的那种劳什子）就这样一个接一个消失不见了。

到了这时候，周围开始漂浮起这样一种氛围：结束了结束了，往下可以放松了！毕竟旅游旺季周末也没有、午睡也没有，一味劳作不止，没什么好留恋的。他们夏天拼命劳作，冬天尽兴游玩。宾馆也同样歇业。一时差不多有十家宾馆如同退潮一般“啪哒啪哒”接连关门，10月尾声，剩下的只有一家小型的，而且也是一副不得不应付的架势。

从海上吹来的湿润的北风摇颤着电线，将不吉祥的乌云运往遥远的克里特岛那边。我心里涌起阴暗的疑念便是在这种时候：莫非我所做的全不对头？莫非我该去更为不同的地方？

但是，面对如此萧条景况是进入11月以后的事，10月下半月还多

少有些生活的余裕。说是旺季活气的尾声也好、余韵也好，反正尚可受用这方面的气氛。店铺和餐馆也还尽量开着，风平浪静的暖和日子也尽可在海滩享受阳光。游客几乎没有了，甚是舒心惬意。假如有人想在希腊海岛上住一个月，我想推荐9月至10月中旬这一个月。此前嘈杂得犹如原宿竹下大街；此后么，从观光角度看来，来希腊的意义无限接近于零。冬天特意来这种地方的，不是特别好事之人，就是盯上淡季低价（低的确是低）的小说家之类。



希腊许多岛屿如同《白日美人》中的德娜芙[10]具有两副截然有别的面孔。一副是从复活节至10月中旬旅游旺季面对外国旅游者的浓艳面孔，一副是其余时间即淡季仅仅自己人在一起时的真实面孔。由于差异太大，只看其中一副恐怕很难想像另一副，我觉得。

首先气候不同。下面，我从一个叫约翰·鲍曼的人写的旅游指南《爱琴海诸岛》中引用一段关于气候的记述：

“我想向读者强调两点：（1）爱琴海诸岛不是热带海岛，（2）屡有强风吹来。一年之间，6月至8月天气连续晴好，多数人往往因此怀有此地乃常夏乐园的误解。但请看一下另表（※年间气温表）。尽管各岛之间多少存在误差，但有一点可以明确断言：10月至4月爱琴海基本无人游泳，11月至3月一般人不会考虑在岛上度假。”

记述简明扼要，关于岛上气候没有任何可以补充之处。不过——也许我啰嗦——没有实际来过希腊海岛的人，我想怕是不会理解其淡季的难受和凄凉的。明白和理解是两回事。

就我来说，秋冬的希腊海岛并非温暖气候这点自是晓得的，平均气温也查阅了，毛衣和风衣当然也准备了，也做了相应的思想准备。然而在秋日海滩迎来第一场北风时，10月25日瑟瑟发抖地往火炉里投第一根柴火时，我还是不由这样想道：喂喂，这到底算什么呀？难道这就是希腊？

过去来希腊总是在夏天，而只来过夏季希腊的人是想像不出冬天如何的。实际见到这种无法想像的落差时，我强烈地感觉到超乎现实的冰冷。目力所及，一切都让我们心里发冷，一切都使我们这一存在

发生动摇。海滩堆积的冲浪用的帆船令人联想巨大的水母骨骸。空无人影的山丘上，写有“蓝莓山（BLUEBERRY HILL）骑马俱乐部”的大块招牌在风中“咔咔”摇颤，现已毫无用处的大巴站标如倒地的伤兵躺在路旁，巧克力包装纸发出“飒飒”的响声被风刮走。

人口也陡然减少。当地人原有人口为三千左右，但夏天由于“别墅族”和旅游者蜂拥而来，人口约增加一倍。而旺季过去之后，岛又转眼之间门可罗雀。散步路上也可一眼看出不少房子空空荡荡，海滩附近甚至出现幽灵城（ghost town）。

早晨我大致沿着海岸线慢跑。一旦出镇（转眼就出镇），往下很难见到人影。无论怎么跑，一路上都是漂亮得不由令人屏息的绵延不断的松树林——不过因每天都看，便一一屏不过来了。在林中时而碰上猎人。说是猎人，也并非专业猎人，不过是附近的老伯扛枪打猎罢了。一条双耳下垂的狗跟在身后。这样的人每次看见我都瞠目结舌（东方人何苦在这种季节一大清早就在山里跑？），尔后回过神来，精神抖擞地大声寒暄“加里梅拉（早上好）”。如此卖力寒暄的民族，找遍全世界我想也不易找到。在寒暄劲头上，希腊人首屈一指。

除了猎人，偶尔也可见到用电锯锯松树的人。这也不是专业樵夫。是镇上的普通人前来弄木柴准备烧火炉过冬。我想这在法律上怕是禁止的。因为，如果全都擅自砍伐山上的树拿回家去的话，山很快就会光秃。但人们全都这么干：小拖拉机上装着电锯开到山上，锯了树拉回。四下里到处都是电锯特有的呜呜声。是的，冬天近在眼前。

跑了一阵子，眼下现出小小的村落。绿色的松林和蓝色的大海之间，几座工整的白色房子肩并肩靠在一起。有白色的海滩，有简单的码头，有酒吧式餐馆，其前闪出圆顶教堂。赏心悦目的景致。但这是被遗忘的村落。房子是别墅，餐馆是来海滨游泳的旅行者用的，而这一切都随旅游旺季的结束而告终。别墅窗口落着结结实实的铁叶窗，餐馆连招牌都没了，大概经营者担心被盗而拿回家去了。近门处扔着一把缺腿的椅子。一把涂着爱琴海蓝色的木椅，漆已剥落得不成样子了。惟独这被抛弃的椅子还隐约漾出夏日的记忆。

这种夏季用的小村落（Resort Colony）宛如小卫星一般点点环绕在镇的周围，然而都随着秋天的来临而无一例外地化为幽灵城。这样一来，岛上的人口势必集中到镇里。岛的另一侧只有一座渔夫住的小

村，山里生活着几个牧羊人，数量微不足道。从镇中心不管往哪个方向，不到十五分钟，房舍就掩没于松树林或荒地之中看不见了。长着浑身带刺的灌木的沙石地上有人在放羊。这样的不毛之地上到底有什么可吃的呢？我很有些担心。然而羊们“叮铃铃”摇晃着铁铃，在一个又一个石场间频繁转移，寻找可怜的白褐色植物。羊群中有生着漂亮长角的黑脸公羊，以威慑性眼神环视四周——由它统率并保护羊群。我沿路走近时，它猛地扬起脸，晃动两三下双角，拉出向我冲撞的架势，仿佛说再靠近我就收拾你！母羊们不再吃草，聚在公羊身后藏起。

时不时可以看见开始崩塌的寒伧的小屋。料想是牧羊人小屋，但已全然感觉不出生活气息。前行不远，石山顶上又有一座教堂。很小的教堂，仅有大巴那么大。究竟有谁会特意跑来这山顶教堂呢？匪夷所思。

过了山再往前行，有一座大修道院。修道院四周围着白色高墙，爬上杉树夹裹的长长的坡路，来到镶有漂亮的马赛克画的门前。一扇很大的黑门，关着。马赛克画以拜占庭风格画着几个圣人。色彩艳丽的九重葛花围着门盛开怒放，四下鸦雀无声。试着“咚咚”敲几下黑木门，毫无反应。但在我转念要离开时，一个蒙着披巾样面罩的修女走出，悄声低语告诉我什么，然后在眼前摆了摆手，脸上一闪浮现出云间阳光般平和的微笑，重新把门关上。想必是说不允许参观。

无奈，我坐在门旁石头上，闭目合眼，侧耳倾听。即使在万籁俱寂之中也可多少听取世界的动静。细微声响的聚集。首先是羊脖子上的铃声，其次是牛的叫声——好像是修道院里饲养的。也有远处传来的轻便摩托车的喇叭声。哪里的教堂响起钟声。东正教堂常在莫名其妙的时刻以莫名其妙的方式响起钟声。狗朝着什么叫。有人扣响猎枪。1点半的渡轮拉响进港汽笛。于是我再次意识到自己置身异国，得知自己处于异质人们的活动的包围中。我访问外国时，通过声音往往最为敏锐地认识到其异国性，觉得那里有视觉味觉嗅觉皮肤感觉等其他感觉所捕捉不到的什么。我坐在哪里让自己的身体沉静下来，把周围的声响深深吸入耳中。旋即，它们——或者我自身的——异国性就如柔软的泡沫一般忽一下子浮现出来。

从山丘上俯视，可以从杉树尖的空隙看到渡轮的姿影。绚丽得近

乎完美的秋日阳光使家家户户的屋顶都闪着金辉，已经关门的波西德尼奥宾馆显然高出一截的圆顶上蹲着两只面朝同一方向的雪白的海鸥。一个十分祥和的午后。风也罕见地没有。

镇上，人们继续做过冬准备。可是我（外国人的我）全然不知如何是好。归途中本想走进哪里的咖啡馆喝杯啤酒，却哪里都不开门。

---

[10] 法国女电影演员（Catherine Deneuve，1943—）。《白日美人》是其代表作之一。



老港

睁眼醒来，窗外舒展着久违了的晴空。夜雨的痕迹在邻家屋顶上闪闪生辉。天空就好像夏日再度归来一般飘浮着轮廓清晰的白云。蜜蜂在院子里的绣球花上发出倦慵的振翅声飞舞。院墙外面传来老太婆们互问早安的语声。哪里鸡鸣，哪里狗叫。一个神清气爽的早晨。几天没有看到如此温暖的太阳了呢？何况今天是星期六。

其实，星期六、星期天都几乎和我没什么关系。在日本时都没什么关系，来希腊海岛就更加不相干了。星期二变成星期三也好，星期四变成星期一也好，怎么都无所谓。就算周末同我们有什么关系，也不过是周末银行休息、不能把旅行支票兑换成现金罢了。

想到这里，有什么一脚踢飞我的注意力围墙。那是什么呢！

旅行支票！

“糟糕！”我对老婆说，“今天是星期六，就是说，不到星期一是不能兑换现金的。”

我们收拾好院子桌上的早餐碟盘，清点钱夹的内容。我手头上的钱是一千五百德拉克马，她手头是二千五百德拉克马。把衣服口袋翻个底朝天，搜出零币，以日元计算总计也才四千元。把美元、德国马克和意大利里拉合在一起，倒是为数不少，问题是岛上的商店不接受那些东西，而信用卡在这里不外乎一张塑料片。必须用手头上的现金把星期六和星期天两天应付过去。

不过，情况并不那么富有悲剧性。为什么呢？因为三千德拉克马足可以购买两天的食品、两瓶葡萄酒和半打啤酒，且还有找零。回想起来，这以前更为险恶的状况我们都度过了好几回，年轻时候我也差不多身无分文地旅行过，相比之下，这回实在算不得什么。

但妻不这样去想。

“不是这样的问题。”她扳着脸说。她视为问题的，对了，是原则。

“知道。”我说。

“知道什么？”

“所以说你当作问题的是原则吧？就是说——”

“我当作问题的，”她像要一把推开我的抢先发言似的说，“是你那

种马虎大意。星期五必须把钱换好是原则对吧？你却马上忘去脑后。为什么不能像普通成年男人那样把这种事一一处理妥当？”

对此我什么也没说。我无论如何也不认为自己能像普通成年男人那样把一切处理妥当，小心翼翼地度过一生，再说没注意到周末到来的责任她也有一半（或者30%，抑或再退一步，算20%）。但这种话说出来势必没完没了，于是我默不作声。我在婚姻生活中学到的人生的秘密即在于此，并且请不知晓的男士牢记在心：女性并非因为有想生气的事才生气，而是因为想生气才生气。她想生气的时候若不让她充分生气，往后会难以收拾的。

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在任何人的婚姻生活中我想恐怕或多或少都是如此——争吵的模式总是固定的。就算开始的形式有所不同，收场也每每相同。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说夫妻争吵同系列电影片大同小异，一如史泰龙的《洛奇》。结构不同，情节不同，场所和对手不同，战斗的动机和战术也不同，但最后镜头如出一辙，并且背后回响的总是同一音乐。

我们争论的模式大致如下：

（A）总的说来日常生活中我是个粗疏、邋遢、马虎之人。就算出现什么问题也趋向于认为“总有办法可想”。若无法可想，那的确是无法可想了。

（B）相比之下，妻在日常生活中有些神经质，一点点混乱都难以忍受。事情考虑得很远很远，对相应的可能性事先做好准备，否则就为之不安。

（C）A与B之间差距实在太大，往往形成精神上的无人地带。

这个星期六早晨我们围绕兑换现金发生的争吵（准确说来我想不能称为争吵），自始至终沿袭的都是这一模式。显然是人生观、世界观上的差异，其中存在几千辆推土机也无法填平的宿命式鸿沟。我身后站立的类似希腊悲剧Khoros（合唱团）的一伙人唱“说到底人生就那么回事有什么办法呢”，妻身后的Khoros则唱“不不，向宿命开战乃人类天职”。而且我的Khoros总是比她的声音略小，士气也不够。

※

不过午饭前妻情绪好了起来。天气好的日子，她没办法长时间气急败坏。午饭我们吃了淋上番茄汁的意大利面条和花椰菜色拉，饭后散步到老码头。从住的房子到老港走路约三十分钟，距离正好用来作晴朗午后的散步。穿过小镇，翻过一道山梁，静静的海湾在眼前舒展开来，犹如被时间河流遗忘而迷迷糊糊打瞌睡的海湾。这里是斯派赛斯岛的老港。一如名称所示，曾作为全岛的中心港口热闹过，但进入轮船时代以后，由于水深和面积不够而将地位让给了新港。现在这里只是作为游艇停泊地而勉强维持命脉。

老港是个极好的场所，我喜欢来此散步。寂寂无人的平静的港湾里停泊着五六十只大大小小的游艇，桅杆“咔嗒咔嗒”发着干涩的响声，如卜签一样不规则地摇摆不已。晒黑的船员把在那一带店铺里买的袋装食品拿上艇去。码头向阳的地方一只黑猫弓身睡得正香。艇尾飘舞着显示各自国籍的旗。当然，蓝地白十字希腊旗不管怎么说都占多数。此外有意大利旗，以及英国、德国、瑞士……

沿港一条弯路上旁排列着餐馆和咖啡馆，感觉都很不错，可惜全部依例关门。原本打的就是游艇旅行者的主意，夏天一过立即收摊。远处岬角尖端现出雪白的灯塔。就在灯塔下面，一只大概是触礁废弃的货船很不安稳地浮在水面，近乎大胆地大量掺入绿色的艳蓝艳蓝的水面同藏青色的货船船体以及白云交相辉映。不见人影。似乎补充完食品的游艇扬帆出港之后，四下里就再无人影。

一直前行，在有灯塔的岬角底端可以看见几家造船厂的形影。说是造船厂，但并非什么了不得的东西，不过两三个工匠在“叮叮咚咚”地用手工造木船罢了。大多是当地渔民去不远的海湾撒网用的小船，但也有足足超过十米的大船，有类似屋顶形画舫的顶篷，看样子是能坐二十人的观光船。

看他们造船的工序极有意思。细看之下，造小船和造大船工序完全相同，简单说来和折纸鹤差不多，无论大纸鹤还是小纸鹤，折的顺序都一样。先为船底做一根堪称船之脊梁的壮壮实实的柱子，再把肋骨穿插进去，然后从里外两侧钉板，把肋骨固定住，最后四周镶上厚船舷。原理十分单纯。单纯而有说服力，看的过程中不由点头称是，心想这就是船的本来面目。建造中的船全都涂成橙色，船头立一个十

字架。只以脊梁和肋骨形象放在台上的船竟给人一种安谧的印象，不可思议。

我们终于发现一家仍在营业的咖啡馆，坐在外面椅子上点了生啤和冰淇淋，一边晒太阳，一边眼望天空中飘移的云，或逗路上走的狗。在希腊生活一段时间，我们身上开始有了一种能力，使得我们能够长时间怔怔注视什么而不感到无聊。因为此外无事可干。

“这一带造船厂够多的。”老婆吃着冰淇淋说。

“岛上有木材，所以过去造船业就很兴旺。17、18世纪靠了造船业，这座岛成了希腊屈指可数的富岛。”我解释道。当然，这是来自旅游指南的现买现卖。每到一处我都认真阅读那里的旅游指南。“那时候，这老港周围一排排全是大造船厂，一个劲儿造大船。”

“大？能大到什么程度呢？”

“有供给商船队在美洲和希腊之间往返，应该是相当大的吧。岛上住着几个那种商船队的老板，互相争强斗富。以现在说来，就是奥纳西斯和尼亚克斯那样的感觉。当时，这座岛一来从位置上说作为贸易中心也很重要，二来有良港，可以说所向无敌。当时比雷埃夫斯不过是个海边寒村罢了。”

灯塔上方有状如海豚的云絮漂移，货船一动不动蹲在那里，似乎要把世界上所有的时间和声音吮吸进去。

“说起来话长，”我大致强调了一句，但时间当然不是问题，这里时间多得几乎腐烂变质。“就是说，这座岛的商船队不仅仅是商船。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地中海到处都是海盗，动不动都打起来，妨碍船的自由航行。拿破仑时期还有英国实行海上封锁。为了与之对抗，商船队开始在船上装备武器进行自卫——就像是个人拥有的海军。那时候斯派赛斯岛的商船队以打破封锁的英勇行为而威名大震。1821年爆发反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希腊独立战争时，这支船队在同土耳其的海战中发挥了极大作用。就在那里的海湾——”我指着灯塔所在的岬角尖端，“土耳其舰队同岛的舰队一决雌雄。伯罗奔尼撒半岛发生叛乱，纳夫普利翁的土耳其守备队被希腊军包围，土耳其军赶去救援。但从陆路由科林斯开往纳夫普利翁的军队在阿尔戈斯一带受阻。”

“阿尔戈斯……就是上次去过的脏兮兮黑乎乎的小镇？”

“总之在那里土耳其军吃了败仗，无法继续前进。这样一来，就只剩下海路。于是由八十艘战舰组成的大舰队驶向阿尔戈斯湾。岛的舰队在此迎击。1822年9月清晨，两支舰队正面交锋，就在那里的海峡。”

我又要了杯啤酒。等啤酒的时间里又往触礁的货船望去。

“那么哪方胜了？”

“说实话，战斗几乎没有发生。”我喝了一口新端来的啤酒回答，“土耳其舰队刚拐过那个角露头，血气方刚的海岛舰队就‘哇’一声扑来，吓得土耳其人仓皇逃走。土耳其舰队只沉了一艘。本来，希腊军司令打算把土耳其舰队全部引过来一举全歼，但留岛家人惨遭杀害的船员们忍无可忍地冲了出去。因为土耳其军出于儆戒的缘故，把途中路过的岛上的妇女小孩全部斩尽杀绝。”

“可为什么土耳其军不战而逃呢？不是很大很大的舰队吗？”

“就数量来说。”我说，“但总的说来土耳其这个国家是以陆军为主的国家，原本不擅长海战。相比之下，希腊人在海上要顽强得多。况且这座岛的水手当时就以英勇善战出名。例如当时战法之中有一种叫‘火攻’。如何火攻呢？就是在容易掉头的快船上装满火药，让它紧紧贴在敌舰身上，然后点火，人跳海逃走，结果船和敌舰一同爆炸。这是这座岛的海军的拿手好戏。这种无比危险的把戏时常由斯派赛斯岛的水手表演。土耳其人对此也很清楚，所以一见船影就吓得逃之夭夭。总之，这斯派赛斯海湾的胜利给全体希腊人增添了勇气，不久希腊就取得了独立。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此岛的全盛时代。”

“那，还要问回最初的问题，”老婆说，“为什么萧条到这个地步了呢？”

“岛一落千丈的原因之一——刚才也说了——在于岛上的人投身独立战争过头了。他们积蓄下来的资本和财富全部投入战争，使得自己无法从这场创痛中恢复过来。”

“你说，那不是太过分了？岂不是没有正义什么也没有了？”

“这就是人世，”我说，“这就是历史。”

“不得了！”她愤慨地说。《小公主》[11]那样的故事是她最喜欢听的。

“不过这不是唯一的原因。”我说，“第二个原因是那以后轮船时代

到来了，这意味岛上最赚钱的木船失去了存在价值。岛上的造船厂也好商船队也好因而迅速落后于时代。第三是因为轮船续航距离比木船长得多，贸易方式随之发生变化，致使岛作为中转站的价值也彻底丧失，繁荣转去了比雷埃夫斯和锡罗斯那边。”

10月末的星期天午后，在老港冷冷清清的咖啡馆里喝着啤酒，侧耳倾听“咔嗒咔嗒”的桅杆声，根本无法想像灯塔前面就有奥斯曼土耳其的大舰队出现。甚至躺在咖啡馆角落的沙发上一边睡眼惺忪地赶苍蝇一边看小报的男服务生恐怕也同样想像不到。

---

[11] 美国女作家伯内特1888年创作的小说，1905年改编成剧本。描写大财主的女儿萨拉因父亲去世而一度沦为寄宿学校的勤杂工，后在父亲亲友帮助下重获幸福。



缇坦尼亚电影院的深夜

从老港回镇，顺路到蔬菜店和超市，买了今明两天所需食品。正要回家，老婆瞥见缇坦尼亚电影院的广告画，兴奋地叫道：“噢，有李小龙的电影！”她是李小龙迷。

“喂喂，又是李小龙！”我说。喂，又是李小龙！

“那有什么，偶尔。又没有什么别的事可干，看电影去好了！”

那么说来倒也是。此外是没什么事可干。再说李小龙的电影，不懂情节也没什么不便。

我们回家吃晚饭，准备去看6点半那场。



镇上有两家电影院，一家到秋天就关门，另一家常年开着。关门的那家名叫“丽娜电影院”，开门的这家叫“缇坦尼亚电影院”。两家都位于城边，而且看上去都不像电影院。若问到底像什么我也答不上。一句话，什么也不像。勉强说来，气氛上就像任何一条商业街都肯定有一家的那种“看不出卖什么的店”。作为电影院门面过于狭小，门也是极普通的杂货店那样的门。知道这是电影院，完全是因为门旁贴有广告画。广告画有两张，一张注明“ΣHMEPA（今天）”、一张注明“AYPIO（明天）”。意思是这个今天上映，那个明天上映。但明天（一如希腊大多数AYPIO）是很难相信的。去了一看，有时候上映的是和昨天同样的东西，有时是和预告毫不相关的其他作品。所以，认为这种预告无非是“某种粗线条假设”我想还是明智的。但不管怎样，态度都是非常冷淡的。

这种冷淡同日本地方小城市的电影院做法又多少有所不同。日本的电影院哪怕再小再破再脏再有小便味儿，但模样大体上像电影院。建筑物的感觉多少与周围的不同，而且散发出不妨说是喜庆（尽管程度有别）的氛围。然而此岛的电影院全然没有那样的氛围。两张广告画，一张注明ΣHMEPA，一张注明AYPIO就算完事。反正是小岛上的小镇，怕也用不着挂牌告诉人家这里是电影院。

“丽娜电影院”关门，门口一直贴着最后那天放映电影的广告画。最后那天放的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主演的意大利摄制的西部片，日语名字是什么想不起来了（似乎是《荒野大保镖》、《黄昏双镖客》、《黄金三镖客》。谁能区分得开呢？），旁边贴一张纸，写道：“承蒙诸位光顾的本电影院照例休业到明年春季，祝诸位冬日愉快……”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照旧紧咬雪茄，眉头聚起很“酷”的皱纹，肩披毛毯，手枪对着虚空。可怜的是，他将贴着ΣHMEPA标签在这里度过一冬。把早已放完的电影的广告画揭下来才是道理，可是仍留在这里不动，俨然以此证明电影院的存在。

“缇坦尼亚”那边仍在营业，所放电影每天不同，广告画也每天都变。前面说的两天连放同一部影片的时候有是有，但原则上是一天一部。放映开始时间是傍晚6点或6点半，标准是一部影片一晚放三场。票价因放映时间长短而异。例如九十分钟的影片票价是一百五十德拉克马，一百二十分钟的则为一百八十德拉克马。说合理的确觉得合理。换算成日元，大致在一百五十至二百元之间。便宜！



拉开电影院的门，里面是四张半榻榻米大小的厅。气氛不怎么样的厅。准确说来，较之厅，更接近裸土间。裸土间右侧有个状似酒吧台的售票处，坐着一个身着黑色未亡人衣服的老太婆。她的形象令人想起只能预告不幸的手相师。下颏收得紧紧的，显得甚是冥顽不化。里面有一个大约是装饮料卖的冷藏柜，柜旁摞着几个可口可乐箱。地板是粗粗拉拉的混凝土，天花板的荧光灯“喀嗤喀嗤”发出不吉祥的声音。墙壁贴满褪色的广告画，统统是我所不知晓的三流影片。

“艾卡顿·艾克萨科希斯！”黑衣老太婆向我们宣告。

“一百六十（艾卡顿·艾克萨科希斯）德拉克马吗？”我确认一遍。

“内（是的）！”老太婆说。那声“内”就好像把一直滞留在喉咙深处因而全然没有水分的空气勉强用舌尖拉出似的。

我从口袋里拉出两人份的三百二十德拉克马。忽然有些不放心，于是叮问了一句：“今晚是李小龙吧？”

“欧希（不对）！”老太婆疾言厉色地否定，以宣布五年计划的斯

大林的架势朝空中竖起手指，“今晚是那个！”

我赶紧朝她指的入口处的广告画看去，那上面印着《李小龙传奇》字样，还有李小龙的照片。

“阿婆，那不就是李小龙么？”

“欧希！不是李小龙，那不是的！”

这仿佛是找不到出路的将棋“千日手”[12]。恰在此时，里面的门突然开了，一个秃头老伯出来向我们招手，用英语说“OK,It's all right Blues Lee，tonight[13]”。我仍有些莫名其妙，回头看老婆。老婆的表情似乎说“虽然不大明白但无所谓吧”，于是我也作罢，付给售票老太婆三百二十德拉克马。老太婆仍冥顽不化地做出一副“欧希”神色。不可思议的电影院。即使有身穿马甲的兔子看着怀表从身旁走过，我想我也不至于这般惊讶。

“你们从哪里来的？”it's all right老伯问。

“伊马斯忒·阿波·庭·雅波尼亚（我们从日本来）。”我按照白水社《速成现代希腊语》（荒木英世著）第22页上的例句回答。

“横滨、室兰、仙台、神户……”老伯面无表情地列举到这里，转而盯视我的脸，仿佛问下一句怎么说。

“哈哈哈，你很熟悉嘛。”我随便应道。一般说来，希腊人就日本所知道的几乎全是港口和公司名称。所以，如果往老伯台词接下一句，应该是“索尼、卡西欧、雅马哈、精工、达特桑”。

“唔，你会讲希腊语？”

“啊，一点点。”

“布拉鲍·布拉鲍（了不起、了不起）。”说着，老伯消失在里面的门内。好家伙！



售票处旁边有一扇门，看情形进门就是放电影的场地了。以为不过是藤泽的美由吉剧场那么小的电影院，开门一看，结果大为意外，里面宽敞得不得了。座席齐刷刷排列开去，天花板高高的，通道宽度也绰绰有余。靠墙是排列着侧柱的回廊。虽然绝对称不上漂亮、豪华或感觉好或有氛围，但反正是足够大的。没一一数过，准确的说不清

楚，不过座席数量总在六百左右。相比岛上三千人口，可想而知，此乃破格数字。只是门面和门厅——或许不该由我挑三拣四——同里边的宽敞实在不成正比，让人有一种受骗之感。

“嗳，往上看呀，天花板开着呢！”老婆说。

抬头一看，果然场内天花板大约四分之一如车顶天窗豁然洞开，猎户座历历可见。

“下雨时要关上的吧？”

“想必。一直敞开，座席岂不泡汤了！”（实际上第二次去时也关上了）

“怎么关的呢？”

“是啊，怎么关呢？”

如此说话时间里，观众陆陆续续进来。功夫片，加之时间早，观众大半是小孩子。从小学三年级到六年级那样年龄的共有二十五六个，教养一塌糊涂，像厄瓜多尔高地上的一群蜘蛛猴聚在最前排大声吵吵嚷嚷，总之吵得不行。有的模仿功夫拳互相踢打，有的在座位上跳来跳去，有的厉声吹口哨，有的把“你娘大肚脐你娘大肚脐”的丑态足足重复了二十遍——简直战场一般。何不让这些家伙不吃不喝地在仓库梁上倒吊两三天！

如此持续了一阵子，刚才那个“室兰·仙台”老伯以忍无可忍的架势出场了，大声吼的估计是：“喂喂，你们再闹下去，就拎你们耳朵扔到外面去！记住了？傻瓜蛋！”说着，“乒乒”捅了两三个小孩的脑袋。老伯离开后，孩子们安静下来，但不大工夫就忘个精光（这上头也跟猴子一样），又“叮叮咣咣”折腾起来。有的一声怪叫“开始喽开始喽”，有的口哨吹得比刚才还响（虽是小孩而肺活量却大），有的连踢更小的孩子，把他们踢哭了，还有的举起坏掉的椅座表演武打——闹得天黑地暗。勃鲁盖尔[14]若是看了，想必当场就能画出大作。

正闹着，“室兰·仙台”又出现了，但见他双手狠狠抓住吹口哨和踢人的家伙的脖子，不由分说地拎去后边。我心想活该。不管怎样，由于当场目睹了牺牲者的血泪，猴子们总算老实下来。得得！

最终，电影开始前进场的观众一共有四十人左右。不知何故，孩子们皆聚于前，大人们皆聚于后。唯独我和老婆形单影只地坐在中间，感觉颇为奇异，恍若梦中光景：反正做了个怪梦，我和老婆坐在

空旷的电影院的正中，前面全是孩子！后面全是大人，天花板敞开着，可以看见星星。

由于电影院大得离谱，多少进来些观众也几乎改变不了空旷的印象。这种空旷感令人想起日本学校常有的兼作礼堂的体育馆。前方有个宽大的舞台（估计这里也发挥镇的多功能厅的功能），上面拉起银幕，前面孤零零地放一个落后于时代的中型音箱。两端点缀着一副寒酸相的人造花，没有还好，有更显凄惨。伤脑筋的电影院。初中上生理课时常把一年级女生集中在讲堂里用幻灯片讲解什么“关于生理”，而这电影院里便是那玩意即将开始的气氛，很有点叫人不寒而栗。

6点半，照明熄了，不是“关于生理”（理所当然）而是《李小龙传奇》开始了。可这个也同样一塌糊涂——李小龙没有出场，出场的是一个酷似李小龙的莫名其妙的演员。演的倒是李小龙的一生，但痛快地说，电影完全无可救药。可是毕竟进场了，决定看到最后。

放映当中一只猫从银幕前踱着四方步走过。一只硕大的黑猫，就像暗示李小龙英年早逝似的从右至左缓缓穿过舞台。二十秒后又以同样步调由左往右来了一次。

“什么，那是？”我愕然问。

“猫吧。”老婆说。

“电影院怎么会有猫呢？”

可是，猫进入电影院从银幕前穿过在这岛上似乎并非什么稀罕事，谁也没有大惊小怪。就连拿吵闹当买卖做的小孩子们也无动于衷。想必若非马和骡子，他们是不会吃惊的。

电影开始后，孩子们马上盯视银幕变得安安静静。不料这回大人们接盘嘈杂起来。中途进来的人发现场内熟人互相“哟哟”打声招呼倒也罢了，问题是那也没完没了。一团漆黑中居然能分辨对方面孔，端的十分了得。不过话说回来，希腊人视力似乎好得出奇（的确，除了老人，希腊戴眼镜的人少而又少），见面马上“哟哟”两声。

“哟，不是科斯塔吗？”

“怎么搞的，原来是扬尼斯嘛，过这边来，坐坐！还好，你小子？”

“还好、还好。你这家伙呢？”

“啊，我倒还好，可我家里的……”

“你家那位情形不妙？”

“不不那不是的，是家里的她妈，对了，就是科林特斯那个守寡的母亲情形不妙，前天住院了。”

“不好办呐！那，你家那位去科林特斯了？”

便是如此内容（内容是我随便想像的）在后头无休无止。本该回过头吼一句“别说了到外面说去”，可这终究是别人的国家，再说——不知幸与不幸——电影又无聊，于是忍住火气。但其他观众似乎毫不介意，全都默默看电影，无人抱怨。我以为是功夫片所使然，不料下次看罗伯特·安利可（Robert Enrico）——令人怀念啊——的《以爱者的名义》（For Those I Loved）那部影片（非常地道的好影片）时气氛也大体如此。于是我想这恐怕仅仅是一种地方特色。若在四季电影院里如此胡来肯定大触霉头。

另外，希腊放电影过程中，胶片必定“咔嚓”断一两回，场内亮灯十多分钟。这意味第一盘胶片放完接第二盘（或第二盘放完接第三盘）。这不限于希腊，意大利也同样。权当中间休息也未尝不可，问题是方式甚为唐突，让人万分扫兴。本来买两台放映机即可解决，但这里的人们似乎没觉得什么不便，全都趁此时机或上卫生间或吃巧克力或总结前半场或鼓足精神迎接下半场。科斯塔和扬尼斯仍在谈论科林特斯岳母。通道角落里猫一个劲儿舔它的睾丸。小孩子们以椅背为对手“嗨唷嗨唷”练功夫拳。不知谁又大声吹口哨。“室兰·仙台”不失时机地冲了过来。缇坦尼亚电影院的夜晚便是如此野性地越来越深。

---

[12] 日本象棋（将棋）同一步棋允许重复四次，其后判和棋。

[13] 意为“对，今晚都是李小龙”。

[14] Bruegel,活跃于16世纪至17世纪的佛兰德斯绘画世家，父子两代均以绘画闻名。



来自荷兰人的信、岛上的猫

刚到斯派赛斯岛时，打扫房间的阿婆在房子里等待我们递给钥匙。瓦伦蒂娜这样安排的。她说阿婆会为我们打扫房间，并介绍在那里生活的详细程序。这固然求之不得，头痛的是这位老婆婆半句英语也讲不来。她的儿子倒是住在旁边，可他还是小学生，几乎不会说英语。无奈，只能用只言片语的希腊语交谈。以我的希腊语水平，事实上不可能问得很具体，如“这个热水器打开电源后需要等多长时间才能出来热水”以及“炸完东西的油扔在什么地方合适”等等。能打手势的靠打手势解决，其余的只好想开些——车到山前必有路。

“车到山前必有路吧。”我说。

“可你学那么长时间希腊语学什么来着，到底？”妻惊讶地说。我因为想旅居希腊，一年时间里每周去明治学院大学听一次希腊语讲座。

“喂喂，什么热水啦菜板啦漂白剂啦，这些特殊单词教科书上怎么可能出现呢？说到底，你在外语学习方面就是过于追求实用。”

“你也太不追求了么！学法语时也同样吧——《局外人》能读下来，路却问不明白！”

“有什么办法呢，本来就这种性格，说话不擅长的嘛！你若是不满意，别依赖别人自己学不就得了！”

如此争吵时间里，阿婆和儿子一直笑眯眯盯视我们，像是说“这两人在说什么呢”。

“那个就算了，你先问问扔垃圾的事好了，星期几扔在哪里？这可是再要紧不过的。”妻说。

我手指垃圾箱问：“星期几·可以·把这个·拿出去？”

对方听明白了。“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早上。前一天晚上拿出去就可以的。”

“理解了。”

“布拉鲍、布拉鲍（了不起、了不起）！”

“拿去·哪里好呢？”

“跟我来！”

她把我领到扔垃圾的地方。那里离家三十米左右，摆着两个高约一百二十厘米的褐色塑料垃圾箱。垃圾箱上用德语大大写着“垃圾箱”。我问希腊垃圾箱上为什么用德语标明“垃圾箱”呢，回答说因为垃圾箱乃德国制造。我心想垃圾箱那玩意儿自己国家制造不可以么？又不是什么结构复杂的东西。不过反正是德国制造。

“‘嗖’地扔进这里。明白了？”阿婆问。

“理解了。”

“布拉鲍、布拉鲍！”



这么着，我们——实质上是我一个人做的——最初一段时间依照阿婆吩咐在星期天、星期二、星期四晚上连续倒垃圾。但不久我们就得知岛上垃圾收取体系简直是个超乎想像的谜团。反正有人来收是毫无疑问的，毕竟扔出去的垃圾不知不觉之间就消失不见了。问题是何时、何人、如何收取的根本不晓得。不说别的，我就一次也没看见垃圾车或收垃圾人的身影，尽管在几乎不存在车这一物件的如此小的小岛小镇上生活了一个月之久。此乃谜团之一。

另一个谜团是收取日，不清楚什么时候收走的。假定星期一早上倒的垃圾星期三中午消失，那么若问是否总是星期三早上来收，那倒未必，因为下个星期二晚上倒的垃圾直到星期四早上还剩在那里。有时早上消失，也有时下午消失，捉摸不透。

那么，附近人们是不是按时间倒垃圾呢（神奈川县我们家那里对倒垃圾管得异常严厉，致使我养成了小心倒垃圾的习惯），这个也不清不楚。某一天早上8点一齐倒出，另一天下午4点一股脑扔来。也许其中有某种无比复杂的规律性，但至少我理解不了。相比之下，鉴于诸般外围性情由，我看还是认为人们随心所欲倒垃圾、收垃圾人随心所欲收垃圾比较稳妥。

这样，最后我也不再循规蹈矩，改为想倒的时候一倒为快。此乃左巴化的第一步。

但是，说不定你这样认为：那一来，势必有损镇的美观，又臭，猫狗又会抓破塑料袋弄得遍地都是，还要招惹苍蝇，岂不一塌糊涂？

是的，完全如此。两个德国垃圾箱装不下的垃圾袋（也没装好）随手甩在那里，猫和狗把垃圾抓得乱七八糟，苍蝇“呜呜”飞舞，臭气熏天，实在惨不忍睹。既然有那么多游客慕名而来，那么也该多少注意一下卫生才是，我想。

为垃圾目瞪口呆的似乎也不仅我一个。一家名叫《雅典人》（The Athenian）的英文月刊的专栏刊出了一封信，采用的形式是一个荷兰人写给希腊旅游局的感谢信。这恐怕是开玩笑。果真开玩笑，那么玩笑开得也够高超的了。下面引用信的内容。



这是来自最近在希腊度过两周假期的荷兰收垃圾者的信。

“首先要说明一点，鄙人服务的荷兰是个非常小的国家。鄙人的国家一切都收拾得井井有条。因为若不那样，就会带来毁灭性结果。关于收垃圾的规定也极为严密，因而作为垃圾回收者供职的二十五年时间里，鄙人始终遵守规定恪尽职守。那是交给鄙人的任务。所以，此番访问美丽的贵国、目睹厨房垃圾一片狼籍的情景时鄙人的惊愕和欢喜诸位可想而知。路旁、峡谷、海边以及露天垃圾站，垃圾袋乱扔乱放，垃圾破袋而出，赤裸裸坦露在贵国强烈的阳光下，时而招来乌鸦或海鸥为这过目难忘的光景来个画龙点睛。对于迄今为止一直生活在密封式垃圾箱和能够处理密闭式垃圾袋的设备之间的鄙人来说，一连几个小时坐在那里观看废弃物——这才正是鄙人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生活的食粮——理直气壮的零乱景象，实在是令人欢欣鼓舞的体验。我还是第一次目睹零乱得如此美妙动人如此堂而皇之的垃圾，从而获得极为可贵的阅历，作为鄙人惟有感谢而已。”



对上述狼籍景象献上感谢之情的并不局限于来自荷兰的垃圾回收者。是的，这些垃圾恰恰是岛上大部分猫们的宝贵营养来源和赖以活命的最后据点。我推测，假如希腊的垃圾回收者遵守时间、希腊主妇注意垃圾扔法，那么岛上的猫们势必转眼之间减少三分之二。好在一

般不至于出现这种情况，希腊仍会遍地是猫。无论从哪条小巷穿过，无论走哪条路，无论往哪里的楼梯上看，无论走进哪家餐馆，也无论拐过哪个街角，看不见猫的时候基本没有。过去在学校有过这样一次测试——“注意，看这幅画细看二十秒，请闭上眼睛。画中有几只猫？”情形同那个一模一样。各种各样的猫以各种各样的姿势位于各种各样的地方。

希腊猫多有几点缘由。第一，刚才也写了，垃圾在户外随处可见；第二，除去隆冬时节，气候不那么严酷；第三，人们一年有一半时间在屋外吃饭，容易得到剩余食物。大体这三点。对猫来说，是比较好过的地方。

不过，这也是气候好的时候的事，及至秋天来临游客锐减，餐馆关门，猫们能得到的食物便与此呈正比地减少。于是猫们为了苟延残喘而开始激烈争斗。例如我住的房子是三毛猫一家的势力范围。每次看见它们，我都零零碎碎投给剩余食物，但随着秋日向纵深发展，其家庭成员数量渐渐少了。原本一家四口：母亲三毛猫、父亲虎纹猫、白斑猫、黑白斑猫。首先是呆头呆脑的大饭桶父亲被三毛“啪”一巴掌撵出势力范围：“你上哪里一个人折腾去！我光管孩子都够呛了。”其后过了两个星期，到了阴雨连绵相当寒冷的时候，白斑猫不见了，一定是被处理掉了。

岛上这个季节，母猫养一只小猫都很勉强，因此只挑看上去最强壮最有出息的留下，其他的弃之不理。人可以在旅游旺季结束后关上店门去别处做工，幸运者也可以依靠夏天的赢利悠然过冬，可是猫做不到，它们能做的充其量是相互拼命争夺已经变小的馅饼。

仅就原则说来，希腊人对猫们相当宽容，有时是相当亲切的。我家门前有一小块空地，成了附近猫们集会的场所。那里不时放有剩饭，猫们聚在一起如获至宝地大口小口吃着——周围居民特意把剩饭拿去那里倒在报纸上。鱼啦肉啦炖菜啦以及看不出是什么的东西全都集中一处，就好像年底的大锅饭。起初我觉得相当奇妙，因为日本不大可能有如此光景。若那样做，必然有人一面戳脊梁骨说：“那户人家的太太喂野猫，添麻烦！那一来这一带野猫岂不越来越多！”一面却对自己家养的猫疼爱有加。但希腊人不然。除了特殊品种，希腊基本不把猫当宠物。据我观察，他们既不怎么欺负猫，又不特别宠爱。

感觉上他们只把猫作为存在于那里生息于那里的活物看待。一如花草小鸟蜜蜂，猫们也是构成“世界”的一个存在。他们心目中的“世界”——我觉得——便是如此各行其事各得其所，希腊野猫多的真正原因恐怕是他们的这种世界观所使然。



概括起来，虽然都是希腊海岛上的猫，但由于岛的不同，岛上猫的岛民性（请允许使用这个词）也多少有所不一。例如米科诺斯岛和帕罗斯岛和罗得岛的猫就各有不同。至于哪里不同如何不同，具体细说我是说不来的，总之“某处”不同。眼神不同，毛色不同，生活景况不同，待人方式不同，举止风度不同。如同人多少具有岛民性，猫也各有其岛民性，而且——这仅仅是我个人意见——人的岛民性和猫的岛民性在某一部分上是相重合的，至少在局部、在倾向上有共同之处。

譬如我住的斯派赛斯岛不远处有个伊德拉岛。伊德拉岛异常热闹，“一日游”的船每天有几只开来，游客吵吵嚷嚷鱼贯而下。这座岛同样猫多，但伊德拉的猫们同我们斯派赛斯岛的猫们比较起来，二者的性格和生活景况简直天壤之别。

首先，一眼即可看出，伊德拉岛的猫漂亮。毛色滑润，有损伤的猫几乎看不见。亲近人，不胆小，却又不死皮赖脸。在港口附近餐馆里吃东西，总有五六只围上餐桌，但只是静静等待，样子似乎在说：“如果可以的话，您吃完请给我一点儿，一点点就行。”招呼一声就竖起秃尾巴过来，一摸就“咕噜咕噜”发出喉音。感觉非常好。我猜想，大概因为这里游客多，使猫进化得讨人喜欢了。

相反，斯派赛斯岛的猫，招呼它一般也不肯过来，刚要摸就一溜烟跑了，有的家伙甚至发火挠你。较之疑心重，恐怕更是因为完全不习惯人们的这种交流方式。这还不算，提起这里的猫，全都伤痕累累，找不带伤的猫绝非易事。而且十之八九伤在鼻头上。看来，这座岛上的猫一吵架就把爪子抓到对方鼻梁上去。所以无论哪个家伙鼻端都黑漆漆的，就像在木炭上“喀嗤喀嗤”蹭过，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就连喜欢猫的我也喜欢不来。毕竟东西南北全都是一副大宫传助[15]

（说法够老的了）模样的猫们。

这以前我在希腊各种各样的岛、镇、村转过，无猫不带鼻伤的地方还从未见过。为什么惟独这座岛的猫如此执著于攻鼻战法呢？实在匪夷所思。那一来，彼此岂不很快变得丑陋不堪而成为“大宫传助”？结果可谓洞若观火。一如人类禁用生化武器和毒气弹，猫们恐怕也到了谛结禁止攻鼻法协定的阶段。但猫们当然无此才智，因而攻鼻战势必永远持续下去。这类似达尔文所说的一定方向进化，此后没准变本加厉地进行到底。一万七千年后斯派赛斯岛的猫很可能全部拥有坚不可摧的钢铁之鼻。

当然，伤并不限于鼻子。也有的被抓坏了眼睛，也有的被咬破了耳朵，有的无一幸免。我在黄昏的海滩见过一只双耳差不多被咬光的很大很大的黑猫。老实说，那早已不像是猫了，活像从海里出来找腐肉的、住在泥里的不吉祥的四脚鱼。这固然是极端的例子，但斯派赛斯岛的猫所处情况大体如此。猫的心情当然谁也不晓得，不过这地方反正不容易度日。假如托生为猫，我宁可选择去伊德拉岛。

---

[15] 日本早期滑稽剧演员。



斯派赛斯岛上小说家的一天

旅游淡季的斯派赛斯岛上的小说家的生活是怎样的呢？让我挑一天扼要写一下。

起床是早上7时左右。这时周围已经亮了，自然睁眼醒来。即使睡过头，7点半教堂自暴自弃地“咣咣”打响的钟声也会不由分说把人吵醒。妻醒后懒得动，早餐总是我做。

早餐桌上，妻基本上讲她做的梦，梦见什么什么人做了什么什么事等等。时不时我也出现，出乖露丑或从房顶掉下来。不过那终归是别人的梦，与我无关。“哦……唔……真的？”如此应答的时间里，早餐吃完。吃完即跑步。短则四十分钟长则一百分钟左右。回来后淋浴，开始工作。这次旅行期间预定完成的有两本翻译、旅行游记（即现在写的这种东西）加上一部新长篇，所以绝不悠闲。写一阵子自己的稿写腻了，就转移到翻译上去。翻译翻腻了又开始写自己的稿。一如雨天洗露天温泉：热了爬出来，冷了钻进去，如此没完没了。

工作到11点，然后两人上街买东西兼散步。花十五分钟沿海边慢慢悠悠走到镇中心。路左侧是海，右侧一座接一座排列着19世纪建造的老房子。只要风不大，路线甚是惬意，正好散步。海鸥在空中优雅地盘旋，微波细浪缓缓摇晃着海湾里的小船，猫蹲在突堤上晒太阳。据书上记载，过去不存在沿海的路，右侧排列的房子和威尼斯同样直接面对大海，各家有专用码头。道路的出现是进入20世纪以后的事。沿路星星点点建有酒吧式快餐店、烤肉串店、土特产店和咖啡馆。这个季节全部关门闭户。透过格子窗往黑乎乎的土特产店内窥看，但见偶人、壁挂和复制古盘等随处可见的土特产当中有几个形状奇特的细细长长的瓶子。瓶里泡着恰如蝮蛇那样的长蛇。蛇已张着大嘴死了。到底干什么用不得而知，总之落着卷帘门的黑乎乎的土特产店里摆的毒蛇尸体活像杜鲁门·卡波蒂短篇小说里的场景，既妖艳，又有哥特意味。

路上开门的只一家书报亭，一个戴黑边眼镜的老伯从早到晚守在那里。因此人长相酷似博报堂[16]的高桥，所以我们姑且称之为高桥君。高桥君是个十分有趣的人物。首先，此人脸上大凡表情都不具

有，不笑，也不显出困惑……反正什么时候看——无论什么时候——脸上都一成不变。就好像原本雄心勃勃却因部下的失误而不得不下台的总理大臣无可奈何地静静看海，终日盯视海面远处，仿佛在说不久总会有谁坐船带来好消息。这就是书报亭的高桥君。因为每天都同他照面，所以视线相碰时我试着说“卡里梅拉（你好）”，但高桥君只是以含糊不清的语声发出“梅拉（当然是卡里梅拉之略）”或仅仅点头作答。我觉得，无论做什么恐怕都融化不了此人冰冻的心。若让他扮演俄罗斯民间故事中的冬神老人，应该再合适不过。

高桥君的书报亭里摆着香烟、口香糖和风景明信片等等，但我从未见到有人在此买什么，也没见过有人同高桥君闲聊，时时刻刻都是高桥君一个人坐在那里以怃然的神色瞪视大海。地段太差，态度也太差。有一两次我想买点什么，扫视一遍所摆物品，可惜明信片给太阳晒得彻底变白，反翘了起来，根本不能用。而买包香烟吧，我又一直戒烟；口香糖牙医不准我吃——能买的东西一样也没有。自觉歉疚，但又没有办法。这就高桥君的书报亭。

走过这里不远有个面包屋，常在这里买面包。

过了面包屋过了镇公所再前行几步，有座棉纺厂旧址。其实已不是旧址那样温吞吞的东西，早已沦为彻头彻尾的废墟。工厂运转的当时想必是相当气派的堂而皇之的工厂——或者不如说是作为工厂未免堂皇过头的建筑物——如今因之愈发显得寒伧和虚幻。世间偶尔是有这种东西的。惟其动机纯正、外观气派，因而倒霉时格外显得惨不忍睹。所有玻璃不翼而飞，窗框油漆尽皆剥落变色，墙壁到处分崩离析，铁门红锈斑斑，石墙满是涂鸦。每次从前面经过，我们都涌起恐怖感，生怕建筑物“扑通”一声塌下来把我们埋了。后来明白那决非多余的担忧。暴风雨过后的第二天去工厂一看，墙壁的确塌了一大块，把路都堵住了。暴风雨都如此，大地震更不堪设想。

这座棉纺厂是一个资本家为振兴本世纪初造船业萧条以来持续慢性下滑的斯派赛斯岛经济于1920年创建的，但终究命途多舛，战后关门大吉，其后用来生产鱼虾保鲜用的冰块和小规模发电。这也于十年前完成使命，后来一直弃置不管。希腊存在着数目庞大的废墟，但在看到的当中，这是最凄凉的一个。围墙一角用白漆写着“ΠΟΛΙΤΑΙ（出售）”，看情形找不到买主。理所当然，不会有什么

人买这种玩意儿。

从工厂再往前走一会儿，这回是名叫彼希德尼奥的漂亮宾馆，建于1914年。不是希腊旅游景区常见的应急建造的看似高级的宾馆，而是真正用心建成的风格独具的货真价实的宾馆。遗憾的是，在所有意义上都不是现代的。实用性这一概念半点也体现不出来。天花板高得一塌糊涂，尽管只是三层楼，却足有日本王子饭店六层那么高。大厅也大得不着边际，显得空空荡荡。较之空空荡荡，感觉上更像是不知如何摆放自身。我不由担心起清扫来，清扫怕是一场恶战。

据书上记载，这家宾馆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欧洲各国的社交界男女和希腊上流社会闹得红红火火，英国舰队在港外抛锚，一身正装的军官们上岸参加在这宾馆大厅里举行的豪华宴会。现在一切都今非昔比了，宾馆照样营业，但细看之下，到处可以看出有欠自然的气氛。古旧之物诚然精美，但精美之余又有挡不住的风化，相形之下，新加上去的东西固然新颖，但比之旧物明显逊色——这种不协调感让人心里发冷。

空空荡荡的大厅里头的服务台坐着一个一副百无聊赖神情的女性，一看就知闲得发慌。我问房间价格，她抬起脸来不耐烦地应道：“哦？房间价格？呃——，四千德拉克马。”言毕又低下头去。左看右看也不见像是游客的身影。三楼阳台上晾着浴室地垫。本想在此住上一次，但这家宾馆也以10月28日国庆日为最后一天关门了。从宾馆右拐即是港口，开始进入镇中心。

若天气暖和，就坐在港口咖啡馆里，边喝咖啡边看《先驱论坛报》（HERALD TRIBUNE）。岛上只有《先驱论坛报》算是地道的英文报纸。即使为了把握世界形势、为了把握美元和日币的汇率，这份报纸也是必不可少的。报纸上大大报道了中曾根首相那个关于“美国知识水准的发言”[17]。总体上是对其大加笔伐，但一天读者来信栏中刊出了美国一个日本通的来信。信中说，日语中的“知识水准”和“智能水准”是不同的。日语所说的“知识”含义比“智能”宽泛得多。中曾根先生的发言诚然非常轻率而Silly（愚蠢），但严格说来，“知识水准低”的说法并不意味着Negro（黑人）和Hispano（西班牙血统美国人）是傻瓜。话说得既好像明白又似乎不明白。老实说，我心想与其拘泥于这种语汇性细节，还不如研究中曾根作为政治家的“智能水

准”的麻木不仁来得痛快。

回家做午饭。用一种名叫“迈达能”的惟希腊才看得见的香草做的“希腊风味迈达能意大利面”。吃罢午饭大体是工作，也有时出去钓鱼。说是钓鱼，其实非常简单：把过期的奶酪和面包加少量牛奶捏成圆粒作鱼饵，坐在突堤上垂线下去，一小时即可钓上四五条十多厘米长的鱼。大多是不怎么好看的黑色的鱼，一副俨然克劳斯·金斯基[18]的倒霉相，无论如何都没情绪食用，遂投给常来我家的三毛猫一家。猫们特别中意这种黑鱼，兴奋得大吃大嚼，所以意外好吃也说不定。希腊这个国家虽然环海，却很难钓上——除非是高手——像样的鱼。好在水惊人地清澈透明，眼睛从上面可以清楚看见鱼在钩附近往来游动。从上面俯视，不难得知鱼这东西其实蛮聪明的。多数鱼只斜眼（我以为）瞥一下鱼饵而径自通过，上钩的鱼属于例外中的例外。一边听尼尔·扬（Neil Young）和杰西·温彻斯特（Jesse Winchester）[19]（杰西·温彻斯特！）一边怔怔地俯视之间，时间随着流云悠悠然离我而去。

晚饭一般6点开始。几乎所有时候都是老婆做。有时扒牛排，有时炸沙丁鱼，有时做鲷鱼饭，有时炖青菜，有时醋渍竹荚鱼……总之使用当时弄到手的东西来做。冬日的希腊乡下，弄到食品种类的情况一天比一天严酷，甚至一天几乎什么都弄不到手的日子也不是没有。比如鱼的捕获就取决于海，糟糕天气若持续不断，有时一星期都根本弄不到鱼。肉铺一星期来一次肉，错过机会就很难买到好肉。海上风急浪高，从本土运送蔬菜的船也停航了（岛上种的菜固然好吃，惜乎品种有限）。因此，在希腊自己做饭，随机应变这一点分外重要，若过于讲究食谱，很可能什么都做不成。

实在没菜可做或懒得做的晚上，就去附近帕特拉利斯的餐馆吃。帕特拉利斯的餐馆也是因为离镇中心不很远的缘故，旅游淡季彻底成了以当地居民（罗克）为主的餐馆。窗边餐桌时常聚有五六个老伯，一边喝乌糟酒葡萄酒，一边大声喧哗或一起看电视新闻。这些人一般不会要下酒菜和正规饭菜。也是由于时间还早的关系（普通希腊人9点左右吃晚饭），像我们这样正正经经吃晚饭的几乎见不到。我们在桌旁坐下后，和大家一起说说笑笑的帕特拉利斯①老大不情愿地拿菜单过来，似乎在说这两个人干嘛来这么早。帕特拉利斯的餐馆有两个

老伯和一个中年妇女（此人至少淡季不怎么干活）干活，但我直到最后也没弄清哪个老伯是帕特拉利斯。姑且把耍滑头的那个叫帕特拉利斯①，认真的那个叫帕特拉利斯②。帕特拉利斯①往好里说是社交型，往坏里说是敷衍了事那一类，可谓某部分希腊人的典型。话说到兴头上，我从餐桌这边举手示意，他也全然觉察不出。我说“对不起请拿葡萄酒来”，他也只是应一声而并不拿酒。以为他正忙什么，一看，却见他稳稳坐在两个英国女孩餐桌那里一个劲儿教对方练希腊语，实在有点儿令人忍无可忍。淡季这个因素想必是有的，但至少该表现出工作积极性才是。相比之下，帕特拉利斯②总在烹调台里一个人静静做准备。每次去烹调台看鱼，他都热情告诉我这个好味道。帕特①不在的时候他也出来接受点菜，闲下来就独自坐在里面的椅子上放松。或许这也可以说是希腊人的一个典型。任何国家都有各种类型的人，社会也因此得以成立。

中年妇女则每每坐在餐馆角落里写什么，时而一闪往整个房间打量一眼，说不定对帕特拉利斯①的工作态度有所不满。人长得胖乎乎的，不折不扣的希腊母亲那一类型。我在路上寒暄或简单搭了几次话，给人的感觉极好。只是，直到最后也没明白她是哪个帕特拉利斯的太太。在角落餐桌那里同帕特②坐着静静说话，觉得像是帕特②的太太；因为客人怎么等也不送菜单过去故不耐烦出门离去而训斥帕特①——“怎么搞的，你！要正经干活的嘛”——的时候，又觉得她大概是帕特①的太太。无法判断。

“到底怎么回事呢？”老婆问。

“是啊！”我把干炸沙丁鱼作为下酒菜，斜举着白葡萄酒杯，开始驱动想像力，“滑头帕特拉利斯①是真正的帕特拉利斯，是那阿姨的丈夫。帕特①本来是船员，年轻时候满世界跑来跑去，拈花惹草，活得相当快活。但由于海运业不景气而丢了工作，只好返回老婆娘家所在的这座小岛，开起了餐馆。太太是比较能干的人，为开餐馆攒了一笔钱，又从娘家多少借了一些，肯定。问题是帕特①生性轻浮，沉不下心工作，忙的时候也跑出去游逛。于是太太担心起来，跑去娘家哥哥那里相求：‘哥，你就训训他嘛！我怎么说他都当耳旁风。’她哥哥应道‘那好我去试试’。此人倒是好脾气，帕特①对他说‘大道理就别讲了帮帮忙吧现在正忙着’，他心想倒也是，随即留下帮忙，一晃儿六年

过去——这么认为如何？”

“究竟如何呢……”老婆表示怀疑。看样子并不怎么欣赏我的想像力。

这天要的是白葡萄酒一瓶、干炸沙丁鱼一大盘、希腊风味色拉、炸鱿鱼、小鲷鱼四条、煮菜豆，大约一千五百日元。不管他们三人是什么关系，菜可是价廉味美。餐馆后面有个临海的院子，暖和季节可以在外面一边闻海潮清香一边受用做好的鲜鱼。

顺便再写一下附近的事。“帕特拉利斯餐馆”旁边有一家阿纳尔基洛斯开的小超市。虽说是小超市，其实也就是日本小巷里的粗糕点铺那样的规模。从甘蓝、橙子到火腿奶酪牛奶啤酒信封以至卫生巾，密密麻麻一股脑儿堆在里面。挑选自己喜欢的品牌固然不可能，但最为生活所必需的东西来这里大体可以解决。当然，也有大概是吉米·卡特当总统那时候卖剩下的清仓查库商品，这点必须注意。例如买了两瓶矿泉水，却见瓶底双双长了一层很厚的绿苔。我不精通植物学，具体的不大清楚，但在密封的矿泉水里繁殖绿苔想必需要相当漫长的岁月。就算店里再暗，不觉不察地卖这东西也是不应该的。我前去提意见，阿纳尔基洛斯到底惶恐起来，赶紧换了新的，把手放在我肩上，十分抱歉地说：“对不起啊，不知道的，请原谅，不好意思。”

“没关系，也没什么。”我说。

“瓦伦蒂娜认识吧？她是我的朋友。”说着，阿纳尔基洛斯亲热地咧嘴一笑。看来瓦伦蒂娜跟谁都能马上成为朋友。

自从绿苔事件以来，阿纳尔基洛斯对我相当友好，教给我用奶酪钓鱼的也是他，停电和气候方面的信息同样是他告诉的。他讲极其蹩脚的英语，我讲相当糟糕的希腊语，因此我们的交谈只能呈现出线路不好的长途电话般的景况。尽管如此，我仍对阿纳尔基洛斯怀有好感，他也对我热情有加。说老实话，在岛上居住的一个月时间里作为结下个人友情的对象也就阿纳尔基洛斯一个人。当然不是说岛上其他人对我们冷淡，在路上相遇时对方微笑寒暄，每有机会都亲切地接待我们。只是，这里并非游客纷至沓来的热门海岛，人们还不大习惯同外国人打交道，何况对自己的英语也没什么自信。在餐馆做工的人会说生意上最低限度的英语，但话题稍微偏离一点点就耸耸肩闭紧嘴

巴。我的希腊语若多少流利一些就好了，但实际情况并非那样，所以不可能发展出个人交情。况且——老婆也时常指出——本能上我有一种回避深入发展个人交情的倾向，这也使得情况雪上加霜。

不过对于阿纳尔基洛斯，我倒是能够比较自然地同他接近。他四十光景，个子不高，一副总像在梦想什么的表情，说话时浮现出难以捕捉的微笑。说话声音小——作为希腊人很少见——慢条斯理，和颜悦色。能干，早上8点开到下午2点，傍晚也开店三个小时。总是一个人劳作，大概是一个人吧。店里始终光线不足，闲的时候坐在对面石围墙上同帕特拉利斯②或附近哪位太太聊天，客人来时就浮起同样的微笑，穿过马路返回店去。店里不时有猫睡觉。看样子此猫认定阿纳尔基洛斯是自己的监护人，总是在纸壳箱上蜷起身子睡得有滋有味。

每次我念购物单，阿纳尔基洛斯都低声复述一遍：

“鸡蛋十个”——“迪加·阿布嘎”

“啤酒六瓶”——“埃克希·比雷斯”

“水一瓶”——“埃纳·涅洛”

“大蒜”——“斯科尔多”

把东西装进塑料袋后，他在便笺上写下价钱计算起来：“42，26乘6，2……一共572德拉克马，佩塔科希埃斯·埃布造米恩达·迪奥。这是鸡蛋，这是啤酒……”逐一把价钱告诉我，亲切、易懂。

离开岛时照了纪念相。他似乎对照相机感兴趣，这个那个问了不少：“这个不错嘛，唔，美能达？新产品？”他问在日本买多少钱，我告以价格，他说：“呃——，希腊这种东西关税高，在这里买要贵出一倍，我这样的无论如何也买不起。”看样子极想得到照相机，但我工作要用，无法转让，再说旅行者把带进希腊境内的机械类物品卖掉或送人是违法的。

走过阿纳尔基洛斯的小店，前行不远即是海岸。海岸上只有一座无人的小教堂和帆船出租站建筑物残骸。靠近海岸有个很大的寄宿制学校，学校有比人略高一点的长围墙，里面鸦雀无声。从其前面经过了好几次，但根本感觉不出墙内有人的动静，而入口倒是有个煞有介事的门卫房，又有门卫的身影，不像是已经关门。料想墙内确有学生上课。

岛的导游手册上介绍，这是有感于英国的公学（Public School）

制度的希腊富豪们为使这一制度在希腊落地生根而在战前创办的学校，以便希腊精英的儿女离开大城市在此接受英式教育。教师里面也有不少外国人，年轻时约翰·福尔斯[20]（《收藏家》的作者）也在此当过英语教师。他在《魔术师》那部小说里对这种希腊版公学制度装腔作势的贵族派头进行了相当辛辣的冷嘲热讽，有兴趣不妨一读。斯派赛斯岛成了小说舞台，岛的历史也是小说的重要背景。作为小说主人公的拥有岛的一半的神秘富翁生活中实有其人。小说本身也妙趣横生，虚虚实实一波三折，情节编排十分了得。只是，整体协调欠佳——福尔斯的小说大多如此——时常为其手法的捉襟见肘感到难以忍受。

不知是不是因为受了福尔斯小说的影响，来此岛旅游的人大部分是英国人。

吃罢晚饭，外面彻底黑了。我在起居室里听着音乐看书，老婆或写日记或给朋友写信或计算钱款或莫名其妙地自言自语什么“啊讨厌讨厌讨厌上岁数”。寒冷的夜晚往炉里添柴生火。眼望炉火发呆的时间里，时间惬意地静静流逝。没电话打来，没截稿期限，没电视，什么也没有。只有火在眼前“哔哔剥剥”。沉寂委实美妙至极。喝光一瓶葡萄酒，斟一杯威士忌干喝之间，困意隐约上来。看钟，差不多10点，就势美美睡去。既像做了很多很多事的一天，又像什么也没做虚度一日。

---

[16] 全称为博报堂株式会社，日本综合广告公司，主要代理出版物广告业务。

[17] 时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曾指责“美国知识水准低”。

[18] Klaus Kinski，德国著名男演员，主演有《陆上行舟》、《魔鬼访客》等。

[19] 均为加拿大摇滚歌手。

[20] 英国小说家（John Fowles，1926—）。



暴风雨来了

据导游手册介绍，斯派塞斯岛平均年降雨量约四百毫米，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三百天不下雨。雨日集中于11月至翌年4月这一期间。不过，一如导游手册同时交待的那样，这当然是approximation（概算）、是statistics（平均统计值）、是it depends（因时因地而异）。这点我也清楚。问题是，就算再it depends，斯派塞斯岛10月后半月的气候也过于离谱。本该不怎么下雨的10月下半月十六天中有八天下雨，其中四天居然是暴风雨，雨量足有二百毫米之多。我们实实在在的感受是：这恐怕是有点例外。究竟有谁会明知有暴风雨还偏来希腊海岛呢？

当然，爱琴海有暴风雨我是知道的。其实我在来岛途中的水上飞船里面刚刚重读完欧里庇得斯的《特洛伊妇女》。

> 雅典娜：……首先由宙斯卷起遮天蔽日的旋风，降下足以冲走车轴的雨和冰雹，借来宙斯的雷火烧毁希腊船舶的约定也已成功。下面就轮到你波塞冬了，你要让爱琴海怒涛翻滚、大潮奔腾……

> 波塞冬：明白了，我既已决心帮忙，便无须多言。那么就让爱琴海波涌浪翻，让米科诺斯海滨、提洛岛石滩，还有斯基罗斯和利姆诺斯诸岛、卡佩列乌斯海岬铺满死人的尸骸……

（千曲文库《欧里庇得斯》）

即使不上溯那么久远，电影《纳瓦隆大炮》[21]也有暴风雨出现。《希腊左巴》那部影片中一开头就好像是比雷埃夫斯的倾盆大雨。是的，希腊当然也有暴风雨袭来。不过说老实话，我做梦也没想

到会在爱琴遭遇暴风雨。说起雨具，只有离开日本时忽然担心可能下雨而带的一把快坏了的小伞，并且那也忘在哪里了。然而这当儿完全可以说是晴天霹雳的狂风暴雨朝着连把伞也没有的我们两人头上猛扑过来。

还一点不巧的是，我们全然不晓得暴风雨的到来。如果知道，我们当然会做相应的准备：购买应急食品和饮用水、备好蜡烛、找伞的时候觉察伞已丢失。但因为家里一无电视二无收音机亦无报纸，什么消息都传不进来。只是前一天邻居哈里斯来用英语说了句“Mr Murakami[22]，明天下雨哟”，后来在路上碰见附近一位热情好客的未亡人阿婆时，她也大大举起手，告诉我“萨·布雷克萨·阿布里奥、萨·布雷克萨（明天下雨，雨！）”。而我却仅仅以为今天好多人谈雨。或许的确是我马虎大意了，也可能该注意到气氛有些异样才是。可是我又这样想：明确提醒我“是暴风雨”也未尝不可嘛！轻描淡写说一句明天下雨，断不至于想到会是暴风雨。

雨是从得到忠告的那天（10月27日）下午开始下的，如暴风雨前哨站的简洁而剧烈的雨。倒霉这东西总是有其前兆，如今想来那场雨即是如此。睡午觉时雨开始一泻而下，注意到时家里的地板已然浸水。为什么下大雨地板会浸水呢？原来房内的地板同外面的阳台完全持平，其间没有门槛那样的东西，所以雨稍大房间便成泽国，一点也不奇怪，理所当然。那么，为什么不做门槛呢？这个我也不晓得，问我也没用。

反正我们一边嘟嘟囔囔发牢骚一边用抹布和旧《先驱论坛报》等物擦地板上的水。不料一小时后雨戛然而止，天又晴了。所以没以为是暴风雨的前奏。这也是倒霉前兆的主要特征之一。事后才意识到“原来是那么回事”，但意识到时为时已晚。

我们上街在快餐店吃了三明治，喝了啤酒，之后去缇坦尼亚电影院看了罗伯特·安利可的电影。看罢电影回家喝白葡萄酒睡觉。

真正的暴风雨将我们裹入其翼下是在翌日即28日早上。10月28日为“拒绝日”，对于希腊人来说是具有相当重要意义的节日。大概是由希腊拒绝纳粹德国的要求而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或其他什么而来，

详细的不大清楚。总之是节日，有各种各样的演出活动和游行，所以我们也满怀期待，准备把那种热闹场面拍摄下来。然而如此心情随着一大早的电闪雷鸣不翼而飞——便是这般厉害的雷鸣，以致我心想没准希腊参加第三次世界大战了。“轰隆、轰隆、轰隆隆”，简直像从战舰上开炮一样一声接一声，并且越来越近，“哔哔剥剥”撕裂大气，犹如宣告世界玩完的火柱从四周拔地而起。实在很久没见到这么嚣张的霹雳闪电了。我枕边的钟针指在早晨6点往前一点点的位置。四下还黑着，夹在雷鸣中的剧烈雨声也传进耳鼓。我只好起身，折起《先驱论坛报》塞进门窗底下，以免水进来。塞罢，烧水做咖啡，同老婆两人喝着。每隔两三秒便“轰隆”一声响，闪电把房间染得一片青白，不时传来地表被一只巨手剥开般的“喀嗤喀嗤”声。每有闪电划过，我们都不由往窗外看去。

“简直是暴风雨，这个！”我说。随即边喝咖啡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早上不到6点起床，雷雨，俨然暴风雨。得得，到这个时候我都没有察觉这便是真正的暴风雨。

至于这雷雨持续了多长时间，现在回头看日记也找不出准确记述。日记相当粗疏。但记得这样想来着：世上居然存在如此数量的雷鸣！因此估计持续时间相当之长。过去西宫球场有所谓“四大鼓手世纪对决”，在吵闹和执拗这点上，二者不相上下。

雷声过后，雨一口气下个不停。作为无伞之人，一步也外出不得。好在有一定程度的食品贮备，心想不外出也罢，于是终日坐在桌前写作。傍晚时分，房后“哗啦哗啦”响起似乎什么东西倒塌的声音，还有人的喊声。打开木板套窗一看，只见房后果树园的石围墙像被谁连根挖除一样倒塌在地，几个身穿黄色雨衣的人围着七嘴八舌说什么。可话说回来，这石墙也太容易倒塌了。不久，第二次黑了，雷声又“轰隆、轰隆”响起。房子里所有东西都又湿又凉。

翌日早上，雷声依然响彻四方，而且比前一天还要可怕。不单单响雷，还切切实实刺穿我们四周的大地、摇撼山峦、劈裂巨木、撕开天穹，其气势恰如宙斯亲自披挂出阵，将雷之粗箭“飕飕”射向大地。果不其然，我不由心悦诚服，希腊悲剧有的部分也还是要亲临希腊才能实际感受得到！但不能感佩很久——雨又浸上了地板！门下塞的报

纸已经湿漉漉的再不能吸水了，而备用报纸又没有，雨又没有止息迹象。10月29日早上5时，这时我才认识到这其实就是真正的暴风雨。可是为什么还来暴风雨呢？没有伞，吃的东西也没多少了。家里存的食品只有一点点——够吃一顿——的意面、西红柿、黄瓜、少量熏肉、元葱、蘑菇罐头、咖啡。今天一天还对付得了，明天心里就不踏实了。若再停水断电，那就一切休矣！米也好意面也好都生嚼不得，矿泉水也只有一瓶了。

“不要紧么，吃的东西只这么多了。”老婆担忧地说。

“不要紧，”我说，“再厉害的暴风雨，中间也必有一下子雨停的瞬间，像幕间休息似的。那时候就一阵子跑到阿纳尔基洛斯那里买食品。而且到他那里还可得到暴风雨的消息。”

“雨真的那么巧停下来？”

“保证停的。我在关西长大，对台风的脾气相当了解。”

“若是希腊台风和日本台风一样脾气就好了。”她面带怀疑地说。她不大信赖我在世俗领域的能力。

然而一如我预言的那样，近午时分雨忽然停了。风也停了，云也散了，就好像持续到刚才的暴风雨压根儿不存在似的，惟独伯罗奔尼撒半岛那边时而传来沉闷的雷声——进入了台风间歇时间。我沿着满是积水的路跑到阿纳尔基洛斯的小店。平时走的近路已化为河流。在阿纳尔基洛斯的小店买了两袋苏打饼干、甘蓝、马铃薯、两瓶矿泉水、葡萄酒。阿纳尔基洛斯以对暴风雨满不在乎的神情把数字写在纸上，依然慢悠悠算账。

“暴风雨啊！”我说。

“嗯。下了很多雨。”

“还下不下？”我试着问。

“是啊……或许下，或许不下……”阿纳尔基洛斯笑吟吟地说。

就是这样，希腊人说话时常极有哲学意味，但我不可能一一感佩下去。必须赶在再次下雨之前回到家。从云的情况看，不大可能有去面包铺的时间。回家路上四下一看，石围墙到处土崩瓦解，有的地方甚至长达七八米整个没了踪影，说严重也够严重的了。的确下了为量不小的雨。不过满城围墙因为这个程度的雨就分崩离析也端的令人费解。凑近细看我才明白难怪崩塌。为什么呢？因为实在粗糙不堪——

很难说是简洁——首先“通通”垒上石块，再用泥土那样的东西填缝，最后外面抹一层厚石灰，这就算大功告成。所以，看上去固然甚是美观，但大量雨水渗入后，里面的结合马上松缓，轰然崩塌。我这人对建筑工程学自是一窍不通，但这点事还是明白的。回到家跟老婆讲起石墙，她笑道：“雨停了，大家还会马上如法炮制。”我说：“无论如何总该思考一下的吧，毕竟晓得经受不住大雨的了。”

“你怎么还不清楚希腊这个国家？”老婆说，“就是这样的国家。不是说好坏，不是说正确不正确。”

“不对。”

“雨停你就知道了。”

十多分钟后，雨又下了起来。我一小口一小口呷着威士忌继续写作。3点响了一阵子雷声，5点又有了一次。我把所有的抹布和新报纸统统塞进门底下堵水，同时蓦然心想人为什么非打仗不可呢？本来人生中的苦难——暴风雨啦洪水啦地震啦火山喷发啦海啸啦饥馑啦癌症啦痔疮啦累进税啦神经痛啦——已经不计其数了，为什么还要火上浇油地发动战争呢？

雨好歹止息已是翌日即10月30日中午12点多了。雨就好像说“啊累了就下到这儿吧”似的痛痛快快偃旗息鼓，遮蔽天空的乌云如细胞分裂一般哗然散开，北风一鼓作气将其吹跑，蓝天从云隙间一闪一闪探头探脑。不过，伯罗奔尼撒半岛那边仍有乌云层层囤积，似乎气乎乎地说事情还不算完。

我说反正得趁天晴上街买把伞去，随即独自出门，沿着海滨路往镇那边走去。但由于山上冲下来的沙土挡路，走到棉纺厂前面再也前进不得，只好退回来走那条靠山的路，暴风雨给岛上带来的灾害意外之大。道路点点处处豁然塌陷，树木横躺竖卧。路面上什么布娃娃啦垃圾箱啦坏掉的椅子啦简直就像集市散后的场地，零乱扔着种种莫名其妙的东西。还有连根冲来的紫茉莉花沿河道堆积如山。看样子，是这紫茉莉花挂在桥梁上堵塞了河流，致使浊流流入镇里。紫茉莉花原本在干涸的河床沙滩上开得铺天盖地。

河岸人家的人们用洗脸盆、扫帚往外扫着灌进房里的水。一个身穿黑色衣服的小个子老太婆一边朝天举起双手比比划划，一边以无比

激动的神情向过往行人讲述其遭遇的灾难："那是昨天半夜里哟，水'呼隆'一声涌了进来，莫非有神什么的不成？"果然像是被梦中劫营，家具、地毯全都成了泥猴。也有人把那些拿到门外用软水管冲洗。老太婆好像怎么说都不解气，又逮住其他行人挥舞双手。可怜之至！不过另一方面，在河口一带堆得高高的无数紫茉莉花的残枝败叶竟那般多姿多彩有声有色。目睹如此多的紫茉莉花这是第一次，恐怕也是最后一次。

2点过后，太阳这回也一鼓作气像弹出来一般陡然露脸，让一切都闪闪生辉炫目耀眼。积水清晰地映出云影，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小鸟在仍滴着水的树枝间飞来飞去，两只海鸥一左一右分别落在彼希德尼奥宾馆两个塔尖。藏在哪里避雨的猫们也似乎饥不可耐地出现在路上。腋下挟着几把旧伞的修伞匠唱歌一样叫着"昂布雷拉、昂布雷拉"在镇上走动。暴风雨过去了！

两天后，人们开始维修镇上倒塌的石围墙。不用说——不出老婆所料——施工法一如从前。我们在路旁目不转睛看着工匠们。他们动作麻利地大致摞了摞石头，把泥巴那样的东西（或者不是泥巴亦未可知，却也不是水泥）"吧嗒吧嗒"塞入石缝。看样子，他们砌围墙砌得极其幸福，也算得上极其认真。石头的砌法简直可以称之为艺术。看这样的作业确实开心，看一整天都看不够。效果也甚是美观，较之水泥预制块墙可谓霄壤之别。只要不下大雨，确实是漂亮的围墙。

"几年后再下大雨，"我说，"又得倒塌。"

"塌了再砌就是。"老婆说。

是的，他们已如此周而复始了几千年。看来我还是成不了希腊人。

---

[21] The Guns of Navarons，美国电影。又译《爱琴岛六壮士》。

[22] 意为"村上先生"。Murakami是"村上"日语发音的罗马字母拼写方式。


米科诺斯



米科诺斯

想都没想过会在米科诺斯岛生活。米科诺斯我也去过两次。蛮漂亮的岛。不过老实说，我觉得它太有旅游味道了。前去游玩诚然有趣，但不是生活场所。写作需要安静沉稳些的海岛。

然而归终我还是在米科诺斯住了一个半月之久。假如不接着决定去西西里，估计还要多住些时日。

把米科诺斯的residence（住宅）介绍给我的，是一个名叫英奇的在雅典一家旅行代理店工作的美国女孩，二十刚过，长相相当可爱。我去她工作的房间，提出想在一座安静的岛上租一套按月出租的带家具套房。斯派赛斯的房子固然不坏，但毕竟是作别墅用的，过冬过于寒冷，天天冻得发抖，除了烧柴的火炉概无取暖设施。拾柴拾得累了，再说下起雨来柴都发霉，很难生火。很想搬去暖和些的房子。在那种地方光一个冷字都够对付了，写作根本无从谈起。

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令人满意的房子。我原以为时值旅游淡季，房子手到擒来，而这过于天真了。在旅游淡季，岛上面向游客的短期出租房几乎全部关闭。没有客人还开着，房主徒添麻烦。没有需求，即无供应。我一筹莫展，英奇也为之不忍，试探了几个地方，但是连房主都未能抓到，全都跑到哪里游玩去了，毕竟忙碌了一年，想喘口气。

最后，英奇说道："对了，那里怎么样呢？那里一年到头都有人管理。"随即问我："嗳，米科诺斯如何？我想那里肯定有一处是开着的。"

米科诺斯？不过也好，只要有房子都足以令人感激涕零了。

英奇当即打电话询问。OK，一个两张床的房间、一个客厅、厨房、浴室，还带有宽大的阳台，视野十分开阔。房租七万德拉克马。不坏，拍板定下，先住一个月再说。

"跟你说，我想你一定中意那里的。"英奇说，"我也在那里住过一个星期，安静，好得很。"

※

米科诺斯岛同样是淡季，店铺有三分之二关门。但反过来说，有三分之一开着，这和斯派赛斯不同。再是淡季，米科诺斯多少也还是有游客来的。所以，土特产店、餐馆和旅馆也都相应有几家营业。夏季一天开来六班的观光船减至两天一班。但反正多少有人往来，若干生意也因之得以成立。

秋冬季节来米科诺斯的，或是利用淡季优惠价出游的北欧靠退休金生活的年老市民（这些人有个想慢慢悠悠安安静静旅行的大前提，所以选择这一季节），或是日本的旅行团（多是新婚）。不过，若问淡季来米科诺斯是否有趣，作为我还是不得不划个问号。那以后我也大体在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来过米科诺斯，觉得冬季特意花钱来米科诺斯恐怕意思不大。当然这是我个人意见。凡事都各有喜好，若当事人自称为冬季来米科诺斯深受感动，那倒也罢了。米科诺斯的居民倒是问过我几次：日本人干嘛都专门趁11月、12月、1月这寒风凛冽的时候赶来米科诺斯呢？这种时候来有什么好玩的呢？

每次我都这样向他们解释：秋天对于日本人是最佳结婚时节，所以来此新婚旅行。既是新婚，多少冷一点儿也无所谓，这样正合适。他们听了，大多表示理解。另外日本人还搞“正月旅行”，有所谓正月里的南欧和爱琴海等包装性字眼，从语感上说的确暖和得可以。

但明确说来，这是大错特错的。以前也说过，爱琴海并非关岛和夏威夷那样的常青岛。大部分日本人似乎以为爱琴海的岛屿位于赤道附近，可在地理上，米科诺斯岛同东京基本处于同一纬度。总之不管谁怎么说，冬季都是很冷的。而且米科诺斯这地方风非常大，几乎能把地表所有物体一扫而光。风又冷又潮，一旦刮起来，强风起码持续三天，从早到晚一刻不停。整个夜晚发疯一样咆哮，刮倒灌木，吹得窗扇“咔咔”作响。天气也不好，动辄下雨，有时甚至下雪。街上空空荡荡。游泳当然不行。美味餐馆四门紧闭，旅馆员工无心服务。特意跑来这等地方，徒然落得挨冷受冻，失望的人想必不在少数。若是来玩，无论如何还得夏季。旅游旺季人多也好，旅馆满员物价攀高本地居民不高兴也好，附近迪斯科吵得睡不着也好，米科诺斯也还是夏季乐不可支。那已是一个节日。

不过，就结果而言，尽管气候如此恶劣，不，正因为气候如此恶

劣，淡季中的米科诺斯才成了我静静工作的再好不过的环境。房子住起来舒服，加之无其他事可做，我得以集中精力工作。我译完了C·D·B·布赖恩的《伟大的德斯里夫》（The Great Dethriffe）。小说相当长，但引人入胜，我一心想尽快译完然后写自己的小说，每天吭哧吭哧译个不止。当时还没有使用文字处理机，用自来水笔密密麻麻写在大学笔记本上。

《伟大的德斯里夫》最后译罢，就斯派赛斯岛的生活写了几篇类似随笔的文章（即收在这里的文章原型），之后迫不及待地创作小说。那时候横竖想写小说，全身急得发痒。身体为寻求语句而如饥似渴。必须等到关键时候才“投入”自己的身体。长篇小说这东西不等到最后一步是不能动笔的，一如跑马拉松，若迄今为止的调整失败，往下相当长一段路就坚持不住。

这部小说就是后来的《挪威的森林》，此时尚无书名。本来是以写三百至三百五十页四百字稿纸的一气呵成的小说那样的轻松心情动笔的，但写到一百页左右的时候得知这样子下去三四百页无论如何也完不了。自那以来至翌年（1978年）4月，我就在迁往西西里、罗马过程中一味泡在小说里，归终成了九百页稿纸的小说。



在米科诺斯生活期间记得最清楚的是夜间的酒吧。日暮时分，我们常上街喝酒。米科诺斯酒吧到处都是。白天我基本一个人闷在房间里写作，老婆看书、学意大利语或在向阳的地方逗猫玩。交谈之类几乎没有。因此，天黑下来两人去酒吧，边喝酒边东拉西扯。我也需要借酒放松，缓解白天的紧张。

米科诺斯的酒吧相当不坏，既不土里土气，又无自命不凡的派头，价格也算便宜的。旅游旺季难免盯住外国游客的钱包，收费相当不菲，但淡季里因客人几乎全是本地人，价格自然降下。两人差不多各喝三杯鸡尾酒，要一点小菜，大致一千日元刚出头。不单单喝酒，和店里的人天南海北闲聊获取当地情报，对我们来说也是为数不多的娱乐之一。

我常去的是“莫尼卡酒吧”、“米诺陶洛斯酒吧”和“托马斯酒吧”。

米科诺斯的酒吧由于过度竞争而时常摇身一变，这些酒吧如今恐怕也不复存在了。经常和在“莫尼卡酒吧”打工的法国女子（名字忘了）说话，她个头不高，表情丰富，估计和我是同代人。“已经在米科诺斯住十几年了，”她说，“年轻时一晃儿来到这里，就被这座岛迷住，后来哪里也去不成了。”米科诺斯有很多这个年纪的欧洲人，即所谓战后出生高峰一代。他们以嬉皮士溃退之势摇摇晃晃离开西欧社会，在此岛定居下来。希腊的岛屿时常可以见到类似当时的共同体（commune）残余那样的人物。不知何故，当时的嬉皮士特别中意海岛。

她被米科诺斯迷得神魂颠倒，说她就连邻岛都没去过，罗得岛和桑托林岛也没去过。“我有米科诺斯，为什么非去其他岛不可？”

“莫尼卡酒吧”是一个叫莫尼卡的德国女性经营的，到了夜晚，感觉上这里往往成了住在米科诺斯的外国人聚会交流的场所。大家都很寂寞，晚上就聚来这里喧哗。因此，不时热闹过头是这家酒吧的一个缺点（此外还有卫生间冲水不畅）。不过，正因是德国人经营的，德国风味的家庭式饭菜十分可口，天冷的日子每每来这里喝德式热汤、吃炖豆角和煮香肠。

“米诺陶洛斯酒吧”的老板是和英国女子结婚的希腊人，此人喜欢爵士乐，有几张渡边贞夫[23]的唱片，我每次去都放给我听。“淡季总是去伦敦生活，”他说，“但今年夏天生意不怎么好，冬天也开着。因为那场恐怖传闻闹得美国人不来了。”

他天天教我一点希腊语。人很沉静。细品之下，数他这家酒吧的鸡尾酒够味儿。是用新鲜水果做的，做得很认真。下酒菜虽然只简单几样，但味道不坏。酒吧一如其人，比较安静，并且总以适度音量放轻柔些的爵士乐。“夏天的确赚钱，”他静静地说，“可是我讨厌夏天，讨厌米科诺斯的夏天。夏天一切都没有章法，7、8月份简直昏死过去，干活时一直计算夏天还有几天过去。人人如此，人人讨厌得要死，忍无可忍。没有办法才干活的。这样的季节就好得多，这才是真正的生活！”说罢，他摇了摇头，言语之间沁出只能靠旅游业为生的希腊的苦楚。

“托马斯酒吧”很有与众不同之处。托马斯生于土耳其，塞浦路斯纷争期间被赶出伊斯坦布尔（土耳其政府强制遣返希腊人），几乎身

无分文地迁居希腊。一如此类人所经常表现出的那样，他对政治极尽嘲弄之能事，是个个人主义者。个头不高，但长相富于攻击性。年轻时满世界游逛，掌握了六种外语。在很多酒吧和旅馆里打工，攒了一笔钱，去年在米科诺斯买了酒吧。“原来叫‘玩酷子弟酒吧’，但很快改称‘托马斯酒吧’。因为1月去雅典付清余款，彻底成我自己的东西了。新招牌也定做了。”他说。为了赚钱，淡季也开业。他还学了日语，大概正在打近来逐渐增多的日本游客的主意吧（不用说，在斯派赛斯岛一个日本人也没见到）。我让他给我看了日语教科书，那东西根本不成样子。我教了平假名和片假名的区别，他招待白兰地表示感谢。

托马斯给人的印象总有些郁郁寡欢，多少有些心事重重，仿佛在说自己什么都不相信，但我们去那里喝酒的次数相当不少。一来托马斯这个人有一种叫人恨不起来的地方，二来说话妙趣横生。一次谈起选举，我问选举时不能卖酒，并说那一来就赚不到钱了吧。他说那就充作红茶，用红茶杯上白兰地。“附近酒吧销掉两箱白兰地！连警察都来喝，喝令上红茶。当然钱是不给的。”他笑道。“算是好处费吧。希腊人么，政治上什么都不懂，只是凑热闹罢了，根本一无所知。”说着，他嘲讽似的笑笑。

“提起警察嘛，”托马斯说，“在米科诺斯开这样的酒吧是需要营业执照的，可是从没叫我出示过。警察一晃儿进来喝酒，喝完就走，白喝。只要管酒喝，谁都不说三道四。心照不宣，妙就妙在这里。”

但是，惟独谈起他的生身故乡伊斯坦布尔，其神情甚是真诚——伊斯坦布尔的鱼是多么鲜美，在那里长大是多么愉快，被赶出那里是多么难受……



在托马斯的酒吧里遇到一位曾长住日本的希腊老伯。他在吧台边同托马斯边聊边喝啤酒。高个头，有点儿驼背，头发已开始稀薄。他转向我问我是日本人么，我答说是的。随即老伯手拿玻璃杯讲起一段很长的往事。

他曾作为轮船公司职员久驻日本，那是1960年代前半期的事。去看镰仓大佛途中，同一个在公共汽车上碰到的女子堕入情网。他说那

就是所谓一见钟情。他实在按捺不住了，遂向对方搭腔说自己想去看大佛，不知怎么走。女子热情为他带路，两人由此要好起来，约会了好几次，甚至发展到了认真谈婚论嫁的地步。如今看上去他已经五十五六岁，长相不坏。

“但最终没有结婚，”他说，“也见了对方父母，谈了，都是好人。可是若真要结婚，还是有很多很多难题。我也有无可奈何的情况。但当时心里确实难过。我也年轻，那时候。归终带着一颗受伤的心离开了日本。

“现在已经辞职不干了，海运业不景气啊！于是回到故乡米科诺斯工作。不管怎么说都是自己出生的地方最好。

“可是夏天不行，夏天再糟不过——到了夏天，岛上人口是冬天的五倍！人口增加这么多，什么东西都不够用。从电气到食品，水都缺，只好从附近岛上买水，圆罐车装水运来。这一来，物价理所当然上涨。一到夏天，没有什么不贵的。靠旅游吃饭的人倒也罢了，而与此无关的居民全都怨声载道，对外国游客烦不胜烦。理所当然啊！冬天好，安静。多数居民用夏天赚的钱在米科诺斯郊外盖大房子，整个冬季在那里看着录像带悠然打发时光。全都有钱嘛！”



在米科诺斯也见到好几个在日本住过的人，基本是货轮上的船员。也有好几个在朝鲜战争之际去过日本（希腊作为联合国军的一员向朝鲜半岛派兵）。原来的船员们熟知日本的小港。他们的年龄都已相当不小了，但身体都很壮实，如今仍晒得黑黑的，常逮住我聊日本。他们随着海运业的萧条从船上下来，有的当公共汽车乘务员，有的当餐馆老板，有的开小杂货店。对于在船上度过的日日夜夜，他们简直像惋惜已逝青春一样谈得十分动情。听他们那么一说，我也觉得那是一个分外美好的时代，一个可以乘船四海为家的时代，一个只要愿意随时随地都可找到工作的时代。

然而那样的时代已然过去，如同斯派赛斯岛那个商船队随着汽轮时代的到来而一蹶不振一样。

[23] 日本爵士乐萨克斯管演奏家（1933—）。



港口和范吉利斯

每天早上醒来，我们首先开窗看海。从卧室窗口可以把大海尽收眼底。得知海面平稳没有白浪掀起，便去港口买鱼。如果白浪滔天，几乎所有的渔船都不出海，鱼也就无从谈起。只有好天气才能吃到鱼。因此，天气对我们的生活意义非同小可。

天气好的时候，一大早出海的船9点前全部返回，在港口前摆卖刚捕来的鱼。港口一角有用大理石（这一带大理石多，什么都用大理石）砌的鱼台，上面齐刷刷摆着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鱼。有鱼摆上，镇上的居民、游客和猫狗鸟们便一忽儿围成一圈。因为新鲜，味道当然好，但鱼价绝不便宜。地中海沿岸哪里都不例外：鱼是比肉贵得多的高档品。一见就很鲜美的鱼差不多都给餐馆老板模样的人集中买走用来营业，镇上的一般老婆婆们只能物色做家常菜的不怎么样的小鱼。这么着，港口摆卖的鱼转眼就卖光。至于卖不出去的杂鱼，渔夫们便扔给在港口转来转去的塘鹅和猫。塘鹅高叫着吓唬猫。

镇上一家鱼店也不存在。卖冷冻鱼的店倒是有一家，而这准确说来是冷冻店，而不是鱼店。渔夫们在港口自己卖自己捕的鱼，卖完收摊。所以，若错过三十分钟左右“卖鱼时间”，鱼就吃不上了。刚开始的时候没摸出买鱼的诀窍，未能顺利搞到鱼。

我们常在这里买鱿鱼（卡拉马利。商乌贼叫斯皮亚）。这里的鱿鱼柔软，香得好像入嘴即化。希腊人一般烤来吃，那太可惜了，我们做不来，当然弄成“刺身”（生鱼片），还有时候塞入米饭做成“寿司”（饭卷）来吃。虽然每天有所不同，但鱿鱼大体一公斤七百日元。以希腊的物价来说，价格相当可以。此外还买一种类似竹筴鱼的鱼（萨布里吉），用醋凉拌或烤来吃。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鱼，形状类似大竹筴鱼，而味道则带有青花鱼风味。这东西不能经常搞到。小鲷鱼（希奈格利扎，或称利斯里尼）不是炖吃就是加葱煎吃。此外还有星鳗、比目鱼、带鱼、梭子鱼等，种类委实繁多。不知何故，梭子鱼贵得和青山纪国屋[24]不相上下。也有见所未见的鱼和莫名其妙的鱼。有一种浑身带刺样子蛮吓人的名叫斯科尔皮奥的鱼，听人说煮汤好吃，试了试，果然好吃得很。不过和河豚一样，有点儿刺舌尖，还

吃坏了肚子。

海每四天左右发一次脾气。从窗口望去，狂涛巨浪犹如东映[25]厂名背景一般撞击着海岬突出的岩体，而且J·G·巴拉德[26]式地刮着充满暴力的风。渔船当然不出海。从窗口看去，渔船进入港内，系着缆绳，桅杆随波摇晃。惟独海鸥开心地迎风盘旋。

这样的日子持续三四天（有时一个星期）之后，随即摇身一变，送来安安静静的清晨。海面平滑如镜，水波不兴。在这样的早晨我们赶紧洗脸，吃罢早餐就拎起购物袋往港口飞奔，一起买下够吃几天的鱼。两人混在老婆婆和餐馆老板之间，问这个多少钱那个多少钱这个贵了能不能便宜点，如此啵啵不休。如果港口摆卖的鱼没有好的，就等下一只渔船靠岸，一马当先同渔夫讨价还价一古脑儿买下。总的说来，旅居期间我的希腊语进步不大，但单单买鱼用的希腊语可谓百炼成钢。

我们不太喜欢吃肉，鱼作为蛋白质来源无论如何都是必不可少的。希腊菜固然十分好吃，基本让我中意，但我们日本人长期吃起来，体质上还是难以承受。油腻、香辣调味料用得多，吃久了就有脂肪不知不觉在体内囤积下来。没体验过的人或许无法想像，体内囤积脂肪是非常不好对付的事。从经验角度我认为（只是认为，谈不上科学根据），日本人的身体恐怕本来就不具有分解那么大量的脂肪的功能。所以，分解不了的脂肪囤积在体内，而脂肪一多，身体难免变重，肌肉活力下降，食欲减退，皮肤粗糙，头发变脆，汗有异味。

这种时候就要“脱脂”三四天，大凡油腻之物概不入口，不去外面吃饭，减为一日两餐。煮米饭，做大酱汤，多吃酸东西。把鱼作为蛋白质来源，而且烤来吃。不用油，“刷”地淋上柠檬汁，蘸酱油吃。烤鱼用的是从套房公寓管理人范吉利斯那里借来的陶炉和铁丝网。此前我全然不知欧洲人用陶炉烤鱼吃，一次看见范吉利斯用陶炉和铁丝网在管理人房间前面烤过期面包，遂问能用来烤鱼吗，他说当然能。于是我向他借来陶炉（希腊语叫斯卡拉），在院子里烤竹筴鱼。厨房的微波炉是电热式，没这东西烤不了鱼。遗憾的是燃料并非木炭，而是碎木料，但久违了的烤竹筴鱼还是香得令人感动。味道真是好极，可以感觉出烟味从鼻孔“刷、刷、刷”往脑芯漫延，细胞渐渐按捺不住。

烤鱼时范吉利斯每次都过来，得意地说：“鱼这么吃再妙不过，

德国人法国人都不晓得这个吃法。”附近的猫们又闻味赶来。全世界喜欢鱼的人们和猫们无不中意烤鱼。如此说来，忽然想起以前早稻田穴八幡坡路下有一家专门提供烤鱼的套餐店，路过时闻到的便是这种味道。

另外，我们常吃的一种叫马利萨的鱼。在鱼中属于最便宜的那种，大小四至六厘米，一百日元能买一大碗。买来好好洗了油炸，从脑袋“咯嘣咯嘣”咬起。骨头硬，吃多了相当累，说麻烦也麻烦，但钙质丰富（在欧洲住久了，钙意外不足），而且有一种极其质朴的味道，我们时常喝着“雷切那”葡萄酒“咯嘣咯嘣”吃个不停。这是地地道道的平民风味，餐馆里上这道菜的仅限于面向当地居民富有希腊色彩的餐馆，以游客为对象的饭店的菜谱上基本没有。

光说鱼不好意思，章鱼也吃了不少。地中海的章鱼相当可以。刚买来时较硬，吊在房檐下晾晒。这样，第二天硬芯就能抽下，变得好吃起来。希腊人全都这么吃章鱼。渔夫捕上章鱼，活着拎腿在水泥地“吧唧吧唧”摔软。从章鱼角度看诚然疼痛难忍，但世道就是这个样子，奈何不得。把章鱼搭在晾衣竿上或什么上面，一天就可晾干。经过这两个阶段之后，章鱼终于适于食用。这个我们也同样用陶炉烧烤，淋上酱油和柠檬汁吃，好吃极了。只是，晾章鱼的时候附近的猫和狗便有几只围来，气呼呼地抬头盯视那章鱼。尽管不可能够到，但还是一蹦一蹦地往上扑。猫们也饿了。这光景看上去甚是令人不忍。另外还招苍蝇，起始耿耿于怀，后来就随它去了：招苍蝇就招好了，悉听尊便。反正是烧烤，苍蝇成群也不至于改变味道。



在港口不时碰见范吉利斯。范吉利斯喜欢在早晨的港口散步。并非有什么事，只是随便走来走去，或在露天咖啡馆喝咖啡，或跟同样漫步的朋友打招呼。若有卖鱼的就瞧上一眼，也有时逗逗塘鹅。港口就像是公共社交场所。我们买了鱼，他往往说一声“先给我，春树”，当场掏出鱼的内脏。下到海里，用军用刀灵巧地割开鱼腮，剖腹，拉出肠子在海水里洗净，鳞也刮了，然后告诉我们这个怎么做好吃。范吉利斯喜欢做吃的，还时不时请我和老婆在咖啡馆喝咖啡。

※

范吉利斯是年近六十的左巴系希腊人。英语一窍不通。身材高大，留着漂亮的仁丹胡。热情，喜欢和人亲近，我们很快同他要好起来。除了我们没有常住客，范吉利斯也相当无聊。

我们居住的地方是有围墙的所谓高级住宅小区，面积很大，上面建有二三十栋漂亮的纯白色双层楼。一栋两个单元，上下楼中间分开。买下来的人或各自使用，或用于出租。楼外地面有很多细密的阶梯，原色鲜花处处争红斗妍。总体设计仿米科诺斯镇，曲径通幽，没有直路。设计上细致入微，作为希腊同类建筑，做得格外精细，无可挑剔。屋顶带有希腊特有的小小的鸽笼模型。风大不能远跑的时候（会被风吹回来的，没办法跑，不骗你），我时常在这小区里跑——便是如此宽阔。阶梯多，爬上爬下，正好锻炼。

走进大门，旁边有管理员室，范吉利斯一般都和两只金丝雀待在这里。不在这里的时候，就去清扫游泳池，或修剪花坛、收拾垃圾。管理员室也带一个小厨房。一看见我就招呼道：“喂春树，喝了咖啡再走！”随即用带花纹的小锅做了个黏糊糊甜腻腻的希腊咖啡，边喝咖啡边查辞典说很多话。范吉利斯说他战前在比雷埃夫斯开面包店，也当过船员，去了许多地方。下船后做了好几种工作，来这里是因T先生的邀请。T先生是设计这片高级住宅小区的建筑师，也是小区的总老板。他请范吉利斯来这里做管理员，于是范吉利斯举家搬来，已是七年前的事了。

夏季范吉利斯当然也忙。“忙得天晕地转！”他本人说道。不光说，还扭歪了脸——扭得皱皱巴巴的——做出讨厌至极的表情。“夏天我女儿来帮忙，女儿会英语，毕竟是跟外国人打交道。我不行，傻瓜一个，英语不会，德语不会。”

可是范吉利斯绝对不是傻瓜。虽说是没正经受过教育的一介左巴，但直觉好，感情也够细腻。范吉利斯有两个孩子。大的是儿子，在米科诺斯的发电站当工程师（这座发电站动不动就停电）。另一个是女儿，做美容师。孙子两个，一个承袭了他的名字，就是说有两个范吉利斯。不过孙子叫米克罗·范吉利斯，即英语所说的小范吉利斯。

他桌子上摆着孙子照片。子女也好孙子也好都在米科诺斯生活。“范吉利斯穷，但都健康。”他说。希腊人非常注重家庭，家人的幸福即是自己的幸福。虽然穷，但只要全都健康地活着，那就是幸福。

一开始他问我“春树，有孩子么”。我说没有，他马上现出非常困惑和伤心的神情。对他们来说，没有孩子是极其难以忍受的事情。

范吉利斯明年春天六十。“六十就有养老金下来，”他兴奋地说，“跟你说春树，那一来往下就可以游玩度日了。我也上年纪了，天天干活很不好过的哟！六十年来一直干个不停，差不多也该休息了。”

但范吉利斯显得十分健康。“您不是还能干么，”我说，“在日本，六十岁正是干活的年龄。”

“哪里哪里，”范吉利斯摇头，“六十已不是干活年纪了，我也老了，没精神了。”说着做出疲惫不堪的样子，以此表现他已彻底心力交瘁。

不过看上去范吉利斯甚是精力充沛，一有时间就在管理员室做手工活。有时修理捕捞章鱼的渔具，有时缝补渔网，还有时做饭做菜或干一点木匠活那样的活计，同时屈指计算养老金下发的日期。

范吉利斯工作时间里不喝酒，但圣诞节那天穿一套最考究的西服在管理员室醉得相当厉害。也罢，圣诞节说起来就像日本的正月。范吉利斯醉后满脸通红，比平时活跃，嗓门变大，并叫我喝威士忌，倒满满一杯。威士忌是红牌尊尼获加（Johnnie Walker）。他喝尊尼获加时显得分外得意，想必是为圣诞节特意保存的酒。平日大体喝廉价葡萄酒。乌糟酒则不喝，大概过去给乌糟灌得烂醉如泥，再也不想喝了。无论我怎么劝他喝乌糟，他都一滴不沾。“乌糟，坏酒，喝了变傻，春树你也注意为好。来葡萄酒好了！”说着，脸色黯淡下来。

他不时把我们领去当地人聚集的咖啡尼奥（希腊式咖啡馆）。作为他那是最大限度的招待。这是因为，那种当地人聚集的咖啡尼奥不欢迎外国游客进入，那是他们的圣地。何况老婆也跟着，女人进咖啡尼奥也让他们反感。咖啡尼奥是合得来的男人们畅所欲言的场所，所以都以冷冷的目光盯视我们和范吉利斯。这种时候，范吉利斯就把我们介绍给大家：“这两人是我的朋友。虽是外国人（克塞尼），但会讲一点希腊语。正用心学呢，喏喏，单词本都带着呢！”

接着，他劝我们喝葡萄酒，推荐好菜让我们吃。菜固然便宜，但以范吉利斯的工资衡量还是不小的破费，此乃友情的表示，我们心存感激。喝着吃着，周围的左巴们渐渐习惯了我们的存在，似乎在说既然范吉利斯那么说，那也就只好接受了。这种温情是希腊人所特有的。



12月3日，设计师T先生来了。范吉利斯说明天T先生来，我表示如果可以想见面聊聊。T先生乃知识分子，当然讲一口漂亮的英语，往返于伦敦与纽约等地之间，是个国际化人物。同样是希腊人，但和范吉利斯有很大区别，不属于左巴系。我称赞这个小区做得极有档次，他兴冲冲带我到处参观。“为做这小区我花了十二年，十二年！”他说，“你恐怕不了解希腊的衙门是怎么个东西，跟衙门打交道活活要命，私下疏通上下打点麻烦透顶。交计划书、交设计图、又要交什么什么图……这方面不知占了多少时间。规定又多，效率又低，能把人急死。一塌糊涂的国家！完工时都累瘫痪了。这种事不能再折腾一次，也不想再折腾。不过，我也认为干得不坏，会心之作。为此我投入了全部精力，天天到场，连石头砌法都要指点工匠。不这样不行，那些家伙不盯着就偷工减料，很懒的！就连细小地方都是我直接指挥建造的。所以，这个小区等于是我的孩子。做了五十三套，四十九套都卖了。每年定下卖几套。不然就乱套了。慢慢做，看准对象慢慢卖。如何，村上先生，你不也买一套？这么好的东西在米科诺斯再不会有第二份。景致也好。夏天小区里都很安静。出租也能赚钱，决不会吃亏的。正是该买的东西。价格十五万美元。明年就会涨价百分之十。手续费等各种费用百分之八，年度管理费等经费八万德拉克马（约八万日元）。”

但我们当然没买。作为度假别墅十分难得可贵，价格虽说高却也并不离谱，管理员范吉利斯也让人愉快，问题是当时我们没有那样的经济余裕（我们在经济上是带着一定程度的担忧离开日本的），再说希腊离日本未免太远，有时间也很难像去关岛那样说走就走。在那样的地方就算有一套别墅也徒然落得麻烦。

因此，我对T先生说：“有道理，您的意思我清楚了，容我好好考虑一下。”“慢慢考虑就是，”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米科诺斯是好地方，希望日本人也多来一些。”T先生是早上到的，傍晚即乘机飞回雅典。忙。“在南美有个建筑师的世界性会议。”他对我说。



早上和范吉利斯一起散过步。那时我再次认识到，希腊人实在是喜欢寒暄的国民。一如日本人喜欢点头和暧昧地微笑、美国人喜欢握手和打官司、法国人喜欢葡萄酒和霍华德·霍克斯[27]的电影，希腊人则喜欢寒暄。早上购物时间和傍晚去咖啡馆时间在街上走一圈，这点就一目了然。那不折不扣是寒暄的洪流。

举个例子。去购物的两个主妇（卡特琳娜和玛利亚）在路上碰见了，往下势必有如下交谈：

“卡里梅拉，卡特琳娜，泰卡尼斯（早上好，卡特琳娜，身体可好）？”

“米亚哈拉，玛利亚，埃夫哈里斯特，埃希（还好，谢谢！玛利亚，您呢）？”

“米亚哈拉，基埃勾，雅斯（我也蛮好，再见）！”

“雅斯（再见）！”

简直成了对话例句集，可她们的确照说不误，而且是在步履匆匆擦肩而过的时间里。从旁边看来，只能说是神乎其技。因为首先要认准前方来人，其次要看准火候（这样的距离是否合适），然后再不约而同地开始“卡里梅拉”，还要快嘴快舌地连发数发，最后以略微回头的样子道出“雅斯”。这么灵巧的活计我横竖做不来。到了这个地步，我觉得较之喜欢寒暄，更像是寒暄高手了。

住在小镇上的普通希腊人相遇时互相寒暄者能占百分之几呢？一天总共寒暄多少次呢？此乃我一直怀有的疑问。于是我同范吉利斯在街上走时注意计算了一下。由于匆忙，无法计算准确，但总的说来，范吉利斯碰上的人里边，三人有一人寒暄。数字相当不小。范吉利斯年已六十，寒暄的对象几乎都在中年以上，男女比率大体四比一。

在港口相继同七八个漫步的人寒暄：“哟范吉利斯”、“你好啊范吉

利斯”、“早上好”、“你好你好”。如此互致问候，但脚步不停。看来，寒暄不停步似乎是希腊一般习惯。若因寒暄而一一停步，那么恐怕哪里都到达不了。的确，如果停下脚步，大有可能卷入没完没了的长谈之中。所以大家都像蝴蝶一样行走，像蜜蜂一样寒暄。进得小巷，巷口呆呆站着的理发匠老伯道一句“你好范吉利斯”。和蔬菜店的老板来一声“你好”，和超市的老伯说“早上好”，和卖菜者连道“你好你好”，和穿黑衣服的胖老太婆擦肩而过时对方问“你好吗范吉利斯”，站着交谈的三个人连声说“你好”、“还好”、“早上好”，电气用品店的老伯问道“喂范吉利斯最近怎么样啊”——看着都觉眼花缭乱，根本顾不上计数。这已经是电子游戏，对于眼前忽然出现之人要一瞬间判别出是①“需要寒暄者”还是②“无需寒暄者”。即便来人属于①，也要根据对象确定寒暄的grade（等级）——一看即可得知grade分得相当细，并且必须遵守若非特殊对象则不停步这条基本规则。可是范吉利斯对此应对自如，轻轻松松穿街过巷。寒暄对象的数目五分钟差不多有四十人。非同小可，堪称高手。我无论如何也当不成希腊人。

---

[24] 日本有名的大商店。

[25] 日本电影制片厂名。其厂名背景为汹涌的海浪。

[26] 英国科幻小说作家、评论家（James Graham Ballard，1930—）。主要作品有《残忍展览会》、《宇航员之死》等。

[27] 美国电影导演（Howard Hawks，1896—1977）。主要执导影片有《光荣之路》、《红河谷》、《勇敢的利奥》等。



撤离米科诺斯

这篇文章的雏形是离开米科诺斯不久为一家文艺刊物写的东西。为避免同其他文章重复，后来多少有所改动，但基本保留了原貌。现在回头看来，不难看出当时自己的心很有些僵冷，尽管写的当时没有意识到。

我想文章这东西或多或少都有这种情形。写的时候由于写的东西太自然太理所当然（因为原则上我们是紧贴当时当地自己的心态写文章的），所以对于自己所写文章的温度、色调和语势往往很难当场作出客观判断。

不过我想，心有时候是会冻僵的，近乎绝望的冻僵，尤其是在写小说的过程中。



1986年12月28日。星期天。雨。

今天我将离开这座海岛。

6点半起床，伏案写一小时左右的小说下文。大致收尾的时候，将一摞信纸装入大号信封，而后放进结结实实的旅行箱最底层以免弄皱。在米科诺斯的生活也今天截止。回想起来，在这里生活的一个半月居然全是坏天气。每星期有一两天晴空万里的好天气降临，但此外都提不起来，不是下雨就是刮风，或者风雨交加，而且天空基本上阴沉沉的不见天日。置身于如此美丽的海岸之间，实际下海游泳却仅得一次。

最后一天还是下雨。无声的细雨，又有风。

紧挨我们所租房子的后院，有一块不大的牧场（或者不如说像是一块荒草甸），放养着三四十只羊。不时有似乎坏心眼的羊倌夫妇赶来（长相仿佛狄更斯小说中出现的情侣），一边破口大骂一边用棍子狠打不听话的羊。从桌前可以把牧场全景收入眼帘。写作当中，我蓦然抬眼从窗口打量羊母子，以此作为小小的乐趣。但随着冬日的推移，草很快少了，羊们在十来天前被一只不剩地转移到其他牧场。现

在窗下铺展的仅仅是寒伧的褐色地面，既看不见拼命扑在母羊脚下的小羊，又听不见好像用直尺拉出的一条线那样没有起伏的单调叫声。看着空荡荡的牧场，清楚地认识到季节利利索索带走了它要带走的部分。

牧场往前有条通往山上的坡路，一辆旧卡车拉着建筑材料似的东西晃晃悠悠往山上爬去。早上的细雨冷冷地淋湿了地表所有物体。我怅然望着外面，心里想着刚刚写完的那一章。下雨的早晨写的文章，不知何故，就成了下雨的早晨那样的文章。事后不管怎么修改，都没办法从中消除早晨的雨味儿。羊们荡然无存的凄寂的牧场上无声无息降落的雨的气息，淋湿翻山越岭的旧卡车的雨的气息——我的文章就笼罩在这种晨雨气息中，半宿命地。

下到楼下，在厨房烧水、煮咖啡。这工夫里老婆醒了进来，加热平底锅煎薄饼。今天是最后一天，必须把电冰箱里剩的东西逐一消灭干净。冰箱残留一点做饼的面粉和牛奶，所以无论谁怎么认为，早餐都要吃薄饼。面粉、鸡蛋和牛奶的比例是有些不当，但也只好凑合了，毕竟是处理剩余物品。我把剩余物品做成的薄饼切成小块送入口中，忽然想起拿破仑军队从俄国撤退时的情景。一场最艰难、所获最少的撤军。在雪原上腾跃的哥萨克士兵。暴风雪。枪炮声。

不吃西红柿？老婆问。

西红柿剩了好多好多。吃，我说。把西红柿切了，洒上盐末和柠檬汁，再细切了香草洒上。咖啡和薄饼和西红柿色拉。士兵们渡过冰河，用冻僵的手烧毁桥梁。他们离开故乡实在太久了。

电冰箱里还有什么，我问。

意大利面条、西红柿罐头、大蒜、橄榄油和鸡蛋、一点点米、半瓶葡萄酒、金枪鱼罐头，也就这些了。

如此说来，午饭铁定是配以金枪鱼罐头西红柿汤的意面。归根结底，撤退便是这么个东西。也罢，吃完午饭，我们就离开这里，午饭吃什么都不是大问题。我一边听劳拉·尼罗（Laura Nyro）的旧音乐磁带一边吃薄饼，吃罢收拾行李。收拾当中蓦然想道：这一个半月时间对于我到底算什么呢？自己在这季节不对头的爱琴海孤岛上到底干了什么呢？对此我一时什么也想不起来，真的想不起来，脑海里生出疙疙瘩瘩般的空白。

得得，到底干什么来着？

在某种意义上，我迷失了自己，如同在无边无际的俄罗斯雪原上踉踉跄跄行进的疲惫士兵。

但过了一会儿，我当然想起来了，想起了自己迄今在这个场所的所作所为。我写了几篇类似游记的文章，翻译也脱稿了，还写了长篇小说的最初几章。成果不算差，我想。尽管如此，我还是在某种意义上迷失了自己，而觉得彻底迷失自己的时候，我甚至朝石墙狠狠踢去，可以说是穷途末路。我知道这样做所得到的无非脚痛罢了，已是第一百二十五次知道。

是的，我的小说沾有黯淡的雨味和夜半剧烈的风声。尽管没有沙俄战线那般严重，但也还是一场不大不小的战斗。喂喂那不对的，你挖出的不是我的尸体。是和我相似，但不是我。你多少误解了我。或许冻僵的尸体看上去全都差不多。

我的迷失，并非因为我远离故乡。我所以迷失自己，是因为我远离了自身。并且今天我就要从疏离自己本身的场所作进一步移动。无限相减，或无限相加，或多或少。都无所谓，彼此彼此。

2时35分飞往雅典的飞机起飞。我被抛入汹涌的重力之中。也许看上去不然，但确乎如此。我只能勉强扑在类似把手的什么上面。正因为这样，我才一直回想拿破仑撤离俄国的战役。我无法抹除那一幅幅图像。可话又说回来，为什么下这么多的雨呢？



11点15分，约翰来了。

约翰是比利时人。其原名早已忘了，一个听不习惯的相当烦琐的名字。此人很早以前来到希腊，直接住了下来，英语德语法语希腊语讲得非常流利，年纪四十上下。前额发际后退得厉害，总是穿一件开线的毛衣。估计已经结婚，因为见过一次他和希腊女性及其母亲模样的妇女在一起。虽说住在爱琴海，脸色却很苍白。嘴唇每每扭歪六厘米。他憎恶几乎所有的希腊人，而几乎所有的希腊人都漠视他或奚落他。我一说自己是作家，他就对我产生了莫大兴趣。

“跟你说村上先生，你我是知识分子。这里其他家伙清一色是傻

瓜蛋，傻瓜蛋里的野蛮人。”约翰说。对于住在米科诺斯的其他欧洲人的智商，他也不以为然。

他在旅行代理店工作，是我所租房子的当地代理人（agent）。房租付给他，有怨言（有若干）找他抱怨。约翰今天是为计算电费来的，他把电表数字计在手册上，计算金额。我付给他大致五千日元的电费。他也不问可不可以就脱掉雨衣走进房间，神色悒郁地坐在沙发上和我谈了三十分钟。

“跟你说村上先生，以前我想当编辑，”他说，“但终究没当成。你猜因为什么？”

我说不知道。不可能知道。

“因为失望，”他把嘴唇往安特卫普[28]方向扭歪八厘米，“对于出版界的状况。明白？”

我答说不明白。

“我不能忍受的是那种大批量生产体制。弗莱明[29]写的007什么系列第十八、第三十六——那简直就是麦当劳连锁店。有资本的出版社出版那么无聊的书大赚特赚，脑满肠肥，而志向高远的人却始终被踩在脚底下，这就是出版界的现状。这个叫我无法忍受，现在也忍受不了。可明白，村上先生？”

唔唔。

“所以我才离开比利时，干干脆脆地。之后来到希腊。为什么选择希腊呢？那是因为希腊是欧洲的边角——离开欧洲没把握混下去。所以来到边角。好地方啊，除了希腊人。恕我直言，我认为那些家伙无可救药。例如范吉利斯，那家伙连英语都讲不来，脑袋不开窍的懒汉，没有希望。看这些家伙真是看够了，有时很想回比利时去。就算是骗子文化，但至少那里还有文化这个东西。”

这就是比利时战后出生高峰的一代。得得，世界所有地方都好端端地活着我们这代人，尽管有些疲软褪色。但我什么也没说。说实话，比之约翰，我远为喜欢不开窍的范吉利斯，超过约翰二十倍。可是这种话无法说出口。

“我喜欢三岛和大江[30]。”这位名叫约翰的比利时人说，“可曾见过他们哪位？”

我答说没有。

约翰摇了几次头，像是表示遗憾。“对了，你写怎样的小说呢，村上先生？”

我说介绍起来十分困难。

“前卫性质的？”

或许可以多少那样认为，我回答。可不可以呢？

他再次摇头，仿佛摇头是他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在膝头摩擦双手，好像说那也是我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

往下我们谈了一会儿小说，然后他从沙发站起，穿上雨衣，向我伸出手：“能见到你很高兴，村上先生。毕竟这座岛上几乎不存在类似文化的东西。”

约翰，我也为见到你高兴，后会有期。

“噢，雨好像停了。”他仰望天空说，“这回不要紧了，飞机可以起飞了，祝你旅途愉快！”

我说谢谢。

我们再一次握手告别。我再一次联想到拿破仑的撤军，眼前浮现出开始秃顶的、名字难记的比利时人约翰一边吐着似乎并不雅观的白气一边举斧头砍桥的光景。这里没有文化，他摇着头说。他何苦来这样的地方呢？既然这样，留在比利时不还好些？跟你说，约翰，你怕是忘记比利时了。已经发生的事就是已经发生了。你的心情不是不可以理解，可是1960年代早已消失在背后，早已远去。

约翰走后的房间里仍存留了一会儿他的焦躁，他的文学性自我犹如细微的尘埃飘来飘去。还剩有六七厘米的嘴唇的扭曲，如同死者的纪念品。

约翰让我想起历史上无所不在的死，觉得应该有人为约翰写一本传记，应该有人精确而详细地描绘他的疲惫他的向后撤退的头发他的开线的毛衣他的希腊岳母及其通往三岛和大江的人生旅程，并且像戴米尔[31]的《十诫》那样浓墨重彩。我坐在沙发上，一边感受房间中漂浮的约翰的焦躁，一边这样思来想去。

此后去了范吉利斯那里。范吉利斯在昏暗的房间里，正戴着老花镜补渔网。他一个人的时候几乎不开房间电灯，我想大概是为了省电。在昏暗中独处，范吉利斯显得比平时苍老。

我敲门进去。范吉利斯打开灯，放下渔网，让我坐下。他慢慢摘

下眼镜，擦火柴点燃呛人的希腊香烟，随即轻咳一声，问我喝不喝咖啡，我说谢谢。

“喂春树，还有六个月。”他眨巴着眼睛说，“六个月后养老金就下发了。”他的确是在盼望养老金。“你今天就离开岛吧？你一走可就寂寞了。”他说，“你不在，就剩我范吉利斯一个人了。”

“不是还有那个德国电影导演么？”我说。

“哪里，他今天也回去。剩下来的只有我和金丝雀。”

“还来的，范吉利斯。辞去这里的工作后，不也还是在港口咖啡馆里转来转去吗？”

我们各喝了两杯范吉利斯珍藏的白兰地（这种时候喝一点儿也无妨吧），握手，以希腊方式拥抱告别。然后提起旅行箱走到奥林匹克航空公司的办事处，在那里等待开往机场的小巴士。

在那空空荡荡的高级住宅小区住了一个半月的差不多只有我们俩。我们和范吉利斯和他的金丝雀。我们离开前一星期，那个沉默寡言的内向的德国电影导演（名字忘了）从伦敦回来了。范吉利斯说此人总是闷在这里写电影脚本。确实，德国人似乎一直独自静静写电影脚本。我也一直写小说。约翰则一直满岛播洒他的比利时牌焦躁。范吉利斯一直补渔网，一直拆解钓乌贼的针捆。港口附近那个报摊少女在我每次去买《雅典新闻》时都把报纸恨恨甩给我，然而我直到最后都对她怀有类似好意的情感。十四五岁，鼻子下面已经生出淡淡的胡须，但看上去并不像多么坏的孩子，她只是焦躁罢了，一如其他多数人。

风持续刮，雨经常下，冬天整个包围了海岛。我们每次去取洗的衣服，洗衣店老板娘都微微摇头，就差没说你们怎么还在这里。12月中旬，她对我问道：“莫不是你们打算在这里过冬？”我答说不不，年底离开这里去罗马，于是她显得多少放下心来。是的，这里不是游客过冬的场所。“以前去过日本的。”烫熨斗的老板娘的丈夫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以前上船来着。可如今他在洗衣店里几乎从不开口地熨衣服。

在1986年这一年结束的时候，我即将离开这座岛。我在空气滞闷的奥林匹克航空公司的办事处等待开往机场的巴士。外面，风越刮越

猛。飞机能起飞吗？松动了的球形门拉手“咯咯嗒嗒”响个不停。疲惫不堪的门拉手，就好像穷途末路的李尔王。

再见，米科诺斯岛！

我瞥了一眼装有小说原稿的旅行箱，然后怅怅地望着窗外白浪滔天的海港。海鸥以撕裂乌云之势笔直地飞去。有人就机票问题对办事处女士发牢骚。敲击电脑键盘的“呯呯”声不绝于耳。两个年轻士兵无所事事地看体育报。另有加拿大一家老小。一如大多数加拿大人，背囊上缝着加拿大国旗。亦如大多数加拿大人，显出百无聊赖的神情，简直像在说我等乃是表现无聊的小小权威。

我从某处迁往某处。时间与场所——二者屡屡在我心中增加重量。我自身和时间和场所这三个存在的平衡趋于崩溃。

喂，比利时人约翰，莫非你正在拆自己的桥？弄不好可是哪里也去不了的哟！

乘坐2时35分飞往雅典的班机的先生们女士们……工作人员吼道。得得，飞机起飞。我把石油洒在桥上，小心擦燃火柴不让风吹灭。球形门拉手“咯咯嗒嗒”一个劲儿颤抖。深重的天色又有一种颜色涂了上来。我在风雪中大声喊叫：喂我都说了，那不是我的尸体！相似，却不是我！

---

[28] 比利时的港口城市。

[29] 英国悬念小说作家（Ian Fleming，1908—1964）。因创作以代号“007”的英国谍报人员邦德为主角的系列长篇小说闻名。

[30] 指大江健三郎（1935—），日本作家。

[31] 美国电影导演（Cecil Bbunt DeMille，1881—1959）。主要执导影片有《十诫》、《草莽英雄》等。

从西西里到罗马





西西里

除夕[32]早上从雅典出发，到罗马正是CAPO D'ANNO（新年庆祝活动）最热闹的时候。在意大利，除夕夜到元旦之间死人相当不少，有喝酒过量喝死的，有撒欢儿弄倒蜡烛失火烧死的，有撞在枪口上打死的——有人从窗口开猎枪来代替助兴的烟花。这还不算，作为除夕夜的一种庆贺方式，一到12点意大利人就把不要的东西从窗口一件件抛下，以致也有人倒霉碰上砸死。正月的报纸连篇累牍都是这种让人笑不起来的死亡事故报道。不成样子！不过从热闹与否这点来说，那还是热闹，这点百分之百可以保证。

我们也学罗马人在除夕夜吃象征喜庆的扁豆（lentil），打开香槟姑且庆贺新年。超短波梵蒂冈通宵播放维也纳华尔兹。时值1987年。恭贺新年！随即我们告别罗马，朝下一站西西里进发。将在巴勒莫租房子住一个月。为何选择巴勒莫呢？因为要给一家航空公司的机上刊物报道西西里，只要完成这个报道，往下就可以随意写自家小说，事情不坏，况且我也想去一次西西里。不料到达巴勒莫时，一瞬间把我弄糊涂了：巴勒莫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足以让游客老老实实住一个月的地方。首先，街道反正就是脏。一切都破败不堪、黯然失色、不干不净。构成街道的建筑物一言以蔽之大部分堪称丑陋。街上行人面无表情，总给人一种抑郁之感。车太多，噪音太大，城市功能一看就知每况愈下。事后得知，街上到处是暴力犯罪，人们疑心重重，对外人极其冷漠。

假如没有讲定工作，没有预付一个月房租，我想我恐怕到达的第二天就赶紧离开这座不三不四的城市。可是因为这个缘故，无法改变计划。当然，住下来也有几桩并不糟糕的事情，可是除却为数不多的例外，我对巴勒莫这座城市的状况总的说来深感失望。

看了好几种关于巴勒莫的导游小册子，也没发现说这座城市不好部分的记述。说干脆些，上面全是好话。也罢，导游册这东西本来就是为激发人们的旅游欲而写的，太消极的事项怕是写不得的。其中英语版的《蓝色导游》（Blue Guide）记述还算基本正确，引用一段：

“巴勒莫，人口六十七万，西西里区首府，一座令人深感兴趣的

城市。面临北海岸美丽的港湾，位于康卡德罗（金盆地）的尖端。不大的盆地四面围着石灰岩山，满山遍岭是橙园、柠檬园和蚂蚱豆（我也不知晓这是怎么个劳什子）田。港湾已毁灭性地衰落，贫民窟惨不忍睹，街头杀人斗殴，交通寸步难行……尽管如此，巴勒莫仍是值得一游的富有魅力的城市。气候无可挑剔。”

至于巴勒莫到底什么地方值得一游，我一下子很难理解（“令人深感兴趣”这点不妨承认）。也罢，世间有各种各样的想法。记述自是简明扼要，但作为我，倒是希望写一下这座城市的丑恶嘴脸。

乘出租车从蓬塔莱希（Punta Raisi）机场去巴勒莫的路上，我们目睹的是数量惊人的汽车修理厂和无论从哪个观点看都难以说是富有诗意的郊区住宅群。过了这些进入市区，紧接着被卷入了作为巴勒莫名胜的交通堵塞之中。车尾废气把所有建筑物都弄得黑乎乎脏兮兮的。不但脏，建筑本身也一副寒酸相。目睹之间，心情渐渐黯淡下来。欧洲城市总的说来给人以协调之感，赏心悦目，在这个意义上，这里已不是欧洲。如果说这里有某种协调感的话，那便是丑陋与贫穷。人口增加，只好随时随地接二连三建起简易集约式住宅——感觉上便是这样一座城市。款式一塌糊涂，色调一塌糊涂。加之灰头土脸，一副穷困潦倒的样子，俨然贫民窟。城市本身正失去健康的活力而走向没落，这点一看建筑物即一目了然。

而且警察随处可见。全都穿着防弹背心，端着自动步枪。警察的眼神比罗马的严厉得多。我们去巴勒莫时，正赶上审判黑手党头目。连续发生报复性大批量杀人案。巴勒莫街头巷尾闪动着黑手党的身影。照料我们公寓的一个叫桑德拉的女孩的男孩子朋友不久前就被黑手党杀死。并非他本人做了什么，他父亲曾是黑手党干部，仅仅由于这个原因，他在巴勒莫街上行走时被自动步枪射成蜂窝。

“不是什么稀罕事的，在这里。”桑德拉耸耸肩，面无表情地说。

城市笼罩在冷漠阴暗的气氛中。倒也不是说有什么实际阴暗，只是觉得无论去哪里都好像隐约蒙了一层薄膜。在餐馆吃饭也好，进邮局寄信也好，去蔬菜店买菜也好，或者上街东游西逛也好，反正到处都可感觉出这种阴暗挥之不去。就连身为外国人和局外人的我长住起来，都被整个卷入这阴暗的氛围中。在旅居巴勒莫期间我们最讨厌的，就是此种无可救药的阴暗。这种阴暗，可以说是无论怎么挣扎都

找不见出口的绝望阴影。看统计数字即可得知，西西里的经济衰落得堪称崩溃。人们穷，工资低，失业率高，如火烹油的意大利经济根本没有惠及这座南方的海岛。北部意大利呈现的富裕和活力在西西里踪影皆无，西西里有活力的，仅仅是黑手党控制的地下经济。

人就在几十个市民眼前被击毙，而警察却一个目击者也找不出来。谁都没有看见，匪夷所思。在枪声传来的一瞬间人们都目视别处。多数警察被黑手党收买，此乃尽人皆知的事实。拒绝收买的警察和法官屡屡遇害。一个背叛同伙向警察作证而直接逃往美国的黑社会干部，其留在西西里的一家老小全被杀害。因此，人们概不多言，缄口，闭眼——城市气氛若不阴暗，反倒是咄咄怪事。

不过比之黑手党，我们更要注意的是汽车。因为巴勒莫路窄车多，而且横冲直闯，以致百分之九十的汽车都伤痕累累。在巴勒莫找出没有伤痕的汽车，或许要比在日本找出有塌坑的梅赛德斯奔驰还要困难。到处有汽车“叮叮咣咣”相撞。信号灯本来就少，而行人又几乎全不遵守。多数人行道被停靠的汽车封死。虽说这可以说是遍及意大利全国的交通状况，但以巴勒莫为登峰造极。我是顶喜欢散步之人，然而在西西里可以说几乎没有外出的心绪，一想到那洪水般的车流就万念俱灰。

还有无休无止的噪音。

我住的公寓面积还可以，在巴勒莫算是舒服地方，尽管如此，汽车声从早到晚响个不停，头都有点痛了。半夜尤其厉害，巡逻车或救护车“叭叭叭”满街飞奔，车动不动就“滋——”一声急刹车。车上装的防盗报警器不知因为什么“啾啾啾啾——”响彻四方。被挡在后面开不出车的车主“笛笛笛笛——、笛笛——、笛——”按二三百次喇叭。如此情况绵绵不断持续到后半夜三四点。从寂无声息的淡季米科诺斯一下子来到这等地方，简直是堕入地狱。陀思妥耶夫斯基暗示有另一种内省式地狱存在，而对于我，这个程度的地狱足矣足矣。



在这样的城市住了一个月。那期间一直写《挪威的森林》，这部小说在此写出六成。和米科诺斯不同，这里天黑后也不能外出稍事散

步，说难受也够难受的。想换个心情也换不成。所以离开巴勒莫出去短途旅行了两次。一次去陶尔米纳，一次去马耳他岛。返回巴勒莫，又闷在房间里写作。

天天都写小说是很难熬的。有时甚至觉得自己被敲骨吸髓似的（也许你说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小说，但作为写的人此乃实实在在的感受）。但不写更加难熬。写文章不易，可是文章方面要求我写。这种时候最要紧的精神注意力，将自己投入那一世界的注意力——必须尽可能长时间保持这种力。这样，就可以熬过当时的难熬。同时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具有圆满完成创作的力。

脑袋日复一日处于慢性痴呆状态。蓦然回神，已经血涌头顶，意识模模糊糊，脑浆充气一般膨胀开来。这也是全神贯注写小说的缘故。注意力过于集中，感觉上有时脑袋缺氧。但不止于此。巴勒莫的冬天过于温暖。1月了，街上却热气扑面，中午外出时穿半袖衫都不碍事。半袖顶不住的日子也很少穿毛衣。艳丽的巴旦杏花到处盛开，公园的槟榔树叶随着非洲吹来的暖融融的南风摇曳不止。路旁摊床的卖花姑娘在卖水杨枝。从寒风呼啸的米科诺斯飞来，这里的气候同乐园无异。但遗憾的是，对于我的写作很难说是理想气候。不时头昏脑胀。春天暖和没关系，夏天炎热无所谓，秋天凉爽亦无妨，这样的气候自有其必然性。若无极特殊情况，任何季节我都能像样地写作，惟独巴勒莫冬天的温暖叫我求饶。就好像汽车里的空调机出故障似的呼呼吹起了暖风，又不知如何才能制止——便是这种令人不无头疼的温暖。我基本是为了温暖来这里的，按理不该说三道四，可我时不时还是深深觉得既是冬天但冷无妨。

还有，我这人本来不怎么做梦，但那时常常做梦。

梦见葡萄酒瓶里塞满小猫崽的死尸。猫崽眼睛瞪得圆圆的淹死在细瓶子里。是怎样把猫崽塞进瓶子里的呢？我全然无法理解。另外还梦见熊猫咖喱。普通咖喱上面直接蹲着一只小熊猫，用叉子扎来吃。肉硬邦邦的。刚吃一口就睁眼醒来。现在想起都心情不快。

隔壁房间住一个女歌剧歌手，经常练独唱，有时还做发声练习和音阶练习。声音和音阶都一丝不苟，大概是在巴勒莫歌剧院演出的歌手住在了这里。另一侧隔壁房间的人养一只漂亮的暹罗猫，猫时常来我们房间玩耍，好奇心很强，却又胆小。

女佣一天来打扫一次房间。女佣来时，我们出门去附近买东西。女佣总是两人一块儿来，长相每次各不相同，其中也有令人怦然心动的美貌少女。打扫房间自是好事，问题是电冰箱里放的巧克力有时不见了一半，我的威士忌也日见其少，马桶里常有烟头扔进去。不过贵重物品倒没丢失。一直放在桌面上的钱也安然无恙，只是食物时不时减少一点罢了。我猜想，某一类意大利人面对食物时恐怕自控力失灵。

日暮时分放下笔吃完饭，往下就再也无事可做了。于是我们在房间里喝着葡萄酒看电视。因此看了很多很多电影。全部是意大利语配音。《阿拉伯的劳伦斯》的彼得·奥图尔当然讲一口地道的意大利语。若说我个人感想，我看再没有比彼得·奥图尔更不适合讲意大利语之人。保罗·纽曼还较为适合。就连东宝的《诺查丹玛斯大预言》都以意大利语配音看了。搞笑节目看了，唱歌节目看了，新闻看了，电视剧看了。如此扎扎实实看电视有生以来头一遭。此外无事可干，实属无奈之举。最后看电视实在看累了。但实在看累了也还得看。不外乎坐在沙发上边喝酒边注视荧屏上的晃动。尽管这样，心情到底为之一变。



晚上去听了几次歌剧。巴勒莫有两座歌剧院：玛西莫和波黎得亚玛。由于玛西莫太玛西莫（巨大）了，平时公演使用波黎得亚玛。从外面看，建筑物同样脏兮兮的，而进去则相当不坏。因是老建筑，作为剧院很有气派，也有相应的氛围。天花板凌空而起，包厢齐刷刷围了一圈，统一涂以金色和红色，令人怀念19世纪至本世纪初的地方文化的辉煌。入口齐整整地站着身穿老式制服的引导员。我在这里看了莱斯庇基的《塞米拉马》这一少见的歌剧和罗西尼的《谭克雷迪》（Tancredi）。《塞米拉马》前面第二排为两万里拉（两千日元多一点）。基本满座。巴勒莫是个娱乐少的地方，有歌剧时人们身着盛装来到剧院（theatron），“呀——呀——”互致问候。尽管天气温暖，人们却身穿毛皮大衣擦着汗赶来。当然是为了穿给大家看。总之这里是个华丽的社交场所。

不过《塞米拉马》这部歌剧音乐上未免冗长，而情节我又不大明白（小册子全部是意大利语），看得甚为狼狈。不仅情节相当曲折，而且全部身穿大同小异松松垮垮的白色衣服，人物无法区分。好歹看懂小册子后，得知《塞米拉马》乃是仅仅在1910年公演过一次的险些失传的歌剧，怪不得！交响乐团倒是恰到好处地传达出了莱斯庇基的音色，令人佩服。这种音色的“吻合度”令人感叹不愧是意大利（后来听了西西里交响乐团演奏的拉赫玛尼诺夫，听起来根本不像拉赫玛尼诺夫）。

《谭克雷迪》因有玛丽莲·霍恩出场全场座无虚席，反响也好。我们咬了咬牙买了一次——总该有一次——包厢票。坐在包厢里一小口一小口呷着自带葡萄酒看歌剧实在非比寻常。费用是两人一万日元多一点。《谭克雷迪》妙趣横生，观众也相当动情，但若让我直言不讳，我想尚未达到如醉如痴的程度。或者霍恩那天状态欠佳也未可知。

卡塔尼亚的歌剧院也去了，名字叫贝利尼歌剧院（贝利尼出身于卡塔尼亚）。我在这里看了威尔第的《埃尔纳尼》。免费。这是因为，我们一说是专门来卡塔尼亚看歌剧的，售票处的老伯默默给了两张招待票，微笑使了个眼色。这是在西西里发生的为数不多的好事之一。在西西里，日本人这一存在相当珍稀。

倒不是因为白拿了票才这么说的——这《埃尔纳尼》甚是气势雄壮。在西西里看的三部歌剧之中，这部最让我开心。土里土气举止粗暴的威尔第没有多少装腔作势之处，从中深切感受到的是“大家一起欢度今宵”的民众性活力。这种积极的现世气势恐怕只有在意大利地方城市才能感受到。交响乐团和角色或许比米兰稍逊几分（不过这天扮演埃尔纳尼的是林康子），但惟其如此，观众席间有一种温情脉脉的气氛——“让我们为本地歌剧加一把火吧！”而这点非常有意思。邻座的老伯一边吃橘子一边同歌手合唱。



西西里留在印象里的，不管怎么说都是吃的。不过，并不是说名列米其林[33]的星级名店有多么好吃，那种店我去过几家，大多令人

怀有疑问（我觉得米其林倾向于高度评价饭菜无懈可击的饭店，而在这点上意大利菜的美妙和气势不可能得到正当评价）。总的说来，在西西里较之所谓无懈可击，“有懈可击”的菜似乎更有味道。一如歌剧，多少有些粗鲁但还是有气势的歌剧更适合西西里的风土。在这个意义上，偶然走进的街头饭店好像更能幸遇令人心服口服的菜肴。当然，相当劣质的也并非没有领受过。

我们在巴勒莫外出就餐大体是吃午饭。晚间懒得动固然是个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半夜（即意大利晚饭时间）吃得太饱很难入睡。

一来没有一一吃遍巴勒莫的主要饭店，二来太高档的敬而远之，因此不可能断言哪一家是巴勒莫最美味的饭店，但我个人最中意格拉纳特里大街的“阿库卡尼亚”，去了三次。一直在意大利生活，去两次的饭店虽说为数不少，但去三次的则没有几家，可见一定好吃无疑。不过，意大利的饭店厨师流动频繁，一年后再去很可能味道大变，即使现在也说不准此处是否好吃。

首先，这里的自助餐式的前菜（antipasto）很够味。意大利饭店里的前菜，往往看上去似乎好吃而实际吃起来却油腻腻的令人难以下咽，但这里的非常清淡爽口，颇有家常菜风味。我们一边高兴地吃着，一边喝有力度的西西里白葡萄酒。其次值得推荐的是西西里特产沙丁鱼通心粉和墨鱼汁细扁面，这两样好吃得不分上下。沙丁鱼通心粉就是往通心粉里拌上沙丁鱼、松籽、茴香和葡萄干，美妙至极，盘子上来时味道好极了。搭配或许让人觉得不伦不类，但实际吃起来的确让人舒坦。这东西除了西西里很难吃到，若有机会去当地务请一尝。

话虽这么说，对墨鱼汁细扁面也不可坐失良机。可能你说墨鱼汁通心粉岂不到处都有，可这并非普普通通的墨鱼汁通心粉——往堆积如山的细扁面上大淋特淋墨鱼汁。乍看之时，不由让人未吃先饱，心想一个人哪里吃得下这么一大堆，可是偏偏吃得下。吃起来顺顺利利进到胃里。吃完时餐巾因墨鱼汁变得黑黑的，说难为情也难为情，但其冲击力还是务请一试为快。赤坂[34]的“格拉纳塔”的墨鱼汁我也中意，但和“阿库卡尼亚”相比，我觉得墨鱼汁的浓度差一档次。

一般说来，这家饭店每个菜的量都很大，吃完前菜和通心粉，肚

子就胀鼓鼓的了。于是我们两人点了一盘量不大的主菜分开吃。实际上只前菜和通心粉就足够了，问题是若拒绝主菜，男服务生的脸色就好像有人告诉他今晚6点世界完蛋似的。如果可能，我不想看那样的脸色，所以大致点一道菜。这里的菜数鱼好吃。鲜鱼烤好后淡淡调味，长相俨然杜鲁门·卡波蒂（Truman Capote）的领班把鱼端来，用刀和叉子动作麻利地把鱼刺和鱼肉分开。我喝蒸馏咖啡，老婆吃点心。我思忖，女人这东西恐怕天生具有用来装饭后点心的小型备用胃。

开销是五万里拉（五千日元多一点点）。老实说，吃罢这些若能挺到第二天早上不饿，说便宜我想也未尝不可。鱼相当贵，所以若主菜点肉类，费用要便宜些。

另外——这倒不是饭店菜肴——西西里的冰淇淋妙不可言。里面的水果味简直原汁原味。由于温煦如春，冬天也常在街头摊床上买冰淇淋吃。买冰淇淋时，对方总问“做蛋卷还做面包”。起始一头雾水，面包怎么回事？四下一看，原来不少人把冰淇淋夹进汉堡包大口小口吃。据我所知，虽说世界之大，但如此冰淇淋吃法仅限于西西里人。当然这属于个人喜好，无意一一吹毛求疵。

领略西西里美食也无须跑去饭店。对于自己做饭的人来说，西西里也是无比幸福的地方，因为市场里鱼铺多得不得了，刚出水的鲣鱼、青花鱼、金枪鱼、鱿鱼以及虾、贝等海鲜齐刷刷排开，应有尽有。不光鱼，蔬菜和水果也丰富得无可挑剔。葡萄酒也十二分可口，又便宜。就连对巴勒莫这座城市忍无可忍的我也不得不认为此地出产的食物——惟独食物——出类拔萃。物产应有尽有且出类拔萃的土地绝对少而又少。

---

[32] 日本明治维新（1868年）后停止使用农历，但农历的有关说法仍然保留下来，此处“除夕”指公历12月31日。

[33] 指米其林（Michelin）轮胎公司主办的以星数评价欧洲的宾馆和饭店的旅行指南书。

[34] 东京港区的地名。



南欧跑步情况

在南欧住久的一个不便之处，就是每天很难跑步。这里几乎没有跑步这一习惯，跑步的人也很少见到。在街上跑的，不是逃亡中的抢劫犯（确实有的，这种人），就是快要赶不上一天仅两班的大巴的背包客。所以，我悠悠然在路上奔跑，难免为人侧目，那眼神仿佛在说那小子怎么回事啊，甚至有人止住脚步张着大嘴看得出神。如此倾向越去乡下越明显。跑步或散步这类习惯或概念原本就是都市型文明的产物，而这些少见多怪之人对此全然不晓。

住在米科诺斯期间，基本上是从霍拉港翻过一座山（翻山相当吃力），一直跑到岛另一侧的海滩。因是冬天旅游淡季，没几个人。迎面错过的不外乎骑驴翻山来卖菜的中年妇女或农夫。冬日的米科诺斯风极大，在坡路甚至险些被吹回来。在此岛跑时被叫住几次——他们根本搞不明白我为何特意跑着翻山越岭，所以把我叫住，问道："喂，你这人，干嘛那么跑啊？"希腊人不但得闲，好奇心也强。

一天把我叫住的，是两个黑衣服中年妇女和一个戴帽子的五十光景男人，男人牵着驴，三人都像是普通百姓，晒得黑黑的，手脚粗壮。三人正站在小农舍门前聊天，我跑近时，他们停止交谈，照例点头、张嘴，怔怔看我。我察觉不妙，果然被其叫住，而且是在我跑出五十米远时从背后叫道："喂，年轻人，这边来！"

英语虽很蹩脚，但毕竟是英语。得得，谁是年轻人啊——我嘟嘟囔囔退了回来。

"你好！"我寒暄。

"你好！"男子应道。

"你好！""你好！"两个中年妇女开口。一个戴着似乎度数很大的近视镜，胖得大象一般。两人都十分警觉地定睛注视我的跑步鞋和T恤，像是说对此人马虎不得。

"呃——，你为什么在这条路上跑呢？"男子问。男子似乎担任发言人角色。

"因为喜欢跑。"我回答。同样的问话不知反复多少次了，这点儿希腊语早已倒背如流。

“那么就是说，”男子摸着腮胡继续问，“不是因为有事才跑的喽？”

“没什么事。”

三人对视一下，就我说的讨论一阵子。这时间里我或揩汗或观望周围景致，大体如此。风大，汗一凉就感冒，一心想跑。但话没说完，别无他法。

“往下跑去哪里？”男子接着盘查。

“超级天堂海滩。”我答道。

“那里够远的。”

“是啊，那倒是。”

“一直跑去？”

“所以说喜欢跑步嘛。”

“何苦非跑到海滩不可呢？”胖的那个中年妇女从旁插嘴。我心里叫苦，也许因为自己的希腊语不三不四，意思根本没有沟通。

“所以说喜欢跑步嘛，阿姨。”我也不厌其烦地重复。

“跑对身体不好。”戴眼镜的中年妇女接了一句。

“是啊是啊。”胖的表示赞同。

跑对身体不好还是第一次听得的说法，但两个中年妇女显得相当认真，双双眉头紧锁。

“不要——紧，我有力气。”我半是妥协地做出身强力壮的样子。罢了罢了，瞧我在这等地方干的什么！

接下去我们为争取沟通努力了一阵子，可惜怎么都不顺利，就好像风大之日隔着一道山谷交谈。没有接合点。男的耸耸肩，摊开双手，像是表示莫名其妙。两个中年妇女宛如脖子不够长的长颈鹿，一个劲儿缓缓左右摇头。一阵沉默。驴瑟瑟发抖。

“嗳，进屋喝杯乌糟酒可好？”胖的中年妇女说。

简直开玩笑，跑步当中怎么能喝度数那么高的酒呢！真的什么都不懂。

“谢谢！不过还要往前赶路。”我笑着拒绝。

“乌糟对身体有好处。”戴眼镜的说。

如此下去没完没了，于是我就此打住，开步往前跑。跑了一程回过头去，见他们仍一动不动往这边看着。

在南欧跑步的第二个问题点，那就是狗。一来放养的狗多，二来狗也和人一样没有看惯跑步的人，我一跑就以为是什么怪物而随后追来。若是人，虽说有点麻烦，但总可以讲通，而狗则不可能。狗这东西通常不懂话语，也就是说道理讲不通。弄不好，性命都要出问题。

在希腊一个城郊被一条大黑狗追过一次，形势相当紧迫。周围没有人，好在正害怕的时候有一辆出租车从我和狗之间穿过，得以化险为夷。

旅居西西里巴勒莫期间也为狗生出诸多烦恼。巴勒莫的赛马场旁边有一条非常不错的跑步路线，令人感激莫名。问题是如何到达那里。从住处跑十五分钟的路上有数条放养的狗。观察其他跑步者如何处理，原来他们丝毫不当回事：全都开车赶到跑步路线那里，跑完又开车回去。我没有车，死活非跑到那里不可。加油站旁边养的那条白毛狗尤其品质恶劣，我每次跑过，它都不顾一切地从后面“汪汪”叫着追赶。必定在同一地方等我，必定穷追不舍。狗的主人一般也在那里，然而狗追我他也不怎么劝阻，只是呆愣愣的袖手旁观，我用只言片语和手势抗议也全然不予理睬。西西里人对于这种事十之八九态度冷淡而固执，甚至让人怀疑他是认为别人全部喂狗才好。

别无良策，开始几星期只好手拿护身棍奔跑。而这个也有这个的问题，这是因为，此时正在大张旗鼓地对黑手党头目进行审判。黑手党方面出于报复在街头开枪打死了几个政府官员。总之全城处于戒严状态，到处全是警察。警察全都身穿防弹背心手持自动步枪，神情高度紧张。而手持棍棒从中奔跑，无论如何都需要一点胆量。狗吓人，警察也吓人。

这样一来，往下只有两种选择：或放弃跑步，或同狗正面交锋。我当然选择后者。若是怕狗和文艺评论家，岂能写出小说——这么说是有点言过其实，但岂能败在狗手下的心情确是有的。

于是，一天我主动大踏步朝狗走去。狗与我面面相觑，一动不动。我弯下腰以“你敢咬我”的眼神狠狠瞪视，狗也并不相让，“呜呜呜”低声叫着以眼还眼，似乎在说“你想把我怎么样”。我如此动真格地跟狗吵架是头一次，因此一开始颇有些担心，不知战况如何发展。但不久我即确信获胜的肯定是我，因为狗的眼睛现出困惑的阴影——它

是在为我主动出击而感到不知所措。这一来往下就简单了。不出所料，互瞪五六分钟后，狗一瞬间移开眼睛。我看准这一瞬间，从近至十厘米左右的距离冲着狗的鼻尖以最大音量吼道（当然是用日语）：

“你这个混蛋，看你还敢捉弄我！”

自那以来，白毛狗一次也不再追我了。我时不时开玩笑追它，它倒逃之夭夭。肯定是害怕了。这么着，追狗成了相当有趣的活计。

尽管为数不多，意大利还是有跑步者的，但气氛上意大利的跑步者同美国和德国的跑步者有很大不同，同日本也相当不一样。我跑了很多国家的很多城镇，但觉得意大利的跑步者作为先进国家恐怕还是属于相当特殊的那类。

首先一点，很俏。像我这样的，只要容易跑就行，一切由此开始。可是这里的人似乎不是这样，而首先讲究穿戴。这点无论大人小孩都是如此，各自下足了功夫，舍得花钱，而且确实像那么回事，令人叹为观止。若真有本事倒也罢了，究竟如何不得而知。不过毕竟在上下身“华伦天奴”外面围着“米索尼”（Missoni）毛巾奔跑，端的非同一般。

意大利跑步者的第二个特点，是极少一个人单跑，一般都是几个人一起行动。至于是因为不擅长一个人做什么，还是出于容易感到寂寞的国民性，抑或由于说不成话觉得难受，我则无从判断。最初甚觉不可思议。跑步是孤独的运动——我无意这么装腔作势，和大家一起跑也全然不认为有什么问题，但不管怎么说，一人单跑的情形实在太少了。在其他国家，感觉上大体八成是一人单跑，另两成是团体或复数，而这个国家，比例完全颠倒过来，全都嘻皮笑脸叽哩哇啦说着聊着跑步，样子极为开心惬意。一个人钻进附近树丛站着小便，那时间里其他人全都原地踏步，静等其小便结束。也罢，终究是别人的事，我不好说什么，只要人家觉得好就是，可是没必要小便都等的嘛！那一来岂不跟小孩子一个样了？若是美国人，想必不会等待。而德国人不至于跑步时小什么便。虽说同是跑步，但各国竟迥异其趣，看意大利跑步，深深觉得这个国家的人打仗很难取胜。

去二战激战之地马耳他旅行时，从马耳他人口中也听到同样的话。马耳他在二战期间一再遭受意大利的轰炸，但马耳他人对意大利

人可以说丝毫不怀有恶感，因为几乎没造成损害。“跟你说，意大利人么，除了吃、闲聊、对女人花言巧语，其他没有卖力气做的事。”一个马耳他人告诉我，“轰炸马耳他的时候也不例外。飞得低怕挨高射炮，所以从很高很高的空中‘啪啦啪啦’扔下炸弹就回去了。那东西不可能打中，不是掉在海里就是落在荒郊野外，但对他们来说那就可以了。叫扔炸弹就扔了，扔了就算完事。因此，不管墨索里尼怎么狂喊乱叫，马耳他都纹丝不动。后来德国空军来了，这个厉害。急剧下降的轰炸机几乎贴到地面，炸弹全部击中，城市夷为平地。在这个意义上，意大利是个好国家。”

我也认为确是那样。在这个意义上意大利是好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人们不至于无谓地跑步。

在德国，就连妓女都天天早上跑步，很有些像村上龙写的《纽约马拉松》。我实际在汉堡同妓女交谈过，她说她每天早上沿艾塞斯特湖跑步。因为我也跑这条路线，遂问跑多长时间。嗬，时间还真不算短。我说好厉害啊，她耸耸肩说“身体是本钱对吧”。对对，妓女也好小说家也好，身体都是本钱。

“你一个人跑？”我问。

“那当然。”她说。

喂，意大利人，听见了没有？人家德国就连妓女都天天跑步的哟，且是一人单跑！

一次偶尔看见一人单跑。也有默默跑步之人。不过一人单跑并不意味默默独跑，其中有讨人嫌的家伙凑到我身旁问我“喂跑多远”或要求“一起跑吧”，不胜其烦。明知我的意大利语不成样子，却在旁边边跑边喋喋不休。一开始我思忖这小子没准是同性恋者，但没给人那样的感觉，无非不说话就寂寞罢了。

活活要命。

南欧最不适于跑步的城市，不管怎么说都是罗马。不是说没地方跑，跑步场所完全有。例如波各赛公园，有极好的跑步路线，宽宽敞敞，景致也好，台伯河的河滨路也非常不坏，问题是如何到达那里。到达那里的路途堪称地狱——大凡人行道都被所停车辆堵死，大街小巷到处是狗粪，汽车“嗖嗖”全速行驶，空气污浊，人头涌涌。我敢保

证，没等跑到公园就已筋疲力尽。纽约通往中央公园的道路我想就够差劲儿了，但同罗马的混乱相比还算文雅的。

在罗马跑步另一点叫人心烦的，是满街乱窜的十几岁少年的恶劣表演。虽说恶劣表演，但并非纽约布朗克斯区（Bronx）的高中生吸海洛因挥舞弹簧刀那种胆大妄为的恶劣，只是丁丁当当小打小闹讨人嫌，而且被彻底惯坏了。性也早熟，据报纸调查，几乎所有的调皮鬼在15岁就完成了初次性体验，只对这一件事表现热心。意大利的学校体制如何我不晓得，反正肩挎书包的高中生初中生大白天就在那一带无所事事地东游西逛，吸烟，一对对打情骂俏。这些家伙毕竟时间精力有余而钞票不足，每次我在其前面通过，他们简直就像正闲得无聊时来了个好欺负的傻瓜蛋，哇啦哇啦大声起哄，别提有多吵闹、多烦人了。

“喂——日本人，再跑快点！”

“喂——日本人，别跑了，来个功夫拳，功夫！”

“一、二、三、四！”

如此异口同声狂喊乱叫。有的模仿我跟着跑，有的死皮赖脸拉出功夫拳架式，有的只是一个劲儿上蹿下跳，同过去《人猿泰山》电影里的调皮猴子无异。知道他们没有恶念，并不怎么生气，但还是让人烦得不行。甚至有的家伙合唱《洛奇》的主题曲。日本的高中生基本不干这种傻事。我每次看见日本的初中生高中生，都觉得他们可怜——被考试、校规、课外活动、歇斯底里的教师等等紧紧五花大绑，如果可能，真想把他们从那种消耗中解放出来。而就连这样的我看见意大利的调皮鬼时都想掐住他们的脖子教训道“你们别老这么胡作非为好好到学校学习去也考虑考虑社会上的事”。

可是一一搭理这样的家伙也不值得，自觉犯傻，于是佯装未闻地赶紧走过。

坦率地说，罗马就像个巨大的乡间集镇。以作为大城市的信息量而言，比纽约和东京（甚至米兰）小得无法再小，而且落后。另一方面，罗马的小孩子们却给人以朝气蓬勃生龙活虎之感。缺乏教养的调皮鬼每每令人心烦意乱（有两个甚至想一把掐死），但我觉得他们的眼睛要比竹下大街[35]上的孩子们平均线上的眼神灵动而光亮。用电影打比方，就是镜头剪接干脆利落准确无误，有一种拼命窥伺什么的

气势。相比之下，东京平均线上的孩子眼神不是显得无精打采似乎在说“所以嘛这样就行了”，就是神经兮兮——就像用遥控器“咔嚓咔嚓”转换电视频道那样忙乱。他们或被城市信息量所抛弃，或拼死拼活紧追不放，而基本上找不见介于二者之间者，至少我有这个感觉。在这点上，罗马的淘气鬼们可谓悠然自得。因为几乎不存在非追不可的东西，且有趣的名堂相当不少，躺在广场上朝过路人来一句“喂老伯活得还好”也未尝不可。

外出旅行，在那里的城镇跑步是蛮快意的事。时速十二公里左右我想应该是观看风景的理想速度。开车速度太快而漏看小景物，轻微的气息和动静也失之交臂，一步步走则过于花时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各种各样的人做出各种各样的反应。路的弯曲度、脚步的回声、垃圾的倒法，无不有所不同，不同得令人兴味盎然。我喜欢一边看如此城镇的表情一边悠悠跑步。全程马拉松诚然有趣，而这个也不坏。跑步之间会有一种实感：我是在活着，大家都在活着。而这种实感是很容易迷失的。

一如某种人去陌生地方必去大众酒吧，一如某种人去陌生地方必找女人睡觉，我去陌生地方则必跑步。只有通过“跑之感觉”才能领会的东西在这世上也是有的。

---

[35] 东京的街名。

罗马



比拉·托雷克里

终于回到罗马。从西西里返回的一段时间里，就连罗马在我眼里也显得比较安稳平和，不可思议。我请朋友帮忙在罗马郊外找了一家名叫“比拉·托雷克里”的公寓式旅馆（residential hotel）。虽说是郊外，但距市中心坐大巴仅十来分钟。当然，我是说如果大巴好好跑的话。房间并不很大，客厅、卧室、小厨房、浴室。在此安顿下来后，暂时不刻意做什么，呆呆愣愣打发时光——正是旅行疲劳差不多浮出水面的时候。回想起来，这个那个手忙脚乱之间，离开日本已经四个多月了。由于气候、食物的急剧改变，身体感觉似乎已一点点发生变化，头发干干巴巴，浑身酸懒，眼窝下陷，脸皮肿胀。

一如名称所示，“比拉·托雷克里”是旧公馆改造成的[36]，带一个甚是气派的大院子。而且位于小山上（托雷克里乃“三座小山”之意），视野十分开阔，罗马全城尽收眼底。从房间窗口可以望见外交部、台伯河以及有足球场的奥林匹克运动场。有足球比赛的日子，“噢噢噢——”的欢呼声甚嚣尘上，上空还雾濛濛地笼罩着吸烟的紫色烟气。刚目睹时我还以为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天崩地裂的事情。

冬末至初春期间的罗马风景给人以极深的印象，罗马城简直就像小孩子耍性子似的要把缠在身上的冬天抖掉，这点同任何时节的罗马景致都不一样。奇形怪状的云气势汹汹地在空中飘移，在山麓蜿蜒流淌的台伯河无端地闪烁着奇异的光彩。我把桌子放在窗前，写作累了，就漫然望着这样的光景。为了纺织出文章，我自己的身体也像罗马城一样耍起性子。这个季节经常下雨，甚至不时下雹子（致使阳台上摆放的盆栽紫苏全军覆灭）。雨停时，云絮强有力地四溅开来——感觉上颇像很早以前的场面壮观的电影镜头——似乎只罗马才有的眩目耀眼的太阳迫不及待地探出脸来，将城市染成一片金黄。切切实实感觉到春天即将来临就是在这种时候。

不过，同如此漂亮的景致和庭园风情相比，建筑方面很难说有多么气派。说清楚些，已经摇摇欲坠，设备也有些粗糙。墙纸褪色，处处剥裂，电梯像得了肺结核似的“吭吭哧哧”，厨房换气扇出故障动弹不得，窗扇吻合不好，热水出不来，地板吱呀作响。原先大约是蛮不

错的建筑物（甚至可能有情调）这点不难想像，但如今尽皆破败不堪。总而言之，这座旧公馆没有为使其原样保持下去而进行必要的修茸。据说，这里动不动就换经营者，致使管理不够到位。不过，只要不过于讲究，大体过得去的生活还是可以维持的。其优点首推幽静。作为我实在谢天谢地。不管怎样，总算有了可以安下心写小说的清静环境。

小说初稿于3月7日完成。3月7日是个阴冷阴冷的日子。罗马人称3月为发疯月——风云突变，冷热无常，前一天还煦暖如春，过了一夜就倒退回严冬。这天我是早上5点半起来的，在院子里跑了一小会儿，而后连续写了十七个小时，于子夜前写完小说。看日记，到底像是累了，上面仅有一句“何其快哉”。

我给讲谈社出版部的木下阳子打电话，告诉她小说大致脱稿。对方说4月初博洛尼亚有个“绘本”展销会，讲谈社国际室有人参加，最好在那里交付原稿。我说自认为是一部极有意思的小说。“哦——，原稿纸有九百页？果真有意思？”她怀疑地说。此人疑心相当之重。

翌日我马上开始第二稿，把写在笔记本上、信纸上的原稿从头到尾重写一遍。四百字稿纸共九百页份量的原稿用圆珠笔全部重写下来，非我自吹，没有体力是无论如何也做不来的。第二稿脱手是3月26日。由于想赶在博洛尼亚书展之前完成，争分夺秒往前赶，以致最后右臂都麻木了，几乎动弹不了。幸好体质上我从不肩酸，肩自是问题不大，但胳膊受苦了。所以一有时间我就在地板上一下接一下做俯卧撑。写长篇小说是个消耗极大的体力劳动，其程度远在一般人想像之上，时下开始用文字处理机，变得轻松多了。

接着又马不停蹄地开始对第二稿进行细细修改。这也彻底完成，而定名为《挪威的森林》，已是去博洛尼亚前两天了。

在“比拉·托雷克里”写小说期间，除了小说我什么文章也没写。写信的气力都没有了，甚至日记都应付了事。接下去要为一家文艺刊物把这一期间的事写下来，较之随笔，更接近自白亦未可知。

---

[36] 比拉（Villa）意为“公馆”。



凌晨3时50分的昏死

对于我，写长篇小说可以说是非常特殊的行为，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称之为日常性行为。打个比方，就好像孤身一人深入深山密林一样。没带地图，没带指南针，甚至食物都没带。树木如墙壁密不透风，硕大的枝桠重重叠叠遮天蔽日，就连里边生息着怎样的动物我都浑然不觉。

因此，写长篇小说期间，我脑袋的某个部位总是围绕死思来想去。

平时不至于思考这个。将死这个东西作为迫切的可能性加以日常性把握的，是极其少有的——三十五六岁的健康男性大多如此——然而一旦投入长篇小说创作，我的脑海中便不由分说地出现死的图像。这一图像死死贴在脑袋四周的皮肤上不动，我持续感受着它的刺痒、它的讨厌的抠抓。在小说最后完成那一瞬间到来之前，这种感触绝不剥离。

总是这样，屡试不爽。写小说过程中，我总是心想我不愿意死、不愿意死、不愿意死，至少绝不愿意在小说平安写完之前死去。想到扔开没写完的小说一命呜呼，我就懊恼得几乎落泪。也许不会成为留在文学史上的杰作，但至少那是我自身。说得极端些，如果不使小说完成，那么准确说来我的人生就不再是我的人生——每次写长篇小说我都或多或少这样想，并且似乎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随着自己作为小说家的阅历的积累而愈演愈烈。我不时躺在地板上屏住呼吸，闭起眼睛，想像自己死的情景，想像死去是怎么一回事。并且这样想道：不行，这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

早上醒来，先去厨房往水壶灌水，打开电炉。这是为了做咖啡。我一边等水开一边这样祈祷：“拜托了，再让我多活几天，我还需要一点时间！”可是——是的——我到底该向谁祈祷呢？若向神祈祷，自己迄今为止的人生实在太为所欲为了；而向命运祈祷，我又过于依赖自己了。也罢，无论向谁祈祷，只要一直祈祷，不久总会和谁顺利沟通的。我就像期待自己的祈祷迟早被哪里的外星人获取，而从山顶

上随意向很多方向持续发射信息电波的科学家。不管怎样，作为我除了祈祷别无他法，因为生息在这个不确定的、暴力性的、不完全的世界上，我们四周充斥形形色色的死。冷静想来，能平平安安一直活到现在都已经近乎奇迹。

这样，我一味胡乱祈祷。祈祷漫不经心的菲亚特别在十字路口把我挑飞，祈祷街头警察手中那悠然自得地摇来晃去的自动步枪别朝我突然开枪，祈祷公寓五楼阳台扶手上岌岌可危地摆放着的花盆别瞄准我的脑袋滚落下来，祈祷精神异常者或吸毒成瘾者别突然发狂把尖刀“咕哧”一下子扎进我后背。

坐在面对卡武尔广场（Piazza Cavour）的露天咖啡馆里，喝着蒸馏咖啡观望四周景致的时间里，我蓦然涌起不可思议的心情：此时在此地走动的人们，一百年后将荡然无存。匆匆向前赶路的年轻女郎也好正上公共汽车的小学生也好盯视电影院招牌的小伙子也好以及我也好，一百年后恐怕都要化为毫无价值的尘埃。和现在同样的阳光一百年后必将同样照耀这座城市，和现在同样的风必将同样吹过这条街道。然而，位于这里的任何人都早已从这地表消失。

也罢，这样也无所谓，我想。纵使一百年后我的小说如死蚯蚓一样干瘪继而消失，我认为那也是奈何不得的事。这并非什么问题。我所追求的，既非永恒的生又不是不朽的杰作。我追求的仅仅是此时此刻，仅仅是允许自己好歹活到把这部小说写完，如此而已。

1987年3月18日星期三，时间是凌晨3时50分。

当然外面还黑，到天亮还有一个小时多一点点，用英语说就是“Small Hours”，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称之为“灵魂的黑暗”的时刻。如此说来，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也是在写小说当中死去的。不过或许他还算幸福的，毕竟病情发作昏倒转眼之间就断气了，恐怕连考虑未竟工作的时间都没有。不，不对，倒地的刹那间说不定没写完的《最后的大亨》（*The Last Tycoon*）倏然掠过他的脑际。因为人这东西恐怕并非一下子就能死掉的。我猜想那肯定是很懊悔的事。那部小说已然在他脑袋里写完了，他只要把它变成眼睛看得见的形式即可。可是若提前死去，一切都化为泡影，任何人都无法将其复原。

我凝视窗外的夜色，考虑了一会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可以看见山

脚下排列的街灯。街灯队列沿着台伯河徐缓地迂回着，一直向远方伸去。不时有车灯划着弧形消失在哪里。不闻任何声籁。岑寂。彻底的黑。就好像置身于深深的洞底。天空星月皆无，阴云密布，如被罩上了顶盖。我缩进沙发，舔一样啜了一口白兰地。这个时候喝酒太晚了，而喝咖啡又太早了。但一小口白兰地未尝不可吧。想听音乐，又怕吵醒老婆，转念作罢。何况，在如此万籁俱寂的黎明时分有什么合适音乐可听呢？

我在沉默中沉下身体。

3点半睁眼醒来是因为做了个奇妙的梦。太奇妙了，因而醒来。我因梦见什么醒来是极少有的事。我基本上不做梦，做也当即忘光。

所以我想趁还没忘时记录下来。如此明晰而有现实感的梦是不可多得的。是的，在某种意义上，那个梦比现实本身还明晰、还有现实感。

梦中出现一座空空荡荡的巨型建筑。天花板很高，俨然飞机库。里面空无一人。我的四周飘有一股血腥味。沉甸甸滑腻腻的气味以明确的比重如断层一般在建筑物内飘浮。每当空气缓缓卷起漩涡，那气味也如心灵体[37]那样移动，并且涌入我的口中。无可回避。它同空气一起不由分说地涌进来，我可以在舌尖上感觉出那气味的动态。气味进入我的喉咙，渗入我全身每一个细胞。我这一存在已经同化在血的滑腻腻的黏液中，无可奈何。

房间左边排列着被砍掉头的牛身，右边摆着被砍掉的牛头。好像刚砍下不久，头和身仍在接连不断地流血。哪一边都摆得井然有序一丝不苟。因此，被一分为二的牛们看上去十分安静，感觉上简直就像在沉睡时间里，被割麦一般飞快地——连感到疼痛的工夫都不给——砍了头。至少牛头似乎还没觉察到自己已从躯体切割下来，这点看它们的眼睛即可了然。不过它们就算觉察到也已无计可施——只能排列在那里持续流血。

五百个左右的牛头全部朝同一方向排列。何苦费这般麻烦呢？我不得其解。无论谁做，我想都耗时费事。

房间地板上有无数细沟，宛如叶脉。细沟汇集了牛们的血，注入

房间中央一条大沟，大沟将集中的血冲入大海。建筑物外面即是悬崖，下面就是海。海已染成牛们的血色。

窗外有海鸥盘旋。数量奇多的海鸥，犹如飞蛾，数不胜数。它们聚来这里是为了牛血——吮吸沟里淌来的血，贪婪地啄食血中混杂的细碎肉片。当然仅此并不满足。海鸥在空中盘旋着窥视窗口。它们想得到更大的肉片，想得到身首分离的牛们以及我。它们不屈不挠地在空中盘旋，静待时机。

牛们定睛看我。地板上齐整整排列着的牛头，看上去仿佛经过品种改良的奇异的蔬菜。我可以清楚感觉出它们的视线。它们看着我这样说道：还没死！还没死！海鸥们则说：已经死了，已经死了！

醒来我马上看表。我出了汗。也许神经过敏，手心黏糊糊的，就像沾满血浆。我赤身裸体走去厨房，从电冰箱拿出矿泉水，倒在杯里喝了，一口气喝了三四杯。

此刻正坐在沙发上眼望窗外的黑暗。时针指在3点50分。

我不想死。

我闭上眼，想像自己死去的光景。所有肉体功能划上句号，最后一口气从肺部徐徐呼出。最后一口气比预想的硬得多，感觉上如同垒球从喉咙吐出，但到底出去了。死随即到来，缓缓地、然而确凿地。视野滞重，颜色摇曳，就好像躺在游泳池底。有人飞扑进来，水纹荡开，摇动光亮。但稍顷光也消失了。

罗马是个吸纳了无数的死的城市，所有时代所有形式的死尽皆充斥于此。从恺撒的死到剑客的死，从英雄的死到殉教者的死，罗马史连篇累牍尽是关于死的描述。元老院议员若被宣布荣誉死亡，首先在自己家里大设宴席，同友人一起大吃大喝，之后慢慢切开血管，一边畅谈哲学一边悠然死去。无名贫民的尸体被投入台伯河中。卡里古拉[38]将所有哲学家处以极刑，尼禄[39]将基督教徒喂了狮子。

在清晨到来之前的这一短暂时间里，我感觉到这种死的高涨。死的高涨犹如远处的海啸摇颤我的身体。写长篇小说时常发生如此情形。我通过写长篇小说而一点点降到生之深处。顺着小梯子，一步又一步下降。然而越是这样向生之中心接近，我越是清楚感觉出死之高

涨，感觉出就在前面很近很近的黑暗里，死也同时急剧地高涨。

---

[37] ectoplasm，鬼神附体者身上释放的一种物质（心灵术用语）。

[38] kaligula，古罗马皇帝。

[39] Nero Clandius Caesar Augustus，古罗马皇帝、暴君。



去梅塔村途中

1987年4月

在博洛尼亚把《挪威的森林》的原稿也交了，决定慢慢休整一下身心。心情畅快至极，就好像一下子全部卸下背负的行李。

4月12日星期天，棕树主日[40]。乌萨科、乌比夫妇和我们夫妇四人去梅塔村游玩。梅塔村是个小村庄，位于罗马西北方向，开车需两三个小时。相当详细的地图上也找不到。由于在远离城市的山尖上，一般没有人特意前往。人口一千左右。村正中有个酒吧，卖一点简单的食品之类，此外概无店铺。村民的职业清一色是农民，一切自给自足，几乎用不着买东西，便是这样的村落。若问为什么特意去这样的村落，因为这里是乌比生身的故乡，在此长到16岁。父母仍在这里生活。“毕竟房租便宜得不得了，”乌比说，“一年的房租才三千七里拉。”

三千七里拉约合四百日元。

我以为听错了，重问一次，但仍是四百日元。

“父亲原先一直在村公所工作——退休很久了——后来也继续住在公务员房子里，可以住到死。在这点上，这个国家非常难得可贵。不这么认为？”

“的确。”我说。

“我父亲的退休金比我的基本工资还多，不像话的国家！由于做这样的事，在财政赤字上已经破产了——等于国民从国民身上抢钱。”

“和日本相反，这方面。”

“是的是的，是相反。”乌比点头，“在这点上，我觉得日本人够可怜的。日本国家本身有钱，可是国民生活相比之下很难说多么富裕。休假少，地价高，纳税多。非我瞎吹，意大利人几乎不纳什么税。老实纳税的只我们这类公务员（他在外交部工作），其他人简直一塌糊涂。意大利经济一半以上是地下经济，国家掌握的资金动向估计不到整体的一半，所以意大利人每一个都比统计数字上的有钱，毕竟不上

税嘛！上次你不是见到我妹妹玛利亚·露西娅了么，她在米兰税务署工作，她说那简直不成样子——去催交税款，竟然一个交的也没有，根本不打算交，鼻涕一把泪一把诉说自己过着如何如何苦的日子，交不起什么税款。意大利人在这类事情上真是能言善辩。玛利亚·露西娅也当真同情起来，说税款由我替你垫上，她也是有点莫名其妙，虽说是我妹妹。”（※一年后，玛利亚·露西娅因精神官能症住院）

“是莫名其妙。”我也赞同，“那地下经济，举例说是怎么回事呢？”

“啊，最大的是黑手党。”乌比介绍说，“这类组织意大利全国大大小小多的是。另外，这个国家的人，很多人有几种职业，我的同事中也很多。白天在外交部工作，晚间在托拉斯特拉（Trastevere）的爵士乐俱乐部吹萨克斯什么的。实际上白天在外交部睡大觉，哈哈哈。这些人根本不申报副业收入。社会结构也是这样子的。若是有哪个政治家要纠正这种结构，内阁第二天就得垮台，所以谁也不着手。国民任意而行。你瞧，全都有三个星期休假：暑假、圣诞节、复活节。一家老小每个星期都在高级餐馆吃饭，阿玛尼啦华伦天奴啦，尽穿花大钱的衣服……同日本的工薪层相比，你不认为过得阔绰？光靠工资那是做不来的。”

“像是蛮好的国家啊！”我佩服道。

“国家这东西，看样子要破产却怎么也破产不了的。”乌比俨然在讲别人的事。

在此进入收费公路，却不见收费站里有人收费，于是我们没交钱。

“收费员闹罢工，”乌比说，“动不动就来一次。”

如此罢工，自是难得。若是日本，这种时候想必是管理人员出来收费。

“墨索里尼是在大胆变革国家结构上唯一获得成功的政治家。”乌比说，“没有让国民说长道短，不那样就无法在意大利人面前搞像样的政治，因为发牢骚成了国民的买卖，一一听他们发牢骚根本搞不了政治。墨索里尼把黑手党都干掉了。他唯一的失败是夸大了意大利人的作战能力，让意大利人打仗可就完蛋了。”

接着他开始谈论意大利人的事务处理能力和劳动积极性。

“春树，意大利地狱和德国地狱的故事可知道？”

“不知道。”我说。

“是这么回事，地狱入口有个传达员，询问死者：去意大利地狱还是去德国地狱？死者问有何区别，答说没有区别，都捆紧吊起来，一日三次把整个人往粪坑里泡，脑袋都不露。意大利地狱由意大利人操纵吊缆，德国地狱则由德国人操纵。你选择哪个？”

想了想，但想不明白。

“绝对要选意大利地狱。因为三次有两次忘掉，哈哈哈。”乌比笑道。此人说意大利人坏话时显得最为开心。我觉得好像很难说她妹妹就莫名其妙。

“跟你说，春树，你可晓得一辆大众车上拉四个德国人和八个犹太人的方法？”

“不晓得。”

“前排座拉两个德国人，后排座拉两个德国人，烟灰缸上装八个犹太人，哈哈哈。”

“哈哈哈。”

菲亚特就在这样的气氛中沿着免费的收费公路向西北行驶。我家老婆和乌萨克在后排座东拉西扯地说着女人间说的话。

派驻东京工作几年后返回罗马的乌比受了逆向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憎恨起罗马来了。

“如果有人想得神经病，就该到罗马来。我在这座城市磨损了生命，这里是地狱，不是人住的地方。除了罗马，我哪里都去。苏丹也好阿富汗也好洪都拉斯也好伊尔库茨克也好哪里都好，只想快快离开罗马，越快越好。日本不错，也蛮受女孩子喜欢。”（往后面瞥了一眼）“东西也好吃。六本木的‘田舍屋’让人怀念，贵是贵了些。”

“‘北国之家’如何？”

“唔唔，那里便宜，那里也不错。”他点头。“意大利大使一次去麻布一家小有名气的意大利餐馆用餐，先点了葡萄酒。不料男服务生这样说道：对不起，法国葡萄酒刚刚卖完，只有意大利的，请忍耐一下好吗？大使勃然大怒，哈哈哈，那是要发怒。随即掏出名片，说自己乃是干这个的。男服务生吓了个倒仰，天翻地覆！经理出来一遍又一遍道歉。整个大使馆捧腹大笑了好些时日。”

我甚至觉得意大利的公务员有可能整天讲笑话。

“事情是不怎么叫人开心，但大家不做工作是事实，的确不干活，无法置信。只考虑休假和吃喝。还有一点：麻木不仁。”乌比不悦地说，“前些天我感冒请假，第二天去办公室想用电脑调资料出来，结果所有数据都消失了，一塌糊涂！有人随便乱动，动错消掉了！居然有这么荒唐的事，这也算是外交部！”

乌比渐渐激昂起来。

“算了算了乌比，冷静些。”乌萨克从后面劝道，“乌比干活干过头了，像日本人。”

“不光这个，那些家伙还是小偷！”

“小偷？”我反问。

“是的。外务省不是有专为职员举办的晚会么？结果很多东西都不翼而飞，银器啦花瓶啦烟灰缸啦。难以置信，难以置信啊（此句讲的是日语）！毕竟罗马是持续腐败了两千年之久的城市，腐败到家了！”

“乌比他时常这么激动的，一说起罗马和工作单位来。”乌萨克说。

“其实我并不是讨厌罗马这座城市。”乌比冲动地双手离开方向盘挥舞起来（意大利人常玩这手，令人心惊），“城市本身我喜欢，漂亮的城市。讨厌的是住在那里的罗马人。那些家伙全部送去撒哈拉沙漠就好了！粗俗、下流、没有知识，简直是野兽！”

“好了好了。”我劝慰道。

“傻瓜蛋！”他说，“罗马一个好印象也没给我留下。以前在罗马当过几年警察，开巡逻车取缔妓女。若是警察，优惠半价。”他往后瞥了一眼（未尝没有占便宜吧），“总之那时候我很孤独。”

“当警察了？”我回问一句。此人的半生甚是波澜起伏，新情况层出不穷。与众不同的人物。

“再以前在罗马一个富豪家里做过勤杂工什么的。”

“……那，现在可是外交部官员。”

“唔，角色够多的。反正，我在罗马总那么孤独。在罗马我就沉静不下来。说到底，我是个乡下孩子（country boy），归根结底。作为军事警察在波尔查诺驻扎过六年，那时很幸福。人们热情，女孩温

柔（动不动就提女孩这点还是说明他是意大利人）。嗯，知道么，和波尔查诺的女孩约会，她们全都客气，只点便宜东西；同罗马女孩约会，那些家伙开口就要芝华士。”

“唔，明白。日本称之为‘混账女人’。”

“混账女人，”乌比重复道，“反正从波尔查诺返回罗马时我哭了，难过啊！从东京返回罗马也很难过。”

（※后来我去了波尔查诺，差不多同奥地利接壤，一座极好的城市。葡萄酒和糕点很够味儿。）

“但愿能早日离开罗马。”我说。

※

讲一下梅塔村。

梅塔是座历史可以上溯到11世纪的古村，最初在山顶尖上，1915年的大地震几乎毁了所有房屋，使村庄下移一百米左右。所以，山顶上基本原封不动地残留着崩毁的村落，一座仿佛画里的荒僻村落。

“村子孤立得很，村里的人过去几乎足不出村。”乌比说，“我母亲二战期间因为无论如何要买盐，骑着毛驴去过一次罗马。那以后四十年时间始终讲那件事，四十年！”

“听过六次了，我。”乌萨克说。

“二战的事讲起来像上个星期的事似的。”乌比说，“战争期间纳粹士兵跑进村来，以抵抗嫌疑把村里两个青年抓走了，他们再没回来。是觉得可怜，可是大家以严肃的神情一直讲到今天。难以置信。对了，还有，我16岁以前不晓得意大利存在意大利面条这个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梅塔村不存在意面，吃的都是母亲在家里做的面条，没那么圆，所以不晓得。难以置信。”

村子似乎妙趣横生，渐渐上了兴致。

---

[40] Palm Sunday，基督教的节日，复活节前最近的星期天。



梅塔村

驶离免费的收费公路前行不久，穿过一个铁道口，爬上山路。途中经过几座小镇。镇上的行人全部手拿橄榄枝——今天是棕树主日。我不明白棕树主日何以拿橄榄枝。可以看见山上有个小村庄。那就是梅塔村？我问乌比。

“No，那个小村子叫佩斯基拉。梅塔人管那里叫中国（基诺）。文明不发达，走路姿势怪异。”

“文明？走路姿势？”我吃惊地问。

“是的，同佩斯基拉相比，梅塔算是大都市了。这走路姿势嘛，的确走路姿势不一样的。因此，无论去世界什么地方都一眼就可看出佩斯基拉出身的家伙，一看走路便知。就是说，走路的样子很怪，步步紧挪，腿有点儿弯。”

“走路姿势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差别？不是相距很近的吗？”

“嗯，相距不出一公里。”他说，“但高度略有不同，地形也不同。所以，年长月久，腿就依照地形变弯了，走路姿势截然不同。反正就是不一样，看了你就知道。”

我半信半疑，但乌比说得极为认真。大概真有其事吧。

“佩斯基拉村的上面是梅塔村？”我问。

“不，那上面还有一个小村子，叫圣萨维诺，没有梅塔文明开化。人口三百左右。梅塔和圣萨维诺倒是相距仅仅二百米。”

“那，走路姿势当然也不同喽？”

“当然不同。”他做出理所当然的神色，“在梅塔村，人们全都嘻嘻哈哈模仿圣萨维诺那伙人的走路姿势。衣着不同，说话方式不同，想法和世界观也大大不同。”

老实说，我渐渐头痛起来。

“这不是说谎。”乌比说，“你问玛利亚·露西娅好了，她完全可以作证。因为千真万确。”

乌比的父亲即是这圣萨维诺出身，母亲是梅塔人。尽管相距不过二百米，但是梅塔人和圣萨维诺人通婚似乎鲜有其例。结婚已经四十多年了，然而双方亲戚之间几乎没有往来，双方亲家也都极度讨厌对

方的村子。意大利实在是个复杂的地方。

“我父亲嘛，至今仍在圣萨维诺拥有自己的田地和小屋，一有什么就跑去那边，死活不回梅塔。”

“那样的两个人怎么结婚了呢？”

“不大清楚。”乌比摇了下头，“结婚前互相厌恶，毕竟是梅塔和圣萨维诺嘛！却不知因为什么缘故，厌恶变成了爱情。”

“简直是罗密欧与朱丽叶。”

“对了，那是1939年的事，两人之间萌发了爱情。不料战争爆发了，父亲当时是法西斯党员——那时公务员差不多都是法西斯党员——立即被派去前线，25岁的时候。先在希腊作战，后在阿尔巴尼亚作战，接着去南斯拉夫，直打到1943年。1943年巴多里奥内阁向德国宣战，他被德军俘虏，送到埃森收容所，在那里待了半年，还被送去哪里的煤矿强迫劳动，最终被盟军解放，得以返回意大利，已是1946年的事了。”

“够受的啊！”

“那也不是的。”乌比说，“父亲说他蛮中意收容所，食品配给确实少，好在他本来就饭量小，没觉得怎么难以忍受。再说德国人都很地道，好像过得相当快活。他说比什么梅塔村好得多。哈哈哈。至今仍不时怀念起收容所。”

莫非真有人中意战俘收容所？“听起来人好像有点儿特殊……”我试着确认。

“是的。没准真有点儿特殊。圣萨维诺的人都有些乖僻。”

果然。

“七年都没回来，村里的人都以为父亲已经死了。我母亲一直等他归来。”

“爱的缘故。”

“还有一点令人不解：父亲至今仍为此气恼，说本来不用等的，我好不容易去战场游花逛景回来了，竟有人半死不活地等着，以致自己又不能结婚。四十年来一直为此嘟嘟囔囔牢骚不断。我想大概是出于乖僻。母亲也同样气恼——辛辛苦苦等着，回来时脑袋却比以前还莫名其妙。跟你说，梅塔出身的人比较认真、虔诚、一丝不苟。相比之下，圣萨维诺出身的人多少玩世不恭、疑心重、嘴上没德。”

“乌比他就很有这种性格。”乌萨克说。

很有些匪夷所思的一家。

首先在圣萨维诺下车。较之村，更接近于集中居住地，只有田地和房子，其他一概没有。看了乌比父亲的“小屋”，很简单，就像在葡萄酒库里安了张床。人住的痕迹的确有。自家酿造的葡萄酒桶堆了很多很多。一条大白狗箭一样跑进来，贴在乌比身上撒欢儿，我一伸手又过来撒娇。

“这条狗，看见人一个接一个咬过去。”乌比说，“圣萨维诺的狗嘛，性格像我父亲。不过它会看人的，不要紧，不必担心。”

小屋周围有小葡萄园、田、畜舍。乌比父亲不在的时候，由这条名叫托邦的狗看家。狗舍前放一个食盘，里面有里加特尼（大些的通心粉）、西红柿、香肠。意大利狗吃通心粉。

畜舍里面有兔、鸡和鹅。畜舍是石头砌的，没有窗，里面黑漆漆的，全在黑暗中静静待着。大兔守护着小兔，警觉地窥看这边。鹅一边“呱呱”叫着一边扑楞翅膀。鸡睡眼惺忪地一动不动地蹲着。全都是为吃肉养的。

“时常勒死兔子来吃。”乌萨克说，“母亲往死里勒，然后剥皮吃肉，兔眼珠掉在厨房台面上。我对这个受不了的，昨天还一起玩的兔子活活弄死端到餐桌上！可是母亲说怎么可能和兔子玩呢，不信不信。意大利人是不和兔子玩的，的的确确。”

从圣萨维诺沿着二百米长的坡路走去梅塔。确实只相距二百米。世界观、衣着、走路姿势和思考方式果真不一样？

不错，梅塔是比佩斯基拉和圣萨维诺大，而且像模像样。至少这里有街道。还有教堂，有告示板，有广场，有前面说过的小店。

“大都会吧？”乌比终于笑了。

乌比的母亲站在乌比家门前等着。

“她一直那么站在那里等我们来的。”乌萨克说。

“一直？”

“一直。意大利人的母亲都那样。”

乌比的母亲同乌萨克接吻。乌比则没任何表示。“我不喜欢那么无谓地抱着‘吧叽吧叽’接什么吻。意大利人总干这种事，所以渐渐变得不文明开化。接吻啦拥抱啦我一概不做。”此人到底有点儿特殊。

乌比的母亲个头虽小，但一看就知是个很有主见的典型的意大利式母亲。她把我们让进屋内，马上开始做午饭。菜有意大利云吞番茄酱、蔬菜色拉、煮青菜花、煮洋蓟、煮马铃薯以及两道肉菜，十分可口，全部是自家产的。饭做好的时候，乌比的乖僻父亲巴蒂斯塔回来了。此人是不折不扣的酗酒者，从早到晚葡萄酒喝个没完，饭也不正经吃，鼻子红得像圣诞老人。

“那个地方放的那些葡萄酒桶，都是他一个人喝的。一塌糊涂，活不多久了。”

“你们是在说我的坏话吧？”巴蒂斯塔说。虽然不懂英语，但说自己坏话这点还是听得出的。

“哪里，在讲托邦呢。”乌比遮掩过去，“托邦和他们混熟了。”

“上个星期喂了两个日本人，满足了，暂时不会吃日本人。”巴蒂斯塔说。有其子必有其父。

巴蒂斯塔“咕嘟咕嘟”一口接一口喝葡萄酒。的确能喝。我给他倒了一杯，他这才高兴地咧嘴一笑，然后只管绷脸坐着。他自己不倒酒。前不久中风摔倒一次，按理不该再喝酒了。

不过葡萄酒的确够味儿。虽然醇厚谈不上，但非常爽口、有香气。是酿好刚刚开桶的那种香气。我也喝了不少。炉子里有火，“哔哔剥剥”发着响声。虽说已是4月，但山上相当冷。

吃完饭，乌比邀我一起去酒吧。意大利的乡间酒吧，其作用同希腊的咖啡馆、英国的大众酒吧差不太多。梅塔的酒吧里聚集着村里所有的男人。星期天下午村里的男人不能待在家里。这个下午女人在家做针线活，男人聚在酒吧里喝啤酒、打牌或这个那个聊男人之间的话题。自古以来就是这个习惯。世上有各种各样的习惯。像我这样认为星期天午后在家里悠然自得地看厄普代克新小说更好的人，在讲究男子汉气的意大利是活不下去的。不用说，酒吧里面没有女客，清一色男人世界。有吧台，有电子游戏机，尽头有餐桌。不时有小孩子拿零钱来买糕点之类，也有来找父亲回家——大概有什么事——的孩子。

我在这里被乌比介绍给他的两个哥哥。他大哥叫菲利普，高高大大，一表人才，甚有长兄气度，只是眼神有点儿神经质。他是个成功的贸易商，特别有钱，坐一辆“梅赛德斯奔驰”，典型的成功人士。老二名叫罗伯特，身材削瘦，感觉同菲利普截然不同。此人是地方议会

的议员，前不久在村里的广场修建一个漂亮的喷水池。“难以置信吧？”乌比说，“在这种地方建喷水池到底有什么用呢？可是村里人为此欢天喜地。莫名其妙。我是理解不了。”

总之这就是他的两个哥哥。两个都住在梅塔村附近，横竖离不开梅塔村。

“离梅塔村越远，两人越没精神。典型的意大利人。生身故土最好，母亲的通心粉最好。”乌比说。

“我在日本的时候，菲利普正好有事来了日本。整整三天除了啤酒和三明治他什么也吃不下去。来日本喝啤酒吃三明治，而且是三天！难以置信。”他总是难以置信。

离开酒吧，去看乌比母亲娘家的房子。很大的石头房子，进了门，见房梁上吊着好几个硕大的火腿。这里住着两个独身的伯母。一座空空荡荡的旧农舍。里面有个秘密小房间。打开秘门，闪出大壁橱大小的空间。

“二战期间，这里藏过一个意外进村的英军飞行员。”乌比说，“母亲一家照料着他。纳粹来搜查，但没找到。那些家伙因此带走了村里的年轻人。”

“那个飞行员后来怎么样了？”

“战争结束后平安回英国去了，再也没有音信。村里人都非常关心那个飞行员的下落，几年前我去英国时托我去见那个飞行员。费了不少力查出他的住址，和我说话时他‘啪哒啪哒’直掉眼泪——想起了梅塔村。”

“他不想再来一次梅塔村？”

“好像不想。为什么我不知道。”

人想必还是有各种各样心曲的。



傍晚，梅塔村越来越冷了。乌比、他母亲、乌萨克和我们夫妇爬到山顶看古村遗址（巴蒂斯塔喝得酩酊大醉，缩回圣萨维诺那个隐身之处去了）。触目皆山，就好像《音乐之声》（Sound of Music）里的风景。除了山没有别的。山坡上点点处处紧紧贴附着梅塔村这样的

（但世界观和走路姿势不同）小村庄。冷飕飕的风呼呼吹过废屋四周。我由衰感叹：德军居然来到这样的地方！德国人大概确乎是凡事认真的种族。

“看见那里的山了吧？”乌比用手指着说，“我小时候，以为那就是世界尽头，实际上也谁都不晓得那对面有什么，谁也没告诉过我。所以，对我来说那就是世界尽头，而这里的梅塔村是世界中心。”他在风中叼一支烟点燃。“难以置信。”说着，他笑了。



春天的希腊



帕特拉斯的复活节周末和对壁橱实施的大屠杀

1987年4月

复活节周末去希腊旅行。在意大利住了一些日子之后，开始分外怀念起希腊来。

※

希腊的确有许许多多国家的背包客。从人数多的排列起来，德国人（世界上最喜欢旅行的德国人）、加拿大人（世界上最闲的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闲得似乎仅次于加拿大人）、美国人（近来少多了）、英国人（脸色基本欠佳）、北欧三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往下是日本人。没有一一确认或统计过，但大致说来怕是如此。德国人一看脸就晓得，装备也最威武。加拿大人和澳大利亚人把国旗缝在背包上，一目了然。北欧人除却德国人的威武，透出几分耽于冥想的神情。法国人脸上总好像带一点嘲讽意味，荷兰人和比利时人则似乎多少愿意与人亲近。在这些人包围中显得有些不舒服的（不过本人大概自得其乐吧）是英国人。当然这是一般印象，例外数不胜数。不过长期旅居欧洲，渐渐可以分出对方是哪国人。

不料，不知何故，压根儿见不到意大利背包客，一次也没遇上。匪夷所思。我遇上了波兰背包客，遇上了韩国背包客，甚至遇上了坦桑尼亚背包客，然而从未遇上意大利人。

我想这恐怕不是我运气不好。因为不用说，意大利人也应当背起行囊旅行的。迄今未同他们相逢估计是偶然性造成的。想必我总是阴差阳错地同意大利人走不同的路——我去那边时他们来这里。

不过，纵然把这种偶然性充分计算进去，我想意大利人不那么中意背包旅行是毋庸置疑的。不知道为什么，那种旅行形态似乎不为他们所青睐。一个人背着沉重的行囊一步一挪地徒步而行，有时只靠面包、奶酪和苹果过一个星期，有时在没有热水的旅馆里听着“咣当咣当”的门声入睡——北欧人比意大利人远为适合这样的旅行，我觉得。

北欧人，他们旅行的确是为追求艰难、贫困和苦行。不是谎言。这确实是他们的追求，简直就像中世纪各国的行脚僧。他们似乎相信体验如此旅程对其人格形成是极为有效而有益的。他们几乎不花钱、不住旅馆，为寻找二百日元的便宜旅馆而不惜在街头转两个小时。他们的自豪在于经济效率，一如汽油费。用尽可能低廉的费用去尽可能远的地方。他们结束如此漫长的苦行僧般的旅行返回故国、走出大学、步入社会，而且——举例说——作为股票经纪人取得成功，结婚，子女也茁壮成长。车库里停着奔驰、沃尔沃和两用面包车。于是，这回他们为追求完全相反的经济效率踏上旅程——怎样慢慢悠悠花钱怎样舒舒服服旅行。这是他们新的经济效率。

这是他们的人生目标、他们的人生方式。

意大利人不然。他们不太那样去想，那不是他们的人生方式。他们忙于考虑午后的通心粉、米索尼衬衫、身穿黑色紧身裙上楼梯的女孩、新型阿尔法·罗密欧的变速等等，没有闲工夫一一搞什么苦行。非开玩笑，确实如此。

前言写长了。我第一次看见意大利背包客，是在从意大利南岸港口布林迪西开往希腊帕特拉斯的渡轮上。那是复活节周末，船上挤满去希腊旅行的年轻人。许多国家的背包客聚集在甲板上。其中意大利人相当不少。船上的意大利背包客活像挤进刚刚从井口上来的矿工队列的芭蕾舞演员，一眼即可看出。以下4点尤其显眼：

①粗声大气。②举止粗俗。③衣着时髦。④大吃大喝。

其他国家的背包客已经累了或者正为前面路途的劳累蓄精养锐而老老实实待着（总的说来，再没有比背包客更老实的旅行者），单单意大利人吵吵嚷嚷。不过这也罢了，他们毕竟是背包客。背负行囊，脚上是旅游鞋。我心想，原来意大利人也像模像样穿旅游鞋。

不料到达帕特拉斯港才看明白，原来他们只是背着行囊罢了，根本不是什么背包客。一下船，就七嘴八舌说着叫着，乘上旅行团大巴一忽儿跑去哪里不见了。而背包客当然不会乘什么旅行团大巴。

意大利人。

下面说我们。我们到帕特拉斯是4月18日星期六，复活节的周末。入住港口附近一家名叫阿多尼斯的旅馆。并非想在帕特拉斯住下

才住的，因时间关系，当天转去雅典不太容易，只好在帕特拉斯住一晚上。帕特拉斯是座缺乏情趣的城市，几乎令人窒息。只有港口和火车站，旁边松松垮垮排列着楼房。连狗都愁眉苦脸。餐馆服务态度差味道也差，差得同上野站周围不相上下。在街上行走之间，渐觉心灰意冷。街上气氛就像被祖国驱逐的索尔仁尼琴那样的二流作家一边嘟嘟囔囔发牢骚一边住下来的城市。顺便说一句，这里正在办电影节，其中有大岛渚[41]的电影专场，招贴画上写道将举行有大岛渚参加的学术报告会。我不由为之一震，但没必要跑来帕特拉斯看大岛渚的电影，遂作罢。

在帕特拉斯发生了几件事。

首先，立柜的钥匙断了。要出门时把照相机什么的放进立柜锁上（立即上锁是意大利生活后遗症），回来一开就断了。不是我特意拧断的。走进房间，从衣袋掏出钥匙，以一、二、三那样的感觉随便一拧，结果钥匙“咯嘣”一声断掉。就像酒吧里作为下酒菜端上来的有些受潮的格力高（GLICO）百奇巧克力，一下子就断了，断得利利索索，无任何前兆，无任何牵连。我手中只剩下黑乎乎寒伧伧的钥匙的一半，另一半剩在锁孔里。

我去旅馆服务台告以情由。服务台坐着一个看上去二十五六的女子，亲切，但长相薄幸声音亦薄幸。我告以钥匙折断以后，她的薄幸目录上又加上了新的一页。长相委实薄幸。我心里万分歉疚。我像《局外人》中的默尔索那样嗫嚅着自言自语“不是我的责任”。不是我的责任，钥匙自己断的。

“请稍等一下，马上派负责人去。”她以薄幸的语声说。随即叫负责人。所谓负责人，就是女佣大妈。她敲我们的房间，敲得很有力。开门一看，一个很健壮的矮个子阿婆立在走廊里。她照例只会讲希腊语。我出示折断的钥匙，说“钥匙、不行、打不开”。她猛拉立柜门，拿脚踢，用身体撞。立柜“咔嚓咔嚓”摇晃。我不安起来：里面的照相机不要紧么？而门偏偏不开。

“这就拿工具来。”她说。听得我放下心来。一开始就该拿工具来。岂料她拿来的工具竟是石块：葡萄柚那么大的石块，要用来砸立柜的拉手。总之声音惊天动地。过去我不知道，用石头砸立柜拉手实

在是非常吵闹的活计，以至旅馆其他客人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全部过来察看。她“吭唷”、“混账”一声声吆喝着连续用石头击打立柜。不一会儿，石块一分为二。立柜也好拉手也好锁孔也好已经面目全非。然而门仍未开。这让我联想到只在书上看到的对古代文明的屠杀，联想到迦太基的毁灭、印加人大屠杀和撒马尔罕的陷落。

“事态怕是比刚才更糟了吧？”老婆说。

“我也那么觉得。”我说。

“找专家来难道不好些？”

“复活节的周末，不会来的。”我说。在这复活节的周末，开锁专家岂肯一个电话就能请来？什么也没有的平时都大可怀疑。

如此议论之间，大妈手持新石块回来了。这回是敦敦实实的大理石块，一看就无坚不摧。大妈出示给我们，自豪地微微一笑。我们只好报以一笑。此外有什么办法呢？

大妈随即精神抖擞地开始屠杀立柜。就像电视剧《蝙蝠侠》那样“CRASH！BOOM！BLITZ！[42]”叫着大砸特砸。木屑飞溅，柜门砸出一个大窟窿，我们终于取出照相机。倒也简单。不过我想，往下住这房间的人看见立柜门上的大窟窿会做何想法呢？如此说来，我——转念想道——在其他旅馆好像也见过类似的窟窿。

那位大妈半夜12点再次“咚咚咚咚”大声敲我们房间的门。我睡得正香，迷迷糊糊走到门那里打开。这回她抱来的不是大理石，而是带有复活节鸡蛋的面包。“复活节快乐！”说着把面包递给我。这时，港口停泊的轮船一齐“哞——”一声拉响汽笛：“复活节快乐！”

复活节全希腊要烤几万只羊，整只羊串起来架在火上来回旋转着烤。人们聚在院子里，一齐烧烤可怜的羊。油“嗞嗞”滴落下来。春天来到希腊。

我们看着家家户户院子里烤羊的光景，乘大巴一路向雅典赶去。星期天清晨，天气好得出奇，正好烤羊。

大巴在科林斯运河那里停下，乘客们下车休息十五分钟。我们一边望着运河，一边嚼着昨夜旅馆大妈送给的复活节面包。面包正中有一个涂成红色的煮鸡蛋。“吧唧吧唧”嚼完面包，剥鸡蛋吃了。阳光暖洋洋的，感觉上简直就像来郊游吃盒饭。大巴乘客全部是希腊人，外

国人除了我们只有一个单独旅行的小个子英国女孩，她说去了在德国认识的一个熟人那里，从那里坐火车转来这里的。“来找好阳光的。不过，假期已经没了，准备乘今天下午的飞机回伦敦。阳光差劲阴惨惨的伦敦，大学里的课，得得！”她笑道。随后我们又上了大巴。

阳光好的国家——希腊。

时不时有什么毛病的国家——希腊。

我们大巴的引擎跑到距希腊十五公里的地方死掉了。死得利利索索，“咔”一下子。司机和乘务员活像盯视突然倒地咽气的老马的御者，木然抱臂看着彻底沉默的引擎。什么也不做，光是注视。“我们怎么办呢？”我问乘务员。

“不知道。”乘务员沉下脸说，缓缓摇了两下头。英国女孩和我们不再对大巴抱有希望，赶紧拦住一辆出租车。我们可没工夫慢悠悠哀悼引擎之死。再说女孩要赶下午的飞机。我们钻进出租车离去时，司机和乘务员仍全神贯注看着引擎不动。

1987年复活节的周末，死了相当不少东西。

数万只羊、阿多尼斯旅馆的立柜、开往雅典的大巴的引擎。那不是我的责任。

---

[41] 日本电影演员、导演（1932— ）。

[42] 大意为“爆裂”、“轰隆隆”、“闪电战”。

 从米科诺斯去克里特岛、浴缸之战、101号酒宴大巴的光与影

复活节时的雅典暖融融的，正适合穿短裤和T恤。在公园悠悠散步之后，因无事可做，便在欧摩尼亚广场附近的电影院看《野战排》[43]（后面座位上的一个流里流气的大块头黑人亢奋地一个劲儿狂喊乱叫什么“fuck it fuck[44]”），吵得不行，根本谈不上看电影看报纸，上面报道说，一个专门杀害有钱人抢夺钱财的杀人团伙在雅典被逮捕。至今他们已经杀害了七个有钱人。其中一个竟是欧摩尼亚广场乞讨的失明乞丐——行乞几十年，因此成了大富翁。一塌糊涂。城市里发生的事五花八门。另外，同一家报纸还报道中曾根康弘去美国会见里根总统，以及“一美元兑换一百三十七日元”。

由于复活节的关系，雅典街上空空荡荡。人们不是回老家就是出门旅行了，商店大多落着铁帘门，街道没有活气。男服务生们无可奈何似的招待客人。常去的便宜餐馆关门了，只好去普拉卡附近面向外国人的餐馆吃饭。味道固然无可挑剔，但看付款单，上面有所谓“多隆”（DRAWN）一项，要另外加钱。这东西从未见过，于是叫男侍应生过来询问。对方说是复活节期间官定特别费用，类似日本的正月费用。加收百分之七。不仅餐馆，出租车也加收。也罢，既是官定费用，倒也算是“阳光付款”。

在雅典消磨了两三天时间，然后又乘镀锌铁罐般的飞机去米科诺斯。因为想见一下久违的范吉利斯，同时也想看看春暖花开的米科诺斯。范吉利斯仍然悠哉游哉地继续做工，管理员室的金丝雀已经生了小金丝雀，常来家里玩的母猫听说生了四只小猫。我在意大利买了儿童皮鞋作为送给范吉利斯的孙子的礼物带了去，递出的时候，范吉利斯甚是欣喜。“跟你说春树，退休金真的快了！”范吉利斯拍着我的肩兴冲冲地说，“退休金终于要下来了。这回不用干也可以了。干到夏天，秋天就不干了。往下舒舒服服过日子！”

那好啊，我说。范吉利斯像以前那样为我们做了浓咖啡，吃午饭的时候甚至把太太玛利亚做的盒饭分给了我们。这东西真是好吃。

※

不过糟糕的是，我们到达的第二天，米科诺斯就彻底返回了冬季。我打算畅游一番，带了游泳裤来，但风又猛又冷，根本谈不上游泳，甚至日光浴都无从谈起。雅典的温暖魔术一般变成了寒冷。米科诺斯人也都说“直到昨天还热得异乎寻常呢”，他们也浑身发抖。得得，只好在房间里看书，或翻译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富家子弟》（Rich Boy）。结果在米科诺斯待了十来天。

相隔很久我重读了卡赞扎基斯的《希腊左巴》，于是特别想去克里特岛。众所周知，克里特岛是《希腊左巴》的舞台。卡赞扎基斯出生于克里特岛，因而他怀着极深的挚爱之情（有时转变为扭曲的憎恶）描写了此岛的风土人情和男男女女。从米科诺斯到克里特乘飞机瞬间可达，那么就去一趟克里特好了。至此为止，进展照例顺利。

不料，往下就没有想的那么一帆风顺了，因为那场臭名昭著的米科诺斯飓风（J·G·巴拉德式、世界末日式、隐喻式、神经质式的飓风）几乎一刻不停地呼啸。反正从早到晚刮个没完没了。无论飞机还是轮船都停运了，没有进岛航班，亦无出岛航班，总之彻底孤立，惟有风肆无忌惮地呼呼大刮特刮。不具有一定重量的物体统统被吹去天涯海角，草木如蒙克[45]的画一般变得七拧八弯。天空被染成阴郁色调，灰色的云犹传递坏消息的使者飞快赶来又飞快离去。海面白浪滔天无边无际，渔船系在港里百无聊赖地“咔嗒咔嗒”摇晃着桅杆。几乎看不见行人身影。人们闷在总好像有点神秘意味的俨然白色糕点盒的房子里，紧紧关门闭户。至于他们在里面干什么，我则不知其详。或织东西，或看书，或看出租录像带——也就干这些吧。反正闭门不出。只有狗和海鸥不在乎什么风，在地上和空中旁若无人地跑来蹿去。

别无良策，只能在寒风呼啸不止的米科诺斯再等三天，等飞机起飞。没什么可做，也没心绪做什么，闷在旅馆房间里静静观望窗外罢了。而且冷得不行。

由于太冷了，遂求旅馆主人借状如抛物面天线的超旧型电热炉一用（可要瞒着别人哟！毕竟大家都冷得不得了。只偷偷借给你的）。

在电热炉前瑟瑟颤抖着熬过一夜。如鱼市一般湿冷湿冷的风从窗缝飕飕直吹进来。

和我们同样困在旅馆里的还有两个背包旅行的荷兰女孩（两个都练就紧绷绷的体型，足可胜任阿诺德·施瓦辛格的对手）、一对举止高雅文静的法国老夫妇、不明国籍的年轻男子（此人连续两天凌晨4点回旅馆“咚咚咚咚”猛敲已经锁上的旅馆大门，旅馆主人不起来，客人中的一个嘟嘟囔囔起身出去为他开门。如此风急月黑之夜在哪里干什么了呢？），此外还有一个持智利护照的谜一样的中年男人。他寡言少语，一个人安静地喝炖菜汁（Stew），仿佛格雷厄姆·格林[46]小说出现的那种类型。这些人在飓风中的米科诺斯寸步难行，在这小山顶上的旅馆里。

也罢，毕竟风云突变，飞机不起飞自是奈何不得，对此我不再多想。问题是飞还是不飞总也没个明确消息，去港口附近的奥林匹克航空公司的办事处询问今天飞机飞还是不飞也全然不得要领，老是回答“那种事我也不知道”。万般无奈，便提起行李搭出租车花二十分钟跑去机场，两三个小时坐在候机大厅等待有无航班的通知。得知还是不飞之后，又提起行李返回。如此持续三天。不用说，这是相当折腾人的。在机场逮住航空公司负责人询问也问不出像样的答话。他们也什么都不知道，越被大家问越是慌乱。依我观察，希腊人是比较容易慌乱的种族。千方百计把事办好的意愿是有的，但事态稍一复杂，就变得慌手慌脚，有时开始发怒，又有时情绪低落。在这点上，意大利人正相反。意大利人从一开始就缺少把事情办好的意愿，因而即使不顺利也很少慌乱。至于喜欢哪一种，那纯属爱好问题。

如此这般，在机场候机大厅坐立不安地过了三天。也遇见了几个日本人，交换了信息。一个是必须接一家杂志摄影组的负责协调的男孩，因为不知来还是不来，只好在机场不屈不挠地等待来自雅典的航班。我觉得不忍，便将手上的最新一期《焦点》（FOCUS）给了他（至于我何以有那种东西，解释起来话长，此处从略）。其余两人是讲关西话[47]的女孩。诉说从雅典起飞的航班已经定了，这里却飞不过去，急死人了。那是要着急的，我想。一如绝大多数两人结伴旅行的女孩，一个俨然发言人（Spokesparson）口若悬河，一个在旁边面带微笑，一个瘦尖尖的，一个胖乎乎的。

第四天早上，风终于止息。5月2日，星期六，风丝皆无，波平如镜。风一旦消失，就彻底消失，没有所谓中间过程。我们提起行李赶到机场，钻进较之飞机更像是退役的超旧型潜水艇的双引擎飞机。乘客共八个人。初次目睹希腊国内航线航班的人心里想必生疑：喂喂，这种白铁罐似的东西真能载人升空？不过别担心，照飞不误。毕竟袭断希腊国内航线的奥林匹克航空公司以少有事故闻名。但若让我发表个人意见，这一事实恐怕不能证明奥林匹克航空公司技术有多么出类拔萃。这是因为，这家航空公司天气稍微不好就取消航班，此外还动不动就罢工。较之飞，莫如说以不飞闻名。但不管怎样，没有事故总是可喜可贺。



到达克里特。伊拉克利翁过而不入，乘大巴朝南海岸进发。以前我来过一次克里特，那时看了克诺索斯宫殿，那东西不值得看第二次（总的说来我对古迹没有兴趣），统统一路通过，径直向南。克里特南岸不远的对面即是非洲，加之季节已是5月，我们打算美美畅游一番。然而正如此次旅行的打算多数落空，这个打算也化为泡影。5月的克里特同5月的江之岛海岸[48]气温上没有多大差别。那么，我们到底为了什么跑来克里特的呢？跑来克里特到底为了什么呢？

也罢，来了就是来了，反正。

从伊拉克利翁开来的大巴翻山越岭，穿峡过谷，跑过只有葡萄园和橄榄园的平野，傍晚开到一座名叫阿基亚·加里尼的不大的港城。导游册上介绍说阿基亚·加里尼是一座珍珠般美丽的海滨城市，而我们对这一说法不能不多少怀有疑念。在我们眼里，阿基亚·加里尼看上去不过是个一副寒酸相的二流观光地。这么说或许过于苛刻，因为这样说起来，克里特岛几乎所有的城镇都成了寒酸的二流角色。不过，在克里特街头转上几天，这种“寒酸的二流性”便渐渐和身体亲和起来，心情亦随之放松下来。这也是克里特的长处。这座岛至少眼下还不是赶时髦的效益型机械观光岛。

反正到了阿基亚·加里尼。事先晓得傍晚到达，旅馆已经订了，而且是在有巴士接送的正正规规的旅馆住两晚。毕竟我们已有三个星期

没好好泡过浴缸了，所以委托旅行代理店的约翰，由他预订保证有像样浴缸的旅馆。

岂料，从港口爬五分钟坡路到那旅馆一看，大厅黑乎乎的，不见人影，但闻用大锤子砸碎什么的“咣咣”声一阵紧似一阵。一种非常不吉利的预感。按了几次铃，出来一个六十上下的秃脑瓜子矮小老伯，口称“guten Abend”[49]。原来这老伯只会讲希腊语和德语。我的希腊语实际上停留在基础水平，德语仅在大学学过，早已锈迹斑斑近乎解体。不过勉强可以沟通。老伯说的大致归纳起来是这样的：

（1）对不起，正在施工当中，热水完全没有。

（2）理应结束了，但由于我所不理解的缘故仍未结束。这不是我的责任，无论如何都是施工者的责任（所以你抱怨可不好办）。

（3）但是他们说三小时后可以结束，别担心。

得得，不顺利时诸事皆不顺。“三小时后真能结束？”我叮问道。“不要紧，师傅说得很明确。”老伯笑吟吟地说，“所以请在那边的酒吧慢慢吃点儿东西，吃完回来不一会儿就能有热水冒出来。”我心想能么，老婆也想能么，可是钱已经付了，不可能另找旅馆。好容易预订一次旅馆，竟落得这么个下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像大多数夫妇那样互相推诿责任，不久这也累了，遂进附近酒吧式餐馆吃晚饭。喝本地葡萄酒，吃菜花模样的色拉、粥样的东西、黄瓜、小鲷鱼和酿西红柿。非常可口，又便宜。饭后在港口转一阵子，快9点时返回旅馆。但如我们凭直觉（或凭经验）所料，到9点热水也出不来。

去大厅一看，一个看样子正直而又有几分懦弱的德国人已经在向老伯表示抗议了。这个德国人带着长相同样显得正直的太太和婴儿旅行。后来得知在这家旅馆投宿的客人只有我们。我问德国人怎么样了，他用英语对我说施工根本没有结束。跟在老伯身后去地下锅炉房一看，三个工人正发出很大的声音干一种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活计。“反正正在抓紧干。”老伯解释说。但这么解释也没用，我们需要的是热水。“不是说9点之前弄好的吗？”我抗议道。“就是！”德国人也说。老伯向施工人员抗议：“不是说9点之前弄好的吗？”施工人员则莫名其妙地反唇相讥。全然没有结果。“那么，几点能有热水出来呢？准确地？”

“12点。”老伯说，“他们说12点保准能出热水。”

能不能呢？我想。能不能呢？德国人也似乎在想。希腊人难道会工作到12点？

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不出所料，没热水出来。热水出来是在最后一天的早上。我用冷水刮胡子刮脸。老婆没澡洗，嘟嘟囔囔地抱怨。我当然也不愉快。但在希腊住久了，人都会开始懂得听天由命，即使完全不能游泳，即使没有热水洗澡，即使旅馆主人几乎不表示反省。

想不出有别的事可做，遂坐大巴去附近海滨游玩。那里有个叫普拉基亚斯的比阿基亚·加里尼寒酸两三倍的镇。海岸的确是有，但冷得游不了泳，有也等于没有。一看就知道没有钱的三十几个铁杆背包客在海岸无所事事地转来转去。作为实际问题也无事可干。他们之所以来这里，不过是因为克里特这座岛的海岸有个叫普拉基亚斯的镇并且想来看一眼罢了。这种事惟独闲人才干得出来。我倒也没资格说别人。

当然要从这里返回阿基亚·加里尼那座旅馆，但这辆大巴同样是个令人吃不消的劳什子，司机一边随着收音机里的歌声快活地唱着，一边在弯弯曲曲的悬崖峭壁路上快速蹦来跳去。糟糕，不要紧么？正担心之际，果不其然，左拐弯时一个车轮在山崖悬空，车厢陡然倾斜。我虽然早已不抱希望了，但还是稳住神，好歹挺着身子，得以有惊无险。乘务员以“瞧你瞧你”的神情看司机，司机也随即中断了十多分钟的歌唱——恐怕多少还算是个事故。

幸好中途换乘另一辆大巴。在山顶等了三十多分钟，来了一辆番号为101的开往阿基亚·加里尼的大巴。上车的有我们两人、一对相貌温和的英国老夫妻、大约30岁的德国单身游客、两个结伴的希腊一二十岁年轻人，以及当地一个大妈。这辆大巴起始跑得蛮认真，后来又开始莫名其妙起来。时近中午，司机和乘务员在车上大开酒宴，当然是在行驶当中。

骚动是从司机在哪里一座小村庄熟人那里拿到一瓶葡萄酒开始的。司机在那座村庄停下车，和乘务员一起走进一户人家，十多分钟都不出来。那时间里，我们就在车厢里静静等候司机和乘务员返回。司机拎着一升左右的大瓶子回来了。我当即预感事情不妙，果不其然，那东西是当地土造葡萄酒。在下一座村庄司机又把大巴停下，这

回乘务员单独下车，走进做奶酪的人家，买了一个排球那么大的圆形奶酪上来。如此这般，大巴上的酒宴开始了。

坐在最前排的希腊大妈向司机以责怪的语气说“喂喂你喝的是葡萄酒吧”。“水呀，水！”司机笑着搪塞，不久说“大妈你也来一杯”，遂把葡萄酒倒进杯里，切了一块奶酪递给大妈。不知不觉之间，包括我们乘客在内的车上所有人员全部聚到前面大吃大喝起来。司机已然醉意上来，用看样子足可剥鹿皮的尖刀切开奶酪分给大家。问题是随着车身的摇晃，尖刀在坐在第一排的英国老夫妻鼻尖前闪来闪去，闪得二人把肩靠在一起，脸上浮现僵硬的微笑，直冒冷汗。司机早已不看什么路面，兴高采烈唱着、开着玩笑，并且哈哈大笑。道路依然险象环生，七拐八弯。

不过，这次旅行当中喝到这么美妙的葡萄酒是初次，吃到这么美妙的奶酪也是初次。不是夸张。的确美妙得难以置信。当然葡萄酒不是上等货，葡萄是那一带农家院里栽种的，然而的的确确好得令人大有觉悟之感。我不由愕然：我以前在这希腊到底吃的什么、喝的什么呢！单纯、新鲜，有一种深厚的温煦，乃是直接植根大地的撩人情怀的香味！遗憾的是，餐馆里没有如此味道的葡萄酒。总之我们酒足饭饱平安无事地到了阿基亚·加里尼。乘客们以既像释然又像满足、既似乎还想乘此大巴又似乎一次足矣那样的复杂心情走下大巴，全都同司机和乘务员握手、拍肩膀，互道再见。说到底，克里特就是这样一座岛，好也罢坏也罢兵荒马乱也罢粗枝大叶也罢。倘若一一细想细究，无论如何也活不下来。啼笑皆非。



说实话，这辆101号酒宴大巴，两天后我们碰巧又一次同它相遇。司机换了一个，乘务员则是同一人物。总有一种凶多吉少的预感。在希腊和意大利旅行久了，我们开始具有——无论我们情愿与否——这种预感能力。一如特洛伊的卡珊德拉[50]，我们只能看见所预感的凶面。遗憾的是这种预感大体成为现实：蓦然觉得奥林匹克航空公司可能因罢工停飞，果然停飞，蓦然觉得意大利火车可能晚点两个小时，果然晚点两个小时（不过以概率来说，这两个例子都很难称为

预感）。

话说回来，那时关于这酒宴101号大巴的预感也是百发百中。大巴行驶正当中货舱的盖子开了——司机没有好好关合——里边装的旅客行李有两件掉在路上。时速高达一百公里左右，司机和乘务员都没觉察行李落地。所幸最后排一个背包客注意到了大声呼喊，车总算停下，后退把掉落的两件行李拾回。噢，还好……正庆幸之际，发觉情况不好，因为那两件行李双双是我们的行李。一件是我背的觅乐牌大号背包，另一件是老婆的尼龙背包。下车查看，觅乐牌背包在路面上摔出一个窟窿。我自然向司机抱怨了，但抱怨就能得出某种结论不成，当然得不出，无非话语在空气中徒然游移而已。英语几乎讲不通。无奈，我向司机出示摔出的窟窿，并用肢体语言（body language）这样诉说：怎么办？出了个洞！司机耸耸肩，摊开双手，用手指着货舱门：这里，开了！喂喂喂，那不用你说我也知道，所以说，那是你的责任嘛！知道么，是你的责任！我用英语和法语和日语叫道（生气时候日语相当管用）。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是白白浪费时间，如同用西班牙语向在路上碰见的大角鹿问路——“对不起，大角鹿君，森林出口在哪儿啊？”无论做什么说什么都无济于事。向大角鹿问路本身就是错误的。我把为准备说什么而吸进去的空气原样吐出，无奈地摇头。司机也同样摇头，而后“通通”拍我的肩，仿佛说飞来横祸啊！

这就是克里特岛。说好几次了，倘若拘泥于细小地方，横竖活不下来。希腊左巴肯定这样说：跟你说先生，那个窟窿是神心血来潮赏给你的。神时常做离奇的事，但统统合计起来，还是好事居多。所以就算了吧。这么着，我也做出阿兰·贝茨[51]那样的神情，不再追究背包的窟窿。

这便是101号大巴的光与影、酒宴与窟窿。

---

[43] Platoon，美国导演奥利弗·斯通拍摄的影片，获第59届奥斯卡奖最佳影片奖。

[44] 骂人话。大意为“性交”、“干”。

[45] 挪威表现主义画家（1863—1944）。

[46] 英国小说作家（Graham Greene，1904—1991）。擅长间谍小说、惊险小说。

[47] 日本大阪、京都一带方言。

[48] 位于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

[49] 德语“晚上好”之意。

[50] Cassandra,希腊神话中特洛伊王帕里斯的女儿，曾预言特洛伊战争。

[51] 英国电影演员（Alan Bates，1943—2003）。



克里特岛的小村庄和小旅馆

克里特山洼里的小村庄和小旅馆。旅馆仅此一家，名字叫“翠微旅馆”，英语叫“GREEN HOTEL”，却没有人会讲英语。村庄里可看的东西一样也没有，但由于物价低，疲于奔命的背包客们（他们简直就像嗅到糖罐味儿的蚂蚁一样为寻找物价低廉的地方而没头没脑地四处流浪不止）看样子没有放过这里，旅馆饭厅的板架上一本接一本——俨然青春的墓碑——排列着他们看完扔下的简装书。他们全都把看完的书扔下，又把想看的书带走。

《希腊左巴》就有三本。英文版两本，德文版一本。另外有西德尼·谢尔顿（Sydney Sheldon）、温斯顿·格雷厄姆（Winston Graham）、J·G·巴拉德（J·G·Ballard）、杰克·希金斯（Jack Higgins）、哈罗德·罗宾斯（Harold Robbins），以及德文版韦尔伯·史密斯（Wilbur Smith）的两部小说、法文版詹姆斯·哈德里·切斯（James Hadley Chase）等等。瑞典文、荷兰文、意大利文等差不多所有的语种一应俱全，而且哪一种都狼狈不堪。稍微离谱些的，有《瑟伯》（Vintage Server）、《柯莱特（Colette）选集》、《凯雷尔·拜伦的职业》这样的货色。更离谱的，竟有《美国联邦调查局白皮书》（资料相当专业）和《美国的工会（图片版）》之类。到底哪里的什么人把这种东西带来克里特岛的呢？我全然揣度不出。莫非《美国联邦调查局白皮书》和《美国的工会（图片版）》是同一人带来的不成？一切都是谜团。

一句话，似乎能引起我兴趣的书几乎没有。难道背包客属于不看正经书的群体？还是说这家“翠微旅馆”的饭厅板架上惟独无人领取的书犹如运河的淤泥静悄悄沉淀下来了呢？估计后者的概率高些（究竟有谁会在克里特岛看柯莱特呢）不管怎样，我从这大风刮来的不起眼的书堆（library）中挑出一本名叫斯蒂芬·布鲁克斯（Stephen Brooks）写的报告文学《乡村酒吧雪糕》（Honky-tonk Gelato）——后来才明白此书虽题材有趣，但内容枯燥无聊——用来同刚刚看完的《战火浮生》（Mission，罗伯特·鲍特写的那部影片的原作，在米科诺斯的书报亭买的）交换，另外放下一本新潮社寄来的作为新潮

文库新书之一出版的《象厂喜剧》（安西水丸、村上春树著）。既然有这么多书，那么有一本日文书恐怕也是应该的，即便在克里特岛山洼里的小村庄的小旅馆的饭厅那世界末日一般凄清而脏污的板架上。

甚至旅馆房间的锁头也不存在。试着问有没有锁头，老太婆说了声等等，随即从哪里拿来一大串脏兮兮的锁头。“反正这里边有一把”，她说。可是哪把锁头看上去都没了模样，以往那种“不吉祥”的预感掠过我的脑际：一旦锁上，没准再也打不开。预感犹如莫里斯·拉威尔《夜之加斯帕》里的日暮钟声从远处“咚——咚——”传来，令人毛骨悚然。于是我说不用锁头。想必没有人用那玩意儿。在这个村庄里，要房间锁头的人怕是无可救药的变态分子，肯定。

小村庄中间夹一条路，银行一家，克里特银行。咖啡馆两家，酒吧两家。公共汽车一日三班。教堂一间，墓地一处。做什么不清楚，反正有一家似乎做什么的小工厂。面包铺和肉铺和杂货铺。糕点店和电器店。挂有“ROOM TO LET”（出租房间）招牌然而毫无人气的房子。有一个小广场，小广场上有饮水站，一排狮子头状的水龙头，每个狮子头都从口里出水。便是这样一座村庄，不出五分钟即可穿过。游客除了我们夫妇，另外只有一对不怎么起眼的中年夫妇，和他们在路上碰见几次。每次碰见，双方都显得有些难为情——作为我们也好作为他们也好，都无法向对方提示何苦非在这光溜溜一无所有的村庄住一晚上的理由。

不过地方还算安静，这点足可保证。清晨人们牵着驴、山羊、马、绵羊这个那个的走去农田或原野，傍晚又带着同样的动物返回。清晨和傍晚，路上全是这些动物的叫声和蹄声。山羊脖子上拴的铃铛叮咚作响。

简洁明快的人生。

没有文学的内在必然性，没有作为内在必然性的文学，没有以文学形式出现的内在必然性，没有诉诸内在必然性的文学，没有文学性内在性的必然性，没有内在性文学性的必然性，这些劳什子统统没有，只有驴和山羊。

驴和山羊通过后，天就黑了。由于别无事情可干，遂去仅两家酒吧中的一家。因为已经在另一家（扬尼斯餐馆）吃了午饭，所以晚饭必然（非内在必然）轮到这一家。彼此彼此，反正哪一家端上来的东

西都一样。客人只有我们。一位老伯搓着手走了出来，样子像是说稀客稀客。我提出想喝本地葡萄酒，对方说倒是黑的更好喝。红的白的玫瑰色的都听说过，黑的却是头一遭。尝了一口，果然好喝。简直像药水似的刺舌头，但味道坚挺醇厚。看情形是自家酿制的，装在脏兮兮的一升瓶子里，摆在厨房地板上。也罢，来半升好了。接下去要了一盘希腊色拉、两盘炒土豆片。炒土豆片盛得满满的，足够喂冬眠醒来的狗熊。之后又喝了一瓶蕾契娜酒。一共七百日元，不认为占了便宜？

饭后正坐在外面椅子上呆呆眺望晚霞，村里七八个小孩把我们团团围在中间。大体是7岁至14岁小孩，年纪最大的领头女孩十分漂亮，看上去很聪明。她们互相捅来捅去，或嘻嘻笑着或不好意思似的观看我们喝葡萄酒，有的还跳了几下。想必因为从没见过日本人而觉得好奇，实际不出所料。领头女孩来到我身旁（花了十几分钟才下定决心），叫我耍几下功夫："功夫会的吧？""当然！"我撒谎道。让女孩儿失望有违我的信念。"那么，只一点点哟！"我说。说罢耍了一点点，仅仅拉个花架子罢了。毕竟我也研究过李小龙。孩子们现出"哇——、到底厉害"那样的神情走回家去。估计明天要去学校里炫耀的："喂喂，我们昨天看见真正的日本功夫啦！"即使我这人，偶尔也还是对谁有所帮助的。

偶尔。

上面写了，旅馆门没有锁头。可这扇门别说锁头，连门闩也没有，以致整整一晚门都被风吹着，在我耳畔乒乒乓乓叫个不停。不知何故，听这风声的时间里，我想起了贝多芬的《爱格蒙特序曲》。也可能是因为初中音乐教室墙上挂的贝多芬肖像画做出的是那种绝望（desperate）的神情——那种住在一无门锁二无门闩的廉价旅馆里通宵耳闻房门乒乓之声的神情。

翌日，一边在扬尼斯餐馆里吃午饭，一边等待开往雷西姆农的大巴。邻桌一个年老体衰的保险公司职员（即当下的保险公司职员）模样的单独旅行的英国人正忍无可忍地吃着上面浮一层厚厚油腻的煮牛肉。我们只点了葡萄酒和色拉。车来了，我付罢账，把一个星期前就想扔而没扔成的破烂不堪的耐克鞋（不知为何，每次扔时都有人给送

来）包在纸袋里放在餐桌下，钻进大巴。好了好了，总算扔了！不料高兴早了，酒吧老板特意把大巴叫住："基里奥斯（你）、这个忘了！"我的破烂不堪的耐克跑步鞋！它就像谁都不肯忘记的往日小小过失一样紧紧缠住我不放。"谢谢！"说着，接过纸包。

我又能说什么呢？

如此这般，我们把克里特岛山洼里的小村庄甩在后面，这往后恐怕永远不会到访的小村庄。

到达雷西姆农时，我当然若无其事地把耐克鞋纸包塞在了车座下面。可我一直担心到天亮，有人敲宾馆房间门把鞋送来："基里奥斯，这个忘了！"好在没人来，谢天谢地！



1987 年，夏天和秋天



赫尔辛基

1987年初夏，我差不多时隔一年返回日本，目的是为了拿《挪威的森林》的清样。猜疑心很重的讲谈社的木下阳子（她本人自是矢口否认）也说"唔，极有意思"。于是放下心来。原本担心她若说出"什么呀这个光是拖拖拉拉的"可如何是好。另外旅欧期间（说法好像有些过时了）完成的保罗·索鲁（Paul Theroux）的《世界尽头》（World's End and Other Stories）和布莱恩（Courtant Dixon Barns Bryan）的《伟大的德斯里夫》（The Great Dethriffe）的翻译清样也要校对，就是说要把一年来的稿件集中处理完毕。虽说是工作，但毕竟要干的事太多，整个夏天为此报销了。

三本书的装帧定了下来，又同编辑这个那个商量完细节一一处理到只剩下印刷之后，再次离开日本。很有点像一次做好一个星期饭菜冷冻起来的主妇。从日本动身是9月初。虽是短期回国，但事情相当累人。要和人打交道，要处理红薯蔓式的接踵而来的杂务，脑袋成了一团乱麻。美味日本料理又要一段时间吃不成了，难受也只好忍了。

这次乘芬兰航空经赫尔辛基南下罗马。赫尔辛基是第一次来，准备住五六个晚上。北欧国家的航空公司大都叫人喜欢，芬兰航空更是我中意的航空公司之一。空姐绝对不算漂亮，体形也很难恭维，但基本部分很热情，落落大方而又没有生硬之处，全都显得悠然自得，笑吟吟忙来忙去。大概是只选健康女子进公司的。日本的航空公司的服务总体上我想是好的，但有的公司过于规范，未免令人觉得有些神经质（简直成了天上飞的麦当劳），而芬兰航空不妨说处于另一极。



从东京来到赫尔辛基，看上去这座城市总好像空荡荡的。路面宽，汽车数量极端之少，公园极端之多，街上一台自动售货机也没有，仿佛一座不怎么考虑经济效益的城市。城市规模不算很大，但也许道路宽阔的关系，走起来相当累，同在札幌逛街差不多。

此外城里女工数量多，无论去哪里都能看见正在劳作的妇女。或

许因为人口少，公共汽车和电车的司机可以说几乎都是女性，从年轻姑娘到中年妇女，全都红着脸颊干得津津有味。人必须质朴、勤劳、健康这一思想在这个国家似乎无所不在。这点同罗马截然有别，除了少数例外，罗马人看上去都活得悠闲自在。较之罗马，气候也一塌糊涂，每天都阴沉沉的，冷雨淅淅沥沥下个没完。虽然时值9月，但早上在郊外跑步时手都冻僵了。

比寒冷更伤脑筋的是饮食。

走进餐馆，每个季节各有菜单。拿起一看，夏季菜单种类相当丰富。例如9月可以吃到波罗的海鲱鱼、鳕鱼、比目鱼、白鳟鱼、白鱼、七鳃鳗、兔子、野鸟、野鸭、蘑菇、草莓、越橘、洋李、红莓苔子、羊肉等等，极尽奢华。但夏季结束冬天到来的时候，到处冰封雪冻，食物来源少之又少。及至11月，使用新鲜材料的菜肴只有驯鹿肉、鳕鱼子和驼鹿肉。驼鹿肉！其实，即使在9月间，赫尔辛基街头餐馆的饭菜也绝对算不得美味可口，想到罗马市场上摆放的那些新鲜得几乎爆裂的神气活现的蔬菜，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尽管有些歉疚——在芬兰久居，不想在这种地方吃着甘蓝和腌鲱鱼过冬。尽管城市非常漂亮、给人印象良好。



不过除了寒冷和饮食，赫尔辛基这座城市还是极能让人放松的。人们温和稳重，而且人数少，几乎看不见排队。英语也相当通行，搭话时全都报以笑容。估计没有小偷，警察也难得一见。在街头见到的警察数量觉得也就是罗马的五分之一。

到达赫尔辛基机场时温度为8度，相当冷。毕竟离开日本时才一件T恤，不可同日而语。以日本说来，大体是11月末的气候，运动衫外面套一件皮夹克正好。想到到了隆冬时节可如何是好——仅仅这么一想——心里顿觉一阵发冷。我实在耐不住冷。这么着，鲍勃·迪兰的音乐会就免了。正赶鲍勃·迪兰和汤姆·佩蒂（Tom Petty）的乐队来到赫尔辛基，本想去听，但会场是名叫“冰雪大厅”（Ice Hall）——光听名字就彻骨生寒，居然取这么个名字——的音乐厅，吓得我打了退堂鼓。也罢。迪兰去年在武道馆[52]听了。顺便说一句，这“冰雪大

厅”据说是打冰上曲棍球的地方，类似芬兰的武道馆。真有些担心鲍勃·迪兰得寒症，此人也年纪不小了。

迪兰没听，去听了赫尔辛基交响音乐会。会场在一座名叫芬兰音乐厅的漂亮场所。以日本说来，也就是中型音乐厅，但有一种十分亲密的氛围，能让人静心欣赏音乐。票价四十二马克（约一千二百日元）。厅内有酒吧，可以喝到雪莉酒，八马克（二百四十元）。大玻璃窗外面舒展着美丽的湖水（也可能是海湾）。白天鹅掠过湖面，黄昏的细雨静悄悄落在红叶斑斓的树林——风景极具北欧情调，仿佛听得见西贝柳斯[53]的旋律。

回头来说音乐会。第一支曲是一位名叫某某的芬兰人创作的现代音乐。一如几乎所有的现代音乐那样，听起来好像恐怖片里的配乐。音乐的好坏自是听不明白，不过我想那种东西未免莫名其妙，又不是没有多少好听些的现代音乐！

第二支曲是莫扎特为两架钢琴作的协奏曲。钢琴手是一个名叫TAWASTSTFERUNA的芬兰人和一个叫HUI-YINGLIU的中国女性，两人合奏。怎么说呢，这可是相当厉害的莫扎特，听得筋疲力尽。莫扎特就好像从前几个型号的半旧“沃尔沃”在手刹车的状态下向上爬坡，重得一塌糊涂，叫人双肩酸硬。音乐诚然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当然不必所有人都演奏天真烂漫的莫扎特，可这个毕竟有点离谱了，我想这已超出了解释的范围。但既然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那么在芬兰很可能这样的莫扎特才符合一般人口味。

不料到了第三曲柴可夫斯基第三号交响曲，这支乐队演奏得十分动听，和刚才判然有别，真有些叫人怀疑自己的耳朵，以为和演奏莫扎特的不是同一乐队。音域宽广，音质浑厚，有表情，有生活，有性灵。说老实话，我不太喜欢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但这样的演奏到底叫人听来心悦诚服。人们常说音乐只有好音乐和坏音乐，但另一方面，我深切地认为适合和不适合那个地域的音乐也是有的，即所谓地域禀性。很想听这支乐队演奏一次西贝柳斯。如此擅长和不擅长截然有别的乐队却也令人精神一振，较之什么都演奏得无懈可击却什么都在平均线上的乐队，这个更能让人产生好感。

这样，除去寒冷这点，芬兰成了对我胃口的感觉极好的国度，夏天再去一次也未尝不可。

---

[52] 日本开演唱会的场馆，各地都有，此处应该是指东京的武道馆。
[53] 芬兰著名音乐家（Jean Sibelius，1865—1957）。



马洛内先生的房子

这回在罗马租房子住。好歹也算是独门独院的房子，热情的乌比通过个人门路给找到的。光靠我们夫妇俩，我想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找到。意大利原本就是个讲门路的国家，没有门路找房子比登天还难。这是因为，一旦不小心租给别人，对方往往一直住下去不出来，而房东倒要无可奈何地住在不方便的公寓楼里。我固然不大理解，但这在意大利虽属违法，却似乎是常识允许范围内的行为。合同那东西在这里不具多大效力。而且，即使打官司，由于衙门手续啦形式啦繁琐得超乎想像，得出法律结论要等很长很长时间。所以，倘是已经摇摇欲坠的宿舍单元房倒也算了，而像样的房子，若无相当特殊的情况，房东只租给知根知底的人。

我们租的房子位于罗马郊外高地一块算是高级的住宅小区。有围墙，面积很大，带电动门，大门口设有煞有介事的值班房，进入时要查看长相。身份得不到确认不给开门，所以在治安这点上大致可以放心。居民多是外交官和高级商务人员，车也大部分是宝马、奔驰、奥迪、沃尔沃、萨博、路虎等进口车。

我们的房东马洛内先生是那不勒斯出身的意大利人，在意大利外交部做高级官员，在这座小区里拥有三座房子，其中一座租给了我们。马洛内在巴黎也有别墅，总之是有钱人。

我们到罗马的当天晚上，马洛内一家在花园里招待我们吃烤肉。马洛内的太太是英国人，过去想必很有姿色，但现在身体各部位脂肪未免多了些。这对夫妇有两个十三四岁的女儿，名字叫狄波拉和宝琳娜，都长得如花似玉。感觉上似乎意大利人爽朗豁达的血液和英国人内省稳重的血液掺和得恰到好处（若是反过来可就无可救药了）。一如这个年纪的女孩儿表现的那样，十分害羞，但好奇心旺盛，对旁边搬来一对日本夫妇怀有不小的兴致。姐妹俩非常要好，两人常说悄悄话。

另外，马洛内先生家有一条母狗“玛多”和一只公猫“琴”。概括说来，玛多未免轻浮嬉闹，琴多少郁郁寡欢。作为档次，我想以琴为上。不过，由于从小就在一起，作为狗和猫来说，琴和玛多关系十分

融洽。不久我们和两个都要好起来，琴和玛多天天来我们家玩耍。

我们在这座房子里大约住了十个月。地点诚然不坏，可惜采光不好，有潮气，湿乎乎的。因为建在小山的北坡，冬天一整天都没阳光射进来。下一点点雨，墙就马上发霉。床上被褥总是凉浸浸的，还漏雨，房前路面也总是又黑又湿。暖气设施也不完备，冬天一直冷到骨髓。老婆恨不得争分夺秒搬出这种潮湿地方，但前面也说了，在罗马物色合适的房子比登天还难。我也抽时间到处找房屋中介商，在“住宅信息”那样的杂志上翻来找去，遗憾的是根本没找到正经货色。这样，直到最后也没能搬出马洛内先生的房子。老婆预言“住在这种地方准没好事”，在某种意义上真给她说中了。

住此期间，我写了、译了几本书，长篇小说《舞！舞！舞！》也得以完成。工作方面我想进展是顺利的，四十岁之前做的工作基本令人满意。但此外这个那个有许多无奈。



雅典马拉松和退票还算顺利

1987年10月11日

10月8日从罗马去雅典。

我去雅典有两个原因。首先一个是参加10月11日举行的雅典马拉松，另一个是退掉今年春天由于雅典代理人的失误而未能乘坐的奥林匹克航空公司的飞机票（雅典——罗马之间，两人四万七千日元）。原本说机场服务台早已准备好了机票，不料根本没有准备，以致必须新买正规的飞机票。在电话里再发牢骚也弄不出结果，遂趁参加马拉松之机直接去谈判。

先说马拉松。

雅典马拉松从马拉松村跑到市内，全程42.195公里，即原始马拉松距离，今年是第5届。作为赛事的传统虽说有所不足，但不用说，其来历不亚于任何地方，毕竟可以上溯至两千几百年之前。

不过，我对这马拉松的起源一向怀有疑问。首先，关于有传令者从马拉松村跑到雅典告知胜利这点，当时难道没有马？算是没有马吧，因为若有马就完全没有必要让传令者奔跑。但是，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应该有马出现了。何以见得呢？因为过去我在历史书上看过骑在马上的亚历山大大帝的图片。如此说来，希腊的历史某个时期理应有马参与才是。原打算查阅一下究竟哪个时期，却因天天忙于琐事而不了了之。这种“如此说来”式的疑问，似乎大多如此不了了之。至于日本的飞脚[54]为什么不骑马以及日本为什么马车不发达，对于我也是个常年未解之谜。世上费解之事相当不少。

关于马拉松传说的第二个疑问：以长跑为业的传令者乃奔跑“专业户”，何以跑42公里就一下子跑死了？如今即使是业余跑手，42公里也不在话下。全程马拉松跑死人这等事还几乎没听说过。

其答案近年终于弄明白了。原来从马拉松跑去雅典的那个希腊人前一天已经在雅典和斯巴达之间跑了个往返。他为了请求斯巴达人支援对波斯之战而携带亲笔信跑去斯巴达，然而固执的斯巴达人一口回绝，他又手拿回绝信急急赶回雅典，继而跑去马拉松战场，看准胜败趋势后又一次全速跑回雅典。这样，我也认为必死无疑。我坐大巴从

雅典去过一次斯巴达，路上山连岭岭连山，烦不胜烦，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后几乎没有平地，山高路险。坐大巴都那么累，跑个来回不累死才怪。具体不清楚，但单程我想有250公里，跑这单程的比赛每年也举行一次，遗憾的是眼下我已没有气力参加了。

好了，我参加的马拉松赛的正式名称叫“国际雅典和平马拉松”，是纪念一位名叫科利苟利·蓝芭基的田径选手举办的赛事。蓝芭基退役不当选手之后成为国会议员，作为和平主义者反抗当时的军事政权，1963年举办旨在和平的马拉松比赛，在跑的路上被捕，遭到殴打，翌月在塞萨洛尼基遇害。比赛宣传册上引用了他这样一句话：

“为和平而生是美丽的，为和平而死是尊贵的。”

这样的词句，当今日本人不至于说得出来。或许可以说说不出来本身即是和平，但不管怎样，这样的词句我想是绝对说不出来的。当然我也说不出。

总之就是在这一伟大志向之下举办的比赛。如果问和平跟马拉松有什么关系，我也答不上来，但若说我的个人感想，我觉得人在长跑时心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变得平和。跑过一定距离之后，渐渐懒得去想各种各样的事，觉得什么都无所谓，反正拼命跑就是。而和平那东西未尝不是在这一原则下形成的。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跑42公里也是这个比赛。六年前自己一个人反向从雅典跑到马拉松，因为必须赶在交通拥挤前跑出雅典。早上5点从雅典出发，在盛夏险些让人晕倒的酷暑中拼死跑到马拉松。时隔六年，这次在秋日阳光下倒过来从马拉松跑到雅典。较之雅典至马拉松，马拉松至雅典上坡要多一些。

在出发地点见到了前来参加的日本人团队。大老远组团来到雅典，日本也算是相当可以的阔佬。不过，大概到底过于遥远或费用过高，说是团队，其实一共才七个人：女性两人，七十多岁的长者四人，年轻男子一人。昨天刚到。我问长者们：“没因时差搞得晕乎乎吧？”“我们时不时去海外跑一圈，没晕过时差。”“困了就睡，睡不着起来就是。”他们回答。着实了得。

但开跑之后一个日本人也没见到，四周清一色欧洲人。我长期旅居国外也没怎么感到孤独，惟独这个时候深切感觉到了：啊，我在这里是异乡人，孤身一人！我身边奔跑着许多国家的人。当然有希腊

人，还有意大利人。世界上大概最有闲工夫的加拿大人自然少不了。此外有德国人（这个地球上难道真有看不到德国人的地方）、身穿同样运动服的快乐的法国人、无比友好的北欧人、郁郁寡欢地默默奔跑的英国人。放眼看去，东方人仅我自己。当然旅行时也去了生来第一次看到日本人的那个小村庄，但那种地方即使一个人也感觉不出什么孤独。说来也怪，在这周围全是外国人的马拉松路上跑上三小时几十分钟，孤独感竟时不时扑胸而来。什么缘故呢？

不管怎样，我一路跑到了作为终点的雅典奥林匹克体育馆，所用时间仍不很理想（三小时四十几分），途中乳头被衬衫磨出血了（不但不雅观，还相当痛，这个），但终究坚持下来了，值得举起易拉罐啤酒庆贺。从日本带来的宝贝耐克鞋也表现不俗。好妙！

这雅典马拉松蛮有家庭气氛，不那么兴师动众，感兴趣的人不妨一试。路线自不必说，终点是光荣的奥林匹克体育馆这点也让人切实欢喜。只是，从日本赶来太远，因此保证身体不出毛病相当不易，再说由于希腊菜过于油腻，赛前如何摄取碳水化合物也是个难题。另外，进入雅典市内后的糟糕空气也让人吃不消。

马拉松完了，剩下的就是退飞机票。这个比预想的费事。哪个国家都一样，钱一旦给出就很难回来。但由于GNTO（瑞典政府旅游局）工作人员全力帮忙，加上我死缠活磨，两星期后总算从旅行代理店拿回了钱，我和老婆再次举杯庆贺。GNTO那地方，据我所知是世界上最友善的政府机关，工作效率高，完全为游客着想。如果在希腊出了麻烦事，尽管去找GNTO，而在意大利遇到麻烦，则快快死心塌地为上策。在意大利，一旦出手的钱花两百年也绝对回不来。因为纵然等上五百年，意大利的衙门也不可能有效运转。

这两件事办完后，我们开始去希腊北部悠然旅行。

---

[54] 日本旧时远程传达信件、钱款和零散货物的人员。



雨中的卡瓦拉

从塞萨洛尼基乘大巴花三个小时来到卡瓦拉。已有年代的大巴长吁一口气似的翻过最后一道山脊，海面、港口和卡瓦拉出现在眼前。卡瓦拉准确发音为卡瓦——拉，是一座三面环山的不大的港城。和大多数希腊此类港城一样，海港入口的山丘上耸立着拜占庭时期又大又老的城堡，城墙炮眼中有生锈的大炮将炮口对准海港入口，城堡最高处迎风飘扬着蓝白两色希腊国旗。港口漂浮着几艘货船，渔船留下白色航迹向外海开去。

由于我是在神户长大的，来到如此地形的场所，不由感到一阵释然。有港口，有包拢它的小商业区，继而有山坡隆起，房屋像俯视港口似的往山顶排列开去——便是这样的场所。海与山之间的距离越窄越好。

卡瓦拉是在那不勒斯（Neapolis）这个名字下作为港湾城市从古代繁荣起来的。距卡瓦拉十五公里的西北方向曾有一座名叫腓立比（Philippi）的古代城市（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菲立普二世建造的），卡瓦拉好比它的门户。并且，卡瓦拉还作为圣保罗[55]初次在欧洲传播基督教的地点而闻名。圣保罗在特洛伊城时梦见一个马其顿男子为他献上祝福并这样说道："请到马其顿去吧，并请解救我们！"圣保罗醒来后马上收拾东西准备远行。他把美国运通旅行支票揣进衣袋（开玩笑），领着两个弟子上船，先到萨莫色雷斯岛，之后在卡瓦拉登陆。如此这般，基督教在欧洲传播开来。

但是，由于具有连接亚洲和欧洲的地利之便，历史上卡瓦拉就好像门口的擦鞋垫一样屡遭磨难，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处于罗马帝国的统治下，继而被诺尔曼人一把火烧光，接下去被拜占庭帝国并入版图，成为土耳其与基督教军队激战的最前线，结果被土耳其征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获得独立——漫长的奋斗史。

我们到达的10月18日对于卡瓦拉城是重要的节日——1919年的这一天，此城从土耳其手里解放出来。希腊北部的城镇都如此拥有各所不同的独立纪念日，这是因为希腊军队是经过浴血鏖战后由西向东

把自己的城镇一个个依序从土耳其军队手中夺回来的。这天，人们一大清早就穿戴得整整齐齐赶去教堂，向耶稣献上祝福，感谢解放与独立。

还有热火朝天的游行活动。我们傍晚走进街里的电影院，正看《芳心之罪》[56]（Crimes of the Heart）时，铜管乐队吹奏着虎虎生威的进行曲从电影院门前缓缓通过，以致台词好一会儿听不清楚。

我们住的宾馆附近有挂着镰刀斧头党旗的共产党总部，其一楼有个小咖啡馆。我们常去那里吃早餐，毕竟便宜。在宾馆餐厅吃，一个人将近五百日元，而这里一百日元就能吃下来。刚刚烤好的奶酪饼加稠糊糊的奶油咖啡才一百日元，而且早上6点就开门了。咖啡馆是一对父母及其三十岁左右的儿子经营的。客人有渔民们和共产党员们（看样子大概是，没有细问）。在那里一边看福克纳——不过这福克纳的小说是资产阶级的呢还是非资产阶级的呢——一边吃早餐。周围时不时有客人吵起来。渔民对渔民，或者共产党员对共产党员，抑或渔民对共产党员……Who Knows？[57]反正我是在此吃便宜早餐。

还有，不知何故，卡瓦拉是个面包好吃的地方，面包品种也和其他地方相当不同。走出共产党咖啡馆，我沿着拜占庭时代的旧城坡路散步。坡路到处有面包铺。从窗口窥看，师傅正在烤早晨的面包，味道也很好闻。一进门，里面出来一个小学生样的小孩，叫我等一下，说新面包马上就好。他的父亲和母亲在灶前边擦汗边烤面包，爷爷和这个男孩卖。男孩把背包放在门口，帮忙干到上学时间（我每每佩服，希腊的小孩子们真是勤快，而意大利的小孩和日本的小孩一样懒）。他是这个家中多少能讲英语的惟一人物，并以此为自豪。

“Good morning,What can I help you?[58]”他喜不自胜地向我打招呼。

我咬着老伯仔细用纸包好递给我的面包沿坡路爬上城堡，站在一个人也没有的城墙上眺望大海和市容，然后穿过嘈杂的鱼市返回宾馆。

我们在这座港城逗留了四天，因为很中意这里。四天里我们几乎什么也没做，只是懒洋洋去电影院（《妙想天开》也是在此看的，蛮有趣的）、散步、坐在宾馆阳台上眼望港口、查看鱼市、在鱼市附近的海鲜馆吃喝、吃完继续散步，下雨就在附近超市里买一大堆葡萄酒

和奶油饼干，闷在房间里看书。

时不时下雨。下雨天气在小餐馆阳台上看着雨吃鱼，蓦然觉得好像到了天涯海角。怎么回事呢？声音散不开，冰镇过头的白葡萄酒瓶浮起一层水珠，渔民们裹着黄色雨衣排成一列，解着色彩鲜艳的渔网的网结，黑毛狗以俨然葬礼勤杂工的姿势一阵小跑去了哪里。男服务生百无聊赖地一眼一眼扫着报纸。男服务生很瘦，蓄着魔术师一般莫名其妙的胡须。我一边吃着烤竹筴鱼，一边把隔着两张桌子前面那个身穿尼龙夹克的老伯形象素描在本子上。他极其无奈似的喝了半升葡萄酒，吃着鱿鱼，撕面包塞进嘴里。顺序有条不紊：喝葡萄酒、吃鱿鱼、把面包塞入口中。一只猫目不转睛地向上看着他。我用圆珠笔别无用意地把这位老伯素描下来。雨日的午后的确无事可干。

但感觉不坏。前面有港，后面有山，回宾馆房间有葡萄酒和奶油饼干。而且现在我几乎没有任何必须考虑的问题。马拉松跑过了，飞机票退掉了，小说写完了，下一部小说要等些时日才能动笔。

---

[55] 《圣经》人物，又称使徒保罗（3—67）。曾到希腊、意大利等地传播基督教。

[56] 美国喜剧影片，1986年上映。

[57] 意为“谁知道呢”。

[58] 意为“早上好，我能帮你什么吗”。



卡瓦拉驶发的客轮

在希腊，坐客轮常可见到军人。

至于他们坐客轮出于什么目的，我不清楚。也许前往驻扎地，或者利用休假回故乡也未可知。他们总是三至六人结伙行动。

不管怎样，乘船时的他们显得甚是放松，就好像几个要好的高中生出去住一晚上那样谈笑风生，甚至有点亢奋。

年轻的军人。较之年轻，说年少或许更合适。有的虽留有胡须，却因此更带孩子气。军人和警察看上去像孩子，换言之，即是说我上了年纪。总之，他们确实是一副少年的眼神。

他们身穿土黄色军装，做工甚为马虎，粗粗拉拉，质地如旧毛毯，给人的感觉就像因为不得不给他们穿点什么，所以军队做了这个发给他们。脚上穿的是似乎沉甸甸的长筒靴。便帽折起来夹在肩章里，背着和军装同一颜色的行囊。胸口衣袋里装着盒装香烟。可是，令人不忍的是，那军服全然不适合他们，不合身。

他们三个人靠着客轮甲板扶手，眼望卡瓦拉的港口。暮色正压向港口，渔船已亮起船尾的诱鱼灯。几分钟后轮船就要启航。

一个军人高得不得了，一个军人矮得不成样子，另一个不高不矮，胖墩墩的。如此三人并立一处，在很大程度上看不出是军人，参差不齐，松松垮垮。不高不矮的军人从胸袋里掏出一盒“万宝路”，一支叼在嘴上，又递给另外两个，分别点燃，于是三个橙黄色光点在暮色中各自画着圆形。他们一边吸烟一边乐不可支地说个不停，或“啊哈哈”放声大笑，或皱起眉头，或挥掌摆手，或显得害羞，或往谁肚子上轻轻来一拳。“万宝路”空了，矮个儿军人随即掏出一盒“骆驼”，又一起吸“骆驼”。无风，烟静静上升，轮廓缓缓消失。

不久，船舱广播响了，通知验票即将开始，要大家进自己的房间，他们这才撤离甲板。三人笑着或再次轻轻来上一拳消失在二等舱的房间中。此后我再未见到他们。

※

世上怎么有这么多军队呢？

前不久，希腊和土耳其边境发生了小规模冲突，希腊兵死了一个，土耳其兵死了两个。我从报纸上得知的。那是一次无谓的枪击事件。实际上根本用不着开什么枪，谁谁跨入国境线的此侧啦、说了什么挑衅话啦，无非这个程度。结果有人开枪，对方还击，自动步枪的弹丸飞来飞去，死了三个士兵。希腊方面说土耳其兵先开火的，土耳其方面咬定希腊兵先射击的，两方的国民都只相信自己国家说的。

报纸上大大登出死亡的希腊兵照片（土耳其报纸也会刊登土耳其士兵的照片，不用说），一个十八九岁的英俊小伙子。他身穿军装，面带微笑，那长相让我想起常在客轮上见到的年轻军人。他到底为什么死的呢？

死的总是年轻人，他们还没搞清怎么回事时就那样没命了。我已不年轻，去了很多国家的很多城市，见了很多人，有很多愉快的感受，也有很多不快的经历，并且这样想道：无论有怎样的理由，人和人互相残杀都是傻事。

※

邻桌一个中年希腊人叫我看电视："瞧呀，日本！"一等舱休息厅的电视新闻节目推出东京兜町证券交易所的光景：神情僵冷的人们有的叫喊什么，有的竖起手指，有的挽起袖口对着电话大吼大叫。但我看不明白发生了什么。"money、money[59]"，希腊人用只言片语的英语说，并做出点钱动作。看情形是股市暴跌了，但详情他的英语水平说明不了。（※后来明白，那就是那个"黑色星期一"。每当我想起当时的光景，我就思索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是在突尼斯旅行时知道1929年股市暴跌的。"简直就像远方的雷鸣"，他描写道。当然，"黑色星期一"作为规模无法同1929年的暴跌相比，但我仍记得当时某种不安稳的气氛。大概因为那时正思考着战争，从而使得股市暴跌和电视荧屏上人们痉挛的面孔在我眼里显得格外凶多吉少吧？）

新闻转为日本的首相如何如何。正值中曾根首相下台，政局正因继任人选问题照例变得兵荒马乱。少顷，竹下登的面孔出现在荧屏

上。看样子竹下登当选首相了。我不甚知晓竹下登这个人，但竹下登从荧屏上给我的印象可用一个词来概括，这种时候英语真是再方便不过：unimpressive[60]。

新闻节目结束后，开始放录像带电影。约翰·米里厄斯（John Milius）的《赤色黎明》。

我用军用小刀削了个梨当晚饭吃，还嚼了奶油饼干，喝了几口水壶里的白兰地，随后翻开福克纳。船轻轻摇晃。电视里传来自动步枪的射击声。美国的少年们正以攻进家乡的古巴兵为对手展开游击战。我合上书，回房间躺下。

清晨醒来时，客轮已经进入莱斯博斯岛的米蒂利尼港。

---

[59] 意为“钱、钱”。

[60] 意为“印象淡薄”。



莱斯博斯

莱斯博斯岛作为“lesbian”[61]一词的词源而为人知。传说中此岛的居民曾全部为女性，但老实说来，现在的莱斯博斯岛距此传说引起的想像已相去很远，没那么多情调了，不过是一个没什么特色可言的极其普通的海岛。从面积上说是希腊第三大岛，由于邻近土耳其，守卫国境水域的海军和海岸警备队的快艇触目皆是。警备艇带着“呼呼呼”的响声驶进安静的海港，甲板上的机枪闪着幽光。身穿白色水兵服的水兵聚在那一带的咖啡馆喝咖啡。海浪一闪一烁反射着秋日明媚的阳光。岛固然美丽，但没有特别有趣的东西。在淡季，尤其游客在这里极难消磨时间，真的没什么可做的。漂亮的海滩虽说到处都有，可是在这10月末，漂亮的海滩又有什么用处呢？老人们坐在港口露天咖啡馆里整天看海，问题是我们不是老人，没有那么大的耐性。

我们决定搭出租车去郊外美术馆。导游手册上介绍近郊一座村庄有个绝对不差的美术馆，虽然心想无非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乡下美术馆，但毕竟此外无事可做，再说偶尔悠悠然看看画也蛮好。况且天气好上天了，出一下远门也不坏。

出租车司机把我们放在一无所有的树林里。“喂喂，美术馆（姆希欧）哟，我们要去的是。”“这就是姆希欧。”司机说。那么说，树林往里一点是有个石砌小屋那样的东西。“就那儿！”他说。小屋前面一个老伯坐在椅子上晒太阳。

反正先去老伯那里再说。“这里是姆希欧吗？”我问。“正是。”他说。买门票，一个人五十日元。客人只有我们。他把英语小册子递给我们。美术馆里集中了一位叫塞奥菲洛斯（Theophilos）的画家的作品。小册子上写道，塞奥菲洛斯生于莱斯博斯岛，以其独特的笔触描绘了希腊风景。单纯的线条、明亮的色彩。不妨说是一种纯真艺术（innocent art），或者民间艺术（folk art）。

塞奥菲洛斯终身在希腊各地流浪，在流浪中作画。人似乎有点特别，最喜欢打扮成亚历山大大帝的模样旅行。对金钱和名誉概无兴趣，热爱流浪人生。人们嘲笑也好，小孩子扔石子也好，他都不放在心上。很长时间里没得到任何人承认。最后固然得到承认了，但过了

不久就死了。便是这样一个人。

不过我看第一眼就中意他的画。光看都让人觉得心胸豁然开朗。小屋里一共展览了近百幅他的画，但由于屋子小，满墙满壁全是画，空白啦余白啦几乎没有，那才叫密密麻麻。但这种拥挤并不显得张扬，而同塞奥菲洛斯的画相得益彰。树林里万籁俱寂，只偶尔传来鸟鸣。鸣声滑润，犹如用软布擦拭上等玻璃器皿。从了无装饰的窗口泻入的午后阳光。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花时间慢慢一幅幅细看。看的人惟独我们夫妇。毕竟时间绰绰有余。管理员老伯时而进来觑一眼，并非放心不下，只是看一下情况，像是说“这两人看得来劲儿了”。我说“真是好画啊”，他高兴地点头，讲解起画来。因是希腊语，听不大懂。不懂他也热心讲解一阵子，之后又折回晒太阳。

有一幅过节的画，赏心悦目。画幅狭长，画中共有十一个人，最左端是市长夫妇，蓄着胡子、腰佩长剑的极有男子汉气质的市长和看上去总有些多疑的夫人。她把手搭在丈夫肩上，斜眼瞥着他。实际看画即可知晓，塞奥菲洛斯的画在技术上是稚拙的，然而人物的视线全都那么富有生机，赋予他的画以奇异的生命力。六个男女夹着摆满山珍海味的餐桌跳舞，三个少女，三个小伙子，不知何故脸上表情都不怎么开心，有点像拍摄纪念照似的略显紧张。这真是个谜。毕竟是欢庆日子，美味佳肴满满一桌，年轻男女又手拉手起舞，本该多少显得开心些才是。

其后面是两个乐师吹奏乐器，一个吹竖笛，一个吹大约是羊肠做的类似风笛的东西。两人俨然专家的架势，对音乐全神贯注。最后有一个少年在火上烤羊肉串。这男孩脸上好像漾出一种充实感（属于何种充实感呢？是擅长烤羊肉的还是庆幸得以参加节日庆贺活动的呢）。便是这样一幅画。画并不出类拔萃，但可以使人感觉出某种活生生的生活气息，注视之间，但觉这些人曾实际存在并且唱着、喝着、恋爱着、苦恼着、争战着以至最后死去，那种实感呼之欲出。

这也许是因为我是在米蒂利尼郊外一个小小的石砌美术馆看他的画，并且美术馆位于岑寂的林中。假如在东京的美术馆里看同样的东西，自己说不定对作品有另一番感受。塞奥菲洛斯的画实在是同这场所、这空气、这岑寂正相吻合的画。

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绝妙午后。塞奥菲洛斯美术馆旁边，有一座

收藏毕加索、马蒂斯、莱热、布莱克小幅作品的同样不大的双层美术馆。我们在这里也愉快地度过了一些时间。这座美术馆里同样也除了我们别无参观者。是一座私人美术馆，创立者系莱斯博斯岛出生，20世纪20年代去巴黎创办绘画艺术的出版社获得成功，在功成名就之后返回家乡莱斯博斯，展示自己收集的作品。他是在和当时的画家们交朋友当中收集的，藏品品位绝对不俗，名作虽然没有，但灿然生辉的精致小品不在少数。美术馆里一个看守人也没有，只有一个妇女在入口深处的房间里等着，叫一声“你好”，她出来微微一笑卖票给我们，而后又撤回里头的房间。

出门爬了一下山坡，走进最先看到的咖啡馆，要了冰镇啤酒，冰得甚是彻底，让人眼底都有些作痛。安静的午后，温暖的阳光。导游手册上说“莱斯博斯岛在希腊以晴天最多而知名”。巡逻艇进港了，蓝白两色希腊旗迎风飘扬。宛如人生最向阳的一天。

就没有人为我们画上一幅？远离故国的三十八岁作家和他的妻，餐台上的啤酒，差强人意的人生，以及碰巧赶上的午后阳光。

---

[61] 意为“女同性恋者”。莱斯博斯原文为“Lesbos”，以创作致女性的爱情诗而闻名的希腊女诗人萨福（Sapphō，公元前6、7世纪人）即诞生于此。



佩特拉（莱斯博斯岛）

1987年10月

从米蒂利尼去佩特拉住一晚上纯属心血来潮，并非有什么必然性。别无事情可干，就想换个什么地方，如此而已。米蒂利尼这地方可看之处没有多少。美术馆看过了，港口看腻了。岛上唯一的电影院正在上映丽塔·海华斯和格伦·福特令人怀念的《荡妇姬黛》[62]（*Gilda*），但去年在雅典一家电影院看了。所以，再在米蒂利尼住一晚上也无所事事，遂乘大巴去佩特拉。

无所事事其实是我们这种淡季游客如影随形的宿命。秋冬两季的希腊是绝好的去处，游客寥寥，宾馆空空，居民热情，物价偏低，哪里都安安静静，心情怡然悠然，但无所事事。而夏天则活动多极了：海滨游泳，看女孩子，日光浴，喝啤酒，吃着希腊式色拉说说笑笑——光这样就能转眼把一个月时间打发走。不是瞎说，真的没工夫考虑什么。夏天的希腊嘈杂、拥挤、游客未免多过头了，但什么都不用想，而在旅游淡季我们就必须绞尽脑汁，琢磨下一站去哪里，下一步做什么。

看地图和翻导游手册的时间里，觉得佩特拉怕是不坏。“去那里能有什么？”“这——”问题是守在这里不也无济于事吗？

从米蒂利尼到佩特拉一天只两班大巴，单程两个钟头。路上没多大意思。

那么，若问佩特拉这座海滨小镇有什么，什么也没有。镇在海滨，当然有海，但前面也说过，10月份去海滨也百无聊赖。倒是有圣处女教堂建在俯视全镇的高耸的石山顶上，教堂也的确富有情调，但也不是非看不可的劳什子。啊，教堂建在山上，有趣有趣——如此而已。

此外概无东西可看。镇上几条小街，外围一片接一片庄稼地，往下就什么也没有了。

不，准确说来并非什么也没有。此镇以农业妇女会活动活跃而知名。下了大巴，眼前就是农业妇女会的事务所。几年前，她们以农业妇女经济自立为宗旨创办了此会，大家提供住房开办家庭旅舍，生产

绿色食品，经营酒吧式餐馆，一步步打下基础。这在以男性为中心的保守的希腊社会是件稀罕事。莱斯博斯岛的女权主义运动不也蛮有意思吗？

从大巴下来后，先有一个书报亭老伯大步流星朝我们靠近。“Guten morgen”，他说。穿着整齐西装的很客气的老伯。此类人基本讲德语。“您在找住宿的房间吗？”他问。但我们一开始就已决定到农业妇女会那里找房间，所以客气地谢绝了老伯。是觉得过意不去，可我们有我们的安排。老伯遗憾地离去。我心里暗暗同情：农业妇女会肯定给老伯添了麻烦。

我们试着走去农业妇女会的事务所。两个二十四五岁的年轻农妇坐在桌旁，圆溜溜的眼睛，态度很热情。

“哈啰！”一个打招呼道。她们的英语还算过得去。

“正在找今晚住宿的房间。”我说。

她们好看地一笑：“那好，没问题，有好房间。请坐在那儿等一下，马上有人来接。”

我们在那里的椅子坐下，啪啪啦啦翻看《莱斯博斯岛的历史》图片集和《塞奥菲洛斯画集》。《莱斯博斯岛的历史》是一本十分令人伤心的图片集，开头是土耳其占领时期的图片，全部身穿土耳其样式的服装，土耳其军人耀武扬威。某年土耳其军队镇压起义，但人们还是要起义。手拿老式枪支、锄头、长矛的情绪激昂的人们。聚集在大炮周围的神情乐观的英雄们。胡须挺挺上翘，19世纪式的民族主义伦理的光辉笼罩着他们。败退的土耳其军队。独立。万岁。庆祝。和平。民族的尊严。眼泪。暴力。

接下去又是战争。巴尔干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又是巴尔干战争。在泥沼中腐烂的无数死者。疲惫不堪的战旗。没有归宿的胜利。帝王和军人和政治家和革命。在泥沼中腐烂的平民们。擦拭枪支的年轻士兵。目送士兵的女人们。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接连不断的战争。纳粹的血腥镇压。英勇的反抗。共产党游击战。不屈不挠的抗战。胜利。欢天喜地。庆祝活动（这样的图片极有感染力）。但是，继之而来是英国的干涉。希腊北部是共产党主导的抗战，他们因而反对丘吉尔。图片很有点像爱森斯坦执导的影片中的一个镜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人们把旗插在坦

克上，身体一齐挺胸前倾，绝对积极绝对乐观。他们对什么坚信不疑。每一张照片都向前挺胸。不坏。“丘吉尔见鬼去吧！”他们高举这样的旗帜。

可我知道，他们最终在丘吉尔的铁腕面前低下头去。

正要进入没头没脑的内战时期，这时一个女孩骑着自行车接我们来了。也就十来岁的小女孩，长的虽不很漂亮，但胖乎乎的，看上去分外有主见，而且逗人喜爱，我觉得恐怕比我还有主见。

“你们好！欢迎光临佩特拉！让你们久等了，对不起。”她说。英语说得甚为地道，好一个未来的农业妇人。

“好地方啊，安安静静。”我说。

“是啊，安安静静，好地方，确实。”她说，“从哪里来的？”

“日本。”我说。

“哎哟哎哟，那可够远的！希腊怎么样？”

“非常中意。”我彬彬有礼地回答。

“那太好了。我们就是想请外国来宾过得愉快。”

“谢谢。旅行得非常愉快。”

感觉上不像同十来岁的女孩说话。

“那么，领二位去我们家。”说着，她跨上自行车，我们随后跟着。前面有羊走来。

“喏喏羊！”她说。

我们同羊擦身而过。

她的家要出镇一直走很远。走了十五六分钟。同很多很多绵羊、山羊、牛、驴、狗擦身而过。动物比人多得多的地方。她在我们前面“嘎吱嘎吱”蹬着自行车，时不时回头看我们一笑，仿佛说“让你们走这么远，不好意思，不过快了”。

同两个兵擦身而过，同骑驴的农夫擦身而过，同两个小女孩擦身而过。她们好奇地盯视我们，我们微微一笑，她们也微微一笑。

走着走着，终于走到了她的家。

什么也没有的地方，周围只有庄稼地无限铺展开去，只有牛羊的叫声。女孩微笑着钻进里面，旋即走出腰扎围裙的母亲。表情总好像有几分凄然，但分明是精明能干的希腊主妇。

“欢迎光临！”她也用英语寒暄。尽管不很流畅，但不坏。我们问

清房价，要了明天的早饭。房钱一千八百日元，早饭两人五百日元。房间不差，作为希腊家庭旅舍算是上等的。绵软的床，正常出热水的淋浴喷头，诸多东西全是新的。

之后，我们又折回镇里，走进海边一家餐馆。因是星期天下午，餐馆给镇上的人挤得满满的。苍蝇也满满的，很难有多么卫生，但气氛温馨。虽然几乎全是本地客，但排他感全然没有。视线相遇，全都报以微笑。风吹来时，邻桌向我们招呼说“克里奥（冷啊）”，端菜的中年妇女也笑吟吟很热情。我们要了相当大的撒上香草的对开烤鲣鱼、色拉、豆角、炖肉、葡萄酒和面包，叮嘱烤鱼不要用橄榄油。这东西十分可口。一共一千三百日元。感觉幸福极了。

露天咖啡馆里有三四个德国游客，在相当砭人的冷风的吹拂下，脸朝迷濛的太阳做日光浴（假如能称之为日光浴的话）。德国人有各种各样的特殊能力，一种是无论什么都吃得津津有味的能力，另一种是任何季节都能做日光浴的能力。我们和他们作为淡季奇特的游客互致简单的问候。奇怪的是，他们看上去丝毫也不感到单调。德国人果然与众不同。

我们在街上东张西望地散步，窥看了乌糟酒厂，登上石山顶上的教堂观看弥撒，买了几枚风景明信片，在露天咖啡馆里喝着热咖啡眺望即将沉入海中的夕阳。就好像用擀面棒薄而又薄地擀饼所得，我们把种种动作和作业最大限度地拉长，好歹消磨时间。谢天谢地，天总算黑了，一天总算过去了。

随着日落天黑，人们领着动物们返回家去。星星像在天空历历打出的点一样开始熠熠生辉。牛在哪里懒洋洋地叫着。我们也回到自己房间。我边喝水壶里的白兰地边看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我不知道它是否适合淡季看，但此外没有可看的书。

清晨给丁丁当当的羊铃声叫醒。我们要赶米蒂利尼方向的大巴，房东太太提前做了早饭。我们在阳台餐桌上吃早饭：面包、全油蛋糕（不知何故，希腊北部早上大多吃这东西）、煮蛋、咖啡。蛋是刚生下来的，鲜极了。两只猫前来讨食吃。

饭吃完时，房东太太来聊天。“我们一直在澳大利亚，”她说，“为了攒钱一直在澳大利亚做工。用那笔钱翻盖了这座房子，这回可以作家庭旅舍使用了。所以回到了希腊，和大家在一起。也想让孩子在希

腊接受教育。不过大儿子昨天又去澳大利亚了，因为高中毕业了，要找工作。昨天去的。”

难怪昨天她脸上好像有几分凄楚。

“是日本人吧？在澳大利亚看见许多日本人，都很精明。”随后她黯然摇了下头，朝田野远处望去，似乎远处会出现澳大利亚。“请再来，”她说，“这么安静，好地方。下次多住几天。”

还来的，我们说。想在夏天来。

“没有孩子？”她忽然想起似的问。

没有，我们回答。

她看了看我们，随即微微一笑：“还年轻啊！”

我们归拢行李，付款。接钱时她显得甚是难为情，不知什么缘故。大概还不习惯这样的接待工作。我掏出从日本带来的零币，请她交给领我们来的女孩。她道声谢谢，定定地注视手心里的零币。“再见！”我们说，然后把她轻轻放在那静静的水珠般的凄婉之中。

这就是佩特拉发生的一切。

---

[62] 美国影片，1946年上映。

罗马的冬天





电视、意式疙瘩汤、普雷特

在罗马买了电视。

本来不想买这东西，不得不买。因为渐渐切实地明白过来，没电视现实生活不方便。第一，不知道天气；第二，消息全然进不来。

我们现在租的房子大体配有家具，但家具中不包括电视。住在东京的时候一不订报纸，二不看电视，倒也没有什么不便，但在罗马不能一如既往。在信息泛滥的日本，有意切断信息可谓恰到好处（即使切断，信息也会渗来），而在罗马如法炮制可就任何消息都进不来了。况且在这里我是彻头彻尾的外国人，信息进不来，感觉上好像自己被剥个精光。另外还有一点，意大利和日本的社会运转方式不同，在这里没办法适当预测。既然这个现在这样，那么往下大概这样——即使如此估计，很多时候也根本对不上号。因此，若不在某种程度上积极搜集信息，势必四处碰壁。

先说气候。今年秋天罗马气候糟得令人吃惊，倾盆大雨整整一个星期没停，每天还下好几次雹子。雨太多了，台伯河水几乎漫上岸来。院子里栽的做意大利面条用的罗勒（basilico）也和春天一样全军覆没。出门买东西都不可能。这种季节不看天气预报就非常不方便。在日本的时候，如果需要可以从电话中听到天气预报，所以没电视也完全应付得来，但这里不成。

再说新闻。这个也蛮要紧，因为必须充分把握罢工的消息。这个国家动不动就搞罢工，公共汽车、火车、飞机，以及收垃圾者，时不时全面瘫痪。不全面瘫痪时也拖拖拉拉，这个那个常出故障（近来甚至外交部都罢工了）。若像日本那样在公共汽车站贴一张纸写道“本日因罢工……”作为我也明白怎么回事，然而这个国家基本上不存在这样的温情，满不在乎而又毫不含糊地进行罢工。一次在罢工那天等了三十多分钟根本不会来的公共汽车，若非过路人告知今天罢工，我想还要等下去，因为不罢工时等三十分钟也是家常便饭。如此搞得我心有余悸，于是下决心非买电视不可。

话虽这么说，特意买高档电视未免发傻，便先去附近一家旧电器店看了看。若是日本的“量贩店”[63]，小电视出两万日元即可买下

——以这样的打算跑去一看，原来比预想的高出不少，即使旧得不成样子的都要三万日元。图像都有点模糊不清了，在日本绝对是等待回收的废品。过去我曾在国分寺站附近的垃圾场捡回一个比这清晰得多的电视。无奈，便买了个最便宜的新的黑白电视。只要能知道新闻和天气预报就可以了，颜色那玩意儿有没有都一回事。

不知幸与不幸，买回电视后罢工立时活跃起来，电视上的新闻节目连日全是罢工报道。看来，买这电视可真没赔本。

对了，意大利的电视节目最叫人愉快的，不管怎么说都是天气预报，单单这个就百看不厌。若去意大利，务请看电视上的天气预报。首先滑稽至极的是，主持天气预报的人动作着实煞有介事。我所喜欢的是RAI·1台的老伯，此人的动作相当有感染力。天气好的时候笑眯眯一副乐不可支的样子，而若下雨或降温，脸色阴暗得简直就像自己给大家添了麻烦似的，声音也往往低沉下来。这个秋天大雨连降一周的时候，他真个一蹶不振，让人担心他没准上吊。一只手悄悄朝天花板举起，闭目摇头说“诸位，这场阴雨……”——每天见他如此预报，我都不由觉得不就是天气预报么，何苦……总之他忽儿耸肩，忽儿用手一圈圈画圆，忽儿歪起脖子，忽儿啪一声拍手，忽儿双手紧握（这已近乎手语），整个荧屏都是此人的手舞足蹈。这样的天气预报看得我捧腹大笑，不料问意大利人，他们都说：“什么地方有趣？不是理所当然的么？”这也未免可怕。

另有一个把卷毛金发不可一世地朝两侧膨胀开来的（少女漫画中常出现的发型）天气预报美女，此人也够滑稽的。她几乎没有动作，只是面对摄像机坐着微笑。问题是由于发型的关系，气象云图整个被挡在后面，收视者甚为不便。好在人还算漂亮，本人也干得喜气洋洋，好坏也就由她去了。

新闻也看不够。例如哪里发生火灾，就用摄像机把现场拍摄下来。消防队员理应一起灭火，不料这里的消防队员却手拿水管对着摄像机一动不动，有几个甚至嬉皮笑脸。最初我以为肯定是一种差错。可后来发现，无论哪里的事故现场，也无论情况多么紧急，只要有摄像机出现，他们就差不多全对着摄像机，且有几个人几乎条件反射似的嘻嘻直笑。若在日本肯定惹出一场麻烦，消防队员灭火当中回头嬉笑若上了电视，无疑要受警告处分。

此外，新闻节目报道员衣着极其花哨：红衬衫、黄领带、蓝边眼镜（因是黑白电视，当然看不出颜色，但我偏偏知晓），尖脑袋上的头发剪得硬橛橛的，朝哪里一个老伯一把甩过麦克风："喂，你对意大利的罢工怎么看？说上一句，如何，老伯？"我也看了许多国家的电视，而意大利的最看不厌。

意大利电视还有一点叫我割舍不下的，就是"钟表图像"——时间剩余的时候单纯推出时针图像，仅此而已，无任何名堂。有时候长达五分钟，即秒针在钟表盘面旋转五圈、分针移动三十度。我也闲着无事，遂抱臂直勾勾地注视不动。秒针无声地走着刻度，的确无声无息。起初自觉不对头，后来意外地着了迷，每次这东西出现都奇异地感到放松，偶尔一段时间不出现，竟有些寂寞，盯视之间甚至产生"诸行无常"的感慨。日本的电视若如法炮制，想必惹出一场骚动。

意大利有RAI·1到RAI·3这三家国营电视台。虽说是国营，但广告照样播。何苦国营电视有三家之多呢？因为政党色彩各有不同。具体的不清楚，大致像是RAI·1属于保守党，RAI·2是社会党系统，RAI·3倾向于其他政党，所以各台的新闻内容有很大区别。不过与政治见解无关，在外国人眼里，RAI·1台的女子最为浓妆艳抹，看起来赏心悦目。时而垂一对奇大无比的耳环，闪闪发光，炫目耀眼，叫人无法受用，时而身穿豹皮连衣裙，时而从华伦天奴盒子里特意取出镶满珍珠的眼镜——光看这些细小地方都让人兴味盎然。至于她们是以何标准被录用的，我自是无从得知。她们长得算不上国色天香，年龄都已不轻，但在"花哨"这点上全都一以贯之，身上的香水简直从荧屏上扑鼻而来。以日本来说，就是港区任何一座公寓都必有一两个的"颇有名堂而又来历不明的贵妇人"。若问她们上电视干什么，实质上等于什么也没干，只是全身珠光宝气像真人模特似的对着摄像机，莞尔笑着来一句"下一个节目是……"勉强说来，也就是所谓"报幕员"吧。如此女子天天更换衣着首饰，交替登上荧屏，反常啊，不管怎么说。



想吃美味意大利疙瘩汤（Gnocchi），遂乘火车远远赶去北部的博洛尼亚。我无端喜欢上了博洛尼亚这座城市，即使没什么事也一晃

儿跑去，悠悠然住上三四天。这里几乎没有风景名胜，游客不怎么来，城市规模也恰到好处，用来漫步也蛮合适。不举办什么书展，宾馆也空。

我们大体在佛罗伦萨下车住一晚上，再乘火车去博洛尼亚。从佛罗伦萨到博洛尼亚要翻越相当险峻的山路。佛罗伦萨至博洛尼亚之间的高速公路弯路和隧道多得不得了，对于喜欢开车的人倒是个施展本事的路段。世上有不少佛罗伦萨迷，不过老实说我不认为佛罗伦萨那么有魅力。确是个历史悠久的美丽城市，可是宾馆房费高，美术馆总是挤满人，餐馆也不如人们说的那么好吃。并不是有过什么不快的事，反正没有美妙印象。餐馆诚然不坏，但没有哪一家让人想再去一次，至少佛罗伦萨市内没有。于是早早离开佛罗伦萨赶往博洛尼亚。

在博洛尼亚常买东西，因为买起来比罗马容易得多。店员的热情截然不同，商店也没那么多人。可以慢慢挑选，即使没中意的不买，也不会遭遇难看的脸色。而若在罗马这样做，店员脸色当即沉下。佛罗伦萨虽然不至于像罗马那样鄙俗，但接待上还是有油滑之处。米兰店铺固然多，却又因为过多，光转一圈都筋疲力尽。我只是想买点衣、鞋之类，不想筋疲力尽。人生应有更宝贵的东西。如此琢磨下来，博洛尼亚乃是意大利非常“地道”的城市。

东西也好吃，热情好吃的是无所谓的普通饭菜。博洛尼亚有好几家我偏爱的餐馆，哪一家都没上导游手册和“米其林”，都是随意闯进去偶然发现的。便宜，好吃，去多少次都不变味，因为和一流餐馆不同，不至于由于厨师被其他饭店挖走而味道一夜骤变。规模都小，感觉上就像老爷爷和老婆婆在里面一边吵嘴一边鼓捣饭菜。形式不讲究，但吃多少次都还想吃。小费都不收！我尤其常来这里吃意大利疙瘩汤。意式疙瘩汤并非博洛尼亚的特产，但寒冷季节在大雾笼罩的博洛尼亚“哈唏哈唏”吃起热气腾腾的疙瘩汤来，那种感触却是很难替代的。疙瘩汤这东西是一种奇妙的食物，我想再也没有这么容易做的食物了，然而味道的好坏判然有别。惟其是真正的平民风味，其中也就格外含带某种心情。即使拿食物来说都是可圈可点的城市。

在这博洛尼亚，傍晚一晃儿走进一所大学附近的电影院，看了西米诺（Michael Cimino）的《西西里人》。电影还算过得去，观众人数也算过得去。这且不说，走出电影院，在夜雾中的小巷里晃晃悠悠

散步之间，发现一家尽管有点像穷困潦倒但气氛又似乎不坏的餐馆，门口写道“本日有李柯尼兹演奏”。心想这种地方怎么会有李柯尼兹（Lee Konitz）呢？进去一看，原来一楼是普普通通的大众餐馆，地下室大概是爵士乐夜总会。我没听过李柯尼兹的现场演奏，一心想听上一次，不料在门口问店员，得知今天票已售完。博洛尼亚学生多（气氛很有点像京都），爵士乐迷不在少数。遗憾。



12月6日，星期天，在罗马听乔治·普雷特（Georges Pretre）指挥的圣西西里亚学院（Santa Cecilia）管弦乐团，演奏曲目是贝多芬第五和第六交响曲这种说是惊天动地也好什么也好反正是相当吵闹的东西。但也是因为年底的关系，集中听一下贝多芬恐怕不坏，于是在那前一天去梵蒂冈前面的圣西西里亚学院音乐厅买了门票。票价分为五千五百日元、三千九百日元、二千二百日元，遗憾的是只剩最贵的，而且是前排最边端的。我和老婆为此好一阵子犹豫，但毕竟年底了，贵就贵些吧（管它好还是不好），就买了下来。什么缘故不晓得，人在外国，不知不觉之间生活变得节俭起来，而在东京时，一万日元的票都手到擒来。

首先是第六《田园》，这个不那么有意思。星期天演奏比平时开始得早，时值傍晚5点半，圣西西里亚学院乐团成员们好像带有午饭的余韵（不是开玩笑，此事真可能有，这个国家），声音总好像不到位。普雷特那意图未能痛快传达给乐团的焦灼如尘埃一般弥散开来。

休息时间里团员们消化晚吃的午饭，驱赶葡萄酒醉意，我在座位上看保罗·鲍尔斯（Daul Bowles）的《遮蔽的天空》（The Sheltering Sky）。很想去一次摩洛哥。

接下去是第五，这个委实精彩，前后不可相提并论。我一向以为第五交响曲相当沉闷，但以普雷特的指挥听起来，竟有那般自由奔放生机勃勃超凡脱俗，不由沉浸其中。一言以蔽之，这已不是波诡云谲感情沉郁的贝多芬，而是温柔纯真、甚至漾出优质感伤氛围的焕然一新的贝多芬。

然而普雷特绝不想刻意颠覆迄今为止的“第五”图像（例如前些日

子同样在罗马听的蒂尔森·托马斯〈Michael Tilson Thomas〉演奏的贝多芬），他仅仅是在自然而真诚地表达自己本身内在的音乐，由于这一点鼓涌而出，其结果便超出了“第五”这一藩篱或者规制，成为自由自在而富有人情味的音乐。普雷特的指挥妙趣横生，不时让身体动作戛然而止，定睛逼视乐团，只用脖颈以上部位指挥，或转目或扬眉或摇头，但仅仅这样便使其激情传达给观众，十分了得。一场久违了的令人信服和感动的音乐会。

---

[63] 大量买入、低价卖出的商店。



罗马的岁末

圣诞节。

圣诞前的罗马街头同日本的岁末情景相当像。岂止像，简直像过头了，像得叫人惧怵。和日本不同的是，街上没放圣诞歌“铃儿响丁当”（音乐一概不放，谢天谢地）。此外兵荒马乱的光景大同小异，如人多啦、商店拥挤啦、车辆嘈杂啦、人们不无亢奋的表情啦、店铺张灯结彩啦、打扮成圣诞老人招徕顾客的店员啦、艳丽包装纸上的礼品结啦等等。

岁末礼物也同样不少——圣诞礼物一半兼作岁末礼物。和日本一样，不仅在亲朋好友和家人之间互相赠送，而且有向老主顾、上司以及关照过自己的人等等赠送的礼仪性礼物。进入商店，搭配装好的糕点等食品礼盒按不同价格齐刷刷排列开来，人们从中适当挑选出大约价值五千日元的。不是凭内容而是凭款额选购，这一点也同日本的岁末礼物毫无二致。在这种莫名其妙的地方，日本和意大利竟如此酷似。装进漂亮的篮子里，包上玻璃纸打上礼品结，甚是堂而皇之。价格下至五千上至三万日元不等。人们一起买好几个，满满塞进后车座带回家去。我也给我们住的小区的看门人送了葡萄酒作为圣诞礼物。四位看门人，一共需要四瓶。我因为是临时居住的外国人，没必要送特别贵的，略表心意即可。在附近食品店买四瓶葡萄酒时，问我要不要礼品式包装，我说要，遂一瓶瓶用包装纸包了，并打了礼品结递给我。虽是廉价葡萄酒也并不歧视。岁末的商店里有专门负责特殊包装的阿姐，把顾客买下的东西一个接一个一层层包好打上礼品结。

人多拥挤，加之阿姐们不像日本人那么手巧，包装相当花时间。但想到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只好耐心等待。在这个国家，着急就要吃亏，总之要排队静等包装。这样，给四位看门人每人一瓶葡萄酒。

若说送这个档次的礼物有没有效果，那还是明显有的。此后一星期左右全对我们那般和蔼可亲，这种立竿见影之处不妨说是意大利人可爱的地方。过了年倒是彻底回到了老样子……

我们今年的圣诞节只送了这么一点礼仪性礼物，自然没费多少时间，而若是普通人，上街为许多人买齐礼物想必累得半死。

和日本岁末光景不同的是乞丐、艺人、讨东西的满街都是。这些人说起来原本就比日本多，到了年底更是多得怵目惊心。每个街角必有人拿着盘子等在那里——这么说一点也不夸张。欧洲人来日本，似乎为街角的自动售货机之多感到诧异，罗马城则有比例大致相同的乞丐站在那里。

以种类说，最多的是母子乞讨者。这类人原则上坐在路边，盘子置于前面，手伸在行人膝盖那个位置，口中说道："这孩子连牛奶也没喝上，肚子饿了，帮帮忙吧！能不能活到明天都很难说。"看脸形，大体像是吉卜赛人，而且小孩子的确一副如饥似渴的样子，瘦，脸积了一层污垢似的约略发黑，眼窝深陷。说来不可思议，任何一对母子都长得极为相像。小孩子的年龄多少有所不同，此外任何一点都是某种典型的母子，就好像同样的母子复制了很多很多撒遍大街小巷似的。

这些吉普赛母子有很多谜。我认识的一个人咬定说他三年前看见的母子又在同一街角见到了，三年时间里小孩儿一点也没长大。这恐怕是他看错了，她领的应该是另一个孩子。不过很多时候似乎并非真正的母子，而是有组织地将"租来的孩子"带来带去。我只能说是"似乎"，真相不得而知。

没有小孩的（或小孩没有到手的）中年妇女偶尔也有，这类人把空空的哺乳瓶往行人鼻头那里猛地一伸，怒气冲冲地吼道："没有牛奶钱！"犹如狄更斯《双城记》里革命时期的巴黎街景。

其次多的是身体有障碍的人。没腿的人、没了很多部位的人。这些人把没有的部位明确出示于众。不存在的存在感。久久观察之间，发现不存在部位多的人在比例上讨得的钱多一些。我不由感叹：人世的运转意外地公正。

但是，这些人中有的并非身体真有障碍，而是为讨钱装出来的，即一种表演。康多提大街（Via Condotti）附近有个四肢扭曲、脖子反转、总是淌口水的乞丐少年，每次看见我都觉得不忍。不料有一天看见他一边数钱一边在街头快步如飞，看得我目瞪口呆。穿的衣服一样，我想不至于看错。不过如果那是演技，我宁愿为那演技付钱。

另外有手风琴手走街串巷，不时有手风琴发出不堪入耳的声音。

人行道上有人画宗教画要钱，一连花好几天时间用彩色粉笔把宗教画画在路面上，夜晚敷上塑料布以免有人踩上。有弹着吉他唱尼尔·扬《金子心》（*Heart of Gold*）的长发青年（这个太让人痛心了，给了一百日元），“咆咕咆咕”吹着风笛样的东西挨门讨钱的从山上下来的羊倌，牵猴人（只牵不耍），手提用意大利语写着“肚子饿了”的牌子坐在路旁的面容憔悴的外国小伙子，一声不响地伸手讨东西的别无所长的男子，如此形形色色的男女充斥街头。

不过说不可思议也是不可思议，何以惟独圣诞节乞丐数量突飞猛进？这些短工式乞丐平时到底靠什么维持生计？如此琢磨起来，谜团一个接着一个，脑袋成了一团乱麻。说真的，他们平时究竟何以为生呢？

这且不说，这么多乞丐都能讨到钱不成——这个疑问自然浮上脑海。但观察之下，确有相当不少的人停住脚从钱夹里拿出钱来放进盘子。我猜想欧洲人这样做怕是出于宗教原因，不过他们时常也做这种微小的施舍，尤其在圣诞节时，这种感情倾向似乎更强烈，看准这一点的乞丐自然有增无已。也可能情况相反，或者乞丐的增加为社会的慈善状况推波助澜亦未可知。不管怎样，需求和供给巧妙地保持着平衡。大致说来，穿戴得体的太太给一千里拉（一百日元），一般人给五百里拉（五十日元）。一次试着给一个小女孩乞丐十五日元，结果没能从她口中听到“谢谢”。观看之间（因闲着无事，看得比较仔细），发现他们等到盘里的钱大体凑齐了，便迅速藏进了哪里。盘里大致留五六百日元像是讨东西时的诀窍。若比这个数多，过路人难免心想“都讨不少了，用不着我给了”，而若少于这个数，人家则可能以为“大家都不给，我不给也无所谓”。世上的实用哲学的确五花八门，静静注视着街巷，自会学到某种东西。如果站在东京街头定定地注视什么，一定会遭遇怪异的神情，在罗马则不至于，人们经常止步细看什么。老婆垂涎三尺地盯视着Max Mara或Polini等百货商店的展示窗，这时间里我朝着大街凝目观察乞丐形态。人各有各的人生方向性。

总而言之，街上混乱不堪。交通堵塞非比一般，搭出租车也寸步难行。公共汽车挤得水泄不通。外出一次，回来心力交瘁。这些地方

也和日本一模一样。

房东林恩太太对罗马的混乱头痛不已。她是中规中矩的英国人，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这种混沌状态。“圣诞节快到时我绝不上街，”她说，“真的，村上先生，无论谁怎么说，那都是khaos[64]漩涡的中心！”

她对日本人怀有好感，或者不如说对大凡非罗马性质的东西全都怀有好感。我们每次见面，她都会产生似乎同是北方国民的连带感，总是长叹一口气，就这disorganized country[65]大发牢骚。可她丈夫是那不勒斯人，她抱怨意大利怕是多少有点不应该。毕竟，同那不勒斯人结婚而哀叹世界的混乱，无异于同黑熊结婚而抱怨其身上的长毛。

说起来，这位林恩太太把世间所有阴暗面统统一言蔽之为“Stupid”[66]。房子设备什么的坏了找她请人维修，她每每现出伤心的样子，就意大利产品的Stupidity抱怨一通。对维修工的Stupidity也发脾气。照她说来，菲亚特是Stupid Car，邮局是Stupid office（这个我也深有同感），路上的狗是Stupid dog。不过，英国人这种人的确有点怪，我想。

---

[64] 希腊语“混沌”之意。

[65] 无组织性（混乱）的国家。

[66] 此处意为愚蠢、笨、蠢货、傻瓜。下面的Stupidity（名词）亦同。



米尔维奥桥市场

今天是12月22日，差不多该去购物了。25日和26日圣诞节休息，所有店铺一律关门闭户，一如日本的正月。今天若不买好那期间吃的食品，往下势必坐以待毙。

平时我们在附近的超市购物，但在想多少集中买些生鲜食品的时候，一般要到米尔维奥桥（Ponte Milvian）的蓝天市场去。米尔维奥桥是皇帝下跪乞求教皇准许修建的，乃台伯河上有名的古桥，但因经常目睹，皇帝也罢教皇也罢都顾不上理会了。

从米尔维奥桥到留有墨索里尼时期面影的弗拉米尼奥桥，沿河走去，一家挨一家排列着宛如上野[67]“糖商小街”一带那样的食品店衣帽店等店铺。蔬菜新鲜，各种各样应有尽有。所以附近的主妇大军提着大购物袋聚集到这里，各个阶层各色皮肤比肩接踵，既有穿皮衣蹬高跟鞋的阔太太，又有俨然大件垃圾的老太婆，既有菲律宾中年妇女，又有美国外交官夫人模样的人，日本太太也看见了几个。每次去市场我都心生感慨：世界上委实存在着类型繁多的主妇。

此外，离这市场不远有一家价廉味美的小餐馆，也有递出一百五十日元（一千五百里拉）即可吃上一块相当大的热气腾腾的比萨饼的站食饼屋。叫一声“米莱·廷奎（一千五百里拉）”果然切下一块一千五百里拉的，用电烤炉热了端上。出二百日元就吃得肚皮鼓鼓的。旁边还有总是给工人和士兵挤得热火朝天的廉价餐馆，男服务生的眼神和态度极端恶劣，时常有汗臭味扑鼻而来。与此同时，意大利也有能够吃到甚是少见的正统里脊肉的高雅餐馆，那里幽静，服务生态度也好，壁炉“哔哔剥剥”烧着。市场入口一家小店的站喝咖啡也浓郁可口。任何国家都一样，热闹的市场附近必有许多美味小食店，锦小路如此，筑地也如此。

我们乘公共汽车前往米尔维奥桥，先去鱼铺买大马哈鱼。大马哈鱼是进口货（地中海当然捕不上大马哈鱼），价钱决不便宜，但对我们极有利用价值。一条大马哈鱼，既可做寿司，又可盐烤，头还可以做汤。庆幸的是，买了鱼身，鱼头可以白拿，因为意大利人一般不用

马哈鱼头，镰状鱼骨那么鲜美的地方也弃之不用。一公斤三千日元左右，随便买多少。去鳞、掏肠、切头，还切段分开卖。我们总买上半身。仔细看去，往往只上半身剩在那里，说不定意大利人专门买下半身。我们买了两千五百日元的大马哈鱼。

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鱼铺都大同小异：一个穿长胶靴的似乎有些古怪的老伯和一个健康得不得了的老婆婆两人在鼓捣。剖了腹的鳗鱼仍然吱溜溜地跑了，老婆婆随后追去。“喂快来呀，小姐，好鲷鱼来了！”——这种欢快的声音此起彼伏。

在相邻的鱼铺买了七条沙丁鱼、五条鱿鱼。沙丁鱼非常便宜，鱿鱼略贵，一共一千四百日元。

接下去买青菜。萝卜三根加芜青。蘑菇两公斤。西红柿、黄瓜、马铃薯、比埃达（类似京水菜的菜）、菠菜、扁豆、罗勒等等。两人双手满满抱着东西，站着喝罢咖啡，又坐公共汽车回家。如此购物累是很累，但满载而归，又都新鲜，心里十分快意。较之在米科诺斯生活那两个月的食物种类之单调，意大利——尽管是隆冬时节——简直无所不有，堪称乐园、天堂！总之蔬菜全都生机盎然。此时的赫尔辛基，人们吃的是什么呢？

回到家，当即动手准备。

我揪下蘑菇脑袋煮。老婆用尖头菜刀（这是从日本带来的）剖开大马哈鱼，肥度适中的绝好部位出来了，马上蘸酱油和芥末站在厨房里吃了起来。大口小口吃这东西的时间里，不由得想吃米饭，正好有昨天剩的冷饭，便就着这生鱼片和梅干一扫而光。那么尝尝鱿鱼如何，于是鱿鱼也切片吃了。这鱿鱼滑润润的，十分可口。刚煮好的扁豆也当咸菜“咯嘣咯嘣”吞了下去，速食大酱汤也做了……如此这般，站在厨房里就简单解决了午饭。这么吃相当够味儿。

顺便交待一下，这天的午饭菜单是：大马哈鱼和沙丁鱼寿司、梅干寿司、青芜速腌泡菜、扁豆拌梅干、烧沙丁鱼。不过这天属于例外，平日大多吃通心粉。

总之罗马市场的食物全都神气活现，尤其西红柿、菠菜和扁豆，放进嘴里简直一声脆响，“这才叫鲜菜”的芳香飒然扩展开来。这三样回到东京后一段时间里难吃得无法下咽——东京的意大利菜虽说近来好吃多了，但青菜的生鲜程度还是一言难尽。

[67] 和下面的锦小路、筑地均为东京地名。



隆冬时节

从新年即将来临的12月17日开始写长篇小说《舞！舞！舞！》。写长篇小说时模式大体相同——“想写啊”那样朦朦胧胧的心情在自己体内一点点高涨，某一天猛一咬牙：“好，今天开写！”就我来说，较之具体结构和情节，更注重把握这个临界点。

和《挪威的森林》不同，《舞！舞！舞！》动笔之前就已确定书名。这个书名有人推测取自“沙滩男孩”的歌曲，其实（虽然怎么都无所谓）来自一支叫德尔兹（The Dells）的黑人乐队的老歌。从日本动身前，归拢家里的老唱片自制老歌磁带，其中正巧有这首歌曲。很像是老风格的“节奏布鲁斯”（rhythm-and-blues），悠然、粗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黑人味儿。在罗马每天半听不听地听它的时间里，倏然来了灵感，就以它为书名写了起来。我当然知道“沙滩男孩”也有同一名称的曲目（上高中时常听），但直接起因是这首德尔兹的歌曲。

这部小说从头到尾我都觉得写得十分顺畅。《挪威的森林》是作为我也从未写过的那一类型的作品，边写边想别人将怎样看待这部小说呢？这个那个想个没完。而关于《舞！舞！舞！》根本没想那么多，想写什么就写什么，随心所欲，怡然自得。从根到梢是自家风格，出场人物也和《且听风吟》、《寻羊冒险记》一脉相承，就好像回到久违的自家院落，非常开心，或者莫如说写这一行为本身就无比快乐，这在我也是极少有的事。

不过，这期间罗马的冬天迅速加深。这年的罗马冬天，冷的日子好像多些，屋子里也冷飕飕的。已有的暖气设备不够暖，买了个煤油炉回来，但暖的只是炉的正面，整个房间始终冷气逼人，而且是潮乎乎的令人讨厌的冷。洗的衣物两天都一点没干。这还不算，为了买波利尼（Maurizio Pollini）音乐会的门票，整整在寒风中排了四个小时队，结果两人身体都彻底垮了，一直冷彻骨髓。罗马的音乐会售票方式实在复杂离奇且蛮不讲理。波利尼或伯恩斯坦（Bernstein）等超一流演奏家的音乐会发行购票序号券，甚至发行购序号券的序号券，而这必须一一排队才能到手。一来二去，连主办方都晕头转向起来。序号券发行到257号，然而门票只有101张，此种事屡见不鲜。既无连

贯性，又无温情可言，何况总有人插队，企图蒙混过关，有门路的早从后门把票搞走了。

而且遗憾的是，这天波利尼的演奏很难说精彩得使我们的殊死努力没有白费。前半场好像焦点还没对上就完了。心想这就是波利尼？好在最后的李斯特奏鸣曲到底云消雾散一般别开生面，不同凡响。不过，就波利尼的实力来说，本应提供更为石破天惊的音乐。听起来就一再觉得“不到位、还不到位”，却又无法把这种感觉聚敛成形，因而有种无可言喻的意犹未尽的不满留在心底。哪一年的事我忘了，总之过去在东京听过一次里赫特（Sviatoslav Richter）的演奏，当时我累得几乎迈不动步了，听的时间里万分感动，音乐会结束时劳累早已不翼而飞，身体如刚出炉一样精神百倍。在这里追求那个就算是苛求，但毕竟挨冷受冻排长队买来的票，想不到竟是这个样子，虽说不是波利尼先生叫我排的队……

由于太冷了，我穿上大衣，对着桌子“啪嗒啪嗒”连续敲击电子打字机的键盘，和在西西里写《挪威的森林》时正相反。那时暖和得不能再暖和，坐在桌前昏头昏脑，这次则冷得差点儿把键盘敲坏。

不用说，冷比暖更适合脑力劳动，问题是这房子里的罗马冬天未免冷过头了。夜里为温暖身体而一小口一小口啜白兰地，白天为冲淡寒冷而每天都跟老婆大谈温泉和夏威夷。老婆宣布：回日本要好好去温泉，每天从早到晚泡在里面，然后去夏威夷一个月。妙！一想都胸口直跳。不过话又说回来，我首先要写完小说才行。一旦开写，横竖要彻底写完才能回日本。一旦回日本，必定又要手忙脚乱。无论如何要守在这里把工作处理妥当。

《舞！舞！舞！》中出现夏威夷场面也是因为这个。我边写小说边想去夏威夷想得不行，所以拼命想像夏威夷写了下来。大概是这样子、大约是这个感觉——一边回想一边写。如此写夏威夷场面的时间里，似乎多少暖和起来，心情就像歪在热带太阳底下喝凤梨园[68]似的。文章也有这种具体效用！尽管转瞬即逝。

据日记记载，这一时期美元跌至一美元兑换一百二十三日元,而我们的现金差不多全是美元，说实话，打击不小。

接下去发生了大韩航空飞机爆炸事件。2月间两人同时得了重感

冒,咳嗽和鼻水一连几个星期都止不住，脑袋昏昏沉沉，低烧迟迟不退。但奇怪的是，惟独写作进展顺利。对我们来说，那的确是个严寒的冷季，从头冷到尾，即使在我们长达三年的旅欧生活当中也是最难熬的时期。这年冬天发生的唯一好事，就是小说完成了。因此，每当我想起《舞！舞！舞！》这部小说，就想起罗马马洛内先生那座寒冷的房子。是的是的，我是穿着大衣在那座房子里写小说的。并想起叫琴的猫、叫玛多的狗、米尔维奥桥的市场和波利尼音乐会。

---

[68] Pina Colada，一种西班牙风味的鸡尾酒。



伦敦

关于去伦敦，没有多少值得写的，因为在那期间一直独自写小说。现在回想起来，可谓不可思议的一个月。在那一个月时间里，我差不多绝对没和任何人说话。



去伦敦可以说是势之所趋。老婆有点事情要经伦敦回国，我去送她。从3月初在此住了大约一个月，这期间我几乎跟谁也没说话，一直闷在房间里写作。写长篇小说时大体都是这样，产生不了想和谁说话的心情，所以对我来说，伦敦始终是个孤独而沉默的城市，这一印象渗透到了骨子里。

最初几天住旅馆，后来搬进短期租用的公寓。实际上来伦敦是第一次。首先最让我吃惊的是英语根本讲不通。我这人彻底习惯了美国英语，英国英语开始几天怎么也跟不上，很多时候都惊叹莫非这也是英语？发音听不大清楚，老是重复“Pardon my（对不起）”（其实英国人这种时候都说“Sorry”）。例如在附近超市卖肉的地方我要烤牛肉，那里的女孩子就此说了句什么——她问我什么，可我完全听不懂。不仅有很重的地方口音，而且速度快，心里不由叫苦。我说了句“pardon my？”对方重复一遍。但因为速度仍那么快，还是听不懂，于是我说听不懂。结果她再也不重复了，只是以“得得”那样的神情摇摇头，并包了一块差不多大小的肉给我。如此几次过后，我再不在此买烤牛肉了。不单这家超市，其他地方也有几次同样的遭遇。这点和美国很不一样，美国人若对方听不懂自己说的，一般情况下都反复改变语速和用词，直到对方完全听懂。

如此这般，语言上意外吃了苦头。

房子是找中介商介绍的，看到第三处时定了下来。最先一处是位于名字叫“World End”（世界尽头）的——好厉害的名字——地段的公寓（顺便补充一句，我以前翻译的保罗·泰罗《世界尽头》这本书的背景即在这个地段。小说蛮有意思，务请一读），宽敞倒是宽敞，但

房间装修有点叫人透不过气，就谢绝了。其次一处在帕丁顿（Padding ton）站附近。房间本身固然不差，可惜地下室气氛阴郁，又凉浸浸的，免了。第三处位于圣约翰森林路，是美术工作室样式的房间，狭窄，折叠床，可以收进墙内，但位置不错，光线好，离地铁站和摄政公园（Regent's Park）也近。反正一个人生活窄点儿也没关系，遂定了下来。窗外就是那条阿比大街（Abbey Road）[69]。

我在这个房间里写完了《舞！舞！舞！》这部长篇小说。一边用收发机听音乐、眼望外面的阿比大街，一边日复一日“啪嗒啪嗒”敲击电子打字机键盘。这是暖气极足的公寓，尽管外面大家都穿着大衣，但里面只穿T恤和短裤都渗出汗来，须不时开窗把脑袋伸到大街上空凉快凉快。写累了，就看在附近书店买来的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一个近乎残酷的力透纸背的书，无可遏止的绝望，积极向上的自毁。天气总是不大好，三天有两天阴天，动不动就“啪啦啪啦”下小雨，一种仿佛预告恶劣世界到来的令人万念俱灰的冷冷的雨。不知何时下起，不知何时停住，甚至走到外面也弄不清此刻是否真的在下雨。这便是伦敦的雨。

趁不下雨的时候，每天在摄政公园跑一个来小时。这个程度的运动若再不做，脑袋势必掉弦。若不想让脑袋掉弦，就要让身体跑。只要不下雨，摄政公园还是极妙的公园。沿中间一条池边路跑过，再绕公园跑一圈。跑到动物园附近时，动物栏里飘出一股呛人的臊臭味儿，但这个也极妙，可以切切实实感觉出围栏里有许许多多动物。活物的活生生的气味。狮子们高角羚们骆驼们远离故土在这里生活，什么动物叫唤的声音也传来耳畔。

傍晚写作完毕，去附近买东西，做简单的饭菜吃。我在伦敦生活期间基本没在外面吃饭。老实说，吃什么都吃不出多大味来。当然美味的餐馆我想一定是有的，但从意大利赶来，很难有心情在伦敦花钱进餐馆。抱歉固然抱歉，可还是自己做来更可口。面包蛮够味儿，称为“料理”怕不合适，但我每天都在超市买来烤牛肉和面包，做牛肉三明治吃，咖喱饭或西红柿汤也有时做。

到了晚间，听音乐会换一下心情。现在看来，旅居伦敦期间能想得起来的，也就是音乐会和电影，因为此外光写小说和跑步。电影的确看了很多。布鲁斯·罗宾逊[70]这个年轻导演拍摄的英国片《我与长

指甲》清晰留在了记忆里，在日本是否公映我不知道。是一部喜剧片，维斯涅尔这个虽然厚脸皮却叫人恨不起来的穷困潦倒的艺术青年、不无懦弱的主人公“我”以及维斯涅尔的同性恋老伯，三人难解难分，相当有趣。另外由加西亚·马尔克斯写剧本的美洲西部片《死亡的时间》这部哥伦比亚片也看了，甚为爽净的影片。《去听美人鱼歌唱》这部富有小品意味的加拿大片也看了。这部大概日本也公映了，讲一个长得并不算漂亮的立志当照相师的普通女孩如何对单位的上司——漂亮的女同性阿姐崇拜得神魂颠倒，但最后还是失望了，跟这位阿姐去日本餐馆时，一个活章鱼一摇一摆爬了出来，女孩叫得半死——这地方不够正常，那东西纵然日本人也不吃的。

不管怎么说，在伦敦看的电影中我最喜欢的是法国片《天使的灰烬》（POUSSIÈRE D'ANGE）。节奏如风行水上，演员表现不俗，使我有一种久违的酣畅淋漓的愉悦感。看罢乘兴走了三站地铁的路。另外看了狄更斯的《小杜丽》（Little Dorrit），有亚利克·基尼斯（Alec Guinness）出场，影片极有狄更斯风格。长得不得了，这个星期天放第一部，下个星期天放第二部。亚利克·基尼斯那仿佛每个汗毛孔都深深沁有狄更斯的从容不迫的演技十分了得。观众里有好多父子，想必英国人是作为必要的成长仪式让小孩看这部狄更斯作品的，下一步大概要让孩子好好阅读原著。不难看出，英国人和狄更斯文学之间显然存在着这种强韧的长期关系，不由让人思索日本是否有与此相应的超党派的国民作品，但没有想出像狄更斯世界这样具有多方面广度和深度的东西。不管怎样，狄更斯确实有意思，虽然带小孩去，但父母其实也足可沉浸其中。

音乐会也听了不少。

阿什肯纳吉（Vladimir Ashkenazy）指挥的皇家爱乐管弦乐团的音乐会也去听了。他与其儿子沃夫卡·阿什肯纳吉同台演奏。我在雅典听过一次沃夫卡君的演奏，老实说，当时没怎么认可，不过也可能多少有所进步。曲目首先是父亲指挥的科里奥兰序曲，接下去是沃夫卡出场演奏的莫扎特的回旋曲，以及父子共同演奏的弗兰克的《交响变奏曲》，最后又是父亲指挥的马勒的第四交响曲。沃夫卡的钢琴依然不够到位。较之好坏，更属于感染力匮乏的问题，没有诉诸心灵的东西。倒也不是受到儿子传染，但为人父者的阿什肯纳吉的指挥也不怎

么样。马勒的交响曲合奏得也粗疏，漫不经心，比之不久前在罗马听的殷巴尔（Eliahu Inbal）指挥的《大地之歌》那天风海涛般的演奏，简直有霄壤之别。他的马勒松松垮垮而又黏黏糊糊。翌日时报的乐评栏载文写道："如果我是弗拉基米尔·阿什肯纳吉的儿子，那么我会做什么呢？或许当理发师，也可能投标枪，但有一点可以断言：绝对不当钢琴手！"

残酷，但有趣。第二代也十分不易。

还在女王伊丽莎白音乐厅听了科瓦塞维奇（Stephen Bishop Kovacevich）的钢琴音乐会。内容皆是贝多芬和舒伯特，舒伯特的降B调奏鸣曲绝对精彩，朦胧温馨，让人身上的疲劳悄然脱落一尽，就是如今难得听到的舒伯特。但贝多芬方面多少有些枯燥。此外还去了我喜爱的马里纳（Neville Marriner）和ASMF[71]的音乐会。巴赫的《圣母颂》尤其优雅动听，仿佛每一个角落都清扫得干干净净，指甲剪了，耳孔掏了，头发洗了——便是这样一种感觉。这么说也许是出于我个人偏爱，反正是出色的演奏。如此充实的音乐会可以天天花不多的钱听到，伦敦市民真让人羡慕。

歌剧看了柴可夫斯基的《叶普盖尼·奥涅金》（弗雷妮唱主题曲）和布里顿（Benjamin Britten）的《比利·巴德》（Billy Budd），都很精彩。这个已经在别的地方写了，在此割爱。

伦敦逗留期间还去听了一次爵士乐，因为是令人怀念的布洛森·迪儿莉（Blosson Dearie）来爵士乐夜总会演奏。夜总会名字很奇特，叫"比萨饼游乐场"。名字听上去不怎么高雅，实际上却高雅得多。所有座位都采取预约制，打电话告知信用卡号码，即给留出座位。票价是八英磅半。客人全部是前来品享夜总会的衣着得体的中年夫妇，单客仅我一个。因此之故，女侍应生时常挂记着来我座位问我"开心么"，我笑着回答"嗯开心着咧"。不一会儿再次来问"如何，开心么"。一身牛仔服的日本男人独自来听布洛森·迪儿莉——人家或许为此感到蹊跷。

布洛森·迪儿莉的台风极具魅力。年纪该不小了，本来担心很难发出往日那惹人怜爱的声音了，结果纯属杞忧。当然，同过去相比声音的圆润度多少有所流失，但艺风愈发纯净无瑕，让人得以全副身心沉浸其中，从第一曲直到最后一曲。曲目全是原创（原创更叫人感

动），所谓Standardnumber（标准曲目）几乎没有。边弹钢琴边唱，钢琴也弹得好，轻而又轻，仿佛即将腾空而去。如此味道的声音并非想弹就能弹得出来的。若说这不是爵士乐，或许真不是爵士乐，但布洛森·迪儿莉的音乐本来就不是吊起眼稍听的音乐，那是一种高品位夜总会音乐，是让人细细品味酸甜苦辣的成年人音乐（如今这种成年人倒是少了）。

比萨饼和葡萄酒也很可口。我吃过西西里风味比萨饼，而这个同意大利比萨饼相比也并不逊色。餐费十英镑。



在伦敦期间只做过一次短途旅行。小说好歹完成了，高兴得外出旅行去了。从帕定顿站坐两小时火车来到一座名叫巴斯（BATH）的温泉镇。一如镇名所示，这是罗马人进驻英国时期发现的温泉古镇。罗马人是异常喜欢温泉的民族，满世界建造华丽壮观的温泉设施。我在那里的自行车出租店租了一辆自行车，准备骑去一个名叫库姆堡（Castle Combe）的小村庄。有人告诉我去英国最好到库姆堡，那里漂亮得很。从巴斯到库姆堡，路段果然漂亮（很早很早以前罗马人修的笔直的路），但要翻过好几座山岭，相当费力，况且我借的自行车有个要命的问题——每隔一小时车链就“哗啦”掉下来一次。如此这般，没能“悠悠然骑着自行车在英国乡间游逛”。这还不算，傍晚时分大汗淋漓地骑到库姆堡一看，旅馆早已满员，必须骑到下一个村庄去。

尽管如此，这次旅行还是叫人欢欣鼓舞。一来毕竟有一种小说终于写完的解脱感，二来天气也出奇的好，而且正值春天。由于拼命登车浑身是汗，肚子也瘪了。在库姆堡下一个村庄住的旅馆名叫“WHITE HEART[72]”，态度虽然冷淡，但住起来蛮舒坦。只剩大房间了，我说只我一人，便减了房费。傍晚在旅馆的酒吧喝啤酒，在餐厅吃鳟鱼。鳟鱼是切成薄片同杏仁一起蒸的，这东西简直香得无与伦比。谈不上多么好看，但味道实在地道。由于是棕树主日前一天，星期六，旅馆餐厅里坐满身穿外出服装的面目和善的一家老小，以致我险些吃不上晚饭。村里只此一家餐厅。

回来路上就差一点点回到巴斯的时候，自行车彻底分崩离析，不折不扣地变得七零八落，即使请来国王及其家臣也不可能修复，害得我扛着自行车走了最后五公里，得得！

不过对我来说，仍是一次幸福的旅行。



去邮局把打好的小说原稿寄去东京之后（避免通过意大利臭名昭著的邮局寄稿也是我特意来伦敦的一个原因），3月末独自返回罗马。

---

[69] “披头士”有一首歌曲与此同名。

[70] 英国电影演员、导演（Bruce Robinson，1946—）。

[71] Academy of St Martin-in-the-Fields之略，圣马丁室内乐团。

[72] 意为“白色的心”，1982年成立的基督教音乐乐队名。



1988 年，空白年

 1988年，空白年

一开始我就写了，为凑这本书（即所谓“游记”），我一点点写了类似速写的片断性文章，但在1988年这类速写一页也没写，没心情写。一来年初为写《舞！舞！舞！》忙得焦头烂额，二来写完后好长一段时间陷入虚脱状态。回日本后，虚脱感不久又过渡到一言难尽的乏力感。结果，直到临近年底都什么也没写成，可以说是空白年。

但是，这本书是随同我这个人的行动按部就班展开的，所以最好还是把1988年4月至10月间发生的事简明扼要地提一下。4月我回到日本，校对印刷厂送来的《舞！舞！舞！》清样，然后把关于菲茨杰拉德的文章和译文收集在一起，以《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读本》作为书名交给TBS不列颠[73]出版了。又拿了驾驶执照。过去没有什么驾驶执照也没感到不方便，但秋天计划开车周游土耳其，为此发奋一搏。再说在欧洲没车去哪里都相当不便。每天坐山手线电车去驾驶技术培训所，一个月好歹过关。这些事处理完毕，如释重负地去了夏威夷，在那里发呆一个月，放松身体，百分之百是一次“暖身”旅行——罗马冬季的寒冷便是那般沁入骨髓。那期间我一直租本田雅阁练习开车，后退时撞在停车场柱子上，把右侧尾灯撞得粉碎。

可是，无论怎样给身体加温，某种冷气还是挥之不去。



回头看去，这一年对我们夫妇似乎算不上多美妙。回到日本，《挪威的森林》成了超级畅销书。也是因为一直身在国外不大了解情况，过了许久回国一看，原来自己已成为名人，为之瞠目结舌。看报纸上的畅销书排行榜，《挪威的森林》的销量在任何书店都名列第一。讲谈社的办公大楼堂而皇之地垂下红绿两色幕布[74]。我有事必须不时沿江户川桥至护国寺的大街通过，看了实在不好意思，总是佯装不见。秋天出版的《舞！舞！舞！》也顺利地成了畅销书。

可是——这么说自知冒昧和傲慢——我无论如何未能从某种苦闷中解脱出来。苦闷什么说不清楚，反正就是苦闷得不行，觉得去哪里

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觉得自己一下子失去了许许多多。书卖到五十万册时，自己当然是高兴的。自己写的东西被大范围接受，对于作家来说没理由不高兴，不过坦率地说，较之高兴，我感到的更是吃惊。我想像不好五十万这个数字是怎么回事。作为读者想像不出，作为单纯的“人数”也想像不出。十万人我好歹可以想像，而五十万已无能为力。后来更加不得了，一百万、一百五十万、二百万，这些对我来说无非是不具实体的“庞大数字”罢了。对于传媒界人士，处理这个程度的数字或许是家常便饭，而我则受不了。越想脑袋越乱，所以也曾尝试不去多想——十年来我基本上是作为小说家混饭吃的，数字与我没什么关系，畅销不畅销不外乎时运，问题是那里边出现了类似无法置之不理的空气那样的东西。

说起来甚是匪夷所思，小说卖出十万册时，我感到自己似乎为许多人喜爱、喜欢和支持；而当《挪威的森林》卖到一百几十万册时，我因此觉得自己变得异常孤独，并且为许多人憎恨和讨厌。什么原因呢？表面上看好像一切都顺顺利利，但实际上对于我是精神上最艰难的阶段。发生了几桩讨厌的事、无聊的事，使得自己的心像掉进了冰窖。现在回头看才明白过来——说到底，自己怕是不适合处于那样的立场的。不是那样的性格，恐怕也不是那块料。

那一时期我心力交瘁，老婆病了一场。我没心思写文章。从夏威夷回来，整个夏天一直在搞翻译。自己的文章写不出，但翻译还是可以做的。一字一句翻译别人的小说，对于自己不妨说一种治疗行为，这也是我搞翻译的一个缘由。



8月，我把老婆留在日本，重返罗马。从罗马去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目的是为新潮社采访阿索斯山和土耳其。这次旅行一共花了一个半月。我和摄影师松村君、编辑O君冒雨在阿索斯半岛的崇山峻岭中爬来爬去，接下去同松村君两人驾驶三菱帕杰罗去土耳其腹地转了一个月。有各种各样的遭遇，肉体也大受考验，但心情反倒由于体力的极度消耗而变得十分畅快。多余的脂肪去掉了，脸也变得漆黑。完了返回罗马，第二天去机场接老婆。10月间的事。

这样，在罗马的生活重新开始了。

不过恢复——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真正得以恢复——恐怕是在翻译完蒂姆·奥布莱恩（Tim O'Brien）的《原子时代》（The Nuclear Age）之后。上面说了，翻译对于我是一种治疗行为。进一步说，这本《原子时代》的翻译对于我纯属精神再生（rehabilitation）。翻译过程中我一再为之感动受到鼓舞。这部小说中蕴藏的热能从最底层温暖了我的身体，骨髓里的冷气也因之排放出来。假如不译这部作品，说不定自己已随波逐流漂去另一个方向。

译罢这部作品，我有了再写一本小说的心情。我想，人的存在证明大概是在长久存活并持续写作这一行为之中。纵使那意味着持续失去什么、持续为世界所憎恶，我也只能那样活下去。那便是我这个人，那便是我的场所。



以上就是1988年4月到10月之间发生的事情的概括。1988年10月，再有三个月即是我四十岁生日。我必须重振旗鼓。

这样，我又一点点写起了随笔。

---

[73] 日本的出版社。

[74] 《挪威的森林》日文原著分上下两册，封面分别为红绿两色，除书名外无任何图案。由作者亲自设计。



1989 年，复原年



康纳利先生的公寓

康纳利先生的公寓位于罗马的波尔卡里大街（Via S.Porcari）。从梵蒂冈走过去马上就到，面对文艺复兴广场去圣天使城的大道。距地铁站也近，过两条街走到里埃恩兹奥街（Via Cola di Rienzo），一般东西都可买到。果蔬市场就在旁边，到了梵蒂冈，还有梵蒂冈邮局（梵蒂冈邮局不属意大利，乃梵蒂冈城国的邮局，邮票也不同，比意大利邮局不知正规多少倍）。沿里埃恩兹奥街径直走十五分钟，走到头就到人民广场。过了圣天使桥，马上就是那沃那广场（Piazza Navana）。

我们早已受够了以前居住的郊外住宅小区交通的不便，决定这回哪怕房租多少贵一点也要住罗马市中心。倒也是，若论便利，这座公寓可谓便利得无可挑剔，哪里都可以走着去，从哪里都能走着回来。

找到此处公寓纯属偶然。沿波尔卡里大街边走边谈论“就在这一带住吧”之间，碰巧看见一座带家具的短期出租公寓，是一座古宫殿风格的极有情调的建筑，带大门和院子，幽静，日照也似乎不错。打电话一问，正好有空房间。

只是，这空房间是地下室，再怎么往好里说，也不能说是好房间。实质上是半地下室，老实说很难称之为正常市民的居住空间。墙最上端有窗，仿佛安杰依·瓦依达（Andrzej Wajda）黑白电影的光线从那里隐约泻下。抬头看去，可以一闪一闪看见路上来往行人的脚，恰似桑尼·克拉克（Sonny Clark）那张名叫《昂首阔步》（Cool Struttin）唱片封套上的摄影画。小姐们穿着高跟鞋，那富有诱惑力的裸足不时能够见到，长筒丝袜在罗马快活轻佻的阳光下闪闪烁烁。如此脚踝带着“咯噔咯噔”不无惬意的声响从离我们脑顶很近的上方走过，作为风景诚然不坏，但天天看未免有点累。总的说来，这段地下生活没有什么美妙的事，或者不如明确承认倒霉的事更多。白天都有些阴暗，加之房间小，厨房设备也糟。电气炉的火力不够，煮通心粉都难有保证，水煮不沸。无奈，我们便用野营用的液化气炉煮通心粉、煮饭。蹲在厨房地板上做饭很有点像难民，心里空落落的，常想我们到底在这种地方干什么呢！

一下雨，面对院子的窗便渗水进来，房间里潮得厉害。由于电容量小，刚熨衣服，保险闸就“啪”一声掀下来，房间里一团漆黑。更糟糕的是，这保险闸活活要命，一旦掀下来就很难复位。我们隔壁房间也一样（地下有两个房间），住在那里的一对美国夫妇动不动就在漆黑中点蜡烛，保险闸比我们的还无可救药。是从波士顿来的举止高雅的中年夫妇，丈夫好像是外贸人士，想必是因为工作才滞留在罗马。理所当然，两人对罗马这座城市深恶痛绝，其心情我也能够理解——这样的房间在美国百分之百是贫民窑。

我们之所以耐住性子住在这里，外景（location）好这个关系固然也是有的，但主要是中意房东康纳利先生的人品。康纳利先生为人非常和蔼可亲，年纪估计七十五六，瘦高瘦高，举止多少有些迟缓，但精神还蛮精神的，每天开着心爱的韦斯帕车来到公寓楼附近的事务所，身穿款式土气的绿色外衣，戴一顶棒球帽样式的帽子。康纳利先生的职业是摄影师，他说过去曾为日本的出版社做过事，“一家名叫小学馆的出版社委托我拍摄意大利的建筑”，并给我看了照片集。看样子是相当早以前拍摄的，多少有些褪色，但技术毫不含糊，让人感觉很舒服。看他拍摄的人的衣着打扮，估计是20世纪60年代拍摄的。“眼睛不好了，已经从拍摄现场退下来了。”康纳利先生说。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在文艺复兴广场附近的银行工作，另一个儿子帮忙管理这座公寓楼。康纳利先生只会意大利语和法语，因此是他的儿子把具体情况讲给我们听的。

康纳利先生实在是个好人。意大利人里口惠而实不至的类型较多，但康纳利先生诚心诚意、无微不至地对待我们，有什么出问题的地方赶紧修好，缺什么买来什么。当然处理不顺利的时候也是有的，但至少此人有关爱之情，即使在我遇到的意大利人之中也属于相当出色的一类。一位深有旧时教养的老伯。

我们一眼就看好了康纳利先生，心想这糟糕透顶的地下室也未尝不可，遂耐住性子住了下来。人世间就是这么回事，即使出现状况，如果明白另一端有人，大多事情都可以忍受，反过来，即使置身于不太差的状况，看不见人影也会心焦意躁、提心吊胆。

除了这个房间，这座公寓楼另外有一个房间。那个在地上，设施也比地下的完备。我猜想这间地下室原本不是给人住的，可能是仓库

什么的，后来因多种原因改成了房间，所以种种设施都敷衍了事，故障也多，同地上的房间大不一样。康纳利先生保证说，如果地上的房间空了，就让我们优先搬过去。“现在住在那里的是一个单身赴任的汽车公司大人物，罗马的事情一完就回都灵自己家去，不出两三个月就会腾出来。”康纳利先生说。

这么着，我们就一边在黑乎乎的地下室里熬日子，一边等待菲亚特的大人物回都灵。不料，这小子说是下个月就回都灵，却老赖在那个房间不动。据他说，他也不愿意待在罗马，也恨不得马上就回都灵自己的家，问题是公司总是拖拖拉拉不给办手续。问一个意大利人，得知这在意大利似乎是常有的事，并非像日本的公司那样明确下达指令于某某日转去某某分公司工作。“喂，你做好准备，下个月去都灵！”——听上司这么说而为此打点好行装之后，事情却迟迟不得进展。找上司打听结果，上司不是说“噢那么说来是那么说过”就是说“唔那事已经没影了”，往往就这样不了了之。所以意大利人的话是靠不住的，连续说上三回之后再慢悠悠准备也绝不为晚。

如此这般，我们便日复一日在地下室生活。

不久，冬天来了，一天比一天冷。隔壁那对美国夫妇留下一句“感谢上帝总算可以逃离这座花园城市了”返回波士顿。由于太冷了，我们开车去意大利北部旅行。周游土耳其时从米兰的三菱代理公司租借的那辆大型三菱帕杰罗一直拖延未还，就开它出行。意大利人的马虎大意也自有其可取之处——在意大利提起帕杰罗，那几乎等于雅皮车。

我们一路住着小镇旅馆，沿高速公路缓缓北上。在威尼斯住了几夜，然后经克雷莫纳、热那亚去了里维埃拉。本来指望里维埃拉会暖和些，不料到了一看，冬日的里维埃拉总好像空落落的，暖和诚然暖和，却没有什么东西可让人提起精神。和在西西里时一样，身上不由得一阵阵发痒，有什么不对头的感觉一直挥之不去。

我们就带这种不释然的心情转了帕尔马、曼托瓦、费拉拉和阿西西，转完又返回罗马。

返回罗马后仍过同样的地下室生活，只好再次出游。这次去米兰。这样一来，让人觉得在帕杰罗中生活的时间可能会比房间里的长一些。好在有事临时回了日本。前不久天皇没了。我终于年届四十。

但不用说，到了四十也并不意味有什么东西陡然发生变化，既不至于以这一天为界一下子老态龙钟，又不会马上聪明过人，无非产生一点点“奇怪呀”这样的感觉而已。

回日本一看，日本的媒体铺天盖地全是天皇报道。有所谓“大丧之礼”，日本全国的警察集中到东京，不断掀开下水道顶盖，贴上封条，想必是为了防止过激分子的恐怖行径，但从意大利回来当即目睹如此情景，神经好像整个出了毛病。我们回日本期间一直住在涩谷区的公寓里，但因为对东京这种疯疯颠颠的名堂烦不胜烦，加之不时有警察登门，令人快活不起来，于是决定乘新干线去九州尽情泡一泡由布院温泉，泡到这场骚动过去为止。这么说或许不尽合适：九州的普通人似乎不怎么把“大丧之礼”放在心上。而在东京，仿佛全世界都染成了同一颜色，不管见谁都谈这个，全都就此发表这样那样的意见。五花八门的意见和感想如细微的尘埃漫天飞舞，微微震颤。所幸九州不同，感觉上天皇的葬礼也是和日常生活没多大关系的“遥远的故事”。

如此兵荒马乱之间，康纳利先生来电话了，告知都灵那小子终于回了都灵，房间空出来了，问我什么打算。于是我们又一路奔向罗马，心中感慨这样子岂不成了无根的浮萍，那里一趟，那里腻了这里一趟，这里腻了又去那里。那里一趟这里一趟倒没什么不可以的，可这样下去，真想购买意大利航空公司的数次往返优惠票。



康纳利先生留给我们的新房间位于一楼。说是一楼，其实是在一楼半左右的高度，因为地下室是半地下，一楼部分自然高出半层。较地下室当然明亮得多，房间也宽敞干净，厨房和浴室的功能远为充实，连洗衣机都有。以前住的地下室没有洗衣机，半年时间里我们始终“喀哧喀哧”手洗，弄得满手起泡，所以对康纳利先生的新房间我们心满意足。进得房间，餐桌上放着一个豪华的小果篮和一束鲜花，并附有一枚纸卡，上面写有“献给名闻遐迩的村上多特雷（博士）”（意大利人习惯这样胡乱形容别人的头衔，我真闹不明白自己何以成了博士）。

我在起居室一角放了一张写字台，把电子打字机摆在上面，接上小型CD唱机。这样，工作间差不多就出来了。回日本自己的家，固然有大口径JBL，但现在想也没用。在地下室住久了，搬到地上房间最先感觉到的，是完整看见外面风景是何等的妙不可言！无论再发生什么，都绝对不住回地下室去。从写字台横头的窗口可以看见一路之隔的七层古典式公寓楼，窗前带有仿佛墨索里尼即将发表演说的煞有介事的阳台。旁边有一家Profumeria（化妆品商店）。罗马Profumeria多得要死。在Profumeria上班的小姐们太太们当然都浓妆艳抹，每当无聊起来，她们就走到门口同左邻右舍的人站着闲聊，居然有那么多可聊的，不由你不佩服。

不过从这窗口看见的最佳景观不管怎么说都是路面停车，百看不厌。在这一带找停车位比登天还难，所以一旦我们得以把车停在家门附近，就不想把车开出那里。总之停车之难就难到这个地步。我们住的公寓楼前也总是停得满满的，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车为找停车位而在附近转来转去。因此，若偶尔有人把停的车开出去，发现空位的幸运开车人一副乐不可支的样子马上随后开进去，这情景定定地看起来真是饶有兴味。

或许你不相信，意大利的车有表情，一如车上的开车人，车本身也有丰富的表情。所以每当有车位腾出，它忙不迭地同开车人一起——活像人马一体——现出可爱的笑容。而若因动作之差被其他车抢了先，整个车就一下子消沉下来，垂头丧气，满脸懊悔。这一个一个表情甚是生动，光看都觉得其乐无穷。这方面和日本的小汽车不同，日本的车居然没有表情，高兴也罢难过也罢，都以上市企业那样大同小异的表情东奔西跑。若让我说，无论丰田MARKII还是日产GLORIA抑或马自达CAPELLA，都全然猜不出其所思所想。如果你说汽车那玩意儿有表情也好没表情也好还不一回事，那倒真是那么回事，不过即使细看日本路面停车的情景，也看不出多大意思，何况若过于无谓地久久盯视不动，没准给S级奔驰下来的人痛打一顿，还是小心为好。

在这点上意大利就表现不俗。那种有表情或者很有可能在路边抬起一条腿拉臭臭那样的车，并非任何人都制造得来的。我喜欢意大利车这样的地方，性能另当别论。

有了窗，就能怔怔打量如此光景以消磨时间。写作写累了，就靠

在窗边一边听威尔第的木管协奏曲一边乐此不疲地观看种种街头景致，心想到底是地上好。尤其罗马春天那晃晃耀眼的光照也和别的地方不一样，透明、亮丽、一泻而下。到了4月，外出就要戴太阳镜了。露天也可以吃饭了，新花开放，新鸟飞来，猫们也懒洋洋伸直身子，性急的小妞们甚至穿上了无袖衬衫。这个季节的罗马，怎么能在什么地下室住下去呢？

此外，这座公寓楼里有Cameriere（女勤杂工一类），一个是名叫丽娜的胖老太婆，另一个是高个子黑人小伙子（名字不详）。两人大致早上9点赶来，下午2点离去。丽娜负责更换床单和细小地方的清洁，小伙子做体力活儿。两人给我的感觉都很好，十分勤快，丽娜尤其是意大利那种极为开朗的老婆婆，为人热情，对方一旦合她的心意，她就彻底以诚相待，所以我们每次外出旅行都给这两人买一点礼物回来。于是丽娜每次都高兴地抱住我的老婆“啾啾”吻上两口，叫人觉得未免感情过剩，但人家高兴比什么都好。和日本一样，在这个国家，所谓诚意总之就是送礼。

从经验角度来说，意大利的公寓，设施自然是一方面，同时Cameriere的素质也会让居住者心情为之一变。假如Cameriere不友好或做事消极，纵使再好的公寓，整座建筑的气氛也会不可收拾。如果他们不肯收留邮局送来的邮件，势必一一跑去邮局领取，而这点——下面详谈——简直是地狱。任何国家都是这样：最后总是取决于人才的有无和人际关系。我们住的波尔卡里大街的公寓管理十分到位，在这个意义上生活起来相当容易，什么东西坏了马上给换，不在家时的邮件也给好好留存着，这在罗马实在近乎奇迹，是我们在罗马找到的最后也是唯一地道的住所。



罗马停车种种

顺便再详细介绍一下罗马的停车情况。在罗马市内找到停车位置不是件容易事。若进一步准确地下个表述性定义，那便是大体介于“相当困难”和“困难至极”之间的一项作业。我想这在东京也是同样，停车难似乎一年比一年严重。在我来罗马后三年时间里，情况眼看着每况愈下，就是说“程度表”的指针已经从“相当困难”大跨度朝“困难至极”倾斜。

一般说来，市中心几乎不存在停车场那个东西。若问为什么不存在，首先因为城市本身狭小。不但狭小，还对建筑物严加限制，使得现代化的可以停车的楼无从谈起。满城的建筑物差不多清一色是历史建筑，自不待言，历史建筑本身就不带什么车库。一次我在罗马找房子，对方说是新的，跑去一看才知是20世纪30年代建的，吃惊不小。这都算是新建筑，其余可想而知。古建筑有情调，看着是很漂亮，遗憾的是很难说功能齐全。

还有一点，即使想深挖地下建停车场也远非易事，因为稍挖开地面一点点就有什么遗迹出土。结果，罗马城“路面停车”泛滥成灾，开车去哪里也找不到停车场。交通堵塞未必有东京厉害，但停车场绝对一塌糊涂。一旦在住处附近找到停车位，一段时间里就再也不愿意把车开出，这么说一点也不夸张——为等停车位而绕着住处来回兜三十多分钟的时候都有过。

这么说，在罗马没车不就行了么？可问题是在罗马没车，生活起来又是一场麻烦。首先第一点，这里并不像东京那样公共交通工具四通八达。不，别说东京，跟世界任何城市相比都不发达。地铁复线只有两条短的，公共汽车又不知什么时候来。而且无论公共汽车还是地铁，全都挤满吵吵嚷嚷的ragazzi（年轻人），这些家伙举止粗俗，动辄胡来。还有——日本人难以想像——这里的公共汽车时常走错路，糊里糊涂忘记拐弯。因为罗马山路都是单向通行，简直人间地狱，错一回路，要费好多周折才能回到原来路线。乘客这个那个起哄，司机喋喋不休辩解（不道歉，只辩解），结果花的时间更多，实在忍无可忍。到站不停已成家常便饭。明明按了停车钮，却不知司机在想什

么，视而不见，扬长而去，以致必须大吼“停车、停车”。这种差错午饭后最多，想必司机也喝了葡萄酒，身心双双松懈下来。这个时间段里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一次我等的公共汽车连人带车整个下落不明，倏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此时交通局的老伯们也总算铁青着脸到处找那大巴了，我猜想大概司机开车到哪里游花逛景去了。

地铁倒是大体按时开来，也不到站不停，遗憾的是仅有两条线，车厢里小偷也多。可另一方面，出租汽车又很难找到。总之不便到了极点。

另外，夜里晚回来一些，公共汽车和地铁都几乎没有了。而罗马的音乐会一般是晚间9点开始，结束无论如何都得过11点，歌剧之类差不多要到12点。这样一来，只能走路回家，或预定附近的宾馆。因此，若长期生活，车就成了必备之物。我在东京生活了近二十年，几乎没有想到必须有车，因而也没有开过车，但来罗马之后，没有车就往往难办。罗马市民也对这种糟糕情况忍无可忍，报纸上也呼吁想想办法，但无法可想是眼下的现实。



这且另当别论，我在想，车这东西充分反映出各个国家的文化和国情。就是说，意大利的车其实是意大利式的。意大利的小型车一般说来做得很容易停在狭小的街角，第一车身小，第二方向盘特容易打转，狭窄地方也可以顺利进入。近来罗马市内也常见到大型奔驰和沃尔沃等等，但我想这到底不适合罗马的停车状况。美国车更是无从谈起（实际也一辆都没有）。就市内停车状况而言，菲亚特500（CINQUECENTO）或126（CENTOVENTISEI）啦UNO啦奥托比安基啦再合适不过，它们可以见缝插针地迅速找到位置。CINQUECENTO全长才三米过一点点，比四米的高尔夫还短一米，比奔驰560竟短两点一米之多，正是给罗马做的车，而且一副对撞车满不在乎的样子，仿佛在说想撞就撞好了其奈我何——简直天下无敌。

说到底，CINQUECENTO的优点是可以停在人行道上，可以在汽车道水泄不通的时候爬上人行道，暗自庆幸地蹲在那里不动，至于是否合法我不晓得。应该不会合法，但我没见其受过处罚，想必因其小

又不过于碍事而网开一面。这东西从旁边看来都像方便得很，若上高速公路未免悬乎，但在罗马市内跑动则非此莫属。驾驶奔驰560和沃尔沃760（全长485厘米）的都是所谓罗马雅皮。这些人在酒店前急不可耐地物色车位，而CINQUECENTO的车主们一下子停在人行道上岿然不动——这光景看起来非常开心惬意。不过，这在人行道较宽的罗马才可做到，在日本根本行不通。

还有，这类人的纵队停车本事十分高超。老婆购物的时间里，我始终站在路前观看这纵队停车表演，这也是百看不厌的罗马娱乐之一。如果哪位来罗马，我就推荐他看这纵队停车光景，而不是去看什么斗兽场和梵蒂冈美术馆。即使对意大利人来说，这项停车表演似乎也足够赏心悦目——我驻足观看之间，也有几个人停下来在我身边看得出神。

在空间小得仅可容下一辆车甚至可能容不下的情况下，这项表演简直精彩至极。不久车来了，开车人放慢速度，目测能否容下，旋即开始尝试。在前面一点点的地方停下，打开警示灯，缓缓后退。旁边有看热闹的人出来，多是闲着无事的老伯，也有我这样在妻购物的时间里无所事事打发时光的人。日本常有有闲老伯抱着双臂怔怔地观看建筑工地什么的，气氛大体相似。开车人是驾驶奥托比安基Y10来商业街购物的普通太太，同样出手不凡，以训练有素的手势轻盈地把车屁股插进去，随后左一下右一下迅速旋转方向盘，岌岌可危而又恰到好处地把车塞了进去，堪称“Bravi（勇敢）”。若做得更为出色，还会有人“呱唧呱唧”鼓掌。大家或点头或招呼说“Perfect（太棒了）”，和意大利歌剧的咏叹调一个样，那位太太也笑眯眯地对这番赞赏坦然作出回应。奇妙的国度！

反过来，若是表现差劲，那就要明明白白地受到奚落。但不用说，差劲的人也比比皆是。差劲的人就彻头彻尾差劲了（对差劲的中年主妇，人们起哄道“太太，快回家煮通心粉去”），一次我看见一个人在不怎么窄的地方停车时，往前面的奔驰防撞杆和后头的雪铁龙防撞杆上分别“咚咚”使劲撞了三次。在日本干这种事很难释然离去，即使在意大利，我想恐怕也很难白撞了事，不料那人似乎性格十分豪放，竟哼着歌儿若无其事地径自去了哪里。意大利人一般认为防撞杆就是让人撞的东西，对防撞杆之被撞远比日本来得宽容，但这毕竟不

是值得欣赏的行为，而且撞一两次也罢了，前后三次就太过分了。一次在西西里，见一个人把对方的防撞杆“咔嚓”一声撞落在地，周围目击者只我和老婆两人，他也好像觉得有点不妙，转向我们说了句什么，大约是“没办法啊这防撞杆也太不禁撞了哈哈哈”，旋即大步离去。

此外，并排停车也是一大景观。

罗马路面挤满了汽车，当然有人并排停车，偶尔甚至一停三排。从原则上说，并排停车的一般都是稍停一下赶紧去办事的，或在前面餐馆吃饭、别人一有表示马上出来的人，因此只要把事情控制在这个限度内，车被挡住的人不会怎么抱怨，再说他本人也这么做过。问题在于对方是意大利人，所以事情就不那么好办了（不可能好办）。有不少家伙并排停车后再也不知去向，等到日落天黑都不返回，这样一来，车被挡住的人就无法把车开出，焦头烂额，束手无策，只能一个劲儿按喇叭，吵得要死。吃饭时旁边喇叭响个不停，真是不快至极。如此时间里，并排停车的开车人忽然折回，有人道一声“啊对不起”，也有人压根儿不道歉（一般不道歉，道歉不是罗马的倾向性）。若有人就此发牢骚，甚至可能争吵一阵子。若是日本，势必抓起脖领子来，但这里的争吵只是虚张声势打嘴仗，没什么龌龊之处。偶尔或许有，但就我目睹的来说，看上去相当有趣。“干嘛把车停在这种地方，就没想到会给别人添麻烦？”受害者这么一说，加害者应道：“反正已经回来了，这不就行了么？”一副大模大样的态度。这样子架也吵不起来，下次受害者与加害者的立场整个颠倒过来也毫不奇怪。所以争吵不至于不可开交，双方说完想说的，就开车去了哪里。

一次在里埃恩兹奥街看见一个因并排停车而开不出车，苦等了二十分钟的女孩朝吹着口哨忽然折回的男子大发脾气，不料那男子满不在乎地这样说道：“跟你说，或许是我不好，这我承认，可你那说话方式也同样差劲！”有趣的国度，住不厌的。

还一次眼见四个男子把并排停靠着的CINQUECENTO一举抬起来移开，若是沃尔沃的话恐怕不易做到。



蓝旗亚

这回无论如何得在意大利买一辆车。不是很了不得的车也没关系，能开着自由自在地在欧洲旅游即可，最好是不很大的意大利车。

我觉得老型号的奥托比安基112蛮可爱的，老婆则是CINQUECENTO的热烈追捧者。问题是作为市区用车倒也罢了，跑外地长途旅行则未免力不胜任，况且二者都不再有新车出厂。再三考虑之下，决定按我的个人爱好买了蓝旗亚Delta1600Gtie。车身不大，引擎相当有力而外观又不显眼，正合我意。Giugiaro[75]的设计也够洗炼，无可挑剔，在Delta系列里算是中档车。价格以日元计算不到二百万。我因是外国人可以不上税，因此在意大利付的款大约一百五十万日元。

只是，买到手费了很多事。需要多种多样的文件，而且要直接找到位于菲亚特总部的蓝旗亚经销店，英语又讲不通，只好请乌比先生帮忙。

首先向经销店的老伯提出想买蓝旗亚1600GT。这是一位秃脑袋的气色很好的老伯，一副仿佛标榜极喜欢通心粉的意大利人长相。他说现在手头没有1600GT，要向都灵总部订货，按顺序大概要等两个月时间。意大利眼下经济看好，车卖得飞快，大多供不应求，况且1600GT基本算是赛车型，现货没那么多，订货无论如何都要这么长时间。事情或许如他所说，问题是我们等不了两个月，于是我明确表示：用现金当场支付，请务必马上找来。或者现在买，或者不买，这点毫不含糊。在这个国家，若不这样自我强调，要的东西永远等不到手。

“那么，我给熟悉的经销店打电话问有没有现货。颜色可有偏爱？”他说。我说没什么偏爱，除了白色什么都行。

打了好多个电话之后，终于找到一台1600GT。颜色是金属深灰（metallic dark gray）。

太好了！十全十美。事在人为。

这位老伯名叫文图瑞，对日本车怀有相当深的敌意，说意大利车在日本卖不出去是因为保护主义的关系。我也不否认日本市场有那种

倾向，但德国车却卖得飞快，所以根本不是保护主义作怪。即便价格高一点，如果质量好服务到位，产品也同样卖得出去——我本想这么说，但一来不会意大利语，二来这事说来话长，便哼哈着听听罢了。“不管怎样，这次我们用蓝旗亚出的DEDRA新车打倒了日本车！”他说。后来我在展示室看见了这辆名叫DEDRA的车，相当丑陋。也罢，人各有所好。

老伯说车到手要一个星期左右，但这个那个啰啰嗦嗦，车运到罗马花了两个星期不止。不过，这是罗马，这个程度的拖延称不上拖延。这种档次的车，车上的东西在日本都是按标准配齐的，可在意大利行不通。首先没有动力方向盘，接下去是没有车内音响，没有广播，空调当然没有。还没有右侧窗镜，没有车内垫，什么都没有。好歹驾驶席前面的车窗是电动的（在窄得难以置信的不易操作的地方几乎像故意找别扭似的有个小开关）。另外，锁是中央控制式的，试了试却不灵。请技术人员看，说“啊忘了装保险丝”。我不由得担心起来：这样子能行？

加钱装了右侧窗镜和防盗警报器，两个加起来二万四千日元。在日本倒也罢了，在意大利警报器绝对少不得，即使不可能有人偷的破烂货菲亚特CINQUECENTO都带警报器。没有这个，在意大利就不能称为汽车。

说一下车内音响，这东西风险太大，决定不装了。因为把车停在街上离开，那时间里车内音响基本上被盗无疑。意大利开车人下车时把音响整个拔下来随身带走，我不愿意找这麻烦，遂不要车内音响。懒得提着车内音响逛街。

再说警报器的使用。

这当然是为了防止车辆被盗。先关掉引擎，下车前打开警报器开关，打开后三十秒内下车锁门，这样警报器就不会响。上车更难，必须在开门六秒内解除警报。问题是警报器开关安在极难找到的地方。当然啰，安在好找的地方小偷会马上解除，这又是一场麻烦。尽管如此，那也实在太难找了，感觉上就像把手伸进电冰箱背后的狭窄空隙拔电源插头一样，而这必须在开门后六秒钟以内完成，很有些像“间谍大战”，汗都冒出来了。况且一旦失手，就要“啪啪啪”震天价响个不停，山鸣谷应。在意大利开车绝非轻而易举之事。

再看车内设计。意外的寒伧。不妨说，在这方面日产阳光和丰田花冠这个档次的日本车要漂亮许多。蓝旗亚塑料接缝明显凹凸不平，高档感全然没有。说起来，玛莎拉蒂之类里面看上去诚然漂亮得很，但意大利车作为普及型多少存在问题，这东西如果做得恰到好处，保护主义根本拿它没办法。除却情趣相当特别的人，大多数日本消费者我想不至于出大价钱买这种车，毕竟日本车便宜得无法相比。

就车内设计嘟嘟囔囔发完牢骚，再看燃油表，燃油彻底为零，表针直挺挺地靠在左端不动。“燃油几乎没有，请赶快去那边加油，不然一开就没油了。”工厂来的人轻声叮嘱。简直开玩笑！时间已过一点，是加油站的打烊时间。自助式加油站倒是有，总之得马上去找。太不像话，丝毫谈不上是好意关照。

总算在油尽之前找到一家自助式加油站，先加了一万里拉（一千日元）汽油。OK！沿曼佐尼街（Viale Manzoni）开进墙边地下通道，从人民之门旁边穿过台伯河，顺着里埃恩兹奥街去文艺复兴广场，然后开回家。正是交通繁忙的午休时间，下了一上午的大雨继续笼罩着罗马城，以致刚买的车浑身泥水。

车况本身非常好，一副刚出炉新车的派头。一踩油门，引擎立即“突突突”发出十分快意的声响，方向盘也转动自如，刹车也立竿见影。弹簧板稍有点硬，但“咯吱咯吱”感觉很妙。

蓝旗亚DELTA1600Gtie，不管怎样是我买的值得纪念的第一辆车。好了，看下一步能否顺利……

---

[75] 意大利的汽车设计公司。



罗得岛

5月末，接受希腊政府旅游局的邀请去了希腊罗得岛，即所谓“有请阁下”包行包吃的那种形式，条件是拍摄希腊风光参加秋季在东京举行的摄影展。在希腊国内随便去哪里随便拍摄什么，拍不好只拍纪念照也未尝不可。除了我另有十人左右受此委托。我不大喜欢啰啰嗦嗦的麻烦事，尤其不愿意照相，但既然说老婆照也可以，那么我想这样问题不大，就答应下来（只是，尽管角度、光线、图像等种种说明不厌其详，我家老婆却未能换上胶卷）。对参加者发给机票和一星期的经费，但我们已在欧洲，就安排了罗得岛半个月带厨房的宾馆给我们。作为我们自然喜出望外，打算去罗得好好享受爱琴海的初夏。

我们来罗得这次是第二次（我是第三次）。上一次来是12月，由于时值旅游淡季，宾馆也好饭店也好商铺也好都有九成关门，游客几乎见不到。天气也不大好，每天淅淅沥沥雨下个不停。罗得冬天的雨的确淅淅沥沥没完没了。那之前刚刚在此开过欧共体首脑会议，科尔、撒切尔夫人和密特朗都住在这里，以致岛上到处是警察。希腊全国的警察全部集中在这里警备。但他们也已结束工作离岛，几乎和我们擦肩而过。罗得一片节日过后的气氛。我们入住的宾馆也许接待要人接待累了，员工都相当疲惫。

虽说是冬天，罗得也没刮很大的风，比米科诺斯温暖舒服得多。绝对算不上暖和，但没有砭人的寒意。绿色多，风景也自有情调。总的说来，是一座富有女人味的、安谧的海岛。凡此种种，让我们相当中意。无奈季节未免过于凄寂，所以计划要在夏天旧地重游。



在罗得机场Budget[76]出租汽车柜台租了一辆菲亚特UNO。UNO这种车开起来简单而又能上来感觉，我相当中意，可惜我借的劳什子是有问题的：小灯不亮，点火栓衰颓不堪，引擎极难发动，手刹车几乎不灵。停在坡路上解手回来一看，停车的地方没车，疑惑之间，发现车一头扎进了坡下的铁丝网里。居然把这种车租给顾客！由于太不

像话了，前去抱怨，倒是很爽快地道歉，换了另一辆UNO。给换了自然好，可是这新换的同前一辆情况大同小异。点火栓彼此彼此，各种警示灯随着颠簸忽亮忽灭，手刹车的确好使了，而脚刹车每次踩下又发出杀鸡般的悲鸣。理所当然叫人放心不下，恐惧感如影随形——刹车板什么的在哪个拐角前“啪”一声脱落怎么办？瞧这个样子，手刹车不灵的那辆说不定更好。

也罢，就开这辆破菲亚特在罗得岛上转吧。一次被一个驾驶日产奇瑞的老伯叫住，以为有什么事，只听他建议道：“你是日本人怎么开菲亚特这样不入流的车？我一直开日产，世上再没有这么好的车了，跑得快，故障少，省油。”

不过罗得岛大小正适合跑车。环岛公路都靠海边，景致十分优美，路面空空荡荡。有合适的海滩就在那里游泳，有看上去蛮不错的餐馆，就在那里吃炸鱿鱼和色拉，喝啤酒开车也绝对没人说三道四。

反正有时间，岛上边边角角都转了不少。我很中意一家叫Epta Piges（七道瀑）的餐馆，位于去林多斯（Lindos）路上右拐的山中。这的确是一家奇妙的餐馆，餐桌沿漂亮的山溪排开，男服务生在岩石之间轻快地跳着上菜。拿手菜是烧烤，烧鱼烤肉的烟从厨房烟囱里很起劲地升向天空，味道也极好。另外这里有很多很多孔雀。至于这种地方何以存在孔雀我不太清楚，反正有一打之多的孔雀确确实实栖居在树林里。雷蒙德·卡佛[77]有个短篇小说名叫《羽毛》，里面提到半野生化的孔雀，来这里后我才得以充分理解那个故事的气氛。孔雀们蹲在树枝上，一边俯视餐桌食客，一边如同小说中那样“美噢美噢”叫着。那么说来，卡佛也曾来过罗得岛。他好像十分喜欢这里，以罗得岛为题材的诗也写了几首。我不由得心想，说不定他也来到Epta Piges看见孔雀后才想出那个故事的。如此思来想去，菜肴味如何竟忘个精光。那倒也没什么。

我们冬天来时也顺路到过这Epta Piges，但当时餐馆关门，惟独孔雀俨然自卫队一般大摇大摆在那里徘徊。我们刚一凑近，孔雀便扑楞着翅膀“美噢美噢”吓唬我们。那时就觉得奇怪，而夏天同样令人费解。如果诸位去罗得岛，务请到Epta Piges看一下，地方非常有趣。也可以以这里为起点沿漂亮的山溪在山里散步。罗得岛有丰沛的泉水，水多绿色多，在希腊海岛中不妨说是个例外。

※

旧城（Old Town）里兼作酒吧的小餐馆鳞次栉比。到底靠近港口，很多餐馆都可吃到鲜鱼鲜贝。既有堂而皇之的饭店，又有价格便宜的平民餐馆。我不大中意堂而皇之的饭店，就在便宜餐馆之间转来转去找味道好的。这样的努力在旧城总能得到回报。名字我忘了，记得在城中心一条小巷里找到一家味道极好的烤鱼店，以日本说来，感觉上就像后街深处挂着半截布门帘的烤鸡店或杂煮馆。进了门，迎面一个大大的炭火炉，炉里总有烧得红通通的木炭。前面守着一位身穿背心的中年烤鱼师傅，一面小口啜着葡萄酒，一面查看火势，翻动鱼串。旁边有装着活鱼的展示柜，顾客指点柜里的鱼挑出请师傅烧烤。店由三个人经营：不懂英语的管烧烤的中年师傅，懂英语的跑堂老伯，以及在里面做色拉的太太。冬天去时没有懂英语的跑堂老伯，到了旅游旺季多了一位。三人是怎样一种关系我不知道，反正这里的炭火烤鱼味道好得不得了。不管怎么说，鱼还是用炭火猛烤出来的再好吃不过。价格也便宜，烤一条刚捕上来的章鱼和三条小鱿鱼，吃一盘色拉和一盘炸薯条，喝一瓶雷切纳葡萄酒，再带个面包，肚子吃得饱饱的，算账才一千五百来日元。不仅如此，去过几次之后，还优惠水蜜桃甜食。若带便携式酱油去就更妙了，往刚刚烤完的鱼和鱿鱼上足足挤上柠檬汁，再迅速淋上偷偷带去的酱油（堂堂正正淋上去也无所谓），味道简直美上天了。

附近的人也把自己的鱼带来请店里烧烤，付不付烧烤钱我不晓得，但据我观察，没人付什么钱，想必免费招待。边聊天边让店里烤，香喷喷烤好后（的确烤得香喷喷的），道一声再见出门离去。估计回到家全家一齐受用。这么说来，日本过去也有人得到别人送的鱼就拿到附近鱼铺，鱼铺里的人免费刮鳞剖腹。拿去说一声“抱歉”，对方说道“无所谓”，三下两下刮剖完毕。二者同一回事。在希腊，附近的人需要的时候，面包铺老板还把烤锅借出去。依我的想法，做菜的味若沾到面包上岂非不妙，但这里人对这种小事似乎不太介意，这就叫大度。我这人很难说有多么大度，但非常欣赏这种大度表现。

※

我们住的宾馆的经理在宾馆餐厅招待我和老婆吃晚饭，想必政府旅游局那边说有日本作家前去请他关照。经理名叫斯巴努迪斯，三十三四岁。宾馆规模相当大，这个年纪便当上经理，恐怕可以说是破例提拔。他因为父亲的工作关系在埃及出生，在巴黎的大学上学，是个能流利讲四种语言的国际型知识分子，称之为希腊式雅皮也未尝不可，为我们准备的菜肴有地道的希腊风味，也有特别做的日本风味炸虾，十分考究而排场。

但是，斯巴努迪斯先生用餐时间里始终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看来宾馆的经营状况不很理想。他说："罗得岛的常客首先是英国人，其次是北欧人，再次是德国人。不管怎么说，有钱的老年英国夫妇是留宿客人的主流。岂料英国税制变了，开始对养老金课税，英国人外出的脚步骤然慢了下来。罗得人以为自己不吭声也有游客涌来，因而在企业经营方面多少有所懈怠，致使常客数量一点点减少。遗憾的是，很难让来过一次的人产生再来一次的心情。开发半途而废，质朴的古风消失，却又没变得精致洗炼，进退两难。因此，认为罗得岛去过一次就可以的人有增无减。这还不算，其他国家也已意识到旅游产业只要真正投入资本就会得到回报，还有外币现金进来，开始在旅游方面下大功夫，例如土耳其啦突尼斯啦西班牙啦南斯拉夫啦，毕竟这些国家物价便宜。以前希腊也因为物价便宜而引来了外国游客，但近来情况变了，在便宜这点上我们无论如何也比不上旅游后进国家。尤其德国人有流向那边的倾向，觉得不去希腊也没关系，反正南斯拉夫也有漂亮的海滩。所以，来罗得岛的游客的总数已经到顶，或者可以说正在一点点下降，然而仍在一窝蜂大建宾馆，床位自然过剩，开房率只有六成，精确计算的话是要赔本的，这可是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旅游业是很不容易做的活计，一方面竞争激烈起来，另一方面只要受一点打击就会土崩瓦解。例如有针对美国人的恐怖活动，结果美国人一个也不来了。传染病流行、地震、政局不稳，人家也不来。海污染了，谁也不再来游泳。连切尔诺贝利[78]都有影响。我们时刻背负着危险生存。难啊！实在难！胃都痛起来了。

“你们会说希腊旅游资源得天独厚，以旅游业立国即可，但那样建设国家是十分危险的。刚才也说了，一点点突发性风向变化都可能动摇国家财政。相比之下，我们还是想建设以生产为中心的国家，所以我认为这回参加统一的欧洲市场是好事。初期会有各种各样难以承受的问题，一来同德国法国英国相比，我们的经济脆弱得不堪一击，二来短时间里可能正面迎击狂风巨浪，通货膨胀都可能发生，也有人在这个意义上反对统一市场。可我不那么认为。长远看，这是合适的选择，我们必须作为欧共体的一员生存下去，尽管道路决不平坦。”



我们一边“呃呃”点头一边听斯巴努迪斯先生说话、吃炸虾。岛上的生活看上去悠哉游哉，却也有种种头疼事，我们只能祝愿诸多问题迎刃而解，早日迎来斯巴努迪斯先生眉开眼笑报告好消息那一天。

“头疼什么呢？用人最头疼。”斯巴努迪斯先生说，“如何确保认真做事的人——宾馆经理的成败取决于此。可是非常不容易，这个。不认真做事的太多了，伤脑筋。”

斯巴努迪斯先生对我们照料得十分周到，不时为我们取水果、葡萄酒和罐头等等。我常常想，希腊人的确是认真的种族，特别是知识分子总是在认真思考什么，甚至有一种因思考过头渐而陷入阴暗世界的倾向。一方面对身为筑就光荣历史的希腊人这点怀有自豪，一方面对国家面临的现实问题的思考每每使他们变得郁郁寡欢近乎精神分裂。他们无法像意大利人那么想得开——别这个那个冥思苦索，只取对自己合适的，快乐风趣地活着就是。这种地方叫人有些不忍。如此说来，左巴也是一样，表现上活得开心，实际上相当哲学。

---

[76] 意为“收费公道的”。

[77] 美国小说家（Ramond Carver，1938—1988）。村上春树翻译过他的大量作品。

[78] 指1986年4月发生的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核泄漏事故。



春树岛

决定去春树岛。假如爱琴海有一座小岛和你的名字相同，你能不想去那里一次吗？

准确说来，春树岛不叫HARUKI，英文拼写为KHALKI。KHA大致介于力和八[79]之间（成吉思汗的KHA[80]），ル[81]不是R而是L。但听希腊人的发音，非常接近一般人口中的日语“ハルキ”，我用日语说成“はるき”[82]也丝毫没有问题。所以，称之为和我同名之岛我想也不碍事。

春树岛是爱琴海土耳其沿岸佐泽卡尼斯群岛十三岛中的一座。佐泽卡尼斯在希腊语中意为“十二岛”，而群岛中住人的岛共有十三座。英语讨厌十三这个数字，把第十三个称为“面包铺多给的（baker's dozen）”，这佐泽卡尼斯恰恰是这个。第十三座叫卡斯泰洛里宗岛，此岛是其他十二岛结盟打响反抗土耳其的独立战争之后不久入盟的，结果只这一个成了面包铺多给的。

这春树岛在佐泽卡尼斯群岛中也离罗得岛最近，自然从罗得岛去最快。岛上没有机场（别说机场，连公共汽车站都没有），只能坐船去。去法有两种。一种是坐从罗得镇港口开往克里特岛的大船，此船中途停靠春树岛，在那里下即可。只是，一星期仅开两班，多少有些不便。另一种是从罗得镇沿西侧海岸南下四十五公里左右，从一个叫斯卡拉·卡米罗斯的小港坐小船过去。去斯卡拉·卡米罗斯虽然相当辛苦，但这边每天都有船开出。

我们决定去斯卡拉·卡米罗斯坐船。从地图上看，斯卡拉·卡米罗斯像是座小镇，实际到那里一看，根本不是什么镇，只是个孤零零的小码头。除了码头另有一个荒草地模样的停车场（把车放在这里上船）和三家可以吃到鱼的小餐馆，至于人家任凭怎么看都没有。等船的客人坐在小餐馆里喝着葡萄酒或啤酒晒太阳。这里只能晒晒太阳。游客模样的人几乎看不到，看到的不外乎大约是来罗得岛采购的春树岛民，以麻木不仁的神情等船回自己的家。

除了星期天，开往春树岛的船下午3时开出这斯卡拉·卡米罗斯港，第二天早上7时返回。船有两条，一条叫“春树”号，另一条叫“阿

芙罗狄蒂”号。两条船的经营者完全不同，却不知何故，从同一场所在完全相同的时刻出发，都是下午3时起航，早上7时返回。如果时间错开，那么客人又方便，又可避免无益的拉客竞争，然而两条船偏偏以分秒不差的同一时刻表运行。原因我不得而知。

“春树”号比“阿芙罗狄蒂”号多少漂亮一点，大体付出了旅游性质的努力，客舱干净，遮阳甲板也宽敞。单程六百五十德拉克马。“阿芙罗狄蒂”号除了乘客还装蔬菜等日常杂货，汽车也装。这边为五百德拉克马。但我们决定坐“春树”号。名字让人倾心这个原因固然有，但主要因为船长是个长相同菅原相像的人物。提起菅原，读者当然不知道，他是以前我在千叶住时为我们砌院墙的工匠。老伯干活非常精心，人也和蔼，后来我们和他相当要好。他说院里适合栽丁香，特意找来丁香树栽上，我们不在时还前来浇水。

这位希腊菅原同样和蔼可亲，我们提前到那里，他就招呼我们上船，在船上的厨房里做了咖啡让我们喝，还说如果岛上没住的地方，睡在船舱长椅上也没关系的。看来岛上十分纯朴。

乘客一共十人，船员三人。我不由得担心能否挣到油钱，但反正3点准时开船。“阿芙罗狄蒂”号也即刻尾随离港，二者的速度和航线也像商量好似的一模一样。

船在无人小岛间穿针走线一般行进。菅原在驾驶室以一本正经的神情掌舵。时值6月初，风仍带有凉意，但太阳暖和，令人心旷神怡。葡萄色的海浪拍打着粉末一般的白色岩石，无声无息，雪花四溅，什么时候看都赏心悦目的光景。我歪在遮阳甲板上，一边听着引擎声，一边就时光流逝这一现象思来想去（这种事想也没用，可就是要想）。想着想着，迷迷糊糊睡了过去。醒来一看，春树岛已在眼前。

春树岛相当小，能称为镇的地方只有一个，其余不是山岭就是荒地，路都没有像样的。没有路，汽车也就几乎没有。船和驴是岛的主要交通工具。渔船“呼呼呼呼”的发动机声是岛上唯一的噪音。

镇围着港口展开。港口被山丘围在中间，舒缓的盆地斜坡上肩靠肩地聚集着一些人家，景观十分美丽。每一家的房子都雪白雪白，方方正正，深红色的屋顶呈徐缓的三角形。白墙上工工整整地排列着竖

长的窗口。差不多所有的建筑都是同一风格，不像日本的民房那样风格随心所欲色调各所不一。白墙，红顶，方形房身，竖向长窗，仅窗框和门的颜色各自有所不同，分别涂成钴绿、鲜绿、蓝色、番茄红、鲑肉色，远远看去，好像西式糕点盒整齐地摆在那里。还有造型优美的教堂，有非常漂亮的石砌钟塔（时间慢了十五分钟）。房子上方舒展着蔚蓝蔚蓝的天空，湛蓝色的平静海面静静映出人家的房影。

这就是春树岛，我一眼就相中了这座岛。

春树岛有若干家庭旅店和一家宾馆。家庭旅店就在码头前面，宾馆在从这里沿港口步行十来分钟的地方。下了船，有几个小女孩走来害羞地问“Room（住宿吗）”，我一说“Yes”,便莞尔一笑领往自己家中。价钱大体两人一千日元。不能说不干净，但又不想以干净称之，极其普通的希腊家庭旅店。

港口前一排三家餐馆，另有一个书报亭，一个驼背青年坐在椅子上卖报。还一个卖各种杂货的小店、一个像面包铺的小铺（估计是，无法断定），此外便没有任何可以冠以店铺名称的了。信步游逛之间，菅原走来提议喝点什么去，于是我和老婆跟菅原走进一家餐馆喝啤酒。菅原是春树岛居民，家在岛上，家里有太太和孩子，船是个人财产（此人一有工夫就擦船，这点我也猜出来了）。

告诉我这里人口是三百人的也是菅原。“过去有两万人住在这里，”他说，“全是采spongo的。”

“spongo？”

“嗯，spongo。”

细问之下，原来spongo就是海绵，即英语的sponge。他说这一带海岛居民大多是采海绵的专家，以前非常值钱，但由于人工海绵的出现，加之海绵不如往日好采了，生活就苦了起来（狭长的小岛到处是岩石，不大适于农耕），全都移民去了美国。留在岛上的大部分从事渔业。“去美国的那些人几乎都在佛罗里达州采海绵。”菅原说。佛罗里达有个镇叫Tarpon Springs，春树岛出身的人聚集在那里，组成类似共同体（communiti）的社区。这座岛上的人全是以采海绵为自豪的行家里手。

啤酒是菅原招待我们的。

我们要付自己那份款，服务生摇头道：“算了，就让他请好了，

这个船长脑袋有点问题。”说罢嘻嘻一笑。难得的一次请客。

接着，我们翻小山走去一处海滨。爬小山的坡路时，两侧排列着石砌房屋，差不多全是废弃的。有的门扇关得严严的。想必房子主人定期从佛罗里达回来，不在时一直关门闭户。有的倒塌了一半，院子里杂草丛生，没有人的动静，想必已被彻底弃置。镇郊便有这种死掉的（或暂时死掉的）房屋成排成列。

从海滨回来路上，在钟塔附近的坡路那里和一位老婆婆相遇，道声“您好”，她喜不自胜地一笑，从围裙口袋里掏出无花果，给我和老婆一人两个。稠稠的多汁无花果。春树岛民风非常祥和，有外人来到，都好客地给这个送那个，这种气氛如今只有真正的希腊乡下才有。

另外春树岛留在记忆里的，是快天亮时把人吵醒的汹涌的鸡叫。这么厉害的鸡叫还是第一次听到。全岛的鸡从天还没亮时（看表才4点45分，但希腊实行夏令时间，实际上还不到4点，仍一片漆黑）就一齐扯着嗓门“咕咕——”、“咕咕咕——”大叫特叫，想必是肺活量特大的鸡，简直如巴黎公社起义一般惊天动地。

我们坐早班船返回罗得岛。菅原开船，我们仍在遮阳甲板上东倒西歪。乘客一共十人，就是说我们只在春树岛住了一晚。岛给人的感觉极好，真想住得久些，同时又觉得就这样回去也未尝不可。春树岛非常安静和客气，那里住着热情的船长菅原，没有汽车，驴活蹦乱跳，采海绵的人留下的成排的空房子，路上相遇的老婆婆微笑给的无花果。不坏。我对和自己同名的小岛是这样的地方心满意足，也放下心来。

这样，我们第二天早上返回了罗得岛。

---

[79] 日文字母（假名），カ发音为KA，ハ发音为HA。

[80] 成吉思汗的“汗”读音为KHAN（汗、可汗）。

[81] 日文字母（假名），发音为LU，日文罗马字母拼写为RU。

[82] ハルキ和はるき均为“春树”的日文字母写法（发音）。



卡尔帕索斯岛

逗留罗得岛期间可以说从未看报。早上起来就到海滨做日光浴，去旧城区散步，或者坐在阳台上从早到晚看书。《情感教育》啦、《玫瑰的名字》啦，带来的书抓起什么看什么。这样的生活上不来想看报的心绪，世界随它怎么运转好了！

总算买一张报纸看是在6月6日。我们心血来潮，要去卡尔帕索斯岛旅行一下换换心情，赶到罗得机场，等飞机的时间里在书报亭买了一份《先驱者论坛报》看。

不料，这6月6日的报纸近乎宿命地满版都是令人心情沉重的报道。在伊朗，几天前霍梅尼死了，悼念他的群众挤满德黑兰街头，好几个人被踩死了。在苏联，天燃气输送管道发生爆炸，附近行驶的列车被火焰包围，乘客死了五百多人。尸体熔化得黏黏糊糊，确认名字都无从做到。世界一片血腥，死者遍地，并且出声地运转，在我每天躺在罗得岛海滩吃着樱桃做日光浴的时间里。

但我不在那里，我在罗得岛，种种安排和机遇把我带到这个场所。我歪在沙滩椅上，吃樱桃，做日光浴，看福楼拜的小说——我存在于此，作为某种既成事实。



还是谈希腊的海岛吧。

卡尔帕索斯岛无论怎么偏心去看都很难说有多么惹人怜爱。如果说罗得岛是拥有绿色和漂亮海岸的开朗明快的阳刚之岛，那么卡尔帕索斯岛就是给人以粗糙感触的暴戾之岛。这里不存在所谓温情。山势险峻，上方总是笼罩着感觉上仿佛客用坐垫的厚墩墩的灰云。风急浪高。地面尽是岩石，几乎见不到可以称为绿色的东西。扑在岩石上的一副可怜相的树木由于风的关系全都朝一个方向倾斜。平地几乎找不见，哪里都坑坑洼洼的。从飞机上往下看时就暗暗叫苦。老实说，真想直接往右拐回罗得岛，但不能那样。

“卡尔帕索斯岛人口有七千，”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不过么，夏天有一万五千人从美国返回这里。”

返回？

“全都去美国打工了，这里没有工作。但到了夏天，就请假返回故乡。七八月回来，带很多很多钱，所以岛上的人相当阔绰。有汇款过来，不在旅游业上下功夫也无所谓。夏天光接回乡的人都够忙的，不大希望游客前来。忙不过来，感觉上。”

的确，卡尔帕索斯岛很难说对旅游业有多么热心，宾馆不很多，旅游设施也不充实，一副得过且过的样子。同罗得岛相比，待人接物也差劲，总的说来半冷不热的人多。“欢迎光临”那样的气氛接近零，几乎见不到笑容，路也超乎想像地一塌糊涂。相反，高档车却不少，宝马啦奔驰啦奥迪啦屡见不鲜，而且都是光闪闪的新车。岛上不知有钱还是没钱。

不过，到底移民多，英语大为通行，而且常可听到顶呱呱的美式英语。听得那边修路的老伯对同伴说“Hay fuck you, man”，我倏然心想“这里到底是哪里”。一座匪夷所思的岛。

不单英语，意大利语也通行。因为这里和罗得岛一样，被墨索里尼时期的意大利差不多统治了三十年。意土战争期间，意大利为切断连接的黎波里和土耳其的补给线而占领了佐泽卡尼斯群岛，战争结束后也占着不走。所以——举例说——汽车出租站的加特里斯是意大利和希腊的混血儿。这家伙也是个一笑不笑的讨人嫌的汉子，我看他在意大利一个镇上照的相片时（相片贴在汽车出租站办公室的墙上），他以含糊不清的给人不快之感的语声讲起了自己的身世。

加特里斯的父亲曾是意大利军队的士兵，驻扎在卡尔帕索斯岛，原是米兰一个糕点师傅。意大利人不可能在这偏僻的岛上清心寡欲地生活下去，不知不觉之间同当地姑娘闹起了恋爱。不料二战中意大利向盟军投降，意大利军队要撤回国内，但加特里斯的父亲同那姑娘难分难舍，擅自离开了部队。意大利军队满岛搜索，但加特里斯的父亲在姑娘的掩护下，悄悄藏在哪里一动不动。一来二去，大家也就放弃他回国了。于是加特里斯的父亲和母亲喜结良缘。不久，堪称两人波澜万丈的爱之结晶的加特里斯出生了。加特里斯一天天长大，成了身穿一股汗臭味的背心、留着浓胡须的不讨人喜欢的汉子，向游客出租

破烂小汽车。历史这东西到底算什么呢？具有怎样的意义呢？

我闹不明白。

卡尔帕索斯不存在安飞士（AVIS）和赫兹（HERTZ）[83]那类大型租车公司，只有两三家加特里斯这样的地区性租车站半死不活地维持经营，车的数量少而又少，质量也不好，因为路实在太糟了。连接机场和几座小镇的路还铺得像模像样，但此外的路（即岛上差不多所有的路）简直糟糕透顶，连驴都愁眉苦脸。开着锃亮锃亮的新车绕岛一周就足以让车变得缺胳膊少腿，所以车都破烂不堪。别无他法，我们出一万德拉克马租了一辆老型号的欧宝可赛（比其他岛贵出不少）。庆幸的是，这欧宝尽管外观惨不忍睹，跑起来还相当可以，大概加特里斯天天仔细维修的关系吧。我们坐着它翻越怪石嶙峋的山岭，跑到名叫凯拉·帕那贾（KYRA PANAGIA）的海滩。

路虽然一塌糊涂，这凯拉·帕那贾却是一处十分迷人的海滩。因交通不便，来的人也少。海滩通船，但一星期只两班，所以只能自己租车或开摩托沿坑坑洼洼的路赶来。海滩很宽，游泳的人稀稀落落，顶多十来个。女的都穿露胸泳衣，有几个一丝不挂。太阳反正就是热，海蓝莹莹清冷透明。我尽情游了三十多分钟，然后躺在沙滩上打盹，心里畅快至极，觉得自己一个人被抛在了天涯海角。不，或许我已经从天涯海角滚落下去。

游客在卡尔帕索斯没有多少事可干。若风和日丽，在美丽的海滩慢悠悠打发时间诚然不坏，遗憾的是岛上的天气变幻莫测。这样一来，往下就只能坐船去一个叫奥林帕斯的村子。奥林帕斯是个靠近南北狭长的岛的北端的一座孤立村子。由于太孤立了，几个世纪前的习惯、语言和生活方式仍原封不动保留着——导游手册上这样写道。女子似乎至今仍穿着民族服装，用风车碾麦子，男子仍聚在露天咖啡馆里弹奏民族乐器。去那里要先坐船到岛北端一座叫迪阿法尼的镇，再从那里转乘大巴，这是最适合的路线。但我们没赶上开船时间，打算开租来的汽车去。但租车时加特里斯瞪起眼珠子叮嘱道："跟你说，不得用这车去奥林帕斯！"他拿来卡尔帕索斯地图，用粗硕的手指触一下大致中间的地方："只能到这里。到这里的路还凑合，再往前糟得不得了，不能去！"

我肚子里哼了一声：管你那么多，偏要开这车去奥林帕斯！以为他不过是由于爱车心切而危言耸听吓唬我。然而最终我们不得不中途放弃去奥林帕斯的计划。即使开到加特里斯指点的那里都已筋疲力尽，沿海岸伸展的路很窄，到处是石块和凹坑，险象丛生，错一步都会从悬崖跌落下去。大石头横躺竖卧，一块躲不好，车身一撞，就要熄火好几次。由于硬邦邦干巴巴的路面上撒满细小的沙砾，车尾剧烈颠簸不止。离开海岸路驶入山中，又整个被浓雾包拢起来，三米开外一无所见。既说这段路“还凑合”，那么前面“糟得不得了”是怎么个德性大体想像得出。这么着，我们未能赶到奥林帕斯村。

后来遇见一个搭出租车去奥林帕斯村的希腊人，他说：“捱到奥林帕斯之前我几乎不敢睁眼睛，一直祈求神明保佑，从没见过那么可怕的场景。”想必路况相当恶劣。

这样，在卡尔帕索斯就无事可干了。餐馆试了几家，味道都称不上有多好。于是我们歪在宾馆附近一家名叫“SEVEN ELEVEL[84]”的咖啡馆（或许你不信，还真叫这个名字）晒太阳、喝着啤酒看书。这里名字虽离谱，但菜的味道不坏。色拉鲜美，炸薯条十分了得，还能提供地地道道的汉堡包。在希腊要汉堡包，一般都有名无实，是一看让人怵目惊心胸口堵胀的劳什子，而这里的汉堡包则是百分之百美国化的汉堡包，肉爽脆可口，元葱和西红柿也放得毫不马虎。面包也是汉堡包专用的圆面包，芥末也恰到好处。这或许是美国移民的功绩。价格也算便宜。三瓶啤酒、色拉、汉堡包、炸薯条，才一千日元多一点点。我们一天去两次这家咖啡馆。

如此这般，我就卡尔帕索斯记得的不外乎不讨人喜欢的意大利希腊混血儿租车站老板加特里斯和“SEVEN ELEVEN”爽脆可口的汉堡包。此外就是芬兰游客多得一塌糊涂。不知此岛何以让芬兰人着迷，波音727包机满载乘客从赫尔辛基一架接一架飞来。进饭店也好进宾馆也好，必有芬兰文说明书。为何芬兰人对此岛情有独钟呢？我也莫名其妙。

这就是卡尔帕索斯。若问我是否还想去一次，我想我只能回答眼下还不大有那个心情，倒是对不住卡尔帕索斯岛上的各位居民。

---

[83] 均为全球性的大型汽车出租公司。

[84] 意为“七、十一”。



选举

在希腊，选举投票既是国民的权利，又是其义务，宪法上分明有此规定。因此，无正当理由不去投票，将作为违法行为受到法律惩罚。我想这大概是日本的选举同希腊的选举最大的不同之处。

至于这种强制投票制度作为选举方式是否正当，我一下子难以判断，不过细细考虑起来，选举的事希腊远比日本拥有悠久的历史，自己恐怕不处于可以就此说三道四的立场。总而言之，有选举权的国民必须去投票站投票才行。

此外——这个自然烦琐——投票必须在自己的出生地进行。这意味着，在塞萨洛尼基出生而住在雅典的人，必须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庄或市镇，在那里的投票站投票。

我又对这项法律的宗旨、目的糊涂起来了。难道不是么？在雅典投票也好在塞萨洛尼基投票也好，一票不都是一票吗？何苦非回到家乡投票不可呢？也可能是为了防止因城市人口集中而使得“一票”的价值发生偏差。但若是那样，制定别的制度来纠正“一票”的价值偏差岂不更妙？我就此问过几个希腊人，但都没得到令人释然的回答。

那么，回家乡投票这个制度首先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不用说，是交通拥挤。毕竟全国男女一齐回老家，这个时间里无论汽车电车还是飞机轮船抑或道路全都人满为患，水泄不通。对号座位票一个月前即一抢而光。独自出行的游客如果稀里糊涂撞上这个时间段，那只能说是一场悲剧。哪里也动弹不了，只能原地不动。

1989年6月18日是希腊大选日。前面写到上次（1987年）也赶上了选举，但那时是统一地方选举，这次则是选举全体国会议员，远为热火朝天。无奈，这期间我们决定去乡下。留在城里的话，选举前后店铺不开门，全然无事可干。我们避免和公共交通工具发生关系，在雅典机场的服务台租了一辆车。这样，选举期间一直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悠然游逛。不然不然，较之悠然游逛，准确说来，更是只能悠然慢逛。这二者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

伯罗奔尼撒山高路险，加之在罗得岛吃了大苦头，所以这回打算

租一辆可以放心的日本车，就租了辆日产CHERRY（大概即日本所说的PULSAR），不料这家伙又一塌糊涂。外表倒是相当堂皇，其实无异于残次设备的代名词。高速公路上刚一开出时速一百公里，车身就颤抖不止，必须扑在方向盘上才行。而到了崎岖的山路，情况就更悲惨了——爬坡时换低挡把油门踩到底也只是气喘吁吁干叫，全然出不来马力。眼看着速度一个劲儿下滑，竟被大巴和大卡车超了过去。便是开着这样一辆不争气的CHERRY，在给选举战烧得发烫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心神不定转了一个星期。

这次大选有可能导致希腊政治体制彻底改弦易辙，是一次重要选举。首先，堪称希腊的利库洛德事件[85]的重大渎职事件把希腊社会主义运动（PASOK）帕潘德里欧政府逼到了悬崖边缘，加之同一件以希腊人的伦理看来是不可饶恕的性丑闻——即将八十的帕潘德里欧首相抛弃多年朝夕相伴的夫人而同空姐出身的年轻情妇同居——扯在一起，希腊彻底分成两派。有传闻说，如果PASOK失去政权，帕潘德里欧可能被捕，政体也好经济政策也好外交政策也好都将为之一变。根据舆论调查，在野党新民主主义党（ND）有希望获胜，但PASOK也在背水一战以挽回颓势，事态如何发展还是未知数，总之人人摩拳擦掌。

不过，不管希腊政权怎么折腾，眼下都和游客没有直接关系，我们只管自由自在继续旅行。

说是回家乡投票，当然不可能全体国民统统赶回老家。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工作脱不开身的人也不在少数，例如警察啦宾馆从业人员啦，若这些人离开岗位回老家，社会功能势必完全瘫痪。但他们必须去政府部门提交报告书，说明因为什么什么原因无法赶回家乡。于是发给不能参加选举的证明书。只是，为了拿这证明书，本人必须证明现在是在距生身故乡二百公里以外的地方工作。事情够啰嗦的。说起来都是选举，但国与国之间差异有如此之大。我们作为极其理所当然的概念使用的“议会制民主主义”一词，现在觉得恐怕很难简单归结为一个模式。

日本大概无法做这等麻烦事。倘若大家一齐返回老家，那就像把盂兰盆节和正月合到一起，交通首先彻底报销。再说还会有不愿意回去的人。也不限于日本，希腊也肯定有这类人，和父母闹翻再没心绪

相见的人、让隔壁姑娘怀孕后马上出逃而一旦回村难免被对方亲戚打个半死的人也未必没有，也可能有人仅仅诗意地认为“故乡远在天涯”——这些人每次选举都必须返回家乡，没准甚是黯然神伤，我不由为之担忧起来，尽管事不关己。

还有，这么多亲戚什么的返回老家，作为父母光安排住宿恐怕都要费一番折腾。被褥必须准备，饭菜必须端上，这些事每一件我都想了解清楚，遗憾的是没时间一一打听。

不过希腊人一般热心于选举——不妨称之为政治狂，估计不会把这种程度的不便放在心上。反正是一选举就要死上几个人的国度。那股狂热，我们从旁看来都为之倾倒或为之震惊。但反过来说，希腊人乃是经历过剧烈政治动乱的国民，以致不得不那样。在土耳其统治下挣扎了好几个世纪，好歹独立了，又因巴尔干势力重组而被拖入动乱的泥沼。这个告一段落后，又受到法西斯国家侵略，开展抵抗运动，战争结束后马上开始自相残杀的血腥内战，继之而来的是黑暗的军政府时期，卷入塞浦路斯纠纷，总算尝到和平滋味不过是近二十来年的事。因此，希腊的选举和我们日本人从选举一词中想像出来的东西相当不同，远为剧烈和富于攻击性。

举例说，伯罗奔尼撒半岛有很多人从雅典自己开车回来投票，这些人的车上大半贴着一张张所支持政党的宣传画，并且从车窗里伸出各政党的小旗“呼呼啦啦”挥来舞去，正可谓旗帜鲜明。因此，站在路旁数一数支持各政党的小汽车数量，哪个政党有多少支持率一目了然。中间票似乎比日本少得多。我数了十五分钟左右，当即明白在野党ND要获胜。PASOK大体以四比六的比例败给了ND。选举结果也大致如此。这比舆论调查还准，委实是一场令人目瞪口呆的选举。

不仅汽车，从家家户户（当然不是全部）张贴的宣传画上也可知道哪家支持ND哪家支持PASOK。咖啡馆也旗帜鲜明，这家咖啡馆支持ND，另一家支持PASOK。日本若这个样子可相当麻烦，不看清旗帜不能随便进咖啡馆，大大不便。

另外还有政党大巴。这东西和日本盂兰盆节或年底的回乡大巴相似，不同的是免费乘坐。为什么免费呢？是因为大巴是政党包下来送各自的支持者回乡（即投票站）的，所以原则上PASOK大巴坐满PASOK支持者，ND大巴上坐满ND支持者。不用说，上面还有乌糟酒

招待，都斟得满满的，热闹异常。全都从车窗里探出脸“哇哇”大嚷大叫，喇叭一路长鸣。沿路也有人站成一排，每当自己支持的政党大巴或小汽车通过就一片欢呼。不过听希腊人说，乘坐PASOK大巴回来的人里边也常有投ND票的（反之亦然）。“不可能查到那个地步。”他说。那倒也是。

6月17日的报纸报道，PASOK执行总部的科斯塔斯·拉里奥蒂斯先生回应了名叫一家Eleftheros Typos的雅典保守派日报发起的选举赌注。报纸第一版向PASOK发出挑战书：“本次选举ND必定取得过半数席位（即一百五十一席）。若不服气，就赌上两千万德拉克马好了！”拉里奥蒂斯先生奋然应战：“Eleftheros Typos报多年来一直是PASOK不共戴天的宿敌，对如此不可一世的挑战不能坐视不理！”至于这种事是否为法律所允许我不知道，但既然报纸上堂堂正正刊出，那么想必是不被禁止的。不过以我们的感觉看，报纸和政党就选举结果明目张胆赌大钱（两千万德拉克马相当于一千七百五十万日元），实在滑天下之大稽。若说有意思倒也有意思。

就结果来说，PASOK方面赌赢了。选举固然DD获胜了，但未能取得过半数的一百五十一议席。那以后我马上离开了希腊，至于选举结束后有没有两千万德拉克马交到拉里奥蒂斯先生手上，遗憾的是我无由得知。

总之，人世间有如此这般热闹非凡的选举战。

星期天是选举投票日，我们住在纳夫普利翁的山顶宾馆。这座城市我是第三次来，一座有情调的宁静的城市，在希腊我也最喜欢这里。中午去附近一个叫特罗的热闹的海水浴场，游了差不多两个小时，之后顺着岸边小路走到岬角最尖端的寂寥的小教堂。教堂是保佑往来岬角的渔船的，灯光彻夜长明，一位壮壮实实的老伯独自照料这座无人教堂。我们同老伯聊了一会，其实也就是用只言片语的意大利语和希腊语并夹带手势勉勉强强沟通。“我年轻那阵子一直打仗，”老伯说，“在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同意大利军队打仗，那时腿吃了两发子弹。接下去德军来了，胸口吃了一发，就这儿。战争中德军杀了两万八千之多的希腊人，那些家伙比意大利军队狠得多，所以我们打游击战。后来美国人来了，内战开始了。一直打仗，盖拉、盖拉（打

仗）。说到底是美国人不好，那些家伙不干正经事，看广岛好了，看长崎好了！”提及战争，老伯简直滔滔不绝，说得就好像战争一直持续到现在似的。我们给了一百德拉克马香钱，离开教堂。

日暮时分，我们走到阳台，打开昨天买好的葡萄酒，眼望暮色中的大海喝着（前面已经写了，因为选举当天无论饭店还是咖啡馆都不上含酒精的东西）。直到选举前一天还又是汽车笛声又辩论又争吵又是高音喇叭吵吵嚷嚷的大街小巷，到了投票日这天顿时变得鸦雀无声，比平时还寂静。投票也已结束，往下只等开票结果了。再没什么可吵嚷的了，惟独广场上传来小孩子们学踢足球的欢声笑语。不久，天空开始闪出一个又一个星星，海上开始有船灯眨眼。时针转过9点、凉风吹来的时候，人们终于走到港口一带漫步。

在希腊住久了，不时为这个在历史重力下左摇右摆的美丽小国感到不忍。当然，同情未必是正确的，但我还是不由感到凄婉。

时近子夜，ND获胜成为定局，响起枪战一般的爆竹声。剩下来的只有撒遍希腊全境的多达几千万张的选举宣传画。此后一段时间无论去哪座城镇，都有旗和宣传画的碎片在路上随风飞舞。

---

[85] 日本利库洛德（RECRUIT）公司通过向政界等各界要人“献金”和转让未上市股票而谋取好处的渎职事件，1988年被披露，导致竹下登内阁总辞职。

意大利的几副面孔





托斯卡纳

实际住起来才明白，意大利并非多么大的国家。罗马位于这座长靴形半岛的大致正中间，从这里无论到北端到奥地利国境还是到南端的雷焦卡拉布里亚，都不过七百公里多一点点。从高速公路驱车疾驰，当天就跑到尽头。

所以，意大利国内基本游遍了。当然不至于每个角落都不放过，没到的主要城市也不是没有（如那不勒斯、都灵），但一般地方都涉足了。其中最中意的还是托斯卡纳区，若进一步缩小范围，就是基安蒂这个地方。在这里买房子住下去也可以，但只想未买，因为不愿意相隔许久去了一看家具踪影皆无，真的。

反过来说，不太想住的是西西里。若铁了心要把骨头埋在那里倒也罢了，坦率地说，那不是个肯乖乖接受外来人的地方。出于同样理由，卡拉布里亚区（长靴趾尖一带）也懒得去。相反，北部美丽的上等城市倒是蛮多，可惜作为城市未免过于逼仄，住久了恐怕有些地方很难适合日本人的感觉，气候上冬天也够难受的。气候好的是罗马，问题却不少。

这样，基安蒂就浮出了水面。首先，不管怎么说这里风光秀丽。舒缓的苍翠山岭一座连着一座，山坡上铺展着葡萄园，交通量不大的弯曲有致的道路绵绵伸向远方。从罗马沿A1高速公路来到这里，心情顿时大为放松。风景舒展，空气香甜，人也好像容易亲近。即使留恋城市的人，也可多走几步来到佛罗伦萨和锡耶纳，无论葡萄酒还是菜肴都美味可口，无可挑剔。

能集中买葡萄酒也是我常去托斯卡纳的一个原因。四处转转葡萄园，买几箱当地直销的葡萄酒回来。从罗马外出采购葡萄酒，南边的弗拉斯卡蒂距离最近，可是一度被基安蒂葡萄酒的醇厚逮住之后，弗拉斯卡蒂一带的葡萄酒无论如何都一股土气。特意外出一次，还是多走几步去基安蒂为好。

话虽这么说，我对葡萄酒并不知道多少，或者不如说一无所知。哪个地方哪片山坡哪年摘的葡萄如何如何，很有点叫我不胜其烦。但到了托斯卡纳，走进这里那里的葡萄酒厂品尝的时间里，至少渐渐明

白了这个世界有多么深奥。酒厂的老伯叫我分别品尝这块田那块田酿出的葡萄酒，即使地块相邻，味道也还是截然不同。若问是不是每种都好喝——说起来难为情——哪种都觉得好喝。

我所喜好的基本上是多少够劲的、有紧张感的红葡萄酒，含在口里觉得多少有些发涩，旋即一股芳醇汩汩涌出——有韧度、有喝头。很难诉诸语言，实际喝起来就很简单："唔，就这个味！"一口敲定。若只就这个来说，根本不用看什么产品介绍。巡游基安蒂葡萄酒库的妙谛恰恰就在这里，实物才是一切（不过在饭店同样搞起来未免做作，也花钱）。

交代晚了，基安蒂是佛罗伦萨以南、锡耶纳以北延展的一大片地区。不是边框模糊的地区的总称，而是从这里到那里有一条明确的线：这就是基安蒂。过去，基安蒂是拉达（Radda）、盖奥勒（Caiole）、卡斯泰利纳（Castellina）结成的军事同盟的名称，如今则以生产特定葡萄酒的地区而闻名。这里生产的葡萄酒一般称为Chianti Classico，但并非这里生产的所有葡萄酒都是Chianti Classico。其成分和酿制方法在法律上有严格规定，稍微游离一点都不得冠以这一名称（在饮食方面，意大利人着实讲究而且真挚）。面积约四百三十平方英里。

这里好旅馆很多。大宾馆虽然没有，但日本所说的"讲究情趣的地方旅馆"不在少数，价钱也不太高。意大利的宾馆一般价高质次，令人扫兴，但这个地区一次也没有那类情况。氛围好，设备齐全。

此地旅馆的特色表现在多是酒厂（意大利说法为Fattoria）改建的或农舍改建的，也有的原来是酒厂让来买葡萄酒的商人住宿的房屋。那样的地方自然附带餐厅，提供适合Fattoria葡萄酒的菜肴。不用说，菜肴十分可口，味道含蓄优雅，无意强调什么，却又能使葡萄酒味得以充分发挥。我想这点哪个国家都一样（会喝酒的人应该能够理解），为了让酒味发挥得淋漓尽致，要控制菜的调味，要保持材料的原味而不破坏它。托斯卡纳便保留了原汁原味。同此地菜肴相比，罗马餐馆的味道对于我有点浓烈。

这本书不是导游手册，名字就不一一列举了，但仅就我住过的来说，就有几家留在印象里的不错的旅馆。多是没几个房间的小旅馆，

几乎都未列入“米其林”旅游指南。

另外，如果问旅馆老板这一带哪里有可以买到美味葡萄酒的地方，就能时不时碰到绝妙的“冷门”。一次住在连名字都没听说过的一座小镇郊外的旅馆时（这里的菜也是绝品。三种葡萄酒、两种通心粉、两种主菜和两种甜食，一股脑儿吞进肚去），打听哪里有卖好葡萄酒的Fattoria，对方问我想买多少，我回答一打左右，老板说那怕不碍事，说了一家小葡萄酒屋的名字。

“那里其实不搞零售，但那个程度的数量，我想会卖给你的。名字叫英诺森提，就说是从弗兰克那里听得的。说实话，我父母家和他家是邻居。他白天一直在葡萄园转来转去，傍晚才回来。到7点钟去看看。”

说着，他画了去英诺森提家的路线。

“人非常好，葡萄酒已做了好几代，认真得很。每天在葡萄园里转，脑袋里只想葡萄，几乎不在家。在几个地方有葡萄园，忙得不得了。”

7时去英诺森提家，果然刚从葡萄园回来。房子普普通通，不打听根本看不出里边在酿葡萄酒。英诺森提看上去是个温和厚道的人，头发已开始变稀，俨然地方私立大学的老师。我一说是弗兰克介绍自己来买葡萄酒的，他就显出悲伤的神情。刚开始以为他不愿意卖，一听，原来他拿手的“会心名作”葡萄酒不巧卖完了，无法提供。

“是最好的葡萄园最好年份的葡萄酒。”英诺森提说，“可是已经没了。”

他就像一个月前失去心爱的妻子似的说道。于是我们解释说那确实非常遗憾，但第二好的也可以，务请出让给我们。英诺森提点点头，把我们领去地下酒库。外表是普通房子，地下室却很大。回到家他似乎多少做了点事，歌剧磁带已响了起来。英诺森提大概每天每日一边听威尔第的咏叹调一边为酿葡萄酒倾注心血。地下室有潮气，还略带霉味，有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器具，酒桶齐刷刷排开。

“那么，请先品尝一下吧！”他说。他让我们大致看了一下地下室，领我们走进后院。从后院可以放眼暮色中的托斯卡纳平原，景色真是漂亮。青山隐隐，湖光点点，云雾绵绵，远方的山顶现出中世纪古堡，庄稼地和葡萄园无边无际横陈开去。“那是我的葡萄园，”英诺

森提说，“那也是我的葡萄园。”手指自己葡萄园时的他满脸无比幸福的神情，一看就是个极其执著的酿酒人。说是品尝，但并非一小口一小口含在口中玩味，而是一整瓶一整瓶拿上来，满满地倒在大玻璃杯里。好喝，加之人家特意拿给的东西，剩下可惜，结果三瓶全部喝个精光。

据他介绍，他酿造的葡萄酒不在意大利国内销售，大多出口到加利福尼亚州和奥地利，同外国公司签了生产合同。又要接受等级审查，又要纳税，又要确保销售途径，对于英诺森提这样的个体酿酒者未免麻烦，所以基本上以合同制销往国外，其余极为个人化地卖给私人性质的熟人。

毕竟是酿造者本人极力推荐的，所喝葡萄酒相当沉实醇厚。说明确些，那一带差不多所有的基安蒂葡萄酒都根本无法与之相比。酒味绵长，余香满口，最后留在舌尖上的味道自然而然地轻轻离去。第二好的尚且如此，第一好的又会是怎样的呢？

接着我又喝了另一种红色的。这个比刚才的还富有果香，温情脉脉。以莫扎特音乐打比方——比方或许有点勉强——感觉上前者若是布达佩斯弦乐四重奏乐团演奏的四重奏，后者便是拉佩尔和斯特恩（Rampal&Stern）演奏的长笛四重奏。这种区分纯粹出于爱好和兴之所至，实际感受是难分高下。不过倘只允许我选一种，我还是选前种，因为这种葡萄酒攻势凌厉，绝不半途而废。

还有一点不能忘说的是英诺森提的Vin Santo[86]。一般Vin Santo作为饭后甜酒喝，香醇的Vin Santo仅这样喝就够受用的。英诺森提先生酿造的到底不同一般。分sec（偏辣）和dolce（偏甜）两种，我觉得前一种好喝（但依英诺森提先生的说法，后一种正统）。我一说这Vin Santo味道好极了，英诺森提先生又现出悲伤的表情。以为舍不得卖，却听他说“说实话这个有点贵”。胆战心惊问有多贵，“一瓶差不多一千日元，”他说。

如此这个那个斜举着酒杯讨论了两个小时，最终一共买了十八瓶。价钱将近一万日元，就算再免税也便宜到家了。主人当场从桶里装进瓶里，塞软木塞，贴标签，放入箱中。这时间里他始终面带微笑。自己酿的葡萄酒能让外邦人欢喜这点似乎使他相当欣慰。我想，能时不时碰上这种“一条道跑到黑”的工匠气质的人，是意大利这个国

家的一个长处。这个国家马虎大意的家伙虽多（的确多），但有一部分人的确在一丝不苟做正经事！他们独自一声不响地做好东西，而且有生活滋味从所做的东西中沁出。不管怎么说，这是意大利这个国家的魅力和潜力，有一种与列队看齐式的日本社会不同的禀性。特意远道来托斯卡那买葡萄酒，值。

---

[86] 风干葡萄酿造的葡萄酒。



雉鸠亭

在托斯卡纳地区随走随住的旅馆中，留在心里的无论如何都应是“雉鸠亭”（假名）。不是我舍不得写出真名，而是这家旅馆本来没有名字。没有名字写起来不方便，姑且以“雉鸠亭”称之。

“雉鸠亭”实在太小了，一共才三四个房间。所以入住的人数至多七八人。理所当然，在旅游旺季不提前很多时间预订一般很难住上，而除了旅游旺季又不开。旅馆是所谓“业余旅馆”，太太一个人照料房客。雇附近的人做勤杂工干力气活，家里细活全由她一个人做。干净，收拾得无微不至，哪怕再爱干净的人，我想都无话可说。室内家具也同农家相吻合，古色古香。床也大，盖着羽绒被。还带有绝对丰盛的早餐。住宿费两个人才一万日元挂个零头。我不由沉思，如此做买卖能收回本钱吗——便是这样一家忠厚的旅馆。

“雉鸠亭”位于基安蒂腹地葡萄园的正中间，不仅位置难找，而且连个招牌也没有。打电话预约时请太太讲了路线，但毕竟在田地正中，没有标识，找到那里实非易事。又没有合适的交通工具，只能开车去。离开柏油主道后，驶入狭窄的土路。路坑坑洼洼，尘土飞扬，车身变得白花花的。这样大约跑了两公里，接着开进更窄的农用路，跑了一阵子终于来到葡萄园正中。正中就是农舍改成的这家“雉鸠亭”，一座石砌的农舍立在小山上，周围是一望无际的葡萄园。深呼吸，空气中一股夏日葡萄叶的清香。四下异常安静，树林那边不时响起鸟鸣，远处的葡萄园里隐约传来卡车的引擎声。

刹住车，两条狗“汪汪”叫着跑到外面。一条是神经质的长毛大狗巴伯尔，另一条是十分与人亲近的小狗萨米。接着，旅馆老板娘出来了。四十五六或年近五十，给人的感觉很好，一眼就可看出不是意大利人。后来得知，她是瑞士人。随后，住在这里的从美国来的一个日本年轻女子和她的美国青年丈夫走出门来。她的美国丈夫也讲一口流利日语，我们住在这里的时间里一直用日语和两人交谈。迎门的梁上有燕子筑的巢，老燕子不时叼食进来。

本来这位瑞士太太全然没有在此经营旅馆的念头。她丈夫是瑞士律师，有个十六七岁的女儿，生活无忧无虑。她一眼看中这座房子买

下来当别墅，完全不知道以前作旅馆使用过，卖方对此也只字未提。不料，这里曾作为“托斯卡那富有情调的小旅馆”被美国一本导游手册介绍过（我也是看了那本书才晓得的），于是麻烦来了。来此休假，刚一进门就有电话打来预订房间。太太说她吃了一惊。那想必要吃惊的，我想。请假来托斯卡纳别墅，正睡得舒服，深更半夜突然有国际电话从纽约打来提出8月7日订个双人房间，任谁都会吃惊不小。

但这位太太的了不起之处在于她能对打来电话的人这样应道：“情况还不大明白，不过，如果您想来请来就是。”说亲切也好说豁达也好，总之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如此这般，她的“业余旅馆”一步步顺水推舟地办了起来。所以，这“雉鸠亭”连个招牌也没挂，甚至名字都没有，至于广告之类更是无从谈起，原则上一直是私人别墅，让客人入住是太太出于好意。这样的旅馆几乎没有。

只是——往下是那对美国夫妇说的——因为她完全是孤军奋战，所以尽管现在还勉强应付得来，但能维持多久则谁也说不准。况且瑞士人和意大利人不一样，无论干什么都拼死拼活，外人看起来都于心不忍。清扫甚至每个角落都不放过，总是为客人着想，神经放松不下来——尽管不那么悉心照料也未尝不可。人太细心，自然格外累。意大利人以百分之六十的力气干的活，此人投入百分之八十的力气。不过，那种气氛的确给人以“外行太太的生意”之感，让人分外放心。

一同住在这里的美国夫妇本来计划在意大利多转一些地方，但由于满意这家旅馆，就一天天地在基安蒂住了下来，“哪也不去了，就在这里”。我们也对这里大为满意，也想多轻松几天，可惜当时已另有安排（第二天必须赶到北部一座叫乌迪内的城市，只好住一夜就出发）。问一星期后能否再住一次，答说早已排满了。又问是什么人来住呢，回答大部分是瑞士人。也许她本身是瑞士人的关系，来投宿的多是瑞士人。我们住的时候就有两辆挂着瑞士车牌的奔驰停在旅馆门前。说起来，托斯卡纳这地方原本就是瑞士人和英国人喜好的地方，纵使夏天休假时节也极少在这里见到意大利游客。看来往小汽车窗玻璃贴的国籍卡片，也差不多都是CH（瑞士）、D（德国）、GB（英国）或A（澳大利亚）。

这家旅馆没有餐厅，那无论如何也忙不过来，但她给介绍附近味道好的餐馆。开车十分钟就到了最近的一个村子，村里有几家味美价

廉的餐馆。中午在树林里一家名叫拉·彼斯康德拉的露天餐馆吃三种合在一起的通心粉、香茹和牛肉，晚间在一家名叫拉·萨洛特·迪·坎蒂的小食店喝1986年的Vecchie Terre di Montefili[87]，吃番茄、夏令蔬菜通心粉和茄子（顺便说一句，我的伴侣吃的是夏令奶油蔬菜、杂烩饭和奶油巧克力）。两家味道都没说的，价格也够便宜。材料新鲜无比，烹饪一丝不苟，服务态度也很友好，不斤斤计较这点尤其让人惬意。后者不愧是两个年轻人刚刚开办的，菜式上似有不少创意。

黄昏时分在旅馆附近散步，小狗萨米一直乐颠颠地跟在后面。沿窄窄的农用路前行不远，走进蓊郁的森林。林中万籁俱寂，惟有脚踩落叶的沙沙声。柔和的阳光映着夏天的翠绿，脚下光影斑驳。迎面走来一位背篓采蘑菇的老伯，大声寒暄："您好！"据旅馆的太太说，森林有很多很多山兔和野猪，夜里跑出来吃葡萄和杏。森林便是如此之深。以为狗一直向前跑去，却又飞奔回来看我们是不是还在那里，接着又向前跑去。平和之至，安静之至，没有任何扰乱人心情的东西，让我深深觉得住在这样的地方该有多好，写作都能开心惬意顺顺利利。

清晨，太太睡眼惺忪地开车上街采购早餐食品，为我们做新鲜得不能再新鲜的足量的早餐。面包铺刚刚出炉的羊角面包和卷形面包，大盘子里摆着好几种奶酪和火腿，用刚生下来的鸡蛋做的牛奶黄油炒蛋，满满装在壶里的果汁，咖啡，果汁鸡尾酒，园子里摘来的水果拼盘，苹果酥。总的说来，我这人睁开眼睛就饥肠辘辘，早餐吃得很多，尽管如此，这份早餐也未能吃完。但由于太好吃了，请旅馆的太太把洋梨和苹果酥包起来当盒饭带走。

走出旅馆，我说实在太谢谢了住得非常愉快，旅馆的太太显得十分欣喜。不过我想下次来时她恐怕很难继续经营，因为单单准备早餐都是非同寻常的重体力劳动。过去我们也做过七八年招待客人的买卖，深知其中劳苦。能让客人高兴自然感到十分欣慰，但招待一方为此付出的劳动远比旁观者看到的繁重。

碰上这么好的旅馆，觉得旅行真是件好事。说实话，那种叫人失望顿生旅途疲劳的糟糕旅馆世间倒是多的是。

---

[87] 托斯卡纳出产的一种葡萄酒。



意大利的邮政

如果叫我用不到四十个字概括意大利这个国家的特征，我可以这样概括："总理年年换，吃饭大声喊，邮政落后到极点。"同时具备这三项条件的国家，至少在北半球应该只有意大利。

反正意大利邮政制度有问题。不，并非有问题这么轻描淡写的程度，不客气地说，简直不像话。至于怎么不像话，一般日本人恐怕是想像不出的。我一而再再而三——嘴都说酸了——忠告从日本往这边寄信的人：意大利邮政机构近乎无可救药，若有急事（或者不如说即使有急事）也不要写信，因为写也没用。一来时间长得惊人，二来大有可能寄不到。所以，即便写了信，也不要指望信会寄到。要寄的信仅限于寄到寄不到也无所谓并且是因为有时间才写的那类信。另外，纵然接不到回信，也请不要以为我是个失礼之人——或者你的信没寄到我这边，或者我的信没有送往你那边。

听我这么一说，对方当时感慨道："噢，是那样的吗？就那么不像话？"但转身就忘得一干二净。在某种意义上，邮政制度如同水和空气。生活在邮件能够在短时间内准确寄到住处的国家的人，很难对另一种情况感同身受，所以很快忘记，并且某一日打电话来："前些日子写信求你办点事，还没接到回音。"我报告根本没接到，对方甚为意外地说"都寄出三个星期了"，于是我说上次不是说过意大利邮政很慢吗，但对方很难理解，反问说："真的那样？"实在叫人沮丧。

回想起来，这还算好的。因为对方打电话明确抱怨，从而得知尚未寄达，可是世上生闷气的人想必也是有的。一想到这些人，我就不由黯然神伤，尽管不是自家责任。

看手头上的美国一本导游手册，上面有则趣闻，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美国大兵从罗马写给故国的信到了20世纪60年代才寄到。事情固然过于荒唐，但绝非无中生有之事。至少意大利人听了不会怎么惊讶，因为这在现实当中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寄到就够幸运的了"——此乃他们一致的冷静感想。

邮政不像话，电话也不像话。有时声大有时声小，有时打得通有时打不通，有时通了也忽儿声大忽儿声小，还有时正说着突然中断。

一个在某公司的意大利分公司工作的人用电话同东京总公司交谈之间，线路“嚓”一声断了（他们称之为掉了，这在意大利不是什么稀罕事），于是慌忙重打过去，但对方大发雷霆置之不理。无论怎么道歉，日本人都全然不理解此乃日常性事实，以致听了对方好些难听的话：“你这家伙，气魄够可以的嘛！”实在叫人觉得可怜。

电话不像话，包裹也不像话。有好心人以为这边日本食品不充足而特意寄来，遗憾的是迟迟寄不到。一次看纪录片，看到给孤立无援的日本部队补给食品的运输船队在开往瓜达尔卡纳尔途中接二连三被美国潜水艇击沉。这里虽说没有那么悲惨和严重，但状况也够不像话的了。那东西究竟是在怎样的过程中消失在怎样的地方了呢？委实令人费解，可就是消失不见了。

从经验上说，我认为不是意大利邮递员有意偷盗邮件造成的。“这是日本寄来的？噢噢这不是冷面么，那好极了，就蘸着番茄酱吃掉好了！”——不能认为事情会是这个样子。也很难认为意大利邮递员对日本文学怀有兴趣，每当有文学刊物从东京寄来就据为己有，忘情地看中上健次[88]的连载小说（尽管不可能说完全没有）。当然，其中或许有专门侵吞邮件者，但相比之下，恐怕还是认为意大利邮政制度这一机构中存在着致命的自我堕落式的黑洞那样的东西，致使许多东西自然而然地一个接一个地被吞噬进去，这样更为接近现实。

总之，这个国家的衙门手续烦琐得要命、效率低得要命、态度差得要命、架子大得要命。又有诸多细小规则，而且每隔半年就心血来潮地把那规则整个变更一次，以致谁也不记得什么规则之类，到处产生制度性黑洞（举个例子，意大利行车限速就几乎年年变，没人记得确切。今年每星期几限速还不一样，那东西就连交警都记不来，因此马上作废。一塌糊涂）。

例如投递员把包裹或挂号信送来，若接收人不在，则和日本一样留下通知单。问题是这终究是原则性的东西，不少时候不照此办理。有的家伙懒得一一按门铃爬楼梯把邮件面交本人，只把通知单一把塞进信箱就扬长而去。更糟糕是连通知单都不塞进去，这种情况下邮件只有默默消失。另外，重东西和大件东西的投递方式恶劣也是事实。《文艺春秋》因为厚，塞不进信箱，几乎不送。这类终端服务往往取

决于每个投递员的个人素质，所以必须时不时给点小费讨其欢心。

拿通知单去邮局取东西，每次去窗口都不一样。责任人不同所需文件也不同，弄得你这里那里团团转，而意大利的邮局又那般拥挤不堪，半天时间就这样报销了。搞到最后，竟被冷冷地告知东西不在这里。开哪家子玩笑！明明送来通知单，上面明明写着来这家邮局取，岂有不在这里之理！于是我坚持说绝对在这里某个地方。对方道说没有就没有嘛，通知单肯定弄错了，但还是老大不情愿地起身去找，结果马上找到了："啊，有了，这个吧？"说着递了过来，没有抱歉没有对不起，什么也没有，只有"啊有了这个吧"，就此完事。

可是若为这个气恼，那就别想在意大利活下去，这种事天天层出不穷。反正邮件便是被这官僚主义黑洞连连吞噬进去，再也不会浮出水面，一如《夺宝奇兵I：法柜奇兵》（Raiders of the Lost Ark）的最后一幕，仓库里没有投递地址的邮件堆积如山，就那样腐烂下去（啊，我的冷面！）。

那么意大利周边国家如何呢？哪个国家的邮政制度都无懈可击。从德国、奥地利寄出的邮件大约四天后准确到达日本。即使希腊也可以说两个星期后——虽说不是四天——必定寄到，就算是法国，若无罢工也并不差。就经验说英国也够一丝不苟，基本上第三天寄达日本。单单意大利提不起来。

我真是佩服意大利人：他们丝毫无意改善这种糟糕透顶的状况，甚至付出努力的表示也没有。所以无意改善，首先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改善也无济于事，其次是因为考虑其他方法来代替变革志向更符合他们的性格。这方面的思维取向同英国德国美国以及日本等国家截然不同。在某种意义上，意大利人是想法极为现实的国民。

就是说，意大利人对公共服务这劳什子可以说全然不抱幻想，觉得与其指望这个，还不如另想办法。看重个人关系和家庭，极尽逃税之能事。不妨说，逃税与足球对意大利人来说是最要紧最投入的两件事。

意大利年度财政赤字约一千亿美元，差不多等于意大利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一。据政府推算，倘意大利国民不再逃税而老老实实申报收入，那么赤字的百分之七十五可以得到弥补（《先驱论坛报》），逃税便是逃得这么厉害。因为逃税，他们手头有大量现金买

昂贵的进口货，以致进口额外增加，国家财政赤字有增无已。经济越景气赤字增加越多。

另一方面，意大利人几乎不具有逃税有罪的意识。对他们来说，逃税乃是出于正当防卫的经济行为，循规蹈矩纳税之人纯属傻瓜蛋。一位意大利经济评论家甚至大胆断言逃税才是健全的经济活动的基本。就是说，个人因逃税而有钱后，便想用那笔钱代建不完备的公共服务设施。公立学校质量不好就送小孩去私立，邮政制度不完备（岂止不完备）就利用速递公司、买传真机，铁路不准点运行（肯定不准点）就买小汽车。而这样做比把钱交给低效、无能、腐败的政府衙门浪费岂不好得多！如此说来我也觉得未尝没有道理，反正也是一种世界观。

这就不说了，总之是吃尽了这个国家糟糕邮政的苦头。例如一个半月前在日本寄出的邮件和一星期前寄出的邮件同时送来，根本搞不清事情为什么这样。莫非觉得一一投递麻烦，要等积攒到差不多的时候才集中送来？另外还兴之所至地有时收有时不收通关税。

那么，不邮寄而改用传真机就行了么？没那等好事。一次去罗马的中央邮局传真窗口往日本发传真，不料对方说日本和意大利传真机基准不同，发不去日本。开玩笑！从没听说国家不同传真机基准也不同。从别的国家也往日本发过好几次传真，什么问题也没有，不可能发不过去。无非嫌麻烦罢了。可是在窗口无论怎么讲都讲不出理来。在这个国家，窗口负责人说不行，那就绝对不行。若无论如何都不死心，就只能等窗口换人时再来。

还有，邮局员工的算数能力之差也值得大书一笔。例如往日本寄三张明信片和三封信函、再给美国一个熟人寄一张明信片，窗口里的女孩用卡西欧计算机“啪嗒啪嗒”计算。数字出来了。觉得邮费过高，抱怨了一句。对方大为不悦地重算一次。这回出来的数字便宜不少。出于慎重，她又算一次，这回出来的数字更便宜。随即她为之困惑，并开始气恼。又算一次。结果——莫名其妙——出来的数字又不一样，于是她气急败坏起来，心想日本人何苦特意来罗马往东洋尽头寄什么信件！

她把四种数字扔到我眼前，随我选哪个款额，我当然选最便宜的付了。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我如实讲起，我想日本人都会认为我言

过其实。不是说笑话，百分之百属实，刚刚诞生的一丝不挂的事实。

这话还没到此为止。回到家，我自己重新算了一下那笔邮费。结果，她的四种数字全是错的，实际上比最便宜的款额还要便宜。这还不算，即便同一张明信片也是一个窗口负责人一个价。纵然同一张明信片递给同一人，也此一时彼一时，从二十日元到六十日元。得得！

依我观察，意大利邮局员工的积极性（我是假如有这玩意儿的话）相当之低。几乎所有的员工都显得无比厌烦，几乎所有的精力都耗在吃零食以及和同事闲聊上。那个做出仿佛牙痛月经痛胃炎同时袭来时的严峻表情的女孩（我说“您好”/“……”/我说“请给我六百里拉的邮票三张、一千二百里拉的邮票一张”/“……”），同到了吃点心时间大叫“我要炸薯条比萨饼”时相比，简直高兴得可爱得判若两人。无可救药！

不过，若为意大利邮局的名誉补充一点，那就是并非邮局所有员工统统如此。一个邮局里一两个认真而麻利地工作的人也还是存在的。若一个也没有，那么意大利就是再不在乎，作为国家也还是无法存续的。那样的人坐在窗口里，几乎令人绝望的长队也眼看着迅速消失。然而遗憾的是，这样的人的数量少而又少，而且未必受到同事的尊敬。很多时候看上去似乎遭人白眼：那家伙既然愿意干，就让他干去好了！

另外，一到夏季连休临近的时候，意大利的邮局系统就陷入严重的麻痹状态，及至圣诞节前夕、复活节前夕和暑假临近时，更是变本加厉，脑袋里想的全是放假去哪里、做什么。自不待言，连休期间整个系统功能全部停止，一切彻底死去（例如我们从8月5日至25日之间一次邮件也没收到）。连休结束后一段时间也不行，名为“连休后遗症”的淡粉色云絮整个儿笼罩在工作场所的上空。即使商店和政府部门，人们也只管津津乐道各自度过的休假，相互炫耀晒黑的肤色，或者在工作场所悠然自得地看报纸来消除休假的劳顿。总之，意大利的邮局大体像那么回事运转的时间，一年之中十分有限。

算了，这种事写得再多怕也没什么人相信。

---

[88] 日本小说家（1946—1992）。



意大利的小偷

谈意大利时必不可少的三大话题：邮政不便、火车晚点，此外就是小偷泛滥。关于意大利的小偷人们已说了许多，或许有人觉得何必还说，但不管你怎么觉得，这点要说的也还有很多很多。

※

美国出版的意大利导游手册中的“SECURITY”（安全）一项这样写道：

“意大利人是优秀的主人。他们好客，富于社交性，开朗热情。大多数意大利人确乎如此，但也不是没有行为不端的人。十分不幸，这一小部分人给游客留下了意大利小偷泛滥成灾的印象。抢包和扒车毛贼确实听说过，不过那种事如今在世界哪里都半斤八两。我没有意大利满街是小偷的印象，也不曾在意大利被人偷过，但不管怎么说，小心再好不过。当心手提包，别炫耀似的把钱夹塞进屁股袋里，贵重物品存在宾馆保险柜中，旅行支票带在身上，别把贵重物品裸露着放在小汽车内。也就是说，要让常识发挥作用。只要注意这类简单事项，你就不至于在难得的旅行当中遭遇不愉快的事情。”

那么，这段文章说得可对？

不对！

我可以负责任地断言：不对。在地方城市和小镇，或许某种程度上被此人说中。例如去锡耶纳、摩德纳、帕尔马和的里雅斯特那样的城镇，只要按照此人说的让常识发挥作用，一般不会遇到不快，事实上我本身也不曾在那些地方有过不快。

可是罗马不同。罗马即使在意大利也是相当特殊的城市。在这里，无论怎么注意、无论怎么让常识发挥作用，超越此限的灾难都要找到你头上。

我以罗马为中心差不多住了三年，在这里的确目睹了五花八门的作案行为，自己也曾受害。那可不是“只要让常识发挥作用”即可避免的那种温吞水似的东西。倘若有人久居罗马而一次也没成为作案（当

然多数是偷盗，暴力犯罪极少，和美国不一样）的受害者，或者有惊无险的情况都不曾碰上，那么，他不是异常幸运就是近乎神经质地严加防范的结果，我想。

举例说，我的一个熟人一天在名叫里埃恩兹奥的主要大街停车进商店买东西，五六分钟买完出来，但见车窗玻璃坏了，车内音箱被窃。他（倒是意大利人）完全是有常识的人，下车时总是习惯性地把音响装置从车里拿出带在身上以防被盗。当时虽说是买东西，也不过五六分钟，且车是停在行人往来不绝的热闹的通衢大道，何况是收费停车位，又有人照看，所以估计问题不大，放松了警惕，结果恰恰被盗。周围人应该眼见罪犯在光天化日之下用锤子或其他什么砸烂玻璃，开门卸下音响拿走，然而谁也不出声，不多管闲事。不错，意大利人或许热情、开朗、亲切，但倾向于不管与己无关之事这点也是不容否认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十分讲究现实的人。他们当然认为（想必认为）犯罪不好，但认为有人被盗即意味那个人是傻瓜蛋，是马虎的人不好。所以基本上没有为素不相识的人（当然家人除外）特意做什么的想法。

老婆挎包被抢时也是那样。那时我们在纳沃纳广场（Piazza Navona）漫步。平时我们尽量不去那种游客多的地方，但那次是回东京的前一天，心想这纳沃纳广场还是应该转一转。我一个人在稍离开些的地方看商店橱窗——倒是不该看的——一点也没觉察到她被抢。一个开摩托车的年轻男子从后面赶来，一把抓住她的挎包带。她本能地握紧不放，大约持续了三十秒。尽管周围有几十人之多，但都往别处看，佯装未见，不愿意介入，作出浑然不觉的样子。互相抢夺了一会，最后挎包带断了，男子拿包离去（此后不久，一个可怜的日本女性因挎包带没断而被拖在路上拖死了。事件发生在罗马的托拉斯特拉）。众人这才如梦初醒地来到她身边，七嘴八舌安慰道“真不得了啊”、“啊请在这儿坐一下”、“我给警察打电话去”、“那不是意大利人，是南斯拉夫人”。这种时候的意大利人又可谓亲切之至——嘴皮子上的亲切，倒也容易。

说实话，这对我们是个不大不小的震动，也很失望。为什么呢？因为若在东京看见被人抢包的女性，尤其是外国女性，我肯定伸手相助。尽管我这人没有多么强烈的正义感，但这点事还是会做的。

更倒霉的是——前面也说了——因为第二天要临时回国，所以她挎包里已为明天预备好了罗马和东京间的机票，而且是两个人的。还有护照、两张信用卡和旅行支票（这个倒没多少钱）。

我们马上去报警。警察署就在附近，有受理外国人失窃事件的专门窗口。到那里一看，虽然上午时间还早，却已黑压压一大堆人。清一色是被人偷了东西的外国游客，不用说，全都神情沮丧或气呼呼的。基本上是欧洲人或美国人，日本人仅我们夫妇。拼命分开拥挤的人群，领来失窃申诉用纸，填写事件发生的场所和被抢走的物品等等。写失窃现金的数额时，一个板着面孔的女警察不屑地说："你说你，用不着写金额的，那东西不可能出来！"她那么一说，我也来气了，恨不得吼道：这么多人来你们国家旅行被抢被偷已经够窝囊了，还要给你这么说！可是吼也吼不出结果，在意大利衙门若每次来气都吼，长再多的声带都不够用。我默默填写完毕，让对方盖印承认。没这个印，再买机票再领护照都不成，保险都下不来。光干这个就差不多花了两个小时。

之后立刻去领事馆。明天就动身，不赶紧来不及。到了领事馆，叫马上去照证件照。罗马的日本领事馆对这类失窃早已习惯了（说每天必有几起），办事十分麻利。附近甚至有专门照证件照的地方，到那里很快就洗出了护照用的相片。

往下是机票。这个麻烦。罗马和巴黎间的航线属意大利航空公司，遂去意大利航空公司事务所说明情况，希望取消失窃机票，另给新机票。公司职员都很热情，安慰说真够倒霉的了，甚至开无聊玩笑："干嘛没耍一通功夫呢？"还说："不过抢东西的家伙不是意大利人，是南斯拉夫人（一有小偷，意大利人就顺口说是南斯拉夫人）！"但票不给再开。我们买的是正常价格机票，电脑里有名字输入，又有警察署的失窃证明，何况几天前刚买的，以常识考虑不可能开不出。然而偏偏不开，也不解释何以不开，只一口咬定不行不能开抱歉。为什么不能呢？事后追究责任问题，麻烦。怎么争论都无济于事，只好新买了去巴黎的机票。不给再开，只能重买。对方坚持说："反正先买了再说，事后来领退款！"事后去意大利航空公司总部说情况发牢骚，对方说："明白了，退款好了。"然而拿到退款花了两年半时间，费了相当大的辛苦，走了很有力的门路。也罢，能在20世

纪以内退回来，或许该庆贺才是。

接着，提交信用卡失窃报告（唔，早已心力交瘁）。我用的是美国运通卡和另一家大公司的信用卡。非我宣传，美国运通卡这种时候的应对非常之快，给位于西班牙广场的AMEX（运通卡公司）打电话，叫我三小时后过去领新卡。我本来没抱什么希望，心想在罗马这座城市事情不可能那么顺利，不料三小时后去了一看，新卡好端端摆在那里！AMEX了不起！相比之下，另一家信用卡公司则一塌糊涂，磨磨蹭蹭差不多一个月后才给新卡。“噢，被人抢走了？这罗马呀，罗马真是伤脑筋！”如此拖泥带水，全然不得要领。开什么玩笑，伤脑筋的是我！来外国丢了信用卡，拿到新的要等一个月，叫人徒呼奈何。领到新的旅行支票也是AMEX快，另一家根本提不起来。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加入旅行失窃保险而不适用于发生在意大利的失窃。尤其欧洲保险公司往往单把意大利从失窃保险对象地区中划掉。因为案件实在太多，保不过来。意大利警察署的失窃报告受理证明也常被置之不理，因为开具得太随便了（的确随便，我一递出，看也不好好看就呯一声盖章——否则，堆积如山的失窃报告根本受理不完）。

如此情况怎么可以像导游手册上那样以“世界哪里都半斤八两”这一说法加以概括呢？怎么可以用“只要让常识发挥作用即可”这样的忠告来了结呢？我坚决认为那纯属开玩笑。

对于日本游客，首先要提醒注意吉普赛人。但吉普赛人只要习惯了一点也不可怕，至少吉普赛人凭外表可以看出。若死皮赖脸凑上来（以为对方可疑），转身走开即可。只要走开，断不至于随后追来。可怕的是外表看不出的专业或准专业作案者，这样的作案者罗马满街都是。

在地铁也看见过好几次扒手，我本身也屡屡惊觉包被拉开一半，所以坐地铁时总是包口朝里，要紧的东西塞入上衣内袋，牢牢系上扣子。进餐馆时必须时刻把包放在膝头。

天天这样生活。若身后有摩托靠近，就要提高警惕赶紧回头（我们的格言是：摩托就是贼）。在地铁里紧紧抓包不放。车厢里有看报纸的老伯，先怀疑他有可能是小偷。下地铁时有人横冲直闯挤上车来，这也最好当心。在餐馆吃饭时眼睛要一闪一闪注意带的东西。从

小汽车下来时，绝对不把东西放在从外面可以看见的地方。每五分钟摸一下钱包位置。每次外出——哪怕出去一会——都关好滑窗。走路时有举止怪异之人出现在前面，就移去路的另一侧。凡此种种，在罗马住久了，自然习以为常。当然，这样的生活到底相当累人。

在希腊生活将近一年，一次也没考虑过什么小偷。很多东西随手放在那里不管，从未有人动，也没有过那样的担心。在米科诺斯租房子住时连门都没正经锁过。留下皮包去哪里，回来时肯定还在那里。忘了东西保准有人送来。但在罗马，小费都不能放在咖啡馆的桌子上——有人走过时一把收走。自从目睹那种偷小费的人以后，渐渐对在这个城市生活厌倦起来。

我和老婆同从巴黎来的西山君傍晚去住处附近的露天比萨饼店吃东西时，包也险些被人拿走。身后桌子的两个人用特殊工具（似乎是可以伸缩的晾衣竿那样的东西）想把我脚前放的挎包“吱溜溜”拖走，好在包里装着书和照相机什么的，比看上去重得多，那工具一下子拖不动，费了不少劲，但手法巧妙得很，我全然没有察觉。倒是老婆觉得后面两个人有些异样，促使我注意，这才得以幸免。我视线落在包上时，那工具早已没了影，只是挎包略微后移。

一来二去，两人倏然离座去了哪里。但他们离去前似乎盯上了旁边坐着的一对美国情侣。大约三十分钟后，那对美国情侣要结账时，女孩发现自己的包没有了，于是发生了一场骚动。他们认定在邻桌吃东西的一对意大利男女偷了包，喝令看样子蛮老实的意大利一男一女打开挎包。美国男子满脸通红怒气冲冲，意大利情侣看情形又不会英语，两个人都搞不清怎么回事，目瞪口呆。

我看不下去，走到美国男子跟前说明情况：“如果你们包被人拿走了，那么我想犯人不是他们，而是刚才在这里坐了一会的皮肤微黑的两个人。两人举止可疑，我的包也被拖走了一点点。”

美国人狐疑地盯视我一阵子，大概怀疑我是这城里精心编织的圈套的一部分，但在我一再解释之下，最后似乎理解了怎么回事，少顷长叹一声，向意大利情侣道歉：“不该怀疑你们，对不起，请原谅。”意大利情侣看样子也明白过来，说：“没关系，不介意的。”

包被拿走的女孩坐在椅子上抽抽嗒嗒哭个不停，男的自始至终重复道：“fuck、fuck[89]。”（由此得知他们是美国人）“我们是从纽约

来的，”他说，“明天就回美国，护照和机票都在她包里。这是旅行最后一夜，竟碰上这种事，fuck！”他抓住男服务生撒气：“喂喂，知道吗，这也是店里的责任！店里没有保安！把领班叫来！”性子似乎相当急躁，但我很理解他的心情。

不久，领班赶来，深表同情。他显得非常难过，伤心地摇头：“实在是不应该有的事、丢人的事、可耻的事。您生气是人之常情、理所当然，心情十二分理解。先生，不过偷的人是南斯拉夫人……总之店里没有责任。”我把这个称为意大利式水桶接力，全都得体地轻轻闪开身体，把名为“责任”的水桶巧妙避让过去，因此火总也扑不灭。急躁的纽约客继续大吼，意大利人继续举起双手摇头。问题是这样继续到什么时候都于事无补。

“去年春天我的遭遇也和你一样，”我对他说，“也在回去前一天全被人拿走了。”

女孩也在啜泣。想必还无法相信自己的包被偷走了。打击大，只能哭。不幸就是这样，事情若非发生在自己身上，随便怎么说可以。我对一个在罗马遇见的日本人说老婆挎包给人偷了，对方完全一副嘲笑的样子，说什么是被偷的人不好。我火冒头顶，但说也没用，便什么也没说（意大利人尽管有五花八门的缺点，但至少还有一点体贴之情，不至于说话如此狂傲）。总之，事情若发生在别人身上，随便怎么说可以，动员常识啦多加小心啦，可又有谁能责怪那个包被偷走的美国女孩呢？对她来说那是罗马最后一夜，场所是美丽的喷泉前的漂亮比萨饼店，只不过在身旁椅子上放一会包罢了。假如是人头涌涌的旅游场所，或许我也会认为她马虎大意，可是那里是几乎没有游客的幽静的住宅地段，所以我们也才得以相当放松地品尝美食。

我对他讲了应做的事：先去警察署提交失窃报告，没那报告什么都办不成。然后去领事馆领新护照。

Fuck！喂，可是明天的飞机哟！

让来罗马的人失望并恨不能打个半死的不仅仅限于小偷、扒手、吉卜赛人、抢劫犯、顺手牵羊者、诈骗犯、暴力酒吧以及故意算错零钱的商店女孩，在这以抢劫为目的的混沌世界中，出租车也占相当大的位置。

旅居罗马期间，有几个从日本来的熟人前来看我，从机场搭出租车没被敲竹杠的人一个也没有。从机场到市中心连小费至多五千日元，然而最低被要去一万日元，最多时花了三万日元。我事先已经对他们交待从机场搭出租车大约五千日元，若有人多要，就去宾馆服务台让服务台的人交涉。但司机也没那么傻，不肯到什么宾馆门口，找种种借口在离宾馆很远的前面停车讨钱。被要去三万日元的人反驳说休开玩笑，对方吓唬他“我可是带着手枪的”。一塌糊涂！自那以后，再有谁来我必去机场接机。

街上一般出租车没那么出格。略感蹊跷的不是没有，但大半司机诚实、热情，和蔼可亲，给人以地道平民印象的老伯较多。他们也是劣质司机的受害者。遗憾的是，聚集在机场和特尔米尼火车站的司机品质相当恶劣。黑车就不用说了，即使正规的出租车也有不少漫天要价。我也经历过几次，可以说地道的出租车为数不多。如果可能，从机场和特尔米尼不搭出租车是明智的。从经验上说，目的地是知名宾馆的时候更要吃大亏。如果你能从特尔米尼或机场搭上让人顺心的老老实实的出租车赶到哪里的宾馆，那只能说是幸运。据我的经验，那样的幸运不会连续几次。

至于罗马的警察为什么不严厉取缔这些恶劣的家伙，我全然不能理解。没准是为了先给前来罗马的游客以警告（诸位，这座城市可不是好对付的，这种事往下一个接一个静等着咧，这个只不过是开篇第一章，务请当心！），作为一种进门礼仪、一种疗法而特意把恶劣的出租车安排在机场和火车站。

当然，在罗马我也并非只碰上这类倒霉事，这点必须先说清楚。也有愉快的感受，也遇上过热情友好的人（尽管不能说很多）。偶尔遇上一次这样的人，分外觉得如释重负。例如我们包被抢走的那天晚上，我们在罗马常住的宾馆总管来了（因是最后一夜，我们退了公寓住进宾馆），在酒吧请我们喝鸡尾酒，对我们说：“在这座城市遭遇那种事，我感到十分抱歉，令人遗憾。如果钱被抢了有困难，请只管说，需要多少宾馆可以借给，不必客气，回日本后寄来就可以了。”所幸现金几乎没被抢走，只对他的好意表示感谢。但得到这样的关心，让我们觉得这座城市也并非一无是处。

不过若问是否还想来罗马居住，作为我还是只能答说“NO”。旅游也罢了，住却是免了。basta,grazie（够了，谢谢）！写这篇文章十天后，我将退掉罗马的公寓返回东京。

在罗马生活期间，我们觉得一年到头都在为小偷分心。每次去哪里旅行，总是担心回家时东西一扫而光。旅行时担心这个，旅行也没多少快乐。

当然东京也不是没有小偷，也要适当注意防盗。可是不用说，没罗马严重。住在东京的人不至于脑袋里天天装着小偷。回东京后看到人们把大钱夹塞进屁股袋里大模大样行走、把挎包随手放在什么地方，一段时间里不禁瞠目结舌，但不久就习惯了。唔，对了，这就是东京，用不着提心吊胆。这的确是东京的长处。如果生活中不必没完没了担心被盗，自然是再好不过。

不过，这里也还是有这里才有的麻烦事。罗马充满罗马才有的麻烦事，东京充满东京才有的麻烦事。东京的麻烦事以东京的麻烦事的特有形式让我头痛、让我心烦、让我生厌和疲惫。

若说我长期旅居外国所得到的经验教训，大体也就这么多了。世界的特质在原则上取决于其拥有的麻烦事。无论我们置身何处，都只能和麻烦事相伴而行，同麻烦事一起生存。

---

[89] 骂人话，意为“性交”、“讨厌鬼”。

奥地利纪行





萨尔茨堡

参加夏季萨尔茨堡音乐节是我很久以来的心愿。一直旅居欧洲，想去并非不能去，却迟迟未能成行。不是担心人多就是怕票难买，总之有怕麻烦的念头在先，不觉之间敬而远之。我不大喜欢人多的场所，万国博览会啦奥运会啦商店减价啦熊猫啦巨人队棒球赛啦迪斯尼乐园啦正月里的明治神宫啦江之岛海滩啦樱花盛开的上野公园啦——这类人山人海的地方从未去过，一想人山人海就万念俱灰。不是因为别的，只因为我讨厌看很多人挤在一起。冠以什么什么“节”的东西一概讨厌。较之讨厌，莫如说是憎恶。因此，音乐固然想听，可是一看见音乐节三个字就没了心情：算了，不去也罢。

另外，以前在维也纳待过一个星期，待得百无聊赖这点也是我懒得去萨尔茨堡一个原因。别人如何感觉我不晓得，反正对我来说维也纳实在是个无聊的城市。东西不好吃，又没有特别的事可干，甚至觉得世间居然有这么无聊的地方。天天去动物园，或在舍恩布龙宫的树林里喂松鼠，如此懒洋洋打发时间。既然同是奥地利——我想像——那么萨尔茨堡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

就这次旅行来说，计划也并不是为了去萨尔茨堡，感觉上只是去德国南部旅行时顺路——如果可能——去一下。不料从奥地利乡下转到萨尔茨堡时，我们很大程度上喜欢上了这个国家。结果，半个月旅行只在德国南部住了四晚，其余时间几乎全在奥地利转来转去。对人也好对国家也好，只凭第一印象有时会错看对象，这便是个佐证。坦率地说，奥地利多少有些单调，没有意大利的妙趣，没有德国的份量。美丽、洁净，但是单调。若说单调也没什么不好，那么这个国家就很好。而且——也许哪个国家都一样——乡下小镇比大城市有意思。另外，奥地利最好不过的是安全。东西放在小汽车里不管也尽可放心。用不着当心抢包、顺手牵羊和吉普赛人，这对于在意大利生活的人来说无异于天堂。进入这个国家后我们得以打心眼往外舒了口气，好久不曾这样了，深感这才是人生活的环境。常有人说去纽约若无那种有刺激性的场所没有意思，可我不那样认为。不管谁怎么说，能够放心生活的安全场所才是地道的场所，在这点上，奥地利无可挑

剔。刺激性那东西，恐怕应该是每个人在自己心中制造出来的。

开车驶入萨尔茨堡。岂料，萨尔茨堡这地方简直是个迷宫，小巷不断拐来拐去，单行线、车辆禁入、此路不通等令人应接不暇。预订了山顶上一家宾馆，但横竖开不到那里。就像卡夫卡的小说，折腾多少次都要回到同一地方。折腾一个小时后，灰心丧气地给宾馆打电话问从这里如何去宾馆。“电话里怎么也说不清楚，雇辆出租车，随车后跟来！”可我们已实在累得浑身瘫软，没气力费那个操办，于是退了那家宾馆，在街口一个大停车场把车停下，在中心地带一家小宾馆要了房间。听人说音乐节期间突然闯进去，全城宾馆哪一家都不会有房间，但实际去了一看，总有办法可想。这家宾馆虽然便宜，但感觉不错，谈不上气派，但干净利落，一楼的小啤酒屋样式的餐厅也蛮有平民味道。我们决定在此住两晚。

从这宾馆去音乐节中心会场走路只需五分钟左右，结果上十分方便。看街上贴的海报，今晚的演奏是阿列克西斯·魏森伯格（Alexis Weissenberg）的钢琴，写道还有票。去售票地方一看，原来今天的阿列克西斯·魏森伯格已经取消，代之以鲁道夫·布赫宾德（Rudolf Buchbinder）的演奏。但毕竟特意来到萨尔茨堡，遂买票进去。

在歌剧方面，此前一天有威尔第的《假面舞会》（苏提爵士〈Georg Solti〉指挥），两天后有《托斯卡》（阿巴多〈Clandio Abbado〉指挥）。《假面舞会》本来该由卡拉扬指挥，但众所周知，卡拉扬突然去世（街上仍贴着卡拉扬海报），而由苏提爵士代他指挥。替代人选也问过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和穆蒂（Riccard Muti），但伯恩斯坦说他从未指挥过《假面舞会》，穆蒂则说替代卡拉扬精神压力大，因而轮到苏提爵士头上。在售票口我试着问有没有《托斯卡》的票，对方以惊诧的眼神看着我：“你这人怎么现在才来呢？”的确如此，现在不可能有。

不过就结果来说，布赫宾德的钢琴令人兴味盎然。老婆以前在东京听过魏森伯格的钢琴，依她的说法，此人比魏森伯格有趣得多。那是过去的事了，魏森伯格现在的演奏有怎样的变化倒是不晓得。

来听音乐会的人衣着都相当考究，男的大部分穿晚礼服那样的东西，女的很多人身穿露肩的正式礼服裙，戴宝石，总之珠光宝气堂而皇之。意大利的音乐会没有多少人如此郑重其事，对二者的落差吃惊

不小。我也姑且穿了夹克进场，总算没有太出洋相。

日本听众也相当多，因为有不少旅行团是以萨尔茨堡音乐节为招牌组团的。说老实话，我也听人说若想在萨尔茨堡听音乐会，最好从日本随旅行团去，否则很难在当地买到票。前面座席上身穿盛装的日本女孩子们吵吵嚷嚷互相拍照，旁边一位奥地利太太叫她们安静一下。日本的年轻女孩子一兴奋就忽然齐声高叫，什么缘故呢？

布赫宾德的节目单上首先是贝多芬钢琴奏鸣曲31中的2和3。一言以蔽之，这是简约主义式（minimalism）的贝多芬——将感情色彩和深沉的思考全部剔除，只留下音符，然后重新构筑。在这个意义上，同古尔德（Glenn Gould）的演奏有一脉相通之处，却又和古尔德截然有别。这里没有古尔德音乐传达的那种令人战栗的宇宙。宇宙虽然没有，但也自成一统。如果说宇宙那东西没有也无所谓，那么就正好合适，妙趣天成。体会到这种妙趣，自两年前在东京听瓦莱瑞·阿瓦纳斯维（Velery Afanassiev）的钢琴演奏以来这是第一次。

后半段是肖邦和李斯特。肖邦是第二号谐谑曲、幻想即兴曲和另一支小品，李斯特是没怎么听过的小品。

肖邦蛮有意思。一点也不再像肖邦，怎么说呢——抱歉，找不出恰如其分的表达方式——滑稽得令人目瞪口呆，全场也掌声四起。鬼气逼人、撼人心魄、百感交集、切肤之美、直击人的本质——根本不是这类东西，然而值得一听。纵使宣称听遍肖邦所有种类演奏之人，听了这场演奏，恐怕也不由一笑莞尔。便是如此快活、新鲜、温馨的演奏。听罢这样的演奏，深感欧洲文化圈到底积淀深厚。

演奏完了仍掌声不息，人们“扑通扑通”猛踏地板，声音震耳欲聋，颇有北欧海盗庆祝什么的味道。加了三四曲，但听众仍不离席。这么说或许失礼，真是白捡的音乐会。之后去啤酒屋喝啤酒、吃香肠，返回宾馆。

翌日在圣方济教堂听风琴、长笛和双簧管音乐会，这个也极有情调（硬木椅，屁股有点痛）。萨尔茨堡一天有五六个音乐会。所以一早起来就去演出导览中心去看当天演出一览表，从中选出自己想听的音乐会即可。既有名人木偶歌剧，又有城堡大厅里演奏的室内乐，每星期在教堂演奏一次莫扎特的安魂曲。有这么多场音乐会，觉得在这里待一星期怕也待不够。运气好用正常价格搞到歌剧的退票也并非不

可能（当然，仅仅是并非不可能那个程度的可能性）。

只是，这个城市雨多。我们逗留期间一直下雨。尽管是8月初，却冷得没说的。身穿全毛的毛衣（由于太冷了，来奥地利后买的），外面套上夹克也还是冷，只好进餐馆喝热汤来温暖身子。买明信片，上面画的是雨中萨尔茨堡，后面写道“以多雨闻名的萨尔茨堡”——想必雨多得上了明信片。睁眼醒来下雨，再醒来仍下雨。不仅萨尔茨堡，奥地利无论去哪里都雨多得不行。觉得无日不看雨。车窗雨刷好像总是“喳喳”响个不停。从萨尔茨堡北上十来公里穿过奥地利同德国的国境，那边晴空万里。而南下一进奥地利，保准又是雨天。看过电影《音乐之声》的人很可能以为奥地利总是天朗气清阳光灿烂，但那彻头彻尾是20世纪福克斯公司[90]式谎言。也许我们不巧赶上了这样的季节，不过那雨下得的确比日本的梅雨还厉害。

雨把我关在房间里动弹不得，在奥地利期间尽看书来着。带去的岩波文库版七卷本《基督山伯爵》全看完了，另在一个名叫Schladming的小镇的一家小书店买了哈米特（Dashiell Hammett）的《马耳他之鹰》（这家书店里我觉得可以看的英文书只此一本），相隔许多岁月又读了一遍。读罢，又读了汤姆·沃尔夫（Tom Wolfe）的《虚荣的篝火》（Bonifire of the wanities）（在慕尼黑一家书店买的）。翻过阿尔卑斯山，住进乡村旅馆，吃薄薄的炸牛排，看窗外下个不停的雨，一边听着牛脖子铃铛的“丁零丁零”声，一边看汤姆·沃尔夫有趣而不无夸张的小说（何以觉得夸张说不清楚，但有趣还是有趣的），如此一天天过去。

在奥地利吃惊而又佩服的是，尽管雨“哗哗”一个劲儿下，但很多人一不撑伞二不穿雨衣，就那样悠悠然满不在乎地走在街上——或许人已进化得适应了气候。另外就是马自达车多得不得了。比之丰田和日产，马自达的数量遥遥领先，不知什么缘故。

在奥地利每天吃好多种东西，但菜名一个地方一个叫法。由于拼写特长，吃了什么都忘光了。当然，每次点菜时看菜单记下菜名倒是可以，却因嫌麻烦而半途作罢。

PRINZREGENTENTORTE

A RTISCHOCKENHERZEN

GESCHNETZELTE HÄHNCHENB RUST

SCHASCHLIKSPIESSCHEN

若把这等菜名一一记在手册上吃饭，你认为能吃出滋味么？我可是不行。一想大学一年级时的德语课就心里沉甸甸的。

我所以一边心想唔这个好吃一边特意记下菜名，是因为在萨尔茨堡吃的是VOLLKORNROLLE。这个菜里面是肉末饼，外面用饺子皮那样的面皮包起来油炸而成。清淡爽口，虽说达不到鼓掌踏地板那个程度，但也绝对不同一般。别的地方看不到，估计是当地特产。即使为了吃这东西，也想再去一次萨尔茨堡。

---

[90] 美国的电影公司。



阿尔卑斯的麻烦事

旅行中总会遇上麻烦。试想，在一不了解情况二无熟人、甚至话都讲不大通的陌生地方惶惶然走来窜去，没有麻烦事才不可思议。若怕麻烦，不去旅什么行老实待在家里租录像带看不就得了——这是正理，是正理且是正论。可是一旦麻烦事实际发生在自己身上，就不那么容易想得开了。正理正论转眼之间烟消云散，化为身后遥远的风景。那东西丝毫不起作用，剩下来的惟有孤零零的自己——面对不确定的未来的、易受伤害的自己。

说来不可思议（也许没什么不可思议），人这东西对于降临在他人身上的灾难想像起来较为容易（说什么就是那么回事嘛，那种事情是有的嘛，本应预想到才是），然而一旦轮到自己头上，其精神追索力便像夏日午后的老犬一样半死不活。例如，你能想像到明天自己会被宣告得了癌症吗？能想像你太太明天跟哪个男人私奔并从银行打电话通知你可以用信用卡提款的账户上欠款达五百万日元之多吗？能把那时的打击和痛楚作为自己的事加以想像吗？

不可能。只有那种麻烦事作为活生生的现实出现在自己眼前时，人才会觉得岂有此理，才会认为不公平甚至发脾气。无一例外，我也如此。

麻烦事发生在8月6日（星期天）上午快到10点的时候。我们早上9点离开德国南端一个叫奥伯摩根的地方，穿过森林中一条国境（有一个警备人员，查看一下文件）进入奥地利。进入奥地利后，云色照例反常起来，看样子任何时候下雨都不奇怪。从奥伯摩根到奥地利一个叫罗伊特的镇约有三十五公里，一路全是景色优美的山路，别名叫蒂罗尔（Tirol）观光道。车也少，幽静，空气清新。有牛群的地方不时有湖泊出现，湖很漂亮，湖面一点垃圾也没有。沿路一块广告牌也见不到，没有House Kukure咖喱的广告，没有三得利纯生啤酒的广告，没有“扒金库”[91]新店开张的广告板，没有“大意一秒悔恨终生”的交通标语。哪座村庄都有塔尖高耸的漂亮的元葱形教堂。因是星期天早上，身裹蒂罗尔服装的老伯们正往那样的乡村教堂集中。游

客们一副登山打扮往山里赶去。这些人看上跟下雨不下雨毫无关系，正毫不含糊地享受着hard[92]的星期天。厚墩墩的云絮从阿尔卑斯的山梁间移往那一带的山谷准备下雨。麻烦事连影儿也没有。阴固然阴，但静谧而祥和——便是这样一个星期天清晨。那里交流的没有任何消极话语——这倒不是保罗·西蒙[93]口中的歌词。

可当我翻过最后一座山、正一面俯视蒂罗尔城一面变速时，引擎突然熄火。怪事！我以为挡没换好，重换了一次，重新猛踩油门，但毫无反应，只是“呼”一下发出无奈的声音，全然搞不清发生了什么。但不管怎样，常有的不祥预感弥漫开来。因是下坡路，加之刹车还灵，心想哪怕下了坡也好，于是缓缓滑下坡去，在看得见人家的地方把车靠路旁停下，然后再次慢慢转动钥匙，启动马达动了，但引擎点不着火。我关掉引擎，隔了五分钟再次转动钥匙，但还是不行，反复几次都点不着火。

下车打开引擎盖，做一个深呼吸，思索启动马达转动而引擎不点火的原因。怎么回事呢？以点火线圈产生高电压，通过分配器把电压分配到点火栓，点火栓发出放电火花点燃混合气——详细道理不大清楚，但作为顺序大体如此。所以，作为原因应该首先怀疑点火栓。可是点火栓能看得见的地方全部好端端地连接着。毕竟是新车，很难设想点火栓会老化。其他的大致查看之下，眼睛看得出的问题点一个也没有。我能想起来的也就这么多了。一筹莫展。本来我就对付不来机械类东西，正因如此，动身前才在蓝旗亚定点厂接受了定期检查，以确保万无一失。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怎么回事？”老婆问。

“不知道，引擎点不着火。”

“怎么一下子这样了？”

“这——，怎么会这样呢？本来不该这样的啊。还不是，刚才还运转得那么正常，根本没有不对头的地方。极常规地从二挡换到三挡，结果突然不行了。难以置信，这可是新车哟！”

“所以我不是说最好别买意大利车么？我就知道会是这样。买日本车或德国车就好了，那样就不至于遭遇这种傻事！”

或许言之有理，或许该买牢靠的大众高尔夫。买蓝旗亚时，包括意大利人在内，好些人劝我最好别买意大利车，可我半是出于好奇

心，还是买了意大利车。怎么搞的！

“所以就这个样子，”老婆说，“星期天早上在奥地利山路上引擎突然寿终正寝。”

不用说，她相当气恼。雨也飘飘洒洒落了下来。得得，我也恨不得发句牢骚：我干嘛非遭遇这等事情不可！这样一来，歪理也罢正理也罢什么都无从谈起了。实在无法相信这么糟糕的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但毕竟不能老这么抱怨下去。老婆只须气呼呼地说三道四，而丈夫必须默默采取对策，此乃世间习惯，或者说是宿命。极不公平的宿命——倒是不好这么说。

首先下车拦一辆过路汽车说了情况。停下来的是挂着博洛尼亚车牌的菲亚特AUTOBIANCHI Y10。两个年轻男子和一个女孩看着引擎盖下面这个那个议论了一番，但他们也不明所以。他们提议送我们去附近的修理厂，可是往车里一看，四个大人，其余的空隙里满满塞着橡皮艇、胀鼓鼓的旅行箱以及行囊等莫名其妙的东西——意大利人典型的休假准备。那种地方怎么还能坐进两个人呢？好意自然非常感谢，但谢绝了。

接下去按附近一家门铃，向那里的太太说明情况，请她打电话给奥地利类似JAF[94]那样的地方。星期天一大早，太太仍一身睡衣，正在准备早餐。她说修理车马上就到，我道谢回到车上。约二十分钟后，车来了，涂成黄色的三菱帕杰罗，一位看样子蛮好说话的老伯从中下来，以意大利方式寒暄道：“GruüB Gott（您好）！”“GruüB Gott”味道很有些像澳大利亚那句“good day”。“怎么了？”此人只会德语。我一手拿着词典，用只言片语的德语好歹介绍说：在那里的坡路上，引擎突然停了。对方“唔唔”两声，用像是万能表的东西这个那个检查了十五六分钟。“电的问题啊，这个。”他说，“这里彻底死掉了，这东西我没有办法，本该给你拉去罗伊特那里的修理厂，可今天是星期天，我想不会开门，不过反正去看看吧。不要紧，去了总有办法。”

这么着，被帕杰罗牵引着赶去两公里外的罗伊特镇。被牵引是有生以来头一遭，气氛凄惨至极。规模诚然大不相同，但仍使我不禁想起在挪威海湾出事的苏联核潜艇。

到了罗伊特镇，修理厂果然关门。毕竟是夏季休假期间的星期天清晨，开门反倒奇怪了。

“怎么办，这回？”老婆说，“说到底，就是因为你想要蓝旗亚……”

“喏喏，”老伯似乎觉察出形势不妙，“这家修理厂的老头儿我认识，我去讲一讲，求他破例开门，放心！”

奥地利JAF老伯非常热情，特意跑去修理厂老板家按门铃，但谁也没出来。

“肯定到哪里旅行去了，没那么快回来的。”老婆说。她这人的性格对什么都比较悲观，而我相对说来凡事都较乐观。非乐观之人不会买什么意大利车。听我一个熟人说，一个在日本买意大利新车的人开着它从东京跑到京都，回来后对经销商一说，对方大为佩服：“你真有勇气啊，居然开那车跑到京都！”是否真有其事我不晓得（很有些都市传说的味道），但情况很可能属实。不是乐天性格的人不会买，还需要勇气。

“别担心，车到山前必有路。”

“有路就好。”妻说。

有路就好，我想。

JAF老伯看样子也是个蛮可以的乐天派，说道：“跟你们说，现在是不在，但我想很快就回来的。回来我就求他开门，在那里的咖啡馆等一下，到时候我去接你们。”相当热情，意大利人办不到。我不是说意大利人不热情，但这点我可以保证：意大利人办不到。至少他们关切之情（如果有的话）不会在星期天表现出来。

“事情要往好的方面看。”我说，“幸亏没在意大利，对吧？在意大利，基本上三天寸步难行。”

“倒也是。”老婆勉勉强强同意。

在罗伊特镇上转了一阵子。老实说，了无情趣。地处德国菲森（Füssen）至奥地利因斯布鲁克（lnnsbruk）的交通要道，以致车多得不得了，一片嘈杂。几乎没有游客特意在这种地方住下，宾馆也少。转了三十分钟，之后在老伯说的咖啡馆坐下等他。喝两杯咖啡等了一个小时，老伯没来。我转而喝啤酒，加吃香肠，又等了一个小时，老伯仍没来。一对双胞胎老太婆进来，坐在我们邻桌喝啤酒，喝

完离去。双胞胎老太婆喝啤酒的情景十分可观。接着两个本地的小伙子进来，喝着啤酒打了一局台球。老伯依然没来。别无他法，又要了一杯不好喝的啤酒。搞得我老是小便。

最终，老伯来时已下午3点多了。我们在昏暗的咖啡馆里等了三个小时。这时间里老婆始终绷着脸。“那种东西扔去哪里算了！”她说。我向她解释：“车那东西不是那么容易扔的。”但她根本听不进去。

“修理厂给打开了，刚才。”老伯说。

谢天谢地。总算舒了口气。老伯把我们领去修理厂，在那里付了奥地利JAF的牵引费，约六千日元。“若是会员可以免费，可惜没会员证。”老伯惋惜地说。的确令人惋惜，我们不是奥地利汽车俱乐部会员。他“通通”拍着帕杰罗说还是日本车好，意大利车不行，买日本车好了！我说谢谢。是要谢谢。

修理厂老板六十岁光景，不愧在修理厂干了四十年，给人的感觉甚是坚毅。这样的人绝不会支持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不会听布莱恩·费瑞（Bryan Ferry），不会去四季电影院（Cine Saison），不会买米索尼（Missoni）毛衣，只知道闷头修理汽车。老伯打开引擎盖，以兴味索然的神情大致往里扫了一眼，开口道：“我儿子会讲英语，叫他来一下。”片刻，感觉上似乎去年刚刚高中毕业的儿子开着十分狼狈的红色菲亚特赶来了。身材挺拔，金发，一个相当英俊的男孩，身穿上下连在一起的工作服，神情像是说“得得大好的星期天叫人家出来”，但看来父亲在家里拥有绝对权力，儿子不敢抱怨。正是贪玩年纪，是叫人可怜，可我毕竟没有可怜别人的余地。大致说明情况之后，他说“唔明白了”，随即开始修理。

可是，无论怎么捣鼓都查不出原因。种种东西拆卸下来，用万能表检查，更换零件，用尽了他能想到的所有办法，但怎么都没奏效，引擎依旧一声不响。一个像是玩伴的小伙子来看情况：“你干什么呢？”“啊，父亲叫我修车。”“哪里坏了？”“噢——喏，这个。”——如此你一言我一语，神色渐渐黯淡下来。然而父亲看样子相当顽固，绝对不向儿子伸出援助之手。我问儿子哪里坏了，也只是应道“唔非常麻烦”。大约折腾了两个钟头，还是毫无头绪，终于沉不住气了，走

去父亲那里大概说道：“爸，我实在弄不明白了。”“知道了，好了，我来。”父亲大概这样嘟囔了一句，言外之意像是说你这家伙怕是够呛。既然如此，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自己动手？我这里还急着哩！无可奈何，各家有各家的招术。他的儿子和同伴又开起菲亚特去了哪里。在这冷雨飘零的阴暗的星期天傍晚、在这望一眼都索然无味的幽灵城，年轻人到底能有什么好玩的呢？也罢，总会有什么可玩吧。年轻时候不管干什么想必都自有其乐趣，再怎么索然无味，也比拆装汽车电瓶有意思。

老伯说，这就看一看，也许花些时间，说不定要今晚7点或明天早上才行。我们只好死心塌地，在这里住一晚上。地方实在不怎么样，如果可能，真不想在这种地方留宿，而且原定今天顺便去跑瑞士，但事已至此，只能作罢。光是星期天有修理厂开门这一点就足以让人感激涕零了。

我们住的是城里最大最老的宾馆。到底老，地板一踩，声音惊天动地（莫非“忍者[95]公馆”不成，这里？），公馆似乎倾斜了，浴室的拉门不拉都会吱溜溜滑开。但房间相当宽敞，格调也算不坏。这家宾馆看样子倚老卖老（此外怕也没什么卖点），一楼大厅齐刷刷挂着一排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自家宾馆照片。那时连自行车都还几乎没有，镇的印象远比现在富有牧歌情调。19世纪的奥地利老伯们全部留着胡须，神气活现。那还是哈布斯堡皇室统治奥匈帝国时期的事。还可找见在城内广场上进行消防演习的消防队老伯们的形象，有人得意洋洋地悬在高楼的窗口上，有人顺着长梯正朝房顶上爬，全都摆着一副架势，显得极为开心。看年代，得知这些照片拍完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开始了，这些人想必也有几个战死疆场。

早已饥肠辘辘，进宾馆放下东西就直奔附近的饭店，喝啤酒，喝牛肝汤，吃火鸡火腿。我原本不大喜欢牛肝和火鸡（累得点错了），但作为菜式相当够味。反正得以坐在椅子上吃饭就足以千恩万谢了。

“好在修理厂开门了。”我喝着啤酒说。

“但愿能修好。”妻一边吃晚饭一边冷静地说。

※

第二天早上（同样下雨）去修理厂一看，所幸车修好了。

“喏，就这个。”老板儿子不动声色地给我们看切断的软皮线。直径约一厘米粗的塑料线。像是被斧头砍的，利利索索地斜茬切断。“连接点火线圈和分配器的软皮线，从这里到这里。这个断了，自然点不着火，被鼓风机皮带卷进去切断的。”

我还没彻底理解：这么粗这么结实的软皮线卷进鼓风机皮带就能利利索索断掉？那岂不有点太过分了？刚刚检修完，怎么就出这种事故了呢？

“这是常有的事故吗？”我问年轻人。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耸耸肩。一个寡言少语的小伙子。于是我自问自答：“常有的话谁受得了！”大概因为配线纵横交错，致使软皮线不太好找，但毕竟点不着火，按理首先该查看点火线圈和分配器之间的软皮线，此乃汽车维修工基本的基本，何况引擎盖打开了两小时之多，本该早看明白才是！想必在父亲眼里，儿子还远远不到火候。

但不管怎样，修好还是修好了，别人家庭的事交给别人处理好了，我道谢付修车费，约两万日元。老板儿子星期天还干活，也够可怜的了，给了他一点小费。

“所以嘛，咬咬牙也该买奔驰。”老婆又啰啰嗦嗦抱怨道。

“算了吧，奔驰是房地产商或棒球选手开的车！”我说（诸位房地产商和棒球选手们，抱歉抱歉，这纯属玩笑，不是什么职业歧视。奔驰不管怎么说都是好车，我开这样的玩笑，不过是因为我买不起奔驰而心理不平衡罢了）。

“反正故障少。”老婆说。

“再不会坏了。那的确是特殊事故，不会再三再四出现的。不要紧了，车况本身并不坏。”我解释道。较之解释，更像是为被妻子讨厌的糟糕朋友辩护。

“天晓得！”老婆冷冷地说，活像在轻度诅咒这辆车。是的——有妻室的人想必晓得——交谈中妻最后一句话大体是这种轻度诅咒。

这天下午，在一座名叫霍尔茨高的富有明信片式牧歌情调的美丽的小村庄附近驱车行驶时，果不其然，仪表盘上的刹车警示灯亮了，陡然现出橙黄色，极不吉祥地。都是她诅咒的！得得得得！进加油站

请人一看，对方说："我说先生，要拿到蓝旗亚指定修理厂好好调整一下刹车闸才行。"啧啧啧啧啧！"修理厂在靠近瑞士边境一个叫阿尔伯施文德的地方，非开去那里不可。开去那里应该没什么问题，反正今天最好调整过来，刹车失灵可不是闹着玩的。"

"奥地利汽车修理厂之旅！"老婆没好气地嘟囔一句。

"事物要往好的方面看。"我说，"这种情况，开德国车无论如何也体验不到的。无故障汽车旅行自是安全，可那终究不过是风驰电掣地从这个宾馆跑到那个宾馆嘛！而开意大利车可以看遍社会每一角落。"是的，不管谁怎么说，我都是天生的乐天派。

如此这般，我们又望着被雨淋湿的牛们和教堂，一路朝阿尔伯施文德奔去，极其沉默地。

关于阿尔伯施文德修理厂没有特别值得写的（顺便补充一句，那以后跑到六千五百公里时，在高速公路飞驰之间哪里一个螺丝突然脱落了，变速杆变得摇摇晃晃）。

---

[91] 一种将球弹起击入孔中的赌博机器。

[92] 意为"艰苦，严峻，猛烈"。

[93] 美国吉他歌手（Paul Simon，1941—）。

[94] Japan Automobile Federation之略，日本汽车联合会。

[95] 日本战国时代（1467—1568）各诸侯国使用"忍身术"刺探情报、扰乱敌人后方或进行暗杀等活动的人。

尾声——旅行结束





尾声——旅行结束

蓝旗亚总算恢复正常，驾驶它再次翻过阿尔卑斯山，南下进入意大利。只要不出毛病，还是十分快意的车。综合大家的说法——意大利车似乎多少有这样的倾向，只要不出毛病，十分快意。这蓝旗亚Delta也是如此。性能不是特别好，低速“吧嗒吧嗒”响，高速稳定性有问题，但以二挡三挡忽一下子加速旋转引擎时的吸大麻般的快感，简直妙不可言。我这人虽不大喜欢开快车，但那种感觉实难舍弃。引擎即刻作出反应，整个弹回身体，很想摸摸它脑袋说“好了好了”。可若是动弹不得，无异于大件垃圾。本来想从黑森林开往斯特拉斯堡，但毕竟对车没信心，遂转念返回意大利。

通过国境检查站，驶入红白绿三色旗飘扬的意大利，不由得舒了口气。说来奇怪，甚至有些觉得像回到了自己的国家。下雨下得忍无可忍，食物的黄油味也呛鼻难闻。风光固然秀美，但若日复一日老看阿尔卑斯、教堂和湖水，再秀美也看腻了。翻过国境山顶，天光都骤然一变，无论什么看起来都明晃晃光闪闪的。歌德在《意大利纪行》中兴奋地写了从奥地利进入意大利时感觉到的明媚，其心情十分理解。意大利实在是为上天所宠爱的土地，温暖、美丽，而且富饶。

从德国和奥地利穿过阿尔卑斯国境线返回意大利时，周围的汽车顿时变得狂野起来。不过狂野也自有其规则和倾向性，习惯了会慢慢觉得理所当然，至少不再有最初感觉到的蛮横。我毕竟是刚拿到驾驶执照就来欧洲的，贴着嫩叶标签在罗马街头兜来转去，兜转之间，觉得开车这事不过如此而已（想来也够后怕的）。所以对我来说，回日本在东京街头的驾车体验和东名高速公路的交通状况，坦率说来要严重得多。

不错，意大利的开车人是够蛮横的，可是开车人脸上和车的行驶都有一个个表情，容易读出动向，相距二三十厘米时可以闪过对方或对方闪过自己。然而回到日本就读不出表情来，因而把握不住火候，十分可怕。而在德国，德国人开车大体遵循阶级社会式的秩序，非常正规。所以，越过国境南下目睹阿尔法·罗密欧和菲亚特鼻尖对鼻尖气喘吁吁的情景，深深感到自己回到了意大利。

回到因休假而空空荡荡的罗马，过了一段安静日子。盛夏的罗马有其他季节所没有的独特风情，路上行人寥寥无几，来往的汽车也少得可观。惟独这个季节那令人头痛的路面停车也全然不在话下，喜欢停哪里就停哪里，悉听尊便。人和车都如此之少的空旷的罗马也分明是座极妙的城市。

我家前面有几辆焦头烂额的菲亚特500，已停了好几个星期。一动不动趴在夏日阳光下的汽车因风吹雨打，早已变得满身泥巴狼狈不堪，有的成了孩子们涂鸦的对象，有的轮胎被放光了气，雨刷上夹着的宣传单变成黄色。想必是太太们平时购物用的车，但它们的主人已带着一家老小开更大的车去休长假了。被置之不理的CINQUECENTO们毫无抱怨（想抱怨也抱怨不来）孤苦伶仃地在路上看着家门。

午后的阳光热得叫人头晕，但一进入背阴处，就凉丝丝的很舒服。时而有热气呼一下子扑来，但除却这点，比日本的夏天好过得多，空调也用不着。午饭后拉下百叶窗大致睡一个小时的午觉，这时间里街上寂无声息。晚上走到外面，在路旁咖啡馆吃granite（果汁冰糕）。提起意大利，一般人喜欢gelato（意式冰淇淋），但我喜欢granite，凉凉的，不很甜，酸得厉害。因为是用真正的柠檬做的，酸是不马虎的，而且随处掺有柠檬籽。一说起意大利，我就想起柠檬granite。

阳光异常晃眼，街上行人全都戴着深色太阳镜。不久，太阳落了下去，人们开始在台伯河畔散步，看见有人在敞篷船上吃晚饭。圣天使堡广场（Castel S.Angelo）的舞台上，身穿花哨衣服的拉丁爵士乐队开始调试乐器。白天热得瘫痪的狗们也终于喘过一口气，这里那里跑跑颠颠。

这个时节无论市场还是副食品店统统关门，买食物要费一番辛劳，去超市也只有冷冻食品、干食品或罐头。头发长了想去理发店，转遍整个罗马城，一家都没找到。这个国家连理发店都休假三个星期。后来回东京，我对常去的理发店里的人说起，对方说他们连正月休息三天都觉得对不起人。若是意大利理发师傅听到这话，一定怀疑自己的耳朵。

过了些时日，这样的夏天也结束了，人们渐渐返回城里，车也开始增多，转瞬之间大街小巷满是车辆，控告并排停车的喇叭声响彻街

头——往常的罗马回来了。我从窗口看着如此街景，写了几个短篇小说。好歹有了写小说的心思。一气写完短篇，搞了几桩翻译。一来二去，我们离开罗马的日期临近了，即将返回日本。

这样，1989年秋天我的海外生活大体告终。以前出国期间总有临时的回国，家具什物都留在家里，但这次全部处理掉了，感觉上算是告一段落。离开日本是1986年秋天，正好在欧洲转了三年。本想好好定居下来，但这本书里也写了，很难找到合适的房子，以致提着电子打字机和收放两用机在南欧到处流浪。

去了各种各样的地方，见了各种各样的男女，遇到各种各样趣事。感触良多，该学的东西也不少。不过说老实话，我们对这种流动生活多少有些累了。一无门路，二不从属任何组织，孤零零的在外国生活远比预想的辛苦。年轻时总可以应付，但我们已不再年轻。我三十七时告别日本，现已年届四十，该打道回府了。



在飞往成田的意大利航空公司飞机上拿起几本久违的日本杂志，但上面只有一则报道：关于宫崎勤[96]的报道。这使我很不耐烦。无论翻开哪一页——左一页右一页——除了宫崎勤犯罪的报道没别的，真可谓清一色。

我离开日本时，杂志上连篇累牍是三浦和义[97]和田中角荣[98]的报道，整个日本都被三浦和田中的丑闻弄得如醉如痴，所有杂志都对他们紧追不舍——三浦去了哪里、吃了什么，三浦和什么样的女人睡了，三浦多么年轻；田中以怎样的姿势举起了哪一只手，田中见了谁、说了什么。这种终端（并且显然毫无意义）的消息经过大众媒体之手，像大小便失禁似的撒得到处都是，而如今他们的消息已杳无踪影。匪夷所思。难道那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回到东京我试问大家：三浦和义和田中角荣究竟怎么样了？但没有人知道，似乎也不想知道。噢，三浦被判了？不清楚啊。田中？这——，还活着吧？



确实，我觉得这三年间变化相当多相当大。我、或者环绕我的环境变化不小，日本这个国家本身也变化不小。其结果，三年时间里我同日本这个国家之间有了某种乖离、有了某种接近。不过就此这样那样写下类似结论的文字恐怕为时尚早，我也不想那么快下结论。

但有一点可以说得很明确：这三年时间里，日本社会的消费速度实在太快了，快得难以置信。久别重归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面对这突飞猛进的加速度，我不折不扣地瞠目结舌，呆若木鸡。这让我想起庞大的掠夺机器。有生命的无生命的，有名字的无名字的，有形的无形的——所有事物、事象都被它接二连三吞入口中，一股脑儿嚼烂，作为排泄物排出去：便是这种巨型吸纳装置。为它提供支持的就是作为Big Brother[99]的大众媒体。环顾四周，触目皆是被咀嚼过的悲惨的残骸，以及正被咀嚼之物的娇音。是的，这就是我的国家，我中意也罢不中意也罢。



从意大利回来不久就去了美国，大约在那里逗留了一个半月，目的是为了策划出版事宜。纽约很久没来了，但并没觉得有什么隔阂，一如原先所预想的那样。当然，我不想久住在什么纽约。不过这里的反应直截了当，因而有的地方反倒感觉不到东京那样的乖离感。

在纽约一家餐馆见了一位美国作家。他刚从日本回来，对一个同伴说："喂，日本人全是雅皮哟！"可我不大明白，日本社会到底什么地方算是雅皮社会呢？我问什么地方雅皮呢？他这样应道："比如日本航空（JAL）的座席商务席比经济席还多，你能相信有这样的飞机？我是无法相信。那岂不发傻，岂不没有实质性？那样的社会太没有深度了。"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他未免过于道德主义了，不过也不是没有道理。

如果说这种镶金镀银的扭曲的模拟社会是雅皮社会，那么日本社会眼下或许真的在朝那个方向努力。一本杂志上一个女孩这样说道：若是宝马，我只想和开700系列的男孩约会，讨厌500，300系列更是穷兮兮的。最初我以为这是一种时髦玩笑，或者是含有双重意味的复杂的口信，然而那既非玩笑又不是口信，而是真真正正的心里话。她

们是当真这样说的。喂，那不就是车吗？我心想。不就是方向盘稍微打歪一点就会撞在电线杆上报销的东西吗？可对她们来说那并非东西，那是明确锁定其存在位置的重要的共同幻想。

我当然不能加以嘲笑。我以后必须在这土地上肩负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大人的责任生存下去，这是先决性的问题。况且我连自己在这里有怎样的发言资格都还不能判断，甚至应该嘲笑什么都不知晓。



回日本后一段时间里，我几乎没能写作，脑袋好像晕乎乎的，重力好像大不一样。差不多一个月时间我基本上糊里糊涂什么也没干。我对处于那个场所的自身资格这个那个想了很多。每天在自家周围跑步，看书，和久别重逢的人喝酒，开玩笑，温泉也去了，可坐在桌前偏偏无从落笔，写了个开头的短篇一直扔在那里。早上起来打开电子打字机，定睛注视屏面，然而大脑一片空白。



这三年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就算经历了许许多多，到头来不还是回到出发点上来了——这样的念头也不是没有。可以说，我是在失落的状态下离开这个国家的，而在年届四十返回的现在，看上去仍和那时一样失魂落魄。无奈仍是无奈，疲惫仍是疲惫，原封不动。乔治蜂和卡洛蜂至今仍藏在哪里不动。一如它们所预言的，只是年龄增加罢了，什么也没有得到解决。

但我这样想：就算重新回到原地又有什么不好呢？更糟糕的可能性都是有过的。

是的，总的说来我是个乐观的人。



我是为了让自己的重力安顿下来做这本书的。修改过去写的随笔，补充新的词句，集为一册。所花时间比预想的多得多，书也比预

想的长得多。

写文章是非常好的事，至少对我是非常好的事。可以将自己最初的想法“删除”什么、“插入”什么、“粘贴”什么、“移动”什么、“更新保存”什么。如此重复几次之后，即可清楚得知自己这个人的思考或者存在本身是何等暂时性的、过渡性的东西。不是说不完整。当然可能是不完整的，但我所说的过渡性、暂时性不是那个意思。

至今我仍时常听见远方的鼓声。安静的午后侧耳倾听，会在耳底感觉出它的回响。有时又想踏上旅途，想得不得了。但我蓦然这样想道：此刻位于此处的过渡性暂时性的我本身、我的存在本身，说到底恐怕即是旅行这一行为。

并且，我哪里都去得成，又哪里也去不成。



这本书的书名，取自开头写的那首土耳其旧时民谣。写这些随笔当中，我已决定成书时用这个做书名。也是偶然，同酒井忠康所著《远方的鼓声——日本近代美术私考》不谋而合。按理应该另想书名，但我对这个书名有很深的珍爱之情，在取得理解后决定继续使用。

另外，此书基本上是采取新作体裁，但有几章以前在杂志上发表过，修改后收入书中。

---

[96] 日本杀害多名女童的罪犯。1989年案发，2006年被处死。

[97] 日本企业家，曾被怀疑枪杀其妻，案情几经反复，2003年被日本最高法院判决无罪。2008年被美国当局逮捕，在狱中自杀。

[98] 日本政治家（1918—1993）。1972年至1974年任首相，因洛克希德事件丑闻下台。

[99] 意为“老大哥”，指极权国家中的独裁者。出自英国作家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



文库本后记

前言中也写了，《远方的鼓声》这本书是1986年至1989年约三年旅居欧洲期间的记录。离开日本长期住在外国是第一次，现在回头读起来，类似兴奋的东西似乎渗出了字里行间，气势那样的东西也可能多少有一些。尽管事情发生在不久以前，但近来我也自己对自己感佩起来：当时到底是年轻气盛啊！若是现在，坦率地说，有许多地方大概不会那样想、那样写。这些文章终究是“那时的产物”，出文库本之际，除了个别行文，原则上没有改动。

从欧洲回来，大约在日本生活了一年以后，因心有所想——解释起来话长，姑且以“心有所想”来表述——我移居去了美国，到写这篇后记的此时此刻，已大约生活两年。在为出文库本而重读此书的时间里，再次感到旅居美国和旅居欧洲的确完全不同。就有趣无趣来说，旅欧期间有趣得多。欧洲有“不知今天发生什么”的刺激性，因而消耗剧烈，有时累得浑身瘫软，但有趣还是有趣的。单单在路上漫步、去超市购物或在高速公路开车都常常会忽然看到意外场面，让人目瞪口呆，每次都切实感到欧洲这个社会高深莫测。

但在美国生活，这种“纯粹的惊讶”就没有欧洲那么多。这个国家，我觉得绝大部分事物都像是建立在可以预测的基础上的。就是说，美国是形形色色的种族和信仰各种各样的宗教的人聚集之后形成的国家，因而若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预测，那么作为国家就难以成立。如果没有眼睛可以看到、嘴巴可以说明的共同观念，那么社会本身就有可能分崩离析。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美国没有多少生活本身的日常性刺激（犯罪刺激固然有，但那种反社会性质的东西是另一回事）。不过，若说美国这个国家是否因此枯燥无味，也很难那么简单概括，其中“可以预测”本身的刺激也是有的。仅仅依靠这类整合性notion（观念、概念）就能使nation（国家）得以成立吗——如果从这一根本疑问出发，对美国一步步加以解析，有些难以解释明白的东西就会浮现出来。关于这点，我打算在另一本书中好好写一写。

写完这本《远方的鼓声》以后，有很长时间没去欧洲。这里所写

的意大利这个国家让我相当气恼，离开时再也不想去了，而在三四年过后的现在却十分怀念，种种景致和男女在脑海中浮现出来，一种期盼随之高涨：啊，那里还想去一次！那东西还想吃一次！意大利确是那样的国家。世间有两种人，一种人“印象极佳，现在却很难想起长什么样”，另一种人“那家伙相当厚脸皮又做事马虎，但现在也能清楚记起长相”。不用说，意大利百分之百属于后者。那个国家迟早还想去一次，久居倒是另一回事。

希腊让我中意的，大概是某种节制性。我们出国期间，日本地价正涨到登峰造极，泡沫现象相伴而生。过些时候回日本一看，不由为日本社会突如其来的改头换面而目瞪口呆。尤其是在希腊那种俭朴的社会中生活过一段时间之后，回日本就像突然被抛进了重力不同的世界，只能怀有“这到底算什么呀”的感慨。这点至今仍然记得。若以体温表示社会状况，那么希腊这个国家是“平温社会”，日本则似乎是“低烧社会”，而在泡沫经济时代似已进入“准高烧社会”，二者落差之大让我多少产生中暑之感。我是小说家，不是评论家，无意对各种现象居高临下地说三道四评头品足，但我觉得我们差不多到了需要来自“平温社会”的视点的时候了。在这个意义上，希腊这个国家以及得以在这个国家生活过一段时间，我想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难得的体验。

去外国，确实让人感到“世界好大”，但与此同时，“文京区（或烧津市、旭川市）也好大”这一视点也是完全存在的。哪一个作为视点我想都是正确的，并且认为，只有这样的微观视点和宏观视点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上，怀有更为正确、更为多元的世界观才会成为可能。如果说我三年时间里通过写这本书有什么体会的话，那便是人应该有这种复合式眼睛。我这个人，无论对什么事，只有在试着写成文字之后才能够准确把握和理解，因此写这本书让我好歹认识和领会了其中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说，这本书对于我、或者对于我的小说乃是重要的记事簿和速写本。一读之下即可得知，里面并没有写什么了不得的东西，也没集中有用的信息，若能读起来轻松愉快，我就心满意足了。

或者，如果哪位读完之后想去长时间旅行，并像笔者这样以自己

的眼睛看各种各样的东西，那么对我这个作者来说可谓莫大的欣喜。旅行这玩意总的说来是让人疲劳的，但或许只有通过疲劳才能获取知识，或许只有通过劳顿才能得到欢欣，这是我通过持续旅行认识到的一个真理。

游记

边境 近境

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东汉普顿幽静的写作圣地
无人岛·乌鸦岛的秘密
横穿墨西哥
从巴亚尔塔到瓦哈卡
做同样的梦的人们
超“有深度”赞岐乌冬面之旅
诺门罕钢铁墓场
从大连到海拉尔
从海拉尔到诺门罕
从乌兰巴托到哈拉哈河
横穿美国大陆
作为一种病的旅行，牛的价格，无聊的汽车旅馆
镇名韦尔卡姆，西部唐人街，犹太人
走去神户

版权信息

书名：边境·近境
作者：[日]村上春树
ISBN：9787532754564
译者：林少华
产品经理：邵明鉴

版权申明

HENKYO KINKYO
by Haruki Murakami
Copyright © 1998 Haruki Murakam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Haruki Murakam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村上春树的中国之行——《边境·近境》与《奇鸟行状录》之间

林少华

村上春树是一位喜欢旅行的作家。用他本人的话说，虽然在日本拥有自己的住所，但不知何故，偏偏无法安居乐业，而宁愿“满世界跑来跑去”。从1986年（37岁）开始，在欧洲住了三年，在美国住了不止四年。这期间创作了《挪威的森林》、《舞！舞！舞！》、《国境以南太阳以西》和《奇鸟行状录》等长篇小说，写了《远方的鼓声》、《雨天炎天》、《终究悲哀的外国语》等游记和随笔。

不过准确说来，村上也并非“满世界跑来跑去”，或者说“满世界”似乎并不包括亚洲。事实上，村上作为亚洲人，亚洲国家他只到过中国和外蒙，而且只有短短两个星期。时间是1994年6月，路线是大连—长春—哈尔滨—海拉尔—内蒙新巴尔虎左旗的诺门罕（一译诺门坎）村，之后绕回北京，路线变为北京—乌兰巴托—乔巴山—哈拉哈河西岸的诺门罕战役遗址。关于此次中国之行、中蒙边界之行的记述，后来收录在1998年结集的《边境·近境》之中。

说起来，《挪威的森林》最初的中译本是1990年4月出版的，到村上来华的1994年6月已逾四年。但那时《挪威的森林》尚未达到畅销程度，村上在中国自然不怎么出名，因此十几年前他的那次中国之行并未引起国人的注意，基本上是作为普普通通的外国旅行者出现的，没有受到任何特殊的接待和欢迎。所以，不妨首先看一下彼时中国在彼时村上眼中是什么样子。

关于火车，村上以其不无辛辣的幽默笔触这样写道：“从大连开始被塞进挤得连厕所都去不成的、堪称中国式混乱极致的满员‘硬座’车（原本计划乘飞机去长春，但航班被无甚理由地取消了，突然改乘火车），摇晃了一夜十二小时，累得一塌糊涂。到达长春站时，觉得脑浆组织也好像随同周围汹涌澎湃的情景而大面积重组一遍。”“中国人满不在乎地从窗口往外扔所有东西，若开窗坐在窗边，有时会遭

遇意料不到的灾难。啤酒瓶啦橘子皮啦痰啦鼻涕啦，各种各样物件从窗外嗖嗖飞过，弄不好很可能受伤，下场更凄惨亦未可知。”关于宾馆：“我转了不少中国城市，深深觉得中国建筑师有一种能使得刚刚建成的大楼看上去浑如废墟的特异才能。例如每次进入面向外国人的高层宾馆——当然不是说全部——我们都会在那里目睹为数众多的废墟。电梯里贴的装饰板张着嘴摇摇欲坠，房间天花板边角部位开有含义不明的空洞，浴室的阀柄有一半两相分离，台灯的脖颈断裂下垂，洗面台活塞不知去向，墙壁有仿佛心理测试图的漏雨污痕。”关于医疗服务：“在哈尔滨，始料未及地跑起了医院——坐‘硬座’的时候，因对面坐的年轻男子开了车窗再不关上，致使异物进入眼睛（不过此君人倒非常友好，我下车时忘了带座席上的随身听电池，他特意跑来递给我）。”为此村上在哈尔滨去了两次医院，两次都不用等待，连洗眼带拿药才付费三元（四十日元）。于是村上感慨：“根据我的经验，就眼科治疗而言，中国的医疗状况甚是可歌可泣。便宜，快捷，技术好（至少不差劲儿）。”

不过，村上的中国之行显然不是为了写上面这样的中国印象记。他几乎没去任何景点，在大连没去老虎滩，在长春没看伪皇宫，在哈尔滨没游太阳岛，而仅仅是路过。较之游客或旅行者，他更是采访者。他的目的地是中蒙边境一个普通地图上连名字都没有标出的小地方：诺门罕。说实话，当年为翻译这个地名，我查遍了手头所有中外地图都没查出。那么，村上要去那么偏僻的地方做什么呢？

这涉及一场战役：诺门罕战役。

这场战役，日本人习称“诺门罕事件”，外蒙称为“哈拉哈河战役”。事件是1939年春夏之交由日军在靠近诺门罕的“满”蒙边境挑起的。关东军投入近六万兵力，结果在以苏军机械化部队为主力的苏蒙联军排山倒海的反击下一败涂地，死伤和失踪近两万之众，第23师团全军覆灭。此后关东军不得不收敛进攻苏联的野心。早在上小学的时候，村上就在一本历史书中看过诺门罕战役的照片。不知为什么，自那以来，那一战役的场景始终萦绕在他的脑际，后来受聘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驻校作家期间，他在学校图书馆里意外见到了不少关于诺门罕战役的英日文图书。翻阅之间，他终于明白了自己一直为那场战役所强烈吸引的原因：“那大概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那场战役的始

末‘实在太日本式、太日本人式’了。”何为日本式、日本人式呢？在村上看来，就是几乎没有人对无数士兵在“日本这个封闭组织中被作为无名消耗品”谋杀掉负责任，甚至吸取教训都无从谈起。即使战后的今天，“我无论如何也无法从我们至今仍在许多社会层面上作为无名消耗品被和平地悄然抹杀这一疑问中彻底挣脱出来。我们相信自己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在日本这个和平的‘民主国家’中得到了保证。但果真如此吗？剥去一层表皮，其中一脉相承地呼吸和跳动着的难道不仍是和过去相同的那个封闭的国家组织或其理念吗？我在阅读许多关于诺门罕战役的书的过程中，持续感觉到的或许就是这种恐惧——五十五年前那场小战争距我们不是并没有多远吗？我们怀抱着的某种令人窒息的封闭性总有一天会以不可遏止的强大势头将其过剩的压力朝某处喷发出去，不是吗？”与此同时，村上意识到那场“奇妙而残酷”的战役正是自己寻求的题材，决心将那场战役作为长篇小说《奇鸟行状录》的一个纵向主轴。“我一边看书，一边把自己带往1939年的蒙古草原。我听到了炮声，肌肤感受到了掠过沙漠的风。”他在《奇鸟行状录》第一部中以64页篇幅（原文）写了同诺门罕战役相关的情节。写完第二部后，《马可·波罗》杂志问他能否实际跑一趟，“那是我早就想去的地方，一口答应下来”。

很明显，村上中国之行或中蒙之行的目的，就在于亲眼看一看作为《奇鸟行状录》题材之一的诺门罕战场。

关于《奇鸟行状录》，这部分为上中下三部、译成中文有五十万字的超长篇小说，对于村上春树可以说是划时代的标志性作品，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JAY RUBIN）称之为“也许是他创作生涯中最伟大的作品”。这部作品无疑是他创作道路的转折点。如村上自己所说，他诸多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主人公总在寻找什么，而《奇鸟行状录》同以前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主人公积极主动地期盼寻找并为此进行战斗”。《奇鸟行状录》通篇贯穿着这种积极性或战斗性，而其战斗性的指向就是寻找和发掘被日本官方掩盖了的另一种历史，即充满邪恶和暴力的历史。而要寻找邪恶和暴力的源头，势必追溯日本对中国大陆的侵略及其犯下的种种暴行。《奇鸟行状录》从寻找冈田亨夫妇丢失的一只庞物猫开始，很快将读者带往蒙古草原和血肉横飞的诺门罕战场。并通过滨野军曹之口点出了南京大屠杀：“在南京一

带干的坏事可不得了。我们部队也干了。把几十人推下井去，再从上边扔几颗手榴弹。还有的勾当都说不出口。”如果说，《奇鸟行状录》的主题是探索和求证当今日本暴力的传承和渊源，那么那场“太日本式、太日本人式”而又被蓄意掩饰的诺门罕战役无疑是一个典型教案。可以说，村上的笔触在这里已触及日本历史最黑暗、最隐秘的部位和当今日本症结的源头所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实际来中蒙边境的诺门罕之前，村上已经写完了涉及诺门罕战役的《奇鸟行状录》的第一、第二部，第三部则是在结束中蒙之行后写的，而恰恰是第三部，成为村上真正的转折点。如果说第一部和第二部仍处于寻找和期待阶段，第三部则真正开始了战斗：用棒球棍将作为邪恶与暴力化身的众议院议员绵谷升打塌头盖骨，主人公的妻子即绵谷升的妹妹也下决心去医院病房拔掉维持绵谷升生命装置的插头——“我必须杀死我的哥哥绵谷升！”杰·鲁宾在他的专著《倾听村上春树》（Haruki Murakami and the Music of Words）中指出：“只有第三部可以说受益于他对这个自学生时期起就一直挥之不去的战场的实地勘察。”

熟悉二战史的人都知道12月7日是美国的“珍珠港日”，1991年12月7日是美国太平洋战争五十周年纪念日。当时村上正在美国，即使普林斯顿那样的大学城也弥漫着反日情绪，几乎成了“反日日”。那天一整天村上没有出门——“那里的气氛很难让日本人出门，很难让自己分辨说自己是战后出生的，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毫无关系。在那里我确实感受到我们必须多多少少持续承担作为日本人的历史责任……换言之，当时我不容分说地被挟裹在五十年前发生的历史事件及其亡灵般的复活气氛之中。此后不久我便越过了界线，被拖进往来于1939年的满蒙边境和现今的东京之间那个不合逻辑的物语之中。”

这样，1994年6月，村上终于来到了中蒙边境，来到了诺门罕，实际站在了哈拉哈河畔1939年展开诺门罕战役的战场——“看上去原本像是坡势徐缓的绿色山丘，但也许因为苏军集中炮击的关系，形状已彻底改变，植被体无完肤，砂土触目皆是。8月下半月在苏蒙联军大举进攻之际展开的血肉横飞的围歼战即那场激战的痕迹在斜坡沙地上完完整整剩留下来。炮弹片、子弹、打开的罐头盒，这些东西密密麻麻扔得满地都是，就连似乎没有炸响的部分臼形炮弹（我推想）也

落在那里。我站在这场景的正中，久久开不了口。毕竟是五十五年前的战争了，然而就好像刚刚过去几年一样几乎原封不动地零乱铺陈在我的脚下，尽管没有尸体，没有血流。”为了不忘记，村上决定拾起一发子弹和一块炮弹残壳带回宾馆，再带回日本。当他半夜返回乔巴山，将子弹和炮弹残壳放在桌子上时，他顿时感到有一种类似浓厚“气息”的东西发生了。“深夜醒来，它在猛烈地摇晃这个世界，整个房间就好像被装进拼命翻滚的混凝土搅拌机一样上下急剧振动，所有东西都在伸手不见五指的一片漆黑中咔咔作响。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是什么正在进行呢？”离开中国以后，那剧烈的振动和恐惧的感触仍久久留在村上身上，并使他为之困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村上开始认为：“它——其振动、黑暗、恐惧和气息——恐怕不是从外部突然到来的，而莫如说原本存在于我这个人的内面，不过是有什么抓住类似契机的东西而将它猛然撬开罢了。”

其实，这一奇特的体验是否属于“超自然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透露和强调的信息：黑暗、恐惧和暴力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终止而终止，它依然活在日本这个封闭性国家体制的内部，甚至活在自己和其他个体的内部，并正在窥伺时机以求一逞，正如前面引用过的村上原话：“我们怀抱着的某种令人窒息的封闭性总有一天会以不可遏止的强大势头将其过剩的压力朝某处喷发出去。”村上紧接着这样写道：“如此这般，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寂静的图书馆和由长春驶往哈尔滨嘈杂的列车这两个相距遥远的场所，我作为一个日本人持续感受着大体同一种类的不快。那么，我们将去哪里呢？”

“我们将去哪里呢？”——日本将去哪里呢？日本人将去哪里呢？自己将去哪里呢？不妨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个疑问和追索期待将村上带到了中蒙边境的哈拉哈河西岸，带到了诺门罕。在这个意义上，诺门罕乃是村上心中的诺门罕。那既是他在历史迷雾中持续寻找的遥远的“边境”，又是他必须日常面对的近在咫尺的“近境”。就此而言，较之一个旅行者、采访者或者一个作家，村上更是一个必须投入战斗的战士。

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边境·近境》这部游记或旅行文学作品所收录的不仅仅是这篇题为《诺门罕钢铁墓场》的中国之行、中蒙边

境之行，还收录了墨西哥之行、横穿美国大陆之旅和神户故乡之行等篇章，或场景描写栩栩如生，充满“新鲜的感动”，或思维的轨迹穿越时空，足以发人深省，文笔或诙谐灵动或沉郁悲凉或娓娓道来——确如村上所说“看写得好的游记比实际外出旅行有趣得多”，但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涉及了。何况，作为译者，理应把“有趣得多”的东西留给读者。

2007年2月23日（丁亥正月初六）于窥海斋

时青岛水仙初谢迎春乍黄

东汉普顿幽静的写作圣地



1991年秋天，一家信用卡公关刊物委托我写一写东汉普顿。我因为要去参加纽约马拉松，正好参加完了去，就答应下来了。搞摄影的松村映三和我同行。东汉普顿固然风景优美，但若说我的个人意见，我却是懒得住在作家聚集的地方——美国也罢日本也罢其他什么地方也罢。



东汉普顿幽静的写作圣地

我一说要去东汉普顿，几个出版方面的熟人当即举出当地居住的熟识作家的名字，叫我务必前去见见。出版社负责宣传的吉里安举出的名字是汤姆·沃尔夫[1]、戴维德·勒维特、E·L·多克托劳[2]。《纽约客》的编辑林达·亚莎举出了卡特·冯内古特[3]的名字。吉里安和林达都是纯粹的纽约客，但都在汉普顿有房子，这些作家是住在其附近的熟人（遗憾的是，冯内古特也好多克托劳也好勒维特也好这回都未能见上。同汤姆·沃尔夫后来倒是在纽约见到了）。

总之，对于舞文弄墨的人来说，东汉普顿这地方类似某种圣地——这么说或许有些夸张，总之有许多作家在这里有房子。自不用说，其大半是成功作家（东汉普顿的地价相当高）。东汉普顿喜好成功作家，成功作家也喜好这个地方。在这个意义上，对于美国作家来说，这里或许是后天的、便宜的圣地。

作为高级避暑地为文人所喜欢的，在日本有轻井泽和镰仓一带，而实际前往东汉普顿一看，其漂亮程度和规模之大，即使轻井泽和镰仓加起来再放大一倍也远远无法相比。来到这样的地方，同样要为美国这个国家积蓄资本的巨大所折服。

东汉普顿位于长岛的东边，距纽约正好一百英里，开车两个小时多一点即可。若有余钱，租直升飞机半小时就到。若更有钱，也可以开私人喷气式飞机前往。当然，作家这类人是不那么有钱的，所以大体驱车往返。他们之中的多数在纽约市内拥有公寓套间，有工作就来纽约，工作完了就回汉普顿悠然写作，这是在此居住的作家的基本生活模式。以前我在纽约见约翰·欧文时，他告诉我在汉普顿和纽约往返的汽车上听狄更斯小说的朗读磁带来着。“毕竟时间长，路上听那样长度的磁带正合适，”他说。不过，欧文氏现已移居加拿大（看来他不中意美国这个国家），正在卖房子。“怎样，村上你不买？”他笑道。

在汉普顿有房子的不但是名作家，也有其他方面很多名人，如拉尔夫·罗兰、斯蒂芬·斯皮尔伯格[4]、彼利·约埃尔、卡尔文·克莱因、罗

伯特·德尼尔、保罗·西蒙[5]等等，不胜枚举。

东汉普顿大多是这类“又新又软的有钱名人”。但这些有钱又有名的人士来此居住一般是在夏天（他们当然是在私人海岸悠然自得地游泳），偶尔在周末或感恩节、圣诞节来一来，其他时间住在城里。每到夏去秋来落叶纷飞时节，剩下的只有当地居民和只要有打字机或电脑在哪里都能写作的那类作家。

“这是个很好的模式。”住在东汉普顿的作家彼得·斯威特说，“一年中的大约一半日子，这里到处是人。有晚会，人们走来串去，热闹得不得了。不久，到差不多厌倦了的时候，正好秋天来临，人们统统回城，而我们留下静静写作。谁也不来找麻烦，什么干扰也没有。而在渐渐觉得这样的生活单调起来，希望有什么刺激的时候，正好5月再次到来。你不认为这对作家很理想？”

在东汉普顿，作家每两周开一次会。所谓开会也并非搞什么特殊活动，不过是住在这一带的作家相聚吃喝罢了。“有各种各样的作家，”他说，“巴德·舒尔伯格（剧作家，菲茨杰拉德小说《美梦破灭》的改编剧执笔者）、皮特·哈密尔（不久前离开了这里）、达特逊·莱达，还有许许多多。下次开会是明天晚上，你也一定要来。”遗憾的是，我明天早上必须赶往纽约，没能参加那个会。

从东汉普顿开车往北行驶二十分钟左右，有个叫萨格·哈巴的港城，汤姆·哈里斯（《沉默的羔羊》）、多克托劳、品特罗等人住在这里。纳尔逊·阿尔格伦（《漫步荒野》、《拥有黄金手臂的人》）也曾在此居住。向我讲起阿尔格伦的是经营“卡尼欧书店”的卡尼欧：

“十一年前在这里开旧书店的时候，一天关门时来了一个两眼放着凶光的汉子，贼溜溜地在店里看了一圈——他就是阿尔格伦。

“‘喂，你就把这个叫书店？我家卧室书架上的书比你还多！’说罢就回去了。不料三天后，他把快抱不过来的书抱了过来，并且这么说道：‘喏，把这些摆上卖了！’倒是个痛快人。芝加哥出身的莽汉，总之粗言粗语不讨人喜欢，可心地非常善良。”

当时的阿尔格伦是个被遗忘的作家，年轻读者几乎没人看他的小说。他在这个多少保留着作为捕鲸港的昔日荣光的萨格·哈巴小城像隐士一样生活着，但在卡尼欧的书店召开其作品朗读会的时候，店里听众挤得满满的，这使得阿尔格伦心里充满了幸福。

“两个星期后阿尔格伦死了。”说着，卡尼欧摇了摇头。

我住在一家名叫“THE PINK HOUSE”的旅馆里，主人罗恩是个年轻的建筑师。他买了位于东汉普顿头等地段的这所旧房子，自己改建成了旅馆。“女朋友苏一眼看见这房子就说要在这里开旅馆，两年前的事了。”他说，“在她的劝说下开始了这个买卖。改建的事彻里彻外是我做的，从揭墙纸到配管配线、涂漆，全我一个人包了。”

如果说打理房子是罗恩的职责，那么苏的任务就是做饭。她做的早餐十分了得，胡萝卜、面包、脆皮松饼、葡萄干全麦饼、薄煎饼，全是她亲手做的，非常可口。这里是所谓Bed and Breakfast[6]，只管早餐，但每天的早餐确是一种享受。

这家旅馆另外值得一看的是家具等用品。“为开业特意买的东西几乎没有，用的全是我们以前搜集的或从祖父母那里继承下来的东西，结果气氛十分沉稳。”看了这些东西，我不能不承认美国社会的某种健全性——买下18世纪建造的房子，自己动手里外翻新，再用亲手收集的家具等家居用品装扮一番，端上自己做的实实在在的饭菜。以日本说来，大约就是从公司离职的简易旅馆经营者，但在罗恩和苏身上看不出自负之处，就像把过去极其自然而然地承袭下来一样。这让人心情愉快。

“感觉上与其说是旅馆，倒不如说是在自己家里招待客人，所以也不怎么做广告。房间里没有电视没有电话。大家来了，在客厅和餐厅里能像在自己家里那样放松下来就行了。前不久还在这里集中留宿过参加斯皮尔伯格婚礼的客人呢。那时真够开心的。罗宾·威廉斯啦马丁·肖特啦罗布·劳啦，那样的明星坐在那里的客厅一起喝酒，听音乐，唱歌。那才叫不同凡响咧！”

到了10月，东汉普顿街头大凡可称为娱乐的东西统统没了，往下只有看书或写作。看腻了写烦了，只能散步。不过还好，这里确是散步的理想场所。地方有点儿过大，像在轻井泽那样骑自行车往来兜风怕也不坏。有各种各样有名的宅院，有许许多多有名人物住的房子。有上个世纪20年代建成的林格·拉德纳的有名的宅邸，有萨拉和杰拉尔德·迈菲住的粉红色房子，有菲·唐纳薇的房子（菲向镇议会申请在自

家院子修游泳池而未获批准，一气之下，前不久离开了）。紧挨卡尔文·克莱因的房子的，是斯皮尔伯格的房子。

为什么名人如此集中住在东汉普顿呢？是什么把他们吸引到东汉普顿的呢？这是个极难回答的问题。我来东汉普顿也这样问了很多见到的人，回答委实五花八门：地理之便、风景优美、环保到位、治安良好、人文景观。最能说服我的是这样一种回答：“名人反正就是喜欢和名人在一起，对他们来说，这好像是最能让人放心的。”或许是这样的，我想，惟其如此，圣地才得以存续到20世纪，在21世纪也将存续下去。

---

[1] 美国新闻记者、作家（Tom Wolfe，1931—）。

[2] 美国犹太裔小说家（Edgar Lawrence Doctorow，1931—）。著有《延迟时间》等。

[3] 美国小说家（Kurt Vonnegurt，1922—）。著有《自动钢琴》、《母亲之夜》等。

[4] 美国电影导演（Steven Spielberg，1947—）。执导有《大白鲨》、《外星人》等影片。

[5] 美国歌手（Paul simon，1941—）。

[6] 意为“住宿加早餐”。

无人岛 · 乌鸦岛的秘密



1990年8月。说起无人岛，脑海中难免浮现出带有某种浪漫和冒险意味的岛，可那太一厢情愿了。一读您就会明白，实际上是相当“糟糕”的玩意儿。同行者是松村映三君。这篇文章发表在《Mother Natures》杂志上。热情接待我们的岛的主人村上先生几年后去世，乌鸦岛那以后怎么样就不知晓了。



无人岛·乌鸦岛的秘密

乘船游览过濑户内海的人想必晓得，濑户内海的岛实在多得数不过来。从大的淡路岛到小得地图上几乎不出现的，反正到处是岛。不过岛再多，若提起为个人所有的岛，数字也少得惊人，这点我以前倒是不知道的。

那么，那些岛到底是谁的呢？大部分好像为自治体所有，或者为若干人共同拥有。希腊有几座岛由以奥纳西斯[7]为首的超级富豪作为另一处住宅所拥有（带游艇码头和直升机场，未获许可当然不得进入），夏威夷的尼豪岛长达几十年绝对不许外人上岛，作为固守往昔生活方式的顽固的“锁国岛”而闻名，可是濑户内海不存在那种富有个性我行我素的岛，尽管我觉得有一两个也未尝不好。

位于山口县的乌鸦岛是为数不多的难得的私有岛之一。拥有这座岛的是一位姓村上的，遗憾的是此村上同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村上先生住在乌鸦岛的对面。原本是老字号酿酒铺的主人，如今停业了，在面对大海的古老大宅院里修补古书，过着优哉游哉的隐居生活。

乌鸦岛就在村上宅正对面大约八百米远的海湾里，面积为六千坪[8]。别以为只隔八百米，游过去也没关系。这一带在全国也以潮大闻名，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游的，仅限于涨潮和退潮没有潮流的时候才能游。涨潮时游到岛上，在那里等一阵子，等退潮时游回来。或者反过来也可以。过去这一带的孩子若能游到岛上再游回，就被认为是长大成人了。只是，岛上没电没煤气没自来水，全然没有，住的人也一个都没有，即世人所说的无人岛。

人虽不住，但岛上立有一座若山牧水[9]的大歌碑。歌碑平时孤零零浮出水面，退潮时可以从岛上步行过去。蛮好的歌碑，极有情趣。上面刻有一首和歌：“寂寞乌鸦岛，绿荫白浪黑石礁，船近观千鸟”。歌是牧水在村上家（父辈村上）逗留时吟咏的。村上家是所谓地方名门，同文人代代交往，同牧水交情尤深，这次我也有缘在村上家逗留。我固然也是以写文章为业的，但远远不敢称为文人，即使搞摄影的松村君——这么说是不大好——怕也很难说是文人。

我们这回所以跑来这里，是从村上先生一个和我老婆有私交的亲

戚那里听到这座乌鸦岛的缘故。拥有一座六千坪之大的无人岛，却又别无用场，扔在那里不闻不问，此事到底非同一般。虽说是一座岛，但以换算成日本通货的资产价值而言，也许北青山[10]的一个公寓套间的价值更高一些，但此是此，彼是彼，艇是艇，fuck[11]是fuck（没看过电影《舍利·瓦伦丁》[Shirley Valentine]的人怕不明所以）。我想，拥有一座岛的人生和在北青山拥有一个公寓套间的人生无疑是不相同的。如此思来想去，渐渐涌起了上岛一看的念头。如果可能，想拿钓鱼竿在岛上住几个晚上。在日本，夜宿无人岛实行起来非常困难，有机会很想尝试一下。这么一说，村上先生回复说那么请过来就是，于是欣然前往。

但不管怎样，一个人去无人岛还是有些不安，便邀搞摄影的松村君同行，松村君满口答应：“一块儿去好了！”事情当即敲定。

“不过得多买咖啡过滤器才行。”他说，“无人岛上没水，需要咖啡过滤器。”

“这是为何？”

“要把海水过滤成饮用水，是吧？”

这么一说，我也渐渐为这个那个事情不安起来，沉思了好一阵子。不过好歹还是把帐篷、塑料桶、睡袋、食品、餐具等物品备齐了，装车上路，冒着刮得正紧的台风往山口县赶去。

当天先在村上家住下，翌日上岛。台风刚过，风平浪静。一大早就坐附近一位老伯的渔船大致绕岛一周，然后在岛上惟一的沙滩卸下行李。岛上此外还有一处漂亮的沙滩，但涨潮时被水淹没。这里涨潮落潮之差非常大。岛上当然没有码头，只能像诺曼底登陆时那样，扛着行李在海水中“扑通扑通”蹚水。海水清澈得令人吃惊。

说起登陆战，听说二战期间陆军还真在这海滩上作过登陆战演习。在军方申请用来军训的时候，村上家曾把小岛交给了国家。但战争结束又归还了，前面说的歌碑就是军方为答谢村上家而建造的。虽然世上歌碑不知多少，但陆军建的歌碑似乎仅此一座（想必）。岛小是小，但再小的岛也自有其复杂的历史。

岛的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原生林，人几乎不能涉足。竹子多得很，战争期间有专人来砍，现在没人肯费这番周折了。树木密密麻麻，一般人很难进到里边。林中有大白鹭垒了好几个巢。白鹭大得离谱，第

一次目睹时不由瞠目结舌，竟误以为是鹳，便是大到如此程度。我们的船靠近时，它们很不耐烦地“扑愣扑愣”猛飞起来，仿佛在说讨厌呀、你等何苦来此！后来落在树枝上敛翅歇息。岛简直成了野鸟天堂，有鸽子，却无老鹰。不用说，乌鸦——一如岛名——也有。鹭和乌鸦同栖一林，看起来很有点儿像奥赛罗游戏[12]。

林中除了鸟还有什么谁都不晓得。有人说有蛇，但无确凿证据。也有人说某人带来兔子放了进去，这也没有实证。林中不时分明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估计是鸟，但究竟有什么不得而知，反正情形有些让人放心不下。

行李全部卸完后，船返回港口。村上先生特意乘船一同来岛。

“真的在这里宿营三天？”分手时村上先生再次叮问。

“嗯，如果可能，想待上三天。食品和水都准备好了。”我说。二十升容量的大桶水两桶，矿泉水半打，应该足够用了。

船走后，四周好像彻底静了下来。距本土不过八百米，房屋举目可见，往来渔船也能见到。所以我想，倘有什么，一招手或大喊一声就可得到帮助。说是无人岛，其实很大程度上是面向初级探险者的无人岛，同动漫中出现的只长有一棵椰子树的无人岛大异其趣。话虽这么说，无人岛终究是无人岛。除了我们的确一个人影也没有。这么一想，两人突然奇妙地沉默下来。

不管怎样，先撑起帐篷再说。随后扑入海中：这回可要大游一场了！无浪，水又漂亮，心情舒畅极了。不料刚进海湾口就给水母蛰了一下。我一向不喜欢水母。高中时代远游时曾游进水母群，心脏当时差点儿停止跳动。慌慌张张游回岸边一看，双腿肿出一条条蚯蚓般的红痕。时近秋季，又是台风过后，正是水母出动的时节。只好怅怅地放弃游泳，一丝不挂躺在礁石上享受日光浴。这也是在无人岛务求一试的活动之一。我特喜欢脱光身子——有什么好遮掩的呢——从头到脚任凭太阳晒个遍。不试不知道，这玩意真叫舒坦。可惜在日本只有无人岛上才能得逞。靠着礁石，一边看安妮·比蒂的短篇小说（至于是否适合赤条条在无人岛阅读自是很成疑问，无奈只带此一本）一边悠悠然晒太阳，晒了两三个小时。岛和本土之间不时有中型货船和渡轮驶过。阳光很强，周围景致扑朔迷离，温情脉脉，呈现出濑户内海特

有的情调。我已彻头彻尾放松下来：喏喏，活该！至于针对谁我也说不准，反正心情变得放荡不羁，很想这么一吐为快。这怕也是无人岛的一种效用。

吃罢午饭，钓了一会儿鱼。我们准备了钓白丁鱼的直抛式钓具，但实际一试，却因是石头海底，钩子当即刮住，全然无计可施，只好放弃。结果，游泳和钓鱼全都泡汤。烤白丁鱼也没吃着。现实这玩意很难让人顺利得手——我们本以为游游泳、钓钓鱼，三天一晃儿就过去了。看来我们不适合钓鱼，上次在土耳其黑海沿岸钓鱼时就一条也没上钩。这么着，往下只能不屈不挠晒着太阳看安妮·比蒂了，而这一旦天阴下来也只能作罢。

我们的悲剧从这时开始慢慢上演，命运的指针一味朝着不顺利的方向摆去。

4时退潮，礁石露出，我们决定步行绕岛一周。松村君说想照相，我也想转一圈看看岛什么样。除了极小一部分，岛的周边全是陡峭的石崖，要转只能在退潮时转。退潮时，在探出海面的礁石上蹦蹦跳跳，行走如飞。但别的地方还得脱鞋进入水中。松村君把莱卡相机挂在脖子上准备照相，岂料入水刚一迈步，脚底板就被牡蛎壳霍地划出口子，条件反射地手拄旁边礁石时手心又被一下子划开。众所周知，牡蛎壳那东西着实锋利得很，而无人岛北侧的礁石上布满牡蛎。

血出了不少，赶紧回帐篷处置。消毒，缠绷带，但伤口相当深，血怎么也止不住。大体带了一套急救用品，但无论用来消毒还是用来包扎，量都没那么多。这种时候无人岛可够伤脑筋的。又不能游泳去药店。这还不算，宝贝莱卡也泡在海水里完蛋了。那可是爱不释手的古典莱卡相机，里边还有照完的胶卷。“糟糕！”“啊，不怕的。”——这么说的时间里，天黑了下来。不一会儿虫子出来了。

虫子！

从傍晚吃饭时开始，我就觉得虫子多得不行，但那时没怎么介意，心想毕竟是无人岛，虫子总会有的，一边拨掉一动一动爬上身来的虫子一边吃饭，吃罢看着暮色中的大海喝酒。但随着四周天色变暗，虫子如启示录[13]一般多了起来，形形色色。先是海蛆。这些家伙白天就满礁石都是，但没爬来这里，不料天黑后大概来了勇气，来了相当不少。不用我说，海蛆并非让人亲近得来的虫类。其次是长腿

蜘蛛模样的家伙，四下里一忽儿一忽儿飞来飞去。危害倒像没有，但被这些东西围拢起来到底令人不快。再往下就是类似草履虫的家伙了，有太阳的时候它们在沙土中蜷身大睡，一到日落天黑就一伸一缩爬上来找吃的，密密麻麻。想必是平时压根儿没人来的地方有人来吃东西，食物把虫子引了过来。

打开手电筒一照，发现虫子已无孔不入。食品袋子也好背囊也好照相机盒也好餐具也好帐篷也好，都有虫子大举进攻。我们慌忙把要紧的东西收进密封式帐篷，将已经侵入的虫子赶走，然后窝在帐篷里一动不动。看见那么多虫子，完全没了外出的心绪。帐篷狭小闷热，这样的地方关进两个大男人，一点趣儿也没有，可出去又有虫子。虫子们连帐篷顶端都聚了上去，在头上沙沙、沙沙发出令人不寒而栗的声响。到了夜晚，这些小小的夜游生物便统治了地表。我们是这个世界的入侵者，牢骚发不得的。虽说小，但无人岛自有无人岛特有的独立生态系统。白天感觉不明显，而到日暮黑透，我们就被它们团团围在中间，于是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到了它们的存在。我们软弱无力，无处可逃。夜间是它们的世界。我不由想起布莱克伍德[14]的《多瑙河的柳林》。

之后，潮水在夜深时分“哗啦哗啦”涌了上来。前面说过，这一带潮水涨落之差非常大。因为晓得这点，所以把帐篷支在沙滩最里端。尽管如此，潮水还是涨到帐篷脚下。我睡觉一般很实，然而似睡非睡中听到了潮水逼到脚前的声音，到底放心不下。不过毕竟天生的容易睡熟，心想管它呢，随它怎样好了，兀自睡了过去。松村君担忧得几乎没睡，够可怜的。莱卡掉进海里，手脚划了口子，虫子袭扰，彻夜未眠，好事一桩也没有。

天亮之后，虫子们了无踪影，但见沙滩上留着草履虫钻入的无数小孔。试着用锹一挖，昨晚的那些家伙正在很深很深的地方蜷身大睡，放到亮处一看，慢慢蠕动着又挖孔钻入地下，仿佛在说什么呀烦人别打扰人家！我心想烦什么人？装蒜（渐渐变得没了品位）。本打算统统挖出来出口恶气，但挖着挖着又觉徒劳，于是再次脱光身子，接着看安妮·比蒂。

上午村上先生坐渔船过来。

“怎么样？可有什么问题？”他从船上向我们打招呼，是放心不下

特意赶来的。

我和松村君再没情绪和虫子们住一晚上了，两人意见完全一致。再说伤口也让人有些担心。

村上先生一五一十听罢，答说海里的伤口用海水一洗就干净了，应该不要紧的，虫子倒是还可能来。这样的想法的确也成立，但无论我还是松村并非坚决前来寻求艰苦的体育磨练的，我们是打算悠悠然歪在无人岛沙滩上想入非非，再不想两个大男人在被虫子围得风雨不透的闷热的小帐篷里一连困上几天，于是请村上先生傍晚开船前来接回。倒是够对不起他的。

船离去后到傍晚之前，我们再次绕岛一周，松村君用另一架佳能相机照了相。那时间里我观察了石滩生物。退潮后，石滩上的生物实在是多种多样。它们在干什么我不知道，总之到处慢腾腾地爬来爬去。海葵啦虾蛄啦海螺啦见所未见的虫子啦螃蟹啦都在拼命活着。仔细看起来真是百看不厌。昭和天皇好像乐此不疲地观察了这些活物好长好长时间，它们身上确有一种容易让人忘情的地方。愣愣地注视之间，时间很快过去了。说不定驾崩的先帝也曾这么看着石滩生物放松身心，久久回不过神来——且容臣村上诚惶诚恐地如此妄自推断（敬语可该用这个？完全没有自信）。

如此一来二去，太阳步步西斜，黄昏渐渐临近。正当在地下安眠的数万条草履虫窸窸窣窣地伸着懒腰准备爬上地面的时候，村上先生开渔船来接了。把行李装上船，最后再次请他开船绕岛一周。大白鹭依然在岩石上怡然自得地歇息，见我们靠近，赶紧“扑愣扑愣”飞起，给人的感觉似乎是说“什么呀什么呀，怎么又来了，莫名其妙！”船离岛之后，那里重新回归无人岛，重新成为草履虫、石滩生物、林中栖居的什么以及白鹭和乌鸦的领地。岛在法律上归村上先生所有，但对于“乌鸦岛居住生物”的各位居民来说，法律问题全然不在话下，Hey Man[15]， fuck of[16]，与己何干！岛终究是它们的。法律是法律，无人岛是无人岛。艇是艇，fuck是fuck。

这么着，虽然遭遇了种种出乎意料的灾难，但无人岛毕竟是奥妙无穷的地方。虽是面向初级探险者的无人岛，却同样有其独特的冲击力，这点务请日后计划夜宿无人岛之人——这样的人全日本能有几位自是无从推定——牢记在心。不管怎样，给山口县柳井市伊保庄的村

上先生添了一场大麻烦，不知如何感谢才好。

---

[7] 希腊实业家，船王，著名富豪（1907—1975）。

[8] 日本土地面积单位，每坪约3.3平方米。

[9] 日本歌人（1885—1928）。著有《海之声》、《别离》等。

[10] 位于东京中心区，为黄金地段。

[11] 性交的隐语。

[12] 台面游戏的一种。64张圆牌表里涂成黑白两色，两人在64目盘里互相挟击，取目多者为胜。

[13] 《圣经·新约》的最后一章。

[14] 英国幻想小说家（Algernon Henry Blackwood，1869—1951）。

[15] 意为“喂”（男人间比较随便的招呼语）。

[16] 意为“滚蛋”。

横穿墨西哥



1992年7月。前半段我一个人乘大巴旅行，中途同松村映三君和兼做我翻译的阿尔富雷特·伯恩巴姆——两人驱车从新泽西州远远赶来——汇合。文章载于《Mother Nature》杂志。旅行结束后不久，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附近发生了原住民大规模叛乱，其后也不断发生暴力事件。那般悠闲的旅行恐怕不可再得。不过，墨西哥是个非常吸引人的地方，迟早还想去一次。衷心祝愿和平返回当地。



从巴亚尔塔到瓦哈卡

在墨西哥旅行了一个月，那时间里碰到的几个人都问我“你为什么来墨西哥”，每次都问得我有些困惑。因为我觉得问话里含有一种微妙意味，仿佛说我何苦选择墨西哥而不是其他国家作为旅行目的地。这以前我游逛了几个国家，记忆中几乎从未有人提出过如此在某种意义上未尝不可以说是本源性的疑问。例如，无论在希腊还是在土耳其抑或德国，基本没人问“你为什么来希腊（或土耳其、德国）”。总的说来，他们似乎认为人们来自己国家旅行是理所当然的。我以为这是相当地道的想法。为什么呢？因为我是旅行者，而旅行者无论哪个地方都要去的。正因为有他或她提着包买票前往某个地方，旅行才得以成立。对吧？假如旅行者必然去某个地方，那么他为什么就去不得土耳其或希腊或德国抑或墨西哥呢？

从这样的语境说来，那么对于“你为什么来墨西哥”这一问话，我甚至可以反问——不失天真地反问“我为什么不可以来墨西哥呢”。为什么人们不可以在不怀有能够诉诸书面语言的理由或目的的情况下到访墨西哥呢？

比如说，如果向来日本旅行的外国人提同样的问题（你为什么来日本旅行），想必会得到各种各样的回答。但是——当然前提是去掉因某种不得已的缘由而无论如何都必须来日本的人——归根结底，其回答只有一种，即他们想以自己的眼睛看那个地方、以自己的鼻子和嘴巴吸入那里的空气、以自己的双腿站在那个地面上、以自己的手触摸那里的东西。

保罗·塞劳的一部小说有个场面，说一个来到非洲的美国女孩讲述自己为什么满世界跑来跑去。很久以前看的，具体词句记不准确了，错了请原谅。大致内容我想是这样的：“会在书本上读到什么，会在照片上看到什么，会听到什么，但我若不亲自去那里实际看看就理解不了，心里就不踏实。举例说，我不能不用自己的手摸一摸希腊卫城的柱子，不能不把自己的脚浸入死海的水中。”她为了触摸卫城的柱子而到希腊去了，为了把脚浸入死海而到埃及去了。她没办法停下来。她去埃及登金字塔，去印度顺恒河而下……也许你说那么做并无

意义，何况还是没完没了的。可是，若把各种各样的表层理由一一抽掉，旅行就无从谈起了。说到底，我想这恐怕就是旅行所具有的最正当的动机和存在理由。没有理由的好奇心。对现实感触的希求。

不过墨西哥的情况略有不同。旅行前我同一个美国新闻界人士交谈，告诉他往下自己要去墨西哥旅行四个星期，他给我这样一个忠告：

“到了墨西哥，他们肯定问你出于何种理由来墨西哥旅行那么长时间。”

“唔。”

“到时候你这么回答即可，”他以认真的神情说，“就说自己准备写一本关于墨西哥菜的书。记住了？墨西哥菜！这是能得到他们理解的惟一理由。这样就会一帆风顺。”

“原来如此。”

“不过这里边也有个小小问题。”

“什么问题呢？”

“一旦说起墨西哥菜，他们会永远说下去：我母亲的拿手菜如何如何，我奶奶的拿手菜如何如何……”

结果，我决定不提写一本关于墨西哥菜的书这个话题。

在瓦哈卡偶然碰到一个日本女孩，在广场前面的咖啡馆和她边喝冷啤酒边闲聊的时候，她问：“来到墨西哥的感觉，你还没怎么有吧？或许该说是不适合吧。你为什么选墨西哥作为旅行目的地呢？”

经她那么一说，我渐渐觉得自己这个人真有可能不适合墨西哥这个国家。越想越觉得自己这个人是由于错误动机来到错误场所的错误存在。说老实话，迄今为止我本身并未觉得墨西哥这个国家同自己之间有什么隔阂。而一旦介意，隔阂感的可能性简直就像癌细胞一样异常迅速地繁殖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我完全不具有足以反驳的理论根据——不能说“没那回事，我并非不适合墨西哥的人”。我只是像塞劳小说中的女孩那样，以就是想看看它、就是想摸摸它这一单纯的理由去了“那里”来了“这里”，是“想去墨西哥那地方看一眼”这一简单的心情把我带到了这里。

不过，这样的回答（无论回答得多么真诚）大概是不顶什么用

的。我想，恐怕需要更有说服力的回答。在墨西哥旅行期间我始终有这样的感觉。事实上我在墨西哥遇到的外国人大多具有自己此时、如此置身于墨西哥的明确理由。居住在墨西哥的理由，游览在墨西哥的理由，为墨西哥这个国家所吸引的理由。有人为阿兹台克和玛雅文化及其遗迹如醉如痴，有人为墨西哥的美术心往神驰，有人对墨西哥的自然风物一往情深，有人为墨西哥人之所以为墨西哥人的墨西哥性深深折服。某种美国人将墨西哥作为同某种美国性相对立的存在加以把握，某种日本人将墨西哥作为同某种日本性相对立的存在予以解读，他们讲述墨西哥时带有一种特殊的眼神。每次遇上那些人，我都强烈而深切地认识到自己身上日本意识的缺失，甚至产生类似愧疚的心情。在这个意义上，墨西哥未尝不可以说是个奇妙的国家。

我开始认为，这个国家有可能在护照和观光卡以外，要求入境者提供某种有明确目的的东西，那是能够用语言表明和说服他人的明确目的，例如说一句“好的，明白了，原来你是为此来这里的”，而后“砰”一声盖上印章。如果解释说“不不，我是想看各种各样的东西，不管哪里都要亲眼看一看，不看怎么知道是什么样的”，在这里几乎是无法让人理解的。当然，如果是乘喷气式飞机前往阿卡普尔科和坎昆等旅游胜地游泳三四天后直接返回，那样的旅行另当别论，而像我这样花上一个月时间慢慢观看寻常的墨西哥，这样的旅行势必需要提供更加明确的理由。

不过，并非自我辩解，我的人生——我想也不仅仅限于我的人生——是由无限偶然性大量堆积而成的。一旦越过人生某个点，我们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把握其堆积体的模式，从那一模式中觅出某种个人含义。而且，如果我们有意，我们还可以将其命名为理由（reason）。然而，纵使那样，在根本上我们还是要受偶然性的支配，还是不能超越其领域的疆界——这一基本状况不会有所改变。无论学校老师提出多么富有逻辑性和整合性的解释，理由（reason）这玩意仍然不过是针对本来无形之物的、勉强捏造出来的临时性框架罢了。那种能够诉诸语言的某物又有多大意义呢？真正有意义的，难道不是潜伏在无法诉诸语言的东西里面的吗？但是，我踏入墨西哥这个“场”、呼吸这里的空气后所首先感觉的，乃是某种无奈——即使说出来也肯定不适用于这里的无奈。

来之前看过墨西哥作家写的几本书，那时我就隐约感觉到了这点。我看的是（或者想看的是）帕斯[17]的《孤独的迷宫》和富恩特斯[18]的《我爱的外国佬》，但哪本都读不到一半就扔开了。作为读物没什么趣味固然是个原因（自不用说，这些书的文学价值因为我觉得没趣而减少的可能性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不存在），但同时也是因为我半叹息着认为“那或许是那么回事”。他们在那些书中写的，说到底，在我看来不外乎是重复同一事实，即“这是墨西哥，这是墨西哥人，这是墨西哥，这是墨西哥人……”旅行前一一看这东西，旅行岂非无从谈起了！老实说。而且，假如墨西哥这个国家果真要求本国的文学和文学家作如此切实的自我规定、自我解析，那未免也太不像话了，我觉得。



最初十天我是独自旅行。我从洛杉矶乘飞机抵达太平洋岸边的旅游城市巴亚尔塔，再从那里乘大巴沿着海岸前行，在瓦哈卡这个内陆城市同驱车从美国本土赶来的摄影师松村映三碰头，之后两人结伴旅行。看望住在墨西哥的父母的阿尔富雷特·伯恩巴姆也在大约十天后加入进来。阿尔富雷特操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作为我真是求之不得。

但反正开头十天时间我是独自旅行的。回想起来，背着背囊独自旅行实在是久违的事了。学生时代常这样旅行来着，婚后也常和老婆两人背着背囊旅行。但某一天老婆向我宣布：我也上年纪了，再不能、也不想这样旅行了！往后我想住像样的宾馆（有淋浴用的热水，卫生间有抽水马桶，铺着没有跳蚤和虱子的正规床单），再不愿意背着十公斤重的背囊，从公共汽车站走到火车站了。毕竟体重只有四十二公斤！是的，她说的是有道理。就那种旅行来说，我们是多少上了年纪，再说做那种穷酸旅行的意义也不复存在了。因为现在不同过去，又不是没有钱。

自那以来，我们便不再背背囊，而是提着SAMSONITE旅行箱，租用中型小汽车，住着不很差的宾馆，在不很差的饭店里吃饭，给行李工和女服务生不算少的小费——如此这般开始了世间普通的旅行。旅游指南也告别了面向斯巴达式学生的《LET'S GO》系列，而拿起了

例如米其林那样的多少像样的版本。这未尝不可以说是人生的一大转换，也许你会称为堕落。但不管怎样，年过四十以后，至少在旅行方式这点上，我们大体成了成熟的大人。

可是这回，惟独最初十天我实行的是过去那种贫穷的背囊旅行。在巴亚尔塔机场下飞机背起背囊之时，坦率地说，我不由心生感慨：噢，就是这样的！其中确有自由的感觉。那是挣脱“自己”这一立场的自由，挣脱一种职责的自由，挣脱经年累月形成的自我自身的自由。这种自由感包含在我肩头背囊的重量之中。放眼四周，认识我的熟人一个都没有，我认识的人也一个没有。我所携带的全部装在背囊里，能称为自己所有物的仅此一件。

我带来了新买的随身听和几盒磁带，以便旅行路上听。也带了几本书。因为我无从判断在墨西哥旅行时想听怎样的音乐，所以从所有种类中大致拿了几盒塞进背囊。B52'S带来了，克拉伦斯·卡特带来了，斯坦·盖茨带来了，塞隆纽斯·蒙克带来了，凯思林·巴特尔的莫扎特带来了，巴赫的平均律带来了，“南天群星”和井上阳水也带来了。但其中最想听的，无论怎么说都是从CD辑为九十分钟磁带的纳尔逊精选歌集。希望不要因为我一边在墨西哥旅行一边听纳尔逊的老歌而指责我，希望不要认为我村上是个没有思想性的、往后看的、以怀古为情趣的作家（弄不好是有这个可能，但希望不要把这篇文章都牵连进去）。我之所以一直听纳尔逊的磁带，说实话是因为旅行期间一直在看纳尔逊的传记。

倒是同墨西哥旅行几乎无关，可这本书极为有趣，看得我相当投入。众所周知——也许并不周知——纳尔逊作为热门电视节目“快乐的纳尔逊”（日本也在星期日中午由NHK[19]播放）的儿童角色，从懂事时起就赢得了全国性人气，走上歌坛之后成了直追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超级走红歌手。不过，他对于自己仅仅被视为英俊的偶像歌手这点常常怀有不满，而始终认真追求着音乐的阅历。在甲壳虫出现前后的1960年代，音乐风潮急剧转向，纳尔逊的人气发生下滑，即使在那以后，他也在默默追求着自己的拿手节目，坚决拒绝作为老歌歌手站在公众面前，为此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音乐会上受到数万观众的谩骂。他便是那样顽固地拒唱往日走红的歌曲，纵然有此遭遇，他也并不妥协。他写了《花园晚会》来寄托那种炽热的情怀，他在歌

中这样唱道：“如果除了回忆无歌可唱，我宁愿当卡车司机（If memories were all I song， I'd rather drive truck）。”《花园晚会》畅销一百多万张，纳尔逊于是重放光彩。

尽管重放光彩，但也不可能一切大功告成。现实人生不同于好莱坞影片。现实人生乃是恼人的每况愈下的行程。纳尔逊后来被离婚问题及由此带来的财产纠纷搞得心力交瘁，最后死于飞机事故。生前他对朋友这样说过：“有两种死法我不愿意碰上，一是空难，一是火灾。”然而在乘私家飞机时，机舱起火把他烧死了。死时，他剩下的惟有债款。

在墨西哥旅行时我看的就是这样一本书，同时倾听可怜的纳尔逊在一点都不可怜时唱的无数天真烂漫的走红歌曲。

不过，在墨西哥乘大巴旅行途中听音乐不是一件简单事。因为墨西哥的大巴不存在安静这一因素，里面几乎百分之百播放墨西哥音乐，而且不是马马虎虎的音量，而是大音量，震耳欲聋。所以，随身听的耳机往耳孔塞得再深，我要听的音乐中也还是有墨西哥音乐混进来。起初我尽可能把意识集中于“我的音乐”，但听到半途被迫作罢，只有躺在海边或步行时才听磁带。

这对我来说是个大大的误算。因为我原本计划在每天长达五六个小时的大巴行驶时间里随心所欲地听喜欢的音乐，极为乐观地以为这样一来，长时间的大巴之旅能变得容易忍受，岂料这番谋划转眼便一败涂地。五六个小时里，进入我耳孔的全是持续不断的墨西哥民谣：铿锵铿锵铿铿锵铿锵铿锵铿铿锵、泰基埃罗、米亚毛尔、铿锵铿锵铿铿锵。或许你说那也没什么嘛，不是说入乡随俗么？把当地音乐作为那里的存在之物好好受用不就行了！也许是那样吧，我起初也是那么认为。可是我要说，一天六个小时不得不听不明所以的墨西哥民谣，正常人无论是谁脑袋都要出问题。比如乘新干线从东京去广岛，车厢老是用大音量播放演歌[20]（或者皇后合唱团[21]），你不认为自己会不胜其烦？至少我会。若真如此，绝对不乘什么新干线。

在墨西哥，对于想从此地移往彼地的人来说，最要命的问题是几乎除了大巴别无移行手段可以选择。铁路经过的地方有限，且安全和准时也相当成问题。所以只能乘大巴。而且——这是我在墨西哥一直

乘大巴旅行的实际感受——能够好端端地乘上大巴都必须认为是幸福的。如此这般，我每日都不得不听那墨西哥民谣。没有任何选项。每次乘大巴我都对天祈祷，愿车内音响发生故障。佛陀也好圣母马利亚也好夸察尔科亚特尔（墨西哥的古神）也好——无论哪个我都对之祈祷。然而车内音响绝对没出故障。这——这个也想大声说出口来——在墨西哥纯属奇迹。墨西哥很多东西都常出故障。一辆大巴冷气出了故障，热呀，热得差点儿晕过去。又一辆大巴椅子靠背倒下去就再不起来了，我必须摆出接受牙医治疗那样的倾斜姿势并保持好几个小时。车窗怎么也打不开或关不上。有一辆大巴几乎没有物件不出故障，喇叭按不响，窗户关不上，仪表一个也不灵。这不是夸张，实际上无论时速仪还是燃油表全都死得利利索索。然而，惟独车内音响还是引吭高歌。虽说声音差劲，歌词差不多都听不清了，但音乐的确响个不停。见此情景，我终于死心塌地了。在这个奇妙的国度，纵然所有机械都呜呼哀哉，所有理想和革命都寿终正寝，车内音响也将因某种奇妙的理由而长生不死！

这么着，我放弃了所有希望，将墨西哥民谣作为“那里存在的东西”接受了下来，如同接受灰蒙蒙的空气、死皮赖脸的蚊虫、石块一般又大又硬的硬币（足以毁掉所有钱夹和衣袋）、印第安小贩以及食物中毒那样。

惟独车内音响因某种奇妙的理由长生不死，我这样写道。但这类似一种修辞，其实墨西哥的车内音响所以不死，自有其相应的明确的理由。那就是：因为墨西哥司机和乘务员无比热爱墨西哥民谣。无论发生什么，他们都要让音响好好存活。想必他们为此使用了想得到的所有手段，付出了所有的牺牲。有的人上车时不胜怜爱地抱着手提包，最初我以为装的是某种业务需要的贵重物品，后来才知道是盒式磁带便携箱。一盒磁带转完，便小心翼翼地取出下一盒插入。箱里我想装有二三十盒磁带。估计他们一天也好两天也罢，反正就是要一刻不停地听这音乐。我也喜欢听音乐，但没那么大的干劲。沉默偶尔也是需要的。然而对这些人来说，所谓沉默就是必须由墨西哥民谣热烈地填满的未完成的空白。这么着，一如墨西哥所有的白墙都被信息、广告涂抹得满满的，墨西哥的沉默也被欢快的墨西哥民谣填塞得风雨不透。

大巴有形形色色的人上来。有带玛切提（砍山刀）的印第安农民，有去镇里购物回来的老婆婆，有看样子赶去某处工地的务工者，有肩扛货物的商人，有因某种理由正从A地赶往B地的父子。只是，在我乘坐的大巴线路上可以说全然没有见到背囊外国游客。没看见的不光是外国游客，更少的是属于中产阶级的墨西哥人。我坐的大巴上，只看见一次——仅仅一次——衣装得体的墨西哥人。混在印第安人、农民、乡下老伯和老婆婆中间，那位绅士（或者不如说给人的感觉也就是普通的都市生活者）看上去确实特殊。因为之前我在大巴上遇到的总的说来是接近底层的墨西哥人，所以这次才在视觉上深切感到墨西哥真是个分明的身份社会。那人头戴巴拿马帽式样的帽子，身穿泛白的上衣，看一本硬皮书。我用一塌糊涂的西班牙语同乘务员说话时，他插进来用英语中规中矩地翻译（在墨西哥，会讲英语是身份象征，他在翻译方面都很热情）。三十分钟午休时间里，仅有他在餐馆吃像样的鱼，众人（包括我）只是喝着冷水、“咯嘣咯嘣”嚼着面包或炸薯片充饥。

大巴也有叫人害怕的人上来：军人和警察。从一个叫库尤特兰的海滨小镇（位于曼萨尼约稍下一点）前往同是海滨小镇的普拉亚·亚思尔（位于拉萨罗·卡德纳斯稍微偏西的位置）的半路上，“扑通扑通”上来四个警察。我们在岭上的“山顶茶馆”休息二十分钟，或喝冷饮或去厕所，正要出发时他们风风火火赶来了。警察全都长得牛高马大，晒得黑黑红红的，头发剪得很短，戴着深色太阳镜，身穿防弹背心，而且腰挎大号自动手枪，端着AK47自动步枪，种类截然有别于那一带的普通警察。他们看上去分外剽悍，分外训练有素，衣袖带有“联邦警察”（估计）字样。

四个警察中的两个在助手席和司机席后面占了位置。原来坐在助手席的乘务员被赶去后座。另外两人在车厢正中间的席位分坐左右。一个警察把自动步枪的枪口由下而上朝我一舀，说道：“那边去！”他毫无笑容，没有“对不起”，没有“请你……”仅仅用自动步枪的枪口略略朝上一指。我当然乖乖把座位让给他，提起行李退到后座。他要我的座位是因为那个座位容易使枪口隔窗瞄准目标。至于究竟发生了什么或即将发生什么，我完全蒙在鼓里。

乘务员到我身旁告诉我："有可能交火，真那样就一下趴在地板上！"我的西班牙语诚然一塌糊涂，说到这种事却听得明明白白。我问："是强盗（班迪多斯）？"对方低声说："是，从这里往前一百公里左右时有出没。"总之，警察全副武装钻进大巴是静等强盗来袭。作为证据，坐在助手席的警察已脱去制服，只穿白T恤，一眼看不出是警察，以使强盗察觉不到埋伏。相隔一排坐在我前面的年轻警察在大巴穿过某个地点后（看情形那里有明确的界线表示"由此往前危险"）"咔嚓"一声推上自动步枪的弹舱，缓缓卸下安全栓，枪口对着窗外以便随时准确开枪。看表情就知这不是摆花架子的任务，脸色多少有些发青，尽管不热，汗珠却一滴接一滴顺脸流淌。

糟糕，形势相当严峻，我想，难怪地道的市民不坐大巴旅什么行。可是，我来墨西哥前看了好多旅行指南，哪里都没写到太平洋沿岸有武装强盗频繁出没。不错，是写了"偷盗频繁发生，贵重行李时刻不要离身"之类，但没发现关于武装强盗的记述，卷入枪战的可能性更是只字未提。

大巴沿着海岸在险峻的山路上行进。从这一带开始，风景渐渐带有热带情调。路两旁那种《地狱启示录》里出现的椰子树绵延不断，也有香蕉林横陈其间。路面越来越窄，越来越弯。除了不时闪现的印第安村落，几乎不见人影。见到的人都像万宝路香烟广告那样戴帽骑马。说起墨西哥，脑海里很容易浮现出阔边帽，但阔边帽除了礼品店基本上见不到，全都头戴万宝路样式的帽子。也有人照例腰挎玛切提（砍山刀），让人感觉正该是强盗出没之地。没有人的动静。哪里都能藏身。

以墨西哥为舞台的D·H·劳伦斯的《有翼的蛇》（我想还是译为《有翅膀的蛇》准确）中有关于被墨西哥强盗用砍山刀砍死的德国血统墨西哥人的情节，一瞬间我不由想起那个场景。

> 嚓！嚓！嚓！砍山刀毫不留情地砍进人的肉体的声响传来了，接着传来霍塞异乎寻常的声音："留命啊！留命啊！"霍塞叫着倒在地上——他被杀死了。

（宫西丰逸译，角川文库）

被砍山刀砍死不是愉快的死法，这一点想必纳尔逊也会同意。

但最终强盗团伙没有出现。驶完一百公里，警察叫停大巴，下车。我前面的警察吁了口长气，锁上AK47的安全栓，擦去脸上的汗。无论对他还是对我都是漫长的一百公里。警察下车的地方停着两辆联邦警察的巡逻车，估计他们是从那里跳上其他大巴赶去“山顶茶馆”，再从“山顶茶馆”钻进我们的大巴车折回那里的。警察下车后，车厢里荡起释然的空气。警察在的时间里谁也没怎么说话，音乐声也到底变小了。

几天后乘坐大巴由锡瓦塔内霍赶往阿卡普尔科，途中从车窗里看见了尸体或者极其接近尸体的形体。虽是一等大巴，但冷气装置坏了，加上我后面座位上一个小姑娘把午间吃的油炸玉米馅饼整个吐了出来，我只好打开车窗，半看不看地呆呆看着外面的景色。大巴左侧，一辆敞篷卡车追了过去。货厢里坐着四个男子，两人头戴工作帽样的东西，朝上竖起自动步枪（大概是美制M16）分坐两侧，枪身在太阳光下闪着幽光。另外两人被手拿自动步枪的男子夹在中间，像刚捞上岸的四鳍旗鱼那样仰面躺着。这两人都光着上半身，闭着眼一动不动，或许睡熟了也未可知。问题是，那可是热得可以烤死人的夏日午后，天空一片云也没有，目力所及，所有生物都像热得昏昏沉沉不省人事，不可能在那样的地方酣然大睡，那样的话一定会烫肿或灼伤。

敞篷卡车追过我乘坐的大巴那十秒或二十秒时间里，我当真把眼睛睁得像盘子一般，定定地看着他们四人，但在我眼里，躺在货厢里的两个年轻男子只能像是刚刚死去的尸体。那姿势、表情、动静根本看不出意识的蛛丝马迹。假如他们是被捕的“活着的”罪犯，那么本该戴上手铐以防他们乱来或逃跑。而若不是罪犯，那么他们断不至于在晒得足可煎熟鸡蛋的卡车厢里悠然自得地享受日光浴。当然，因为没有走到近旁好好确认，我也没有那就是死尸的确凿证据。

由于事情太突然了，我只是呆愣愣地看着敞篷车消失不见，并且久久侧首思忖那到底是什么，毕竟锡瓦塔内霍和阿卡普尔科在墨西哥也是最有名且最有光彩的旅游胜地。

后来听人说（这种事一般都是事后听说的），锡瓦塔内霍和阿卡普尔科所在的格雷罗州在1970年代是以游击队老巢而闻名的地方，政府曾投入数万军队予以镇压。即使在政治骚扰勉强平息的现在，这一带好像还是有动乱的余波。沿高速公路有许多检查站，警察和士兵的身影随处可见，全都携带自动步枪。时不时同坐在卡车货厢里的警察擦肩而过。到处有兵营。从阿卡普尔科驶往埃斯孔迪多港的大巴，每次上车都用金属探测器检查，稍微大些的手提行李不能拿进车厢。就此发牢骚的德国游客受到相当粗暴的对待，大发脾气。只要从阿卡普尔科跨出一步，人们马上面对暴风骤雨般的“现实”。访问墨西哥的外国人只要住在锡瓦塔内霍、伊科斯塔帕和阿卡普尔科的宾馆里且钱使得到位，就会作为贵客受到礼貌接待，而在这些人工制造的热带乐园外面，只有无边无际的“现实”荒野铺展开去。

总的说来，阿卡普尔科是座可悲的城市。海被污染得不成样子，和图片全然不同。一游泳就得碰上垃圾。到处漂浮着炸薯片包装袋、报纸、塑料容器及其他莫名其妙的东西。宾馆住宿费贵得令人瞠目结舌，游泳池的水面上浮着一层闪闪发光的防晒油。游泳池旁边正在举办撕心裂肺的卡拉OK大赛，面色欠佳的瘦削的墨西哥主持人狂喊乱叫：“好了，下一位是……从……来的……小姐唱……”路上挤满了出租车，一瞧见走路的外国人必定按响喇叭。物价高，商店的女孩极不讨人喜欢。多少开始磨损的幻想——这就是我对阿卡普尔科怀有的印象。

当然我的印象有可能是片面的、错误的，我无意把自己怀有的印象原封不动地强加于人，让别人也认为“阿卡普尔科是这样一个地方”。我写这篇文章不是这个目的。实不相瞒，我这个人较之坚固的，更是动摇的，较之恒常的，更是一时性的，较之正确的，更是不正确的。而且，这终归是“我的旅行”，不是“你的旅行”。我无权也没有资格把什么强加给你。何况，事物印象往往因何时看和以怎样的角度看而截然不同。如果有人怀着“阿卡普尔科实在好上天了，那般美

妙的地方简直绝无仅有”这一印象返回（当然会有很多，毕竟年年岁岁有数十万游客蜂拥而至），那也无可厚非。我不认为那些人有错。人们为寻求各自的幻想前往某处，并将其据为己有，为此支出可观的款额，消费假期，那是他们自身的金钱、自身的时间，他们拥有将其据为己有的正当权利。

但是，在偶尔沿海岸乘大巴赶到那里、又沿海岸乘大巴离开的我这样的人眼里，很遗憾，阿卡普尔科这座城市仿佛只是一个开始磨损的幻想。也许是我在到达那里之前的途中已经相当真切地目睹了这一幻想是由何种因素提供结构性支撑的缘故。阿卡普尔科、锡瓦塔内霍、伊科斯塔帕或坎昆和加里布等海岛等等，它们乃是墨西哥提供的幻想、提供的“点”，但我们想用“线”把点与点之间连起来的时候，无论情愿与否，我们势必直面现实。而这些幻想和现实的差异，在这个国家相当——有时致命——之大。

不用说，我也是为寻觅我的幻想而旅行的。不带幻想旅行的人恐怕哪里都不存在。可我寻觅的那种幻想在阿卡普尔科未能得到。总之，事情就是这样，如此而已。

在阿卡普尔科，我看到了“死亡跳水”。本来没打算看那玩意，但我凑巧住在拉戈布拉达山上的一家旅馆里（海滨的旅馆太贵，于是冒着酷暑，不屈不挠登上坡路，总算找到一家价格合适的旅馆），在附近临海的公园里喝着啤酒纳凉的时候，跳水正好在我眼前开始，所以得以——虽说是偶然——在最好的座位观看跳水。记得很久以前，在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电影里看过跳水。电影原名为“Fun in Acapulco”，日译名好像是《阿卡普尔科之海》，里面出现了这个跳水场面。电影公映时我还是初中生，埃尔维斯在里面唱《波萨诺伐婴儿》（Bossa Nova Baby）。虽名《波萨诺伐婴儿》，但歌曲旋律压根算不上波萨诺伐，而像是把桑巴和马里亚奇[22]凑在一起的什么玩意儿。电影本身——情节已全然记不得了——也是一场闹剧。这也罢了，反正我是在那部电影中第一次看到所谓死亡跳水。

老实说，实际在拉戈布拉达山上（碰巧）观看的那场“死亡跳水”，其中几乎不含有比我从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电影中所理解、所了解的更多的东西。场面同电影中的毫无二致。我惟一的感想

是：噢，和电影一样！总之，我是赶到墨西哥来，把差不多三十年前在神户一家电影院银幕上看到的东西通过现实重新感受了一遍。觉得好像顺序颠倒了，但实情就是如此。那里面没有激动，惊叹也谈不上多少。一没觉得“噢到底是真东西有冲击力”，二没心想“什么呀还是电影上的更有刺激嘛”，只是认为“到底和电影一个样”。如此一想，甚至觉得自己此时置身此地（在晚风吹拂中喝着DOSE ESSENCE[23]观看“死亡跳水”）一事本身既是现实的又不是现实的。即使猫王突然在此现身唱起“波萨——诺——伐……”也没什么不可思议，我始终有这样的感觉。怎么说呢，那是一种应当受到细心爱抚的幻想。我并不是说那个架式不外乎是普通旅游景点的一种表演。其中当然有不可预料的危险，而且要求跳水选手具有超常的体力、足够的勇气和沉着冷静的计算。然而我还是这样想：不可能失败，电影中都是得手的！我猜想，聚集在这里的大部分人恐怕也多多少少怀有同样的感觉。

只有一点和电影不同，或者说看电影是看不明白的。第一次表演，从悬崖上往下跳的选手不是一人而是三人，三名选手从不同的位置按着时间差依次跳入远在眼下的大海。想必是考虑到光一个人跳时间太短的缘故，毕竟跳水本身是转瞬即逝的。看好三人全部跳完，我们陆陆续续离开公园。这“陆陆续续”之感同看罢“有趣倒是有趣，但情节和结尾基本不出所料”那类电影（如《007》系列和《洛奇》等）离场时观众的表现极为相似。

我们离开公园时，先跳水的两名选手已从海里上来了，身上还滴着水，就在出口那里向大家致意，一起照纪念相。他们笑容可掬，十分讨人喜欢，富于献身精神。在眼皮底下细看时，我最吃惊或者说最意外的，是他们其实就是那一带随处可见的普通墨西哥小伙子。

在探照灯照射下只穿一条游泳裤向圣母马利亚祭坛祈祷，或者站在悬崖边身体笔直全神贯注凝望虚空——刚才，我从对面公园远远看着他们的这一形象。从远处看去，他们仿佛是完全不同于我们的那类存在，是严格训练造就的英雄，是和我们不同世界的人。他们全身流溢着某种虔诚和敬畏，使我想起即将作为活人供品奉献给古代阿兹台克神的勇敢的士兵形象。或许的确是给游客观看的一项表演，但这另当别论，他们站在悬崖边为准备起跳而集中精神、调整呼吸的身姿，

在我眼里却带有一种难以否认的光环。那浅黑色的肌肤在探照灯下闪闪发光，肌肉如钢铁一般坚硬，身材高大挺拔。

可是，同游客照纪念相的他们已彻底失去了那样的光环。他们的实际个头同我们差不多，长相也和在旁边卖冰糕的父兄没有分别。说到底，他们不过是圆满完成了旅游业赋予自己的职责的普普通通的青年，不过是一天从悬崖往大海跳入三四次并因此领取相应酬金的旅游从业人员。

我并没有因为近看跳水选手的真实形象而感到失望，只是当时这么想：这个在电影里怕是表现不出来的。

电影的确表现不出来这个。这是因为，较之现实的连续性，电影所追求的更是幻想的连续性。但我又想，将来回想阿卡普尔科的跳水场面时，大概只会是现实中不起眼的跳水选手的相貌——那带着黯然失色而缺乏自信的笑容，赤裸着湿漉漉的身体，同游客们一起照纪念相的（因此得到一点小费）作为体力劳动者的“死亡跳水选手们”。

虽然有所预料，但在墨西哥还是几次吃出食物中毒。

我说要去墨西哥，大家都劝我当心饮水和食物中毒。

“水是万万喝不得的。”众人异口同声道，“刷牙时一定用矿泉水，洗牙刷也要用矿泉水！”起初我倒是一一忠实照做的，但做着做着就不耐烦了，刷牙开始用自来水。管他呢，坏肚子就让它坏好了！我一改原来的态度。所幸在我身上总算没发生什么。当然，饮用水一直坚持用矿泉水。

但食物中毒到底没躲过，哪怕吃的是再普通不过的东西，迟早也要吃坏肚子的。总的说来就像俄罗斯轮盘游戏[24]，不是小心就能避免的。即使再小心，该中毒时也要中毒；而哪怕再随便吃东西，不中毒时仍不中毒。在海边“海之家”风味餐馆里吃烤虾后（倒是好吃得很）中毒一次，在破败不堪的宾馆餐厅吃晚饭后（这个不好吃）又中毒一次。事后想来，后一次问题好像出在通心粉色拉上，估计这类食物中毒的原因仅仅在于卫生管理。所以我想，如果住在旅游城市的一流宾馆，在一流餐馆里吃饭，应该不至于发生食物中毒问题，而只要离开旅游城市一步，往下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一旦食物中毒，呕吐和泻肚就接踵而至或同时赶来。问我呕吐和

泻肚哪个痛苦我也答不上。哪个都够受的，一来二去二者的区别都分不清了。这东西大体持续六个小时。那时间里几乎起不来床。吃了抗生素类药物，但效果不大。只是吐，只是泻，只是躺着。到头来吐也罢泻也罢躺也罢，都让人烦得不行，甚至觉得没准就这么昏死过去了。罢了罢了，我可不愿意在这莫名其妙的墨西哥宾馆的莫名其妙的床上因为吃了什么通心粉色拉而一命呜呼。如此说来，莱蒙德·钱德拉的《漫长的分别》中，雷诺克斯就在莫名其妙的墨西哥城镇一家莫名其妙的宾馆房间里没命了——死了。好在他还有个朋友哀悼他的死，有个朋友为他喝吉姆莱特[25]。而我则不然。我死了，大家肯定在背后这样议论："村上春树何苦去哪家子墨西哥呀，这不，墨西哥那地方就是不适合他的嘛！有什么特殊理由让他非去墨西哥不可呢？真是不好明白。就算去了，也不该吃通心粉色拉泻肚泻死嘛，死法实在太惨了。何况，听说不就是上吐下泻吗？人就那么死了真是不值得，死法这东西可马虎不得啊！"

但不管怎么折腾，到一定时间身体总是彻底恢复，恢复了就继续旅行，旅行当中又因吃了什么莫名其妙的东西来了食物中毒。或许如此旅行几个月后，身体也逐渐健壮起来，小打小闹不再导致食物中毒。但遗憾的是，我没那么多闲工夫，等不到形成对付墨西哥的抗体就得返回国境以北。

十天时间里，又是不由分说的食物中毒，又是不屈不挠的墨西哥民谣，又是端着自动步枪的神情肃然的汉子，又是冷气出毛病的大巴，又是怎么踢（我真的使劲踢过）也全然无动于衷的如大象一般厚脸皮的加塞儿老太婆——在忍耐着诸多名堂独自在墨西哥旅行的过程中，我再次痛切地感到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旅行这东西在根本上是累人的活计。这是我身经无数旅行后悟得的绝对真理。旅行是累人的，不累人的旅行不是旅行。接连不断的情绪低谷，无数始料未及，无数事与愿违。淋浴的温吞水甚至不温吞了，吱呀乱叫的床，绝不吱呀的僵尸般硬的床，不知从何处一群接一群涌来的饥饿蚊子，不冲水的卫生间，没有水的厕所，令人不快的女侍应生，日甚一日的疲劳感，连连丢失的行李，这就是旅行。

连连丢失的行李……

实际上旅行当中我也的的确确丢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每次从某地赶去某地，都有种种物件一个接一个不翼而飞。我退房时要仔细确认有无东西忘掉。桌子抽屉（如果有那东西）、卫生间、床上，这些位置要一一检查。房间小，不至于看漏。确认没有任何东西忘记后才退房。尽管如此，还是有东西不断消失。到下一家宾馆打开背囊找什么，偏偏不在那里，那东西哪里也不在。

发梳、微型收录机（这是记录旅行用的，没有了极伤脑筋）、刮脸膏、蓝牛仔裤、皮带（这也是够头痛的）、眼镜（这也吃尽苦头）、眼镜盒、六百美元面额旅行支票（所幸美国运通卡第二天就补发了）、袖珍计算器、笔记本、地图、零币钱包、防晒油、圆珠笔三支、军用小刀……就好像这些物件分别寿命到期升天似的一个又一个悄然失踪。至于何时、如何消失的，我全然没有记忆。觉察到时，它们早已踪影皆无，倏地。倘若多少有某种自觉——如在哪里被谁偷了，忘在哪个地方了——我也能心怀释然，心想得得，以后好好留意就是。可是除去几个例外，甚至那样的自觉也几乎没有。那些物件简直就像仅仅、仅仅依据某种法则不断地消失而已。于是某日我死心塌地，放弃所有努力。

随它便好了，无所谓，努力也好不努力也好，反正东西就是要一个劲儿地消失。

这是一种豁达：这就是墨西哥，这就是置身墨西哥的意义。我必须把这种连续性失窃作为自然规律、作为宿命接受下来，必须默默背负它的重荷！

如此这般，我把永无休止的丢失作为自然规律、作为宿命接受下来。接受只能以噪音称之的墨西哥民谣，接受8月午后劈头盖脑的酷热，接受俄罗斯轮盘游戏式的呕吐和腹泻。这些使我疲惫，让我厌烦，但思考起来——不久我忽然心生一念——没准正是导致我如此豁达的这一程序、正是促使我将让我疲惫的种种事物作为自然现象默默接纳下来的阶段，才是之于我的旅行的本质。

我不得不承认这样的想法是相当极端的。为什么呢？因为疲惫这东西即使不远远跑来墨西哥，也是无论哪里都会找上门来。在东京也好在新泽西州也好都会轻易降临头上。可问题是你何苦特意跑来墨西哥找那劳什子呢？

对于这个提问，我可以用比较明晰的语言来回答。我何苦特意跑来墨西哥寻找疲惫呢？“若问何苦，”我将这样回答，“因为那样的疲惫是惟独在墨西哥才能得到的那一种类的疲惫，因为那是只有来此呼吸这里的空气和脚踏这里的土地才能获得的那一种类的疲惫。而且，这样的疲惫每叠积一层，我就向墨西哥这个国家多少靠近一步，我觉得。”说来奇怪，每丢一次东西，泻一回肚子，没赶上一趟大巴，有一个老太婆挤进队里，我都觉得墨西哥这个国家更深地渗入我心中一步，不是我开玩笑。德国有德国的疲惫，印度有印度的疲惫，新泽西有新泽西的疲惫。但墨西哥的疲惫乃是只能在墨西哥得到的那一种类的疲惫。

以此疲惫将彼疲惫相对化，以此疲惫辩证地超越彼疲惫——这是我一边用随身听听纳尔逊唱歌一边怅怅思考的一点。

从埃斯孔迪多港开往瓦哈卡的大巴中（翻越好几座崇山峻岭的这七小时路程即使以相当的好意来说也近乎上刑），遇到一个晒得黑黑的二十岁左右的日本小伙子。来墨西哥后遇到日本人还是头一次，自然这个那个和他闲聊起来。他说他是学生，在瓦哈卡进修语言，但很想看海，就在埃斯孔迪多港海边游了一个星期。“在大巴上睡觉可不行哟，”他提醒我，“高度变化太厉害，睡着了耳朵会出问题。”他是相当穷的旅行者，说付完回程大巴费，身上只剩下一百日元。所以到达瓦哈卡时，我请他在餐馆吃了顿午饭。“啊，说实话，已经两天没好好吃东西了。”他边说边大口小口吃着。目睹小伙子的神情举止，我不由涌起一股感慨：这么说来，以前自己也是这样。二十年前，我也曾这么旅行过，衣袋里只有几百日元，两三天吃不上像样的东西，由擦肩而过的什么人招待一顿饱饭。可如今，自己成了招待别人的一方。

归根结底，就算我背着沉重的背囊，浑身脏兮兮地到处苦找能少花一百日元的旅馆，就算再热、积劳再多、再苦于食物中毒，我恐怕也不至于饿得像这个小伙子那般切实了。旅行完了，我自有返回的地方，那里有为我准备的位置，有我要做的事。但过去不同。旅途中遭遇困惑，就可能一直困惑下去——某种内外交困的心绪总是挥之不去。话虽这么说，当时我旅行得还真不算少。早上睁眼醒来，想去哪

里就径直出门，旅行个没完。大概我是在寻求那种“难免困惑”的旅行提供给我的类似幻想的东西。我想我是切实需要那样的东西。

或者，此时在墨西哥如此旅行的我，只是在重新仔仔细细地描摩十五或二十年前自己一度怀有的那种幻想也未可知，恰如拉戈布拉达的跳水选手为了描摩前来阿卡普尔科的几十万人的幻想而日复一日地从那悬崖上做危险的跳水动作并且每日做三四回。

这样思考的结果未免使人难过。这是因为，年纪越大、对那种幻想的认识越鲜明，我们获取的量相对于我们献出的量就变得越少，而且相对于我们怀有的大量疲惫，我们得到的幻想只是较少的一部分，这好比长期服用的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效果渐渐减弱。不过，虽然量比过去少多了，但此前见所未见的那类新的幻想也还是有的，只要小心翼翼睁开眼睛，一丝不苟地侧耳倾听，那些幻想至今仍能向我倾诉。在某种情况下，那应该是年轻时的自己所无法看到或即使看到也可能轻易看漏的东西。是的，如纳尔逊所唱：“如果除了回忆无歌可唱，我宁愿当卡车司机。”

“嗳，记忆中你的长相在哪里见过。”分手时小伙子以想了很久的神情说道，“从大巴车上看第一眼起就一直在想：这人是谁呢，在哪里见过呢？但横竖想不起来。都想到这里了，却出不来。以前可在哪里见过我？”

“见没见过呢？”我说，“我也想不起来。也可能在哪里见过。”

---

[17] 墨西哥诗人、评论家（Octavio Paz，1914—1998）。199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18] 墨西哥小说家（Carlos Fuentes，1928—）。

[19] 日本广播协会之略。

[20] 用日本传统唱法表演的歌曲。

[21] 英国的摇滚乐团，其歌曲广泛运用日本的电视主题歌等。

[22] mariachi，墨西哥乐队。主要演奏带有乡土气息的流行音乐。

[23] 一种添加香精的饮料。

[24] Russian roulette，在转轮式手枪中装入一颗子弹，转动转轮后在不知子弹位置的情况下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头部扣动扳机。喻危险的游戏。

[25] Gimlet，一种鸡尾酒名。



做同样的梦的人们

旅程后半段，摄影师松村映三从新泽西州远远开车赶来瓦哈卡，开始乘他的三菱帕杰罗行进。虽然一天之中开车时间相当长，但比坐大巴舒服多了。“只是，”几个当地人一本正经地劝告我们，“天黑了绝对不能开车。记住，天黑之前无论如何要找地方住下！”

这一来，简直和在吸血鬼飞扬跋扈的特兰西瓦尼亚旅行无异，可是见到的人都这么异口同声地劝说。为什么天黑以后不能开车呢？因为荒郊野外晚上治安相当不好。吸血鬼固然不出动，但强盗出动。半斤八两。

“下落不明的人多着哩！硬让车停下，抢走钱财什么的，堵住嘴杀死，埋在什么地方。尸体很难找到。上次就有一家，连小孩都被杀了，尸体倒是碰巧找到了。半夜里把很粗很粗的圆木头死死地横在路当中，埋伏起来，开来的车一停就一拥而上。反正天黑后不能开车！”

这类作案故事大多是“这可是从某某那里听来的实际发生的事”之类的城市传说，但我因为坐大巴旅行时目睹了武装警察毫不含糊的执勤场景以及卡车上的尸体（估计），所以有了切身感受：这个国家发生什么都不奇怪！何况在陌生地方旅行，听从当地人劝告对于旅行者乃是铁的守则。于是我们决定总之天一黑就不再开车。总共开车行驶了三个星期，的确，在白天开车这一限度内一次也没遇上麻烦，只在瓦哈卡的夜里丢了纽约州的车牌。几个美国人忠告说“开车去墨西哥一定要带手枪或步枪”，但我当然没带，把摆弄不来的枪支带去只有增加麻烦。

同作案相比，在墨西哥实际困扰我们的更是TOPE。所谓TOPE，就是为使汽车减速而在人家附近筑起的隆起物，英语叫BUMP。总之全国星罗棋布。开到那里若不注意减速，就要“通”一声感受恼人的震动。问题是，道路本来就无可救药，哪里是TOPE哪里不是TOPE，很多时候看也看不明白。以为是TOPE而放缓速度，实际却不是；以为不是TOPE而照样行驶，却又正是。TOPE前面倒是立有标牌写道“前面有TOPE”，但其中也有没有TOPE标识的TOPE（没有TOPE的TOPE

标识也有），分辨十分困难。这样的TOPE一天之中要跨越二三百个之多，看都懒得看了。

我想，不做这麻烦东西而代之以在城镇入口竖起“减速”的标识岂不更好。可是在墨西哥，只看标识恐怕任何人都不会减速的（环顾四周的驾驶员，得到的强烈印象是：这家伙只瞧见标识是不至于减速的）。问阿尔富雷特·伯恩巴姆，他说：“噢，那个么，不但墨西哥，其他中南美洲国家也到处都是。”看来在中南美洲各国，这玩意儿是必需品。

TOPE是隆起的人为障碍物，而反过来，塌陷的非人为障碍物也是有的——路面像布满奶酪窝似的到处坑坑洼洼。一级干线道路还没那么严重，但一离开墨西哥城，随着道路的降格，路况就一步步凄惨下去了，看情形估计是装载重货的大型卡车的震动造成的。擦身而过的卡车的确都装得满满的，满得令人难以置信（在墨西哥，物资大部分靠卡车运输），而铺路的沥青并没有达到足以承受那等重量的标准。既然这样——我想——还不如一开始就别铺什么沥青，直接用土路岂不更好。问题是我怎么想都没用，事态当然不可能因此而发生变化。

我经过的道路，从韦拉克鲁斯到科尔多瓦的山中路段是再糟糕不过的，无论坑洼的数量还是深度都非同一般。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像电影《恐怖的报酬》一样小心绕过坑洼向前行驶，但由于坑洼数量太多，任凭怎么小心，有时还是要掉下坑去，其冲击不亚于TOPE的震动，实在让人不快。车也受损。我们是开剽悍的四轮驱动车来的，因此还算好，如果开的是保时捷或法拉利，我想车子马上就会解体。不过不至于开那种车来，随便说说罢了。

总而言之，我们便是在这无休无止的TOPE和坑洼的全程困扰下行驶在墨西哥的。我们所以没有夜间行车，较之害怕强盗，说不定更是因为实在受不了坑洼和TOPE的缘故。大白天都难以看清路况，天黑就更不用说了。

尽管道路如此肆虐，尽管存在很难说多么富于守法精神的那一类人，但我们毕竟能够以自己的意志在喜欢的时候行驶在喜欢的地方，这委实让人心里充满喜悦。如果你想在有限的时间里穿越墨西哥——尤其内陆——弄一辆车几乎可以说是绝对条件。墨西哥内陆的有趣之

处，不管怎么说都在于外人不怎么到访的小村小镇，因为乘大巴很难顺路到达那样的地方。假如好容易找见大巴到了哪里一座村落——到了自然好——回程大巴起码要等两天，那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即使两天一班的大巴，如果哗哗下大雨（而且经常下）也可能开不来。若是时间多得打发不完的闲人，没准是一次有趣的经历，而对于此外的大部分旅行者，就不能说是多么现实的旅行方式了。

在瓦哈卡悠然休整四五天消除大巴旅行疲劳之后，途经太平洋沿岸美丽的海滨城市安赫尔，前往恰帕斯州的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这个名字长长的小城。离开太平洋沿岸，转瞬之间就进了山里。看地图即可一目了然，从哈利斯科州到瓦哈卡州、恰帕斯州之间，沿海几乎没有平地，海岸线和山地紧挨紧靠着伸展开去。险峻的马德雷山脉在这一带差不多伸到了太平洋岸边。所以，刚才还在炎热的海岸游泳，等到回过神来，此刻已置身于凉冰冰的山中。反正一进山气温就骤然下降，景物也整个一变。植物种类变了，田里的庄稼也不一样了，人们的生活样式开始带有截然有别的景象，所见男女的长相也已不同。越往山里去，身裹独特衣服的印第安人的身姿越多，云絮低回，静静润湿着山体，让人明显感觉到自己走进了和刚才完全不同的国度。

恰帕斯的原住民是印第安人，至今这个州仍以维持强有力的共同体而闻名。他们讨厌同梅斯提索人（混血西班牙裔人）混合，近乎顽固地保持着自己的传统生活。这个地方成了他们同西班牙人、后来又同梅斯提索人长年浴血抗争的舞台，那种紧张的空气至今仍有剩留。

西班牙侵略者来到这里是1523年的事，转眼之间他们就以武力征服了原住民即印第安人，没收了其土地，作为奖赏给了士兵。士兵们为耕种那些土地而把印第安人不折不扣地当奴隶使唤。印第安人被迫从原来生活的村庄迁移到深山沟里的定居点，在那里被置于士兵们的严厉监视之下，被迫改信基督教并承担重税。

关于原住民印第安人是在何等恶劣的环境下被奴役的，这一点可以从其人口的锐减推断。西班牙人征服这里时，住在恰帕斯的印第安人数量约三十五万人，而在1600年竟减为九万五千人。西班牙人从旧大陆带来的传染病固然是原住民人口减少的一大原因，尽管如此，也

减得太过份了。从中不难看出印第安人是怎样被当作“消耗品”对待的。

作为印第安人的朋友站起来说话的，是以巴尔特罗梅·德拉斯卡萨斯为首的基督教传教士。他们保护印第安人，向西班牙本国强调印第安人的悲惨处境，终于促使奴隶制度的废除得以实现。这是1550年的事。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由于名字长，往往略称德拉斯卡萨斯）便起因于他的名字。

问题是，虽然奴隶制度废除了，但印第安人所处的实质性隶属状态并没有出现多大变化，致使他们定期举行叛乱。1712年，一位采尔塔尔族少女做了一个梦，圣母马利亚出现在她的梦中，告诉她说只要拿起武器反抗西班牙人，就会给印第安人带来希望。于是他们拿起了武器，随即遭到了残酷镇压。1869年，佐齐尔族村庄出现了名叫“皮埃德拉斯·阿布兰泰斯（会说话的石）”的三块奇石，深受当地人尊崇。不久，奇石——那是“黑曜石”，看上去会说话——向人们说：举行叛乱，收回自己的土地！结果发生了大规模的叛乱，但同样被军队镇压下去，其间有数量极多的印第安人惨遭杀害。

即使现在，那样的紧张状态也绝未消除。恰帕斯州近一半的土地为相当于人口百分之一的梅斯提索人地主阶级所有。他们控制着经济、政治和警察，有的甚至拥有私家军队。印第安人活动家掀起的土地返还运动被他们以强大的力量扑灭了。大赦国际公布说，迄今已有二十名佐齐尔族活动家遭到暗杀。

我之所以就这个州的历史写了这么多，是因为若不了解这样的历史过程，便几乎不可能在旅行当中理解那里的情况。恰帕斯是被历史践踏的、被以武力侵占的地方。那里是贫困的，充满矛盾和悲伤。只要踏入一步，旅行者即可清楚目睹。其贫困或许不能称之为压倒性的，但也相当严重。据说恰帕斯还有一多半人口过着没有电气的生活。恰帕斯不是没有发电站，河流上也有像样的大水坝。但是发电站发出的电大多送往其他州，而把恰帕斯人生活的地方丢在一边。不妨说，人种间根深蒂固的对立、财富的绝对不均这两个困扰墨西哥的大问题在这里以最显著的形式表现出来。

可是这方土地好像有一种东西超越了如此严重的问题而震颤人的

心灵。悲伤中有美丽，炽烈中有平静，贫穷中有某种心情。这么写起来好像措辞有些奇妙，但实际去那里呼吸一下当地的空气，可能就会明白我所写的。这次旅行转了墨西哥各种各样的地方，但没有哪里给我的印象比恰帕斯更强烈。其结果，我们在此停留的时间超过了最初的安排。

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是一座沉静而美丽的城市，海拔二千米以上，夏天也很凉爽，要穿外衣。温润的空气中，有着涂漂亮颜色的房舍的街道伸向远处，依然保留着殖民地时代的华丽。无论拍摄哪里，其情调都可直接成为一幅明信片。说起墨西哥的城市，几乎所有外墙都整块是花花绿绿的广告板，但这里不同。大概有什么规定吧。

瓦哈卡地方虽也十分漂亮，但由于至今仍实际上承担着州首府的职责，故而车多、人多、空气差，没办法安安静静散步。感觉好的安静地段惟独限制车辆驶入的索卡罗（中央广场）一角。相比之下，德拉斯卡萨斯从来就不是州的首府，现世职责已经放弃，只是作为历史城市隐居式地悄然存续下来，所以感觉上恰如飞驒[26]的高山，许多东西都保存着往昔面貌，和古都这一称呼十分相称。顺便说一句，恰帕斯州现在的首府是名叫图斯特拉古铁雷斯的大城市，因日程关系我们无奈地住在了那里，但如果可能，真想争分夺秒逃出来，说热闹也好什么也好，反正就是人多，又脏又吵。想必乱糟糟的现实因素都一股脑儿投在了这里，于是安安静静漂漂亮亮的德拉斯卡萨斯另存了下来。京都也最好把政治和经济功能在某个阶段迁往别处，不过这话现在再说也没什么用了。

总之，德拉斯卡萨斯是让人觉得多住几天也无妨的少数墨西哥城市之一。以我个人印象来说，墨西哥城市大体可分为两类，即“嘈杂的城市”和“凄凉的城市”，几乎没有介于二者之间的。但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是个例外，既不嘈杂又不凄凉。人口大约五万，规模正适宜居住。散步散不够，够品位的餐馆和咖啡馆也有。若在这里住上一个月，好像可以心情愉快地写出小说，我觉得。

来这里的人最先觉察到的，恐怕是印第安人的数量之多。当然，就人数而言瓦哈卡也不少，但这里的印第安人同瓦哈卡见到的衣着普通的“现代化”印第安人不一样，至今全都身穿一如从前的民族服装，保持着被西班牙人征服之前的风习。服装颜色每个部族各有不同，哪

一种都非常艳丽，用的是自然布料，且以传统自然染料染成，所以即使远看也有一种韵味，让人心怀释然。身着如此粉红色深蓝色黑色红色等五颜六色服装的印第安人在同样涂得五颜六色的街道上足不出声地——因为他们大多光脚——静悄悄往来穿行，光景煞是好看，给人的感觉好像在说事情本来就应这个样子。尤其是清晨和黄昏时分的情景，确有一种什么在抚慰人的心。

这些印第安人大部分不住在城区。他们住在德拉斯卡萨斯近郊各处的共同体即村落里面，一大早乘大巴或步行进城。卡车拉着二十几个印第安人早接晚送的情景也常可见到，至于是谁组织那类卡车则不大清楚。反正他们每天早上来德拉斯卡萨斯“上班”。住在德拉斯卡萨斯城里的印第安人，大多情况下是出于某种原由——一般是宗教性对立——被赶出共同体的人们。印第安人都是为了卖什么东西才集中进城的。妇女和儿童们背着自己做的工艺品和衣服赶来，男人们来卖蔬菜、水果和其他种种工艺品。街上到处是热闹的市场，这点也同飞驒高山的感觉有些相似。

卖东西的大半是妇女和儿童。在广场和教堂前的市场里有自己摊位的人，坐在那里摆开物品一直卖到傍晚，没有摊位的印第安人妇女和儿童一整天满城里走来走去，看见游客模样的人就凑上去说“喏，买这个”。一般说来，她们开的价钱比市价多少便宜一点儿，但讨价还价要花不少时间。一到傍晚，她们就收起东西各回各家。

黄昏时分，常可见到结束一天买卖的印第安人静静坐在电器品商店前面的情形——他们出神地盯视橱窗里正在播放的彩电屏幕，那时间里一句话也不说，不发表意见，不笑，全身一动不动。仿佛所有人都被电视迷得魂飞魄散，真可以说是神奇的入魔场景。

不错，昭和30年代[27]日本也有街头电视，人们聚在那里愣愣地张着嘴注视电视荧屏。那一时期注视街头电视的日本人所感觉的，大约是对新奇玩意的好奇心和向往，其中有着新科技改变时代、改变生活那种微热的兴奋。人们在广场上或多或少共同怀有那样的情感。但在德拉斯卡萨斯电器品店前面，我见到的印第安人的表情里丝毫没有那种成分。印第安人简直像做梦一般静静、静静地看着电视。当然，他们是因为贫穷根本买不起电视才站在（或坐在）那里看的，不过从

他们身上感觉不出贫穷的阴影，没有贫穷派生的凄惨、扭曲和自暴自弃。他们就好像坐在那里做着个人的梦，也像是彻底进入了一时性的恍惚状态。

我们走出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首先访问的近郊印第安人村落是锡纳坎坦(Zinacantan)。沿着狭窄崎岖的山路好不容易开到那里。我们说“还是开帕杰罗才能来啊”，其实并非如此。原来我们走的是旧道，另一侧就有铺得平坦坦的好路。这个村落也是因为距德拉斯卡萨斯仅十一公里的关系，道路和学校设施看上去似乎相当齐备。空荡荡的村落正中建有一座崭新崭新的小学校舍，给人的印象有些异乎寻常。

西班牙征服者到来之前，锡纳坎坦村民的主要工作是在后期玛雅文明的守护下进行交易。他们在危地马拉至北部阿兹台克帝国的辽阔地域建立了交易网，运送和买卖各种各样的生活必需品和贵重物品。锡纳坎坦当时驰名全国，人们只要听到名字便高看一眼：“嗬，是锡纳坎坦人！”时至今日，那种昔日辉煌的面影在这山谷间的小村落里已全然无从觅得，不过是普普通通的印第安人穷村子罢了。社会状况由于西班牙人的出现而风云突变，使锡纳坎坦这块土地及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失去了自己的声音，彻底湮没在历史之中。

但仔细想来，湮没他们的历史不过是若干并存的历史性假说中的一个，其中应该同时存在一种有别于忘却他们的正规历史（我们在学校学习并作为知识获得的一般性历史）而通过他们的眼睛绵延不绝的“另一种历史”。那“另一种历史”恐怕至今仍在肉眼看不清的场所、在不以明确形式出现的事物中悄然而又顽强地跳动着——我坐在锡纳坎坦村的场院里漠然打量四周景致、耳听祭祀烟花声音的时间里，不由生出这样的感慨。

纵使曾经的现世荣光失去了，纵使西班牙人夺走了祖先的土地，纵使自身长年沦于隶从地位，而且古来的宗教也被强行剥夺了——或者不如说正因如此——住在这里的人们看上去还是没有失去其曾经作为精神磁场予以信赖的、深深植根于此的充沛想像力。恐怕正因为它是眼睛看不见的无形之物，所以才超越所有压迫而生生不息。那种强烈的共同体意识使他们拒绝同外部打成一片，使他们历经了近五百年

的西班牙人征服，却明确保持着作为部族的同一性（identity）。我觉得那就是他们的“另一种历史”。在这块土地上，时间似乎超越了我们的想像，彷徨着缓缓流淌。

罗伯特·罗林写的《蝙蝠人》（锡纳坎坦人曾将蝙蝠视为守护神加以崇拜）那本书，向我们传达了锡纳坎坦人这种鲜明而坚定的世界观，发人深省。其中介绍了这样一桩趣闻：1969年，一个少年在梦中听得一个神谕——“俯视湖水的山上埋有一口大钟，你要把它挖出来！”梦中，古代的神把他领去那个场所，告诉他就埋在这里。少年以自己的双手怎么也挖不出来，遂去村落长老那里寻求帮助，讲出了梦中的神谕。长老找到巫师，请教从少年口中听到的神谕是否属实。巫师经过繁杂的手续，认定神谕是真实的。随即开始挖掘。尽管正值玉米收割时节，忙得不可开交，村民还是一个也不少地手持铁锹聚集在那座山上，击碎石灰岩坚硬的岩盘往下挖洞，连续挖了两个星期。从结论说来，遗憾的是没挖出钟。留下的只是一个十多米深的颇为壮观的大坑。

所有的锡纳坎坦人对这样的梦都怀有极其强烈的兴趣，在某种情况下（例如某个梦有可能影响共同体命运的时候），梦不再是个人的梦，而成为整个共同体共有的梦。在那样的场合，巫师便向共同体提出建议，村民们同心协力予以实现。那样的事现在还有，人们戴着卡西欧表，提着收录机走来走去，然而他们至今仍做着作为共同体的梦。

此外，这里的人们出于宗教原因坚决拒绝照相。在锡纳坎坦附近一个叫胡安·查姆拉(San Juan Chamula)的村落里，几年前村民亲手杀死了两个在教堂内部照相的游客。这也可能照例是“从某某人口中听来的实际发生的事”，但各种旅行指南书都有记载，说不定实有其事。而且实际去查姆拉村时我感觉到：实有其事也好没有也好，反正发生那样的事没什么奇怪。

问题是搞摄影的松村君因为照相是他的生计，没法说一声“明白了不照好了”而作罢。一如这里出现的[28]，他以村里人为对象着实照了不少相，以致吃了不小的苦头，或被掷投石块或被殴打。我看不下去，劝他悄悄躲起来拍照。他摇头道：“不不，春树，相这东西要迎

面正照才行，悄悄躲起来照是卑鄙可耻的。”

松村君之所以坚决拒绝偷拍，其实是因为他在一家摄影周刊工作了好几年，偷偷摸摸拍照已经拍腻了。所以，死活再不肯偷拍，这已成了他的信念。“扔石块还算好的，上次去非洲照马赛人的时候，还给枪托打得去了医院。相比之下，这还算好应付的。”

既然他这么说，我也只好说“是吗，那就小心拍去好了”。不过松村君的确吃了苦头，我从旁看着都很不忍。他一照相，周围的人就把各种物件扔过来，而且频频击中目标，不偏不倚正好打中脑袋，简直像每天都在练习对着什么目标投东西似的。我真担心他一来二去因此丧命。摄影师这活计可不是好玩的。小说家还算好，文艺批评家（我又提起来了）也不至于有真石块打来。

但看样子松村君到底切实感受到了生命危险，几天之后终于委曲求全，用床单挡住车窗玻璃，从缝隙里偷偷拍摄。毕竟训练有素，这样一来——这么说或许不好——效率实在快得很，质量也好，令人叹为观止。虽说不该对此招术表示敬佩……

每次进入印第安人村落，我都尽量离开松村君行动，以免受其连累。我又不拍照，若有石块抛来可吃不消。我做出不认得此人、此人与我不相干的神情，尽可能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做笔记或画几笔速写。人们讨厌被拍照，但速写则不放在心上。像这次这样带着写文章任务的旅行，有时是需要做视觉记录的，那种时候一般用傻瓜相机三下两下拍摄下来，但这里是难以使用照相机的地方，只好画上几笔。画画决不是我的拿手戏，不过坐在教堂石阶上慢悠悠地勾勒周围人所穿衣服的颜色样式，感觉非常不坏。在这种场所，时间的流逝较之照相更适合速写。

不过，并非所有印第安人都讨厌拍照。在查姆拉，表示给钱的话但拍无妨的女孩也不算很少。那是卖东西的女孩，我说东西不要，“那就照相好了，一千比索”。一千比索换算成日元为四五十元，能买四个果酱面包。甚至有母亲主动领着小孩来要求拍照。差别当然因人而异，总的说来，对于拍照的抵触情绪，好像小孩比大人少，女的比男的少。在印第安人村落，多是女孩以游客为对象卖东西，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她们比男人更现实、更为深切地同货币经济打交道。可是，如此用钱换来的拍照又有多大意思呢？想到这里，心情多少复杂

起来。

如果你有机会来恰帕斯的印第安人村落，恐怕还是把照相机放在什么地方，沉下心来悠悠然来个速写什么的为好。技术好坏另当别论，反正这样惬意得多，可以顺利地同村民打成一片，心情也比偷偷摸摸拍照或被投掷石块好出几倍。

锡纳坎坦在为一位名叫圣托·奥塔博的圣人举办祭祀活动。规模不很大，没有庙会，人们也没聚集，只教堂的院里有乐队演奏，还放了烟花。教堂大院有一座双层凉亭模样的建筑物，二楼成了舞台。乐队在那里并排演奏祭祀音乐：小号两把，萨克斯管两把，乐号两把，土巴号一把，加上鼓。乐队成员像是外地来的半职业性人士，不同于当地人。穿的都是普通衣服。乐队演奏了一阵颇有气势的音乐之后进入休息，下面的本地演奏家代之继续演奏。说是本地演奏家，其实也就是那一带的三个老伯，两个打小鼓，一个吹竖笛。音量小，气势不足，旋律也不清不楚。三个人一屁股坐在地上，不无凄切地一个劲儿演奏类似日本古代祭祀音乐的什么：哔——啪啦、哔——啪啦……

但是，较之二楼那种有气势的“嘣锵咔、嘣锵咔”的演奏，还是这边不无凄切的音乐更让人感到安然。尤其对我们日本人来说，那一声声“哔——啪啦、哔——啪啦”感觉上总好像很亲近。但很快二楼乐队又开始演奏了，下面的老伯们戛然而止。演奏当中，两方面的演奏者都始终面无表情，既不笑意盈盈，又不郁郁寡欢，压根儿没有表情那个玩意儿。演奏本身也平铺直叙，全然没有高潮，只音乐在不间断地流淌。

烟花工一共五人，脸上也几乎不见表情。看服装，同样像是从别处赶来的专职烟花工。估计乐队和烟花专家是按照祭祀活动的日程走村串巷维持生计的。他们以熟练的手势用木槌“通通”敲打黑色火药，将其塞入筒中，塞罢点火，“嘭”一声打向天空。看上去快要在手边爆炸了，但工匠的手上一道烫烧的伤疤也没有，想必万无一失。虽说是烟花，但视觉上不怎么好看。毕竟是大白天放的，除了烟别无所见。嘭——，声音自是虎虎生威，而在空中只是“啪”地散出烟来，再无下文。打完放完，老伯们再次从腰间的葫芦里掏出黑色火药用木槌敲打……如此周而复始，俨然永久性运动的一部分，极为机械，极为事务性。那时间里，乐队兀自“嘣锵咔、嘣锵咔”或“哔——啪啦、哔——

啪啦”个不休。

同样的过程无数次单调地翻来覆去，惟独时间在缓缓流移。可是，坐在教堂院子里和孩子们一起看着那光景，我却并不怎么感到无聊和厌烦，甚至还涌起了某种怀旧之情。如此说来，日本过去的祭祀也是这般慢慢悠悠的感觉。祭祀活动这东西，不是“啪”一下掀起高潮又“啪”一下偃旗息鼓那样的名堂，而需要从早上起就开始品味其绵长的过程。在某种情况下，较之精彩的祭祀，我们更欣赏无限延长的低迷情怀。

这样的心情——类似“如此说来确是这种感觉”的怀旧心情——我在这一地区旅行时有好些地方都感觉到了。例如在细雨如烟的乡村山道上开车拐过一个弯，便有另一番风景豁然展开。那种时候，眼下点点散在的民舍房顶、山坡一小块一小块的农田，不由让人觉得仿佛看见了日本的乡村风光。我问身旁的阿尔富雷德：“你不觉得有的地方同日本的乡村很像？”他回答说：“唔——，怎么说呢，我倒不觉得有多少日本情调。乡村风光么，哪里都大同小异吧！”但我以前去了很多国家，看了很多乡村，产生如此亲近感还是第一次。特别是在美国东部生活一年半之后，目睹这样的景色，真是让人由衷觉得“是啊，这在视觉上完全看得出”。在美国生活，经常感慨——这和心情好坏无关——自己到底是在别处生活，是在并非本来应该在的地方生活。这是社会如何、人种如何等问题之前的问题。在此之前，环绕我们的风景在视觉上就是“别处”。在那里，风景一般不是作为潜在性记忆，而是不由分说地直接诉诸我们的心灵。当然，目睹美丽风景自会感觉其美，感动也是有的，但那仅仅是在“美丽”这一语境中的感动。然而，我在恰帕斯山中蓦然感觉到的不是那样的东西。我在那里感觉到的不妨说是一种共时性心情——绵延不绝地伸向很远很远的远方、无法用现成语言顺利表述的心情。

当然不是说我对墨西哥原住民怀有廉价的连带感，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化上抑或人种上，我们都同他们有很大的隔阻。尽管如此，在那里转悠的过程中，我仍然感觉到脚下有一种无可言喻的根深蒂固的东西存在，而能够让我产生如此感觉的地方，即使找遍全世界我想也没有很多。

走进锡纳坎坦的教堂，正看着身披艳丽的紫色长袍的基督教徒和

身着此村特有服装的圣母马利亚，一个十来岁的少年走过来问我带没带圆珠笔，他想要。我把圆珠笔放在车上，就说没有。少年于是说想买一支圆珠笔，能不能给他一点钱。我给他一千比索。一千比索大概买不了圆珠笔，但我零钱只那么多。随后又一个男孩过来问我带没带圆珠笔。具体情由不晓得，总之圆珠笔在这个村落好像大受欢迎。

胡安·查姆拉是个大村落，比锡纳坎坦大得多，人们的性格看上去较为积极开朗。有的旅游指南上介绍说是“桃花源一般的村落”，但我得到的印象并不那么乐观。同锡纳坎坦的人们相比，这个村落的人生活似乎贫穷得多。小孩子们不像锡纳坎坦的小孩那样说话绕弯子——比如“对不起，您带圆珠笔了么”之类——而是一齐围住游客说“给钱呀给钱呀”，或者把手里的工艺品、礼品硬塞上来死活要卖。车一停就被一群小女孩围住了，说“帮你好好看车，给两千比索”（倒是好好看着的）。身上的衣服全都破破烂烂，头发乱糟糟的，满是污垢。穿鞋或穿拖鞋的小孩几乎没有。我没给钱，以饼干代之，全都狼吞虎咽地“咯嘣咯嘣”吞下肚去。由于政府采取改善印第安人生活设施的政策的关系，道路在这里同样漂亮得令人吃惊，但走在路上的村民形象多少显得不够相称。

这里也像多数印第安人村落那样，人们的衣着整齐划一，那像是他们属于这个共同体的一个象征。妇女从小孩到老太婆统统肩披青色披肩，下穿黑色缠腰式裙子。男人整个披着麻毯那样的外衣，下面穿一条短裤。几乎所有男子都头戴帽子，脚穿瓦拉齐凉鞋，戴着手表。听说通过服装的细微差异可以看出一个人在村里的身份，但我看不出来。总之在服装方面有种种繁琐的规定。村民的服装可以在礼品店里买到，但当场穿买的衣服有时是有危险的，因为那意味着外人侵害了共同体的规定。

无论哪个村落，一进村最先看到的必是教堂。这里的教堂门涂成鲜艳的薄荷绿色。我当然不知道“我们村的教堂门涂成薄荷绿色好了”这样的决定是如何作出的，有可能是召开全体居民会议表决通过的，或者薄荷绿自古以来就是村落的主题颜色也未可知（如此说来，妇女们身上的披肩青色与此相近）。教堂里没有椅子。十分适合“土屋”一词的空空荡荡的地上铺满了松树枝，到处立着燃烧的蜡烛，较之庄严，气氛更富有巫术意味，甚是不可思议。与西欧教堂相比，未

尝不可以说像是异教。十字架的比例也同欧洲天主教堂里的截然不同，演奏的音乐也不是所谓教堂音乐。其间时不时有印第安人进来，赤脚踩着松叶走到祭坛前，在那里跪下悄悄画十字。教堂里不允许带进照相机。游客因在教堂拍照而被村民杀害的事件就发生在这个村落。

教堂前有片很大的空地，空地上有集市，出售当地居民的必需品和食品，没什么东西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卖的多是鱼干、甘蔗、椰子、柠檬、香蕉一类东西。我在露天摊床吃了煮玉米和玉米煎饼卷鸡蛋。这东西听起来似乎很好吃，其实就是用玉米煎饼把变凉的煮鸡蛋卷起来吃。直截了当地说，谈不上多好吃。

另外用五百比索从一个卖货的小女孩手里买了两个小小的饰扣。

安德烈亚斯·拉腊因萨尔位于从锡纳坎坦往山里进去一点点的地方。进村的道路没有胡安·查姆拉和锡纳坎坦那么像模像样，交通相当不便。已有筑路车进入，想必很快修好，但眼下很大程度上还处于悲剧状态。稍一下雨，路就致命地泥泞不堪（泥没脚腕），即使四轮驱动车也很难行驶。在我们的车前面，一辆卡车陷进泥里进退不得，一筹莫展。路又窄，无法超车。众人把石头、树枝垫在车轮下一起从后面推，花了三十多分钟才好歹推出。那时间里我们一直在后面等待。

每到星期日，拉腊因萨尔都有相当大的集市。我们到的当天正好是星期日，得以仔细观看集市。这里卖的是日常生活用品，把货物装在卡车上从城里运来的商人或者带着蔬菜和家畜从近郊赶来的农夫分别摆开摊位，买东西的印第安人聚集在村落广场。仍在滴血的猪头在台子上一字排开。也有人卖玛切提（砍山刀）。这里最有人气的商品是盒式收录两用机，卖这东西的摊前围着一大堆人。买两用机的印第安人播放的无一不是那种“铿锵铿锵铿锵”的墨西哥民谣，着实伤透脑筋——不过在别人的国家这么说也没用。

这个村落的小孩子总的说来比较老实，看见游客不那么死皮赖脸黏着不放。有一个漂亮得让我吃惊的8岁女孩，我从她那里买了个布袋。布袋本身自是不坏，但那女孩长得极为漂亮也是我购买的一大原因。的确，世界上什么地方都是长得漂亮占便宜。对方最先的报价我忘了，讨价还价的结果，以四千比索成交（在这方面，8岁也表现得

十分了得，叫人佩服）。不料付款时一翻钱夹，里面的零钞只有三千五百比索。一万比索的钞票倒是有的，但零钞怎么也没有。于是我说：“对不起，三千五百比索可以么？只有这么多了。”女孩随即以极其伤心的眼神目不转睛地久久看着我的脸，简直就像看斯克鲁济[29]老伯似的，而后一声不响地接过我的三千五百比索去了那边。至今每次想起那小女孩的眼睛，我都觉得自己在拉腊因萨尔村做了一件十恶不赦的事。

还去了几个村落，但逐一写起来越写越长，就简单记述一下。在切纳尔奥村，松村君拍照时被“砰”一下子打了脑袋。我一如往常做出“此人与我两不相干”的神情，或去观看某个宗教性质的队列，或进店喝啤酒什么的。松村君在教堂后面的空地站着小便之时，被高声怒骂了一通。如今看来，能活着回来已是幸运。这个村落，醉鬼多得不行，喝红脸的汉子到处踉踉跄跄东游西逛，广场上还常有人吵架。

田纳哈帕村的入口有一家店名叫“战斗妇女工会工艺品店”。西班牙文为：

SOCIEDAD COOPERATIVA DE ARTESANIA UNION DE MUJERES EN LUCHA S.L.C

详情不大知晓，大概是一种运动——这一地区编织东西的妇女聚集起来成立了工会，把自己的产品集中放在一个场所有组织地推销出去。目的似乎是通过统一商品流通而防止价格过度下滑，排除中间盘剥。店里卖货的清一色是妇女。运动的动机本身固然不错，但“战斗妇女”这一名称毕竟有点儿吓人。这么说或许会遭到女权主义者的斥责，可我还是觉得，既然是卖东西的店，还是取一个温柔些的名称为好，别去管什么思想性。不出所料，进店交涉价格，问“这个不能便宜点吗”，对方当即回答：“NO！”就是说此乃工会统一定价，不容讨价还价。据纺织品权威阿尔富雷特（此君是很多很多东西的权威）介绍，东西好是好，就是有点儿贵。我也认为有点儿贵，况且来墨西哥以后已经完全习惯了讨价还价，骤然间要我按统一定价买总有些不甘心。因此之故，最终什么也没买就出来了。后来看书得知，关于统一定价，村落内部也有剧烈争吵，哪一种类的争吵不大清楚，反正我的基本方针是尽可能不介入妇女内部的争吵，再说又是“战斗妇女”内部

的争吵。

依我观察的范围，在这一带的印第安村落，男人一般从事传统农耕经济，妇女则从事以游客为对象的服务产业。也就是说自古以来就是男耕女织。但明白自己所织布匹值钱的妇女的目光逐渐从共同体内部投向——情愿也好不情愿也好——外部世界，在某种情况下发展成了“战斗妇女工会”。不用说，这种过激方式不可能一帆风顺，前面也说了，既有内部争吵，又要受到企图维持原有体制的卡西肯（地主）的剧烈迫害。“战斗妇女工会”运动往下能否获得成功当然无从知晓，但这些山谷间的小村落里正在一点点地诞生以妇女为核心的新型经济结构，这一点应该是难以否认的事实。新路修成之后，自有游客跑来，而游客增多，商品流动也会随之增大。这种经济结构的转换，势必大大改变依赖农耕经济的共同体结构。我觉得这是无法抗拒的历史进程——外部的历史终于追上了他们。

离开恰帕斯州，再也见不到那种共同体式的印第安村落了。距恰帕斯不很远的拉坎东，深山老林里居住着传说中的印第安人，如今他们也已失去了原来的生活环境，多数背井离乡进城找事做。从飞机往下看就知道了，能够称为森林的森林几乎荡然无存。曾经覆盖辽阔大地的蓊郁茂密的原始森林被砍伐了百分之八十五。那里有的，只是遍布于红褐色土地上的怵目惊心的热带雨林残骸。

估计人们就要这样放弃做共同的梦，放弃心灵的共振，放弃倾听远方的回声了。我觉得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悲哀的事。为什么呢？因为我在恰帕斯深山中遇到的印第安人贫穷固然贫穷，但他们是具有轮廓清晰的价值观、世界观并引以自豪的人。我不是什么文化人类学者，只不过从这个村落到那个村落观看了几天，没有任何资格说结论性的大话，但是想到往后外部体系将一点一滴渗入他们中间，致使他们引以自豪的东西和以往的价值观不再有效，想到那时他们身上将发生什么，我不由有些黯然神伤。

墨西哥政府正在致力于印第安人生活设施的现代化，那当然是好事。他们修筑道路，建立学校，充实医疗设施，这是开发的三大支柱。然而这样的现代化必然大大改变迄今几乎处于隔绝状态的印第安村落的结构，改变从属于那里的人们的意识。

一次听到一个从故乡村落进城的印第安小伙子说的话。小伙子在故乡村落生活时一次也没有挨过饿。虽然村落贫穷，但他不知道饥饿是何滋味，因为如果他在村里肚子饿了，只要向谁道一声“你好”即可。对方听到这声寒暄，就会说“啊，你像是饿了，来我家吃饭”，随即给他饭吃。那声“你好”有一种韵味，完全可以从中听出对方是否饿肚子、是否身体不适。他们在心中培育了那种韵味。因此，那个印第安小伙子来到城里最初一段时间，每当肚子饿了就向各种各样的人说“你好”。然而谁也没给他饭吃，只是还给一个寒暄“你好”。他到处说“你好”直到说得发不出声音，但谁都没说一句“来我家吃饭吧”。于是他终于认识到：这里没有人能领会那句话的韵味。

在下着凉浸浸的牛毛细雨的恰帕斯山谷里转了几天之后，尤卡坦半岛的风景显得格外呆板。空气热得闷乎乎，人们的样子看上去总有些凄凉。在下山过程中，觉得以前始终感知的某种类似静谧情韵的东西消失了。那是一种有点不可思议的感觉。

即使在伏案写这篇文章的现在，眼前仍然浮现出拉腊因萨尔村那个因少给五百比索而目不转睛久久盯视我的漂亮的卖东西小女孩的眼睛。她当时的眼睛里仿佛存在着一种摇撼我的心的东西。回想起来，和一个人那般专注地四目相对，对于我来说的的确确是久违的事了。围绕着五百比索（二十日元），我们长时间地窥视对方眼睛的深处。也许你想充其量不过是二十日元，我当时也不是没那么想：有什么办法呢！对不起，现在口袋里只有这么多嘛！但那当然不是钱的问题。那是我和那小女孩之间的交流问题，心弦的颤动方式问题，我觉得。

我甚至心想，将来长大，那个小女孩说不定也会成为“战斗妇女”中的一员。只是，到那时候，恰帕斯山中的印第安村落想必已面目全非。

---

[26] 日本城市名，位于岐阜县北部。江户时期为幕府直辖地。因其格局和山川风物同京都相似，故有“小京都”之称。

[27] 相当于1955—1965年间。

[28] “这里”指书中的照片（原书有照片）。

[29] Scrooge Muduck，短篇小说《圣诞颂歌》（后改编为动画片）中的主人

公，商人。一生爱财如命，对穷人分文不舍，但在圣诞夜由于三个精灵的出现而领悟了生活的意义，在圣诞颂歌响起时开始了新的人生。

超“有深度”赞岐乌冬面之旅



1990年10月。《高级时尚》一位名叫松尾的年轻漂亮且有才气的编辑（当时）每次见到我都炫耀（大概此外别无炫耀）她老家的赞歧乌冬面。于是我说“那么就去尝尝吧”，随即前去采访。同行者为安西水丸。三人“吐噜吐噜”大吃乌冬。不过的确好吃。近来不由想再去吃一次“中村乌冬”。采访之余，爬一爬金刀比罗宫的石阶也不坏——令人怀念哪！



超“有深度”赞岐乌冬面之旅

也许香川县这个地方此外也有许多名堂足以令人吃惊，但我去香川县最为吃惊的，乃是乌冬面馆之多，多得铺天盖地，简直让人觉得除了乌冬面馆就一无所有。什么寿司店啦拉面馆啦荞麦面馆啦几乎见不到，无论去哪里都是乌冬、乌冬，就好像“五·一”节明治公园随风飘扬的彩旗，甚至觉得旅行期间从早到晚看的全是乌冬面馆的幌子。

除了乌冬面馆的幌子，勉强留在记忆里的，顶多只有写着“热情待人”字样的“狮子俱乐部”竖牌和名叫“就那里”的酒吧招牌。我虽然不大喜欢就细节说三道四，但到底弄不明白将“就那里”作为店名的人发的是什么神经。“就那里”指的不就是“那里”吗？另外，“热情待人”也蛮够意思的。这招牌是在金刀比罗宫附近一个街角发现的——风风火火提起这个来，作为我也伤透脑筋。标语这东西还是把意象（image）限定一些才好。四国[30]人到底想的什么？一塌糊涂。

这且不说，总之香川县乌冬面馆为数甚多。如果统计出每人所拥有的乌冬面馆的比例数字，香川县必占全国之首无疑。

老实说，对于《高级时尚》杂志，这次很难说是多么时尚的采访活动，我多少觉得有点儿不对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赞岐乌冬面同时尚之间没有任何关联。按理，这样的策划该让给《太阳》、《四季之味》或退一步让给《Mistress》[31]才是道理。然而却由《高级时尚》搞起来了。这又是何故呢？原来责任编辑松尾（松尾小姐，女性，敬称从略）同我一见面就谈乌冬面（或许香川县出身的人话题一般来说很有局限性），而我本来就中意乌冬面，每次松尾说起来都觉得十分好吃，听着听着就恨不得马上吃到嘴里。松尾差不多每次都淌着口水和鼻水大说特说，既然那样，那么就去四国吃乌冬好了，顺便采访一下，写成报道。实不相瞒，起初还叫我写Comme des Garcons[32]展览会方面的报道来着，我说那东西我可不太明白，若是乌冬面倒还可以写一写。如此说说笑笑之间，乌冬面之行就真的定了下来，只能说是势之所趋。

于是向安西水丸打招呼：“一起去四国吃乌冬面如何？”“啊，好

啊，去就是了！”这么着，三人就一晃儿去四国做了三天两夜之旅。时值秋季，气候也适宜，正好去四国一边悠悠然游山玩水一边放开肚皮大吃赞歧乌冬。尽管10月已进入尾声，但四国仍热得只穿一件T恤都冒汗。

也可能有读者以为乌冬面馆这东西全国不管去哪儿都大同小异。但明确说来，这看法不对。香川县乌冬面馆同其他地方的相比存在着根本性区别。一言以蔽之，即相当“有深度”[33]，感觉甚至像深入某个美国南方小镇去吃油炸鲶鱼。

小悬家

到四国最先进入的乌冬面馆，刚一坐下就有礤床儿和长约二十厘米的大萝卜端了上来。我心中生疑，可四下一看，但见客人全都以一本正经的神情“咔喳咔喳”礤着萝卜。不得已，我也右手萝卜，左手礤床儿，“咔喳咔喳”礤起大萝卜来。从点乌冬面到煮好大约有十五分钟，以此消磨时间诚然不坏，问题是店堂里的客人全部礤大萝卜，作为场景相当奇妙。我蓦然心想，礤大萝卜在本质上恐怕应属于个人作业。固不能说是孤高之举，却也不应是集体行动，虽然怎么都无所谓。

况且大萝卜很硬，礤起来需要非同一般的腕力和握力。相对说来，我算是腕力大的（老婆常说惟独这种时候派上用场），尽管如此，还是累得气喘吁吁。倘若去年心脏病一齐发作的老年夫妇来这里吃乌冬，那可如何是好？虽说事不关己，但也够让人担忧的。

和萝卜一起端来的还有酸橘子。桌面上放有五香粉、葱和生姜。葱不是关东常见的白葱，而是软乎乎的青葱。此外有芝麻，转动磨盘“咔咔”碾碎的那种。还有酱油、装在软管里的辣根和味精。采访当中我进过十来家乌冬面馆，几乎家家都有味精，不妨说是保留项目。香川县多数人吃乌冬面时都洒味精，那也够壮观的了。

另外，或许有人问乌冬面馆为什么有酱油。这是用来淋乌冬面的。就是说，冷乌冬面端来后，客人把酱油“刷刷”淋在上面吃。这叫“酱油乌冬”。

好容易跑来四国，我也想品尝一下这“有深度”的酱油乌冬。这东西相当可以，简洁豪放，以荞麦面条言之，就是所谓“小笼屉”[34]之感。放久失去弹性的乌冬就不成了，若是刚刚摔打出来的生龙活虎的乌冬，淋上酱油，覆以葱花调味，“吐噜吐噜”吃起来，味道禁不住让人拍膝叫绝。

这家乌冬面馆名叫“小悬家”，似乎相当有名。乌冬的软硬度是稍微偏硬。酱油乌冬大碗四百日元，小碗三百日元。同东京的荞面馆相比，价格固然便宜，但以香川县乌冬面馆的标准价格来说，可能算贵的。馆里除了乌冬面，还有御田[35]和油豆腐寿司之类，吃的人像吃自助餐那样随意取来，同乌冬一起吞食，算是一种菜肴。哪家乌冬面馆的章法好像都和这家差不多。

这是面向初食者的乌冬面馆，让你大致有个感觉。往下就陡然往“有深度”进军了。

中村乌冬

下一站是丸龟附近的“中村乌冬面馆”，这家可真叫厉害，是“有深度”之中最“有深度”的。不但交通极其不便，而且店的位置也难找，实在不敢向一般游客推荐，但若是近乎偏执的乌冬爱好者，则务请前往一试，绝对不虚此行。

第一点，此店几乎位于农田的正中，连个招牌也没有。门口倒是写有“中村乌冬”字样，但故意（我认为）写得很小，存心不让路上的人瞧见。若不绕一大圈走到最里端，绝对看不出那是一家乌冬面馆，可谓相当乖僻。我们是搭出租车去的，连司机也吃了一惊：“哦，这地方竟有乌冬面馆，没想到！”

店小得不行。与其说是乌冬面馆，不如说更像建筑工地放器材的小仓房，里面凑合着摆了几张小桌。经营“中村乌冬”的是中村父子。我进门时，无论父亲中村还是儿子中村都不在，只有一个老汉在装满水的大锅前独自“吭哧吭哧”煮着乌冬面团。我以为他大概是中村父子中的一位，就打了声招呼，不料他说“哪里哪里，我是客人”。这家面馆的规矩，客人只管拿起那里摆着的乌冬面团煮熟，淋上汤料或酱油什么的吃，随便放下钱走人就是。我思忖这地方甚是了得，但入乡随

俗，我等也自管煮好乌冬淋上汤料，端起大碗走到门外（店堂太小），坐在石头上“吐噜噜吐噜噜”吃了起来。时间是上午九点多，天气好，乌冬味道也好。一大早就坐在石头上“吐噜噜”啜食乌冬面，渐渐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心情，心想世人爱怎么想就怎么样想了，管他呢！乌冬面这一食品里，肯定包含着损耗人的知性欲望的某种因素。

正吃着，父亲中村出来了，儿子中村也出来了。父亲中村捏着乌冬摔打的时间里，我们听儿子中村介绍情况。面馆开了十八年，儿子中村说，那以前是办养鸡场的，再以前办木材加工厂赚了钱，鸡不下蛋以后开始经营乌冬面馆。从养鸡场忽然转行开乌冬面馆，设想足够大胆，不过在这香川县也许并没有什么不自然。经他这么一说，再仔细察看，乌冬面馆的建筑果然有点儿像鸡舍。

乌冬面馆建筑物后面是农田，栽着大葱。据一位客人证实，一次发牢骚说没有葱，结果被父亲中村训斥道：“啰嗦！自己去后面的地里拔来！”总之这家乌冬面馆够野的（我也渐渐带上了方言味儿）[36]。如此闲聊之间，父亲中村捣鼓完了新乌冬，随即在锅里过一下水，洒上葱花和酱油端给我们。的确可口得很。刚才吃的已经够可口的了，但同这刚刚打出的乌冬相比，香味和毫不含糊的韧性到底差了一档。在此次采访中吃到的许多乌冬里，这碗乌冬也堪称珍品中的珍品。去“中村乌冬”碰巧吃到刚刚打出的乌冬之人堪称幸运儿。

“中村乌冬”是用双脚踩着揉成的。没有揉面机的话，保健所是不发卫生执照的，所以开店时购置了一台二手机，但检查过后不再使用，一直用人脚踩着制作。“不这样不好吃的。”儿子中村一口咬定。明确地说，这对父子无论所说的话还是经营方针都很偏激，可乌冬又好吃得没得说。听对方用东京腔说“不这样不好吃的”，不由得想插嘴道“哦，是吗”，而当他说“不用这招儿不够味儿”时，就只能为其本地方言的动感所折服了[37]。

桌上摆有葱、生姜（自己捣碎）、五香粉、味精、山濑酱油（淡味型，琴平产），放在乌冬里的配料有筒状鱼糕、天妇罗[38]、鱼肉山芋饼。天妇罗是儿子中村自己炸的。乌冬面团小的一团八十日元，相当便宜（带走五十日元）。听说一人大体吃五团，但我不是香川县民，觉得三团足够了。客人多是回头客，有不少人为吃这乌冬面特意

从远处赶来（虽说是远处，当然也不是从带广或那霸[39]坐飞机赶来，只是那一带的邻镇邻村）。食客愿意自带鸡蛋和萝卜也悉听尊便。不上酒，但好像可以随便带来。如此非同一般的乌冬面馆，我想此外找不出第二家。不过，如果专门带着大萝卜来吃乌冬，怕也是够意思的……

山下乌冬

此店位于一条名叫绫川的河边，门前有过去碾粉用的水车。同样没有招牌，只门口旁边有一块写有“邮政局邮递员休息处”字样的牌子。大概香川县邮局职员是在乌冬面馆里休息的。也许从东京调来香川的职员下班后听上司说“找一家店去”，找到这里还以为是酒吧或卡拉OK，不料进去一看却是乌冬面馆，于是两人“吐噜噜”吃一顿乌冬了事——好个温情脉脉的风气。

“山下乌冬”基本上是家面条厂，给乌冬吃算是一种小小的招待。来买乌冬的人提出品尝乌冬，于是摆上桌子，烧开水，拿来酱油和料汤，生意就这样开始了。所以桌子旁边就是一字排开的面条机。香川县有很多这样附带乌冬面馆的面条厂。以东京说来，就是既制作三明治又上咖啡的面包屋。两张简单贴有装饰板的餐桌，十三四把钢椅，芝麻、生姜、味精、酱油、葱，必需之物一应俱全。乌冬一团一百日元，筒状鱼糕天妇罗七十日元，是面条厂刚刚制作出来的，味道毕竟不一般。支一口老式大锅，以树皮为燃料，“咕嘟咕嘟”烧着水。

听了主人山下先生的介绍：“战后国产小麦减少，味道也变了。我小时候把附近收上来的小麦碾了做面条吃，那真叫好吃。如今差不多所有小麦都是澳大利亚产的。”

虽说是进口货，但日清面粉厂为香川县生产了特配的面粉。这是因为，香川人对乌冬的标准特别严格，面向全国的普通面粉受到了用户的投诉。我也看了，供给香川县的面粉的确印有“香”这个标记。着实讲究。

加茂乌冬

乌冬接着乌冬，肚子渐渐吃不消了，但别无他法，下一站是“加茂乌冬”。“老是这么吃乌冬可真够受的啊！”水丸君说。那对我也一样，我也想吃点儿不是乌冬的东西。如果可能，想来点咖哩饭什么的。然而，彻底对付乌冬乃是采访主题，是为这个才来四国的，后悔也来不及了。这么着，只要体力支撑得住，就只能继续吃乌冬。接下去是“加茂乌冬”。

光从外景来说，我绝对中意此店。不折不扣位于农田正中，坐在屋外的长板凳上吃乌冬，但见稻田在眼前平展展地铺陈开去。时值秋日，稻穗在清风吹拂下窸窸窣窣摇曳不止。一条小河就在前面流过，天高气爽，鸟声频频。清汤乌冬八十日元，大碗一百四十日元。配菜有炸牛肉饼和鸡蛋，都放在桌上。乌冬当然够味儿。这次都是请当地人介绍的，就味道而言，哪一家都高出平均线。水丸君吃着炸牛肉饼：“味道好极了，这个！”店堂一角的煤气炉上煮着竹笋，正“咕嘟咕嘟”发出声响。常有当地人顺路进来“吐噜吐噜”吃乌冬，很有乡土气息，人们显得其乐融融。松尾如今因为任职于《高级时尚》，开口Comme des闭口三宅一生[40]，自以为好了不起，其实高中放学路上还不是走进这种面馆淌着鼻水吃乌冬的！

在这里吃乌冬算是小憩，然后去见香川大学教授、乌冬权威真部正敏先生。进了教授室，先生始而不解：“到底采访什么呀？高级时尚？”继而谈起乌冬。先生任赞岐乌冬研究会会长，出版一份名为《赞岐乌冬》——名字不无即物味道——的像模像样的会刊，日前还去中国交流面类的学问，实非一般教授。会刊读来也妙趣横生。只是读这刊物，让人觉得香川人也许除了乌冬什么都不思考，这恐怕也是个问题。

据先生介绍，现在赞岐乌冬使用的小麦为澳大利亚产的ASW（Australia Standard White）这一品种。这是澳大利亚人为用于乌冬面而进行品种改良后面向日本市场特别生产的小麦，有香味，韧性好，口感滑润，其特性出类拔萃，而且原价比国产的低得多，因此转眼之间席卷日本市场。那是昭和50年代[41]中期的事。我也在各家乌冬面馆看了原料面粉袋，发现哪家用的都是同一牌子的面粉，所以正确说来，进口ASW以前的赞岐乌冬和其后的赞岐乌冬味道也应该有所不同，实际上“山下乌冬”的主人也说还是过去的味道好。

但真部先生并不附和这个说法："味道是记忆中的东西，至于哪个味道好、味道有怎样的变化，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这的确有其道理。想必这在香川县内也是引起争论的话题，或者说是竞选县长的一个论点也未可知。

但不管怎样，整个日本不管哪里都吃同一味道的乌冬也未免单调，我也有此看法。上面也写了，就算面向香川县的麦粉品质真的高一档次，赞岐乌冬也应具有唯独赞岐乌冬才有的不容怀疑的独立性才对。因为以如此不亚于虔诚信仰的澎湃激情热爱乌冬的县民，即使找遍全日本也绝无仅有。我想，假如某一天澳大利亚同日本因故断交，全面中止面粉出口，乌冬这个东西荡然无存，那么至少在香川县会掀起革命浪潮吧。

从真部先生口中听到了不少关于乌冬的令人兴味盎然的学术性见解，可惜篇幅不够，只好移师下一站。得！

久保乌冬

这家乌冬面馆也是面条厂直接经营的，但因其位于高松市内，比之其同类，作为乌冬面馆的格局还蛮像那么回事，从外面看无可挑剔。我们到时早上九点刚过，但里面已座无虚席。因为有很多人早餐也吃乌冬，所以香川县的乌冬面馆开门早。这里的汤料有一股小沙丁鱼干味儿，甚是可口。主人说，小沙丁鱼汤料的味道取决于起网时间，这点极难把握。这里清汤面和小笼面各占一半。

看上去客人吃的效率非常高。基本上是男子一个人进来，简单点罢，从台面随意取来炸牛肉饼或炸豆腐，以熟练的手势加进调味品，"吐噜噜"默默吞食，食毕放下钱迅速离去。极其Hard-Boiled[42]。假如菲利浦·马洛[43]生在香川县，肯定如此吞食乌冬无疑。不剽悍吃不了乌冬，不温柔没资格吃乌冬——是否果真如此我不晓得，姑妄言之罢了。

此处小团一百二十日元，大团一百九十日元，特大团二百六十日元。

此外也转了不少乌冬面馆，无法一一写来，只好忍痛割爱。上顿

下顿净吃乌冬，感觉上好像三天吃完了一年的份额。“乌冬面都快从我鼻孔里出来了！”松尾说。采访期间松尾一直患重感冒擤鼻涕，没准真的出来一两条。

这个不说也罢。反正香川县的乌冬好吃得超越了所有怀疑、所有保留意见。旅行结束之后，我对乌冬这东西的看法也好像整个为之一变，即使说我的乌冬观发生了“革命性转变”也不为过。以前我住在意大利的时候，几次去托斯卡纳的基昂蒂地区旅行，转了好多葡萄酒厂，结果我对葡萄酒那东西的想法整个为之一变，而此次乌冬体验足可与之匹敌，我想。

在“有深度”层次上吃的香川县乌冬有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气息。我深切地感到这里的人们是如此这般吃着、如此这般生活着的。同香川人谈起乌冬的时候，简直有一种像谈家庭一员的温情，每一个人都带着关于乌冬的回忆，谈得真诚感人。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正是这样的温情才孕育出了美味。

不过，“中村乌冬”是够厉害的啊！

---

[30] 日本四国地区，包括德岛、香川、爱媛、高知四县。古为四个藩国，故名。

[31] 均为日本时尚杂志名。

[32] 日本时装设计师川久保玲设计的名牌产品名称。

[33] 原文为deep，意为“深厚的，浓厚的”。

[34] 即小笼屉荞麦面条。将煮熟的荞麦面条盛在小笼屉里，蘸浓味佐料汤食用。

[35] 将豆腐、魔芋、萝卜、胡萝卜以及鸡蛋、鱼丸等放在一起煮熟的菜肴。类似中国的杂烩、杂煮。或译“日式好炖”。

[36] 原文带有方言腔。

[37] 后者原文为香川方言。

[38] 油炸虾或油炸蔬菜（如茄子、青椒等）。

[39] 带广位于北海道，那霸位于冲绳，均距香川很远。

[40] 日本著名服装设计师。

[41] 相当于1975—1985年间。

[42] （小说中）以不含感情的理性文体表述冷酷、冷漠的内容。钱德勒等美国侦探小说作家所用手法。

[43] 美国当代作家雷蒙德·钱德勒系列作品中的主人公。

诺门罕钢铁墓场



1994年6月。《奇鸟行状录》第三部写到诺门罕和满洲，结果引来了《马可·波罗》杂志，问我能否实际跑一趟。那是我早就想去的地方，一口答应下来。那里基本属于边境，旅行期间住在人民解放军和蒙古军队的宿舍，非我个人轻易去得成的地方。同行者为松村映三君。本书封面的照片[44]，是我请他用我带去的“现场监督”的那个简易相机拍摄的。臼形炮弹的残片仍好好保留着。不过清一色的羊肉饭食可真是害得我好苦。

---

[44] 原书有封面照片。



从大连到海拉尔

早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在历史书中看过诺门罕战役的照片。至今仍清楚记得照片上异常笨重的旧坦克和同样笨重的旧飞机。还附有简短说明：1939年夏，驻扎在满洲的日军同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古）联军围绕“满洲国”国境线展开激战，日军遭受重创，败退下来。较之关于两年后爆发的太平洋战争那神乎其神的记述，简短得近乎“小小花絮”。然而不知何故，自那以来，这场诺门罕战役（因为没有正式宣战，很长时间里一直以“诺门罕事件”这一暧昧字眼称之，但事实上那是一场惨烈至极的货真价实的战役。蒙古方面称为“哈拉哈河战役”）的场景就鲜明印在了我的脑际。

其后我也从不放过写诺门罕战役的书，大凡见到的都看了。遗憾的是，其数量绝不为多。不料，大约四年前因故旅居美国，当我在我所属的大学图书室信步走动之间，发现书架上有数量相当不少的关于诺门罕战役的日文旧书。固然算不得“命中注定的邂逅”，不过人这东西总是在奇妙的地方碰上奇妙的东西。反正，我把那些书借了出来，有时间就看。结果，我察觉自己至今仍像小时候那样为那场在蒙古无名草原上展开的血肉横飞的短期战役所强烈吸引。什么原因却不晓得。反正情形就是这样。

写下巨著《诺门罕》——就连细部都写得令人震惊——的美国战史专家阿尔宾·D·库克斯也在前言中写了相同的情形：年轻时某一天在美国报纸上看到了关于诺门罕战役的简短报道，自那以来“不知何故”为那场战役迷住了。那种心情，“不知何故”，我也十分理解。

不过，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图书室里一册又一册阅读有关诺门罕战役的书籍过程中，随着那场战役的实况在脑海中较为鲜明地浮现出来，我开始把握了——尽管是朦胧地——自己为那场战役所强烈吸引的含义。那大概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那场战役的始末“实在太日本式、太日本人式”了。

当然，太平洋战争的始末在大的意义上无论如何都是日本式的、日本人式的，但若作为一个样品取出来分析，其规模委实过于庞大。那已经作为一个定型的历史浩劫，恰如一座纪念碑耸立在我们头上。

但诺门罕不然。在时间上那是一场不到四个月的局部战役，以现今的说法，乃是“限定战争”。尽管如此，那仍是日本人拖着一条非现代尾巴的战争观即世界观被苏联（或非亚洲）那种重新改组过的战争观即世界观彻底击溃、被其蹂躏得体无完肤的最初体验。然而遗憾的是，军部首脑几乎没有从中吸取任何教训。理所当然，如出一辙的模式又以压倒性的规模在南方战线重复了一次。在诺门罕丢掉性命的日军将士不足两万，而在太平洋战争中竟有超过二百万之多的战斗人员战死。最为重要的是，无论在诺门罕还是在新几内亚，多数士兵的死法几乎同样没有意义。他们在日本这个封闭组织中被作为无名消耗品以极差的效率杀害了。对这种“极差的效率”或非合理性，我们或许可以称为亚洲性。

战争结束之后，日本人开始憎恶战争、爱好和平（说得更准确些，应是和平这一状况）。对于把日本这个国家最后导向毁灭的极差的效率，我们力图将其作为前现代性的东西予以摧毁。我们不是追究其作为自身内在的非效率性的责任，而是将其作为由外部强制施加之物来对付，像做外科手术那样单纯地、物理性地予以排除。其结果，我们的确住在了基于现代公民社会理念的效率良好的世界，而效率的良好又给社会带来了压倒一切的繁荣。

尽管如此，我无论如何也无法从我们至今仍在许多社会层面上作为无名消耗品被和平地悄然抹杀这一疑问中彻底挣脱出来。我们相信自己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在日本这个和平的“民主国家”中得到了保证。但果真如此吗？剥去一层表皮，其中一脉相承地呼吸和跳动着的难道不仍是和过去相同的那个封闭的国家组织或其理念吗？我在阅读许多关于诺门罕战役的书的过程中，持续感觉到的或许就是这种恐惧——五十五年前那场小战争距我们不是并没有多远吗？我们怀抱着的某种令人窒息的封闭性总有一天会以不可遏止的强大势头将其过剩的压力朝某处喷发出去，不是吗？

如此这般，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寂静的图书馆和由长春驶往哈尔滨嘈杂的列车这两个相距遥远的场所，我作为一个日本人持续感受着大体同一种类的不快。那么，我们将去哪里呢？

这次我和照片上的松村君用了两个星期，先后分别从中国内蒙古

自治区一侧和蒙古国一侧看了诺门罕战场。本来，只要从诺门罕村往前一步跨过国境线即可进入蒙古国（以下简称蒙古）的哈拉哈河，但遗憾的是时下两国的想法错综复杂，无法如愿以偿，只好远远返回北京，从北京乘机飞到乌兰巴托，再特意开吉普去中国国境，整整绕了个大弯子。在这个意义上，这一带在政治上相当“麻烦”。中国和蒙古的关系近年来是改善了不少，但国境一带的民族问题仍暗藏着沉重而静寂的火种。

说实话，去中国完全是第一次，但从成田直飞大连仅用了四个小时。想到花十多个小时往返美国东部，这回就像国内旅行，很有些意犹未尽。“哦，已经到了？”——虽说时间这么短暂，但感觉上的距离十分了得。从大连开始被塞进挤得连厕所都去不成的、堪称中国式混乱极致的满员“硬座”车（原本计划乘飞机去长春，但航班被无甚理由地取消了，突然改乘火车），摇晃了一夜十二小时，累得一塌糊涂。到达长春站时，觉得脑浆组织也好像随同周围汹涌澎湃的情景而大面积重组一遍。

初次目睹中国这个国家，最先大吃一惊的是人多。当然日本也人多，但因为国土本身狭小，未尝不可以说是理所当然。而中国情况不同，国土大得不得了（尽管大），人也多得足以把国土整个填满。去哪里都满满是人，没有人的场景压根儿不存在。这么说也许会招致误解——我在日本从书上看到“南京大屠杀”和“万人坑”等战争期间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大量屠杀事件时，对于事情的过程，我的脑袋可以大体把握，但在数字规模这点上总有不能领会之处。就算再集中杀人，可作为现实问题，果真能杀那么多人吗？对此在实感上难以置信。日本的很多读者恐怕也怀有和我同样的感想吧？

但实际来到中国，在公园一角或车站候车室有意无意地观看周围人来人往的情景，忽然心想：那真可能实有其事。总之人就多到那个程度。人不知从何处一拨又一拨赶来。也不单单城市，去乡下也一样。交通工具——无论何种乘用物——全都宿命地、致命地拥挤，街上行人不分场合地扔烟头、吐口水、大吼大叫、胡乱买东西或硬卖东西。长时间面对如此光景，难免产生类似恐怖的感觉，觉得数量陡然差了一位数。甚至觉得，使得日本兵的感觉发生根本性错乱的，说不

定也是这种压倒性的物理数量的差异。

在大连街头，梅赛德斯·奔驰左一辆右一辆扑入眼帘，而且不是190那种温和车型，而是500、600那类大家伙。究竟什么人乘这样的东西呢？我一时捉摸不出。除此之外，奥迪和丰田皇冠也呼呼跑个不停。但不管怎样，路况差得接近极限，车自行其是地行驶，人自行其是地行走。我花了好些时间才跟上其步调，或者不如说直到最后也没跟上。这以前我在罗马、伊斯坦布尔、纽约等交通相当混乱的地方也自由自在地驱车行进来着，但对于中国城市交通异乎寻常的极度混乱还是瞠目结舌，根本不想在这样的地方开什么车。

“为什么街上几乎没有信号呢？”我问中国人。“不顶用的，有信号也没人遵守。”对方每每这样回答，“当然喽，大家好好遵守信号，堵塞也能减少一些……”全都像说别人似的，谁都不肯从自己做起。四周黑下来车灯也不开（对此有两种说法，一是视力好，二是节省电费）。有人横穿马路，车也不减速，只是警告性按喇叭了事。由于太可怕了，天黑以后我一步不出宾馆。而在太阳出来的时候，我目睹了街上到处发生的梅赛德斯·奔驰和自行车相撞事故以及把群众卷进去的大规模争吵。

世界上所有的汽车公司好像都把中国作为惟一剩下的大型市场而虎视眈眈，问题是倘若行驶在中国大地的汽车数量进一步增多，那么出现的恐怕是异乎寻常的噩梦（有关中国的东西似乎都有异乎寻常的倾向），因为即使是现在这样，也足以称之为“通常意义上的”噩梦了。然而看样子人们并没有作为噩梦来对待。由此看来，如此发展下去，势必有一天中国全境——从越南国境到万里长城——被交通堵塞、空气污染、烟头、BENETTON招牌所彻底覆盖。这或许可以称为历史必然，总之不可乐观。

我在长春采访了动物园。动物园是1941年作为“新京动物园”（日伪时期的称呼）开设的，1945年随着苏军的进攻而关闭。此后成了形同废墟的公园。但到了1987年，长春市当局重新辟为动物园。如今正式称为“长春动植物公园”。作为主要动物，有虎、熊猫、犀牛、象、猴、斑马等。但是，也许是开园不久的关系，动物数量不是很多，加之占地面积大得不得了，从一个动物区走到另一动物区相当累人。我

喜欢动物园，旅行当中顺便看了全世界各种各样的动物园。但“动物密度”如此之低的动物园还是初次。若把动物大体一一看遍，要累得筋疲力尽。我们最后也没能找到熊猫栏。问一个路上碰上的年轻男子熊猫在哪儿，对方沮丧地说他找了半天也还没找到。看来本地人也够受的。

虎是在相当大的石山那样的场所饲养的，一看就知道虎生活得悠然自得。问题是看的人必须远远观看，若非用望远镜，看到的虎只能是小得近乎不合理的虎。但绕到虎山后面一看，那里竖有一块写着“抱虎照像”的牌子，我当怎么回事，原来意思是“抱着虎崽照相”。问费用，答用自己的照相机照，十元即可。十元才相当于一百三十日元。有句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出一百三十日元就能抱上真正的虎子，真个十分了得，不愧是中国。

可看到饲养员领来的“虎子”，我有些慌张起来。比预想的大得多。我以为顶多猫那么大，而实际在那里的却是不折不扣的小型老虎。胳膊都比我的粗得多，牙齿也长得和大虎没什么两样。若给它咬上一口，大有可能忽地咬出一个洞。喂，我可不抱这样的东西——心里虽这样想，但毕竟是自己提出来的，不好现在才打退堂鼓。遂问饲养员“不咬人吗”，只听他说“放心，不怕的”。不过据我短暂逗留的经验，中国人口中的“放心，不怕的”相当叫人放心不下。实际一抱，果不其然，虎转到我脖子后准备咬我。来中国被虎咬了如何得了！我从背后死死抱住扑腾腾的老虎，由对方照了相。在土耳其深山里被库尔德游击队包围的时候和在墨西哥看见大概是被击毙的人的时候也够害怕的，但还是抱这老虎的时候更害怕。看当时的照片就知道我的脸绷得多么紧。中国的动物园和中国其他很多东西一样，都是超过我们想像的异乎寻常之地，半点儿也马虎不得。

对方说此虎生下才两个月（可是真的？就两个月来说也未免太大了么，我觉得），好像还没有名字。我问“没有名字”，给对方以空漠的神情看了片刻，仿佛在说“你这个傻瓜蛋，哪能给虎一一取什么名字”。我是不大清楚，莫非中国不给动物园的老虎取名字？记得熊猫倒是有名字的。

动物园里的建筑物总体上显得陈旧，同废墟无异。遂问饲养员设施可是照用战前的，对方说不不，重新开园时把以前的全部拆毁重建

了。可是无论怎么看都难以认为是七八年前建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物的墙壁像久经岁月洗礼一般凄惨惨黑乎乎的，到处布满令人想起李尔王皱纹的深度裂纹，有的地方甚至已开始崩毁。听得我有些愕然。对方为了证明过去的建筑物已被毁掉，把我领去曾经的虎栏那里。不错，是有往日的混凝土台基剩在那里。这么说自是不太合适，在我看来，较之七年前建的新混凝土墙，倒是五十年前的混凝土台基显得结实得多新得多。

我转了不少中国城市，深深觉得中国建筑师有一种能使得刚刚建成的大楼看上去浑如废墟的特异才能。例如每次进入面向外国人的高层宾馆——当然不是说全部——我们都会在那里目睹为数众多的废墟。电梯里贴的装饰板张着嘴摇摇欲坠，房间天花板边角部位开有含义不明的空洞，浴室的阀柄有一半两相分离，台灯的脖颈断裂下垂，洗面台活塞不知去向，墙壁有仿佛心理测试图的漏雨污痕。遂问："这是旧宾馆吗？"答曰："不不不，去年刚刚建成。"至于这样的才能是在何地如何产生并普及到全国的固然无从确定，反正长春动物园也无疑出自某位同样的建筑师之手。

不过这座动物园非常有趣，还从工作人员口里听到了"日伪时期"的情形。由于面积太大树木太多而来的人又太少，所以理所当然有许多情侣。这类人无论在世界哪个地方都显得乐不可支，长春自然也不例外，大概全都忙于寻欢作乐，特意付钱抱那胡乱扑腾的老虎照相的好事之徒好像仅我一个。

在哈尔滨，始料未及地跑起了医院——坐"硬座"的时候，因对面坐的年轻男子开了车窗再不关上，致使异物进入眼睛（不过此君人倒非常友好，我下车时忘了带座席上的随身听电池，他特意跑来递给我）。那时我还是中国旅行的初学者，不知道不可对着车行方向而坐这个铁的守则。中国人满不在乎地从窗口扔所有东西，若开窗坐在窗边，有时会遭遇意料不到的灾难。啤酒瓶啦橘子皮啦痰啦鼻涕啦，各种各样物件从窗外嗖嗖飞过，弄不好很可能受伤，下场更凄惨亦未可知。仅仅异物入眼或许还算幸运的。话虽这么说，毕竟痛得我睁不开眼睛，遂去哈尔滨站附近的铁道中央医院那里就诊。

建筑物说极有派头也好，反正十分古老。就诊手续简单至极，在

挂号处写罢名字即被直接领去眼科疗室，在那里，一个武斗派肌肉发达型体质的中年女医生一边莫名其妙地哇哇大叫着（尽管我认为并非声音大就可让我听懂中国话）一边给我洗眼，取出异物。不过只要把这个忍受住也就过关了：等待时间为零，连拿药才付费三元（四十日元左右）。反正什么都压倒性便宜。我费解地问中国人：“这么便宜为什么医院还空空荡荡啊？”对方照例做出“瞧你小子问的什么呀”那种大为诧异的神情：“这还人少？是问人少吧？就这样的嘛！中国人都不怎么上医院的。”真是这样吗？若是日本，医院那地方基本总是人满为患，看一点儿小病都要在候诊室整整耗上一天。如此接二连三体验种种事情的时间里，中国这个国家对于我渐渐变得难以捉摸起来。

这天傍晚，眼睛再次痛不可耐。异物算是取出来了，但好像得了轻度结膜炎，眼睑内侧沙沙拉拉泪流不止。这次去了哈尔滨市立医院。之前去了松花江近旁一家正面矗立着毛泽东巨大铜像的名叫“人民解放军医院”的甚有威严的医院（因为眼睛就在这家医院旁边开始痛的），但那里诊疗时间五点就结束了，遂转去市立医院。市立医院的眼科医生是一位中年女医生，显得比石田亚由美[45]还要疲倦。所幸此人远比前一位医生文静，一点儿也不可怕。同样洗眼，给了眼药水和软膏，费用同样三元。看情形这大概是中国这一地区看眼睛的共同行情。最后，她脸上浮现出像是从文革时代遗留下来的凄寂的微笑，静静地告诉我：“睡前涂上软膏，马上就会好的。”这里也空空荡荡，没有等待时间。

根据我的经验，就眼科治疗而言，中国的医疗状况甚是可歌可泣。便宜，快捷，技术好（至少不差劲儿）。不过怎么说呢，中国医院里面非常暗，或许也有同日本医院相比照明本身存在着物理性幽暗这个原因，总之整体上笼罩在卡夫卡式的郁闷气氛之中。蓦地，我产生一种超现实主义恐惧——假如不小心开错一扇门，那里面说不定又有中国式异乎寻常的情景展现出来。只是取出眼中异物倒也罢了，而若是更大的病，我可不大想在这里彻底接受关照的。

---

[45] 日本歌手，原名石田良子。



从海拉尔到诺门罕

从哈尔滨站再次乘上列车，赶往海拉尔。这回坐的是中国列车中最高档的“软卧”，单间，彻底实行预约制，所以和上次不同，途中极为舒坦。去厕所时不会被人抢走座位，也没有小孩子在地板上撒尿。晚间上车，舒舒服服喝着芝华士看埃拉里·奎因[46]的《希腊棺材之谜》。困了就躺下，醒来已经到了内蒙。勉强算得上问题的，一是枕头花花绿绿，二是在同一单间和一位少妇度过一夜，不过不是什么大问题。厕所照旧近乎崩溃状态，这个也照旧想开些就是。所幸服务员往保温瓶注入大量热水，我取出自带的青山“大坊”咖啡豆在单间里泡咖啡受用。如您所知（或许不知），中国不存在好喝的咖啡，只能自带材料和用具。

进入内蒙，周围风景整个变样。在此之前是无限铺展的绿色平原，而早上5点醒来拨开窗帘一看，已是山中。大兴安岭！若干车站掠过，若干城镇掠过。早晨好像很冷，尽管时值7月，不少人仍身穿外衣和风衣。车站上的人们长相也约略不同。总的说来，中国东北人肤色较黑，眼窝下陷，脸形瘦长，个子高大。但到了这一带，人长得有点儿像蒙古人，整体上多为圆脸盘、高颧骨、面部扁平。另外穿的衣服色彩艳丽，俨然民族服装。穿马靴样长靴的男子也多了起来。

此前窗外接连不断的是平坦得让人不耐烦的绿色田野，而进山以后田园风光没了，眼前出现的是草原上星星点点的牛群猪群。以棍代鞭的小孩子赶着猪群移去什么地方。水洼中有家鸭浴水。在一个叫牙克石的车站，很多人一齐挤上车来。不知何故，一个企图扛着自行车上车的男子突然被警察逮住，噼哩啪啦打一顿带走了。

翻译说（我和松村君一般总是自己随意旅行，但这次采访也是因为接待方面的关系，请了翻译），牙克石这地方林业工人多，为此人们的脾气相当暴躁，文革期间有很多人在这里遇害。死了多少人我没问，既然中国人说“很多”，想必真的很多。如此想着往窗外看去，城市给人的感觉就好像相当桀骜不驯。

城郊紧挨紧靠排列着寒伧的小砖房，哪家房顶上都竖起一条电视天线。因为全是平房，所以天线都绑在长竹竿样的竿子上端，看起来

活像是光竿丛生的杂木林。倒不是说有什么特别奇妙，但到底是奇妙的光景，气氛很像日本公寓楼阳台上并列的卫星电视接收天线。我心想，信息这东西简直就像阿米巴虫一样因场所和状况的不同而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形式。“一个村子安一个公用大天线就好了，可中国人不那样，都喜欢自行其事。”翻译说。日本也并不例外。

一旦进入内蒙，往下便是同样光景的持续。牛猪牧群，红砖小镇，朝着蔚蓝天空喷吐白烟的工厂烟囱，电视天线丛生的村落，这里那里流淌的河流，大约上班路上踩着自行车等待道口开闸的朝气蓬勃的红脸蛋年轻女子，站在铁路边一动不动盯视列车驶过的老人，车站建筑物上同汉字一起书写的仿佛勃然翘起的胡须的蒙古文字。

到了早上，同室少妇的丈夫（四十光景）进入我们的单间。他说他在同俄罗斯接壤的满洲里做个体贸易，这就领妻子和小孩返回那里。从中国带去俄罗斯人需要的东西，再从俄罗斯带回中国人所需之物，说简单也是简单到极点的经济行为，不过生意好像不坏，瞧不出多么有钱，但支付一等卧铺费似乎根本不当回事。他显得很困，说买票时卧铺车满员了，只买到一个铺位，说完随即取代醒来的太太钻进铺位呼呼大睡。我们在海拉尔下车时他还在酣睡。下车时我蓦然心想，此人此前留下怎样的命运轨迹、此后的命运轨迹又是怎样的呢？我忽然涌起一股冲动，很想直接跟去满洲里，再越过国境线一直跟他到俄罗斯，将他的种种情况看个究竟。我时不时被这种没来由的好奇心俘获，但当然不可能那样——这么着，我无奈地在海拉尔下车了。

海拉尔这座城市让我不由想起开拓时代，大概是路宽、灰大、天空高和平房多的缘故吧。尤其街上行人的形象总好像散发出一种野性。同充满经济动感的大连（建成北方的香港！）和长春不一样，几乎没有梅赛德斯·奔驰在这里奔驰，万宝路的广告板也没有。自行车数量多得就好像时针倒转了五六年。从沿海地区进入内陆，经济状态之差显而易见，但与此成反比，天空一片蔚蓝，空气愈发清新。

海拉尔虽是内蒙辖地，但住在市内的大部分人不是蒙古族人，而是“汉人”。蒙古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集中住在市外的点点处处，因为历史上后来移居到此的汉人掌握着地方经济实权。但蒙古族人和汉人长期相互混合，其结果是这里人们的长相和走路方式同迄今见过

的“本土”中国人看上去有很大区别。海拉尔虽是开放城市，但没有多少历史建筑，又没有什么风景名胜，以观光为目的来此的人恐怕很难消磨时间。实际上来这里的外国游客也好像基本上是“满洲国”时期在此居住过的日本人。

海拉尔差不多惟一像样的观光设施是个名叫“望回楼”的瞭望台，位于郊外一座小山顶上，我们去那里看了。三年前建的，也同近年建的中国建筑物一样化为轻度废墟，墙壁有了裂纹，天花板上出现莫名其妙的窟窿。较之从瞭望台瞭望市容，我对观看瞭望台本身更感兴趣。但不管怎样，从这里可以遥望市容。瞭望台脚下排列着旧关东军的砖瓦结构旧建筑。

关东军为了对付可能到来的苏军进攻，在海拉尔郊外山上修建了名为“海拉尔城”的大规模地下永久工事，目的在于阻止苏军强大的机械化部队，在那里进行持久战。军队使用强征的中国劳工突击施工，施工当中由于劳动条件极为严酷，致使很多劳工死去。好歹活下来的人也出于保密（即灭口）目的而在完工时遭到集体杀害。山头附近有集中扔死尸的万人坑，埋有大约一万名中国劳工的尸骨——在海拉尔，给我们当向导的导游员这样说道：“日军是用铁丝穿进劳工的脖颈，把他们带来这里杀害的。挖出一看，脖子上全都带着铁丝，就那样化为白骨。”从山上看去，的确，绿色草原中惟独那里裸露的泛白沙土如小山一般隆起。他所说的在何种程度上属于正确的历史事实——就是说是否果真杀了一万人——我当然无法充分证明，但至少住在海拉尔的中国人至今仍确信那是史实（从当地几个人的嘴里听到过大体相同的内容），归根结底，我想那恐怕才是最为重要的。根据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在中国其他地区干的实在太多的海拉尔式行为加以类推，那样的事在这里也确实（或以相当高的概率）发生了。当时致死的中国人数字一万也好五千也好两千也好，此时存在于此的事态本质都不会因其数字的变化而有大的变化。

那个秘密要塞我也到了。较之山，更接近于略高的丘，表层交错纵横地布满了洞穴，如蚁窝一般整个成为一座要塞，甚是壮观。平缓的山坡上至今仍有开始崩塌的很深的防坦克战壕剩留下来。出于彻底保密目的，要塞那俨然迷宫一般的地下通道究竟伸往哪里，其全貌现在仍没弄清楚。为了抗受任何程度的猛烈炮击和轰炸，钢筋混凝土浇

得惊人的厚，并且到处都有坚不可摧的铁门挡住去路。因为用尽所有手段都不能打开，那些门只好照原样放在那里不管了。我也拿手电筒走进几步看了看，里面漆黑一团，空气如冷库一般冰冷。听导游说，要塞里面，从医院到食品贮藏库，大凡长期坚守所需之物无不齐备。很久以前，我在尚未统一的东柏林看过纳粹修建的同样的地下要塞。那也是用来对付苏联坦克的，建在同样略高的山丘上，即所谓赫尔曼·格林夸说“永不陷落”的极为可观的要塞，但最终什么用也没有。一如历史所证明的，永不陷落的东西在这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存在。

走在要塞顶部的地面，到处都有类似换气孔的残缺孔露出。1945年夏越过国境线从满洲里方向攻入的苏军第三十六军，以四百辆坦克也未能攻下这座坚牢至极的地下要塞，最后从换气孔往里面注入瓦斯，再把出口封住，展开彻底的歼灭战。

无论在中国一侧的内蒙还是在蒙古国，我最为惊愕的是到处都有二战和诺门罕战役的痕迹以与当时几乎完全一样的形态剩留下来，而且大多数场合并非像“原爆DOME”[47]那样是有明确目的“保存下来”的，只是听之任之地剩在那里。这在日本是很难设想的。因此，实际在眼前看到，不由心里感慨：噢，想来，战争在五十年前刚刚结束，五十年不过是一瞬之间啊！而在日本生活，感觉上五十年时间几乎与永远无异。

从海拉尔我们乘长途汽车（听说费了好大的劲才弄到票）去新巴尔虎左旗。旗是过去就有的蒙古行政区，此镇负责那个旗的行政管理。这里是未开放地区，不经政府许可，外国人不得进入，拍照之类也颇受限制。既是这样的地方，当然没有宾馆那类玩意，我们住在解放军的“招待所”（接待军方来访者的设施）里。到底是军队经营的，态度冷淡得不得了，不到晚间根本没水。走廊门前五颜六色的痰盂一溜排列开去，感觉很有些像电影《巴顿·芬克》[48]中的场景。厕所倒是冲水的，但由于水冲不下来，哪个都有大便原封不动保留着，臭味无可救药地四下弥漫。刚进建筑物时还以为进了巨大的公共厕所。不过这怕也是理所当然的——或者不如说，到达这里时已经不把这类事情放在心上了。

从海拉尔到这里坐长途汽车约四个小时，道路（或者相当于道路

的）是从茫无边际且一无所有的草原穿过的坏路，一路颠簸不止，不用说对心脏不利。司机看样子对来回走这样的路早已处之泰然——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人生——他轻快地躲过大的坑洼，以七十公里左右的时速驱使长途汽车风驰电掣。总的说来坑洼躲得确实巧妙，但有时没躲好，致使脑袋“砰”一声撞在窗上，或险些咬掉舌头。如此持续四个小时，着实烦不胜烦。但很快就明白了，这不过是我往下所吃苦头的一个小小序幕罢了。

新巴尔虎左旗这地方比海拉尔还要原始、粗野，其情形只要想像一下电影《原野奇侠》（Shane）中的开拓者居住区（杰克·帕朗斯用手枪残杀农民的那个泥泞不堪的小镇）即可。一条足够宽的沙土路从镇的正中间笔直穿过，两侧排列着垂头丧气的凄凉的建筑物。车变少了，骑马的人显眼起来。人们的服装更加花花绿绿，动物大模大样地往来徘徊。从中国“本土”来到内蒙古自治区的海拉尔时，我已经对人们相貌的变化深感惊讶，而从海拉尔到这里一看，又觉得像进了另一世界。

第一——这么说或许不合适——街上走的人怎么看都不正统。同此前旅途中见到的农民型长相相比，此地人的长相属于截然不同的世界，让人实实在在觉得这里不折不扣是采集游牧民族的地方，他们是这里的居住者。或许以前没怎么见过外国人，我们每次外出，他们都眼盯盯地注视着我们。眼睛好像几乎不含任何感情。与其说因为好奇而看，不如说仅仅因为我们是异物才看的（采集倒没采集）。恶意可能没有，但具体如何我不得而知。被人险些把脸看出洞来，心里难免不大是滋味，而若看的人是当兵的，气氛就更加紧张了，真怕出点什么意外。年轻士兵大多邋邋遢遢，或解开衣扣，或歪戴帽子，或叼着烟卷，活像从前日活[49]电影里的阿飞。

离开这很难说是充满温情的新巴尔虎左旗，又沿着大同小异的坑洼路花三小时奔向诺门罕村。听说一下雨路就泥泞不堪，陷得车轮动弹不得，所幸尽管是雨季，我们却没遇到雨。坐在长途汽车上就路况说三道四，想来也够奢侈的。查阅历史记录，参加诺门罕战役的大部分日军士兵可是全副武装远远地从海拉尔徒步赶到国境地带的，大约在荒野中行军二百二十公里（相当于从东京到滨松的距离）。说体力超强也好，耐力出众也好，反正得知以后不由对往日的人大为佩服。

问题是，“步兵通常期望行军速度为一小时六公里”（科克斯：《诺门罕》），而若不休息地连续行军四五天，即使身体再结实，差不多所有的士兵也无疑在进入战斗之前就已经疲惫到了极点。何况他们还在渺无所见的草原当中为慢性缺水所困扰，我想实在是够受的，毕竟路程长得坐车都坐腻了。但作为实际问题，当时的日军即使征用了所有的民用车辆，也无法凑够运兵所需的汽车，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同整治好万无一失的补给路线后才重新转入有组织的攻势的苏军相比，其战略构想本身就是另一种东西（这是我去外蒙一侧察看后再次切实感受到的）。看书，书上只记载“××部队从海拉尔徒步行军至国境地带”，看的人也只是作为知识认识到“是那样啊”那个程度，而实际来现场一看，面对那一行为意味的现实性艰难困苦，我不由瞠目结舌，同时也深切感到当时日本那个国家是何等贫穷。为了使日本这个贫穷国家生存下去而在“维持生命线”这一“大义”之下侵略中国这个更穷的国家，真是无可救药。

就能实际感受到的来说，当地蚊虫的攻势就十分了得。有风吹来的时候倒还好，一旦草原上的风停息了，或者进入风吹不到的地方，大凡所有的蚊虫就以人为目标汹涌袭来了。苍蝇、蚊子、牛虻、飞蚁以及其他不知名称的长翅膀的飞虫拼死拼活围上身来，衣服上黑压压的一层。进入7月，草原经常下雨，由此形成的水洼滋生出大量的蚊虫，蚊子毫不客气地扎进皮肤，难受程度无法形容。再热也要扣紧帽子穿好长袖衣服和长裤，还要戴太阳镜，用毛巾围住嘴巴——若非“全共斗”[50]打扮，休想在此活命。

战斗在诺门罕展开和我们到访是同一季节，士兵们同样遭受蚊虫袭扰。有记载说，日军士兵都有携带型蚊帐，受害还算少的，而苏军因无此准备，大受其害。即使苏军，也没有针对夏季在蒙古草原作战的专项技巧进行彻底研究。不过，在孤立场所身负重伤的日军士兵遭受了无数苍蝇的折磨。“若是普通银蝇，由卵变蛆需三天时间，但诺门罕的蝇卵不到十分钟就变成了蛆，快得只能视为魔术。蛆眼看着爬满尸体，从柔软部位开始侵蚀。不仅对死者，对负伤者也是一样”（伊藤桂一：《静静的诺门罕》）。作为文章，读到这里都不寒而栗，而实际前来被蚊虫忽一下子围住，更能切实感受到那种战栗。

诺门罕是个很小的小镇，前不久还是人民公社，如今成了普通的

村（人民公社现在踪影皆无，一如没人穿人民服）。正是诺门罕村民赶着家畜移往夏季牧场的时节，只剩负责人模样的人和他的一家以及小孩子看管村子，即所谓的“留守宅”。村里空空荡荡，满身污泥的黑猪在大水坑里泡着。刚拿照相机对准，孩子们就哗一下四下跑开了。即使从很远的地方用望远镜对准，他们也分明看在眼里。“眼睛相当好使啊！”搞摄影的松村君感叹道。如此说来，进入内蒙之后，确是几乎没看见戴眼镜的人（总不至于眼睛不好的人统统戴隐形眼镜）。

村里有座不大的战争博物馆，里面陈列着日军遗物模样的东西，从枪支到水壶、罐头盒、眼镜等等，所有军用品都成行成列摆在展示柜里，俨然小学里的遗忘物品玻璃柜，导游说国境线那边的外蒙也有大体同样的博物馆，但那个规模大得多，展览的东西也很可观。过些天前去一看，果然如此。从这里到国境近在咫尺，遗憾的是不能过境，倒不是有铁丝网或围墙等肉眼看得见的国境线，但到底是无遮无拦无处藏身的辽阔草原，穿越国境之人马上会被眼睛好使的蒙古哨兵发现逮住，用不着什么铁丝网。

天黑以后，天空布满了数量多得劈头盖脑的星星。夏天日暮时分的草原风景，漂亮得叫人透不过气。然而，围绕着这块几乎没水、根本不能耕作且到处是蚊虫的土地，五十五年前人们竟然在这里浴血激战，数万之多的士兵被击毙、被火焰放射器烧死，被坦克履带碾死，被因炮击而崩塌的战壕活埋，或者不愿意当俘虏而自杀。还有数倍于此的人身负重伤，失去手脚。想到这里，心情不能不黯淡下来。这一带原本是牧民赶着家畜，按季节从这里移去那里的“谁的东西也不是”的土地，必须在此作战的几乎惟一的理由是军部的面子和“万一碰巧”这样的冒险主义算计。远离故土满身是蛆在痛苦不堪中不得不死去的当时的青年人，想必是死不瞑目的。

那天夜晚在诺门罕村吃了羊肉喝了白酒，有生以来第一次醉得人事不省，记忆彻底不翼而飞。听人家说，白酒的酒精度数在六十五度左右。这东西干喝了四五杯，当然一败涂地。觉醒已是第二天早晨，正躺在新巴尔虎左旗的宿舍床上。作为后遗症，即使在那以后过了将近一个月的现在，也几乎不能喝啤酒以外的酒。白酒便是这般厉害。

---

[46] Ellery Queen，美国侦探小说家弗雷德里克·丹奈（1905—1982）和曼佛

雷德·李（1905—1971）合用的笔名。两人的主要作品有《罗马帽子之谜》和《Y的悲剧》等。

[47] 日本广岛保留的遭受原子弹爆炸的圆顶形建筑物残骸。

[48] 1991年上映的美国惊悚电影。

[49] 日本电影制片厂名。

[50] 全称为“全学共斗会议”，1968—1969年成为日本大学生的主要运动组织，掀起以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为主的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后被当局镇压。



从乌兰巴托到哈拉哈河

从诺门罕村到蒙古国境虽然近得伸手可触，但遗憾的是不能从那里穿越，这点前面已写了。尽管拥有漫长的国境线，但现在从中国进入蒙古的口岸数量极其有限，且只能利用飞机。除此之外的方法，明确说来近乎“非现实”状态。不过凑巧传来消息说今年7月初的几个星期作为特别措施开放了新巴尔虎左旗那里的国境，准许当地人往来，于是心中大喜：lucky[51]！不料这也在即将开始之前不加任何解释地——似乎是这一带常有的模式——突然延期了。中国和蒙古的关系近来已改善很多，为什么还对这种极度不便的状态听之任之呢？想来令人费解。

我的想像是，虽说处于友好关系，但现实中两国的经济实力相差悬殊，蒙古方面害怕中国（汉人）经济长驱直入，中国方面担忧被国境线人为地“划线隔离”的蒙古族抱团或融合的倾向高涨——双方有可能因为如此情由而各自从两侧对交流进程予以刹车。我推想这一带的区域性政治重组将以很快的速度向前推进，不过，但愿别像南斯拉夫那样悲惨（因为我在内外蒙遇到的都是好人）。不管怎样，这种强行阻止流程的Status quo[52]应该不会持续很久。

由于这个缘故，我们从北京乘飞机到乌兰巴托，再换机到乔巴山，从那里乘吉普远远穿过大草原，好不容易到达哈拉哈河畔一个地方，却是三天前我们所在的诺门罕村极近的对面，真让人目瞪口呆。不过绕了这么个大弯子，我才得以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蒙古草原的辽阔。横穿蒙古草原是怎样一种情形，读者可能想像不好，总之你认为就像乘一叶小舟凌波横渡于万顷大海即可。从乔巴山到哈拉哈河约三百七十五公里。说起三百七十五公里，大体等于东京至名古屋的距离，当然道路非常糟，算上中途吃饭和休息时间，足足花了十个钟头，其间擦肩而过的车辆屈指可数。四周是那样平坦，纵目望去，无论哪里、无论多远都是绿色的草场。作为实际问题，视之为海在感觉上反倒更容易把握，无休无止的上下颠簸也未尝不可以说同小艇冲浪的感觉相似。

和大海不同的是有时能看见野生动物。既是草原，草确实是多，

但附近没有足够的水，适宜放牧的地区很有限。除了贝尔湖附近，基本看不见牛羊，人也几乎不住，只有种种野生动物自由自在、与人无涉地在那里活动。羚羊、蒙古鹰、鹤、狼、大野鼠、兔……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动物都在路上屡屡撞见。只要有电线杆，可以说必有大大的蒙古鹰蹲在顶端，以锐利的目光四下扫瞄着寻找食物。这一带蒙古语叫“多尔诺多”（东）地区，除了如此空空荡荡的草原别无东西可看。多尔诺多草原曾是海底，可以不时见到海洋生物的化石。海拔在外蒙境内最低，夏天热得要命。旅游指南书上说人口仅有九万，相比之下，牛羊多达约二百万。不用说，特意到这种地方来的好事的外国游客没有多少。说得再明确些，几乎没有。

不过在军事上具有重要意义（同中俄两国接壤）。也许因为这个，交通比预想的便利。县城乔巴山有列车从莫斯科直接开来。这条铁路在诺门罕战役或进攻满洲时得到了高效利用。从乔巴山到“满”蒙国境附近的塔木斯库基地之间，过去好像铺有补充兵员及军事物资的专用铁路，如今已不复存在（至少我们听的介绍是这样）。反正只要是事关兵站，苏军就同关东军相反，是极为慎重地计算好了以后才采取行动。对于苏联来说，军事上最重要的事项，是利用铁路迅速有效地在欧洲战线和远东战线之间运送兵员和装备，并为充实这一系统而全力以赴。无论如何都要避免在欧洲和远东两线正面作战，而要巧妙地一次吃掉一方——这是苏联绝对的基本方针。所以，诺门罕战役结束后苏联马上进攻波兰，而后于1945年8月（德国投降三个月后）再次进攻满洲，这基本上没有任何不可思议之处。

诺门罕战役、对日宣战之后直到近年因改革而废除俄蒙军事协定的时间里，苏军在这一带驻有规模相当大的军队。因此之故，乔巴山的机场也像模像样地铺上了跑道——尽管多少有些裂缝——以蒙古机场来说，这是很罕见的。机场建筑物之类倒是没有，下雨时只能撑着伞耐心等待。算了，挑剔不得的。我们乘坐的俄制小型螺旋桨飞机的货舱里装有一具棺材，也罢，这也不足以发牢骚的。

这里给我们当向导的是蒙古军队的现役军官。何以让军人做我们的向导呢？这点我也不大明白。说到底，大概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担心，担心外国人在国境一带转来转去；二是实利，作为向导，酬金有美元进账。也就是说，军方身兼挣美元的打工者和监督者两种职

务。蒙古现在没有像样的产业，国际硬通币严重不足，游客但凡有事，在所有场合都被贪婪地索取美元。这个国家的旅游产业，较之设法增加游客的数量，遗憾的是更处于从少数游客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钱的阶段（同过去一段时期的中国相似）。不过反过来说，只要有美元，差不多的东西都可买到，差不多的事情都可办成。

坦率地说，我们这次采访被蒙古旅行社要了高得足以令我们惊讶的款额（当然是同蒙古物价相比而言）。但作为现实问题，没有可以取代的选项。以前就听说过，以个人资格租用吉普去东部国境地区的人，在现场到处受到国境警备部队毫不留情的驱赶。好不容易费时费力来此采访，若弄成那样子可就太惨了。与其那样，还不如花些钱，一开始就由军人带路来得明智。老实说，那种做法不怎么让人愉快。

带路的是一个名叫乔格满托拉的戴太阳镜的态度硬邦邦的中尉——有两颗星，估计是中尉——还一个名叫那松贾格尔的专职驾驶员汉子（此人大概是中士）。吉普是冷冰冰的俄制军用吉普，有四扇门，却前后都不开窗（只开一个三角窗），车里堆着几个汽油罐，味道大得呛人。然而他们还大口小口地吸烟，又危险又喘不过气。无论舒适还是性能，同三菱帕杰罗相比，简直是全自动洗衣机和洗衣盆之差。这样的车竟单程要坐十多个小时，即使我随时随地随便诅咒什么，你怕也指责不了。

但是，作为代步工具，较之时髦的日本产四轮驱动车，当地人更喜欢这种简单粗壮的家伙，因为几乎所有地段的路况都一塌糊涂，这种车子没有各种各样“有也许方便、没有也不碍事”（即当代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商品）的物件，故障少，好用，全然没有例如自己不知如何下手的黑匣子那样的玩意儿，一切都裸露在外，有故障也能自己动手当场修好。汽油啦润滑油啦水箱啦都不挑三拣四，那一带有的任何东西——小便也好烧酒也好——只要放进去就能跑到目的地。便是这样的车型。在大草原正中车突然出了故障，弄不好很可能就此乌呼哀哉——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开车，此地驾驶员的世界观同星期日夜晚在涩谷一带开着朗克尔车[53]的哥们有明显差别，那是没什么不自然的。

中尉和我们在乌兰巴托委托安排旅行的旅行代理公司的经理是陆军幼年学校或什么学校的同学，似乎接受过“别出差错”之类的指令，

尽管不习惯“武士经商方法”，但还是给了我们不少关照。旅途中顺便到了部队驻地，在那里喝了奶茶，吃了什锦奶酪和羊肉饺子。只是，我因诺门罕村的羊肉和白酒后遗症几乎没有食欲，照相的松村君肠胃不好（此人的长相足可狼吞虎咽地干掉蛇啦青蛙啦什么的，其实内脏很敏感，人不可貌相），两人差不多什么也没动，而这在蒙古是失礼的事。“怎么不吃？旅行时不吃东西，身体抗不住的！”乔格满托拉中尉热心相劝。但对不起，没心思吃。虽说非常失礼，但我们毕竟是来工作的，不能把身体搞坏。中尉好像肠胃不存在任何问题，在吉普车里也咕嘟咕嘟猛喝白酒。在那种活像自动洗衣机店烘干机的环境中，居然能那般大吃大喝，我心中暗暗佩服，不过对他来说好像根本无所谓。

“喂喂，也不喝酒，那么长的旅行你怎么熬得住呢？”他问。“日本人胃的结构天生不一样，旅行当中不怎么吃东西。”我扯个谎敷衍了过去。看样子他好像没怎么相信。

我们要找的镇、或者不如说村落是一个叫松布尔（欧洲地图上一般标为“查加阿努尔”）的地方，位于诺门罕战役激战地之一哈拉哈河和乌尔逊河的汇合点——日军称为“川又”——对岸的小山上。松布尔没有宾馆那种乖巧的玩意儿，住的是部队招待所。虽是军官专用的蛮漂亮的住宿设施，但遗憾的是出不来水。牙不能刷，脸不能洗，当然也没有什么冲水的厕所。煮开了，水应该是可以喝的，但贮水罐的水里漂浮着各种各样的东西，在精神正常状态下无论如何也喝不下去。蒙古人自是不以为意，咕嘟咕嘟直接喝进肚去，但我喝了那东西笃定站不起来。喝干自带的少量矿泉水之后，往下十二个小时只能静静地忍耐干渴，够难受的。

因是在基地里，规定十点熄灯，酒一律禁止，但士兵们根本不当回事儿，全都开着灯吱吱哇哇喝到半夜。说给中国人听，中国人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绝对没那种事”。可能蒙古军队里没人说三道四，乐得逍遥自在。总之，在这个国家，劝酒基本无人拒绝，军队也罢，熄灯时间过后也罢。

翌日清晨，乔格满托拉中尉把基地里官最大的那姆索拉中校（此

人也可根据气质大体推断出是中校）介绍给我们，说他将陪我们一起行动，带我们去国境地带转转。至于是出于友好还是仅仅因为闲着无事，个中情由我不大晓得。不过较之蒙古陆军中校，此人看上去更像是一大早在千驮谷商业街“秋季交通安全周值班室”转来转去的普普通通的老伯——这么说并没有什么恶意——或者说像是经营不下去的大相扑传授屋的出现酒精依赖症状的老板。我暗暗生疑：这样的人真能带路不成？但真是不可以貌取人。此人对国境地带的每个角落都像对自家房间结构一样熟悉（老实说，若让我画图，我连自家房间结构都记不清楚。这个不说也罢）。几乎没有路，无任何标识——我觉得——在如此惟有辽阔可言的大草原上一个劲儿驱车奔驰，不断向驾驶员发出“一直”、“向左”、“翻那座小山”等明确指示，有条不紊地把人带去各个地方。如若没有此人，我们恐怕只能在茫茫草原上来回乱窜，找不到任何像样的东西，没准还迷路闹出大乱子。无论在哪个国家，一看见穿制服的国家公务员，我的身体往往条件反射地僵硬起来（大约是世代性记忆的关系），而此人不管怎样在现实中非常有用。如此想着再一细看，但见他眼睛不时锐利地一闪。不管怎么说，他这个官最大的人不是用来摆架子的，怀疑他是自己不对。

但反过来说，我想这些人是很认真地负责国境警备的，认真得熟知这一地区的所有边边角角，就算有人想趁夜黑穿越国境也会被他们当即逮住。我问中校“有人偷越国境走私吗”，他没有给予明确回答，总之情况似乎是“并非没有”。蒙古高级消费品供应不足，若从中国带进录像机、照相机一类的工业品，肯定能赚不少钱。

哈拉哈河是蛇打滚一般扭扭弯弯的河，水流相当快，到处有沙洲出现。在举目别无所见的大草原上长途行驶之后，那青青的河流和岸边绿得发亮的茂密灌木，看上去简直如同生命本身一样生机勃勃。河西岸（苏蒙联军一侧）是较高的台地，相比之下，东岸（日军一侧）为宽阔峡谷般的低洼地带，因此日军——尤其是炮击战时——在地形上背负着巨大阻碍。从台地上，用望远镜即可历历望见二十公里外的诺门罕村。不用说，苏蒙联军司令官朱可夫元帅在那山丘上设了坚固的地下司令部，在将战场尽收眼底的情况下进行指挥。与此相比，从东岸只能看见如屏风一般沿河壁立的白色石崖。实际站在河的两岸眼望对岸，至今仍为景观的不同而惊讶不已。

松布尔附近的河汉南面建有一座很漂亮的钢筋混凝土桥。桥是十年前才建成的，那以前除了军用临时桥，永久桥一座也没有。村民骑马涉过浅水河段，冬天结冰就在冰上行走——“即使没有桥也没什么特别不便的”。较之为当地村民提供方便，想必此桥是为了让军用车辆通过而建造的。不过细看之下，动物比人远为频繁地利用桥面。桥的正中，牛群全都懒洋洋地东倒西歪，驱赶那些家伙过桥相当花时间。桥上到处是马粪、牛粪，当然也有相应的臭气。自不待言，此桥同《麦迪逊镇的桥》[54]大异其趣。

那姆索拉中校最先带我们去的，估计是曾经激战过的高地。从河汉朝东南方向开吉普车跑二十分钟就到了。当然所谓道路那玩意根本无从谈起。高地的确切名称无从知晓。从地图上看，作为激战地而闻名的“诺罗高地”（当时日军的称呼）想必便在这附近，但不能断定。看上去原本像是坡势徐缓的绿色山丘，但也许因为苏军集中炮击的关系，形状已彻底改变，植被体无完肤，砂土触目皆是。8月下半月在苏蒙联军大举进攻之际展开的血肉横飞的围歼战即那场激战的痕迹在斜坡沙地上完完整整剩留下来。炮弹片、子弹、打开的罐头盒，这些东西密密麻麻扔得满地都是，就连似乎没有炸响的部分臼形炮弹（我推想）也落在那里。我站在这场景的正中，久久开不了口。毕竟是五十五年前的战争了，然而就好像刚刚过去几年一样几乎原封不动地零乱铺陈在我的脚下，尽管没有尸体，没有血流。

或许是因为气候干燥，加之地处无人来访的荒郊僻野，这些杂乱的钢铁制品依然原样剩留在这里。钢铁虽然都生锈了，但拿在手上也不至于片片剥落。发红的只是表面，弄掉红锈，下面活生生的“钢铁”仍在喘息。面对如此大量的钢铁残片集中散落在如此狭小的地方这一事实，我不能不茫然若失。如果进行历史分类，恐怕应该属于“后铁器时代”那样的时代。在那里，将大量钢铁有效地撒向对方的一方、以此尽可能多地切削对方骨肉的一方获得了胜利与正义，而将这不怎么样的草原的一块弄到了手中。

为了不忘记这震撼性场景，我决定拾起掉在脚下的一发子弹和臼形炮弹的一部分装进塑料袋带回日本。倒不是多么想要纪念品，仅仅为了不忘记——我觉得这是我惟一能够做到的行为。而且我也很想保

留一件类似抓手的东西。

之后我们往纵深处行进了三十分钟，在绿草原的正中有一辆被弃置的苏军中型坦克。“如果有什么大件战争遗物就好了，想照一张相”——为了满足松村君的希望，那姆索拉中校把我们带到这里。这辆坦克，炮塔和机枪固然拆掉了，但其他部分基本完整无缺原模原样地留了下来。大概本想用钢缆把战斗中毁坏的友方坦克拖走而未能如愿，仍有钢缆拴在那里。我想，若运去什么地方弄成碎铁，多少能换一些钱，但蒙古人对回收废铁那样的麻烦事似乎没多大兴致。或许因为一来位置不好，卡车进不来，二来就算愿意回收，随之而来的运输成本也太高。不管怎样，草原因此而到处扔有五花八门的钢铁制品，使得我们至今仍可切近地目睹当时那白热化的“钢铁战役”，那淋漓酣畅的钢铁消费场景。如此顺利保存往日战场遗迹的场所，找遍全世界也恐怕没有第二例。

又转过几个战场遗迹之后，我们参观了松布尔壮观的战争博物馆。毋庸讳言，松布尔是世界尽头一般寒伧的小镇，然而有关战争的纪念物一应俱全，件件非同一般。博物馆本身也仪表堂堂，展品丰富，当时的贵重资料和各式武器、军用品等整理保存得井井有条。参观之间，可以清楚地看出蒙古人对诺门罕战役即哈拉哈河战役的胜利——毕竟将日军赶出了自己主张的国境线，因而是胜利——看得多么重要。但与此同时，我觉得如此大张旗鼓慷慨激昂的英雄礼赞也悄然而又生动地暗示了哈拉哈河战役给蒙古这个小国带来的灾难是何等惨重。俄罗斯通过情报公开活动将以前隐藏的种种史料公诸于世，据此得知，哈拉哈河战役并非像过去苏联方面所说那样的是苏蒙联军“压倒性的辉煌胜利”，他们为此次胜利所不得不付出的牺牲的惨重程度并不亚于日军。日后若有更多的资料公开，对于诺门罕战役即哈拉哈河战役的历史观也肯定会大大改变。战争博物馆的馆长欢迎我们并亲自热情带领参观（人十分和蔼），遗憾的是由于停电的关系，馆内黑乎乎的，没法细看更多的展品。好像因为慢性电力不足，白天也要停电几个小时。

从松布尔到乔巴山漫长的归途中，在草原中间发现了一只狼。蒙

古人看见狼必定杀死，几乎条件反射地杀死。对于身为牧民的他们来说，狼是看见就只能当场杀死的动物。爱护动物这类概念在这个国家根本不存在。驾驶员连一声“去”也没说，就让吉普迅速离开道路朝草丛开去。乔格满托拉中尉以熟练的手势从座位下面拿出AK47自动步枪，推上子弹舱——他把子弹舱装在黑塑料手提包里随身携带——而后打开吉普车门，探出上身瞄准，以单发点射逃跑的狼。在草原正中听起来，“啪、啪”——AK47的枪声又干又小，没有想像的那么厉害，不是在电影声带中听到的那种震耳欲聋的轰鸣，莫如说颇有非现实之感，恍惚是在极其遥远的世界里进行的、与己无关的活动。我在脑袋里像考虑别人的事一样怔怔地想道：噢，我现在置身于草原正中，乔格满托拉在我身旁打狼！逃窜的狼的四周“嘭嘭”掀起着弹的沙尘。但狼动作极快，怎么也打不中，皮都没伤着。狼计算着自己同吉普的距离，利用身体轻巧的优点，飞快地改变方向奔逃着。最初的弹舱空了，乔格满托拉一边咂舌一边“咔”一声推上新弹舱。此人究竟准备了几个弹舱呢？驾驶员那松贾格尔一声不响地咬紧嘴唇，忽左忽右打着方向盘紧追不舍。说到底，狼从一开始就无望得胜。狼的四肢诚然敏捷灵巧，可惜它们不具备相应的耐力。它们或许能胜过马——蒙古人说胜负率基本是五比五——但在无遮无拦无沟无坎无枝无树一无所有的平展展的大草原正中，狼不大可能跑过四轮驱动车。因为汽车决不疲劳。那仅仅是大的钢铁机器，没有肺那个物件。十分钟，狼就彻底筋疲力尽，肺叶即将破裂。狼站立不稳，肩头起伏着，喘着粗气，做好精神准备似的定定地看着我们这边。狼知道怎么挣扎也无法逃脱，这里已别无选择，惟有一死。

乔格满托拉让驾驶员停下吉普，把枪身固定在车窗上，瞄准狼。他不慌不忙。他晓得狼已哪里也去不了。那时间里，狼以澄澈得不可思议的眼睛看着我们。狼盯视枪口，盯视我们，又盯视枪口。那是种种强烈的感情混在一起的眼睛，恐惧、绝望、困惑、无奈……以及我不知晓的什么。

只一发，狼便应声倒下。身体痉挛片刻，而后那也停止下来。小个头母狼。从季节推断，有可能是为孩子出来觅食的。我在内心祈祷这只干瘦干瘦的狼好歹逃开铁车和铅弹的追击，然而奇迹终究没有发生。凑近死尸一看，狼已吓得大便失禁，子弹打中肩偏后一点的位

置。弹痕不很大，只渗出衣扣大小的圆形血迹。那松贾格尔从衣袋里掏出一把不小的锋利的猎刀（看来这些人手头总是备有自动步枪和猎刀），麻利地整个割掉狼的尾巴，然后把割掉的狼尾巴垫在狼的头下。这像是蒙古人的狩猎咒符，意思是“保佑以后再幸遇这样的猎物”。

打死狼后，我们都奇异地沉默下来。很长时间里几乎谁也没有开口。那松贾格尔把奇妙的俄语雷盖[55]磁带插进收放机，开始听音乐。夕阳向草原西边缓缓倾斜，绚丽的火烧云染红了云絮，天空由青变蓝、由蓝变黛之间，我们始终向西行进，就好像紧追下沉的太阳不放。但不用说，这回我们无望获胜。随着四周变暗，路面到处有野兔穿过。白天它们怕被老鹰逮住不敢出洞，都静等着暮色降临。如此说来，四下里再也见不到老鹰了。鹰们想必在这草原某处的巢中静静歇息，歇到明天早上。明天完了，后天来临，后天完了……

我们好歹返回乔巴山已是半夜一点了。总之累得死去活来，口都几乎开不得了。先喝了一通不很凉的啤酒，喝罢直接倒在宾馆床上。不伦不类的城市不伦不类的宾馆不伦不类的房间（自来水整整流了一夜，声音大得惊人；门关不上；除了天花板垂下的电灯泡别无照明；气氛郁闷得要命），但这些怎么都无所谓了。只要能躺下好好睡上一觉就一切OK。何况，想到我此前住过的世界最尽头的不伦不类的宾馆，这个还算不错了。然而我怎么也睡不着。也许白天看到的刺激性场景太多的缘故。我无法忘记生锈的坦克、钢铁碎片所在皆是的战场遗址、被乔格满托拉射杀的母狼那凄寂的眼睛。我蓦然想起，随即从包里取出在沙丘沙土中拾来的臼形炮弹残块和子弹，拍掉沙土放在桌子上。它置于阴沉沉的宾馆一室的桌面之上，我不由得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觉得时间的座标基轴正一点点地在扭曲损毁。这东西在宾馆房间里看来，同我在沙丘中发现时给人的印象有很大不同。我并非崇拜超自然物之人，总的说来在日常生活中是循规蹈矩的现实之人，并以此为人所知。可是，惟独此时却不能不感觉到某种“气息”浓厚之物的存在。我忽然心想，也许本不该把这东西带来，应该照样留在那里也未可知。但为时已晚。

深夜醒来，它在猛烈地摇晃这个世界，整个房间就好像被装进拼命翻滚的混凝土搅拌机一样上下急剧振动，所有东西都在伸手不见五指的一片漆黑中咔咔作响。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是什么正在进行呢？我完全摸不着头脑。姑且从床上跃起，准备开灯。但由于剧烈晃动，甚至站在床上都不可能。说到底，灯在哪里都无从想起。我踉跄摔倒，而后抓着床头好歹坐起。我想肯定来了大地震，一场要让整个世界土崩瓦解的强烈地震。不管怎样得赶快离开这里。不知花了多少时间我才死活挪到门前，摩挲着按下墙上的电灯开关。就在那一瞬间，摇晃戛然而止。灯亮了，黑暗消失了，房间立时寂静下来，一切都难以置信地无声无息，什么也不摇动，时针正指在后半夜两点。究竟怎么回事呢？我莫名其妙。

随后我恍然大悟，摇晃的不是房间，不是世界，而是我本身。明白这点，一时冷彻骨髓。我无法把握自己手脚的感觉，在那里木然伫立。尝到如此深切、如此劈头盖脑的恐惧有生以来是第一次，看见那么黑的黑暗也是第一次。不管怎样，我不想留在这房间里了。横竖留不得了。不得已，我走进隔壁松村君的房间（凑巧这座宾馆的房间不能从里面锁住，为什么自是不知），弓身坐在昏死一般沉睡的他旁边的床上，一动不动地等待天明。原以为黑夜将永远持续下去，但四点过后，东边的天空终于一点点泛白，鸟也开始啼叫。随着晨光的降临，我身上冰块一般的恐惧也渐渐融化消失，就好像附体的邪魔脱落下来。我悄悄返回自己房间，上床躺下。已不再害怕。夜间卧床时感觉到的不快也没有了。我甚至反倒产生一种类似恬适的感觉。它同黑暗一起去了哪里。我就势在晨光中甜甜睡去，睡罢醒来。

从乌兰巴托返回北京，直接在机场换机飞回东京。机上的NHK广播报道说村山首相在那不勒斯峰会上病倒。村山首相？我离开东京时该是羽田首相才对。在这同一天，金日成主席之死成了事实。在我从满洲到蒙古转来转去的两个星期时间里，此侧世界有诸多事情在与我无涉地运转不息。而大约一个月后的此时此刻，我在远离蒙古草原的场所、在几乎可以说是与之处于两极的地方写这篇文稿。

但是，在乔巴山那座穷困潦倒的宾馆一室，我于下半夜2时体验的那场剧烈的世界摇晃仍分明留在我身上。至今仍能记忆那震颤、那

恐怖的感触。那究竟是什么呢？我至今未得其解。我想了很多，但未能想出关于那件事的确切答案。那时我所感觉的恐惧的质是不能够用语言传达给别人的。那和从道路正中豁然开出的洞口遥遥窥看世界深渊是同一程度的恐怖——至少对我而言。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这样认为了：它——其振动、黑暗、恐怖和气息——恐怕不是从外部突然到来的，而莫如说原本存在于我这个人的内面，不过是有什么抓住类似契机的东西而将它猛然撬开罢了。恰如上小学时在书上看的诺门罕战役的图片并无什么来由地俘获了我，且在三十几年后把我远远领去蒙古草原的纵深处……把我带去的地方真够远的了。可是我觉得——我说不大好——无论去多远、或者不如说去得越远，我在那里发现的也只是、或者越是我自己本身。狼也好，臼形炮弹也好，停电当中幽暗的战争博物馆也好，归根结底恐怕都只是我自身的一部分，它们恐怕只是在那里静静等着我前去发现罢了。

但至少我决不会忘记它们在那里和曾在那里。不忘，我能做的事仅此而已，大概。

---

[51] 幸运，好运气。

[52] 现状，原来状态。

[53] 一种日本出产的轿车。

[54] 我国译为《廊桥遗梦》。

[55] reggae，1968年前后开始流行的牙买加黑人新流行音乐，歌词主要反映平民心声。



横穿美国大陆

1995年6月，为《森罗》杂志分两期写了这篇文章，收入书中时做了加工。同行者又是松村映三君。能够不屈不挠陪我如此长途跋涉的摄影师除他别无第二人。实际握着方向盘横穿大陆，就会明白美国这个国家真是大得不得了。地区不同，文化啦服装啦也随之哗哗作响地变得不同。另外令人感叹的一是汽油便宜，二是几乎没有收费公路，三是饮食和住宿设施无可救药地单调。若问是否还想横穿一次，我只能扭头沉思：这个嘛……



作为一种病的旅行，牛的价格，无聊的汽车旅馆

很早以前我就想——准确地说是一直梦想——好好花时间驾车横穿美国大陆。问我去那里有什么目的我也没法回答，因为根本没有什么特殊目的，仅仅是一种愿望罢了：从大西洋岸边到太平洋岸边，翻山过河，把美国大陆一气划开！若明快断言"行为本身即是目的"，那倒是够潇洒的……

不管怎样，这踏上漫长旅途的行为之中，毫无疑问含有某种不由分说——如果不能称之为发疯的话——的东西。说到底，何苦非做这种莫名其妙的事不可呢？花时间，费用也小瞧不得，又只落得个徒劳无益，甚至可能祸从天降。不，还是说"'祸不从天降'偶尔也是有的"来得痛快。Scrabble Game[56]的广告复印件上总是说"早知如此，在家里玩Scrabble好了！"漫画中也常常出现遭遇各种灾难的可怜的旅行者。每次看那广告，我都大大点头：是啊，正是。旅行就是灾难陈列窗。实际上也是在家里玩玩Scrabble什么的远为稳妥。我们对此心知肚明，然而还是要外出旅行，就好像被看不见的力量拉起衣袖，踉踉跄跄地给扯到悬崖边上，然后回到家里，坐在柔软而熟悉的沙发上，深感还是家里好。是这样的吧？

不如说，这类似于一种病。我们（至少我）从书架上取出地图翻开，放在桌面上定定地注视。地图是个富有诱惑性的东西，上面铺展的是自己尚未去过的地方。它稳稳地、默默地而又挑衅性地冲着我们。闻所未闻的地名比肩接踵，涉所未涉的大河流淌不息，见所未见的高山连绵不断。不知何故，湖泊和海湾也显得风情万种，连不三不四的沙漠看上去也那么浪漫，那么难得。

盯视着地图上自己未曾到过的场所，一颗心就像听到女妖的歌声一样被迅速吸引了过去，胸口怦怦直跳，肾上腺素如饥饿的野狗一般沿着血管横冲直闯。我知道自己的皮肤寻求新风的吹拂。机会的气味犹如破城棰一般急剧地敲响门扇。我觉得一旦去到哪里，就会碰上足以使人生发生激烈摇晃的重大事件（其实那样的事只能发生在极为象征性的领域）。

如此这般，我照例同搞摄影的松村映三君两个一起动身，踏上为时两个多星期的漫长的横穿美国之旅。路线不是有名的往南转的“Route 66”，而是半拉子内行人所钟情（具体如何不得而知）的北转路线。伊利诺伊州、威斯康星州、艾奥瓦州、明尼苏达州、南达科他州、爱达荷州、怀俄明州、犹他州……而且要充分投入时间，不走枯燥无味的州际高速公路，而以地方性的后方道路为主。

不过，我自己的大众COLLARD用来长途旅行未免有点辛苦（屁股痛，行李放不多），决定租用沃尔沃850客货两用车。一开始也想租用传统型号的美制旅行车，但亲眼见到实物，却不由为其恐龙般的非现实体积所压倒，终究不战自退。想想那玩意停成一排都冒冷汗。老实说，沃尔沃虽然不能说多么富有刺激性，但车座状况极好，两个星期坐下来身体几乎不痛，腰有问题的人不妨一用。

“那样的旅行无论如何也奉陪不起，我还是回东京落个轻闲算了。”我把这么表示的老婆从波士顿的罗甘机场送上飞往成田的飞机（想法相当明智），然后直接奔赴西海岸。我们的目的地是大约八千公里外的洛杉矶长滩。

首先从马萨诸塞州穿过纽约州，从尼亚加拉一带暂且进入加拿大（尼亚加拉那地方去多少次都让人心烦），造访家住多伦多的日本文学研究专家特德·格森。很久以前他就邀我前去，遂利用其好意顺路去了那里。特德本是美国人，因越南战争期间讨厌当兵而搬到加拿大，就势定居下来。他在距多伦多一小时远的一座山里拥有隐居用的小别墅，我们住了进去。深山老林，听说有河狸、豪猪、鹿、狼和浣熊等出没。喝着葡萄酒，听着鲍勃·迪伦的老唱片（唔，我们就属那一代），烤着大马哈鱼，吃着院子里摘来的芦笋，一个晚上说了很多很多话。还有……啊，不好写这个。

再次从加拿大穿过国境，朝底特律驶去。接着经过衣阿华州、印第安纳州赶往芝加哥，一路上没什么有趣的事。老实说无聊至极，不过是看着前方踩加速器，眼望驶过的印象平淡的景色罢了。每天平均行程约五百公里，两人轮换驾驶，住进怎么看都看不出名堂的汽车旅馆，早上吃薄烤饼，中午吃汉堡包，天天如此，周而复始。变化的惟有汽车旅馆：HOLIDAY INN、COMFORT INN、BEST WESTERN、

TRAVELOG……

不，准确说来也并非全都无聊。有一件事不能说是无聊，那就是车相当频繁地被警察拦住。其实我们开车并没有胡来（不错，在没人瞧见的亚利桑那沙漠正中，我们是听着埃尔顿·约翰的《英格兰制造》开出时速二百公里，但那终究是例外行为）。美国的高速公路只要不超过十五英里，一般不会被警察拦住。我们打算以十英里左右的速度跟在自然车流之中，不知何故却被拦住了。闪着红灯的警车尾随而来。

"哦，怪事，我们不该被拦住的呀！"正困惑不解之间，警车"呜呜"响起警笛，命令我们靠路边停住。但警察并没有查验我们的驾驶证，只把脑袋探进来左看右看，也没撕下违章票："往下注意别超速。"只拿了一张警告票。

怪事！为什么单单总是我们被拦住呢？后来才弄明白，原来是由于我们开着其他州牌号的旅行车，后车窗贴着黑色遮光纸的缘故。加之松村君有外观上的问题：他晒得黑黑的，从远处看去活像西班牙血统。一句话，此乃毒品贩子的特征。所以警察一看见我们就警惕起来，命令停车以检查车厢里有没有可疑物，如此而已。

但说实话，这很让人吃不消，因为随时随地有蒙面警车目光炯炯地监督我们。假如松村君的外观同米老鼠或辛迪·劳帕[57]相似，我猜想不至于发生这样的问题。不用说，这不是他个人的责任。除了警车的问题，最初五天反正无聊得要死。

旅行终于变得丰富多彩是在穿过芝加哥进入威斯康星州之后。不，"丰富多彩"这一说法也许并不正确。实不相瞒，那里压根儿没有什么多彩的要素。说得确切些，不如说我们周围的环境变得"愈发无聊"更为接近实况。不过，那种无聊是和此前那些地方给我们的无聊不同的全新品种的无聊，对我来说未尝不可称之为极有刺激性。痛快说来，从那一带开始，我们总算进入了美国中心地区（heartland）的中心(heart)。

首先，车内播放的音乐种类整个为之一变，乡村音乐台压倒性多了起来，不管怎么按车内音响装置的搜索键，爵士乐和说唱音乐（Rap Music）都听不到，于是我阴差阳错地对乡村音乐的流行状况

熟悉起来。不客气地说，绝大多数不伦不类，惟独《得克萨斯龙卷风》这首流行歌曲还相当委婉动人（你是得克萨斯的龙卷风，我像一棵倒地的小草任你捉弄……）谁唱的不知道，但这首歌简直成了此次旅行的主题曲，在到达加利福尼亚州之前的路上不知听了多少次，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迈克尔·杰克逊的新歌之类仅仅播过一次……虽然也不是很想听。

在汽车旅馆房间里打开电视，早间新闻报完O·J·辛普森的审判进展之后，竟让我没完没了地听起了“本日家畜价格”，一个年纪蛮大的新闻播音员以一本正经的神情淡淡地报价：某品种某岁的牛多少钱一头，某某品种的猪多少钱一头……一如纽约之播报交通信息，夏威夷之播报海浪情况。根据所念数字的不同，播音员或约略感动，或蹙起眉头。是啊，美国是个货真价实的大国啊，我深切地感到。

晚间打开电视，常常看到乡村舞蹈盛会，头戴牛仔帽、脚穿彩绘长靴的众多男子和头发如棉花糖一般蓬蓬松松的花哨姐妹们随着乡村音乐步伐整齐地跳得兴致勃勃。虽说并无特异之处，但一旦看开了头，往下肯定看得忘乎所以。怎么回事呢？不可思议。

另外一点我不知道的，是这世上居然有乡村音乐专用MTV[58]。从早到晚无休止地播放乡村音乐录像，甚是了得。

车窗外见到的光景完完全全——或许堪称艺术性地——变得单调无聊起来。那里存在的仅仅是牧场、农场和时而闪出的招牌。无论何处、不管哪里、任你去哪，映入眼帘的只是牧场、农场和时而闪出的汽车旅馆招牌。此外几乎一无所见。

道路笔直笔直，直得像托尔斯泰小说中正直的农夫灵魂，让人无法忍受。只要视力足够，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问题是看得再远也没有赏心悦目的景物，因为同样是农场、牧场和时而闪出的招牌。

偶尔对面驶过的车大部分是家畜运输车或敞篷卡车。从波士顿来艾奥瓦所受到的文化冲击，老实说，我觉得比从东京来波士顿还大得多。在这样的地方天天看牛、日日听乡村音乐，即使不是弗朗西丝卡（艾奥瓦州麦迪逊镇上的那个人[59]），恐怕也会对人生多少感到厌烦，我想。

农舍的样式无论哪家都大同小异：正面有个大大的仓房，有个干饲料库，有长长的围栏。围栏里有许许多多牛。牛固然也是非常可爱

的动物，但多看到底厌了。世间大多事物都有这种倾向——多看则厌——牛也不例外。不但看厌，久而久之，还对看牛这一行为实实在在地感到疲劳。想到世间何以必须有如此数不胜数的牛，不由变得心烦意乱。

每天无论开车跑多远，这样的光景都无休无止无边无际，甚至叫我产生了无谓的错觉，以为看过的牛又跑到前头等我们了。

居然来到了这样一个地方！说到底，以前我所看到的美国不过是这个国家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风景已然如此单调无聊，而一日三餐所去的餐馆和每晚所住的汽车旅馆，其无聊的完美程度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彼此之间在无个性这点上是那样相似，一来二去，哪个是哪个竟然几乎没了区别。

选择汽车旅馆原理上很简单，实际做起来却异常困难。既然哪个都一样，那么选哪个岂不都无所谓？虽说心里这么想，但必须具体选择一家才行。所以一到黄昏时分，就以自暴自弃的心情全无根据地随便选一家出来：噢，这个可以吧！如此日复一日，自己身上原本应有的什么好什么不好的价值基准就逐渐摇摆模糊起来，不骗你。每当汽车旅馆这个图像浮上脑海，思维能力就差不多同时蒙上一层乳白色雾霭似的东西，我们被吞入状如特长管道的“持续性”之中。在那里，时间如金太郎饴糖[60]一般流移，前后区别无从察觉。昨天与明天的边界无从分辨，日常与非日常的不同无从知晓，感动与不感动的分野无从判定。那里存在的，仅是电视与床与浴室之类符号而已。电视与床与浴室，电视与床与浴室、电视与床与浴室，如此循环不止，无休无止，人心任其慢慢蚕食。

旅行期间我一直在写日记（无论怎样的旅行我都认真写日记，因为人的记忆——尤其我的记忆——根本靠不住），但关于美国中西部的汽车旅馆和餐馆到底半途而废——实在想不出有什么东西可写。因此，现在翻看手册也找不出什么，几乎清一色是汽车旅馆名称和房费，没有所谓特征。就算有特征，其特征也没有特征含义。不具有特征含义的特征，类似排列无序的辞典，再打交道也无非浪费时间罢了，哪里也到达不了。

但有一点，我们在经过一个个如此平庸的汽车旅馆的过程中，就

美国的汽车旅馆获得了一个宝贵经验，那就是：别住带有温水游泳池的汽车旅馆。

这是因为：第一，路边汽车旅馆的温水游泳池又小（十有八九）又脏，休想正常游泳。第二，由于建筑物中有温水游泳池（几乎都设在天井），整座建筑物潮乎乎的。总之，整个儿像一大桑拿馆，每每如此。我们给这类温水游泳池害得好苦，投住印第安纳州一个小镇的汽车旅馆时差不多彻夜未眠，难受得简直令人想起曼谷机场过境旅客休息室。诸位务必当心，千万别住带有温水游泳池的汽车旅馆。除此之外，关于汽车旅馆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关于餐馆也没有值得一提的。到底在那里吃了什么——为了维持生命肯定要吃什么——我几乎想不起来。一如不幸的幼儿时期的阴暗记忆被塞进意识壁橱的深处，而我又没心绪挖掘出来，全然没有。

---

[56] 2—4人在室内玩的一种拼字游戏。

[57] 美国著名女歌手（Cyndi Lauper，1953—）。

[58] Music television之略，美国专门播放大众音乐的有线电视。

[59] 指《廊桥遗梦》的女主角。

[60] 一种日本手工制作的饴糖，做成日本神话人物金太郎的面孔图案。

 镇名韦尔卡姆，西部唐人街，犹太人

美国有各种各样离奇古怪的镇名。明尼苏达州有个名叫“韦尔卡姆（WELCOME）”的镇。我和松村君在空荡荡平展展、除了牛几乎别无所见的中西部持续不断地向西行驶，有些累了，瞧见招牌便情不自禁地一晃儿驶下高速公路，心想到了镇上说不定会碰上什么好事、见到什么有趣的东西。镇的入口处竖着一块简易招牌：“WELCOME 人口790人。”我们大致从镇的这头开到那头（入口处稍往前一点点就是那头），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中西部乡间小镇，除了镇名，其他谈不上有什么特征。进了镇也没有人围上来呜呜哇哇口称“欢迎”，没有满面笑容的妇人向远方来客献上一杯冰红茶。相反，一辆似乎怀疑我们来历的警车尾随了好一阵子，让人不是滋味。哼，真想说一句这算哪家子WELCOME……算啦。

这里的男人全都不约而同地头戴帽子。帽子不是斯泰特逊就是拖拉机厂的棒球样式。走路不戴帽子的人基本上没看见。黑人也几乎（或者不如说一个也）没见到。吸烟的人多。没怎么见到无咖啡因咖啡，没有人看布莱特·伊斯顿·埃利斯的书，没有温顿·马尔萨利斯的粉丝（大概），没有酥壳蛋糕（Quiche）。不知为何，海象一般肥胖的人比比皆是。有的餐馆要啤酒时，杯里却有橄榄——到底什么缘故呢？生来想像力匮乏的我想像不出。

听说在韦尔卡姆前面的南达科他州，一座深山小镇里有往日的唐人街遗址，遂去那里看了看。搞摄影的松村君是满世界专门拍摄唐人街的真正的“唐人街专家”，既然有唐人街，那非去一趟不可。

这座小镇名叫戴德伍德（DEADWOOD），金矿所在地，威尔德·比尔·希柯科曾在那儿的酒馆被枪杀，多少有点名气，如今作为赌场还算相当兴旺。一言以蔽之，就是把拉斯维加斯极度缩小，从中抽去豪华和时髦，再把天气恶狠狠弄坏的地方。主干道两旁一家挨一家全是赌场，大肚子的赌迷们小心翼翼地抱着装有硬币的塑料碗，面对自动赌博机“哗哗啦啦”摇个不停。我对赌博没兴趣，几乎所有赌场都过门不入，只参加了地下唐人街观光团。说是参加，其实团员只我和松村君，并无别人。大家都忙着赌博，没有谁突发奇想去南达科他州深山

老林湿乎乎的洞穴里参观往日唐人街遗址（其心情不是不能理解）。入口有一个脸色阴沉沉的神经质年轻人值班，看样子真是无聊到了极点。

听说淘金热淘出了新的城镇，中国人从洛杉矶冒着印第安人的袭击，在马车的一路摇晃下远远赶到南达科他州的深山老林。没有一技之长的穷中国打工者只要听说有工作，即使万里之遥也不在话下。可是，为什么中国人在镇子下面挖出规模和迷宫一般大的东西呢？其缘由至今也不清楚。一种说法是中国人受镇上白人的欺侮，半夜不敢在地面走动（当时西部兵荒马乱）。另一种说法相反，是中国人为躲避白人世界、钻入自己的空间单独居住而建造了秘密地下家园。的确，地下通道中连吸鸦片和赌博用的小屋都准备好了。我一向对地下世界小有兴趣，看得津津有味。不过我想，大家动手挖洞，在一座镇子下面建造仅仅属于自己的“别镇”——当时中国人的想法和能量到底匪夷所思。

顺便说一句。在爱达荷州，我们同样为了寻找往日的唐人街而去了一座叫沃伦的镇。这里是地地道道的深山中的深山，路也没铺沥青。从一般公路进入沙土路，花了两个小时才好歹开到这里。风景诚然十分优美，但最近似乎发生过一次很大的山火，树林烧得一片狼籍。西部大多数的金矿镇如今都成了ghost town[61]，惟独沃伦至今仍在开采，或者说是候补ghost town。这是因为，这里仍有二十来人在有气无力地继续淘金。为此有一家以这些人为对象的小沙龙般的酒吧，此外别无店铺。生活物资由直升机运来。住在这座镇里，好像一下子进入了被历史潮流遗忘的场所。我走进镇上的酒吧，喝着百威生啤，吃着香菇汉堡包。女服务生虽不特别冷酷，但感觉上仿佛在说吃完赶快走吧。看情形不像是外国人受欢迎的地方。

酒吧里卖一种“白猫头鹰例行射击运动会”T恤，当然这是针对鼓吹保护白猫头鹰的环保主义者的嘲讽。笑话的品位固然不太高，但终究是笑话。顺便提一句，我们的沃尔沃新车同这地方根本不协调，沃伦镇人只乘卡车，别说沃尔沃，乘别的汽车的人也一个也没见到。

在淘金热时代，这里也有很多中国人赶来，挖金子、耕田种菜。他们住过的房子和用过的餐具现在还好端端留在那里。此镇（不如说

是村落）有个农业局的小小农业站，一个往墙上涂漆的高中生模样的女孩向我们热情介绍了沃伦镇的由来。按唐人街研究专家松村君的说法，在这样偏僻的地方，中国黑社会也曾伸手进来，在为同胞介绍工作的同时通过赌博和鸦片把他们的钱卷走。卖淫过去好像也很盛行，有种种关于美貌中国姑娘的传说留下来。不过在农业站领到的正经资料里，关于赌博和卖淫只字未提。

不可思议的是，沃伦镇一带的石头全都闪闪发光，一派炫目，流经小镇的小河河底也金光灿然。拾起石头一看，原来有一层薄薄的金箔像青苔一样紧紧附在表面。起初以为没准这就是真正的金子，很卖力气地拾了一堆，继而心想这里不是传说中的Zipangu[62]，不可能遍地落满黄金，自觉傻气，遂作罢。想必是只发光而别无太大价值的矿石。不过，在这往日的金矿小镇里，目睹着脚下沙石被太阳照得金光闪闪，还是觉得像被狐仙迷住了似的。风景相当奇妙。虽说不是汉弗莱·鲍嘉主演的电影《黄金》，但黄金这东西或许真有一种令人心荡神迷的魔力。

翻过落基山脉，从爱达荷州一进犹他州，西海岸即在眼前。在犹他州，住在过去的塔夫茨大学同事查尔斯·井上先生（研究泉镜花[63]）的父母的花园里，因为查尔斯总是劝我去犹他州看看，说犹他州是个极好的地方。查尔斯的父亲是第二代日裔，战争期间因reolcation[64]，从加利福尼亚送进了怀俄明州的收容所，战争结束后也没返回故乡加利福尼亚，而在相邻的犹他州定居下来，靠着白手起家，如今在一个叫加尼逊的小镇郊外拥有七百五十英亩农园，子女都是医生、律师和大学教授等专业人士。他们全是摩门教的信徒，不饮酒，不喝咖啡，由于曾来日本传教，日语非常好。他们的孩子到了一定年龄，也无一例外地在布里加姆·扬大学接受训练，然后作为传教士前往日本。

战后为什么没有返回加利福尼亚州而改信摩门教呢——这样的例子少而又少——关于这点我到底没问，想必老人在收容所期间想了很多很多。住在旁边的老人的儿子、医生德怀特（和我同年）说："日本人在战争期间受了很多迫害，而摩门教徒在美国历史上也一直受迫害，这里面大概有相通之处吧。哪一方都是以勤劳为美德的规规矩矩

的老实人。啊，倒也不是说所有人都那样……”

把摩托雪橇装进卡车，和德怀特一家去山上玩雪时（附近山顶6月也有雪），我问他：“对您来说，世上最最宝贵的是什么呢？”“家庭。”德怀特说，“没有比家庭更宝贵的，那是一切的基础。”卡车的仪表板上很自豪地摆着竞选高中学生会主席的英俊的儿子的照片。儿子高中毕业就将去日本传教。

不过，在犹他州不能喝酒让人很不习惯。全州所有人都滴酒不沾，无一例外，连咖啡也几乎不喝。我脑子里想两三天不喝酒又有什么呢，但真的不喝又有些想喝。人之常情。白天一般都很热，所以傍晚来临时很想“咕嘟咕嘟”喝一杯啤酒，然而无论去哪里都很难要到啤酒。镇上连酒馆也没有，旅馆里基本上不供应酒，于是只能大口小口地喝冰红茶。

在靠近亚利桑那州的锡达城投宿汽车旅馆，服务台里坐着两个黑西装白衬衣黑领带极有摩门教传教士意味的青年，我虽然心想恐怕不行，但口渴得厉害，慎重地问哪里有能喝啤酒的餐馆。毕竟快到州境了，难免有侥幸心理。两个青年皱起眉头，客气地（但不无冷漠地）答道：“噢，对不起，您二位还在犹他州。”意思仿佛是：既然那么想喝啤酒，就去亚利桑那州喝个够好了！如果可能，作为我何尝不想那样，问题是到州境还要两个小时，而我不想再开什么车了。天热得要死，我们累得要死，累得像死狗，像一段木头。

出门问了很多很多人，听说镇郊有“类似”酒吧的场所。实际去那里一看，实在不成样子，再渴也没心情进门。以前在费城偏僻的乡间，我也到过同样有宗教性质的镇，进过外观同样阴沉的酒馆，因此十分清楚，那种地方肯定像《铁面具》中出现的地牢一样阴暗，感觉湿漉漉粗拉拉的，就像周围的破烂东西统统随风聚到了一处。进这样的地方喝啤酒，根本喝不出滋味。

只好死心塌地，吃了一顿没有酒精陪伴的味同嚼蜡的晚饭。之后在车里翻了个底朝天，翻出一罐几天前在加油站买下来以后扔在那里的如马尿一般温吞吞的百威，用旅馆里的冰块冰了，两人各分一半，一小口一小口喝了。尽管不解馋，但的确是最高享受。

犹他州风光秀美，地方特色也令人兴味盎然，不过说实话，进入

亚利桑那州荒凉沙漠正中一座荒凉小镇，在第一眼看到的酒吧里要了冰镇百威啤酒“咕嘟咕嘟”大喝特喝的时候，我们还是舒了口长气。这个该遭天罚的世界上的无可回避的现实已经一点一点渗入我的体内，真真的，酷酷的。唔，人世就该是这个样子，我想。

过了亚利桑那州（就我们实际路过的部分来说，除了仙人掌和加油站，没什么值得一提的），驶入内华达州，即将到达赌城拉斯韦加斯。我这人向来对赌博没有兴趣，不过既然来一次有名的拉斯维加斯，日暮以后还是穿上茄克去赌了一回。买了牌，这里那里转动赌盘，随心所欲地把筹码放在上面，或许该说是Beginner's luck[65]，居然碰巧凑到了一百七十美元筹码。心中大喜，用赢来的钱一气买了许多旧唱片。拉斯韦加斯找起来也有几家旧唱片店，有的店里可以发现非常有趣的东西。

话又说回来，到底怎样性格的人会专门跑到欢乐之都拉斯韦加斯，在一股霉味的旧唱片店里一个劲儿找来找去呢？恐怕也只有因赢了一百七十美元而乐颠颠地径自离开赌盘那样的性格谦恭（或者说穷惯了）的人吧。

再说搞摄影的松村君，他比我厉害，在自动赌博机那里赢了满满两手的筹码，结果紧张得肚子急剧作痛，回房间大泻一通，泻罢面容憔悴地折回来说：“呃，看来我不是适合赌博的啊！”估计是那样，全然不适合赌博。这么着，两人在拉斯维加斯既未穷困潦倒，又未一夜暴富，仅仅旧唱片又多些罢了。不过，时至如今，吉米·史密斯[66]的密纹唱片再多又能怎么样呢？

离开内华达州，终于进入我们旅行的最后一站加利福尼亚州。除了仙人掌一无所见的沙漠在四周无限铺陈开去，笔直笔直的高速公路在沙漠正中尽情伸展。只是，此前几乎没有车辆对面驶过的空空荡荡的州际高速公路忽然拥挤起来，颇像平日的东名高速公路[67]。爬完漫长的坡路，过得山顶，远方一个奇妙的白色巨块清晰可见，犹如失去归宿的魂灵。形状扁平扁平的，看上去像是能够直接放在盘子上，用刀一切两半。想了一会儿，终于明白原来那就是作为洛杉矶名胜的烟雾。

这很有些让人莫名其妙。看不见大都市的剪影，看不见太平洋湛

蓝的海面，又不是作为什么特殊的东西出来迎接我们，只不过是让人翻过山顶瞧见远处有白色烟雾时心想“原来那就是洛杉矶”罢了，其中没有“啊，我们终于横穿美国大陆到达西海岸了”那样发自内心的激动——虽然也不是反高潮[68]。

类似感慨的心情，是在我们下了坡驶上洛杉矶郊外六车道的快车道，整个被那烟雾吞没的时候蓦然产生的：“啧啧，这可真是个大国，旅程真够长的了！”虽然这么说未免煞风景。

---

[61] 被遗弃的无人居住的城镇，幽灵镇。

[62] 马可波罗《东方见闻录》对日本的称呼。意为“黄金之国”，引起了读者对东方的兴趣。

[63] 日本小说家（1873—1939）。著有《高野圣》等。

[64] 重新安置。此处指美国政府在二战期间对日本侨民的强行迁徙和安置。

[65] （赌博当中）好运气往往降临初学者头上。生手的运气。

[66] 美国当代的电风琴爵士乐手。

[67] 日本东京和名古屋之间的高速公路。

[68] Anticlimax，（电影）让观众感到失望的结尾。


走去神户

1995年5月，独自从西宫走去神户。反正我想走一次试试。这篇文章没指望稍后在哪里发表，是为自己写的，归终也未能想起发表的地方，就收在这本书里了。写故乡是非常困难的事，写受伤害的故乡就更难了。此外再没什么好说的了。松村映三君后来沿着我行走的路线拍了照片。



走去神户

1

我想一个人从西宫一带花时间走去神户三宫——动这个念头是今年5月的事。偶尔去京都办事，要在那里住一晚上，就直接转去西宫了。从西宫到神户，看地图也就十五公里左右。虽说决非近在咫尺，但我对脚力算是有自信的，再说也不是走起来多么辛苦的路。

户籍上我出生在京都，其实出生不久就迁往兵库县西宫市的夙川，又很快搬到相邻的芦屋市，十五六岁之前主要在这里度过。高中位于神户的山脚下，所以去玩的地方自然是神户的闹市区三宫一带。如此这般，成为一个典型的“阪神间[69]少年”。当时的阪神间——当然现在也可能那样——作为从少年向青年过渡的场所是很叫人心情愉快的。安静，悠闲，有一种自由自在的气氛，依山傍海，大城市离得很近。可以去听音乐会、去旧书店物色廉价软皮书、泡爵士酒吧，也可以在艺术电影院看新潮影片。穿的衣服当然是VAN夹克。

去东京上大学和在那里结婚工作以后，就很少返回阪神间了。偶尔回故乡一次，办完事就乘新干线赶回东京。一来生活忙，二来在外国生活时间也长，还有若干私人情由。世上有人不断被故乡拉扯回去，相反，也有人总觉得无法返回，这种不同多数是因为命运的力量，而不是因为思念故乡的程度轻重。我看来好像属于后者，情愿也罢不情愿也罢。

父母一直住在芦屋市。1995年1月阪神大地震后，房子几乎不能住了，父母很快迁往京都。这样，作为将我同阪神间连在一起的具体纽带，除了记忆的累积（我的重要资产）就荡然无存了。所以，从准确意义上说，那里已不能再称为故乡了。这一事实给我带来了若干失落感。记忆之轴在我体内发出轻微的吱呀声，极为物理性地。

然而反过来看，或许正因如此，我才想以自己的双脚一步步好好走一走，才想验证一下失去自然纽带的“故乡”在自己眼中是什么样子，才想从中查看自己的身影（或身影的影）呈何种状态。

还有一点，我想知道两年前那场阪神大地震给我长大的地方带来

怎样的影响。地震后我去神户看了几次。不用说，其创伤的严重让我深受震动。但经过两年，这座看上去终于恢复平静的城市实际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那场巨大的暴力从城市中夺去了什么，又为城市留下了什么呢？我想亲眼确认一下，因为那恐怕是同我本身现今的存在有着不小关系的事。

我穿上胶底旅游鞋，将笔记本和小照相机装进挎包，在阪神西宫站下车，以此为出发点向西慢慢走去。天气好得需要戴太阳镜。首先穿过南口的商业街，上小学时常常骑自行车来这里买东西，市立图书馆也在这附近，一有时间就跑去，在阅览室里一本接一本贪婪地翻看各种各样的少年读物。因此，这一带让我感到十分亲切。

只是，最后一次来这里已是很久以前的事，商业街变得几乎看不出来了，至于其变化在多大程度上是时间推移带来的，多大程度上是地震的物理性灾害导致的，我无法作出正确判断。尽管如此，两年前地震留下的伤痕依然历历在目。建筑物倒塌后的空地就像掉牙后的豁口一样散在各处，预制件组装的临时店铺一家接一家地把它们连接起来。用绳子隔开的空地上，夏日的绿草一片繁茂，路面的沥青残留着不吉利的裂纹。同广为世人瞩目并迅速复兴的神户中心商业地段相比，不知为什么，这里留下的空白显得滞重、沉寂和深刻。当然，这也不限于西宫的商业街，同样带有重伤的场所在神户周围应该还有很多，多得说不过来。

走过商业街，穿过马路，便是西宫的戎神社，很大的神社。院内有茂密的林木，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对我们小伙伴来说，这里是理想的玩耍场所，但那伤痕一看就令人心痛。沿着阪神国道排列的硕大的不夜灯，大部分失去了肩上的灯盏。灯盏就像被锋利的刃器削掉的脑袋一样，乱七八糟地掉在脚前的地面上，剩下的灯座成了失去意识和方向的石像，犹如梦中出现的象征性图像，一声不响沉甸甸地排列在那里。

小时候常去钓小虾（在拴有细绳的空瓶里放入面粉饵料投入水中，小虾就会钻进来，在适当的时候提起空瓶就行，很简单）的水塘上，老石桥崩塌了，无人理睬。水就像慢慢花时间熬煮过似的，黏糊糊黑乎乎。年龄不详的乌龟们在干巴巴的石块上不思不想地慢悠悠晒

着龟壳。剧烈破坏的痕迹活生生的无所不在，使得这一带看上去甚至像是某种遗址。惟独神社院内茂密的林木超越了时间，静悄悄暗幽幽的，和我记忆中的往日形象一般模样。

我在神社院内弓身坐下，在初夏的阳光下再次环视四周，让自己适应这里的风景。我想把风景自然而然融入自己的身心——意识之中，皮肤之内，作为“或许自己曾经如此的东西”。但为此要花很长时间，不言而喻。

2

从西宫走去夙川。到正午还有些时间。暖洋洋的天气，走得一快就汗津津的。不看地图我也晓得自己现在走在哪一带，但并非每一条路都有印象。过去应该走过，却毫无记忆。为什么这般没有记忆呢？我觉得不可思议。老实说，甚至可以称为困惑，就好像回家一看，家具全部换过似的。

原因很快明白了：空地的位置犹如正负极颠倒。就是说，本应是空地的早已不再是空地，而原来不是空地的如今成了空地。前者多数由空地变成了住宅，后者则大部分老房子因大地震而化为乌有。如此两个作用（相继）重合，使我记忆中的往日街区光景相乘式地变成了虚拟物。

夙川附近我住过的老房子也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一排仿佛集体宿舍的建筑物。相距不远的一所高中，运动场成了地震灾民临时栖身的住宅区，我过去打棒球玩耍的那一带，密密匝匝地晾满了在那里生活的人们的洗涤物和被褥。凝目细看也几乎不见往日的面影。虽然河水一如往日地清澈动人，但目睹河床被混凝土加固得整整齐齐，感觉上总有些奇妙。

朝海那边稍走几步，进入一家小寿司店。因是星期日中午，看样子正忙于外卖。跑外卖的年轻人许久不归，店主接电话接得焦头烂额。整个日本随处可见的场景。我半看不看地对着电视喝啤酒，等着点的东西上来。兵库县知事就震后重建同嘉宾谈着什么。至于谈的什么早已忘光，现在也想不起来。

爬上防波堤，往日眼前一片大海，无遮无拦。小时候每到夏天就天天在那里游泳，喜欢海，喜欢游泳，钓鱼，每天领着狗散步。喜欢在那里一动不动地静静坐着。半夜从家里溜出来和同学一起跑到海边，捡来漂流木，升起篝火。喜欢海的气味，喜欢远处传来的海涛声，喜欢大海运送来的东西。

然而现在那里也没有海了。近山近海的阪神间对于土木建筑业来说是极为理想的场所，山削平后建起整齐漂亮的住宅，被填平的海上同样排列着漂亮的住宅，施工期间正是我去东京不久后开始的经济起飞、列岛改造热如火如荼的时候。

我现在在神奈川县一座海边镇子拥有住宅，在东京与小镇之间跑来跑去。这座海边小镇如今比故乡还强烈地使我想起故乡——说遗憾也十分遗憾——那里有还能游泳的海岸，有翠绿的山林。我想以我的力量保护这些东西，因为消逝的风景是不可能再回来的，暴力装置一旦被人打开就决不会关闭。

防波堤对面、曾经的香栌园海水浴场一带，周围已被填埋，形成一个不大的海湾（或池塘）。一伙帆船手正在那里捕捉风力。就在其两侧，往日的芦屋海滩上，排列着如集成电路一般呆板的高层公寓。近海那里，开着面包车和旅行车赶来的几家老小用自带的煤气炉烧烤，即所谓outdoor[70]。烧烤鱼、肉和青菜的白烟，作为星期日赏心悦目场景的一部分，宛如狼烟一般向天空静静攀升。天空几乎万里无云。5月午后恬适的风景，甚至不妨说完美无缺。然而在我坐在混凝土防波堤上凝望曾有真正的海出现之处的时间里，那里存在的一切就好像轮胎漏气一样在我的意识深处静静地、一点一点地失去现实意味。

很难否定那片平和风景中含有暴力的余韵，我觉得。那暴力性的一部分就潜伏在我的脚下，另一部分潜伏于我们自身的内部。一个也是另一个的隐喻（metaphor），或者二者是可以互换的。它们如做同样梦的一对野兽在那里沉睡。

跨过小河进入芦屋市。走过曾就读过的初中，走过曾居住过的房前，走到阪神芦屋站。看车站广告画，上面说星期日（今天）下午2时在甲子园球场有“阪神：益力多”day game[71]。于是突然想去甲子园球场看看。旋即改变计划，乘上开往大阪的电气列车。比赛刚刚开

始，现在去，可以赶上三局。没走完的路明天继续不迟。

甲子园球场和我小时候的差不多，让人由衷产生一种亲切感，简直就像time slip[72]。球场上有变化的，一是没人背着水珠花纹塑料罐卖CALPIS[73]（世上好像没多少人喝CALPIS了），二是外场记分板变成电子显示的（白天因此看不清字）。球场的颜色一样，草坪绿色一样，阪神球迷也一样。地震也罢革命也罢战争也罢经过几个世纪也罢，惟独阪神球迷的着装不变，不是吗？

由于川尻和高津[74]的对投，结局为1比0，阪神获胜。虽说只差一分，但比赛没有太大刺激性。总的说来，几乎没什么看点。再说得极端些，一场不看也无所谓的比赛，尤其对于外场席的观众而言。阳光越来越强，口渴得不得了。喝了几杯冰镇啤酒，作为理所当然的结果，在外场的长凳上昏昏睡去。睁眼醒来，一时不知自己置身何处（我到底在哪里呢？）。灯影斜了，已经伸到眼前。

3

在神户，在眼睛正好看到的一家不大的新宾馆要了房间。住宿的客人大半是团体年轻女客，便是那一类型的宾馆。早上6时起来，抢在通勤高峰之前赶到芦屋川站，从那里继续不很长的徒步旅行。天空和昨天大不一样，阴云密布，略略发冷。报纸上的天气预报极有自信地宣称下午开始下雨。专门预告坏信息，一如卡桑德拉[75]（当然说中了，傍晚我被浇成了落汤鸡）。

在三宫站买了早报，上面说在须磨新区（想必那里也是劈山造出的新城，地名不熟悉）有两名少女遭袭，一人死亡。“路魔”仍未被捕，线索也几乎没有得到。有小孩的居民为此惶惶不安。当时还没发生土师淳[76]遇害事件。不管怎样，都像是以小学生为目标的一种悲惨而无意义的犯罪。我基本不看报纸，连有这样的事件发生都不晓得。

报道的字里行间回荡着平板而又异常深重的令人不寒而栗的低音。我把报纸折起来，心想一个男人大白天在街上转来转去，有可能被人投以奇妙的目光。新的暴力阴影使得位于那一场所的我的新意义上的“异物性”呈现出来，我觉得自己似乎是卷入错误场所的不速之

客。

我沿着阪急电车线靠山一侧的道路，不时迂回往西走去，大约三十分钟后进入神户市。芦屋是一座南北狭长的城市，东西向走起来，转眼之间就穿了过去。左盼右顾行走之间，这里那里仍然有地震造成的空地闪入眼帘。没有居民气息的歪斜房屋也时而入目。阪神地带的土质虽说与关东不同，但也同是山沙地，不湿不黏，颜色泛白，空地因而格外醒目。地面草丛又绿又密，鲜明的对比很刺眼睛。那让我联想起留在亲人白色肌肤上的大外科手术遗痕，其场景势必超越时间和状况而物理性地刺着我的皮肤。

不用说，那里有的并不是仅仅是杂草丰茂的空地，也出现了几个建筑工地。估计不出一年，那一带就会有新房栉比鳞次，彻底改观。新瓦沐浴着新的阳光闪闪耀眼。而那样一来，那里新产生的新风景同我这个人之间恐怕就没有不言自明的共有感存在（应该不存在），地震这个无坚不摧的破坏装置强制性地暴露出来的新分水岭有可能存在于二者之间（很有可能）。我仰望天空，将微明的早晨的空气深深吸入肺腑，思索着培育我这个人的这方土地，思索由这方土地培育的我这个人，思索这不妨称为无可选择的事项。

走到相邻的阪急冈本站，我打算随便走进一家饮食店吃优惠价早餐。回头一想，早上到现在还什么都没吃。不料，一早开门的饮食店一家也没找到。想起来了，这里不是那类地方。无奈，在国道旁边的罗森便利店买了面包，坐在公园长椅上独自默默吃了，又喝了易拉罐咖啡，然后把此前路上见到的记下来。休息片刻，接着读了几页装在衣袋里的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记得高中时代读过，昨晚不期然地在宾馆床上再次读起，读得如醉如痴。为什么过去没读出这部小说的精彩呢？想到这里，甚觉不可思议。大概是因为想别的事情了。

遗憾的是，下一站御影站也不存在优惠价早餐。我一面忘情地想像着又香又浓的热咖啡和切得厚厚的涂着黄油的烤面包片，一面沿着阪急电车线继续默默前行，依然走过几块空地和几处建筑工地，同几辆把小孩从学校送往车站的E级梅赛德斯·奔驰擦肩而过。梅赛德斯·奔驰当然没有瑕疵，没有污渍，一如象征之没有实体，流移的时间之没有目的。那是同地震、同暴力没有关系的事物，大概。

在阪急六甲站前，我做了一点妥协，走进麦当劳，要了鸡蛋黄油脆皮面包（三百六十日元），总算化解了深度海啸般的饥饿，休息三十分钟。我觉得自己被组合为巨大的（麦当劳式的）虚拟现实的一部分，或者成了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但实际包围我的，不过是个别现实，无须多想。好也罢不好也罢，仅仅是个别性暂时迷失归宿罢了。

想到是特意来到这里的，于是任由额头浮起一层细汗，爬上陡急的坡路，走到从前就读的高中跟前。以自己的双腿行走在从前总是乘满员公共汽车行进的路上。拓平山坡建成的足够大的运动场上，女生在上体育课，打手球。周围静得不得了，除了她们不时发出的招呼声，几乎不闻任何声响。由于过于安静，我甚至觉得自己是因为某种原因而滑进了错误的时间层面。为什么这般安静呢？

我一边遥遥地俯视着眼下发着幽光的神户港，一边侧耳倾听，看能否听见遥远往昔的回声。但什么也没传来耳畔。借用保罗·西蒙老歌的歌词来说，听见的惟有沉默的回响。也难怪，毕竟一切都是三十多年的事了。

三十多年前的事——是的，有一点我可以明确断言：越是上年纪，人越是迅速地变得孤独，人皆如此。不过也可能不对。这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人生只不过是旨在适应孤独的一个连续过程罢了。果真如此，就不该发什么牢骚。说到底，牢骚又向谁发呢？

4

起身离开高中，颇有些麻木地走下长长的坡路（也是因为多少有点累了），直接走去新干线的新神户站。走到这里，距目的地三宫就没有多远了。

由于时间充裕，出于纯粹的好奇心，我走进站前刚刚开业的堂而皇之的东洋宾馆，在里面咖啡屋的沙发上深深坐了下去，终于捞到今天第一杯像样的咖啡。我把挎包从肩头撤下，摘下太阳镜，做了个深呼吸，放松双腿。忽然想起该上卫生间，早上离开宾馆以后小便还是第一次。折回座位又要了一杯咖啡，之后舒了口气四下打量。地方大得有些过分。和港口附近原有的神户东洋宾馆（因地震现在停业，那里有一种大小恰到好处的亲密感）相比，印象相当不同。较之大，或

许说“空荡荡”更接近实况。看上去总好像刚建成的木乃伊数量不足的金字塔。不是我吹毛求疵，很难认为这是我想住的宾馆，至少不符合我的口味。

几个月后，正是这间咖啡屋发生了暴力团伙持手枪乱射的事件，两人被夺去生命。当然，那时的我不可能想到会发生这类事件。但不管怎样，我还是在那里隔着若干时差，同另一种“即将到来的暴力”阴影偶然擦肩而过。想到这里，觉得“偶然”这东西颇有些不可思议。过去、现实、未来三者如立体交叉一般走来串去。

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么深入这么持续地处于暴力的阴影之中呢？四个月后，我在回顾这次不算长的徒步旅行，伏案写这篇文章过程中，不由得这样想道。我觉得，即使把现在的这个神户切割下来，一种暴力也还是同另一种暴力宿命地（现实地或比喻地）紧紧连在一起。那里面莫非有某种时代性的必然不成？还是说仅仅属于巧合呢？

我离开日本在美国生活期间，恰有阪神大地震发生，两个月后有地铁沙林毒气事件[77]发生。对我来说，似乎是极具象征意味的连锁事件。那年夏天我回到日本，稍事休息后开始采访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的受害者，一年后出版了《地下》（Underg round）那本书，写的就是理应潜伏在我们社会脚下的暴力性——平时被我们忘记、但现实中作为可能性存在于那里的暴力或以暴力形式凸显于现实的可能性。正因如此，我才选择“受害者”而未选择“加害者”作为采访对象。

从西宫去神户的路上，我独自默默走了两天，始终边走边思考这个命题。一面在地震的阴影中移动脚步，一面持续思索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究竟是什么，或者拖着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的阴影持续思索阪神大地震究竟是什么。两件事不是孤立的，解开一件，恐怕就会更为明快地解开另一件，我是这样认为的。那既是物理性的，同时又是心因性的，或者不如说心因性本身即是物理性的。我必须在那里找出属于自己的回廊。

如果再补充一点，“我现在究竟能做什么”这一更重大的命题也在那里。

遗憾的是，我还不拥有关于这些命题的富于逻辑性的明确结论。我尚未具体抵达任何地方。现在的我所能做的，只能把自己的思考

（或视线，抑或双腿）所移经的现实路程作为不确定的散文盛进anticlimax的容器里表现出来。不过如果可能，我希望大家理解，归根结底，我这个人只能通过开动自己的双腿、运动身体、物理式地粗线条地一一历经这一过程才能前进。这很花时间，时间花得令人不忍。但愿不至于为时已晚。

终于走到三宫，身上出了不少汗。并非多么大不了的距离，但总比早上散步走的路长。在宾馆房间来个热水淋浴，洗发，冰箱里取出一瓶冷藏的矿泉水一饮而尽。我从旅行箱里拿出新衣服换上：藏青色马球衫，蓝色棉质外衣，驼绒色粗布裤。脚有些肿，单单这个不能换。还有脑袋里悬而未决的模模糊糊的意念——这个也无法取出。

想不出特别想做的事，遂上街看随便碰上的电影。虽不能让人感动，但也还不坏。汤姆·克鲁斯主演的。休整身体，打发时间。人生中的两小时因此流失——没有感动地、并不那么坏地。走出电影院，已近日暮时分。兼作散步走去山麓一家小餐馆，一个人坐在台前要了海鲜比萨饼，喝着生啤。单身客人只我一个。也许是神经过敏的关系，看上去餐馆里的人除了我都非常幸福。恋人们似乎极为情投意合，成伙来的男女大声说笑。这种日子偶尔也是有的。

上来的海鲜比萨饼带有一个小纸条："您吃的比萨饼为本店第958，816枚比萨饼。"好一会儿我没能领会这一数字的含义。我应该从中读取怎样的信息呢？如此说来，我曾和女朋友几次来这里喝同样凉的啤酒、吃带有编号的刚烤好的比萨饼。我们就将来谈了很多很多。说出口的所有预测无论哪一个都彻底化为泡影……那可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这里还有海、有山。

不，海和山现在也有，不用说。我指的是和此时在这里的不同的海、不同的山。我喝着第二杯啤酒，翻开便携本《太阳照常升起》的书页，继续往下读。失去的人们，失去的故事。我很快被那个世界吸引过去。

不久，出门离开。如事先预报的，我淋成了落汤鸡，上下整个淋透，淋得让人心烦。既已淋透，伞也懒得买了。

---

[69] 大阪和神户之间，为日本主要工业地带之一。

[70] 野外，户外，户外运动。

[71] 白天举行的比赛。阪神和益力多为日本职业棒球队的名称。

[72] 日式英语。超越现实时空而过渡到过去或未来世界。

[73] 一种乳酸饮料的商标名称。

[74] 均为棒球队员的名字。

[75] 希腊神话中特洛伊王帕里斯的女儿，被阿波罗神赋予预言能力。因不服从神的旨意而受到诅咒，其预言亦不为人们所相信。曾预言特洛伊战争，后被杀。

[76] 日本神户的11岁少年，1997年被14岁的少年“酒鬼蔷薇圣斗”杀害。

[77] 1995年5月20日，由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内实施的沙林毒气事件。致死2人，231人受害。作者采访了其中62名受害者。



边境之旅

当今时代，旅行后写成文章，甚至写一本书，想起来是很难的事，的确很难。毕竟如今去海外旅行不是多么特殊的事情了，和小田实[78]写《什么都看》的时代不同了。如果想去——就是说只要有此念头并相应拿出一笔钱来——一般都能满世界跑。能去非洲的原始森林，南极都不在话下。甚至可以Package toar[79]。

所以就旅行来说，不管去的地方多么远多么偏僻，脑袋里都一开始就要有“那不是多么特殊的事情”这一念头，否则是不行的。把过度的顾虑啦启蒙啦勇气啦什么的排除掉，而作为“略略非日常性的日常”加以把握——当今时代的游记恐怕该这样动笔才是。就算说“只不过去了一趟那里”多少有些极端，但若给人以“痛下决心”那样的感觉，读的人怕也很难轻松。

在这个意义上，驱车横穿美国大陆和在四国清一色吃了三四天乌冬面相比，究竟哪个是边境就有点闹不明白了。一个困难的时代（笑）。

一般说来，实际旅行途中我不做详细的文字记录，而总是怀揣一个小笔记本，每次都把类似的小标题的词句并列写在那里，如“浴室老太婆！”等等，以便日后翻开笔记本看见“浴室老太婆！”这句话就能很快想起：啊是的是的，在靠近土耳其和伊朗边境的小镇里是有那么一个奇特的老太婆。总之是自己最容易明白的标题即可。便是把这种东西像在海面上做浮标似的一个个连着写下来，同资料抽屉中的索引标题是一回事。一次次旅行下来，逐渐掌握了适合自己的做法。

例如日期、场所名称和各种数字，如果忘了，写的时候就会遇到实际困难，因此作为资料要尽可能详细记录。至于具体记述和描写则尽量避免，不如说在现场就把“书写”这件事忘掉才好。记录用的照相机什么的也几乎不用，而把因此节约下来的精力集中用于观察，以自己的眼睛定定地注视形形色色的东西，把情景、氛围、气味和声音等等清楚地刻录在脑中，让自己成为好奇心的俘虏。反正就是要让自己整个儿淹没在那里存在的现实之中，这是再要紧不过的。让一切渗入

肌肤，让自身当场成为录音机、成为照相机。从经验上说，这么做对日后写文章有用得多。反之，如果不一张张看相片就记不起什么样子，那就压根儿写不出生动有趣的文章。

所以，虽说是采访，但看上去作家很轻松，在现场差不多什么也不做，只是静静地看，单单只有摄影师跑来跑去忙个不停。作家是回来后辛苦。相片洗完就万事大吉了，而作家的作业刚刚开始。对着桌子，以记下的片言只语为线索，让现场在脑海中复活。一般回国一两个月后才能写文章。从经验上讲，采访好像要放这么一段时间才对结果更有利。那时间里，该沉的沉下去，该浮的浮上来，而且只有浮上来的才会水到渠成地连在一起。这样，文章的粗线条就形成了。忘记也是重要的，对于写东西来说。只是，放置的时间超过一定长度会使忘记的事项增多，大凡事物都是有“火候”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对我而言，写游记是非常宝贵的写作修炼。思考起来，游记这东西本来应该做的和小说本来应该做的，差不多是同一回事。绝大多数人都要旅行吧？一如绝大多数人都要恋爱。但将此向谁述说并不是容易的事。发生了这样的事，也去了这样的地方，有了这样的感受——即使向谁这么说，能否真切传达自己在那里的实际感受和“感情水位偏差”也是个疑问，因为那是难度极大的技艺，不如说近乎不可能。而让听的人认为“啊，旅行真是太有趣了，我也想去旅行”或者“恋爱真是太美妙了，我也想来一场美妙的恋爱”更是难上加难。对吧？而设法做到这一点的，不用说，非行家的文章不可。这里需要技巧，需要固有的文体，而激情、爱心和感动等等当然也是需要的。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作为小说家的我来说，写游记是非常好的学习机会——我本来就是因为喜欢写才写的，这里是说在结果上。

我本来就喜欢游记，一向喜欢。海定[80]啦斯坦利[81]啦，小时候就看那样的游记看得入迷。和童话相比，还是更喜欢那类游记，反正就是喜欢。每次翻动书页都激动得不行。斯坦利历经千辛万苦在刚果腹地找到下落不明的探险家利文斯通那个段落，至今仍记得一清二楚。新游记方面，保罗·塞罗的东西也常看。看写得好的游记比实际外

出旅行有趣得多——这种情况也不在少数。

不过前面也说了，如今一个人可以到任何地方去，所谓边境那东西已经不复存在，冒险的性质已彻底变样，“探险”和“秘境”等字眼也迅速落伍，在现实层面几乎不能再用了。电视上至今还在搞那种加长节目，冠以某某秘境等带有大探险时代意味的标题，但几乎没有哪个人会天真得信以为真。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游记来说，当今时代恐怕并非幸福时代。

但不管怎样，旅行这一行为作为其赖以形成的形式，或多或少总要迫使旅行的人改变其意识。既然如此，我认为描写旅行的作业也必须相应地反映其动向，其本质无论哪个时代都不会改变，因为那是游记所具有的本来意义。“去了哪里，发生了如此这般的事，做了如此这般的事”——仅仅连篇累牍地罗列这类奇闻逸事，人们很难读下去的。“哪怕远离日常，也是同日常比邻而居的”——我想必须综合阐明（顺序颠倒也没关系）这一点才行。真正的新鲜的感动正是从这里产生的。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相信即使在边境已经像这样消失的时代，自己这个人的身上也仍然存在着可以造出边境的场所。而追加、确认这样的情思即是旅行。倘若没有这样的终极性认识，纵使跑去天涯海角，恐怕也是发现不了边境的，毕竟是这样的时代。

（根据《波》刊载的访谈《边境之旅》整理而成）

---

[78] 日本小说家（1932—2007）。

[79] 包价旅行。旅行社面向个人策划的旅游。形式虽为团体旅游，但住宿和时间安排等由个人决定（自由行）。

[80] 瑞典地理学家、中亚探险家（Sven Hedin，1865—1952）。曾发现古楼兰遗迹。

[81] 英国探险家、记者（Henry Morton Stanley，1841—1904）。1871年在坦噶尼喀湖附近戏剧性地找到利文斯通。后发现尼罗河发源地和刚果河流域。